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民国人物传

第七卷

朱信泉 宗志文 主编

中华书局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民国人物传

第七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朱信泉 主编
宗志文

中华书局

责任编辑：于世明

DK41/09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民国人物传

第七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朱信泉 主编
宗志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桥中印刷厂印刷

767×1092毫米1/32·19印张·385千字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定价：16.00元

ISBN 7—101—01052—0/K·428

前 言

一九七二年八月，我们接受了编写《中华民国史》的任务，当即召开座谈会研究。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中国剥削制度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中华民国的兴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根据这一认识，我们提出了如下的初步设想：

一、编写《中华民国史》 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方针，绝不能因袭中国封建时代传统的修史方法。

二、写一部书，定名为《中华民国史》，拟分三编：

第一编 中华民国的创立（1905—1912年）

第二编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12—1927年）

第三编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1927—1949年）

三、编三种资料：

第一种 《中华民国大事记》

第二种 《中华民国人物志》

第三种 《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专题资料）

关于人物志，需要写传记的约一千人；列入人名辞典的约四千人；另外还拟编制若干人物表。

如何写传记，我们毫无经验，只预先提出了几点要求：

一 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一个人写传记，必须充分占有材料，认真进行研究。只有对这个人的一生有了总的概念、对他的主要言行有了具体的判断，并且自信这个概念和这些判断是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然后才可以下笔。

二、要求用记叙文，不要写成评传。要通过具体的事实把正确的观点表现出来。不要离开事实材料，作过多的评论。对事实的取舍、详略以至措辞用字，都必须仔细斟酌，务求妥帖。

三、要求真实可信。传记中所写的事实，要经过反复核对，有的还要经过调查研究，务求做到确实无误。凡是有疑问而又查不清的，宁可写或存疑，不要以讹传讹。

四、要求反映一个人全貌的同时又有重点。一个人的传记，要把他的家庭情况、上学情况、主要的经历和言行，总而言之，要把他的生平事迹如实地反映出来。但又不要写成流水帐或年谱。要把最能反映本质的事情，选其中最重要的一两件写得详细、生动些，其余的不妨简略。

五、要求用白话文写，文字要力求简练。没有必要就不要用引文，引文要注明出处。每篇以二、三千字为准，不要写得太长。

六、初稿后面，要附主要参考资料目录。

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编写《中华民国史》，非全国大协作不能成功。即以写人物传记而论，哪个行业的人由哪个行业的人来写最好，哪个地方的人由哪个地方的人来写最好。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不过是抛砖引玉而已。我们希望这批初稿，能引起各方面和全国各地方的兴趣，大家都来写，尤其

是熟悉情况的人动手写，那么《中华民国史》就不难完成了。我们还希望从事史学工作的同志，不但自己动手写，而且要把有关这方面的组织工作承担起来。

一九八〇年五月修改

目 录

邵力子.....	袁钟秀(1)
马君武.....	曾 诚(13)
蒋作宾.....	江绍贞(21)
吴铁城.....	郑则民(29)
王正廷.....	郑则民(37)
王伯群.....	熊宗仁(45)
马福益.....	陈匡时(53)
徐镜心.....	卫香鹏(57)
陈家鼎.....	许 进(62)
王和顺.....	黄碧琴(71)
唐群英.....	罗绍志(77)
许世英.....	郑则民(85)
周钟岳.....	谢本书(92)
任可澄.....	李双璧(99)
赵 伸.....	李希泌(105)
王永江.....	武育文(109)
赵凤昌.....	陈时伟(117)
李宗仁.....	李静之(128)
廖耀湘.....	杨 焜(143)

夏 威	赵世怀(152)
廖 磊	莫凤欣(161)
孙 渡	杨光斗(167)
盛世才	陈宁生(173)
吴克仁	姜克夫(183)
冯占海	霍燎原(188)
王金发	裘士雄 徐和雍(194)
张云山	郑自毅(200)
胡景翼	徐辉琪(206)
罗佩金	李希泌(214)
王士珍	公孙荀(218)
张敬尧	范春荣(228)
龙济光	吴显明(235)
陈炳焜	刘立道(242)
谭浩明	刘立道(246)
沈鸿英	黄秀颖(251)
胡若愚	荆德新(256)
周凤岐	汪仁泽 陈光贻(263)
杨登鹏	吴忠才(269)
张 贞	萧 林(274)
汪精卫	闻少华 丁贤俊(284)
陈公博	闻少华(305)
周佛海	闻少华(315)

周学熙	朱信泉(328)
刘鸿生	熊尚厚(339)
盛丕华	汪仁泽(349)
武百祥	辛培林(357)
孙大有	马国晏 刘 轡(363)
王荆山	马国晏 刘 轡(371)
朱葆三	陆志濂(376)
郑伯昭	陈曾年(382)
张本政	左域封(388)
胡 适	耿云志(394)
蒋光慈	姜献阁(411)
曹聚仁	任嘉尧(418)
任白涛	任嘉尧(424)
王希天	任秀珍(430)
朱惺公	任嘉尧(437)
杨 铨	陈 崧(442)
竺可桢	阎 铁(453)
叶企孙	阎 铁(463)
熊庆来	夏光辅(469)
章鸿钊	李建初(476)
任鸿隽	赵慧芝 王 震(483)
李剑农	萧致治(492)
吕思勉	汤志钧(499)
黎锦熙	白吉庵(504)

李更生	萧致治	(513)
俞承修	姚祚鼎 汪仁泽	(520)
傅东华	王 震	(525)
王闿运	白吉庵	(530)
廖 平	汤志钧	(536)
李苦禅	姜克夫 李 侃	(539)
沈克非	商一仁	(548)
吴耀宗	汪仁泽	(553)
达浦生	陆琢成 朱正谊	(561)
于 斌	阎 铁 沙洵泽	(566)
黄金荣	吴云乡	(574)
《民国人物传》第一至七卷目录索引		(585)

邵 力 子

袁钟秀

邵力子初名景奎，又名闻泰，字仲辉。浙江绍兴人。生于1882年12月7日（清光绪八年十月二十七日）。①父亲邵霜，曾任江苏吴县县丞。邵力子幼年在家塾读书。1902年9月乡试中举人，江苏县令朱智邀任文案，辞未就，径去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学习。②时马相伯在上海创办震旦学院，1905年邵力子进该院学习，因法国神父干涉学院的行政和教学计划，同学罢课，马相伯忿而辞职，邵力子等二十八名学生随之集体离校。马相伯带领学生又创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邵力子入该校学习。③

1907年春，于右任等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进行反清宣传，邵力子参加该报筹办工作。因随于右任赴日本募款，在东京会见了孙中山，赞成孙中山的革命主张。1908年，邵力子与于右任在东京同时加入同盟会。④稍后回国。不久，《神州日报》因遭火灾停刊。1910年又同于右任创办《民立报》，邵任编辑。1913年《民立报》因响应孙中山“二次革命”遭禁停刊，他回到复旦公学任语文教员。⑤

1915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创办上海《民国日报》，以叶楚傖为主编，邵力子为经理兼编辑。同时，邵兼任复旦大学国文系教授，后兼大夏大学

新闻系教授。《民国日报》因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的宣传，受到当局的压迫干涉，经济上也十分困难，邵力子等艰难支撑，有时不得不自己掏钱买纸张，使《民国日报》得以正常出版。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邵力子以极大的热情到复旦大学等处发表演说，报告北京反帝斗争的经过，鼓动广大青年投入运动。他经常充当学生的顾问，分析形势，解答问题，推动了上海的反帝反封建运动。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开始了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民国日报》社一些思想比较激进的成员与主编叶楚傖有了思想上的分歧，邵力子等人便于1919年6月16日在《民国日报》上单独开辟副刊《觉悟》一栏，作为宣传新思想的阵地，由他担任主编。10月，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觉悟》开始创刊时，只占四开一版的大半页，1920年扩大为四开两页，随报附送。从7月份起，每月发行汇刊单行本。它的内容表现了比较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初步的社会主义倾向，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同《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经常展开辩论。它提倡工人组织起来，号召青年到劳动中去，主张妇女解放，关心青年的学习和生活，很受进步读者的欢迎，有许多青年把《觉悟》当做自己的喉舌。邵力子亲自接待来访，答复来信，解决青年提出的各种问题，撰写了近千篇短小精悍、寓意深切的短评、随感录和通信。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1920年以前，邵力子就开始接触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日文的马克思主义书刊。1920年上半年，邵力子参加了陈独秀等在上海组

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稍后，该会转变为共产主义小组，邵力子因工作繁忙，共产主义小组允许他可以不定期参加小组的活动。^⑥此后，《觉悟》的编辑工作，实际上是在共产党上海党组织的直接影响下进行的，经常发表共产党人的文章，批判各种反动思潮。在1922年《先驱》和《向导》创刊以前，《觉悟》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园地。邵力子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上海东南高等师专学生酝酿学校改组，首先得到邵力子的支持。1922年10月，该校改名为上海大学，迎于右任、邵力子为正副校长。经李大钊介绍，邓中夏担任总务长。于、邵又聘请瞿秋白、蔡和森、陈望道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担任各系主任和教员。从此上海大学面貌焕然一新。1923年底，于右任离上海去广州，邵力子代理上海大学校长。他每星期要到上海大学参加学校行政会议，并经常对学生发表演说。学校制定了新的教育方针，学生不仅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还参加社会的实际斗争，从而培养了大批的革命积极分子和共产党的干部。

1921年共产党的“一大”和1924年国民党“一大”，邵力子“为了守《民国日报》这个阵地”，都没有参加。^⑦

国民党改组后，邵力子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农工委员和农工部秘书，表示要“继续不断地为民主政治和排斥列强压力努力奋斗”。^⑧

1925年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工人掀起罢工高潮。罢工领导人经常把报导罢工的稿件送邵力子，要他在《民国日报》上发表。这引起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忌

恨。邵力子等左派在报社内受到排挤。五卅运动以后，邵力子离开《民国日报》社，从此《觉悟》遂为国民党右派所掌握。6月4日上海大学被封闭，邵力子被法帝国主义驱逐出租界。他在上海的处境十分困难，于是应蒋介石的邀请，于6月中旬离开上海去广州。由于蒋介石曾受到孙中山的器重，邵对蒋也很佩服，“几乎把他当作偶像崇拜”。^⑨

邵力子到广州以后，被蒋介石任命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副主任。这时，他“公开共产党员的身分，参加党的组织生活”。^⑩1925年10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随蒋介石参加国民革命军东征。1926年1月，邵力子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邵力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

8月，蒋介石委托邵力子代表国民党去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途经上海时，中国共产党让他“以纯粹的国民党员，代表国民党去苏联开会”，欢送他退出共产党。邵力子接受这个意见，退出了中国共产党。^⑪

1926年11月，邵力子在莫斯科参加会议期间，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出国前，蒋介石嘱邵力子向斯大林提出，要求第三国际直接领导国民党，不要通过中国共产党。邵力子不同意蒋介石的意见，因此他向斯大林转达蒋介石的要求时，只说希望第三国际加强对国民党的领导。斯大林未做肯定答复。^⑫第三国际会议结束以后，邵力子暂留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旁听。这期间他和国内几乎断绝联系。

1927年5月初，邵力子从苏联回国，到达上海，始知蒋

介石已叛变革命。他虽然对蒋发动“四一二”政变不满，但还是去南京见蒋。蒋介石让邵仍当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秘书长。邵力子表示“我不能再当秘书长，不离开你就是了。但希望停止杀戮青年。并不要叫我写关于反共的文字”。^⑬

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邵力子仍未放弃对蒋的幻想，因此又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参与为蒋介石起草文稿。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以后，邵力子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⑭1929年3月，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抗怒潮，9月28日，南京、上海学生冒雨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外交部请愿。邵力子同情学生的爱国行动，当天他发表讲话说：“中央的同志担负政治上的责任，竟有今日的国难，应当对国民深自引咎”。^⑮他主张停止内战，唤起民众，准备抗战。

11月邵力子参加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连任中央监察委员。12月国民党政府任命他为甘肃省政府主席，由于当时甘肃省政治极为混乱，他直到1932年4月始到任。

1933年4月，蒋介石调邵力子为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到任后，与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实行军政分治。他注意发展农林事业，成立陕西省农业合作事业委员会，自任主任。着手兴修水利，提倡开荒造林，同时发展交通文化事业。邵力子不掌握军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僻省光杆主席”。在行政人员的任用上，他也征求杨虎城的意见。因而

同杨虎城相处颇为融洽。1935年10月，张学良率东北军进入陕西。邵力子同情张、杨的抗日主张，对蒋介石的剿共局势感到忧虑，尽量缓和张、杨同蒋介石的矛盾。

西安事变爆发后，邵力子同蒋介石在西安的军政要员同时被捕。12月13日，蒋介石要求同邵力子谈话，邵向蒋介石表明，事变前他一点也不知道。并趁机劝蒋说：“事已如此，委员长还应以国家人民为重，他们（指张、杨）的要求似乎也可以考虑”。^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邵力子回到南京，又曾同张学良一起住在奉化溪口，名义上帮助张学良读书，实际是对西安事变补过。1937年1月5日，蒋介石正式免去邵力子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

同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邵力子为大会审查委员、政治组负责人和大会宣言起草人之一。会上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3月19日，邵力子在南京招待新闻记者，指示宣传方针，他说：目前国难严重时期，“凡违反国家统一及民族复兴之记载与言论，必须消除务尽”。^⑦但他把国家民族统一复兴的希望，仍然寄托于蒋介石的领导之下。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通电号召全民团结抗日，7月15日，又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国共两党合作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17日，邵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蒋介石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在庐山的会谈，协商两党合作抗日问题。不久，军事委员会战区政务委员会成立，蒋介石任主任委员，周恩来等十三人为委员，邵力子为秘书长。

1938年元旦，邵力子撰文《望国民向前迈进》。他说：民国二十六年完成国家统一，还要使民国二十七年能完成民族独立。指出中国胜利之路，是“彻底抗战，终不屈服”。^⑧

1月23日，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召开成立大会，邵力子被选为理事会主席。他在会上发表演说，针对汪精卫卖国投降活动，提出要将“和平运动”的译名改为“反侵略运动”，藉以表示我国抗战到底之决心，避免少数别有用心之曲解。他说：“我们所需要之和平，决不是损害国家人格，丧失独立精神之屈辱和平，而是荣誉的和平，正义的和平”。^⑨此后，中国分会在进行反侵略宣传、揭露日寇暴行、争取国际对中国抗战的援助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3月26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邵力子为大会主席，被选为协会理事。

同年底，邵力子任中苏文化协会副会长。在对日作战中，他主张和苏联结成联盟，反对德意日的反苏反共轴心。但感到蒋介石国民党同他的想法并不一致，他的宣传主张无法贯彻，便于1939年2月1日辞去宣传部长的职务。

1940年4月，蒋介石为装点联苏抗战的门面，取得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派一向主张同苏联友好的邵力子为驻苏大使。邵感到任务艰巨，他要蒋介石“言行一致，内外一致”，并说：“如果国内还在叫嚣反苏反共，怎能争取到苏联的援助？又怎能促进中苏邦交？”^⑩蒋表示一定支持他。邵抱着搞好中苏邦交，促进国共合作的目的，于6月7日到达莫斯科。经过他的努力，苏联援助的军械物资在当年冬季通过新疆运进国内。正在邵力子争取改进中苏关系的时候，1941年

1月发生皖南事变，邵力子十分焦虑，他打电报给蒋介石，告以国际舆论对蒋的谴责。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表示愿增进苏中两国的友谊，邵力子催促蒋介石做出相应的表态，但蒋介石表示冷淡。

1942年11月邵力子回国述职，他在重庆对新闻记者发表讲话说：“中苏邦交应不断增进”。^②以后，他接连在中苏文化协会、中央银行、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处做报告或撰写文章，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介绍苏联情况，^③对推动中苏文化交流和加深中国人民对苏联的了解起了积极作用。邵力子的活动，遭到国民党反苏反共分子的攻击和诽谤，他们说：邵力子不是中国的驻苏大使，而是苏联驻华大使了。1942年11月，蒋介石免去邵力子驻苏大使的职务。次年，邵力子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宪法促进委员会秘书长，他强调用政治方法解决国共争端。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国民党派邵力子、张治中等为谈判代表。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双方在10月10日签定了《会谈纪要》。1946年1月10日，签定停战协定。在同日开幕的政治协商会议上，邵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报告国共会谈的经过，他说：毛泽东到重庆来，“是最有诚意的表现”。“在会谈中，政府方面没有先提出具体方案，这或者要受良心的责备与朋友们的责备，我们没有在会谈中争取主动”。但又说，“倘若政府先提出具体方案，也许使中共方面认为政府已有一定定见，而有碍会谈的进行”。^④1月18日，他在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第五次

会议上发表演说，盛赞孙中山的联共政策，肯定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又说，希望社会上不要抹杀国民党在推翻满清、进行北伐以及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并希望国共两党在和谐中解决问题。^④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了全面内战。11月15日在南京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纷纷通电反对。邵力子认为：在国家没有真正统一，上下没有共同意志时急急忙忙召开国民大会，实属儿戏。^⑤因此他拒绝担任大会秘书长的职务和参加“国大”的选举。1947年4月任国民政府委员、社会经济研究会委员。

辽沈、淮海战役之后，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蒋介石为争取喘息的时间，于1949年元旦发出求和声明，21日宣布“引退”。代理总统李宗仁在22日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等五人为代表，准备与中共代表进行和平谈判。

在正式谈判之前，李宗仁组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指定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为代表团成员前往北平，并要邵力子以私人资格同时前往，同中共交换关于和平的意见。2月14日邵力子与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到达北平。在20日中共举行的招待会上，邵力子明确表示“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⑥2月22日，邵力子同代表团成员乘专机到石家庄，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并同周恩来进行了两次商谈。27日邵同代表团返回南京。在机场上发表书面谈话说：“和平前途虽困难尚多，而希望甚大”。^⑦

3月24日南京国民党政府组织和平商谈代表团，原定以

邵力子为首席代表，由于邵力子坚辞，改派张治中为首席代表。4月1日国共双方代表团开始在北平举行谈判。在和谈中，南京代表大部分不愿接受“惩治战犯”这一条，只有邵力子是个例外。^⑧经过半个月的谈判，双方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由于蒋介石阻挠，李宗仁终于没有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23日南京解放，当晚代表团商讨回南京还是留北平的问题，邵力子首先表态，坚决不回南京。这时邵力子已彻底丢掉对蒋介石的幻想，决心投向人民。经过讨论，全体代表一致决定不返回南京。4月27日，国民党行政院在广州宣布撤销南京政府和平代表团。5月10日邵力子等宣布代表团结束。

邵力子和章士钊于5月18日给李宗仁写了一封长信，托刘斐带到香港转广州交李宗仁。5月20日，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刘斐五人给李宗仁、何应钦一封电报，分析形势、剖陈利害，劝他们“悬崖勒马”，“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坦然交替政权”。^⑨5月27日上海解放，邵力子和黄启汉等联络留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国民党立法委员五十余人，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声明同国民党脱离关系。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开幕。邵力子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会议。会上，他代表一部分特邀代表讲话说：我们从不断的失败与不断的检讨中得到了正确的认识，接受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最后表示：我们誓以至诚为实现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和政协一切决议而努

力。^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邵力子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外交协会理事，中国抗美援朝总会常务委员等职。

1954年邵力子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社会主义国家要实行计划生育的问题，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重视。1955年，邵力子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世界和平大会，1956年出席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理事会。

1956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张治中任主任委员，邵力子任第一副主任委员。邵以其同国民党的历史关系，经常通过广播、通讯、发表讲话等方式对台湾军政人员进行争取工作，对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事业做了不懈的努力。

1967年12月25日，邵力子因年高在北京逝世。

注：

- ① 《邵力子年表》，《和平老人邵力子》，第224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 ②② 邵力子：《苏联工业化》，《苏联归来》第61页，1943年11月中国文化服务社发行。
- ③ 刘麦生：《我所知道的上海震旦大学》，《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一辑。
- ④ 傅学文：《邵力子生平简史》，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七辑，第93页。

- ⑤ 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64页。
- ⑥⑦⑩ 同⑤，第62页。
- ⑧ 邵力子：《民国十三年的新觉悟和新努力》，《觉悟》1924年1月1日。
- ⑨⑪ 邵力子：《出使苏联的回忆》，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辑，第184页。
- ⑫⑬ 同⑨，第185页。
- ⑭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记录》。
- ⑮ 邵力子：《举国上下团结起来努力自救》，《暴日蹂躏东北汇刊》1931年厦门南泰成印。
- ⑯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119页。
- ⑰ 《中国现代政治史大事月表》，1937年3月19日，南京史料整理处编。
- ⑱ 邵力子：《望国民向前迈进》，《抗战大道》，1938年福建战时青年社版，第7页。
- ⑲ 《新华日报》1938年1月24日。
- ⑳ 同⑲，第183页。
- ㉑ 同⑲，第2页。
- ㉒ 邵力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经过》，《政协文献》，1946年7月版，第35页。
- ㉓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9日。
- ㉔ 《和平巨人邵力子》，《联合画报》226期。
- ㉕ 同④，第114页。
- ㉖ 同④，第115页。
- ㉗ 黄启汉：《1949年和平的回忆》，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七辑，第26页。
- ㉘ 同④，第121页。
- 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讲话、报告、发言》，第112—113页。

马 君 武

曾 诚

马君武原名道凝，字厚山，到日本留学时改名和，字君武，后以字行。1881年7月17日（清光绪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出生。^①祖籍湖北蒲圻，后定居桂林。其父马衡臣曾在广西恭城、平南、马平（今柳江）等县衙任文牍。

马君武九岁丧父，家庭贫困。他母亲从裁缝店领来衣服缝花边，向爆竹店领来爆竹插引线，以维持一家生计。马君武从小读私塾，在严母的督促下，知发愤读书，行路不释卷。他临帖写字，无钱买纸，就用芭蕉叶当纸。后来在亲戚陈允庵家附读，陈家藏书甚丰，他得以博览群书，因而旧学很有根底。

甲午战争以后，国难日亟，维新变法运动兴起，各省废科举，兴学堂。1897年，康有为到桂林讲学，设立“圣学会”，创办《广仁报》，宣传变法维新主张。马君武深受影响，曾以“马侗”笔名投稿《广仁报》。他认为非精研西学，不足以致中囷于富强，乃于1899年考入广西体用学堂。他在这里发奋学习数学、英语，开始接受西方科学文化。主讲经史的唐景崧联系当时的政治情况，指出清廷的昏庸腐败，中国有被瓜分的危险。马君武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产生了外出求学，进一步探索救国途径的想法。1900年马君

武到广州入法国教会主办的丕崇书院学法文。同年7月去新加坡，谒见康有为，请教救国大计。这时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光绪逃往西安。康有为正以衣带诏号召天下勤王，便派马君武返桂活动，策应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自立军在武汉失败后，他去上海，入震旦学院继续学习法文，并翻译《法兰西革命史》一书。1901年冬，马去日本，在横滨与梁启超、汤睿及日本宫崎民藏、寅藏兄弟相识，曾为《新民丛报》撰稿。次年，马君武在横滨由日人宫崎民藏介绍，往谒孙中山，聆听革命言论，甚为钦佩。他对人说：“康梁者，过去之人物也；孙公，则未来人物也。”^②此后，马君武和冯自由、刘成禺等经常走访孙中山，往来于东京、横滨之间，在孙寓畅谈革命。从此，他追随孙中山，走上了民主革命道路。4月，他和章太炎、冯自由等十人，发起于明朝崇祯皇帝殉难日在日本东京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企图通过纪念明朝灭亡以动员反清革命。1903年农历正月初一，东京中国留学生千余人在骏河台留日学生会馆举行团拜，“时有马君武、湖北刘成禺先后演说满洲吞并中国的历史，主张非排满专制，恢复汉人主权，不足以救国，慷慨激昂，满座掌声”。^③

同年秋，马君武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学工艺化学。他在暑假期间，对一些留学生传授炸药术，准备作为狙击清廷权贵之用。

1905年7月，为了统一革命力量共同对敌，在孙中山的倡议下，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决定共同组成中国同盟会。由马君武、黄兴、陈天华等草拟章程。8月，

同盟会正式成立，马君武曾被指定为执行部书记，因那时他在京都帝国大学攻读，未能就职，改由田桐接替。^④他曾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上先后发表《甘必大传》和《帝民说》等文，鼓吹革命，宣扬民主政治。

由于反清运动在中国留日学生中蓬勃发展，1905年冬，日本文部省徇清公使要求，为禁止在日学生进行反清活动，颁布了《取缔清韩学生规则》，中国留日学生发动罢课斗争，以示抗议，一大批留学生因此愤而归国。1906年初，归国留学生在沪自办了一所中国公学，同年夏，马君武毕业归国，担任该校总教习（教务长）兼理化教授。由于中国公学的学生多为同盟会会员，他们的反清活动引起清政府的注意，马君武被两江总督端方指名缉捕，他不得不于1907年到德国入柏林工艺大学，学冶金，毕业时获工学士学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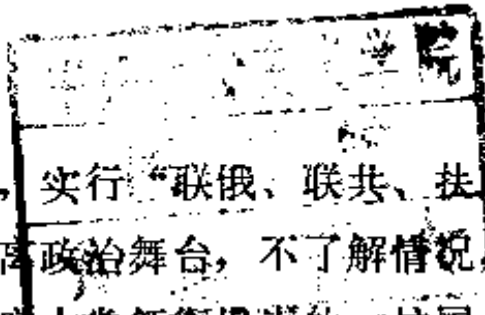
1911年11月上旬马君武由德归国抵沪。当时辛亥革命已爆发，他在为《民立报》撰文宣传建设共和的同时，积极参加组织临时政府的筹备事宜，被推举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代表，参加《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起草，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成立后，马君武以实业部次长代理部务，并参与起草《临时约法》。

当时，袁世凯为了窃取革命果实，从各方面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同盟会内部也有人主张妥协，建议将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马君武却指出袁为人诡诈，心怀叵测，坚决反对孙中山让位。后来，孙中山辞去总统职务，亲自主持中国铁路总公司，马君武亦辞去实业部次长，任铁路公司秘书长。1913年国会成立，任参议院议员。

二次革命失败，马君武被迫离开北京，再次赴德国，入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并兼德国波鸿化学工场工程师。在院四年，提出蚕丝七种原素之分析研究论文，获工学博士学位，于1916年归国。袁世凯败亡后，国会恢复，马仍任参议院议员。

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号召“护法”，国会议员纷纷南下，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马君武追随孙中山，最初任大元帅府秘书，旋代理护法军政府交通总长，并兼任广州石井兵工厂无烟火药厂总工程师。1918年5月，孙中山被桂系军阀排挤，离开广州，前往上海。马君武也跟着到了上海，与广西同乡王乃昌、梁烈亚等组织“改造广西同志会”，在广西旅沪人士中进行反对陆荣廷的宣传和组织活动。1920年，孙中山命陈炯明从福建回师，驱逐盘据广东的桂系军阀，11月重组军政府，马君武任秘书长。次年4月，南下的国会议员在广州开非常会议，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推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马君武任总统府秘书长。6月孙中山进兵广西，7月任命马君武为广西省长。马君武雄心勃勃，励精图治，提出禁烟禁赌，整顿金融，发展实业，兴办教育，建筑公路，成立新军等计划。但陆荣廷旧部分布于广西各地，割地自雄，附粤的桂军刘震寰又不听指挥，以致政令不出省会南宁，马君武一筹莫展。1922年5月粤军撤出广西，自治军蜂起，陆荣廷旧部伺机进逼南宁。5月22日马君武致电广州政府，辞去省长职，旋去上海，一度在上海杨行镇经营果园。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马君武由于远离政治舞台，不了解情况，并受居正、冯自由等的影响，在章太炎领衔发表的《护国救国公函》上签名，这个“公函”实质是反对国民党改组，反对三大政策的。11月，马君武受聘为上海大夏大学校长。1925年4月，并出任国立北京工业大学校长。同年12月底，段祺瑞执政府任命马君武为司法部总长。当时段祺瑞执政府正向各国交涉取消领事裁判权，需要有名望的人主持其事，马君武由于对北洋军阀的本质认识不清，加上好友章士钊的援引促驾，便以“事关国权，勉从其请”，于1926年1月7日就职。是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马君武违纪参加段祺瑞之善后会议，予以除名。两个月后，段祺瑞改任马君武为教育部总长，工大学生群起反对，马未就职，同时辞去工业大学校长职务。3月底离京回沪，再任上海大夏大学校长。从此息影政坛。

1927年初，马君武应广西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之邀回桂，在梧州创办广西大学。1929年，粤桂军阀混战，学校经费无着，校务停顿，马君武乃离桂赴沪，再回上海大夏大学任教。1930年1月，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辞职，5月，马君武被该校校董会推举任校长，并主讲文化发展史。马君武出任校长，向上海聚兴诚银行贷款六万元建校，学生增至一千多人，是中国公学的全盛时期。马君武重视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而对国民党党义及纪念周等，不予重视，因此颇受学生欢迎。但国民党当局对此却深为不满，挑起学潮对他排挤打击。马君武于1931年初愤而回桂，5月复任广西大学校

长。1932年，又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广西省政府委员兼广西修志局总纂。

马君武在任广西大学校长期间，聘请国内一些名教授来校教课，添置图书仪器，充实教学设备，开办化学、机械等教学工场和农场，使学生获得实践知识。并成立科学研究机构，设置贫苦学生基金会，还由学校出资选送有培养前途的助教出国留学深造。他经常在晚上自修时间，提着马灯到学生宿舍巡视，亲自指导学生学习。1936年，因马君武不积极推行军训，反对广西的“三自三寓”政策，白崇禧借故将广西大学改组，免去马君武的校长职，只给他一个顾问空衔。马君武便离开广西去上海，与人合办农场。

马君武一向坚决主张抗击日本的侵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南京政府仓皇迁都洛阳，马君武去电指责说：“国事败坏至此……乃精卫兄在武昌一年，介石兄在南京四年倒行逆施之总结果……介石兄对内面狞如鬼，对外胆小如鼠”。^⑤1933年日军进占热河，国难日急，马君武大声疾呼：现在已是千钧一发的时候，“要厉行对日经济绝交，……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以民众的力量去收复东北失地”。^⑥1937年抗战开始，马君武被任为最高国防会议参议、广西省政府高等顾问。1938年马君武和地质学家李四光在桂林开办科学实验馆，马为常务委员。马还和戏剧家欧阳予倩成立“广西戏剧改进会”，从事桂剧改革工作。同年，马任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参政员。1939年，国民政府改广西大学为国立，任命马君武为校长。1940年汉奸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马君武写了

《三州纪事》诗，斥汪“潜身辞汉阙，矢志嫁东胡”，⑦卖国求荣，卑鄙无耻。同年秋，马君武胃病复发，于8月1日在桂林病逝。

马君武青年时代，在贫困中勤奋读书，刻苦钻研，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学者。他懂得英、法、德、日四国文字，精通数学、物理、化学、冶金、生物、农业等自然科学，对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社会科学也有研究。1902年，先后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介绍卢梭、圣西门、黑格尔等思想家的学说。后来在《民报》上发表了他1901年翻译的《法兰西革命史》。1918年翻译出版卢梭的《民约论》，至1930年，发行了六版。1919年，他第一个翻译出版了达尔文的《物种原始》，此书一出，风行全国，到1936年，发行了十二版。此后，他还翻译出版达尔文的《人类原始及类择》、赫克尔的《自然创造史》，并写了《达尔文》一书，系统地介绍达尔文的学说。马君武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也不遗余力。他在1901年翻译出版《代数学》一书，两次留学德国期间又翻译和编写了《平面几何学》、《微分方程式》、《矿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德华字典》等，其中有的被用作大中学校教科书。他在广州任无烟火药厂总工程师期间，还翻译了维也纳教授菲里波维所著《国计民生政策》全书。他自己写了一本《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对王安石变法作了肯定。马君武工诗能文，学贯中西。他不仅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者，也是一个爱国诗人。1909年他和同盟会会员柳亚子、陈去病、高吹万等组织南社，以诗会友。他的诗多“鼓吹新学思潮，标榜爱国主义”，⑧有的诗脍炙人口，传诵一

时，深为读者所喜爱。在二十世纪初，他与诗人柳亚子、苏曼殊齐名。这些诗多收入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马君武诗集》中。

马君武去世后，周恩来送来祭幛，挽词是“一代宗师”，朱德、彭德怀的挽词是“教泽在人”，对马君武的一生作了正确的评价。

注：

- ① 马君武的出生年月，各书所说不一，今依马君武在《一个苦学生的自述》一文中的记载，见《马君武先生文集》第372页。
- ②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册，第56页。
- ③ 《马君武先生纪念册》，第37页。
- ④ 田桐《同盟会成立记》，《革命文献》第二辑，第3页。
- ⑤ 《广西大学周刊》第2卷第1期，第56页。
- ⑥ 《广西大学周刊》第4卷第3期，第5页。
- ⑦ 《马君武先生纪念册》，第26页。
- ⑧ 《南社丛选》第4卷，第24页。

蒋作宾

江绍贞

蒋作宾，字雨岩，湖北应城人，生于1884年3月4日（清光绪十年二月初七），其父以“务农为生”^①。

蒋作宾幼时在家乡就塾，十五岁时考取秀才。1902年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与宋教仁等同舍，经常议论时政，萌发革命思想。1905年毕业后被选拔为官费留日学生，入东京振武学校。是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蒋加入同盟会。1907年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步兵科，翌年7月毕业返国，由清政府派任保定军官速成学校教习，1909年参加清政府举行的陆军留学毕业生考试，获优等第二名，调陆军部军衡司任科长。

其时，清政府正谋划总揽全国兵权，排斥袁世凯的势力，蒋作宾趁机向陆军大臣荫昌提出整编全国陆军的建议，遂被采纳。1910年9月，陆军部接管北洋六镇，裁撤京畿督练公所，袁世凯的旧属多先后被参革或调任，以士官毕业生吴禄贞、张绍曾等分别担任第六镇、第二十镇统制，蒋作宾也得荫昌的信任，1911年擢升军衡司司长。

1911年武昌首义爆发后，驻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与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等电促清廷立宪，清政府大为震惊，急派蒋作宾等往滦州对张部进行所谓宣抚。蒋到滦州后

极力策划张绍曾与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趁清军大举南下之际，举兵夺取北京。事为清廷侦知，11月17日吴禄贞遭清廷暗杀，张绍曾随之被调职，其计划夭折。蒋便往沈阳谋与蓝天蔚在奉天举兵独立，行至山海关，闻蓝已失败。这时他感到在清政府势力强厚的北方不能有所成功，遂南下到了武昌。此时，革命军在汉阳作战受挫，蒋急往九江请援兵，到浔后，被原保定军官速成学校学生蒋君羊等推为九江都督府代参谋长。蒋即派江西民军两队往湖北广济、黄冈一带牵制清军，诱其东移，缓和了武昌的局势。年底，蒋受黄兴电邀赴上海，参加临时政府筹备工作。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蒋作宾被任命为陆军部次长。他向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陆军部总长黄兴提出建立南京、武汉、北京三重点的计划，即在此三处建立由革命党人切实掌握的军事力量。他的建议被采纳后，即在南京参预编练第八师的工作，同时收容保定军官速成学校学生成立南京军官学校。他又往武昌向黎元洪建议多用同盟会员，改练湖北新军。

南北和议告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由唐绍仪组织民国第一届责任内阁。蒋随唐北上，仍任陆军部次长，总长为段祺瑞。蒋作宾打算在北京建立第二个军事重点，并计划将第八师调驻北京或热河，由于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防范，而未能实现。6月，唐绍仪辞国务总理职。7月，袁命陆征祥组阁，为排斥在陆军部任职的同盟会员，提名蒋作宾任工商总长，但由于参议院中同盟会员的抵制，而未能通过。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蒋作宾在南京建立的军事基

础遭瓦解。他在北京随班进退，无所作为，于袁世凯酝酿帝制时称病离职，后被幽禁西山。至西南各省起而护国讨袁，袁世凯为利用蒋拉拢黎元洪帮助挽回危局，才将他解禁。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北京政府的实权则掌握在段祺瑞手里。这时，段拉蒋作宾出任参谋本部次长。他在黎、段矛盾冲突中居间作了一些调和工作。由于黎、段间的矛盾冲突加剧，翌年充作调人的张勋搞复辟，在危急中蒋作宾帮助黎元洪逃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避难。不久段重任国务总理，为拉拢蒋作宾为己用，授为翊威将军，派汤化龙前往挽留。蒋深知段难以共事，乃毅然拒绝，于7月间南下到上海。9月经孙中山同意出国考察国际局势，先后到美国、法国、东欧巴尔干及土耳其、希腊等地。

1919年2月，蒋作宾由欧洲回国到广州。当时护法军政府在桂系军阀把持下名存实亡。蒋为实现孙中山打倒桂系军阀、夺取广东和统一南方的计划，与孔庚、何成濬、夏斗寅等人一起筹划先夺取武汉。当时武汉为湖北督军、两湖巡阅使王占元所盘踞，王在湖北的残酷统治早已激起人民的愤懑。1921年7月，倒王运动主持人李书城联络湘军赵恒惕攻鄂，主张“湖北自治”，蒋作宾参预这一行动，并被推为湖北自治政府临时总监。兵至蒲圻，王占元弃职潜逃天津。王虽然被驱，但盘踞河南的吴佩孚以新任两湖巡阅使名义率北军南下，顺收渔人之利，使上述计划未能实现，蒋便偕孔庚返粤。此时孙中山正准备在桂林组织大本营，由桂入湘进行北伐。蒋作宾被任为大本营参议，参预军事计划的制订。年底，师次桂林，正待出兵之时，受到留守广东的陈炯明暗中

牵制。1922年孙回师广东，改道北伐，设大本营于韶关，蒋也随之前往。正当北伐军向江西胜利进展的时候，陈炯明公然发动反革命叛变。蒋在叛军杨坤如部围困中逃出韶关，到广州时又遭叛军叶举围捕，蒋乘港轮脱逃，到永丰舰与孙中山会面。旋奉中山之命，到沪联络松沪护军使何丰林、浙江督军卢永祥，酝酿建立反直三角同盟，以打倒陈炯明勾结的直系军阀。蒋除在上海、杭州一带活动外，又往沈阳参加姜登选等人建立反直军事力量的活动。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段祺瑞电邀北上，蒋作宾到京随侍左右。翌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蒋滞留北京观察形势变化。是年冬至次年春先后往河南、江西动员岳维峻、方本仁等响应北伐，但因广州方面动作迟缓而未收效。蒋复返广州。

1926年7月，北伐开始，蒋被国民政府派为湖北宣抚使，8月11日随蒋介石到达长沙，对鄂赣境内的军阀部队作了一些争取工作。17日，又奉派往沈阳劝说张作霖不要帮助吴佩孚南下。南返时，武汉、南昌已为北伐军光复。

蒋作宾到达武汉后，被任为国民政府委员，却与蒋介石息息相通。随着武汉革命阵营与蒋介石斗争的白热化，蒋作宾于1927年1月从武汉潜往南昌，投靠蒋介石。他向蒋介石告密，诬称“共产党在武汉另有企图，国民党同志变节者甚众”^②，建议蒋介石招降孙传芳所部陈调元，先期夺取安徽，然后取南京。这一建议正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意图。他随即被蒋介石派往安庆，时陈调元已经易帜，蒋作宾偕陈至南昌，与蒋介石筹划进取南京之策后，前往安庆组织省政

府。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动的国民政府，蒋作宾被任为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8年4月，蒋介石以统一全国之名，进行第二次“北伐”，蒋作宾担任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委员，随军北上。当北伐军抵济南时，日军于5月3日以武力制造了“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六千余人，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长蔡公时也被日军残酷杀害。蒋介石对日军的暴行采取妥协退让，率军撤出济南。蒋作宾随后于5月9日从济南突围而出，随蒋介石绕道“北伐”。6月，到达北京，不久战地政务委员会解散，蒋作宾转任北平政治分会委员。

是年10月，蒋作宾由国民党政府任命为驻德国公使兼驻奥地利公使，11月往柏林赴任，首次与德外长斯特莱斯曼会晤时，提出德国应与中苏连成一气的主张，颇受德国朝野的重视。他还取得德国同意，派前任参谋总长塞克特等来华充当蒋介石的军事顾问。翌年3月，蒋代表中国政府出席日内瓦国联军缩会议，在大会上首次用中文发表演讲，引起震动，不少与会者视为中国的莫大光荣。会议期间，苏联人民外交委员季维诺夫主动向蒋提议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为将来复交行动铺路，蒋虽十分赞同，但未得国民党政府的同意。1931年春，蒋辞公使职，途经苏联考察后回国。

蒋作宾回国后，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即将侵占中国东北，中日关系紧张之际。他力主对日直接交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设立中日交涉委员会的建议。他的主张符合国民党政府内一部份人的愿望，8月底遂被任为驻日公使。就在他赴任途中，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国民党政府向国联提出控诉，幻想

国联制裁日本，避免与日直接谈判。蒋抵日后，迭电外交部不要寄希望于国联，并立即与日本外相币原谈判，条件是先由中国允许给予日人土地商租权以交换日本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然后再作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具体谈判。但他的这一建议，由于一方面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阻止；另一方面亦因币原受军国主义分子的排挤去职而落了空。接踵而来的是日本侵略的进一步扩大，蒋作宾只能是遵照国民党政府的训令，向日本政府提交一些书面照会，在抑止其侵略上毫无作为。1933年3月上旬日军侵占热河后蒋被召回国，9月蒋介石开牯岭谈话会，确定改善对日关系，10月蒋作宾以“携有解决中日问题之有效训令，当以此尽力于中日友谊之改善”的“使命”返任。他在途中对记者宣称：“国内‘共匪’虽仍炽烈，但拟于中日关系告一段落后即竭力从事讨伐。”^③

1934年4月，日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发表妄图独占中国的“四一七”声明，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蒋作宾遵循国民党政府的旨意，于4月26日访晤日本外相广田，向广田保证中国并没有准备任何行动以抵抗日本的侵略。广田则得寸进尺地向蒋要挟：今后国际对华援助，中国必须事前商诸日本。

1935年1月，广田在日本议会演说时诡称“对华不威胁，不侵略”，高唱“中日亲善”的调子，蒋介石、汪精卫随即派国际海牙法院公断员王宠惠于返任时途经日本与广田交换“亲善”意见，并采取了一系列讨好日本的措施，如宣布取消抵制日货法令，改变对日宣传政策，禁止刺激日人的一切言行等。5月，中日双方公使馆升格，蒋作宾被任为首

任驻日大使。6月，国民党政府颁布“邦交敦睦令”，蒋作宾再次回国，向蒋介石、汪精卫请示进一步“亲善”办法。他向记者表示不因当时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这些不愉快的事件而变更改善中日国交的政策”^④。9月，蒋返东京任所后立即会晤广田，提出中日亲善基本前提条件三条：

（一）中日两国平等享有与遵守国际法规定之独立国家权利与义务；（二）中日两国对于一切非友谊行为不得再行发生；

（三）中日邦交回复正轨，两国间一切事件循和平外交手段以求解决。并向广田说明中国虽然不能承认“满洲国”独立，但可以置之不问。10月7日广田召见蒋作宾反提三原则，大要为：（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二）中国事实上承认“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满共同防共^⑤。声称这是中日提携的绝对必要条件，中国政府如能完全同意，日本就可逐步商议中国所提三原则。蒋向广田当面表示：取缔排日言行已有事实表现；承认伪满需请示政府再行答复；对共同防共的方法和地域可以研究。广田希望蒋作宾回国后能担任外交部长。

由于当时日军策动华北“自治”达到高潮，全国抗日情绪更加高涨，蒋作宾在日的言行，自然遭到全国人民的谴责，加之国际政治斗争形势的演变，国民党政府内亲英美派与亲日派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蒋与广田的谈判没有能继续发展。同年12月国民党政府改组，蒋介石继汪精卫任行政院长职，蒋作宾的驻日大使也随之被免职，改任内政部部长。

1936年12月初蒋作宾往西安视察，适“西安事变”发生，被幽禁。迨事变和平解决后回南京，担任国民大会全国

代表总选举事务所主任。

“七七”抗战爆发后，蒋作宾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上任仅两个多月即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接替。随后往重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0年冬任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政务组主任。1942年元旦，高血压发作，卸职休养。同年12月24日因肺炎并发心力衰竭在重庆病故。

注：

- ① 《蒋作宾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9月版第3页。
- ② 同①，第44页。
- ③ 天津《大公报》1933年10月10日。
- ④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208页。
- ⑤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一分册，第42页。

吴 铁 城

郑则民

吴铁城，1888年3月9日（清光绪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生于江西九江。吴家原籍广东香山（今中山县）平湖乡。父吴玉田于光绪初年到九江任商店司帐，后自营洋货店，曾任九江商会协理，在当地颇有影响。

吴铁城幼年，由其父延师教授经史、英文等课程，继入美以美会设立的九江同文书院读书。1909年同盟会会员林森从上海调往九江关任职，在交游中和吴铁城相识，逐渐成为好友。他们共同设立“浔阳阅书报社”，作为宣传革命思想的场所，吴经林森介绍加入同盟会。

随后，吴铁城利用其父在商会中的地位，联络新军官兵和帮会力量，开展了一些反对清朝统治的秘密活动。吴曾回忆说：“广泛的周旋于一般商绅之间。就是军界方面的人，我也渗入去打交道。当时清军有一标人驻扎在九江（即五十三标），标统是安徽人马毓宝，我父亲和他认识，我也和他厚相交纳。”“九江当时还有许多帮会中人，……我很喜欢他们的豪爽气概，各帮的头目，我也结识不少。”^①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之前，吴铁城负责同武汉方面的革命党人相联络，担任詹大悲主办的《大江报》通讯员，彼此间常通信息。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吴参加策动九江新军标统马毓宝于10月

23日独立。九江军政府成立，由马毓宝任都督，蒋群任帮办军务兼参谋长，林森负责对外交涉，吴铁城任总参议负责办理与军事有关的民事工作。清海军管带黄钟英率领海筹号等四艘军舰和几艘鱼雷艇，从武汉沿江东下，于11月13日驶抵九江。林森、吴铁城等代表九江军政府前往接洽，欢迎海军起义归附民军。九江独立和海军舰队起义增加了革命的声势，对沿江各省的起义有所推动。

11月中旬，吴铁城、林森等被选为江西代表，赴上海、南京参加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12月下旬孙中山从海外归国，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接见代表时，了解到吴是同乡的年青革命党人，决定将他留在身边工作。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后，于1912年8月北上会见袁世凯，吴也随侍在侧。1913年“宋案”发生后，吴铁城经孙中山派赴江西催促李烈钧首先发难，起兵讨袁。“二次革命”失败，他亡命日本，不久进明治大学，学习法律。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吴铁城首批加入。翌年，赴檀香山办理党务，任华侨《自由新报》主笔。曾以“吴丹”的笔名，抨击袁世凯的帝制活动。袁世凯政府通过外交机构，对吴进行起诉，由美国检查庭审理，经过一场辩论，宣告不予起诉。1916年春，吴返国，在香港、澳门等处进行反袁活动。

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电召吴铁城回广州。广东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吴铁城任大元帅府参军。次年军政府改组，随孙中山回上海。

1920年，吴铁城和孙科等到香港办理粤军由福建回师广

东的策应工作。9月，讨贼军总指挥朱执信在虎门联络讨桂军事时遇害，吴任代理讨贼军总指挥。这时，陈炯明、许崇智等率领粤军驱逐桂军出广州，吴带领部分队伍从石岐经宝安、东莞、广九路进入广州。11月孙中山回广东重组军政府，吴仍任参军职务。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吴改任总统府参军。11月孙中山赴广西准备出师北伐，吴留守广州，随后出任香山县“民选县长”。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吴铁城在香山县组织地方团警抗击陈军。在抵抗陈军失败后，他经香港转赴上海。嗣又奉孙中山之命与古应芬、孙科赴港设机关，主持策反及接应讨陈的军事工作。

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上海通电讨伐陈炯明，广西的桂、滇军奉命组成西路讨贼军，沿西江东下，连克肇庆、三水，直逼广州。粤军许崇智等部在福建组成东路讨贼军，经汕头向广州方向进攻。吴铁城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军司令，带领沿海民军也向广州推进，配合西路讨贼军驱逐陈炯明军出广州。2月，孙中山回广州设立大元帅府，经费奇缺，吴铁城曾为之筹集款项，以济急需^②。旋吴铁城被任命为广州市公安局长兼省警务处长、工兵局筹备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等职。东路讨贼军第一路部队改编为广东省警卫军时，吴兼任司令^③。1923年10月25日吴铁城被指定为中国国民党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他曾主持设立警卫军讲武堂，吸收部分青年学习军事，办了二期，至翌年5月并入黄埔军校。1924年9月，吴随孙中山北伐，任行营警戒兼代大本营参军长。10月广州商团发动叛乱，吴奉命率警卫军参加平叛，重兼广州市公安局长。还兼任国民党广州市党

部委员及组织部长。

当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时，吴铁城和胡汉民、伍朝枢等，“表面随和而实际抱阳奉阴违态度”“他们本来也是不赞成改组国民党，不赞成三大政策的，但是他们在当时革命形势节节向前推进的情况下，只有在暗中反对，消极怠工，却不敢公开说反对的话。”^④实际上吴铁城等早就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作为反共活动的据点。孙中山逝世后，坚决捍卫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于8月20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遭到谋杀。当时吴铁城身任广州市公安局长，他不仅参与反对廖仲恺的活动，而且在知道有人要加害廖的情况下，竟然撤去中央党部大门的警卫。廖案发生后，又对被捕的凶手和嫌疑犯多方优待，引起了左派人士和工农群众的强烈不满。蒋介石为抑制粤系势力，乘机先撤去吴铁城广州市公安局长职，随后于1926年5月30日将吴扣押起来，囚禁于虎门横档炮台，直到同年10月吴才获释前往上海。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吴铁城表示支持，并尽力催促武汉方面的汪精卫、孙科等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合流。吴在上海与孙科等交往十分密切。1927年6月吴铁城重新被起用，先是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建设厅厅长。由于他擅长交际，与奉方人物有所交往，1928年秋，南京国民党政府派吴铁城等赴东北游说张学良易帜，统一于国民党政权之下。1929年吴奉命往北平参加迁移孙中山的灵柩到南京安葬。同年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立

法委员。

1930年5月发生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蒋介石派吴铁城、张群再次去东北争取张学良反对冯、阎。终于促成张学良于9月18日发表拥蒋通电，随即挥师入关，造成蒋军的胜利和冯、阎军队的瓦解。吴因此更加受到蒋的赏识和重用。

宁粤对峙后，1931年10月吴铁城被加派为南京政府代表，与汪精卫、孙科为首的广州政府代表在上海举行“京粤代表会议”。双方经过讨价还价的谈判之后，在中央政制、党务和外交等方面达成某些妥协，结束了宁粤分立的局面^⑤。1932年1月6日，吴铁城奉命继张群之后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这时日本蓄意发动进攻上海的战争。先是在1月20日，由上海的日本浪人纵火烧毁三友纺织厂，捣毁北四川路的中国商店。接着派遣大批日本军舰麇集于上海港，激起了上海人民的强烈反对。27日，日本驻上海领事向吴铁城提出最后通牒，要求道歉、惩凶、赔偿、取缔抗日运动等，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吴执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在翌日晨下令封闭各界抗日救国会办事处，驱逐办事人员，还复牒给日本领事馆“深表歉意”。但日本帝国主义仍不满足，遂发动军事进攻，激起了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的奋勇抵抗，曾迫使日军三易主帅。由于国民党政府并无抗战的勇气和决心，仍然执行对日妥协政策，于5月5日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承认日军可留驻上海，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设防，并取缔抗日活动。

此后，吴铁城继续担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在任

期内，他曾按照黄郛任市长期间所草拟的计划，在上海进行了一些市政建设，1934年元旦前夕，在江湾建成了市政大楼、博物馆、图书馆、体育场和医院等。吴在任职期间还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对内镇压的反动政策，严厉防范并禁止革命和进步活动，取缔抗日救国运动，摧残进步文化；同时吴又在这里大量收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及时向蒋介石、宋子文、汪精卫等报告，关于西南军阀与蒋介石的斗争情况是他注意的重点之一^⑥。

1937年3月21日，吴铁城调任广东省政府主席。这里原是陈济棠盘踞的地方，1936年7月陈反蒋失败，被迫下台。在全国抗日情绪高涨之时，蒋特派吴前往坐镇。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10月21日广州失陷，广东省政府撤往粤北连县。吴在粤任职期间，曾以权乘便贩运走私，大发国难财。有关回忆录提到吴“在本省经营‘经济活动’的积蓄，他在银行的活期存款帐上已存了足够的金钱”^⑦。

1939年春，吴铁城前往重庆，改为主持港澳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兼管福建、广东的对外宣传。1940年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同年秋奉命赴南洋各地联络和争取华侨捐款资助抗战。他经香港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历时五个月。1941年春回重庆，任“南洋华侨协会”、“国民外交协会”理事长。随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他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是积极贯彻的；在国民党内部则采用圆滑的手腕，尽力排解国民党各派系、政客之间的明争暗斗，力图稳定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部秩序。1944年10月蒋介石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鼓动知识青年从

军，吴铁城秉承蒋介石的意旨积极参与筹划，用抗战名义招募了大批青年入伍，建立“青年军”。这支队伍后来被蒋介石利用，成为他争夺抗战胜利果实和反共反人民的工具。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强烈呼吁和平，蒋介石为了争取发动内战的准备时间，同意于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有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吴铁城是国民党的代表之一，在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等一系列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中共代表的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政治协商会议终于通过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决议，但不久为蒋所撕毁。

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之后，于1946年11月在南京召开伪国民大会，颁布伪宪法。吴铁城对蒋介石采取积极支持和配合的态度。1948年吴任“立法委员”，并一度酝酿竞选立法院院长。同年11月孙科按照蒋介石的意向出面组阁，吴铁城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李宗仁任代总统，曾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以中共提出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吴铁城和孙科出而反对，把行政院撤到广州。不久他们辞去了行政院的职务，由何应钦接任行政院长。随后，吴铁城以“民间”代表身分，到东南亚等国访问，进行反共宣传活动。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夕，吴铁城赴香港，后转往台湾，任“总统府资政”等职。1953年11月19日在台北病死^⑧。

注.

- ① 吴铁城:《江西辛亥革命前后》,《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下册,第3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② 包惠僧:《大革命时期的回忆》(二),《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7期,第13页。
- ③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第426页、454页、48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 ④ 何香凝:《我的回忆》,《回忆辛亥革命》第42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 ⑤ 《1931年宁粤和平会议》,《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第70—76页。
- ⑥ 参见《吴铁城关于西南军阀与蒋介石(1932—1934)斗争情况的密电》,《中国现代史学会通讯》1983年第3期。
- ⑦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2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梁国武:《吴铁城统治广东时期“禁烟”黑幕》,《广东文史资料》第十六辑。
- ⑧ 据记载,1953年11月18日,吴铁城因王世杰被撤去伪总统府秘书长事,面见蒋介石为王说情,要求准王辞职,受蒋严厉斥责。吴不堪忍受,回家吃过量安眠药,以致于次日死去。参见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162页。

王 正 廷

郑则民

王正廷，字儒堂，浙江奉化人。生于1882年9月7日（清光绪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父王际堂是奉化基督教圣公会的牧师，曾在上海郊区传教。王正廷自幼就受洗为基督教徒，七岁时进奉化凤麓学堂，十岁往上海入英国传教士所办的中英学校学习英文。1896年，考入天津北洋西学堂二等（预科），后升入头等（本科）。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攻陷天津、北京，北洋西学堂被德国侵略军占据，学堂停办，王正廷辍学返回上海。1901年曾一度进海关任职，不久再去天津，随原在北洋西学堂任教之坎特（Percy H. Kent）研习法律。其后，到中英书院任英文科主任。1904年，去湖南长沙明德学堂担任英文科主任。

1905年，王正廷应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白乐门（Fletcher S. Brockman）邀请，前往日本，在中国留日学生中筹设中华基督教青年协会之分会。同年王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07年得教会之助赴美国留学，先入密歇根大学，次年秋天转入耶鲁大学学习法律，1910年毕业，升入耶鲁大学文科研究院，攻读国际公法。

1911年夏，王正廷因父亲去世回到上海，后应长沙湘雅书院之邀，任英文科主任。10月，武昌起义爆发，黎元洪被

推举为中华民国政府鄂军都督。王正廷由湘前往湖北，被任为都督府外交司副司长，后任司长，办理外交事务。12月中旬，袁世凯派代表唐绍仪，同民军方面的全权代表伍廷芳，在上海举行南北议和谈判，王正廷任民军方面和谈代表兼伍廷芳的参赞。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开会选举临时大总统，他以湖北省代表资格参加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年1月28日，各省代表会议代行参议院职权，成立临时参议院，王以浙江代表任参议员，3月15日被举为副议长。^①

1912年3月，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唐绍仪组织新内阁，王正廷被任命为工商部次长。因总长陈其美没有就职，由王署理总长职务。6月，唐绍仪辞职，王正廷等属于同盟会的四名阁员也连带辞职，随后王回上海继白乐门之后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

1913年春，北洋政府产生了正式国会，国民党员当选参众两院议员的有三百九十二人，国民党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王正廷被选为参议院议员及副议长。时宋教仁力图实行政党内阁，为袁世凯所忌恨。3月，国会开会前夕，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上海。王正廷等对袁世凯的违法活动及未经国会批准擅自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进行了揭露和斗争。7月参议院议长张继离开北京，王正廷代理议长职务。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于同年11月宣布解散国民党并下令收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王正廷遂离京去沪。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国会恢复，王正廷回京继续担任参议院副议

长。1917年6月，张勋率兵入京“调停”总统黎元洪和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之间的所谓“府院之争”，迫使黎元洪解散国会之后拥清室复辟。

7月，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复辟帝制，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主张，并从上海率应瑞、海琛两舰南下广东，建立护法根据地。王正廷拥护孙中山的护法主张，7月底电复广东省议会，同意前往广州开会。与吴景濂电请美、英、法、俄等国赞助中国国会。8月初王到达广州，受到孙中山的接见，并共同商议组织政府等事宜。8月25日，王正廷和其他南下的国会议员一起，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并任副议长。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成立护法军政府。9月11日王正廷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次长，并暂行兼署外交总长。1918年护法军政府派王正廷赴美国，接洽美承认军政府事。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英法意日等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派代表参加“和会”，为表示中国南、北两个政府对外“一致”，广东护法军政府派王正廷为中国出席“和会”的全权代表之一，他与陆征祥、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一起，曾向“和会”提出了一些要求：如希望列强放弃在华特权；取消日本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收回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去的山东的一切权利等。但是中国的正当要求不仅遭到与会列强的拒绝，而且“和会”还将日本夺得的山东权益明文载入对德和约。巴黎“和会”的这一消息传出，立即激起了我国人民的一致反对，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国外华侨也展开了

爱国斗争。在当时形势和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推动下，王正廷于5月中旬明确表示，如果签订和约不准中国保留意见，则无论如何，“决不签字”。^②这一主张符合当时我国各阶层人民的愿望，得到了多方面来电支持，也得到广东护法军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等的支持。这种态度对当时我国争取独立主权的外交斗争起了好的作用。我国出席“和会”的代表，终于在全国人民和旅法华侨、留法学生共同斗争的压力下，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③王正廷在巴黎和会期间的表现，获得当时国内舆论的好评。王从巴黎归国后，曾一度到上海经营进出口贸易。1920年初，滇桂两系军阀因争夺驻粤滇军的统率权而关系破裂，国民党系的国会议员与桂系把持的广东军政府间的矛盾亦加剧。4月21日，林森、王正廷、吴景濂、褚辅成通电宣布：自3月29日起，广东军政府政务会议已不足法定人数，一切决议概属违法。王正廷及不少议员离粤去沪。

1921年5月，王正廷还被选为海牙国际常设公断法院公断员。1922年初，在华盛顿会议期间，美英与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从各自利益出发，促使中、日两国代表在会外直接交涉，达成“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规定让中国从日本手里收回胶州原德国租界地，改向各国开放；同时“以中国国库券交付日本”，“以铁路产业及进款作抵”，由中国赎回胶济铁路。^④3月，北洋政府派王正廷为鲁案督办，与日本办理交涉，至12月签订了“鲁案协定”并办理移交胶澳管理手续。^⑤接着王正廷担任青岛商埠督办兼胶济铁路理事长。当时北洋政府曾把这件事吹嘘为“外交胜利”，王正廷也从中取得

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加强了他在北洋政客中的地位。这时直系军阀首领曹锟，采取排斥现任内阁，迫使黎元洪重组对直系有利的新内阁。11月29日王宠惠内阁因遭到曹锟的反对而辞职。黎元洪先命汪大燮署理国务总理，王正廷署外交总长。12月6日，黎元洪不得不提出由张绍曾出来组织新内阁，因张与曹锟、吴佩孚的关系都很密切。在新内阁没有通过以前，汪内阁代理时间已到。黎元洪便于12月11日请王正廷暂行代理总理，作为新内阁产出前的过渡。1923年1月4日，张绍曾内阁组成，任王正廷为司法总长，但他未就职。3月26日特派王正廷筹办中俄交涉事宜，负责与苏俄代表谈判恢复邦交等问题。中俄交涉经年，至1924年3月14日，王正廷与加拉罕在北京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等草约，^⑥旋因北洋政府部分阁员持有异议，中俄交涉改由外长顾维钧接手，后经一再交涉，至5月31日“中俄协定”方始正式签字，中俄外交关系恢复。同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下台。31日黄郛任代理国务总理，王正廷任外长兼财政总长。11月24日段祺瑞再次上台，当上了北京政府“临时执政”。黄郛下台，王也去职。1925年3月，王再任中俄会议督办。12月段祺瑞改组内阁，王任外交总长。次年3月，辞职赴上海，不久，任全国道路协会会长。

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宣布加入国民党，并与南方国民革命军相配合，出潼关参加北伐。王正廷应邀参与冯玉祥的军事谋划。1927年夏，冯军占领河南以后，鉴于陇海铁路有涉外事务，冯荐王正廷任陇海铁路督办。

1928年，王正廷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同年5月，日本军队为阻挠国民党军队“北伐”竟炮轰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郛因执行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投降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不得不引咎辞职。6月，王正廷继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兼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其后他还当上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委员等职。

同年10月，王正廷与日本代表举行谈判解决“济案”问题，日本方面仍然蛮横无理，拒不撤兵。王正廷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对日本一再妥协退让，^①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懑，南京市民于12月13日举行示威，并捣毁了王正廷的住宅。1929年3月28日，中日双方达成所谓“济案协议”，除规定组织调查委员会调查所谓双方损失外，还要中国政府负责保护在中国的“日本臣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个“协议”把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杀害中国军民数千人等罪责一笔勾销，还声明：“视此不快之感情，悉成过去，以期两国邦交，益臻敦厚”。^②

王正廷任外长期间，为了应付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独立自主的要求，也曾采取过一些新的外交手法。1928年7月间，发起了向帝国主义国家要求“改订新约运动”，即国民党政府在承认不平等条约的前提下，要求就关税和领事裁判权的有关条文，进行若干修改。虽然在几年内，先后与美、英、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达成某些“新关税条约”协议，在形式上争取到他们的某些让步，但中国受制于人的半殖民地局面却没有本质上的改变。至于连年叫嚷的“取消领

事裁判权”问题，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又匆忙通令暂缓执行。王正廷任外交部长期间，还同希腊、波兰、捷克等国订立了商务协定，进行了商品交流。王本人虽不是亲日派，但由于他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仍然执行蒋介石的“对外退让、对内镇压”的反动方针，对日本的侵略采取妥协政策，再次引起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强烈不满。9月28日，南京、上海两千多名学生冒雨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因不得结果，随即转向外交部，冲开警卫的阻拦，向王当面质问，王语言支吾，遂被殴打，头部受伤。事件发生后，他被迫辞职。次年1月，改任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

1936年8月，王正廷出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王在美国国务卿安排下与日本驻美公使会面，但毫无结果。以后，他也没有能够从美国方面得到新的“援助”。1938年9月，国民党政府将王正廷调回，改派胡适接任驻美大使职务。王正廷经香港转赴重庆，此后不再担任政界要职，只挂名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

王正廷从政的同时，对体育和教育事业也颇具热心。早在1912年，他与来华考察体育的国际奥委会菲律宾籍委员加斯相结识，并共同联络发起远东运动会。1913年第一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在王的努力下中国也派了代表参加。王是我国早期体育组织“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的负责人。1921年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在我国上海举行，王是这次运动会的大会主席。次年，王被国际奥委会通过为该会委员。

1924年中华体育协进会成立，王被举为主席董事，该会被国际奥委会承认为中国奥委会。王曾先后多次领队参加远东运动会和国际奥委会，对我国体育事业的推进有过贡献。在教育方面，他于1921年受聘兼任北京中国大学校长，曾为该校的建设和经费的筹募积极尽力。

抗战胜利后，王正廷回到上海，曾任上海市参议员、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还兼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交通银行董事、菲律宾交通银行董事长、太平洋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王晚年居住香港，1961年5月21日，在香港因患喉癌病逝。

注：

- ① 上海《天铎报》1912年1月31日第三版：《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2年第155页。
- ②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350—351页。
- ③ 关于1919年拒签“巴黎和约”的情况，王正廷在1927年7月为《国闻周报》作《近二十五年中国之外交》一文中，对此曾有较详细的叙述。又见吴天放编：《王正廷近言录》第127—155页。
- ④ 《中外旧约章汇集》，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三册，第208—212页。
- ⑤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13)·中华民国史料》第448页、453页。
- ⑥ 同②，第119—126页。
- ⑦ 洪钧培：《国民政府外交史》第185—194页。
- ⑧ 1929年3月28日芳泽谦吉与王正廷互换照会，《东方杂志》第26卷第9号。

王 伯 群

熊宗仁

王伯群，名文选，以字行，贵州省兴义县景家屯人，1885年9月6日（清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生。其父王起元，通文墨，以办理团练而著名乡里，1903年病故。王伯群少时在外祖父、兴义团练头目刘官礼处，从姚华、徐叔彝等人就读。1905年得其舅父、兴义县劝学所总董刘显世资助，东渡日本。先入大塚弘文学校，后考入中央大学，专习政治经济，1910年毕业，再入研究院深造。留日期间曾加入同盟会，但思想却深受梁启超政闻社的影响。

辛亥武昌首义，全国响应，留日学生纷纷返国参加革命，王伯群亦随之回到北京。1912年1月，他在京参与章太炎、程德全、张謇等人组织对抗同盟会的新政团——中华民国联合会，并积极筹组黔省支部。未就绪，适上述诸人在上海发起统一党，王遂赴沪参与其事，得推为本部干事，后受统一党委托，联络已返贵州的留日学生张协陆和符经甫，以原贵州的立宪派人士为骨干，成立统一党黔省支部，并谋在各府、州、县筹设分部。2月，唐继尧率滇军入黔。3月3日，在第四标标统刘显世和旧巡防营的配合下，颠覆了贵州军政府。以自治学社为主体的革命派纷纷逃离贵州，在北京等地成立“冤愤团”，向全国控诉贵州反动派和唐继尧的暴

行，外界舆论群起谴责唐、刘。王伯群在沪，为唐继尧、刘显世辩护。他“以为非借言论机关，不能将吾黔是非邪正表白于天下。适统一党亦有大共和报之设，遂经理其事”。^①在任《大共和日报》经理期间，兼理刘显世驻沪代表事务。从1912年至1913年5月，在统一党——共和党——进步党的演变过程中，王伯群均出任干事。他把孙中山、黄兴将临时政府设在南京的主张，视为“荒谬计划”加以反对，积极支持袁世凯武力统一全国的活动。^②

1913年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次年3月解散参、众两院后在京召开约法会议，制订了袁记“新约法”。这期间，袁氏阴萌帝制的嘴脸日益暴露，国内外革命党人反帝制舆论日益强烈，王伯群与胞弟、贵州陆军第一团团长兼护军使署副官长王文华及贵州巡按使戴戡相谋，谓“国难且作，辄为备”。^③“筹安会”出现后，进步党在全国各阶层反袁声浪的推动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由拥袁、规劝袁，走向公开反袁。梁启超、蔡锷在京津秘密策划以滇黔为立足点，准备发动武装反袁，电召戴戡、王伯群到天津相商。天津会议决定蔡锷到云南发动武装起义，梁启超到南京、广西游说冯国璋、陆荣廷作响应，戴戡、王伯群负责策动贵州独立。王伯群以“当局（刘显世）意向，文华能左右之。所部虽成军日浅，气锐，可一战也”^④为词，自请负责策动王文华迫刘显世反袁。12月14日，他先蔡锷假道香港、越南，到达昆明。稍后，蔡锷也辗转到滇。王伯群参加了由蔡锷、唐继尧主持召开的决定云南起义具有重大作用的第四、第五两次军事会议。^⑤云南起义爆发后，王伯群由滇经兴义到贵阳，与王文

华一道策动贵州独立。1916年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护国战争中，王伯群是护国第一军右翼总司令戴戡和右翼东路支队司令王文华的主要谋士。护国战争结束后，王伯群因曾参与密谋滇黔首义的天津会议，与梁启超、蔡锷、戴戡、汤觉顿、蹇念益、陈国祥一道，被誉为“天津会议七君子”。^⑥8月，北京政府任命王伯群为黔中道尹。

护法运动期间，王伯群开始参预贵州的经济事务。先任专司开采铜仁等处矿产的裕黔公司董事，不久当上主办全省矿务的群益社的理事长，成了省中瞩目的实业活动家。

1918年11月，王伯群以贵州省长公署代表赴广州协助护法军政府工作，直接参与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次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9年1月，受委为广州护法军政府议和代表，赴上海参加南北和议，并得督军兼省长刘显世授权为贵州全权代表，常驻上海。

五四运动爆发，王伯群也察觉到时代潮流的变化，认为“现在科学时代，无科学不足以立国，无新学识不足以成才，……谋国之本，树人为先”。^⑦当中国留日学生纷纷归国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时，贵州留日归国学生二十余人，在黄齐生倡导下，组织贵州教育参观团，王伯群曾予支持，并请刘显世拨济经费二千元。^⑧王本人也资助经费一千元。

1919年3月30日，王伯群以贵州全权代表身分，同美国华侨实业公司代表赵士甄在上海签订了借款修筑渝柳铁路（由四川重庆经贵阳至广西柳州）草约，该草约中有将铁路沿线三十公里区域内的矿产、森林归华侨实业公司开发和采伐的条款，规定贵州省长公署以每百元实收九十六元、年息

六厘向该公司借款美金五百万元，并允许该公司有在贵州投资、兴办实业的优先权。草约内容透露后，刘显世所倚重的一伙人纷纷反对。财政厅长张协陆、政务厅长陈廷策、督署秘书长熊范舆和省议会议长张彭年等人，以草约条件苛刻，借款偿还方式于贵州不利；并以王文华有言将从借款中提取一百五十万元偿付黔军欠饷，攻击王伯群兄弟“卖省”营私。这就是贵州“渝柳铁路借款案”。刘显世对王伯群签订草约同意于先，见张协陆等人反对激烈，又犹豫于后。他担心王氏兄弟权力膨胀，转而支持反对王氏兄弟的行动。因此，草约未得批准，从而更加剧了护国运动前后逐渐形成的王文华集团（握有军权的“新派”）与刘显世集团（握有行政、经济大权的“旧派”）之间的矛盾。王文华发起了一系列行动，揭露张协陆等人贪污腐败，攻击刘显世集团。到年底，政争更加激烈。陈廷策遭人暗杀受伤，张协陆被迫服毒自杀，张彭年辞职避祸。这就是贵州所谓的“民八事变”。与此同时，王伯群与王文华借口军民分治，在贵州策划召开了一个非正式的政治会议，“想要刘（显世）让出督军或省长一席”。^⑨王伯群利用南北和议代表身分在上海、广州极力活动，迫使刘显世作出让步，“允南北统一后让伯群长黔”。^⑩

1920年冬，王伯群随孙中山由沪返粤。孙中山恢复军政府后，当时交通部长唐继尧未到任，由王署理。是年11月，贵州发生了“民九事变”，王文华集团杀死刘显世的亲信熊范舆和郭重光，迫使刘显世宣布辞去贵州督军和省长职务。事变发生前，王文华为避“以甥逐舅”、“以下犯上”之嫌而赴上海。次年3月16日，王文华被黔军司令部总参议袁祖铭收买

刺客刺杀身死。王伯群曾与浙江督军卢永祥策划行刺袁祖铭复仇未遂。是时，贵州政局大乱，黔军陷于群龙无首的局面，五个旅长相互火并。1921年4月，北洋军阀以饷械支持袁祖铭在武汉成立定黔军总指挥部，准备回黔定乱。王伯群希望取得黔军总司令卢焘、第一旅旅长窦居仁、第四旅旅长张春圃及其妹夫第五旅旅长何应钦等的支持，重振黔局，反对袁祖铭回黔。1922年3月，广东军政府委任王伯群为贵州省长。王伯群由上海启程，经湘西入黔，准备开府铜仁。但被袁祖铭所阻，未能就任。8月，北洋政府发表袁祖铭为贵州省长，王伯群无力与袁抗争，返上海作寓公。同年，在上海加入国民党。

1924年6月，厦门大学发生学潮，二百多名学生失学。部分教授为学生鸣不平辞职到上海。王伯群与这些教授共同筹商，决定为失学的厦大学生创办一所新学校，并由他捐款二千元作基金。经多方筹措，新创办的大夏大学于同年夏成立，马君武任校长，王伯群被推为该校董事会主席董事。他主张大夏大学“本学术研究之自由与独立，涵育革命与民主精神”；^①以“三苦主义”（即职员苦干，教授苦教，学生苦读）、“师生合作”和“自强不息”作为校训。^②1925年，王伯群出席段祺瑞执政府的善后会议并任临时参议院参政。1926年冬，大夏校长马君武回桂主持广西大学，王伯群经大夏校董会推为校长。^③同年底，王伯群与同乡窦简之见北伐军节节胜利，相约前往投奔。二人设法购买孙传芳部下，得以安全出境，潜赴何应钦之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部。何以王系文人，不宜任军职，升以“总参议”一席。北伐军到达上海后，

王兼任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王伯群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9月，宁、汉、沪三派组成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王伯群为委员。1928年王伯群任国民政府委员、交通部长兼招商局监督。在交通部长任上，他免去法国人铁士兰担任的邮政总办，接收英国在烟台、威海卫水线收发处，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电信营业局，设立国际电讯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真茹国际大电台及开办宁、沪、汉、青岛的自动电话，由部统管全国无线电台，与美商合办中国航空公司，与德商合办欧亚航空公司，恢复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创设航政局，并先后公布了航空条例、电信条例、邮政汇兑国立法及邮政储金法，使交通部所司渐上轨道。他还主张兴建粤汉、湘桂、黔桂诸铁路，因资金和技术不足而未能实施。1929年3月，王伯群以贵州代表出席国民党第三届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次年递补为执行委员。第四、五两届连任执委。1931年10月至11月，在国民党召开的宁、粤“上海和平会议”后，王去交通部长职，改由陈铭枢兼任。时值四川军阀刘文辉、刘湘交恶，川局纷扰，王伯群被派为特使入川协调川局。由汉口赴重庆时，川军刘文辉部以重金贿赂船主和王的随员，将步枪六千支、子弹数百万发藏于特使“专轮”底舱。事为刘湘特工侦知。“专轮”甫抵渝，枪、弹皆为刘湘截获。刘湘遂借故不与王谋面，致使协调川局之行一无成效。由渝返汉时，王的随员双清、刘协恒等又私运毒品，以图牟利。不意又为刘湘获悉，预报武汉行营。

“专轮”到汉，又被扣留，毒品被没收。一时各报竞相刊

载，舆论哗然，双清、刘协恒二人因此入狱，王伯群则以“不知情”而免议处。1932年，王伯群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受命为川滇黔视察专员，次年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失败后，大夏大学与复旦大学决定内迁。王伯群赴南京与教育部商定，设大夏、复旦两校第一联合大学于江西庐山(后迁重庆)，设第二联合大学于贵阳。1937年12月27日，第二联合大学在贵阳正式开课，王伯群任校长。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事竣，令大夏、复旦两校分立，以重庆第一联合大学为复旦大学，贵阳第二联合大学为大夏大学，任命王伯群续任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为副校长。王为大夏在贵州确定的宗旨是：“抗战教育之推行”；

“协助政府以开发西南之资源”；“促进西南之文化”。^⑨在内迁贵州的各大、中学校中，图书设备较完备者首推大夏。大夏迁黔期间，王伯群继任国民政府委员。

1938年3月，王伯群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筹划在花溪成立“农村改进区”，由大夏大学和贵阳县政府经理其事，旨在使百姓“生活安定”，“努力于各项生产建设”，实现“抗战建国”。^⑩1939年，王伯群受任为国史馆筹备委员。^⑪1940年，副校长欧元怀出长贵州省教育厅，大夏大学校务全由王伯群承担，并先后在贵阳、柳州创设大夏中学。王伯群曾以“学不倦，教不厌，行不惑”三语自勉，并与大夏师生相期。^⑫贵州食盐素仰川省，抗日战争时期，盐运受阻，贵州食盐昂贵。王伯群主张开发黔盐，积极与刘熙乙等人筹办裕民盐井公司，并出面聘人来黔勘测盐区。为培养盐务人才，王伯群

在大夏大学附设盐务专修班，首开大学培养盐务人才的先例。该专修班共培养学生四五百人，分布国内各盐务机关任职。^⑥大夏大学自创办到1944年，先后毕业学生达数千人，成为颇有影响的私立大学之一。

1944年12月，日本侵略军攻陷贵州独山、荔波等县，声言将袭取贵阳、遵义，直捣陪都重庆，西南一片惊慌失措。王伯群急赴重庆商议保卫贵州及大夏大学去留问题。因胃溃疡复发，12月20日病逝于重庆江北陆军医院。

注：

- ① 《王伯群君在进步党黔支部演说词》，《贵州公报》1916年2月3日。
- ② 《王伯群君在进步党黔支部演说词》，《贵州公报》1915年2月2日。
- ③ 汪兆铭：《勋三位陆军中将王君文华坤道碑》，《兴义县志稿·人物志》。
- ④ 周素园：《贵州陆军史述要》，《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63年版，第18页。
- ⑤ 参见《中央党务公报》第七卷第一期，第12页。
- ⑥ 天声：《中兴民国内幕之人杰》，《贵州公报》1916年7月15日。
- ⑦ 《赴沪代表王伯群呈据上海留学生倪松寿请助留美各情》，贵州省档案馆藏件，全宗2，案卷148。
- ⑧ 《王伯群致刘显世电》，贵州省档案馆藏件，全宗2，案卷177。
- ⑨ 桂百铸：《刘显世集团内部斗争散记》，《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63年版，第106页。
- ⑩ 1919年12月4日《刘亚休致熊克武密电》，原件藏四川省文史研究馆。
- ⑪ 《大夏周报》第二十四卷第十四期。
- ⑫ 参见民国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五月十四日出版的两期《大夏周报》。
- ⑬ 王伯群：《弁言》，《大夏周报》第十四卷第七期。
- ⑭ 参见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十四日出版的《大夏周报》。
- ⑮ 何辑五：《悼伯群先生》，《中央日报》1945年1月25日。
- ⑯ 刘熙乙：《悼伯群校长》，《中央日报》1945年1月26日。

马 福 益

陈匡时

马福益，一名马乾。1865（清同治四年）出生于湖南湘潭。世代为佃农。至其父马大良时，因受族人欺压退佃，生活无着，全家被迫迁至邻县醴陵西乡瓦子坪，租当地傅姓地主田为生，遂改籍醴陵。

马福益幼时读书数年，能写作短文。曾“读王船山遗集，引起其革命思想”，^①对清朝的统治不满。成年后，身体魁梧，有胆略，喜断里中不平事。有记载说他曾在当地“水师飞翰营做火头军目（管理炊事），因以营内粮精接济徒众，致被开革。”^②后全家迁居醴陵渌口镇（今株洲）。渌口处湘江边，为湘省南北要冲及湘赣水陆通道，五方杂处，人烟稠密，亦为醴陵会党的活动点。马福益在渌口逐渐成为当地会党的首领。渌口隔岸是湘潭雷打石，盛产石灰石，石灰窑林立，工人多为会党中人，窑主聘马福益至该处为总工头。马因此在雷打石大收徒众，各窑厂工人千余均听他调动。1891年，马福益“开堂放票，自称‘四路总统’，领有东、西、南、北四路头目，放飘布约一万余张”，^③即拥有徒众达万人。1897年又被两湖哥老会各地山堂推为龙头。^④1900年8月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被镇压，湖南许多参与这一事件的会党首领或遭屠杀或被通缉。清政府亦下令湘潭县令逮捕马福益。此

消息先为充任湘潭捕快头目的刘方尧所得，急令其子刘揆一通知马福益。马福益闻讯迅速逃离，对刘揆一极为感激，称他为“恩哥”。^⑤事后马福益回来重整当地会党，“以信义结其徒众，称洪江会”，^⑥成为二十世纪初湖南哥老会中一支重要力量。

1904年2月，革命团体华兴会在湖南成立后，为联络会党之便，又另立了一个“同仇会”作为外围组织，以策动和组织会党参加革命。马福益在会党中素有声望，信从会众最多，因此他和当地洪江会会众便首先成为华兴会联络的对象。这年春天，黄兴先派刘揆一的弟弟刘道一和万武去见马福益。马福益被说服，同意和华兴会合作，表示只要“有用得着我的时候，无不唯命是听”。^⑦不久，黄兴、刘揆一便去湘潭茶园铺，和马福益在一旧矿洞中秘密会晤。三人围着篝火、坐地而谈，“共谋光复”。他们筹划在同年11月16日西太后七十寿辰之际，趁全省大吏齐集长沙玉皇殿参拜时，预埋炸药于其下而聚歼之，乘机起义。拟议以长沙武备学堂学生和军队中革命分子为主力，同时由马福益督率附近各县会党，从长沙、岳州、衡州、宝庆、常德五路同时进军长沙。黄兴担任主帅，刘揆一和马福益担任这次起义的正、副总指挥。会后，马福益积极组织会众，“散放同仇会、华兴会票”。他们又仿照日本军制，将会党编成军旅，黄兴为大将，刘揆一为中将，马福益为少将。9月24日，湖南浏阳普迹市开传统的牛马交易大会，黄兴、刘揆一等又利用这一民间集市与马福益等会面。马福益介绍当地会党首领姜守旦、龚春台、冯乃古等与黄兴等认识。同仇会同时在此举行授予马福益“少

将”衔仪式，并赠长枪20支、手枪40支、马40匹。决定待大批武器陆续运到，便举行起义。

1904年10月，华兴会起义计划被一武备学堂学生泄露，清政府接获密告，侦探立即四出，多处搜捕可疑人物。接着在长沙的马福益部下二人因酒后失言被密探侦出，立遭逮捕，供词涉及马福益和黄兴（当时称黄廛午）等人。黄兴这时已躲藏起来，马福益远在湘潭茶园铺矿山中，未知有变。幸有会党中专跑交通的刘重，绰号飞毛腿，知事已泄，飞速通知马福益，马暂时走避广西。华兴会长沙起义计划亦因而流产。

1905年春，马福益自广西潜返醴陵、萍乡湘赣交界地区活动。4月12日，因会党接应失去联系，马福益不幸在萍乡火车站被清军逮捕。清朝统治者害怕马福益武艺高强和在当地的威望，竟残酷地用刀洞穿马福益的锁骨，贯以铁链，械送至长沙。马福益受到极为残酷的刑讯，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仍然毫不屈服。他“声言革异族命，为汉族复仇，死何所憾！”^⑧4月20日，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终年四十岁。

注，

① 陈春生：《丙午萍醴起义记》，《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2月版，第463页。

②④ 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第100页。

③ 《端忠敏公奏稿》卷五，第31页。

⑤ 刘安熙：《回忆我的父亲刘揆一》，《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23—124页。

- ⑥ 《马福益传》，《革命人物志》第四集，台北1971年2月版，第138页。
- ⑦ 万武：《策动马福益起义的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中华书局1963年2月版，第245页。
- ⑧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第10页。

徐 镜 心

卫香鹏

徐镜心，原名文衡，字子鉴，1874年12月10日（清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出生于山东省黄县^①。他童年入私塾，聪明好学。他兴趣广泛，也爱音乐，十三岁时常于学习之余，到镇河寺跟僧人学吹笛和箫等。稍长，泛览兵法、宗教诸书，对宋、明陆王之学尤为嗜爱。二十岁为邑诸生。他目击甲午、庚子两役，“慨然于清政之窳败，革命思想潜萌于中”^②。1901年，徐肄业于烟台毓材学堂，次年转入济南高等学堂，1903年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法科学习。

徐镜心在日本学习，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影响，逐渐产生反清革命思想。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组织同盟会，他率先加入，并被举为山东分会首任会长。是年底，在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斗争中，一部分留学生愤然罢课归国，徐镜心偕谢鸿焘等回到山东烟台。他以倡导革命为己任，设立同盟会机关部，积极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为筹措革命经费，他曾亲自向山东掖县留日同学邱丕振的父亲宣传“毁家纾难”的道理，说：“清室权贵，招权纳贿，国已不国，必致外人瓜分之祸。国若不存，家产何有？尊府拥有厚资，曷不毁家纾难，组织革命基础”^③。邱父受感动，即捐资两万元。为了“唤醒民众”，

扩大影响，徐还劝说谢鸿焘出资在烟台西郊通绅冈创办东牟公学，聘同盟会员担任教员，藉教育宣传革命。随后，又联络高密刘冠三组织相州中学，与王学锦、徐文炳创设师范班于育英学堂。由于徐镜心等广事联络，同盟会在山东迅速发展。

为了发展革命力量，徐镜心于1907年前往奉天，一度任《盛京时报》主笔。他又与张继等人结伴潜赴东北各地，宣传革命，结纳豪杰，先后发展同盟会员三百余人。不久，事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所闻，下令缉捕，于是潜往吉林，在省城高等小学任教员以为掩护。是年，宋教仁与白逾桓等到东北策动“马贼”举事，他与宋取得联系，在省城创办一木植公司，作为秘密联络机关。后谋泄事发，同志数人被捕，徐镜心幸得走脱，往见当时担任延吉边务帮办的吴禄贞，在吴的掩护下，任督办处垦务委员。1910年秋，因母病回到家乡。

徐镜心返黄县后，初与本县邹斌元、王学锦、李梦庚等人组织县农会，担任会董。次年夏，在济南与刘冠三、王厚庵创立戏曲改良社以为掩护，从事革命宣传和联络活动。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徐镜心得知消息后，便与丁惟汾、谢鸿焘等谋划响应。他们借游大明湖为名，在古历亭开秘密会，商议响应办法，决议召集各界在咨议局开会，强迫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④。会后，事为地方士绅、立宪派所悉，他们认为徐镜心“峻急”，听说徐将担任各界联合会会长，竟群起反对。徐镜心闻此情况，不愿因一己之故而牵动大局，决定与党人杨岷庄南下，同沪军都督陈其美取得联

系，相约南北互为策应。不久，徐镜心前往奉天，参与革命党人商震、程起陆等在辽阳发动的起义。

徐镜心南下后，革命党人丁惟汾、谢鸿焘等联络各界人士和清军第五镇中支持独立的官兵，于11月13日在济南召开各界联合大会，迫使巡抚孙宝琦宣布山东独立。这时袁世凯已到京组阁，立即派其爪牙张广建、吴炳湘赴济南，策动取消山东独立，以稳定北方局势。第五镇的头统吴鼎元、张树元等人均是袁的旧部，这帮人经策动就立即转向反动，要求取消独立。11月24日，孙宝琦又宣布取消山东独立。于是，徐镜心决心以武力光复山东，他到烟台组织“共和急进会”^⑤，自任会长，宣布以“巩固山东革命之实力，与满洲同志相呼应，以为南方之声援”为目的^⑥。并设立民政、军事、宣传、交通等部门，他兼任民政部长。随后，徐镜心派崔士杰、徐镜古去蓬莱、黄县筹款，本人则去大连组织民军。1912年1月15日，徐镜心率领由共和急进会员和关东绿林军五百余人组成的民军袭占登州（今蓬莱），次日又攻克黄县，组成山东军政府，推连承基为鲁军司令，徐镜心任总务部长，军政府着手筹措款项，加紧战备，准备进军济南。

山东军政府成立后，袁世凯令青州总兵叶长胜率左路巡防营，向黄县民军发动进攻。连承基、徐镜心亲自指挥民军激战三昼夜，始将清军击退。随后得到沪军北伐先锋队司令刘基炎部的支援，声势复振。对于清军对山东革命党人的镇压，徐再接再厉，坚持斗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曾任胡瑛为鲁军都督，驻节烟台，因缺乏实力，清军复乘军政府内部改组之机再攻黄县。徐镜心不辞艰危，亲率士兵至前线侦

探敌情并指挥迎敌，后终因民军势单力孤，黄县于2月14日失陷，徐镜心前往烟台。

南北议和告成后，山东战事不久也随之结束。徐镜心认为“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任务已经告成，目下应致力于民生主义，为实现“平均地权”移民关外垦殖，便发起成立“山东垦殖协会”，为谋渔航事业之发展；又创立“冻口河船协会”^⑦。其间，山东都督周自齐曾以济南道一职相笼络，为徐所拒绝。徐镜心对议会政治抱有希望，他积极参加政党活动。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徐镜心任山东支部理事。同年冬，当选为参议院议员。1913年任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候补委员。

随着袁世凯加强专制独裁，徐镜心对袁日益不满。他曾当面对袁说：“总统者，公仆也；国民者，共主也。仆无自己意志，以主人意志为意志，仆无自己行动，以主人行动为行动。总统能为此，则中国治，否则中国乱。治则全国之休，乱亦非总统之福也”^⑧。袁世凯听后大为惊讶，说：“昔闻子鉴，今见子鉴矣”^⑨。随后袁派心腹对徐进行笼络，表示拟任以甘肃都督，遭到拒绝。“宋案”发生后，4月袁世凯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徐镜心即发表《袁政府违法借款之铁证宣言》，公开提出对袁世凯实行弹劾。他说：“袁氏借款不经国会议决，是为违背法律”，“不弹劾袁氏，无以谢中华全国”^⑩。此时，徐镜心还与南方的胡汉民、李烈钧、柏文蔚三都督暗中联络，密谋讨袁^⑪。

袁世凯以武力镇压了革命党人的“二次革命”后，为谋

帝制自为，首先向《临时约法》开刀，提出增修临时约法。他授意法律顾问日人有贺长雄抛出《共和宪法持久策》一文，对宪法起草委员会及“天坛宪法草案”大加攻击，为袁世凯在宪法中争夺权限。徐镜心于是在《顺天时报》上发表《驳有贺长雄共和宪法持久策》，文章说：“蔑视宪法起草委员会，即为蔑视国会。蔑视国民与国会，即为蔑视国家，即为共和之蠹贼，即为国民之罪人”^⑩。

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徐镜心等国民党籍议员被迫缴出议员证书。袁对徐早就怀恨在心，此时更派密探侦察其行动，后竟下令缉拿。1914年3月14日，徐镜心在《顺天时报》馆被捕。在狱中，袁世凯指使京畿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对他百般利诱，继以非刑拷打，但徐坚贞不屈。4月14日徐镜心被袁政府杀害于北京^⑪。

注：

① 《徐氏家谱》第二卷（之二），第23页。

②④⑧⑨ 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三集，第428—429页。

③⑦⑪ 孙丹林：《山东辛亥革命之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325—341页。

⑤ “共和急进会”又名“北方革命急进会”，其总部初设于烟台，后移往大连。

⑥ 《时报》1912年1月3日。

⑩ 萧继宗主编：《革命文献》第四十三集，第343页。

⑫ 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第2分册，第329页。

⑬ 《革命人物志》第三卷，第425页。

陈 家 鼎

许 进

陈家鼎，字汉元（汗园），又名陈曾，故自号半僧。1876年6月18日（清光绪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狮顾镇。祖辈务农，到祖父陈玉华始为读书人。父亲陈梅叟以诗礼教化闻名乡里。

陈家鼎少年读书聪敏坚毅，十五岁补博士弟子员。1898年，入两湖书院，与同窗黄兴、白逾桓等相识，后转考入湖北武普通学堂。戊戌变法失败后，常读王夫之（船山）和南明学者遗著，遂萌发民族思想。八国联军迫订《辛丑条约》后，眼看大好河山日益破碎，痛恨清政腐败，有振兴中华之志。1903年初，与新人文普通学堂的宋教仁相识。同年秋，陈以成绩优异获保送官费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益肆力于政治学，于西籍无所不窥，尤博通共和宪法原理原则，阐究民生学，注意于社会国家主义。”^①曾获法学士学位。^②

留日期间，陈家鼎积极参与黄兴主盟的华兴会活动。1904年黄兴策划长沙起义事泄失败后逃往上海，同年11月7日，陈家鼎在上海参加黄兴召集的余庆里集会，图谋再举事，因万福华谋刺清吏王之春案突发，与黄兴等先后逃亡日本，继续学业。在日本，与湖南同学黄兴、宋教仁、陈天华、

姚洪业等联络留学生，鼓吹反清革命，宣传民主共和。

1905年夏，孙中山由欧洲到日本，创建中国同盟会，陈家鼎率先加入，并任同盟会总部评议员。是年秋，同盟会总部决定在长江沿线创设机关，陈家鼎奉孙中山命回国筹划，他先后在上海、武汉、长沙参预建立同盟会分会机关。在上海，当时曾由在阜丰公司任职的孙毓筠捐资作经费，先在虹口三元里，后迁往法租界八仙桥鼎吉里夏昕棠家设立同盟会机关，门外挂“夏寓”的牌子，由陈家鼎驻会负责。上海同盟会机关成为当时海内外革命党人活动联络“通消息之大本营。”^③

陈家鼎还在长江一带积极活动。在武昌与“日知会”的刘敬庵、朱松坪、时功璧等结交，感情甚深，在高升巷圣公会内建立同盟会湖北机关。以后，陈家鼎曾写过《哭刘敬庵、朱松坪两烈士》诗三首，有“何当寻得刘朱墓，大哭当年两鬼雄”、“不堪再过高升巷，宿草斜阳独闭门”等句。^④

陈的胞弟家鼐也是同盟会员，1906年毕业于湖北陆军学堂，充新军教练官，在军内积极联络同志，从事革命。陈家鼎还结识一些长江会党头领，如杨恢、成亚龙、郑先声、马福益等，开展活动。陈家鼎当时担任长江沿岸七省同盟会机关视察，他不避艰险，为创设革命机关和开展革命斗争而努力。

陈天华忧国愤时在日本蹈海自杀殉国后，同盟会公推宋教仁作传，由陈家鼎和苏鹏护送烈士灵柩回国。不久，姚洪业又因筹建“中国公学”受挫，在上海愤投黄浦江而死。湘籍人士原拟将陈天华烈士遗柩归葬新化原籍，陈家鼎认为这

是发动群众号召人心的好机会，提议公葬。经电 商 湖 南 各 界，建议公葬烈士于长沙岳麓山。1906年5月23日，二烈士灵柩运抵长沙。陈家鼎和禹之谟领导群众冲破官绅阻挠，举行了葬礼，万余人参加，轰动一时。后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说这是“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⑤

在湘期间，陈家鼎和禹之谟还在长沙创建了同盟会湖南分会，初设天心阁，后移至北正街湘利乾织布公司禹之谟家中。当时青年军人和学生，尊奉禹、陈二人为泰山北斗，一致推举二人为湖南学会会长。邵阳中学堂和唯一学校是他们进行秘密革命活动的两个据点，一时全省人心更加趋向革命。

公葬陈、姚后，陈家鼎、禹之谟拟利用民气进一步发动，组织起义。事泄，禹被捕，陈家鼎翻墙逃入圣公会，得一牧师保护才幸免于难。刘敬庵闻讯，自武汉密电告知，湖北官府正亟谋抓捕他，嘱出逃时切不可走武汉。于是陈家鼎化装清吏，由这位牧师护送从小路奔江西萍乡逃亡。清政府命令沿江官府严缉陈家鼎，又迁怒其家，其父陈悔叟经地方乡绅杨翌如等极力保免。⑥

陈家鼎潜抵上海后，得到党人高天梅、柳亚卢（即柳亚子）等人掩护，立即与宁调元、杨守仁筹备出版《洞庭波》杂志，这是和《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云南》、《四川》等杂志一样，同由本省留日学生创办，以本省为刊名的宣传民主革命的刊物。《洞庭波》刊出陈家鼎所撰《二十世纪之湖南》一文，对在湘人中存在的“媚满性之圆足”、“合群性之缺乏”、“保皇性之愚谬”、“守旧性之固结”、“排

外性之误看”等谬误，进行了剖析，他针对性地提出“速行悔过”、“首倡起义”、“力讲外交”、“公约自治”和“预备革命”等五法，以为“医治湖南的药石”。^①此外，陈还撰写了《禹狱之构成》、《哭亡友姚君洪业》等文。

清吏端方、铁良、瑞澂对陈家鼎等人的革命活动恨之入骨，通令悬赏缉拿。由于无法在沪久留，陈家鼎与宁调元于10月29日同船再逃往日本。宁调元在舟中曾有诗云：“心绪如焚赋七哀，同舟共济几人才；祖鞭应许君先着，东亚雄飞大舞台。”“须知安乐交人易，漫说狂澜砥柱难。唯有使君唯有我，头颅练好铁相看。”诗共八首，题名为《渡黑水洋有作兼赠汉援》。^②

那时，孙中山住在东京筑土八幡町，门外写着“高野长雄寓”。陈家鼎向孙中山详细谈了国内情况，并设法营救禹之谟。但不久，禹在狱中被害。继之，萍浏澧起义爆发，宁调元奉派回国策应。陈家鼎等将《洞庭波》改名《汉帜》在东京出版，宣称“此报宗旨，在光复祖国，防护人权，唤起黄帝种魂，扫除白山鞑虏，建二十世纪民国，还五千年神州；而尤以维持各国公共安宁，鼓吹汉人实行革命为最大要素。”^③陈家鼎在《汉帜》第一期上发表了《论各省宜速响应湘赣革命军》等文章，声援萍浏澧起义。《汉帜》曾被认为是当时鼓吹革命最有力的刊物之一。这些杂志散布各省，流入萍浏澧等处尤多，知识青年和青年军人争相阅读，影响甚广。萍浏澧起义失败后，陈家鼎、宋教仁等在东京为此役牺牲的烈士开会悼念。在主编《汉帜》的同时，陈家鼎在东京曾任同盟会总部鼓吹部部长、文学部部长等职。^④

陈家鼎通过在内地的革命实践，深知革命必须重视军事方能成功。在东京，他积极联络同盟会中学过军事任过军职的同志，如李烈钧、黄郛、王天培、仇亮等和一些重要党人，每星期天都相约在桑原、城西寓所聚商革命方法。陈又去联络留学东京的振武和士官学校的学员，发现其中有革命思想的人士甚多，就介绍他们陆续加入同盟会。以后辛亥革命时，各地武装起义的领导骨干，有不少就是和陈家鼎来往的人。

萍浏澧起义失败，湖北日知会领导人刘敬庵等被捕，革命运动一时受挫，国内形势更险恶。陈家鼎告诫隐伏在湖北新军中的胞弟家鼐，外表上装得糊涂没出息的样子，不引人注意，以便暗中活动。

陈家鼎还在东京寓居的荒井家中，和乔宜斋、仇亮、王延祉、杜羲等组织一极秘密的小团体“血党”，专门对付清廷派来日本追踪诱捕革命党人的侦探。一次，端方派一个名叫刘祝三的来东京，化名金寿山。陈家鼎查清他的来历行为后，派“血党”成员唐声海向日本警署报告，说刘祝三犯“烟禁罪”（吸毒贩毒），使被捕入狱。还有一个朱孟廉，端方叫他先迷惑住陈家鼎、刘揆一。陈立即察觉这是个奸细，就给“血党”同志下了“诛奸状”，以后用了“反间计”将此人剪除。徐锡麟在安庆刺杀恩铭，被派去协助最后一同殉难者之一的陈墨峰烈士，也是“血党”之一员。^①

1908年夏，陈家鼎和宋教仁奉孙中山派遣，带领小组分两路潜回国内，发动起义。宋去台湾转奔大连、沈阳；陈去胶州湾、青岛、山东沿海。临行相约，前后夹击，直捣北京，

结果都失败了。陈家鼎在山东的活动，被德国人和清政府侦知，被逼得和几个同志潜入山区僻径赶路。没有吃的，只能嚼几粒生花生维持生命，而气不稍馁。^⑫回东京后，宋教仁一夜到陈寄住的桑原馆寓所，相对饮泣，为失败而痛心。但后来证明，他们的努力还是结出了良果的。^⑬

辛亥革命爆发，江苏独立后，陈家鼎奔走上海南京间，协助宋教仁筹组南京新政府，草拟创制法度。1911年冬，与杜羲等去大连、沈阳，招募人马组织“胡子队”，准备给清王朝最后一击。布置就绪后，因和议定局而作罢。^⑭

1912年3月，孙中山因陈家鼎是首创上海同盟会的老同志，委任他和于右任、姚勇忱、黄郛、褚民谊五人重组光复后的上海同盟会。这是上海同盟会第三次组建，后即为国民党上海交通部。^⑮

同年4月7日，陈家鼎与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景耀月、孙科兄妹、章士钊等，随孙中山同乘“联鲸”号兵舰自南京去武汉，^⑯9日到达，参加与黎元洪会晤。

南京临时参议院随政府北迁后，陈家鼎作为湖南省议会选出的参议员，勤劳国事，为人民代言议政，在议院常批评权贵，正气凛然，^⑰曾以铜砚击桌，怒斥宵小，满座皆惊，宋教仁赠以“陈惊座”美名。在北京，八十多家新闻单位联合组成北京新闻团，陈以很高的威望当选为团长。民国初建，舆论十分重要。陈经常和东西方各国新闻记者和各界名流来往，发表很多言论。对于化除国际误解，开展国民外交，争取国际上对民国的承认，做了不少工作。^⑱

同年8月，武汉革命将领张振武、方维被袁世凯、黎元洪

洪钧结在北京非法拘捕枪杀，全国愤慨。陈家鼎在参议院中力主弹劾与查办此案，但由于共和党籍议员阻挠而未果。

10月，陈家鼎在北京主持中央共和纪念会，连续三天盛大庆祝辛亥起义一周年，并向应邀参加的蒙古、西藏活佛热情宣传五族共和的意义。^⑩

1912年冬，陈家鼎因竞选首届国会议员回到湖南，次年初，宋教仁也回到长沙。1月19日，他俩同往岳麓山吊念革命烈士并联句作诗，全诗是：

十载有家归不得，而今随尔入黄门。（陈）

更无多泪流知己，别有伤心哭国魂。（宋）

死友已经垂竹帛，生朋无分住桃源。（陈）

元龙豪气今犹在，百尺楼头一汉元。（宋）^⑪

此次陈家鼎经湖南省选为众议院议员。

宋教仁遇刺后，陈家鼎在临时参议院向袁政府提出严厉质询。覃振等十七名议员联署此案。陈并以发言人身分接见中外记者，发动舆论，声讨袁党罪行。^⑫

首届国会开幕后，袁世凯遣亲信贿陈五十万元“炭敬”，嘱“勿为民党所用”。陈当面厉声呵斥说：“我头可断，义不帝秦！”璧还其金。陈更是国会砥柱中流，组“癸丑同志会”，联合两院忠贞的国民党议员合力抗袁。曾写诗寄友人明志：“自从建国出门行，为罪为功百未成，公等应为香案吏，政余犹比玉堂卿；一樽兴到歌还饮，万物春来息又生，为报昔年诸共事，长安虽朔不称臣。”^⑬

“二次革命”失败，陈出亡日本，积极参加护国讨袁。袁世凯死，国会重开，陈再回议院，并兼任宪法起草委员。不

一年，护法南下，参加广州非常国会，联络协调各派系矛盾，孙中山深为倚重。^②1918年初，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参议。^③在护法的整个历史时期，陈始终和孙中山在一起。1920年11月，陈发表《关于西南大计之通电》，全面阐述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方面政见，颇具影响。^④

1922年4月，陈炯明叛变。陈家鼎冒险只身入叛将洪兆麟兵营，责以大义，使洪感愧，乃令士兵缓进。陈遂急入总统府报告孙中山，为孙脱险赢得了时间。^⑤

陈家鼎诗文造诣均深，早期加入“南社”，并介绍其弟和三个妹妹入社，一家五兄妹均为“南社”社友，一时传为佳话。

护法斗争失败后，陈家鼎深愤党人不求进取，国事不可为。孙中山逝世后，他伤惋之余，决心不问政事，退隐深居，整理著述。著有政治专著数卷，诗四卷，文六卷，均未及出版。辑印之《百尺楼诗集》、《半僧斋诗文集》后亦散佚。

陈家鼎毕生致力国民革命，“秉性刚直，与人落落难合，而大节凛然，人不敢干以非义。”^⑥1928年1月8日，陈家鼎在北京寓所书斋因煤气中毒猝逝，年仅五十二岁。居正、胡汉民、于右任、戴传贤、张继、吴敬恒、商震等为其卜葬于北京西山四王府。^⑦

注。

- ① 林述庆：《陈家鼎革命大事记》，《朝野新谭》第82页。
- ② 居正、焦易堂：《陈家鼎》，《革命人物志》第五集，第193页。
- ③⑦ 同②，第191页。
- ④ 《南社诗集》第四册，第367页。
- ⑤ 刘洪洪：《简论禹之谟》。
- ⑥ 同①，第88页；同②，第191页。
- ⑦ 《洞庭波》第一期，第3—21页。
- ⑧ 《汉帜》第一号，第75页。
- ⑨ 1907年3月30日《复报》刊的《汉帜》广告。]
- ⑩ 同①，第94页。
- ⑪ 同①，第91页。
- ⑫ 同②，第191页。
- ⑬ 同①，第91、95、96各页。
- ⑭ 同①，第92页。
- ⑮ 《孙中山史事详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6页；同①，第92页。
- ⑯ 同⑤，第266页。
- ⑰ 《民国之精华》第219页；同①，第95页。
- ⑱ 《谭人凤集》第96页；同①，第93页。
- ⑲ 郑逸梅：《南社丛谈》，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374页。
- ⑳ 《宋教仁血案》，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04页、297页。
- ㉑ 同②，第191页、193页。
- ㉒⑳ 同②，第192页。
- ㉓ 《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19页。
- ㉔ 《陈家鼎关于西南大计之通电》，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 ㉕ 同②，第193页。
- ㉖ 同②，第194页。

王 和 顺

黄碧琴

王和顺，字德馨^①，号寿山，1868年（清同治七年）生于广西邕宁县一个壮族的贫苦农民家庭。王和顺青年时曾投入刘永福部下，参加过抗法战争，担任过哨官。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大批遣散抗法战士，王和顺回到家乡并参加了三合会。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年，广西天灾频仍，瘟疫流行。处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广西各族人民，在会党的组织和领导下，酝酿大规模的反清斗争。王和顺这时正在宣化县（现在邕宁县及南宁市的一部分）署当衙役。他有五个兄弟当时因抗租税而被官府杀害，目睹清政府的黑暗统治，他心中燃烧起了反抗的怒火。县署衙役当时负有所谓“捕盗”的任务。王和顺利用职务的方便，暗中串连了许多穷苦失业的壮汉族兄弟和散兵游勇，设台拜会，组织抗清队伍。1898年，他被清政府逮捕入狱。次年8月，从狱中逃出，召集会员，“聚众拜台”，公开举起了反清革命斗争义旗。在王和顺的影响和推动下，当时南宁府属的邕宁、横县、隆安以及思恩府属的武鸣等地，先后发生多次会党武装反清斗争。

1902年，清政府特命广西提督苏元春兼任广西边防督办。这年6月，苏元春飭令总兵马盛治率领大军镇压人民起

义。王和顺率领会党武装，将马盛治的队伍围困在隆安县马鞍山峡。马盛治率部突围，被王和顺开枪击毙，其部几乎全军覆没^②。

1903年，广西人民起义出现了新的高潮。清政府以苏元春“疏防失职”革去其职，充军新疆。另派岑春煊署两广总督，督办广西军务。岑春煊调集了湖南、广东、贵州、广西、云南等省大军共十多万人，妄图一举扑灭广西的人民起义。广东调来的军队称“安勇”，由陆爵率领，兵多粮足，装备精良，王和顺在南宁石埠布阵诱敌，而将大队人马埋伏在隆安县境的梅龟山。陆爵驱兵急进，在梅龟山遭到伏击，伤亡过半。这支有“天上雷公，地上安勇”^③之称的清军，被王和顺一仗就打垮了。

经过马鞍山峡和梅龟山两战役的胜利，王和顺声威大振，许多分散的会党武装，纷纷投奔王和顺部下。都安的韦五嫂（会党领袖韦五之妻）、南宁的关运培等抗清义军与王和顺领导的会党武装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以南宁为中心，势力扩展到马山、都安、武鸣、隆安、扶绥、上思等地区的各族人民大起义。王和顺成为这一带地区会党的著名领袖。

1904年3月12日至4月21日，王和顺联合南宁地区的黄五肥、滕正宜，钦州的黄三等，集中了三千多名会党武装，在武鸣赖屯、花园村，及隆安的局理、都吉等地，与广西提督兼代理边防督办丁槐亲自督率的十多个营清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随后，王和顺又率领义军转战到了扶绥、上思一带，依靠当地壮、汉人民的支持，凭借十万大山天险，与清军周旋。同年5月，柳州爆发了会党领袖陆亚发领导的起义，

桂、柳、庆三府一带（即今桂林、柳州和河池三地区）人民纷纷起来响应。王和顺挥师北上马山、都安县境，与柳州地区会党起义军相呼应。随后又由上林县率队南下，占领了上林县和宾阳县交界的一带地区。接着转战邕宁、武鸣一带，专门打击罪恶昭著的土豪劣绅。

1905年前后，广西会党起义暂趋低潮，王和顺不屈不挠，一直坚持反清斗争，他对清政府的招抚、诱降视之“如粪土”，“宁备历艰险，未尝稍贬节操”^④。清政府对他恨之入骨，悬赏万金购其头颅。由于寡不敌众，王和顺避往安南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

1907年3月，孙中山从日本到达安南西贡策划武装起义。王和顺前往谒见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旋随孙中山由西贡经海防到达河内，受命负责钦州、南宁一带的起义活动。同年4月，钦州、廉州“三那”（即那黎、那彭、那思）地区爆发了刘思裕领导的大规模的抗捐运动。清政府派巡防营统领郭人漳和新军标统赵声（同盟会员）前往镇压。孙中山认为这是一个发动起义的好机会，派人去郭、赵军中活动，并委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⑤，深入“三那”地区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王得知驻扎防城的清军连长刘辉廷、李辉堂有反正之意，决定在防城发动起义。这个计划得到孙中山的赞同。同年9月1日，王和顺率领“三那”的群众武装二百多人，从王光山出发，袭取防城。3日，王和顺以南军都督名义，发表了《告粤省同胞文》、《招降满洲将士布告》等文告，揭露清政府的腐朽反动；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由于得到清军连长刘辉廷、团长

唐浦璋以及驻防城江对岸的守军连长李辉堂为内应，王和顺率领革命军于5日攻入防城，部队发展至五百多人。接着王和顺又率队向钦州进发。但因驻钦州清军统领郭人漳不肯依约内应而没有攻克，起义军又转攻灵山。与清军激战三天，终因弹药缺乏，被迫撤回“三那”。由于一时无力进取，王和顺下令解散队伍，自己则退到河内，向孙中山报告钦廉防城起义经过。孙中山勉励王和顺继续战斗，命他负责组织桂边的镇南关（今友谊关）、水口关、平宜关（今平而关）一带的活动，着手准备镇南关起义。11月，王和顺赴那模村与凭祥土司李佑卿商议夺取镇南关炮台的问题，但因李佑卿的部下拒绝合作，孙中山改派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派王和顺募集同志，夺取龙州水口关作为声援。

1908年4月，孙中山命令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三人筹划云南河口起义。4月29日，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率领一百多人在河口起义，与清军血战一昼夜，占领了炮台，击毙清防务处督办官王玉藩，缴获枪支一千多支，子弹二十万发。驻河口清军六个营全数投降。5月4日，王和顺率领队伍沿滇越铁路线向北推进，两营清军相约来降，王部顺利占领了南溪。5月下旬，清政府调集了云南、广西、贵州、四川清军数万人向河口大包围，王和顺率队迎战，相持了二十多天。起义军弹绝粮尽，不得已撤出河口。王和顺和黄明堂率部六百多人退入越南，后被法国殖民政府扣留，驱逐出境并派轮船押送新加坡。

王和顺在新加坡居住三年，1911年3月29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后，他到达香港，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10月武昌

起义胜利，王和顺回到广东，他没有来得及征得同盟会南方支部的同意，便自告奋勇募集粮饷，于11月初（农历九月十一日）发动了惠州起义，组织了惠军，与清军在飞鹅岭血战七昼夜，光复惠州。11月9日，广东光复。各地民军纷纷开进广州城，王和顺也率领惠军十七个营不下一万人的队伍，进驻广州长堤一带。此外，还有黄明堂的顺军、陈炯明的循军等也相继进驻广州。不久，陈炯明任广东副都督，独揽广东军政大权，他扩充自己的实力，排斥异己，实行消灭民军的政策，当时各路民军中“以王和顺惠军势力最为雄厚，又颇有纪律”^⑥，是民军中影响最大的一支队伍，因此，被陈炯明视为眼中钉。陈炯明召开所谓裁军会议，遭到民军领袖王和顺和黄明堂反对。当时，王、黄已意料到冲突不可避免，就将队伍退驻于东堤一带。1912年春，陈炯明出动军队包围惠军驻地，遭到惠军的顽强抵抗。双方激战了几天，惠军终因枪弹接济不上而失败，王和顺出走香港。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中华革命军及护国军讨袁。王和顺亦组织义军，参加讨袁运动。

1922年6月，陈炯明公开叛变孙中山，王和顺回到梧州，与滇军将领张开儒、杨希闵兴师讨逆。1923年初随滇桂军进入广东。以后，王和顺离开军队，隐居广州多年。因积劳成疾，久患足疾，医治无效，于1934年在广州逝世。

注。

- ①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下册第757页关于云南河口起义的叙述中，称王和顺为“张德卿”；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第119页关于钦廉起义的叙述中，说王和顺“改名张德兴”；台湾版《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编第十三册第155页记述，“王和顺，字德馨”。可见，“卿”、“兴”、“馨”几字之差，皆为谐音之故。
- ② 关于马盛治之死，史志有不同的记载，本文采用余一清《南宁地区人民的反清斗争》一文的说法，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230页。
- ③ 余一清：《南宁地区人民的反清斗争》，《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230页。
- ④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1964年台湾版第一编第十三册，第145页。
- ⑤ 同④，第156页。
- ⑥ 李衡章：《王和顺惠军与陈炯明循军冲突内幕》，《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392页。

唐 群 英

罗绍志

唐群英，字希陶，册名恭懿，1871年12月8日（清同治十年十月二十六日）生于湖南衡山。其父唐少垣，清末提督。他共有二子四女，唐群英系第三女。

唐群英自幼聪慧好学，稍长能诗善文。十五岁时写过“邻烟连雾起，山鸟唤晴来”等佳句，被塾师批谓“女文而有男性”^①。1890年，唐群英的父亲病逝。不久，她从母命嫁到毗邻的湘乡荷叶（今属双峰县），与曾国藩的排行弟弟曾国纲结婚。1897年她丈夫去世，独生女也夭折。在曾家的日子里，唐群英结识了秋瑾和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她们都和曾家有亲戚关系^②。当时，这三位进步女性，在思想上互相产生过影响。

1904年春，秋瑾赴日求学。接着，唐群英也冲破封建家庭的阻力，自费赴日寻求救国之道。在日本，她先入青山实践女校，与秋瑾同学；两年后，考入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湖南当局嘉其成绩，把她改为官费生。她因才华出众，深得校长山根正次及老师水谷直孝、宫田修等器重。

在东京期间，唐群英结识了刘揆一、刘道一、黄兴等湘籍志士。1905年春，她胞弟唐乾一也抵日。5月，经赵恒惕介绍，姊弟俩一同加入黄兴、刘揆一等发起的华兴会。7

月，黄兴介绍她会见了孙中山。8月20日，以华兴会、兴中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成立中国同盟会。其时，华兴会会员中在讨论是否加入同盟会问题时，有人不赞成，她的弟弟唐乾一便是其中之一^③，唐群英坚决赞同加入，成为同盟会会员。她年岁较大，是当时同盟会里有名的“唐大姐”。

唐群英加入同盟会后，积极从事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1906年，留日女学生会成立，她初任书记，继任会长。是年10月，湖南留学生筹办的《洞庭波》在日创刊，她利用课余时间为该刊组稿或撰稿。“霾云瘴雾苦经年，侠气豪情鼓大千；欲展平均新世界，安排先日把躯捐。”就是她发表在《洞庭波》第一期的八首绝句之一。她也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热心支持者，当时《民报》经费困难，她与秋瑾节衣缩食，各捐银二百元。

1907年底，唐群英在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毕业。翌年春回国执教于湘、赣、宁等地。未几，复往日本，入音乐学校音乐专科。这期间，她痛心于同志刘道一、秋瑾相继为革命捐躯，觉得不建军旅，不能推翻清王朝，便于1910年归国，临行时孙中山赠她诗一首：“此去浪滔天，应知身在船，若返潇湘日，为我问陈颠。”^④唐群英返湘后，在湖南、湖北等地，联络革命同志，筹建女子军队。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她奔走长江流域，尽力革命事务。“女子北伐队”建立时，她被推为队长，率领队伍挥戈疆场，英勇作战。11月，唐群英与同盟会会员张汉英、张昭汉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女子后援会”。该会一面派人到各省为民军筹款；一面组织“北伐军救济队”，“随赴战地，医救受伤兵士”^⑤。南京

临时政府建立时，她与张昭汉、程颖、陈鸿璧四人，作为“女界协赞会”代表，受到孙中山接见，荣获总统府“二等嘉禾章”^⑥。

民国建立后，为了在政治上实现“男女平权”，各地妇女纷纷组团设会。当时，除唐群英等发起的“女子后援会”外，还有林宗素、沈佩贞、吴木兰等在上海发起的“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尚武会”、“女子同盟会”，以及王昌国在湖南长沙发起的“女国民会”等，致力于女子参政活动。1912年2月20日，她联络五个女子团体在南京开会，决议组织“女子参政同盟会”。宗旨是“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其方法应联络全国女界各举代表来宁组织统一机关部，以厚团体而利进行。”^⑦

此后，筹建中的“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唐群英等的领导下，围绕女子参政问题，同参议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是年3月，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临时约法》时，唐群英等认为：“女子参政为民国所必要”，“须从根本上要求解决”^⑧。她们直接上书孙中山和参议院，提出“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请求在《临时约法》条文上写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⑨。然而，3月11日公布的《临时约法》，却无男女平等的规定。为此，唐群英等再次上书孙中山和参议院，“求其将女子与男子的权利一律平等，明白规定于临时约法之中”^⑩。参议院19日开会讨论时，又以“事件重大，应候国会成立时再行解决”^⑪为辞，予以否决。唐群英愤怒已极，于20日率领多人闯进参议院，并欲径

入议场，遭卫兵拦阻，唐等不服，将议场门窗玻璃击碎，造成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

为“誓以死力”达到修改《临时约法》、实现男女平权的目的，3月22日，唐群英与蔡蕙还代表“女子参政同盟会”晋谒孙中山，请求敦促参议院修正。孙中山答应了她们的要求，并热情加以鼓励，说只要坚持不懈，据理力争，将来定能达到目的。在孙中山的激励下，唐群英等第三次上书参议院，争女子与男子的平等权利。4月8日各女子团体在南京开会，正式宣告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会上通过了唐群英等拟定的十一条政纲，选举张汉英、林复、唐群英、王昌国、沈佩贞、徐素贞、蔡蕙、李芝，分管总务、交际、政事、实业、教育、财政、审查、文事八部事务。会后向全国发表了《女子参政同盟会致各省都督等电》，声明对南京参议院所颁布之《临时约法》，“我女界绝不承认”^②。

临时政府北迁后，唐群英不顾袁世凯的阻挠，于5月与王昌国等“联袂北上”，联络北方女界，继续力争参议院给女子以参政的权利。是年7月，她获悉参议院拟定的国会选举法中，只规定男子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认为“此乃切肤之利害”，必“出死力以争之”，便与北京女子参政团“筹商对付办法”^③。8月10日，以“女子联合会”名义，第四次上书参议院，要求确定《女子选举法》，并颁布实行。由于仍未得到解决，唐群英会同女界，再三商议，又以“女子参政同盟会”名义，向参议院递交了第五次《请愿书》。《请愿书》陈述要求《女子选举法》的理由，严厉斥责参议院拒绝承认女子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不啻“违背约法，蹂躏人

权”，简直是“灭绝人道”，“不以女子为人”，“俨如犯罪行为者”^⑩。但《女子选举法》未经讨论便被参议院否决。12月9日，唐声色俱厉地与议长吴景濂辩论，声言如不赞成女子参政，妇女们便要用武力解决问题。

同时，唐群英还领导“女子参政同盟会”开展反对同盟会抛弃“男女平权”的斗争。在同盟会本部召开改组为国民党的酝酿会议上，她质问主持人宋教仁：“此次同盟会合并，何以不知会女会员，擅由一般男会员作主？且合并之后，何以擅将党纲中男女平权一条删去？”她声明：“此等合并，吾辈女会员绝不承认”^⑪。当天晚上，她还召集同盟会女会员紧急会议，决定致电同盟会各省支部女会员，“迅筹对待办法”。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时，到会的女同盟会员一致抗议，唐群英在盛怒之下，甚至要动手打宋教仁。会后，她又为“女子参政同盟会”起草“驳诘同盟会传单”，在社会上广为散发，并于9月1日召开女界联合会，号召女界“切勿动摇”，要继续努力，“必达以男女平权、女子参政而后已”^⑫。为“扩张势力”，“女子参政同盟会”还于10月22日在北京成立本部，其他各地设分部。由唐群英任总理，王昌国等为协理。

对唐群英等发动的女子参政活动，孙中山是极力支持的，但由于社会上和党内重重压力，孙中山也无能为力。

“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建立时，孙中山致函唐群英等，指出：“至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人可能挽回，君等专以一二理事人为难无益也。”孙中山认为：“今日女界宜专由女子发起女子之团体，提倡教

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也”。他向唐群英等建言：“切勿倚赖男子代为出力，方不为男子所利用也”^⑦。

孙中山的劝告，对唐群英的启示很大。严重的现实，也使她深深感到：女子参政“理想上有莫大之希望，事实上未免有暂时让步”，所以参政的目的，“此时固不能达到”^⑧。她改变了原来的激烈的手段，在北京创办《亚东丛报》和《女子白话旬报》（后改称《女子白话报》），并设立“中央女学校”和“女子工艺厂”等，借以“鼓吹女权”，提高女子知识和参政能力。鉴于多次请愿活动的失败，唐群英还以湖南为基地，谋求“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地方的发展。1913年初，她与张汉英分别从北京和南京回到长沙。在她们的推动下，“女子参政同盟会”湖南支部于2月2日正式成立，会员达八百人，唐群英兼任支部长。湖南支部一建立，就创办《女权日报》为机关报，宣传男女平权和女子参政；并开办了“女子美术学校”和“自强职业学校”，提高女界的学识和实业能力。随后，唐群英还领导了反对《长沙日报》攻击女子参政活动和反对“女国民会”强占“秋（瑾）烈士专祠”的斗争，在湖南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1913年3月，袁世凯为加强独裁统治，派人暗杀了宋教仁。唐群英是个坚强的反袁者，被列入黑名单，并悬赏缉拿。因此，她曾一度离开长沙，先避难于上海、天津，后隐居故里。从此，“女子参政同盟会”再无力发动全国性的活动了。同年6月，匈牙利举行“万国女子参政会”时，“神州女界协济社”电请“女子参政同盟会”物色人选参加。因

旅费难措，未能成行。

“二次革命”时，“女子参政同盟会”的活动基本停止。是年11月13日，袁政府的内务部以“法律无允许明文”勒令“女子参政同盟会”解散。但唐群英与张汉英、傅文郁、杜英杰等仍积极投入反袁斗争。唐群英之胞弟唐乾一是拥袁的，唐群英却与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在湖南女界传为美谈。

1918年初，唐群英因母亲曹氏去世返家。在老家守灵三年。以后在乡下从事平民教育。1924年在长沙创办复陶女子中学，并发动女界投身国民革命。6月9日，湖南女界联合会在复陶女校举行恢复成立大会，到会者百余人，公推唐群英为主席。会上，代表们纷纷演说：“以后如有再轻视女子，蹂躏女权者，当效唐群英先生打宋教仁的法子来打一打，看他们怕不怕”^⑩。

1926年6月，北伐军进入长沙时，唐群英在复陶女子中学积极发动女界迎接北伐军。翌年，她在衡山白果红茶亭创办“岳北女子职业学校”，直至1929年。在这期间，她为女子教育事业奔波，以至家业费尽，负债累累。1935年5月，老同盟会会员张继、覃振、仇鳌等知道这个情况后，电邀她去南京。她先后被聘为国民政府顾问和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1937年唐群英因体弱多病回故里，于同年4月25日病逝。

注,

- ① 唐乾一:《又征文事略》,未刊稿,存唐群英抚子唐遂九手。
- ② 秋瑾之丈夫王廷均系曾国藩的表侄,蔡母葛健豪之堂叔葛承保系曾国藩之女婿。
- ③ 子虞子(唐乾一):《湘事记》1914年6月10日。
- ④ 据曾昭桓:《辛亥革命女战士唐群英》,载《湖南文史资料》第十五辑,陈癸,即陈树人,湘籍同盟会会员,孙中山好友。
- ⑤ 《女子后援会简章》,《时报》1912年12月7日。
- ⑥ 据《衡山治平晋昌唐氏七修族谱》。
- ⑦ 《女子参政同盟会纪事》,《天铎报》1911年3月2、5、6日。
- ⑧ 徐辉洪:《唐群英与“女子参政同盟会”》,《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四期。
- ⑨ 《时报》1912年2月20日。
- ⑩ 《时报》1912年3月23日。
- ⑪ 《东方杂志》第八卷第十一号第四页。
- ⑫ 《民声日报》1912年4月12日。
- ⑬⑭ 《女子参政同盟会参政请愿书》,未刊稿,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 ⑮ 上海《大公报》第3604期。
- ⑯ 《平民日报》1912年9月7日。
- ⑰ 孙文:《复参政同盟会女同志函》,《孙中山全集》(二)第438页,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 ⑱ 《女子参政同盟会代表唐群英宣言书》,《民国新闻》1912年9月4—13日。
- ⑲ 《女界联合会恢复矣》,1924年6月10日湖南《大公报》。

许世英

郑则民

许世英，字俊人、静仁。1873年9月10日（清同治十二年七月十九日）生于安徽秋浦（今东至县）中乡兆吉山许村的一个比较富裕的耕读人家。父许玉堂受过旧式教育，注重封建伦理道德，结交乡绅名流。

许世英六岁入本村私塾，十一岁时往长江北岸望江县童问渠门下寄馆读书，打下了较好的旧学基础。1891年中秀才，其后曾两次参加乡试，均落第。1897年考取拔贡。同年进北京参加礼部选官考试，成绩列为第一等。次年任刑部广西司副主稿、主稿。后转任直隶司主稿。

1900年春，许世英得到同乡四川布政使周馥的邀请，告假离京赴川。当他于6月到达成都后，周馥却劝说他乘义和团发生后局势动荡朝廷用人之时，返回京城，争取个人升官的机会。许世英在归途中得悉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和光绪已出走。10月，许赶到西安，受命办理刑部直隶司和四川司的积案。1902年回京后升任刑部六品主事。

1905年10月，清政府新设巡警部门，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厅丞朱启铃推荐他任该厅行政处佥事。1906年年终考核时，列为京察一等，获得以四品任用的资格，受到慈禧、光绪的召见。

1907年4月，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特调许世英同往东北筹建司法机构，次年任奉天高等审判厅厅丞。在应酬交际中，结识了日本驻奉天领事广田弘毅和副领事有田八郎。

1910年春，许世英和徐谦等受清政府派遣往欧美考察司法和监狱，经过俄、德、法、英、意、比、荷、瑞、奥等九国，随后到美国参加在华盛顿召开的第八届世界监狱改良大会。1911年春回国。11月，正当武昌起义爆发不久，许奉调往山西任提法使。为配合袁世凯逼宫的需要，许世英和山西巡抚张锡銓联名呼吁清朝皇帝退位。

1912年5月许世英得张锡銓的推荐，被袁世凯任命为大理院院长。7月入陆征祥内阁任司法总长。9月继任赵秉钧内阁司法总长。当民国初年出现政党林立局面时，许世英、徐谦、陈锦涛等发起组织“国民共进会”，成为该会的骨干人物。1912年8月，“国民共进会”等三个小政党和同盟会合并组成国民党^①。

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赵秉钧派人刺杀于上海。黄兴等人提出组织专门处理宋案的特别法庭。许世英在袁世凯授意下，以司法总长身份，用“不合编制”为借口，加以阻挠。4月26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民政长应德闳在黄兴等强烈要求下，将有关宋案的证据公布，使袁、赵的杀人罪行难以掩盖。许世英再次出面通电“力争法权”，否认地方长官有宣布宋案证据的权利，受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抨击。他们认为许世英是赵秉钧内阁的成员，应当一起辞职，没有高谈法律资格。黄兴在电文中指出：“惟司法总长侧身国务院中，其总理至为案中要犯，于此抗颜弄法，似可不

必。”^② 7月赵秉钧辞职，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总理，许仍留任司法总长。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派熊希龄组织新内阁，许世英辞去总长职，10月经张锡銮推荐任奉天民政长。这时段祺瑞有意结交许世英，在他出关任职之前，特邀至天津段宅，结拜为“盟兄弟”。他们同为安徽人，这次拜盟，与日后政治上的紧密结合，有相当的关系。

1914年春，袁世凯为了铺平复辟封建帝制的道路，策划增修“中华民国约法”，许被调入京充当约法审查员^③。同年5月3日出任福建省民政长，不久改称巡按使。按照袁世凯的命令，许世英曾于1915年5月下旬至7月上旬乘船巡视福建沿海之马尾、沙埕港、马祖、厦门和金门等处^④。后因与护军使李厚基不合，于次年4月辞职。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院总理，掌握军政实权。6月30日许世英任内务总长，7月改任交通总长，从此他成为皖段的智囊人物。1917年，在“府院之争”中，许世英站在段祺瑞一边。5月3日黎元洪责成查处津浦铁路租车、购车受贿案，翌日京师高等检察厅逮捕了许世英。旋以没有犯罪的证据，许被宣告无罪，随后他辞去了交通总长的职务。1918年许任安福国会参议员及中意合办的华意银行总裁。

1921年9月许世英出任安徽省长，次年11月受命署理汪大燮内阁司法总长，但尚未到任汪阁便已倒台，仍留省长原任。1923年初，许世英因坚持裁撤安武军，同安徽督理马联甲发生冲突，被迫卸去安徽省长职。2月，经黎元洪任命为航空署督办。11月曹锟贿选总统后，许被免职。

直系军阀曹錕、吴佩孚控制北京政权后，同样极不得人心，皖系军阀企图乘机再起。1924年秋段祺瑞派许世英南下广东，联络孙中山反对直系统治。10月初孙中山在韶关接见了许世英，听取关于共讨曹吴的意见。

1924年10月下旬，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直系政权迅速崩溃。孙中山应冯玉祥电邀北上商讨组织政府，段祺瑞和张作霖也虚伪地表示赞同。但在孙中山北上途中，段祺瑞已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段宣称“外崇国信”，表示尊重历届反动政府同帝国主义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到达天津后肝病发作，12月18日在病榻上接见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等，怒斥段祺瑞政府的错误主张。质问他们：“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⑤

12月24日段祺瑞公布《善后会议条例》，随后任命许世英为筹委会秘书长，主持会议准备工作。1925年2月1日，善后会议在北京开场，许世英担任秘书长。参加善后会议的有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各省、特别区的军政首领或其代表，西南各省军阀也派代表参加，此外聘请了一些政客、文人。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早就通电拒绝参加，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善后会议至4月21日结束，花费了一百一十五万大洋^⑥，但并未达到巩固段祺瑞统治的预期目的。

5月1日，段祺瑞公布《国民代表会议筹备处条例》，3日派许世英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

五卅运动以来，全国反帝斗争高涨，唯军阀和帝国主义

之命是从的临时执政府，更被民众所厌恶。段祺瑞为了逃避集矢于一身的困境，于1925年11月下旬曾派黄郛、许世英去张家口与冯玉祥商讨改组临时执政府事宜。12月26日公布修改临时执政府官制，添设国务总理，任命许世英为总理。许世英在组阁时，企图任用一些接近冯玉祥和国民党的人员，以稳住段祺瑞的统治，决定任命王正廷为外交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于右任为内务总长，贾德耀为陆军总长。但是国民党人于右任等因提出条件没有得到满足拒绝就职，段派内部也有人许世英表示不满，迫得他一度避居使馆区不愿就职。此时正逢年关，段政府财政吃紧，1926年1月18日段令许兼署财政总长，21日又令他兼署盐务署督办，设法筹款。许世英尽力搜罗款项，帮助段祺瑞渡过了年关。2月15日许提出辞呈，段准其请假，由贾德耀代理内阁总理。5月13日段祺瑞下台，许陪同段回天津，不久赴上海。

1926年秋，北伐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吴佩孚主力被迅速击溃，孙传芳势力也遭到打击。这时许世英在上海参与组织反对孙传芳的苏浙皖联合会，历数孙传芳的罪状，主张地方自治。翌年初，许世英等人受到孙传芳的通缉，他避往香港，孙传芳失败后方才回沪。

许世英闲住上海时，曾参与救济灾民的工作。1928年10月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命许为赈务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全国社会救济事业长达八年之久。其间1929年河北、山东等省遭受大旱灾，1931年长江、淮河发生大水灾，“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种灾害更是连续不断，灾民无数。许世英曾亲往灾区进行赈济工作，他提出：“救灾如救火，救人须救彻，

查灾要查明，放赈要放洁”^⑦；并慨叹灾区之悲惨情况：“床下鱼儿帐上蛙，阶前艇子室中车。更怜草舍沉沦尽，不见流亡不见家。”^⑧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只顾反共祸国，不管人民的死活，许世英主持的救灾工作只是杯水车薪，治标不敷，治本更无从谈起。

1936年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了“二二六”事变，广田弘毅任首相兼外务大臣，有田八郎任日本驻华大使，他们都是许世英以往的老相识。蒋介石集团为了贯彻对外退让，对内镇压的反动方针，企图借助许的这种关系，与日本搞妥协，当年2月特命许世英为驻日本大使。许世英到达日本后，与广田等会见，彼此除寒暄叙旧之外，实际上并不能发挥外交作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当日本侵略者感到原定三个月结束全部对华军事的狂妄计划无法实现之后，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议和”条件。许世英受命在东京同德国人密谈。直到南京陷落，德国人宣告调停失败，日本政府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实则等于断绝国交”^⑨，在日本召回驻华大使后，许世英始获国民政府外交部准许，在1938年1月20日离开东京回国。

许世英经香港到达武汉，接着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再次主持全国赈灾委员会的工作。1938年12月受派为中央救济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委员长。

抗战胜利后，许回到南京。1947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至1948年卸职，不久赴香港。1950年夏到台湾，任蒋介石“总统府资政”。1964年10月13日许世英在台北病故。

注:

- ① 《中国近代史丛刊·辛亥革命》第8册,第585--588页。
- ② 《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0页。
- ③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19、138页。
- ④ 许世英:《闽海巡记》,1915年9月出版。
- ⑤ 黄昌谷:《孙中山先生北上与逝世后详情》第15页,上海民智书局1926年版。
- ⑥ 许世英:《善后会议经过略述》。
- ⑦ 许世英:《水灾咏事》(1931年)。
- ⑧ 许世英:《咏事》(1935年)。
- ⑨ 许世英:《雪楼记事》,1938年1月。

周 钟 岳

谢本书

周钟岳，字生甫，号愷甫，又号愷庵，白族，云南剑川人。1876年10月17日（清光绪二年九月初一）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他从五岁起开始读书，到十五岁已读完《三字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诗经》、《书经》、《四书集注》、《易经》、《朱子》、《礼记》、《春秋》、《左传》、《周礼精华》、《公羊传》、《谷梁传》、《性理精义》、《史记菁华录》等书，并练习作文。由于自幼阅读大量古书，旧学有相当基础，加上“少年记性颇强，十五岁以前所读各书，约能背诵。”^①所以，“颖悟异常”，“落笔惊人”^②。多次在云南丽江应府试，大理应院试，都名列前茅。

1898年，周钟岳在剑川被延聘教私塾。1900年肄业于大理西云书院，被在省襄办团练的赵藩约为文案。1902年5月，赵藩去湖南长沙开办四川济楚盐局，周钟岳前往司文牍。1903年初，赵藩以四川臬台兼管学务，聘周为学堂教员。同年秋，周回昆明参加癸卯科乡试，中式为第一名举人。

1904年，周钟岳由云南学务处派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师范一年。第二年10月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周钟岳在日本时，曾与范熙壬等合组《新译界》杂志

社，并著有《法占安南始末记》一书，又汇辑师范讲义为《师范丛论》十卷。

1907年底，周钟岳回到云南，担任省学务公所普通课课长兼省城两级师范教务长。此时，正值英、法组织隆兴公司，掠夺云南七府矿产事件发生，清政府竟然与英、法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云南人民十分愤慨，设立“保存云南矿产会”、

“矿务调查会”等，坚决要求废约。云南绅商各界推举李增、周钟岳为赴京代表，向北京外务部请愿废约。1910年秋，又发生了英国侵占云南片马事件，群情更加激愤，组织“保界会”进行斗争。云南咨议局又推周钟岳、李曰垓为赴京代表，请求北京外务部抗议英国侵略片马。1911年7月，周钟岳、李坤、顾视高等人乘赴京出席教育会议之机，约同云南籍的京官，就七府矿产和片马事件要求外务部采取行动。由于全国人民的斗争，七府矿产开采权终于被收了回来；但片马事件的交涉未能取得结果。

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北京震动。周钟岳即于10月15日离京南返，“凑一角色，无徒在台下观也。”^③他已经意识到可能会出现“亡秦恐归三户”^④的局面。周钟岳南下途中，亲见革命气氛甚炽，颇受感染。他在日记中写道：

“至沪后，闻某处某处失守之信，……人人欢迎；忽《时事新闻》有革命军小挫之揭示，观者愤恨，几欲毁其报馆。于此亦可见人心之趋向也。”^⑤11月12日周钟岳到达昆明。此时云南响应辛亥武昌起义，已成立以蔡锷为首的军都督府，周被任命为秘书长，专司文牍。此后一年，云南军都督府的重要文电，大部分为周钟岳起草。这些文电，后来择其要者辑

成一书，名《天南电光集》。“云南光复以后之事，借此可窥一斑矣。”^⑧

1912年8月，周钟岳被任命为云南教育司长。次年2月，兼任云南光复史编纂局总纂。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编成云南光复史十册，另有《云南光复诸人事略》一册^⑨。“虽仓卒成书，而事皆征实”^⑩。1913年4月，周钟岳改任滇中观察使，1914年8月因病辞职。1915年2月，周应蔡锷邀约赴京，担任全国经界局秘书长兼局评议委员会主任。他在经界局任职期间，根据蔡锷的指示，与同事合作，编成《经界法规草案》、《中国经界纪要》、《外国经界纪要》等书^⑪。

1915年8月，“筹安会”出笼，袁世凯蓄谋已久的复辟帝制的阴谋表面化了。11月，蔡锷潜赴天津，乘船东渡日本，经香港、海防去云南，发动反袁护国战争。蔡离天津去日本时，电告周钟岳代拟请假三月赴日就医的呈文。周在蔡上船后，将呈文送给袁世凯。袁派人搜查蔡锷的所有文电，一无所获。周钟岳被监视，乃改名周谥，化装为商人，逃往天津，转赴日本学习英文^⑫。

1916年年底，由于蔡锷的建议，周钟岳回国到四川成都，就任四川督军署秘书长，协助代理四川督军罗佩金。次年，驻川的滇、黔军与川军发生武装冲突，滇军失败退出成都，周钟岳亦随之返回昆明。

这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云南督军兼省长唐继尧亦于8月1日通电“响应”，组织了靖国联军，自任总司令，以周钟岳为总司令部秘书长。唐以“护法”之名，出师四川，亲自率军进驻贵州毕节，周钟岳亦随军至毕节。1918年5

月，广州非常国会决议改组广州军政府，废除元帅制，改为总裁制。孙中山虽是七总裁之一，实权却掌握在滇、桂军阀手中。孙中山大失所望，愤而辞职，通电斥责滇、桂系军阀“置根本大法于不顾”，“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唐继尧收到这个通电后，竟批道：“无耻已极”。周钟岳也鸷鹬学舌地批道：“一片糊说”^⑩。

1919年11月，唐继尧因其祖母和父亲先后去世，请假治丧，以周钟岳代理云南省省长。1920年6月，在“废督裁兵”的声浪中，唐继尧宣布废除督军称号，专任靖国联军总司令，而以周钟岳为云南省长，但大小事务仍得听命于唐继尧。

1920年爆发了川滇战争，驻川的滇军先胜后败。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以“士兵厌战”为由，准备班师回滇，驱逐唐继尧。唐派周钟岳前往毕节，以慰劳滇军为名，观察动静。顾品珍问周钟岳，唐继尧“既促开和会，何必出兵以争四川？既废除督军之名，何必创树联军之帜？”周钟岳尽力为唐解释，说他“非有争川之心，始终不过欲排除护法碍阻而已”。设联军总司令部，不过“以为收束军队之机关。”^⑪同年底，周钟岳回昆明向唐继尧汇报，说顾品珍的言行“殊属可疑”。唐继尧为了稳住顾品珍，即任命顾为云南东防督办。顾品珍仍率师向昆明进发，唐继尧军心动摇，被迫于1921年2月通电辞职，逃往香港。

顾品珍进驻昆明，以滇军总司令名义控制云南，请周钟岳继续担任省长。周表示：即去无以对地方，然仍留无以对联帅（指唐继尧）。只答应维持两个月。1921年4月，周钟岳

辞去省长职，回到老家剑川。

1922年3月，唐继尧率兵重返昆明，再次控制了云南军政大权。他电请周钟岳来昆，委以云南盐运使兼枢密厅厅长、省法制委员会会长职。唐继尧参与南方军阀“联省自治”的合唱，改组省政府，周钟岳为之修订省政府组织大纲，把唐继尧推上了“民治”省长的地位。1925年2月，段祺瑞在北方召开善后会议，唐继尧派周钟岳等为云南代表出席。1926年1月，唐继尧任命周钟岳为省内务司长兼赈务处总办。后内务司改为民政司，周继为民政司长。

1927年2月6日，昆明、蒙自、昭通、大理四镇守使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联合发动政变，举兵进逼昆明，迫唐继尧交出政权。政变后，以胡若愚为省务委员会主席，周钟岳被推为省务委员会常委代理内务厅长。

新的省务委员会成立后不久，周钟岳草拟了新政府大政方针意见书和新政府宣言两件。意见书声明，“就大势所趋，及环境情况观察”，云南决定加入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以“确定本省地位”。6月，胡若愚、张汝骥与龙云所部发生新的武装冲突，周钟岳曾出面吁请双方不得在省城作战，使昆明免遭战火之厄。随后辞职远游江苏、浙江等地。

1930年初，云南拟设通志馆，省政府聘周钟岳为筹备主任，次年，正式任命他为云南通志馆馆长，主编《新纂云南通志》凡二百六十六卷，印成一百四十册。后又编纂《续云南通志长编》，自中华民国元年至二十年（1912年至1931年）为限。该书1941年完成初稿，1943年进行了审订，但一直未能付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8年，蒋介石南京政府迁至重庆。云南省主席龙云特派周钟岳为省府代表飞重庆表示慰问。他说：“既定抗战政策，无论战事进展如何，绝不宜中途变更。”表示滇省除已派出第六十军参加抗战以外，还可再派出两军^⑩。

1939年4月，蒋介石电邀周钟岳至重庆中训团讲学。周钟岳到重庆后，蒋介石多次宴请，要他返昆后转告龙云，公开表明与已经叛国的汪精卫断绝关系。为了利用周钟岳的无党派人士身份装点门面，笼络和分化地方实力派，蒋又任命周钟岳为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兼行政院所属县政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1944年11月，改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副院长。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蒋介石与龙云地方势力之间矛盾十分尖锐。蒋利用周钟岳与云南地方实力派的特殊关系，让周钟岳带着他给龙云的亲笔信，进行疏通，要龙云就任中国陆军总部副总司令的职务。同时，又暗中部署解决龙云和控制云南的活动。1945年10月3日凌晨2时，在昆明的杜聿明率领国民党中央军，向龙云的部队发起突然进攻，占领了除五华山制高点以外的昆明全城，宣布免去龙云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龙云在五华山上据险抵抗。行政院长宋子文出面，请周钟岳写信劝龙云服从。龙云被迫屈服，去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职，但实际上被蒋软禁。蒋介石用武力解决云南，使周钟岳大为感慨，逐渐丧失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信心。

1947年7月，周钟岳以年老多病为由，辞去考试院副院长职，回到昆明。蒋介石政府则给周钟岳以总统府资政的空

衔，以示笼络。周钟岳回到昆明后，埋头于整理文史资料，著书立说。1949年秋冬之交，云南省主席卢汉在准备起义的过程中，两度登门拜访周钟岳，征询他对云南起义的意见。周钟岳表示支持，并为他出谋献策^④。

1949年底云南和平起义。1953年周钟岳被聘为云南省文史馆馆员，1954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5年5月19日，周钟岳在昆明病逝。遗嘱将所藏图书字画，分赠云南大学、云南省图书馆、剑川县图书馆^⑤。

注：

- ① 参见《惺庵回顾录》第一卷，手抄本，现存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惺庵回顾录》共四卷，除第一卷外，尚有续录、三编、四编，所记自1876年起至1947年止，前后共七十二年，为周钟岳亲身经历的回忆录。其中，大部分已整理登刊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但早年部分回顾录未刊。
- ② 《惺庵诗稿》十卷，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印，陈荣昌序。
- ③⑧⑩⑫ 《惺庵回顾续录》。
- ④ 《闻武昌兵起出都南旋》，《惺庵诗稿》卷四，第5页。
- ⑤ 《惺庵日记》（1911年10月22日）手稿，现藏云南省图书馆。
- ⑥ 参见《惺庵回顾续录》、《天南电光集》手稿，现存云南省图书馆，经整理后刊于《辛亥革命资料类编》（近代史资料专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 ⑦ 《呈明编纂光复史情形请函复省议会文》，《惺庵文牍（一）》手稿，现存云南省图书馆。
- ⑧ 皆已收入《蔡松坡先生遗集》之中。
- ⑨ 唐继尧、周钟岳在孙中山电文上的批语，原件存云南省档案馆。
- ⑩ 《惺庵回顾录四编》。
- ⑪ 未刊调查访问记录。
- ⑫ 《惺庵遗嘱》辛卯（1951年）4月，见《惺庵回顾录四编》之附录。

任 可 澄

李双璧

任可澄，原名文铎，字志清，号匏叟。贵州安顺人。1879年1月14日（光绪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生于一个有五百年谱牒可稽的封建官僚家庭里。

任可澄幼时受传统的封建教育，“未冠入泮，蜚声庠序”^①，1902年中举，次年，考取内阁中书，在北京做了一年多的闲官，后以升迁无望，报丁忧回籍。

时值清廷倡言改革，任可澄约同贵阳巨绅唐尔镛、徐天叙兴办了“贵州官立师范传习所”，为贵州的新式教育培养了第一批师资。1905年以后，他又与唐尔镛、华之鸿等人创办了“通省公立中学堂”、“优级师范选科”和“宪群法政学堂”等新式学校。在“通省公立中学堂”里，任可澄担任堂长并主讲国文、史地、读经等课程。任可澄热心桑梓的教育事业，为他在社会上赢得了较高声誉，1907年他当上了旨在发展黔省教育的“贵州黔学总会”会长。

在政治立场上，任可澄坚定地站在以康、梁为首的改良派一边。他通过在日本留学的陈国祥、蹇念益等贵州同乡，和梁启超组织的“政闻社”建立了联系，并联络了一批与他们有共同政治主张的士绅，于1909年10月成立了“贵州宪政预备会”，任可澄是这个组织的会长。他们先后发行了《黔

报》、《贵州公报》，控制舆论，鼓吹立宪。

任可澄和他所领导的“宪政预备会”在省咨议局选举、教育总会会长的任命等问题上与革命派组织“自治学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为了阻挠革命的发动，曾使用攻讦、告密的手段诬陷革命派，并向清政府密递自治学社主要负责人的名单，以便官府按名捕拿，只是由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才使这一阴谋未能得逞。

云南“重九”起义的消息传来后，任可澄见贵州革命派也在积极准备发动革命，遂惊呼：“小人得志，我辈无噍类矣！”^② 他向巡抚沈瑜庆献计，电召兴义土豪、西路巡防营管带刘显世“募土著五百人，星夜来省，以资捍卫”^③，沈采纳了他的计策。自治学社为了实现“不流血的革命”，主动向“宪政预备会”提出“携手合作”的建议。两派领导人遂于1911年11月2日集议，敦劝巡抚沈瑜庆反正。可是，任可澄却向沈瑜庆另提出“既不保清，亦不革命，集中力量，以图自保”的主张，要求沈瑜庆效法江苏程德全，做“半独立”的表示，任的这一活动，遭到革命党人坚决反对。

农历九月十三日（11月3日）晚，自治学社联合陆小学生和新军发动起义，次日贵州光复。革命党人推新军教练官杨蔭诚为都督，新军排长赵德全为副都督，“自治学社”领导人张百麟为枢密院长，任可澄也被邀担任枢密院副院长。由于革命党人的妥协态度，给以任为首的“宪政派”造成了攘夺革命成果的机会。任可澄极力举荐被沈瑜庆电召入省镇压革命的刘显世参加新政府，担任军事股长一职。任可澄和刘显世还假借枢密院的名义，致电云南都督蔡锷，请蔡指派在滇

的贵州立宪党人刘显治、熊范舆为代表，参加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另外，在政府各部门，任亦处处安插党徒，以致实权尽入其手。不仅如此，任可澄还扶持退职官僚和守旧乡绅郭重光等人组织了“耆老会”，以吃喝聚谈掩人耳目，从事破坏新政权的活动。任可澄、郭重光等人密议，由宪政派重要成员何麟书出面组织“尚武社”等所谓“五大社团”，倡开公口（即会党），扰乱秩序。他们反过来又将“公口林立”、“全黔糜烂无完土”的罪名加在革命派的头上，以此作为请滇军入黔平乱的借口。对任可澄在光复后的种种行为，革命派中一部分人曾向枢密院长张百麟提出“不去可澄必有后患”的警告^④，但张百麟等革命派领导人未采取防范措施。

在任可澄、刘显世、戴戡等立宪党人的请求下，云南派兵“援黔”。1912年3月1日，唐继尧率滇军到达贵阳，3日，贵州军政府即被颠覆。在唐继尧为都督的“军政府”里，任可澄担任了参赞兼秘书长的要职，“同时，任可澄对自治派大肆报复，不特贵阳，就是各县曾与自治派有关的人士，宪政派的分子也假任可澄的势力要求地方官搜捕，而地方官不敢不办”^⑤。任可澄的所为，获得袁世凯的好感。1913年被任命为黔东观察使，次年春被举为袁记约法会议的议员，6月任镇远道尹，8月升任云南巡按使。

1915年8月，“筹安会”策动拥袁复辟帝制。12月，袁政府的法制局要求各地明确表态，时任云南巡按使的任可澄当即召集省中绅商著名人物开会，谋划拥戴事宜。因赴会者寥寥，使任大为气沮，只好草草收场。事后，任可澄又亲拟奏稿，准备会同唐继尧等奏报劝进情形，但滇中反对帝制的声

浪已经很高，任可澄不得已乃以其个人名义电呈袁世凯，用涕泣而谏的语气请袁不必称帝。蔡锷到滇后，云南正式宣布讨袁，迫于形势，任可澄只好加入了护国讨袁的行列^⑥。在1915年12月25日的“独立”通电中，任忝列其名，但由于任可澄在云南起义前有劝进的举动，护国军中有些将领对他是不信任的。尽管如此，任可澄在护国战争中“躬治军书，所为文檄，遐迩传诵”^⑦，为护国运动还是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护国运动结束后，黎元洪的北京政府于1916年7月任命任可澄为云南省长。任可澄发出通告准备就职，不料云南将领联名指斥他在帝制初期有劝进行为，不能服众，他只好以脑病复发为由，离开云南，回到贵州主持贵州通志局，编修《贵州通志》。

作为一个有声望的退职官僚，任可澄受到了贵州各派政治势力的重视。贵州兴义系军阀“新派”首领、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和乃兄、时任国会议员的王伯群，于1919年初创议，成立了贵州政治会议，以商讨贵州政治改革问题为名义，从事夺取刘显世等“旧派”的统治权的准备活动。他们推举任可澄担任这个组织的会长。由于刘显世表示宁死也不肯交出军政两权，政治会议很快就流产了。当时，兴义系内部新、旧两派的斗争已呈白热化状态，任可澄为避祸，迁居于安顺老家。1920年11月初，“新派”重要骨干何应钦、谷正伦等人发动了“民九事变”，刘显世被逼下台。时任督军署参谋长兼警察厅长的何应钦派人到安顺找来了任可澄，并策动省议会推举任为临时省长，任深知兴义系两派斗争的内情，不愿再卷

入政潮中去，遂于事变数日后潜离贵阳，回到安顺。1922年夏，兴义系“旧派”军事头目袁祖铭在武汉组织“定黔军”，迅速平定了“民九事变”后出现的何、谷“五旅之乱”，分化了谷部团长彭汉章、王天培，驱走了何应钦、谷正伦，恢复了兴义系“旧派”的军阀统治。袁祖铭为借重任可澄的声望，致函任可澄，请他出任省长一职，期许他“综理自治事宜，部署全局，改进一切”^⑧，任亦婉辞未就。

其后，任可澄一直致力于《贵州通志》的撰修，而在政治上，则更趋于保守。1925年2月，他以云南代表的身分列席了段祺瑞执政府召集的善后会议。当北伐军兴、袁祖铭已就职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前敌总指挥之际，他还在袁面前“力陈拥吴（吴佩孚）之利”他“强聒不舍，凡革命军之优点，概从掩蔽，且诬为赤化，盛张吴佩孚之形势”^⑨。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任仍没有从北洋派的立场上转变过来，1926年6月，他还在张作霖控制的北京政府杜锡珪内阁里当了半年教育总长。

此后，任可澄僦居北京，“日惟摩挲故纸自娱，仅赖及门生资济，常时不给”^⑩。在他的后半生中，曾于1935年8月担任过全国禁烟委员会委员，于1937年担任过云贵监察使等闲职，其余大部分时间，均用于《贵州通志》的主编和其他著述。

1946年夏历十月下旬，任可澄因脑溢血死于昆明^⑪。他除了主持编修《贵州通志》，并撰写其中的《前事志》外，还有《牂牁江考正》、《读史胜录》、《且同亭笔记》、《续夏曾佑〈中国历史〉宋元明清编》、《黔语》、《藏山堂诗文词稿》等著

作。

注：

- ①③⑦⑩⑪ 白之瀚：《代任泰撰任公志清事略》，《贵州文献汇刊》第五期，第113页。
- ② 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第62页。
- ④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第219页。
- ⑤ 张彭年：《辛亥以来四十年间贵州政局的演变》，《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75页。
- ⑥ 李子辉：《任可澄为袁世凯所作的帝制活动》，《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80页。
- ⑧ 《贵州政报》民国十一年（1922年）七月下旬，第6号。
- ⑨ 周素园：《贵州陆军史述要》，《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29页。

赵 伸

李希泌

赵伸，字直斋，1876年5月26日（清光绪二年五月初四）出生，云南嵩明杨林驿（今杨林）人。赵幼聪颖，年二十，补博士弟子员。1903年，云南成立高等学堂，师资大多是云南著名的学者，如陈荣昌等，学生都是经过考试择优录取的。赵伸考入该校肄业。时革命书刊《恤书》和《革命军》等已从日本传入云南。赵与同学李根源、罗佩金和李曰垓等托人购阅革命书刊，课余他们常聚在一起讨论革命问题。次年，赵被云南当局选送日本留学，入成城学校学习。赵在日本，和孙中山、黄兴、章炳麟、陈天华等均有来往。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赵入会。

1906年1月，孙中山与黄兴要求云南革命党人赵伸与杨振鸿等筹办云南地方刊物，宣传革命。孙、黄对赵伸等说：

“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的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铎与兴禄的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的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安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的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侵袭之下，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①同年4月，《云南杂志》社成立，李根源与赵伸因系云南留学生同乡会正副会长的缘故，被分别推举为该社正副庶务干事（相当于正副经

理)。10月，该刊创刊号出版，著文揭露清政府的贪污腐败与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野心，深受留日学生和云南全省人民的热烈欢迎。至1908年，该刊出版第十三期时，发行份数由创刊的三千册增至一万册。

1906年11月，云南留日学生有二十余人毕业于振武学校，编入日本联队。赵仲特为他们在《云南杂志》社举行了一次祝贺会。赵在《云南杂志》第四号上刊布了《云南入队诸君姓名住所录》并在这篇资料前写了如下一段话：“立于廿世纪竞争最烈的地球上，非纯用铁血主义，决不足以保其生存，此有识者所公认也。本年中十一月，吾滇卒業振武学校入日本联队者二十余人，将来学成归国，组织一完全军队，则吾滇或可不致为安南、缅甸。”赵又搜集世界上沦亡国家的悲惨情状，录为一卷，题名为《腥风血雨录》，连载于《云南杂志》第四、五、六号，借以激发垂亡之中国国民“大为醒悟，而早自为计，则东亚病夫三百年来之大病庶有疗乎”。

1908年春节元日，《云南杂志》社举行《云南杂志》创刊周年纪念庆祝会，到会者万余人，极一时之盛。赵仲在会上演说，将该刊取得的成绩归功于云南绅商侨学各界的共同心与团结心。与会者都认为该刊的迅速发展与得到中外的好评，是与赵仲的精勤努力分不开的。

1908年4月，革命党人在河口起义。赵仲与李根源、吕志伊倡议云南独立会以资响应。他们在东京锦辉馆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万人。赵主持大会，激昂陈辞，宣告云南独立于天下，不再受清廷的统治。章炳麟亦到会，发表演说，表示支持。清朝驻日使馆闻讯，取消赵的留学生官费，赵毫不

在意。赵在这年暑期中与黄兴等开办大森体育讲习会，暗中以军事教授革命党人。就学该会者有林时壘、刘揆一、焦达峰、孙武、夏之时、方声洞、林隐民等七八十人。

1909年，赵伸担任同盟会中暗杀部副部长，他和陶成章跟李英奇学制榴弹。赵并练习投掷，力求命中。日本警厅侦悉其事，到《云南杂志》社搜捕赵伸，未获。赵变姓名逃亡台湾。广西右江镇总兵龙觐光是赵的拜把兄弟。赵遂从台湾转往广西，在龙部下任管带。1911年重九日，云南起义，成立大汉军政府，都督蔡锷与军政部长李根源迭电催促赵伸回滇。赵回到昆明后，先后负责筹建同盟会云南支部以及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等事务，均由李根源任支部长，赵任副职。民国初建，百废待举，凡政府政令兴革，赵无不参与。

1912年，云南省议会成立，赵伸当选为议长。1913年，袁世凯在镇压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后，下令解散各省议会。云南省议会解散后，赵伸返回家乡杨林。他看到当地的阳宗海经常泛滥为灾，遂与地方父老筹商根治阳宗海的水患。他详细勘测了阳宗海的地形与蓄水量等，制订方案，发动民力，从事开浚。历时三年，工程告竣，为杨林乡民开垦良田八千余亩。

1915年12月，云南宣布护国讨袁，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赵伸出任云南兵工厂会办。赵闻知岑春煊从槟榔屿回国讨袁，已抵达日本，他赶往日本迎接。过香港时，和李根源等磋商护国大计。岑春煊回国后，担任广东军务院的代理抚军长。赵仍返回昆明，全力办理云南兵工厂。他赶制械弹，以供前方急需，并改进榴弹的制作，提高它的杀伤能力。在

决定护国战争胜负的纳溪战役中，云南兵工厂制作的榴弹对北洋军起了强大的威慑作用。

1922年赵仲被补选为参议院议员。次年6月，直系军阀头子曹锟决心把黎元洪赶下总统宝座，取而代之。他指使党羽借索饷之名，包围黎的总统官邸，并断绝自来水、电灯、电话以威胁。黎被逼迫出走天津，继往上海。赵仲拥护黎，奔走南北，力主黎应返回北京恢复总统职权，斥责直系军阀的专横恣睢。10月，曹锟贿选当上了总统。赵仲为当时拒绝贿选的参众两院一百七十二名议员之一。^②嗣后赵返回家乡云南嵩明，仍致力于地方水利事业，使泛滥为患的阳宗海，“昔日横潦浩渺茫，今日四野稔与稷”。^③1930年7月27日，赵仲因病逝世，年五十五岁。

注：

① 李根源：《〈云南杂志选辑〉序》，载《云南杂志选辑》。

② 李根源：《雪生年录》“十二年癸亥四十五岁”。

③ 李根源：《曲石文录》卷三《故云南省议会议长嵩明赵君直斋墓碑铭》。

王 永 江

武育文

王永江，字岷源，号铁龛。生于1872年2月17日（清同治十一年正月初九）^①，奉天金州（今辽宁金县）人，祖籍山东登州府蓬莱县，他的祖父王作霖逃荒过海，定居金州，以农为业，父王克谦，少时曾在金州双兴货栈当学徒，后升任帐房。

王永江童年，拜宿儒李某为师。清末政治腐败，李怀才不遇，“愤中国国势陵夷不振，外交着着失败也。每读剑南集中从军感事诸作，常慷慨悲歌，倾酒狂醉”^②。王永江受其师影响，也“钦慕放翁之为为人，而酷喜其诗集”^③。

王永江二十一岁时为廪生^④。其时，为了谋生，他在旅顺口开设“采真堂”中药店。1904年日俄开战，俄国战败，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去旅大地区，日本商人竞相到旅大地区投资经商。王永江的中药店，受到日商西药店排挤，营业萧条，不久倒闭，他回到金州。时逢日本人创办“南金书院”，延请他为汉文教员。任教期间，他洞悉日本人在华实行奴化教育的卑劣用心，不满而辞职。此后，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在租界地实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政策颇为留意考察，尤其注意村屯制度和警察制度的实施情形。

1907年，辽阳地方团总袁金铠写信叫王永江调查日本租

界地实行警察行政的情况，王将调查所得复信详述，袁深为满意，便邀他去辽阳办警务学堂，这是王永江踏上仕途之始。他参照日本警察制度，结合当地社会情况，编写教材、章程等若干种，培训了一批警察人员。由于他办警务成效显著，受到东三省总督的奖叙，被誉为奉省办警政的第一人。

1910年，王永江任辽阳警务所长。这时东三省鼠疫蔓延，王因明了医学，防疫有功，经辽阳知州史纪常保荐为候补知县，1911年改任南路巡防营管带。辛亥武昌起义爆发，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调他晋省，入督府民政司民政科，参与镇压铁岭县革命党人起义^⑤。

1912年，他署理东边兴凤道尹，“甫三月，即挂冠归里”^⑥，经袁金铠相劝，才又出任辽阳、康平、牛庄、海城以及省城等地税捐局长等职。1915年，他任奉天省税务局长，兼官地清丈局长及屯垦局长，以“干练”而知名。

1916年张作霖当上奉天督军之后，深知欲成霸业，必须“延揽人才”，王永江经奉天军政两署秘书长袁金铠的推荐，被任命为奉天督军署高等顾问。同年11月被任命为全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后又任奉天财政厅长、代理奉天省长等显职，成为张作霖手下“文治派”的首领。王在张作霖的支持下，在奉省实行了若干措施，如整顿全省警政、招民垦荒、发展实业、整理税收等，为奉张的“霸业”竭尽心力。那时，张作霖感到原来绿林出身的军人难于约束，是统一奉天军政的障碍，决心整顿军纪。王永江任警务处长之后，立即改革警政，仿效日本警察制度，重新厘定警务规章，在省城各处设立派出所。他严督部下按章办事，凡军民人等，如

有违犯警章者，概依法惩处。其时，二十七师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部下纪律最坏，在省城胡作非为，常用军权侵害警权，不时发生军警摩擦。有一次汤的部下在省城西关平康里妓院闹事，不服从警察干涉，并殴打警察，王永江下令将闹事人员拘押起来。汤玉麟闻讯大怒，径向警务处要人，扬言要率兵包围警务处。王永江也不示弱，在警务处院内，架起一门小炮借以防卫。汤玉麟无奈，怒气冲冲地去找张作霖告状，要求撤销王永江警务处长职务。王永江也自动提出辞呈，等待张作霖裁决。张作霖支持王永江惩处闹事官兵，并对汤玉麟等人严加申斥。汤玉麟颇觉难堪，后竟与张作霖闹翻，于1917年3月被免去旅长职务。

张作霖统治奉天之初，金融紊乱，财政入不敷出，年亏空二三百万元，并负外债一千余万元，财政极为窘困。张作霖为了巩固统治，扭转财政困难局面，1917年任命王永江为奉天财政厅长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王永江就任后，对奉天省财政紊乱状况作了调查，研究积弊的原由，力图刷新。

王永江有多年当税捐局长的经验，深谙聚敛之道，他首先整顿官营企事业。按照兴利除弊的原则，对官营企事业分别采取或予维持，或停办，或改由民营以进行整顿。对省内的荒地实行开放，奖励开垦殖民。对省内各矿山的采掘，则实行官营。

其次是整顿税收，制定田赋征收成绩考查条例。条例按税捐局所征税区的耕地面积、商户多少和农工产品生产情况，定出切实应征税额，超过定额增收的税款，对有关人员除记功外并留出提成部分作为奖金，对达不到征收定额者，

查明原因，确实由于自然灾害等情况，准予酌情减免，如属贪污中饱或不尽职责者，则按章惩罚^⑦。他还于1918年提请省议会通过，发行省公债五百万元，年息六厘，从奉天省税捐收入溢出项下，每年拨出一百万元作为还本付息的担保。此项公债实际发行额为三百二十五万九千二百九十七元，并在1920年10月已将本息全部偿还^⑧。

经过一番整顿，到1920年3月，奉天省的财政状况已经好转，不仅偿还一千余万元地方外债和弥补了每年二三百万元的财政亏空，还有一千余万元的结余。对此，张作霖大喜过望，说：“这实在是我梦想不到的。”^⑨

张作霖看到王永江理财有方，决定将奉天省长职务交给王担任。王永江执意不肯，经张作霖再三促请，才应允任代理省长兼财政厅长（省长仍由张作霖兼任）。

王永江代省长后，首先是整顿吏治，对官吏实行甄别考核制度。贪赃枉法的，轻者撤职，重者依法惩处；奉公守法著有政绩的，予以奖励、提拔重用。他还注意培训县知事，开办讲座，亲自讲授“县知事学”，内容有：保护商业，奖励工艺的发明创造，振兴实业，宣传教化，沟渠整理，严禁苛敛诛求，边境开垦与殖民，褒扬荣典，保存古迹和提倡优良的风俗道德，义仓，学塾，监查，清查盗源，禁止吸毒，讲求卫生，提倡特产等等^⑩。

王永江很注重文化教育事业，认为“教育为人才之本”^⑪，大力普及小学，发展中学，并创办东北大学，造就专门人才。他还创办实业、发展交通，如建立奉天纺纱厂，开采铁矿、煤矿，修筑奉海铁路等^⑫。此外，他倡导讲究卫生，

把讲卫生做为地方官保护公众福利的一项职责^⑩。

在王永江代省长期间，出现了短暂的所谓“仓廩足，治安宁”的景象。这时张作霖看到东三省的实权尽在自己掌握之中，奉省财富厚集，政治野心益炽。为了向关内伸张势力，不惜把人民的血汗用于扩军备战。1920年7月，张作霖趁直皖战争之机，率军入关，助直倒皖，把势力伸展到察哈尔与热河，并与直系共同把持北京政权。王永江曾向张力谏说：“我们何必去参加内战呢？！我们修明内政，把东北治理好，富强起来，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不用去打，他们自然就来投我们，地盘可以不扩自张，何必急在一时呢？”^⑪然而，张作霖热衷于问鼎中原，迷信强权政治，对谏言无动于衷。从此，王永江与张作霖政见开始发生分歧。

1921年底奉系支持梁士诒组阁，直系军阀反对，直奉矛盾激化。1922年4月9日起奉军人关，4月28日直奉战争正式爆发，但不到一周，奉军战线便迅速瓦解。奉军战败后，缩回东北，张作霖在王永江等人的策划下，由东三省议会宣布东北“自治”，与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断绝关系。张作霖觉得没听王永江的话吃了亏，他安抚王永江说，这回你当省长，放手干。同年6月，王永江被任命为奉天省长。

张作霖经此次失败，以所谓“存励精图治之心，蓄卧薪尝胆之志”，整军经武，准备对直再战。王永江任奉天省长期间，企图趁势进行某些改革。他认为欲使东北富强，必须注重文化建设，不参加内战。曾写信给杨宇霆说：“现在潮流所趋，日重文化，此后以中国人与中国人斗，胜者不足荣，败者不足辱，……反足以遗害于国家而已。弟本明达，又系武

官，当极力主张缩减军备，共图文化，他日使奉省为庄严灿烂之奉省，不当使奉省为焦头烂额之奉省，即大有造福于桑梓也。”^⑤王永江建议兴办大学教育，培养专门人材。经张作霖同意，1923年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王永江兼任校长。

王永江主张东三省闭关自守，增强实力、充实财富、储备人才、改革军备，说这是不战而胜的万全之策。这时，张作霖则全力整顿奉军，设立陆军整理处，改革军事教育机构，重用军校出身的军事人才，扩充兵工厂，建立海军和空军，兴建葫芦岛军港和东塔飞机场等，为此每年耗费二三千万元。王永江认为，军事之繁费有增无已，将来后患无穷，劝张作霖“幡然改计，以兵足自卫为度，而将兵工厂缩小一半作生产事业，汰粮秣处之冗费，去骈枝之机关，裁冗滥之闲员，省财力以救金融，均度支以兴庶政”^⑥。但张作霖不愿听这些意见，总想进兵关内，打败直系以雪战败之耻。

1924年10月，当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之时，王永江还是力劝张作霖武力不可恃，战事结束后速回东北，他说：“战事结束后，我们什么也不要，因为北京如同一根无肉的骨头，谁夺到手也无肉可食，不如东北地大物博，有发展前途。我们有这样的好基础，决不应放置不顾，而去夺那无肉可食的骨头。”^⑦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获胜。张作霖背弃原先与冯玉祥约定的“奉军不入关”的诺言，于1925年初挥师入关，迅速占据了直、鲁、苏、皖等省，到6月将势力伸展到东南财富中心上海。张作霖的穷兵黩武行径，使关内人民深受涂炭，庞大的军费开支也使东北民不聊生。奉军各将领则

争相扩编军队、抢夺地盘。奉军将领郭松龄因不满张作霖的穷兵黩武，于1925年11月22日在滦州起兵反奉。张作霖为挽救自己的统治，不惜勾结日本出兵，才把反奉郭军击败。此时，奉天的危局虽然暂时渡过，但王永江所面临的内外交困局面却有增无已：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履行援奉反郭所许条件；而内部则是民生凋敝、财政困难和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王永江为此急得“左目失明，心脏漏血”^⑧，“征敛能手”也束手无策。1926年2月19日，王永江请假回金州故里省亲，到家后以才弱事纷，留职无益，给张作霖写了辞呈，请开去本兼各职。他在辞呈中写道：“窃永江从将军治奉，将十年于兹矣。初意本期举实业、教育、吏治、交通、屯垦诸大端，逐渐发展，兼经营东蒙，以为利用厚生根本之图。……自民国六年，畀永江以财政重任，勉竭愚忱，不避劳怨，得以财政日裕，内外债渐次偿清，度支由是以不乏，……乃又值时局不靖，战端屡开，知进而不知退，而卒因军事之牵动，致金融紊乱，且犹复牵动不已，则一切期望，将难达到，民生日蹙，复何以固根本而图发荣。……夫时局如此，简练军实，自属必要，然备兵自卫，与逞兵争雄，则利害相反。……况中原兵交方始，民生凋敝之秋，独东北一隅，最得地利，本足以自强，无待外求，而不速图之。轻内而重外，忽近而图远，将自投入荆棘之中，而纳人民于水火之内也。”^⑨王永江的信也表明张作霖穷兵黩武政策的破产。从此王永江退出政界，张作霖虽多次挽劝，王始终未归。晚年王从事著述，其诗作有《铁龕诗草》二集。王永江对易经、管子亦有研究，著有《读易偶得》、《易原窥余》、《阴符经

注》等。王在医学方面也有所造诣，著有《医学辑要》、《痼疾蒙谈》等书。

王永江于1927年11月1日^②，病逝于金州。

注：

① 《王公墓志铭》，〔日〕田岛富穗著《王永江》附录，满洲公论社出版，第231页。

②③ 《非好爵所能廉之王岷源近况》，《满洲报》1926年7月14日。

④ 王永江本人曾在《辛亥元旦吟》中有：“昔年十五二十时，学书学剑未见奇，世上功名不解取，文场驰逐等游嬉；苟幸食饩二十一，公车三上翅三垂，归来无复寻章句，不慕良相慕良医。”又王永江的儿子王贤伟，在《王永江的一生概略》的回忆文稿中，虽有其父王永江“考取乙酉科优贡”之说，按乙酉科应为1885年，其时王永江仅虚岁14岁，恐有误。今从王永江在诗中所说：二十一岁食饩为廪生。

⑤ 《铁瓮诗草》二集，第12页。

⑥ 同⑤，第11页。

⑦⑧⑨⑩ 均见王贤伟：《王永江的一生概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存稿。

⑪⑫ 〔日〕田岛富穗《王永江》，满洲公论社出版，第34—35页。

⑬⑭ 同⑧，第95—105页。

⑮⑯ 同⑧，第234页。

⑰ 王永江致杨宇霆的信，辽宁省档案馆藏。

⑱ 同⑧，第53—54页。

⑲ 王永江致张作霖辞职书，〔日〕田岛富穗著《王永江》，满洲公论社出版，第53—54页。

⑳ 同①，第231页。

赵 凤 昌

陈时伟

赵凤昌，字竹君，号惜阴，江苏武进人，生于1856年（清咸丰六年）。少时家贫失学，入钱庄习贾，因私自挪用钱庄款项被辞退。富户朱某鉴其聪明伶俐，为之捐官县丞，分省广东候补。到广州后，赵凤昌先在广东藩司姚觐元幕下任记室，得以饱览群书，精研幕道。1884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赵夤缘得充督署文巡捕。由于他勤奋好学，处事练达，很快便获得张之洞的赏识，被委为督署文案，参与机要，起草文电奏稿，“摹仿之洞书法几能乱真。”^①

1889年，张之洞移督两湖，赵凤昌以亲信幕僚随同前往。抵鄂后，升任总文案，掌管督署机要。赵凤昌遂借此“与在省寅僚广为结纳，共门如市。”^②1893年，朝中爆发了轰动一时的“张之洞大参案”，名翰林周锡恩因被赵凤昌揭破其抄袭文章为张之洞祝寿一事而恼羞成怒，在京运动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张之洞“辜恩负职”，附带攻击赵凤昌替人钻营差缺，“声名甚秽”。^③结果，清廷在处理此案时为了既不得罪张之洞又能敷衍京官的脸面，遂将赵凤昌革职勒令回籍，^④赵凤昌成了张之洞的“替罪羊”。

遭此变故，赵凤昌对仕途功名心灰意冷，他决心从此不再涉足官场，但是他的政治热情并未减退。1894年，赵凤昌

回到上海定居，张之洞因对赵所受处分过意不去，仍给他安排一份差使，名义上在武昌电报局挂名支薪，实际上常驻上海为湖广督署办理通讯、运输诸务。赵凤昌遂借此与当地官绅、外国领事建立联系，继续为张之洞提供情报，出谋划策。

赵凤昌回沪定居时，正值甲午战争爆发。他与张謇、屠寄、经元善、何嗣焜等一批与张之洞有雅素的帝党名流过从甚密，常在一起诗酒酬酢，议论朝政，言战之声甚高。维新运动期间，因经元善的介绍，赵凤昌结识了南下办报的康有为、梁启超，“时与讨论。”^⑤

1900年，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赵凤昌对此十分敏感，他从电报局连续向张之洞发出“不费一钱的一等密电。”^⑥这些密电大都系报告外国人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和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年6月，英帝国主义为了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派军舰进入汉口、南京、吴淞，一时江海各口岸人心惶惶。这时，赵凤昌向他的武进同乡、正在上海的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提出了一条“保护东南”之策，其内容为：“各国兵舰勿入长江内地，在各省各埠之侨商教士，由各省督抚联合立约，负责保护。上海租界保护，外人任之；华界保护，华官任之。总以租界内无一华兵，租界外无一外兵，力杜冲突。”^⑦这一策略的目的在于稳定上海秩序，预防义和团运动在南方蔓延，也为防止外人借机出兵上海。6月下旬，盛宣怀召集赵凤昌、何嗣焜、张謇等人，在“盛宝源祥宅中”设立临时办事处，决心置清廷的宣战上谕于不顾，由赵凤昌联络张之洞，张謇游说刘坤一，盛宣怀亲自致电李鸿章，陈述“保

护东南”之策。他们的建议很快得到了东南三大帅的赞同。

6月26日，东南各省督抚的代表与各国驻沪领事在上海订定了《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这两个约款的基本内容与赵凤昌所提出的“保护东南”方案毫无二致。这就是著名的“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订立后，赵凤昌等人并没有停止其活动，随着北方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他又和张謇一系的帝党策划了一个拉拢刘坤一、张之洞两位总督，联合起来以东南互保为名，而以推倒那拉氏政权为最大目标的计划。具体的方法是用“迎銮”的名义，“将那拉氏与光绪迎到汉口或南京，作为行都，然后再强迫那拉氏交出政权。”^⑧8月初，赵凤昌接到神机营文案庆宽从京中寄来的密信，告以“宫中传见义和团之红灯照，试演其术，且获赏；我已送老母往西山避祸，南中当知大局去矣！”^⑨赵遂加紧游说张之洞。同时，张謇也一再致函刘坤一，陈述“迎銮”之策。^⑩但是，由于张、刘二督与西太后之间并无根本矛盾，加之西太后很快向列强投降，使他们之间的矛盾缓解，赵凤昌等人的计划遂成泡影。

“辛丑条约”签订后，国内外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逐渐发展。在江浙地区，以张謇为首的资产阶级财团开始崛起。这一时期，赵凤昌与张謇的配合更加密切，他不仅积极参加张謇的经济活动，而且十分热衷于立宪。

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爆发，给知识分子以很大震动。是年5、6月间，张謇与赵凤昌、汤寿潜等人聚集于上海，为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燾起草了一份《拟请

立宪奏稿》，请求清廷“仿照日本变法立誓，先行宣布天下，定为大清宪法帝国。”^①这是国内较早呼吁立宪的文章。7月，赵凤昌又托内务府满人庆宽，将张謇刻印的《日本宪法》十二册“径达内廷”。此事引起了西太后的注意，军机大臣瞿鸿禨“旋命其七弟来沪，托凤昌选购宪法各书。”^②

日俄战争结束后，两国在美国调停下将于朴茨茅斯签订和约，重新分割中国权益。赵凤昌闻知后，遂在上海串联张元济等爱国人士合电枢臣，要求清政府派专使“预会建言”，以防利权外溢。^③他还向署湖广总督端方上《为预筹外患请特简专使陈公义而维危局密折》请代为转达。^④颇获端方赏识，不断有书信往还。

1906年，清廷颁发“仿行宪政”上谕，国内立宪运动由秘密转入公开。这一时期，赵凤昌经常出入于上海的张园、《时报》馆等处，为张謇等人组织的“预备立宪公会”和资产阶级领导的保路运动出谋划策，曾被江苏铁路公司聘请“担任总公司职务，随时赞划一切。”^⑤

1909年，赵凤昌正式加入了“预备立宪公会”。^⑥次年11月，他通过美国传教士李佳白，邀请来华参加“南洋劝业会”的美国民间商团到上海访问，特意在家中设宴招待商团首领大来夫妇。席间，张謇、熊希龄等立宪派领袖与美国人商讨了中美合资，“共营银行、开航业、设商品陈列所、置商品调查员”等事。^⑦事后，江浙资产阶级中间掀起了一股“社会联美”的浪潮。

1911年5月，清廷悍然成立皇族内阁，“是时举国骚然，朝野上下，不啻加离心力百倍。”^⑧赵凤昌与张謇、汤寿潜、

沈曾植等人联名致函摄政王载沣，要求“行宪法，罢亲贵，一新纲纪”。遭拒绝后，赵凤昌“遂断言清廷之无可属望，谋国必出他途以制胜矣”。^⑨是年6月，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上奏清廷，请将赵凤昌开复原官，由他“礼聘到东，备咨要政。”^⑩奏上即获批准。但是赵凤昌却以“病躯”为由，婉辞了赵尔巽的邀请，^⑪继续居留沪上。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至上海，赵凤昌立即召集立宪派准备应变。10月15日，他邀约江浙立宪派首领雷奋、沈恩孚、杨廷栋和同盟会员黄炎培到他家惜阴堂开会，“商讨时局前途应付方法。”^⑫会后，雷奋等人即赴苏州，会合从武汉赶回的张謇，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了一份要求清廷解散内阁、宣布立宪的奏折。此后，张謇曾两次来到上海，均下榻惜阴堂，同赵凤昌面商下一步的行动。

11月初，上海光复。赵凤昌感到清王朝大势已去，决心积极向革命党人靠拢。11月12日，他和张謇等人发起，邀请已独立各省咨议局代表和部分革命党人在上海方斜路江苏教育总会召开了临时政府筹备会议，决定成立“全国会议团”，采用共和政体。目前暂时“公认武昌为中华民国新政府”，

“并公认上海为临时外交政府之所在地”。^⑬13日，赵凤昌等人在《时报》上发表了给革命党人的公开信，要求与革命党人“约定时刻、地点”进行“面谈”。^⑭立宪派当天就收到了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回信，赞同“邀各省同志代表联合来沪，组织临时议会。”^⑮11月15日，“全国会议团”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名称在沪成立，赵凤昌在其中扮演了幕后军师的角色。他积极向革命党人建言献策，在革命党和立宪派

之间穿针引线，颇获好感，他家惜阴堂“成为当时讨论国事的会场。”^②黄兴、宋教仁、陈其美、黄郛、谭延闿、李书城、李烈钧、柏文蔚等革命党都督和将领均与他过从甚密，

“惜阴堂宾客云集，论政以外，兼及论军。”^③

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于次日造访惜阴堂，向赵凤昌征询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其后又“屡至商统一建国诸要端，尤先以网罗英贤及国家财政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和黄兴多次以各部人选名单向赵凤昌征求意见，赵凤昌答之曰：“建府开基，既须兼纳众流，更当克副民望。”^④在他的推荐下，张謇、汤寿潜、程德全等立宪派和旧官僚纷纷被邀进临时政府。1912年初，孙中山甚至亲自致函赵凤昌，邀请他担任临时政府的“枢密顾问”，但是此举却遭到了赵凤昌的婉却。^⑤他抱定不出山、不作官的思想，始终未在临时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

辛亥革命期间，赵凤昌不仅与南方革命党人关系密切，与北方袁世凯之间的联络也十分频繁。先是，早在立宪派筹备临时政府的时候，赵凤昌便提出过一个联络袁世凯共同倒清的方案。^⑥稍后，他通过其妻弟洪述祖与袁世凯的亲信唐绍仪建立了联系，唐绍仪便成为他在北方的代言人。1911年11月，洪述祖根据赵凤昌的授意，炮制了一份将以隆裕太后名义颁发的诏书，交唐绍仪转达袁世凯和亲贵奕勋，劝说他们敦请清廷召开国民会议，“投票取决共和、君位问题。”^⑦倘不允准，则“以去就争之。”^⑧12月初，清廷在革命党人和袁世凯的双重压力之下，被迫派出了以唐绍仪为首的议和代表团。

唐绍仪南下之前，曾电约赵凤昌、张謇等“东南人望”赴汉口会议。^③但是赵凤昌认为和议在汉口进行不便于自己插手，遂复电唐绍仪“径来沪上开议。”^④12月17日，北方代表团抵达上海，次日，赵凤昌便约唐绍仪与黄兴在惜阴堂相见，南北议和也于当天开始。

据时人回忆：“这次议和是一个大烟幕，有关会议情况的电报，白天打出去的和晚上打出去的完全不同；……。重要问题在夜里谈：清帝退位问题、退位后的优待问题、退位后谁来的问题、要外国承认问题，等等。”^⑤“所有和议中主张及致北方电，俱是夜间在赵寓双方商洽。”^⑥“在和议过程中，每星期当中总有一天或两天，程德全、汤寿潜、张謇、汪兆铭、陈其美等曾在赵家聚会。”伍廷芳“名义上是南方总代表，实际上作不出什么决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这个赵老头子。”^⑦种种迹象表明，赵凤昌是议和中的一个神秘人物，他不仅能在南北双方穿针引线，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南方的意见。

1912年1月中旬，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南北双方在惜阴堂里订下了清帝退位后拥袁世凯为大总统的秘约。随后，双方又在第一届内阁总理和陆军部长的人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坚持“内阁总理必须提出同盟会会员”，袁世凯方面则坚决反对。为此，赵凤昌提出了一个折衷双方的办法，他建议唐绍仪加入同盟会，然后出任内阁总理，此举得到了双方的赞同。孙中山、黄兴当即表示“欢迎绍仪入党，同时即决定请绍仪为国务总理。”^⑧

陆军部长也是内阁中的要职，双方均将此看作掌握实力

的关键。南方推举黄兴为候选人，北方则必欲段祺瑞担任此职，一时相持不下，和谈陷入僵局。这时，赵凤昌深恐内阁不早日成立将引起列强的干涉，他急忙函、电黄兴、汪精卫等人，劝黄兴以就任参谋总长为调和之计。^③在他的劝说下，本已无心恋栈的黄兴很快便放弃了对陆军总长的争取。

南北议和结束后，赵凤昌因调停有方而得到了袁世凯的青睐，袁世凯特意发电邀请他到北京政府中担任“顾问”，但是赵凤昌也拒绝了袁世凯的延揽。^④他甚至退出了自己曾经参加发起、而现在已经公开打上了袁记标签的“统一党”，^⑤以示不介入任何政党纠纷。这一时期，他热心致力实业活动，曾被选为汉冶萍公司总董，^⑥不久又和张謇、应德闳合资收买了《申报》股权，俨然成为上海工商巨头。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二次革命”爆发在即。4月，孙中山、黄兴通过章士钊秘密联络岑春煊，准备拥岑倒袁，曾经策划于惜阴堂。^⑦但是，赵凤昌联络较多的还是国民党中的“法律解决”派。5月底，他在张謇的授意下，同在沪的国民党“法律解决”派汪精卫、胡瑛、陈陶遗等人共同商订了一份调停南北方案，其主要内容为：一、国民党“决心举项城为正式大总统”。二、袁世凯须申明不撤换皖、赣、粤、湘四省国民党都督。三、坚持“宋案”法律解决。^⑧6月12日，张謇将这一方案电告袁世凯。

袁世凯接到这一方案后，对国民党人采取了欺骗手段，他一方面“同意”调停，一方面又不断向南方调兵遣将，并连续撤免国民党都督。到7月初，形势已经十分恶化，但赵凤昌仍然对袁世凯寄予幻想。7月5日，他还给张謇去信，请

张密电袁世凯宽释被捕的革命党人，“借收彼党人心。”^④不料“赣宁之役”猝然爆发，赵凤昌的调停之梦被冷酷的现实击得粉碎。

“二次革命”失败及时局的动乱，使赵凤昌“实业生计大受损害”，^⑤但他对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双方都充满了抱怨之情。未久，熊希龄、张謇等好友先后走上了与袁世凯在朝合作的道路，而赵凤昌则因“不肯牺牲”而遭到北京政府的猜忌，袁世凯的爪牙对他“污蔑无所不至”，^⑥甚至无端造谣，说他“欲在上海向某国借兵，另组政府”，^⑦企图加以陷害。

1915年12月，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赵凤昌立刻投入反袁活动。此前，他曾接到黄兴从美国的来信，请他和张謇、唐绍仪、汤寿潜、伍廷芳、庄蕴宽等“海内人望”联合起来，共同推翻帝制。^⑧为此，赵凤昌进行了积极的行动，他一方面利用《申报》大造反袁舆论，一方面秘密游说直系将领冯国璋，企图劝冯在南京建都，造成第三种势力，北逼袁世凯下台，南与护国军并立。^⑨但是由于冯国璋首鼠两端，赵凤昌很快便对他失望了。1916年5月17日，黄兴再次从日本给赵凤昌等人来信，希望他们逼令袁世凯“早行退位。”^⑩同时，黄兴还派人专程回国联络赵凤昌，准备在宁、皖、赣、鄂一带布置反袁武装。^⑪袁世凯死后，赵凤昌给黄兴去了一封长信，信中把黄兴称作“同志”、“吾党”，期望他“早日归国，解一时纷纠之局，树百年远大之规”，^⑫表示了同革命党人重新合作的愿望。

1917年7月，北京发生“张勋复辟”，赵凤昌再度投入反复辟斗争。他与段祺瑞的幕僚熊希龄联络频繁，积极为“讨

“逆军”运动军舰前往大沽助战，^{⑤⑨}同时他还充当了段祺瑞和孙中山之间的调停人。草拟了一个“遵约法”、“修宪法”、“督团逼散，归罪于逆”的调停方案，希望双方“不争是非”，实现南北统一。^{⑥⑩}然而随着段祺瑞窃据北京政权和孙中山南下护法，调停活动很快失败。

1917年之后，中国由表面的统一转入公开的分裂，各派军阀争权夺利，战乱不已，外侮内患，日甚一日。赵凤昌也感到前途渺茫，心灰意懒，他在政治上日渐消沉，实业上一蹶不振。1919年第二次南北议和时，双方虽然再度将他推为“调人领袖”，^⑪但是终于毫无建树。赵凤昌从此息影沪滨，埋头于辞章考据，参禅拜佛。1938年逝于上海，终年82岁。

注：

① 刘厚生：《张謇传记》第93页。

②③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第82、79页。

④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三册，总第3220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⑤ 黄谔：《花随人圣庵忆》第307页。

⑥⑧ 同①，第97页。

⑦⑨ 惜阴：《惜阴笔记·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见《人文月刊》第2卷第7期。

⑩ 张謇：《张謇日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

⑪ 北京图书馆藏：《赵凤昌藏札·奏为时局艰难谨参考各国政史拟请采用宪法实行新政以振积弱而图自强折稿》（以下简称《藏札》）。

⑫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附《啬翁自订年谱·光绪三十年六月》。

⑬ 《藏札·张元济致赵凤昌函》。

⑭ 《藏札·张鹤龄致赵凤昌函》。

⑮ 《藏札·王清穆致赵凤昌函》。

⑯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预备立宪公会报》。

⑰ 张謇：《张謇日记·宣统二年十月八日》。

⑱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附《啬翁自订年谱·宣统三年四月》。

⑲⑳㉑ 赵尊岳：《惜阴堂辛亥纪事》。

㉒ 《时事新报·赵凤昌开复原官》，1911年6月5日。

- ②① 《藏札·赵凤昌复赵尔巽电》。
- ②② 黄炎培:《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63页。
- ②③ 《藏札·念三日会议结果》,《藏札·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稿》。
- ②④ 《时投·唐文治上沪军都督府书》,1911年11月13日。
- ②⑤ 《藏札·陈其美复唐文治等函》。
- ②⑥ 严独鹤:《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新闻界动态》,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84页。
- ②⑦ 《藏札·孙中山致赵凤昌函·赵凤昌复孙中山函》。
- ②⑧ 黄炎培:《八十年来》第58页。
- ②⑨ 《藏札·拟召开国民会议办法稿》。
- ②⑩ 《藏札·洪述祖致赵凤昌函》。
- ②⑪ 《藏札·唐绍仪致赵凤昌电》。
- ②⑫ 《藏札·赵凤昌复唐绍仪电》。
- ②⑬ 余芷江:《辛亥上海光复前后》,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15页。
- ②⑭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92页。
- ②⑮ 冯耿光:《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363页。
- ②⑯ 同①,第197页。
- ②⑰ 《藏札·赵凤昌致汪精卫电》。
- ②⑱ 《藏札·袁世凯致赵凤昌、杨寿潜电》。
- ②⑲ “统一党”前身为“中华民国联合会”,由章太炎、赵凤昌等人于1911年底发起成立于上海。
- ②⑳ 叶揆初:《卷盦书跋·述汉冶萍产生之历史》,第53页。
- ㉑ 李根源:《民国李雪生先生根源自撰年谱》。
- ㉒ 《藏札·为解决刺宋案献策》。
- ㉓ 《藏札·赵凤昌致张謇函》。
- ㉔ 《藏札·张謇致赵凤昌函》。
- ㉕ 《藏札·佚名致赵凤昌函》。
- ㉖ 《藏札·张謇致赵凤昌函·附张一麐来函》。
- ㉗ 《藏札·黄兴致张謇、赵凤昌等人函》。
- ㉘ 《藏札·赵凤昌致冯国璋函》。
- ㉙ 《藏札·黄兴致唐绍仪、赵凤昌等人函》。
- ㉚ 《藏札·黄兴致赵凤昌函》。
- ㉛ 《藏札·赵凤昌致黄兴函》。
- ㉜ 《藏札·赵凤昌复熊希龄电》。
- ㉝ 《藏札·赵凤昌复熊希龄电·附调停各节》。
- ㉞ 《藏札·张一麐致赵凤昌函》。

李 宗 仁

李静之

李宗仁，字德邻，广西临桂县人，1891年8月13日（清光绪十七年七月初九）出生在一个耕读人家，父亲李培英是位乡村塾师。李宗仁六岁从父读书，1908年入广西陆军小学堂，1910年加入同盟会，后“陆小”改为陆军速成学校，李于1913年秋毕业后到南宁将校讲习所任下级军官，曾随桂系陆荣廷所部参加过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1918年升任营长。1921年粤桂战争时，李宗仁与他的“陆小”同学黄绍竑从旧桂系中分化出来，另树一帜。1922年，入桂粤军回粤，广西各地自治军蜂起，互不统属。李宗仁自称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委黄绍竑为第三支队司令，实力共三千人枪，李、黄为了和旧桂系陆荣廷、沈鸿英两股势力争夺广西统治权，在革命潮流影响下，1923年同广州军政府建立了联系，并加入国民党。黄绍竑就任孙中山委任的“广西讨贼军”总指挥，在粤军配合下占领了梧州，李宗仁将所部改称“广西定桂军”，驻在桂平。他们占据广西最富庶的梧州、玉林和浔江一带，与占领桂林、柳州、南宁的陆荣廷和占领平乐、贺县、蒙山一带的沈鸿英成鼎足之势。李、黄利用陆、沈矛盾，采取先联沈攻陆，各个击破的策略，于1924年6月取得南宁，然后联合组成定桂讨贼联军，分任总指挥和副总指挥，

消灭了陆荣廷所部二万余人，占据了左、右江至南宁以北四分之三地区，迫陆荣廷于9月23日通电下野，广西境内遂成李、黄与沈鸿英对峙局面。

李、黄投靠革命，有利于消灭旧桂系势力，受到广州大本营的欢迎和支持。1924年11月，孙中山任命李宗仁为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公署督办，黄绍竑为会办，白崇禧为参谋长。所属军队改编为广西陆军第一军和第二军，李、黄分任军长。1925年2月到4月，他们在粤军李济深师协助下，集中全力讨伐沈鸿英，占领了桂林、柳州，使沈从此一蹶不振。5月至7月，又与粤军合作，将假道广西企图进攻广东的唐继尧部驱回云南。自是，李、黄、白统一了广西，“新桂系的统治，从此开始”^①。

广西统一，结束了长期战乱，有利于广西经济文化的发展。李、黄对广西的改革和建设比较认真，诸如整编部队，整顿吏治，统一币制，改革税制，整顿教育等等，均取得较为显著的成绩。一时有新广西之称^②。

广西的统一，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北伐战争的发动，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二次东征时，李宗仁等出兵击败了和陈炯明勾结的川军熊克武部，为广东政府解除了西部威胁。南征时又与李济深部配合，取得了邓本殷的胜利。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宗仁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3月，李宗仁等宣布将广西统一于广东革命政府。广西军队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为军长，黄绍竑为党代表，白崇禧为参谋长。两广统一发展了革命形势，稳定了北伐后方。

北伐前夕，湖南人民掀起讨吴（佩孚）驱赵（恒惕）运动，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参加驱赵，与吴部作战失利。5月，李宗仁应唐之请，派钟祖培旅入湘增援，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李并亲赴广州，请广东国民政府乘机出师北伐。6月2日，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入湘。7月初，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李宗仁亲率第七军二万余众，同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进入湖南，会同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对直系北洋军发动正面进攻。第四、第七、第八军占领长沙、岳州后，又沿粤汉路北上进攻武汉。李宗仁指挥第七军先后参加了汨罗河之战、贺胜桥之战，并担任武昌攻城战总指挥。当时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在江西与孙传芳军相持不下，第七军在9月又被调去增援，经箬溪、德安、王家铺之战，击败了孙传芳的精锐谢鸿勋等部，扭转了江西战局。10月，李又指挥第七军和第四军，破敌于马回岭。江西底定后，李宗仁任中路军江左军总指挥，率部沿长江东下攻取安徽，1927年3月初进驻安庆。白崇禧也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部到达上海。在北伐部队中，第七军是最有战斗力的劲旅之一。

李宗仁虽然顺应潮流加入了国民革命行列，但为了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仍然仇视和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运动。大革命时期广西工农运动较为发展，李宗仁、黄绍竑等勾结地主豪绅镇压右江地区农民运动，制造了1926年1月的东兰惨案，下半年又迫害梧州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李宗仁对迅猛发展的工农运动更加反感，视为“越轨闹事”。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

李宗仁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对于武汉国民党左派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斗争，李宗仁认为是“同室操戈”，说“党内纠纷，应以合理方式和平解决”，主张“顾全大局，尽量忍让”^③。1927年3月下旬李宗仁到南京，把共产党和工农运动视为“腹心大患”，对上海高涨的革命气氛，更加忧心忡忡，认为“如不加抑制，前途不堪设想”。这时蒋介石正在布置“清党”，他建议“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④，还建议将第七军主力从安徽调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线上反对背叛三大政策的北伐部队。3月底，他应蒋介石之邀到上海，参加4月2日“中央监察委员紧急会议”，通过“处置各地共籍叛乱分子咨文”，又和白崇禧一起参加蒋介石召集的清党反共秘密会议。接着，李、白伙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七军成了蒋介石赖以建立独裁统治的反动武装之一。

7月15日武汉汪精卫集团也叛变革命，蒋、汪虽然在反共上一致了，但互争正统，斗争仍十分激烈，武汉并布置东征讨蒋，要求蒋下野。这时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已将第七军扩充为第七、第十三、第十九等三个军，在蒋汪斗争中举足轻重。他们早有问鼎中原的野心，联蒋反共是由于单独反共力量不够，并不是真心拥蒋。蒋介石利用北伐军总司令职权，扩展嫡系，排挤异己的作法，以及蒋系军官骄横放纵和战场表现无能，都使李宗仁强烈不满，认为“蒋氏最多只可说是偏将之材，位居主帅之尊，其智慧、德性、涵养俱不逮远甚”^⑤。李、白利用蒋在徐州作战失利和在蒋汪斗争中为武汉所嫌恨，联合何应钦“逼宫”，以宁汉合作压蒋，责蒋“不

宜用个人地位而牺牲党国大计”^⑥。蒋介石以退为进，在8月13日宣布下野。但这时北军孙传芳、张宗昌陈兵江北，随时准备南渡，武汉东征军仍在向下游移动，为摆脱困境，李、白需要同武汉方面达成妥协，于是作出拥汪姿态，要求武汉停止东征，李并亲赴庐山欢迎汪和武汉政府其他领导人赴宁“柄政”。但是李、白也不是真心拥汪，他们在9月初打败了孙传芳的部队，稳定了南京政权后，便转而排汪。他们伙同西山会议派控制了9月15日组成的宁、汉、沪合作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使汪精卫通过宁汉合流攫取党政实权的企图落空。汪在这场政治分赃中失败，返回武汉策动唐生智反对特委会。李、白等又发动西征讨唐，乘胜收编了唐部，获得了两湖地盘。汪在武汉不能立足，又南下广州，伙同张发奎图谋另立中央党部。11月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勾结汪精卫进行复职活动，谋以汪蒋合作打击桂系势力。由于蒋的复职还得到阎锡山、冯玉祥等实力派支持，李宗仁不得不表示拥护，但迁怒于汪，责汪倒蒋拥蒋，反复无常。12月爆发广州起义，李宗仁联合反汪各派对汪发动攻击，汪被迫出国。又经过1927年底到1928年初粤桂战争，桂系黄绍竑的势力从广西伸展到广东。

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从桂系手中夺回了最高统治权。他虽欲拔掉桂系这根肉中刺，但桂系据有两湖和两广地盘，他不能不有所顾忌，而且北洋奉系还占据中国北方，也需要利用桂系力量对奉军作战。于是他让李、白担任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任命李宗仁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将桂军编为第四集团军，以李宗仁为总司令。蒋桂关系

表面缓和。4月初，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与北洋奉系争夺北中国的战争发动，第四集团军沿京汉线北上。李宗仁将收编的唐生智部编为第十二路军，交由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领，一直打到天津至山海关一带。李自己坐镇武汉，控制两湖。6月，对奉作战胜利。10月，蒋改组南京政府，自任主席，任命李宗仁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

“北伐”军事结束后，蒋介石为了建立独裁统治，召开编遣会议削除异己势力，引起各实力派强烈不满。李宗仁掌握的桂系军队，通过西征讨唐和北伐奉张两仗，兵力扩充到二十万人，地盘已由广西发展到冀东，南北遥相呼应。李宗仁设第四集团军总部于武汉，虎视长江下游，威胁着蒋的统治，蒋必欲去之而后快。1929年3月，因争夺湖南地盘，蒋桂矛盾激化，双方调兵遣将，战云密布。为了灭桂，蒋重新起用唐生智，令其策动在冀东的旧部叛离白崇禧，使桂系在平津的势力首先瓦解。蒋又以调停湘事将广东的李济深骗到南京，拘留在汤山，以此拆散粤桂联盟。对付武汉地区桂系主力采取分化收买和武力进攻的两手，3月26日蒋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讨伐李宗仁，并免去李的本兼各职^①。又在次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开除李宗仁、白崇禧的党籍^②。4月，桂系在武汉的将领李明瑞、杨腾辉受蒋收买倒戈，武汉为蒋军所占领。

李宗仁在蒋桂战争中失败，回到广西，与改组派发起的“护党救国”运动结合，继续攻粤反蒋。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李宗仁响应阎锡山、冯玉祥的反蒋军事行动，率桂军倾巢入湘，企图与阎、冯会师中原。虽一度占领衡阳、长沙、

岳州，前锋进入湖北，但在蒋军压迫、粤军尾追的情况下，反攻衡阳失利，全军溃败，退回广西。1931年5月，反蒋各派再度麋集广州，组成反蒋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桂系加入这个反蒋联盟，李宗仁重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只是由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一致呼吁团结御侮，才没有酿成大规模战争。经过协商，达成蒋介石下野，广州方面结束“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的协议。11月，李宗仁、白崇禧的国民党党籍被恢复，李并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2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在广州设立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⑨，由陈济棠和李宗仁分掌实权，形成对蒋政权半独立局面。

以后数年，李宗仁锐意经营广西，准备应变。1934年李召开全省“扩大党政军联席会议”，通过了“广西建设纲领”。纲领规定实行“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民，寓将于学，寓征于募）政策，以“振奋民众，效力国家”相号召，在各地遍设民团，对青壮年实行军事训练；整顿军队，充实军需，并用关余收入从外国购进大批枪炮弹药武装部队，并买了十余架飞机。李利用西南半独立局面，使广西休养生息，在普及国民教育，发展地方工农业，发展对外贸易方面也取得一定成绩，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曾获得“中国模范省”的声誉^⑩。

这期间，蒋介石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对西南半独立采取了容忍态度。李宗仁也把反共作为根本方针，曾派兵入赣，协助蒋“剿共”。红六军团和中央红军长征路经广西

北部时，李宗仁曾派廖磊率第七军一直跟到贵州都匀。但为保存实力，未同红军发生激烈战斗。

面对“九一八”以来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李宗仁主张奋起抵抗，认为“必须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⑩。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入华北，蒋介石置民族安危于不顾，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这时南方红军已长征到达陕北，蒋一方面调动军队阻拦红军东进抗日，一方面着手解决西南半独立问题。6月1日，李宗仁便和陈济棠联合，发动了抗日反蒋的事变。他们通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请中央领导抗日，并将所属军队改称“抗日救国军”，由陈、李分任总、副司令，出兵湘南，要求北上抗日。蒋介石对陈济棠的部下实行分化、收买，使这次抗日反蒋行动在广东迅速失败。蒋又在7月10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通过决议，撤销了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然后以大军围困广西，迫李、白离开广西以彻底解决桂系势力。李、白拒不从命，准备另组抗日反蒋政府。蒋桂双方秣马厉兵，战争一触即发。但在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内战的形势下，蒋桂冲突最后和平解决。

抗战爆发后，李宗仁受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津浦线防御战，其辖区包括山东全省和长江以北江苏、安徽两省大部。1938年1月李又受命兼任安徽省主席，直到10月由廖磊接任。

日军在1937年12月13日侵占南京后，急谋打通津浦线，连贯南北战场，第五战区首当其冲。自12月中旬开始，我军

首先与沿津浦线北犯的敌军在明光以南血战逾月；随后撤至淮河北岸，阻敌北进。1938年1月，敌板垣师团在青岛登陆，沿胶济线西进，图与沿津浦线南下的矶谷师团在台儿庄会合，策应自津浦线南段北上的敌军会攻徐州。2月到3月，李宗仁调庞炳勋军团与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在临沂与板垣师团激战五昼夜，打破了该师团与矶谷师团会师台儿庄的计划。3月23日，矶谷师团自峰县循津浦线临枣支线而下，直扑台儿庄。当矶谷师团窜至滕县时，遭到第二十二集团军邓锡侯部的阻击，第一二二师王铭章师长率部死守滕县城，与敌血战三昼夜，全师殉国。迟滞了敌军的进展，为我军增援赢得宝贵时间。李宗仁亲自指挥孙连仲第二集团军、汤恩伯第二十军团与敌在台儿庄血战两周，取得了歼敌万余的重大胜利。台儿庄之战，是抗战爆发后正面战场取得空前胜利的一次战役，大大振奋了民族抗战精神，李宗仁也因此成为颇有影响的抗战将领。此后，李宗仁还率部参加了武汉保卫战及鄂北、豫南诸战役，并在桐柏山、大洪山创立了游击基地。

从抗战开始，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前后六年，直接指挥过近百万军队。除十一、二十一两集团军约十万人属桂系部队，胡宗南、汤恩伯部为蒋的嫡系外，其余则为原西北军、东北军、直鲁军、川军、粤军等杂牌部队。他反对蒋介石借抗日战争消灭杂牌军的做法，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这些部队的战斗力和爱国热诚。他指挥的部队中涌现了不少浴血奋战、效命疆场的爱国官兵，1940年5月第二次随枣战役中，在前线壮烈牺牲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便是突出

的代表。

抗战开始，广西当局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以广西建设研究会名义，延聘了一些进步的学者、教授，参加广西经济、文化建设，其中包括一些知名的共产党员。广州、武汉失守后，桂林集中了许多进步文化机构，成为大后方著名的文化城。1938年李宗仁兼主皖政期间，同共产党人、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共事，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安徽形成起了好的作用。但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的时候，桂系在安徽的部队挑起了同新四军的武装磨擦。“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有时表现进步，不久仍然反动起来”^②。

1943年9月，李宗仁升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负责指挥第一、第五和第十战区。但汉中行营是个架空机构，并无实权。

抗战胜利后，李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1946年9月改称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他支持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1946年10月，调傅作义部攻占了张家口。他对北平的学生运动没有硬性镇压，和教育界人士关系较好。由于他“弭息学潮”、“礼遇贤士”^③，被认为政治作风比较开明，“有儒将之风”^④。

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美国对蒋介石已经失望，有意以李宗仁为“换马”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宗仁决定参加1948年3月“行宪国大”的副总统竞选。由于蒋李关系二十多年一直处在矛盾之中，蒋介石把李参加竞选视为插向他心脏的“一把利刃”^⑤，先是以国民党员参加竞选应由国民党中央提名，迫李退出，

后又发动CC系和黄埔系支持孙科同他竞争。4月23日副总统选举正式开场，斗争更加激烈。李宗仁以退为进，以选举不民主、幕后压力太大为由，声明退出竞选，引起舆论大哗。蒋不得已，只好对李表示支持。29日，李以微弱多数战胜孙科，当选为副总统。

经过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蒋军主力丧失殆尽，蒋政权覆灭已成定局。美国再次策动“和平”阴谋，企图以李宗仁代替蒋介石主持同共产党和谈。桂系为逼蒋下台，由白崇禧电蒋主张恢复同共产党谈判。蒋介石在内外形势逼迫下，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说“只要和平果能早日实现”，他“不计个人进退”^⑥。蒋介石的假求和阴谋被中国共产党戳穿后，不得不在1月21日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但实际上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溪口操纵一切。李宗仁上台后，急于用“和谈”阻止解放军渡江，妄图搞“隔江分治”，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表示愿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条作为谈判基础。但此举却遭到国民党死硬派的反对。在蒋介石的策动下，行政院长孙科将行政院迁往广州，南京国民党政府四分五裂。2月14日，李宗仁派出一个“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到北平，试探共产党的反应。鉴于“南京反动政府方面在这个谈判中的推动力量是桂系、国民党主和派和上海资产阶级”^⑦，中共中央决定以李宗仁为和谈对象。

3月8日，孙科辞职，何应钦继任行政院长。4月1日，南京政府派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李蒸、章士钊、刘斐为代表的和谈代表团到北平。行前李宗

仁指示代表团要坚持就地停战，解放军不渡江，不追究战争责任（即不要惩办战犯）等要求。中共代表团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八条二十四款，拒绝了南京代表上述要求，粉碎了李宗仁“隔江分治”的迷梦。新华社并敦促李宗仁抛弃幻想，下定决心，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藉以立功赎罪^⑧。4月15日，中共代表团又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限定4月20日为最后签字日期。由于蒋介石幕后操纵和桂系实力派白崇禧的掣肘，李宗仁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

21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23日占领南京。毛泽东、朱德签署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出，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李宗仁政府愿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可以再给一次机会。李宗仁再次拒绝向人民靠拢，却在22日飞杭州同蒋介石商讨继续顽抗。但由于他不满意蒋介石背后牵制，没有随南京政府跑到广州，而径飞桂林。他从桂系集团现实利益考虑，曾设想走局部和平的道路。当时广西省内高级官员中的开明人士正在积极推动李补签“国内和平协定”，李也认为“仗是不能打了，非和不可”，想请广西民主人士李任仁到北平为他斡旋，争取“重开和谈”^⑨。但一向以坚决反共著称的白崇禧极力反对，美国政府又作出了支持地方实力派反共和不再援蒋的表示，使李宗仁重新做起了组织粤桂联盟、抗蒋反共的旧梦。由于阎锡山等一再调解，蒋介石也作了不再干政的表示，李宗仁便在5月8日飞广州，叫嚷“戡乱”到底^⑩。

蒋介石并不兑现他的许诺。为了加强对党政军的直接控

制，7月宣布成立以他为主席的“非常委员会”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并瓦解了李的粤桂合作计划。这使李宗仁无法忍受，蒋李关系更加紧张。他邀集顾孟余等组织第三势力活动，筹备成立一个以亲李的立法委员为基础、标榜“反共反独裁”的组织——“自由民主大同盟”，搞两面作战。10月广州解放，国民党流窜“政府”迁到重庆，蒋介石紧锣密鼓地进行复任总统的活动，派人说服李宗仁参加“劝进”，李以蒋“欺人太甚”，坚决拒绝。在蒋挑拨拉拢下，白崇禧也主张妥协，李仍断然拒绝。但蒋复出已成定局，李宗仁遂以出巡为名，离开重庆，请行政院长阎锡山以责任内阁全权处理“国政”，然后于11月20日飞香港，12月5日再飞美国就医，争取美援。1950年3月1日蒋在台北宣布“复职”，李不得不在纽约城郊长期留居。1954年3月10日台北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罢免了李的副总统职。

离开政坛，使李宗仁有可能超出个人恩怨和集团私利，以一个爱国的炎黄子孙立场看待一切，并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太平洋彼岸的祖国，不得不承认“尘埃已经落定，室内红光耀目，焕然一新”^①，面对国内建设蒸蒸日上、世界威望与日俱增的新中国，他“私心弥觉可喜”，“愿红色政权好自为之”^②。1954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后，1955年李宗仁在美国公开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反对搞“台湾托管”和“台湾独立”，主张国共两党再度和谈，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1960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李写信促他转变对华政策，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62年又著文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谴责尼赫鲁政府的侵略和美国利用中印边界问题进行的反华活动。1963年他接见意大利女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时说：

“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②

李宗仁在1962年完成的《回忆录》中，对自己戎马生涯、宦海浮沉三十多年的历史进行了反思。未泯的理想和爱国之情，使他终于作出了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正确选择。经过十六年海外流亡的岁月，叶落归根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地撞击着他的心灵。1965年7月20日，他终于冲破重重险阻，回到社会主义祖国。在首都机场，他宣读声明，对1949年未能接受和谈协议“至今犹感愧疚”，希望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③。他还寄语留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希望他们为祖国统一事业作出贡献。

李宗仁归来，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热烈欢迎。祖国对李宗仁优礼相待，关切备至，使他深受感动。通过参观访问，他亲眼看到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成就，表示深信中国一定会建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在北京病逝。临终前写信给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他回到祖国后受到的关怀和照顾表示感激。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希望他们回到祖国怀抱^④。

注：

① 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与两广统一及大革命北伐》，《广西文史资料》第6辑，第63页。

- ② 参见《建设化的广西》，《国闻周报》1928年第5卷第43期。
- ③ 《李宗仁回忆录》（上）第437—438、449页，广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出版。
- ④ 同③，第456页。
- ⑤ 同③，第420页。
- ⑥ 《晨报》1927年8月17、24日。
- ⑦ 《国民政府公报》1929年3月27日第126号。
- ⑧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686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 ⑨ 陈键波：《中华民国春秋》第609页，三民书局1981年版。
- ⑩ 《广西日报》1937年5月25日，《李宗仁回忆录》（下）第672页，广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出版。
- ⑪ 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4月18日。
- ⑫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2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 ⑬ 梁升俊：《蒋李斗争内幕》第2页，亚联出版社1954年版。
- ⑭ 李家骏：《李宗仁先生传》第28—29页。
- ⑮ 同⑬，第6页。
- ⑯ 转引自毛泽东：《评战犯求和》，《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0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 ⑰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7页。
- ⑱ 毛泽东：《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7—1449页。
- ⑲ 李任仁：《国民党崩溃前夕的和谈内幕》，《广西文史资料》第4辑，第43—44页。
- ⑳ 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第93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
- ㉑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1045页，广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年出版。
- ㉒ 同㉑，第1047页。
- ㉓ 同㉑，第177页。
- ㉔ 《人民日报》1965年7月21日。
- ㉕ 《人民日报》1969年2月2日。

廖 耀 湘

杨 焜

廖耀湘，别号建楚。湖南邵阳北乡酿溪镇（今新邵县县城）人。1906年5月16日（清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出生于一个富裕农民家庭。父亲务农，祖父廖光宦是名秀才，在乡教私塾。廖从小随祖父读书，1918年春考入县立高小，1920年冬毕业。1921年春又考入长沙私立岳云中学。由于受到广东革命浪潮的影响，1925年暑假前，与同学数人相约去广东考黄埔军校，因未筹足旅费，没能成行。他无心再读书，到湖南陆军第三师叶开鑫部第三旅教导总队当学兵，训练期满，在该部任班长。1926年1月，第四师师长唐生智驱逐赵恒惕，拥赵的第三师败走湖北。5月，第三师回长沙，廖耀湘不愿再参与军阀混战，潜回家乡。7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不久，升为学生队班长，后编入骑兵团。

1928年廖在军校毕业。次年投考留学生预备班。1930年以上士军衔公费送法国留学。他为了学好法语，要求先进法国小学，与法国学生们在一起学习了三年，然后再入法国军校，学习机械化骑兵。1936年毕业，成绩优良。

同年回国，在南京桂永清的教导总队骑兵团任少校连长。1937年，升旅部中校主任参谋。是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廖辗转前往武汉。其时南京政府迁至武汉，成立了一个

军官训练总队，训练收容失散的中级军官，廖被任命为该军官总队上校大队长。

1938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了一个机械化师（番号二〇〇师），师长是杜聿明。该师需要一个学过机械化的人员任参谋长，军政部长何应钦遍查留学生学历，只有廖学过机械化骑兵，于是便任命廖为该师的少将参谋长。廖在任参谋长期间，帮助杜聿明教育训练部队，成绩卓著，得到杜的信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酝酿军事同盟，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为准备派军队入缅甸作战，编组了一些新的部队。杜聿明升任第五军军长。廖则升任该军新二十二师副师长。全军被派担任赴缅甸作战任务，由中印缅战区美国部队司令官兼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直接指挥。1942年3月，中国军队第五、第六、第六十六等三个军组成远征军出发到缅甸，卫立煌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卫未到任，由杜聿明代理。继由罗卓英任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

廖部入缅甸后，先后参加了同古、斯瓦等战斗。同古战斗中，我军二〇〇师遭敌五十五师团猛攻，激战数日，二〇〇师有被围歼的危险。廖受命指挥新二十二师解围，终于协助二〇〇师安全撤出。

斯瓦战斗中，新二十二师的任务是掩护主力集中。“我新二十二师以一师的兵力，自3月26日与敌接触以来，至4月16日，共与敌战斗二十一日之久，我军先攻继守，用逐次抵抗战术与优势之敌（先后五个联队）连续激战达十二日，

不但达成掩护主力集中的任务，而且消耗打击敌人，并引敌深入于我有利的决战地区”^①。

1942年4月日军分三路进攻盟军，进逼腊戍，英军撤往印度，中国远征军亦于下旬开始仓促撤退。新二十二师由曼德勒西北转达罗到新背阳，后又奉令改道入印。7月底，到达印度利多。退却时正逢雨季，部队经过之处，多是崇山峻岭，森林蔽天，人烟稀少，给养困难。加之森林地潮湿，雾气弥漫，蚊叮虫咬，各种疾病蔓延，官兵死亡累累，惨不忍睹。

8月初，新二十二师到达印度的迪布鲁加尔，此时，史迪威在兰姆珈设立训练中心，对撤退到印度的中国军队进行整训。新二十二师参加整训后，并接受美械装备。

1943年10月底，新二十二师奉命参加对缅甸的反攻战。在胡康河谷战斗中，与敌十八师团的五十五和一一四联队接触，廖师以一个团的兵力，全歼敌一个加强营，揭开打回缅甸胜利的开端。新二十二师又与新三十八师配合向敌进攻，自1943年10月底至1944年3月底，南进一百五十余公里，予敌以沉重打击，缴获大炮十五门，步枪七百余支及其他装备弹药等。

在孟拱河谷战斗中，敌以一一四联队的主力和新增援的五十六师团一四六联队的全部布置在孟拱河谷，企图凭藉有利地势逐次抵抗，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经过十五天的激战，陆续攻克敌阵地。杀伤敌军四五千，俘敌大尉以下官兵八十九名，缴获各种火炮三十门，步枪数百支，汽车二百余辆。

1944年8月，在缅甸战役中，中国驻印军同新从国内空运来的部队编为新一军与新六军两个军。新一军军长为孙立人，辖新三十师、新三十八师、五十师三个师；新六军军长为廖耀湘，辖十四师、新二十二师两个师。

同年11月，桂林、柳州相继沦陷，日本侵略军进窥贵阳，蒋介石急将新六军由缅甸战场空运到云南，不久再运到湖南芷江，作为战略预备队。该部在湖南黔阳地区曾与侵入湘西的日军进行过几次不大的战斗。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新六军由湖南芷江空运到上海待命。

1945年9月，蒋介石任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令其抢占东北。10月，又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梁华盛、郑洞国为副长官，率两个军开进东北，向解放区进犯。1946年1月，新六军等五个军先后被运往东北增援。廖耀湘依仗新六军是美械装备、兵精、火力强，趾高气扬，看不起解放军的力量。2月中旬，先期到东北的新六军新二十二师到达磐石后，在沙岭遭到东北人民解放军（当时称东北民主联军）五个旅的猛攻，激战三日，受到严重打击。该军第十四师与第二师进攻本溪，也为解放军击败。经过这两次较量，他才不敢轻视解放军了。

1946年4月28日，蒋军分南北两路向本溪进攻。新六军为南路，与北路军配合，经过六天的激战，于5月3日占领本溪。接着又分右、中、左三路进攻四平。廖军为右翼，于5月17、18两日，先后占领叶赫站、塔子山迂回四平东北，企图封死解放军的退路。解放军依照中共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在大量歼敌之后，于5月18日主动

撤出四平。廖军得以于5月下旬逐次占领公主岭、长春、永吉、小丰满、桦甸等地。

6月，全面内战爆发。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动撤离了交通线和一些城市，集中主要力量，歼灭可以歼灭的敌人。自是年冬季以后，蒋军处处挨打，不少部队被包围歼灭。新六军是蒋军中的一支王牌部队，为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哪里危急，就往哪里调用，在南北满两个战场疲于奔命，廖耀湘弄得手忙脚乱。

1947年8月初，蒋介石为加强东北的军事力量，将东北保安司令部并入东北行辕，以陈诚任东北行辕主任，罗卓英、郑洞国为副主任。陈诚想打通北宁路，结果进击北宁路的一〇五师被消灭。陈诚感到兵力不足，除请求从各处抽调部队增援外，积极收编地方部队，大肆扩军。他将新三军、新六军编为第九兵团，以廖耀湘为兵团司令。又调来新一军、四十九军和新编的新五军等为机动部队，准备与解放军进行决战。

10月，解放军发动秋季攻势，接着又发动冬季攻势，前后共歼灭蒋军六七万人。1948年1月，蒋军新五军在公主屯被歼，接着四十九军的七十九师和二十六师亦先后被歼。解放区不断扩大。陈诚在东北焦头烂额，无法再干下去，借病辞职。蒋介石决定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卫立煌为总司令，郑洞国、范汉杰为副司令。

卫立煌到东北后，解放军冬季攻势尚在继续进行，陆续解放了沈阳外围一些城市。至1948年3月，东北全境的蒋军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其主力位

于沈阳地区，廖兵团也龟缩在沈阳。蒋介石采纳美国顾问团的建议，拟放弃沈阳，将主力撤往锦州。卫与廖坚决不同意。卫怕部队在撤离途中被歼，要求先由关内派出援军到锦州配合打通北宁路，然后再撤出。廖提出四点理由，反对放弃沈阳：（1）沈阳有兵工厂，每月可制造装备一个师的武器和弹药；抚顺有煤，本溪有钢铁，可以长期固守。（2）沈阳至锦州间，有三条横断的大河流，没有公路桥梁，机械化部队运动困难，容易被阻击。（3）将沈阳地区让给解放军，如虎添翼，解放军经整补入关，华北和华中都将不保。（4）放弃沈阳，置长春守军于不顾，于心不忍。于是卫派参谋长赵家骧、第六军军长罗又伦及廖耀湘到南京见蒋，陈述意见。蒋仍坚持认为沈阳部队多，光靠空运补给，是自取灭亡。但表示派援军打通北宁路问题，可以考虑。他只同意沈阳主力撤退可稍推迟一些时日，指示卫、廖仍要作好将主力部队撤出的准备。他又指示将沈阳部队重新编组：以周福成的五十三军及二〇七师为防守兵团，担任防守沈阳的任务；其余各军组成机动兵团，由廖耀湘统一指挥，随时准备行动。卫立煌还是坚持要求与关内援军合力打通北宁路后撤出沈阳。廖耀湘则对于如果援军迟迟不来，解放军向沈阳发动攻势时，如何行动，有所考虑。他向卫建议，将沈阳主力秘密集中辽中及其以南地区，伺机袭占营口，既可以进攻，又便于从水、陆两路撤出。并建议将市区的机关、学校，尽量疏散，以免像长春一样，造成被围后粮食极端困难的局面。但卫怕主力一出，沈阳不保，同时自己失去掌握，迟疑不决。

10月初，东北解放军主力开始进攻锦州外围，准备围歼

锦州守军，以关门打狗的形势，全歼东北蒋军。蒋介石下令新一、新三、新六、四十九、七十一各军共十万人组成辽西兵团，以廖为兵团司令，由沈阳出辽西，与葫芦岛方面的蒋军配合，东西夹击，以解锦州之围。并指示辽西兵团要沿北宁线从沈阳、新民向锦州前进。

关于援锦路线，廖耀湘主张，最好经辽阳、营口、盘山、沟邦子到锦州，以避开右侧据守法库、彰武解放军的威胁，而且如援锦不成，还可经营口从海路撤退。卫立煌支持廖的意见。但蒋介石决心在沈阳主力撤退前与解放军进行一次决战，他单独召见廖耀湘，强迫执行沈阳主力出辽西的命令。

10月8日，辽西兵团开始在新民地区集中。12日开始，分成两个梯队向新立屯、黑山方向前进。新一军在右，七十一军在左，新三军在右侧；新六军、四十九军为第二梯队。行进中，果如廖所料，主力右侧时时受到法库、彰武方面解放军的袭击，他只好分兵向法库和彰武进攻。同时，正面的部队，由于需要遇河架桥，行动非常迟缓。葫芦岛方面的蒋军，9日起向塔山猛攻，受到解放军阻击，激战三日，毫无进展。廖耀湘兵团占领彰武后，廖恐锦州不守，有意拖延，不肯贸然前进。尽管蒋介石心急如焚，亲坐沈阳督催，他还是迟迟不进。他私下对部属说：“快了会更麻烦，不如等锦州解放了，我们就可以退回，岂不省事得多”^②。后来蒋介石严令迅速西进，廖不得已，只好在14日下令整个兵团渡新开河西进，15日占领新立屯，并到达黑山外围。同日，锦州解放。廖以为可以撤退了，蒋介石却仍要辽西兵团和葫芦岛蒋

军东西对进，夹击锦州。后经卫立煌、杜聿明向蒋介石请示，廖耀湘坚决要求，才决定先进攻黑山，如夹击锦州不成，允许辽西兵团向营口方向撤退。

在等待蒋介石最后决策时，廖以为无论向锦州前进或向营口撤退，都必须先进攻黑山。因之，黑山的进攻部署，早已完成。21日拂晓开始进攻黑山，打了三天，毫无进展。廖判断黑山解放军已得到增援，长春（已于19日解放）方面的解放军，亦可能南下，他怕陷入解放军合围圈内，不等攻下黑山，便征得卫立煌的同意，于24日开始向营口方向撤退。不料，向营口撤退之路已被截断。26日，解放军的穿插部队袭击了廖兵团及各军指挥所，一时各指挥所联络中断。通往沈阳的公路也被截断。廖令各军、师设法掌握部队，就地抵抗，然后逐渐靠拢，待命行动。此时卫立煌来了电报，令迅速退回沈阳。

27日拂晓，兵团指挥所率新二十二师一个团向辽中方向撤退，到处是枪声，各行军纵队被截成数段，各级指挥所无法指挥。廖等行进至辽中地区开阔地时，混杂的官兵约千余人，已不成队列，拥挤一团；东面枪响，涌向西跑，西面枪响，涌向东跑。廖大声呼喊：“大家不要跑，组织起来，保护我们冲出去，要官升官，要钱奖钱。”然而，兵败如山倒，他再三呼号，也无人理睬，官兵纷纷作鸟兽散。至28日拂晓，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旅）及特种兵部队共十万余众，全部被歼灭。

廖耀湘化装潜逃，在黑山以西地区，被解放军查获。被俘后由沈阳转送到哈尔滨解放团，后迁往抚顺，再迁黑龙江

省绥化县，1961年被特赦释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64年任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撰写过一些文史资料及对台宣传稿件。1968年12月2日，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去世。

注：

- ① 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第26页。
- ② 廖和作者的谈话。

夏 威

赵世怀

夏威，原名钧差，号煦苍，广西容县人，1893年3月2日（清光绪十九年正月十四日）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其父夏继虞，是个地方绅士。夏威1910年春考入广西陆军小学，与黄绍竑、白崇禧为同级同学。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参加桂林学生军北伐敢死队，先后到达武汉、南京。1912年春，转入南京入伍生队学习。是年秋，南京入伍生队奉命改为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校址移至武昌南湖，夏威在此学习两年，再经半年入伍期，于1915年6月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科，1916年冬毕业后，分到广西陆军第一师任见习官。

1917年夏，陆荣廷为改造旧军，创办广西陆军模范营，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归来的马晓军为营长，夏威与黄绍竑、白崇禧入该营任连附。是年秋，模范营随湘粤桂联军入湘参加护法战争，改为联军总司令部卫队第一营。1918年4月北军入湘，联军退出长沙、衡阳，卫队第一营退到零陵东湘桥驻防训练，时夏威已升任该营机关枪队队长。1919年5月桂军与吴佩孚达成协议，直军北撤，桂军退回桂境。1920年，粤桂战争爆发，该营奉命开赴广东肇庆驻防。桂军溃败后，沿西江退回戎圩，后驻桂平。

1921年6月，孙中山为消除北伐后患，以陈炯明为粤军

总司令，挥军入桂，讨伐陆荣廷和谭浩明。因原模范营多是新军人物，陆、谭防其与粤军勾结，调马晓军营开往远离前线的百色。粤军攻占南宁后，陆、谭败走，孙中山委马君武为广西省长，马营即拥护孙中山，脱离旧桂系。马君武任命马晓军为田南警备军第五路司令，扩编为三个营，黄绍竑、白崇禧分任第一、二营营长，夏威任第三营营长。

1922年春粤军从广西撤走，分散在各地的陆、谭旧部，纷纷以“自治军”名义卷土重来，攻占南宁。马晓军率部撤往钦廉，由于长途行军，衣食无着，前途渺茫，他将所部交黄绍竑率领，径自北海去广州，黄率部至廉江。此时驻玉林的李宗仁，与黄为陆小同学，自称“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拥有两个支队，李即派黄绍竑的胞兄黄天择持函邀黄绍竑到玉林合作。李委任黄绍竑为第三支队司令，下辖三个营，夏威为第一营营长。驻扎容县。

1923年6月，黄绍竑意欲向外发展，一方面派人到梧州与旧桂系沈鸿英部联络，假意归编，受任为桂军第八旅旅长；另一方面，又暗中派陈雄和在广州养伤的白崇禧与孙中山联系，受任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把部队开往梧州上游的新地圩。当沈鸿英攻粤败退时，黄绍竑即与粤军李济深部夹击沈军，一举占领梧州，成立“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部”，黄绍竑任总指挥，白崇禧任参谋长。下编三个团，夏威任第三团团长。

1923年8月底，夏威随黄绍竑进攻藤县，消灭自治军卢得洋和黄超武部。同年秋，黄绍竑与李宗仁合作（此时李部改名为“定桂军”），11月间协同进攻驻贵县、桂平、平南的

陆云高部。夏威率部进攻平南大安正面之敌，随后又渡过西江，与李宗仁、白崇禧在江口、鹏化（桂平县金田附近）会合，击溃了陆云高部主力。

这时，陆荣廷、沈鸿英旧桂系两大势力还盘踞广西。陆荣廷占有南宁、柳州、百色、龙州；沈鸿英自1920年脱离陆荣廷后，独树一帜，占有桂林、平乐等地。1924年春，陆、沈争夺桂林，互不相让。李宗仁、黄绍竑即采取联沈讨陆的策略，分兵两路进攻陆荣廷老巢——南宁。5月，夏威担任左路军随李宗仁自贵县沿江西上，白崇禧率讨贼军俞作柏部和定桂军何武部为右路军，经宾阳、迁江、上林、武鸣与左路军会攻南宁。6月25日，他们打垮林俊廷、蒙仁潜部，占领南宁。为了更好地统一指挥作战，李、黄在南宁将“定桂军”和“讨贼军”联合组成“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部”，李宗仁任总指挥，黄绍竑任副总指挥，白崇禧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下辖定桂、讨贼两军指挥部，夏威任讨贼军第三纵队司令。

9月，夏威在白崇禧指挥下，率部向柳州进攻，消灭陆荣廷的战将韩彩凤部。与此同时，盘踞龙州、百色之敌，也相继被定桂讨贼联军所击溃。陆荣廷见大势已去，乃宣布下野。11月，孙中山将“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部”改组为“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公署”，李宗仁任督办，黄绍竑任会办，白崇禧任参谋长，所部编为两个军，李宗仁兼第一军军长，黄绍竑兼第二军军长。夏威任第二军第三纵队司令。

1925年1月，李宗仁、黄绍竑在驻梧粤军第一师第二旅陈济棠的合作下，分兵三路向沈鸿英部进攻，激战三个月，

将沈军全部歼灭，统一了整个广西。1926年3月，广州国民政府又将广西督办公署的两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黄绍竑任党代表，白崇禧任参谋长，下辖九个旅，夏威任第六旅旅长，后继白崇禧任第一旅长。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第七军抽四个旅约二万余人，由李宗仁率领入湘，分两路作战，夏威与胡宗铎分任第一和第二路指挥官。后第七军出征部队改编为三个师，夏威任第七军第一师师长。7月11日，北伐军占领长沙后，夏威指挥第一路军强渡汨罗江，进占浯口，循岑川、长安桥，进至北港。然后又越崇阳、咸宁，直趋贺胜桥。8月30日，第七军及第四军与北军吴佩孚的精锐部队刘玉春、陈嘉谟等师，激战于贺胜桥一带，夏威部在余花坪击溃自金牛来敌，并尾追至鄂城，将敌宋大霈残部缴械，俘虏其参谋长聂洗，占领鄂城。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节节胜利时，蒋介石进攻南昌却被北军孙传芳打败，9月10日他调第七军赴赣增援。在武宁县箬溪，夏威与胡宗铎部与孙传芳之精锐谢鸿勋师大战，将谢师包围，歼敌于修水河中。随后，夏威又率军向南浔路中心的德安进军，与孙传芳部的段承泽、陈光祖、李俊义等师三四万人激战，10月3日占领德安。德安之敌溃败后，江北的陈调元、王普部又突然南渡，袭取箬溪附近的王家铺，威胁第七军之背。12日，夏威与胡宗铎部在李宗仁的指挥下，以快速、猛烈、出其不意的作战方法，回击王家铺。13日，将敌三万人全部击溃，获得了三战三捷的战果。11月，北伐军占领了九江、南昌，第七军奉命陈师鄂东。

1927年2月，北伐军向长江下游挺进，夏威随第七军担

任中路江左军，沿长江北岸进攻安徽，3月初进驻安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又奉调进驻南京，负责监视沪宁路上“不稳”的部队，积极配合蒋介石清党。

南京蒋记国民政府成立后，宁汉分裂。东线各军分三路继续“北伐”。夏威任第三路第二纵队指挥官。5月13日，大破直鲁联军于柘皋，16日，在合肥东北梁园又击溃马济的白俄骑兵千余人。6月2日，攻下徐州，夏威升任第七军副军长，胡宗铎也升任第十五军副军长。两路指挥官名义，至此取消。

这时，武汉的唐生智秣马厉兵，准备东征讨伐蒋介石。

7月初，第七军奉命撤往芜湖以西布防。直鲁军乘机全力反攻，24日攻占徐州，8月中旬占领浦口，以重炮轰击南京狮子山炮台。19日，南京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三路大军南撤，防守长江。第七军负责乌龙山以西、东西梁山以东长江中段的防务。8月25日，孙军偷渡长江，占领了乌龙山炮台和栖霞山阵地。夏威率领第七军向孙军逆袭，夺回所失炮台和阵地。

在栖霞山战斗激烈进行时，直鲁军又攻陷了沪宁路上的龙潭车站一带，孙传芳亲自渡过长江，坐镇龙潭水泥厂督战，他破釜沉舟，背水为阵，志在必胜。8月30日，夏威率领第七军与十九军、第一军，会攻龙潭，与敌恶战七昼夜，将孙军驱至长江岸边，全部包围缴械，共歼敌六万余人，孙传芳仅以身免，逃回江北。此役后，夏威升任第七军军长。10月，被任命为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在南京政府与孙传芳部激烈交兵时，唐生智的东征军乘

机分江左、江右两路东下，占领了安庆、芜湖，准备进攻南京。10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又决定分兵三路讨唐，夏威的第七军奉命担任第三路，沿长江北岸西进。10月25日克安庆。11月8日破蕲春。15日占领武汉。唐生智兵败下野，其残部退往湖南。1928年1月，夏威部在白崇禧指挥下，尾追入湘，27日攻克长沙。唐部接受改编，两湖遂为桂系所占有。李宗仁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驻节武汉，夏威的第七军、陶钧的第十八军、胡宗铎的第十九军为其基干队伍。

1929年3月，蒋桂战争时，蒋介石收买夏威所部第一师师长李明瑞和第二师副师长杨腾辉在阵前倒戈。夏威此时沉湎于酒色，对李、杨的动向一无所知。4月3日，当李、杨在前线倒戈时，他和胡宗铎、陶钧惊慌失措，将部队撤往鄂西，使蒋介石“兵不血刃”而定武汉。7日，蒋介石以张发奎、朱绍良分任第一和第二追击司令，向荆沙追击。4月21日，夏、胡、陶联合通电下野，夏乘英轮逃往香港。鄂西桂军尽为张、朱二人缴械收编。

1931年，李宗仁、白崇禧重整桂局，李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任副司令，黄旭初为省主席。次年，夏威从港归来，初任南宁军校校长，后任第十五军副军长（白崇禧兼军长），驻梧州。1933年，夏威升任第十五军军长。但军中人事安排，仍由白崇禧一手控制。

1934年冬，红军长征经过广西，夏威亲率第十五军进行堵截，又率所部第四十三师尾追红军。1936年，第十五军奉命回驻梧州，后移驻南宁，担任南宁、梧州、百色、天保、

龙州五区的防务。1936年广西部队再度改用南京政府的统一番号时，夏任陆军第四十八军军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宗仁、白崇禧率军北上抗日，夏威留守广西，并代理广西绥靖主任。1939年，第十六集团军成立，夏威任集团军总司令，设司令部于贵县，以韦云淞的三十一军驻防玉林五属，以何宣的四十六军驻防北海至南宁一带，其中以黄固的新十九师驻钦县防城，向钦州湾海面警戒，以保卫广西的南大门。11月15日，日军从龙门港登陆，连陷防城、钦县。新十九师被打得措手不及，向后溃退，其他各部也不战而退。11月23日，日军攻陷南宁，随后又占领了昆仑关和高峰坳。第十六集团军总部和三十一军退至武鸣，第四十六军退至邕钦公路西侧。昆仑关会战时，白崇禧以桂林行营主任担任全局指挥，他为了保存桂系实力，尽量使用非桂系部队作战，而第十六集团军只担任助攻任务，在武鸣和邕钦路西侧打些“风流仗”，致使会战失败。

1944年9月，日军沿湘桂路第二次进犯广西，蒋介石令第四战区司令官张发奎确保桂柳，并派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来广西指导会战，要求坚守桂林三个月。当时，第四战区所辖部队，只有夏威的第十六集团军驻扎在桂林、柳州一带，军部设在永福县，张发奎即决定以第十六集团军的两个军全力防守桂林。但夏威和白崇禧为保存桂系实力，将部队调到外围，避开敌锋，只留下三十一军的一三一师和四十六军的一七〇师等少数部队，与敌人正面作战。11月1日，日军进攻桂林，一三一师和一七〇师官兵孤军奋战，牺牲惨重，11月10日桂林失陷。日军继续进攻柳州时，夏威不战而退，率部

向黔桂铁路以西逃跑。1945年3月部队改编，蒋介石命令撤销第十六集团军及三十一军，第四战区改为第二方面军，夏威调任第二方面军副司令。5月，夏威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1946年，蒋介石为准备打内战，在全国设立绥靖区，调夏威任第八绥靖区司令官，统率新桂系在安徽的部队，并有权指挥皖东、皖北和皖中各专员、县长。1948年8月，夏威继李品仙任安徽省主席。他积极推行白崇禧的所谓党政军民一元化的“总体战”。在军事方面，他强化地方自卫团队，在各县设副县长，专管军事训练、登记民枪、修筑碉堡及交通网，进行清乡；在政治方面，实行所谓新政，提出“求安、求均、求富、求教（普及国民教育）”的施政方针，和“尚廉、尚能、尚新、尚实”四大作风，以强化其反动统治；在经济方面，提出所谓“三公政策”和“八有主张”，即“田地公耕，商业公营，银行公有”，从而达到“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车坐，人人有书读，人人有医药，人人有娱乐”^①，以欺骗人民群众。9月，夏威兼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解放皖北广大地区，并渡过淮河向长江北岸挺进。夏威将省府从合肥迁到安庆。他把两个保安旅合编为一个正规军即一二六军，以保安副司令张湘泽为军长，又将一二六军与原桂系的四十六军，合编为第十兵团，自兼兵团司令，与人民解放军相对抗。中国共产党提出八项和谈条件时，他说：“事到如今，和是要和的，不和怎么办呢？现在国民党腐化了，所以共产党能打倒我们。等一个

时期，共产党腐化了，我们又来打倒他们”^②。3月，淮河两岸全部解放，人民解放军进逼安庆，夏威辞去安徽省主席职，到武汉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与白崇禧一道，率领国民党华中部队（桂系），在鄂、赣、湘、桂战场上，继续与人民解放军对抗。在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国民党华中各部队节节败退。9月，退至湖南的衡阳、宝庆一带。白崇禧在衡阳召开军事会议，部分将领主张反攻长沙，与人民解放军决战，夏威极力反对，主张退回广西固守。人民解放军向衡宝之敌猛攻，歼灭了桂系主力三万余人，桂系残部10月16日退回桂林。夏威不满地说：“如果当时按照我的计划，就不致有衡宝之战，也不致遭到巨大的损失。”^③11月20日，夏威与白崇禧逃往柳州，24日，又逃往南宁。12月2日下午，当人民解放军逼近南宁时，夏威与白崇禧、李品仙等人，在暮色苍茫中飞往海南岛。以后，夏威转香港定居，1975年1月3日，因车祸身亡。

注：

- ① 韦晓萍：《夏煦苍与新安徽》，《广西日报》（南宁版）1948年12月1日。
- ② 曾佩涵：《新桂系军阀夏威反动言行点滴》，广西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未刊稿。
- ③ 张文鸿：《白崇禧败回广西后的慌乱情形和华中部队被歼经过》，《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廖 磊

莫凤欣

廖磊，字燕农，广西陆川县人，生于1890年2月20日（清光绪十六年二月初二）^①。其父廖章甫，务农，农闲时帮人挑盐。廖磊幼年家贫，仅读过三年私塾。1906年，廖十六岁，到桂林考入广西陆军小学堂第二期。1911年陆军小学毕业后即转入湖北陆军第三中学第二期学习。是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军校学生响应，廖磊曾参加与清军作战，上臂负伤不退。1913年入陆军第一预备学校。1914年秋，廖磊升入保定军校步兵科第二期，1916年6月毕业，分配到湖南省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三团三营（营长唐生智）三连任中尉连附。1917年，廖磊跟随唐生智到湖南醴陵一带参与护法战争，升为连长。1918年，北洋军王汝贤、范国璋部进犯湖南，湘军反击，廖磊升为营长。1920年又升任第三团团长，率领全团从衡州（今衡阳）出兵，攻占宝庆、永丰等地，直达岳州，大败北洋军阀张敬尧部。

1926年初，湖南人民掀起讨伐吴佩孚、驱逐赵恒惕运动，3月上旬赵通电辞职，以唐生智代理省长。6月初，唐生智接受广东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廖磊则升任第八军第四师副师长。是年7月，北伐开始，国民革命军占领湖南长沙后，廖磊在唐生智指挥下，沿着粤汉铁路北

上向湖北推进，与友军配合，在汉阳、武胜诸役击败北洋军。10月上旬，攻占武汉后，以第八军扩编为第八、第三十五和第三十六军，廖磊升任刘兴第三十六军的第一师师长^②。

1927年“四一二”后“宁汉分裂”，唐生智为了扩大地盘，于8月间组织东征军，从武汉沿江东进，廖磊的第一师在刘兴指挥下，进至安徽当涂县。10月中旬，南京政府的西征军向唐部进攻，双方在安徽交战，廖部在兰溪地区被击败。唐生智因前敌战败，后方军队不听调遣，于11月12日通电下野，所部由李品仙、何键、刘兴率领撤往湖南。1928年初，白崇禧军攻占湖南后，刘兴辞去军职，由廖磊继任第三十六军军长。唐部为桂系改编，开赴湖北整训。

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发动对奉系战争。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在白崇禧率领下，李品仙、叶琪、廖磊等部沿京汉铁路北上。5月，廖磊的第三十六军进入河北。6月，与友军配合进占北京，又在滦东一带击败直鲁军张宗昌残部，其后廖磊部驻防唐山。

1929年1月，南京政府编遣军队，第三十六军缩编为第五十三师，廖磊改任师长，仍驻唐山。其时，白崇禧与廖磊常相来往，对廖比较信任。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派人策动李品仙、廖磊等人叛离白崇禧。当时，从唐山到天津沿线，均为廖磊所属部队驻守。白崇禧得知情势危急，秘密去唐山找廖磊。随后，廖磊亲自护送白崇禧到塘沽港，乘搭日本轮船经香港

逃回广西。廖磊也因同情白崇禧和不满蒋介石所为，辞去军职，到香港居住。

是年冬，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重新回到广西，组织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部。1930年初，廖磊应白崇禧的邀请，从香港回广西，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2月，廖磊协助白崇禧将进犯平乐亲蒋的朱绍良部击溃。这时，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李宗仁通电响应。3月，护党救国军改名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廖磊任第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5月，中原大战爆发，第一方面军除留少数驻守南宁外，全部进入湖南。6月，桂军败退广西。7月，桂系在柳州整编军队，廖磊仍任第七军副军长兼二十一师长。不久滇军侵犯广西，围攻南宁，形势危急。这时，廖磊建议先解南宁之围，然后安定全省，白崇禧采纳此议，指挥桂系各军驰援南宁，在长堙岭、高峰一带大败滇军。之后，又把进入广西的粤军驱逐出境，广西全境回到桂系控制之下。1931年1月，廖磊升任第七军军长，驻守柳州。

1929年底和1930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先后爆发，成立了红七军和红八军。1930年秋，红军主力奉命北上，留韦拔群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1931年春，廖磊奉白崇禧之命，于4月率军围攻东兰、凤山等右江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军民顽强战斗，迫使廖磊的部队退回柳州。1932年7月，廖磊第二次率领军队围攻东兰，将根据地西山附近纵横三四百里的垌场重重包围，逐山搜索^③。红军机智灵活，化整为零，与敌周旋。廖部搜索了两个多月，毫无所得。9月，白崇禧、叶琪亲临东兰与廖磊计议，决定“悬赏

东毫一万元缉拿韦拔群”^④。因叛徒出卖，韦拔群为敌所获，壮烈牺牲。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惨遭杀害，右江革命暂受挫折。

1933年2月10日，兴安、灌阳、全州、龙胜一带爆发了瑶民武装斗争，起义军提出“杀财主佬，杀官兵”的口号^⑤，震动了李、白的统治。廖磊奉白崇禧之命，率军镇压。一方面命令第十九师副师长陈恩元和师长周祖晃，先后领兵四万之众到兴安、全州、灌阳等地围攻起义军。同时还派桂林民团区参谋长虞世熙率领民团开进龙胜堵防。另一方面，请求派三架飞机散发传单，分化瓦解起义队伍。廖磊则坐镇桂林指挥。3月4日，廖磊亲临兴安督战。由于众寡悬殊，3月25日，起义军被廖磊镇压下去。

1934年秋，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电告李宗仁、白崇禧，要桂军协助夹击红军。李、白决定派廖磊负责桂北全线的阻击。廖急调周祖晃赴恭城龙虎关、灌阳永安关、雷公关一带及兴安、全州布防，并调桂北各县民团协助防守，企图防堵红军进入广西。是年9月，萧克率领红六军团从湖南进入广西清水关，击退周祖晃、陈恩元部桂军的阻截，进入灌阳文市，经石塘、界首，向兴安唐家市前进。廖磊急忙派兵到兴安唐家市阻击。红军机智灵活，很快就进入资源。廖磊部队尾追不舍，但红军已到达贵州。这时廖磊又亲自率第二十四师和独立团赶到贵州，企图截击红军，结果也落空了。11月，中央红军逼近湘桂边境，廖磊在贵州闻讯，立即出动十个团兵力，分别在桂林、兴安、灌阳等地防堵，均被红军击溃。红军很快越过广西，经湖南进入贵州，廖磊的堵击以

失败而告终。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开始。廖磊奉命北上抗日。9月16日，廖被任命为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七军军长，率领第七军、四十八军到达第五战区参战。10月19日，廖磊升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四十八军军长，率部开赴淞沪战场，在陈家行、蕴藻浜等地抗击日本侵略军。之后，大场危急，廖磊率部增援，与日军激战一星期，廖部伤亡惨重，奉命退往浙西，收容整顿。1938年春，奉命移师入安徽。4月，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威逼徐州，廖磊奉命开赴淮北，驻守宿县，挫败南路来犯日军。当日军进犯武汉，廖部又开赴湖北麻城一带，从侧面袭击敌人。同年秋，武汉失守后，廖磊奉命留守大别山地区，9月任安徽省主席，10月任豫、鄂、皖边区游击兵团总司令。廖磊主皖之后，曾致力于本省战时的军政建设。11月，在立煌开办政治军事干部训练班，廖自兼班主任。还招收知识青年受训，每期二三个月，结业后派充县长、区长、乡长、联保主任等职，并令调省、县政府工作人员分期分批训练，以加强全省各级政权的掌握。

抗战初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廖磊与新四军曾一度合作，邀请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到干训班讲演，宣传抗日。当国民党当局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时候，廖磊的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受到国民党CC分子和新桂系内一些高级将领的责难^⑥。廖磊本已患有高血压症，加上受了各方面的刺激，竟至一病不起，于1939年10月23日因脑溢血去世。

注：

- ① 廖磊出生于“民元前二十二年二月初二”，应为公元1890年2月20日。
- ② 《廖磊将军事略》，载《廖主席言论集》，1939年12月，中原出版社。
- ③ 《东兰痛史》，1962年广西区档案馆据民国间稿本铅印。
- ④ 沈治：《1932年秋廖磊第二次率部进犯东兰凤山和谋害韦拔群同志的经过》，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
- ⑤ 谢祖萃：《绥靖兴全灌龙瑶变始末》，民国广西省民政厅秘书处印。
- ⑥ 苏民：《新桂系与CC在安徽的矛盾和斗争》，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第79—80页。

孙 渡

杨光斗

孙渡，字志舟。1898年5月5日（清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五日）出生在云南省陆良县。父亲孙绍，是陆良县有名的大绅士。孙渡少时在家乡读小学，1915年入昆明进云南陆军讲武堂步兵科，1917年毕业后，到滇军警卫二团任排长。几年间，追随唐继尧出兵川、黔，历任连长、营长。1922年3月，唐继尧重返昆明，孙渡升为滇军直属独立团团长。

1923年，孙渡奉调随滇中镇守使胡若愚出征四川，联合川军熊克武、石青阳等攻打川黔军刘湘、杨森、袁祖铭部，10月占领重庆。12月，重庆复为川黔军所占，胡军败退贵州，驻防遵义、毕节。

孙渡旋升任滇军张汝骥部旅长兼贵州省警务处长、云南省政府委员。1924年下半年回滇，调任云南烟酒公卖总局局长。不久又任云南省宪兵司令官。1927年2月，昆明、蒙自、昭通、大理四镇守使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联合倒唐，孙渡潜逃滇西，投奔唐继尧残部。6月，爆发了胡、张与龙云争夺云南政权的战争。7月，孙渡见唐军大势已去，又投奔龙部卢汉，随卢汉反攻昆明获得胜利，又诱迫胡、张等释放了龙云，从而成了龙的左右手。在之后两年的军阀混战中，孙帮助龙云打败了胡若愚、张汝骥部及其他反

对势力，统一了云南。1929年到1930年间任云南省团务总局会办。

1930年5月，蒋、桂、冯、阎大混战时，蒋介石派龙云为讨逆军第十路军总指挥，令其出兵广西，抄袭桂军李宗仁后路。龙云派卢汉为前敌总指挥，统帅三个步兵师二万余人进兵广西。孙渡为九十八师第三旅旅长。部队从昆明出发，沿途不断抓兵派款，抽收烟税，军纪败坏，被老百姓称为“三杆枪”军队（即携有步枪、大烟枪、水烟枪）。7月，进迫南宁，围城三月余，未能攻占。10月，张发奎部和桂军在白崇禧指挥下，从柳州出发，解南宁围，并与南宁守军内外夹攻，大败滇军。龙云、卢汉率部经田州（今属田阳县）、百色，撤至乐里（今属田林县）集中，并乘机将部队整编，裁并庞杂腐败的滇军，1931年2月开拔回云南。

3月，孙渡升任龙云的参谋长，卢汉、朱旭、张凤春、张冲四师长请求龙云安置编余官兵，并发给饷糈。龙云既吝不给钱，又不给官，激起编余官兵的不满。各师长认为是孙渡等人在龙云左右梗阻。孙又建议龙云废除师旅建制，以团为单位，划全省为若干绥靖区，以各师长为绥靖区主任。各师长恐失去兵权，乘龙云召集他们到昆明开会之际，联合向龙云进行兵谏，并将孙渡放逐到上海。后因内部发生分裂，他们反而被龙云扣押。不久，孙渡返回昆明，仍任参谋长。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时，蒋介石令龙云为“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命孙渡为第三纵队司令，到川、黔、滇边界防堵红军。孙渡认为蒋介石怀有一箭双雕的野心，不仅想消灭红军，而且还想乘便消灭地方武装。

如果红军进入云南，则中央军必跟踪而至，云南政局便有发生变化的可能。他建议，在红军未进入云南以前，应尽最大努力去防堵，若红军进入云南，则追而不堵，将红军尽快赶出境外。孙渡的意见得到了龙云的赞赏，又命孙渡兼第二路军总指挥部行营主任，负指挥全责。

1935年2月，红军由云南镇雄回师东进，云南部队也随之进入贵州毕节、大方、黔西一带布防。3月下旬，蒋介石飞抵贵阳，通令各军由他直接指挥，并调来大批中央军和飞机。红军佯攻贵阳时，蒋调孙渡前往保驾。孙渡率部昼夜兼程，提前赶到，受到蒋介石的嘉奖，被授予中将军衔并得奖金三万。由于红军行动神速，灵活多变，孙渡纵队调动十分频繁，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先后在安顺、贵阳、龙里、毕节、黔西、打鼓新场及川黔边境、赤水河畔、黔西南等地往返奔命，防堵不成，反遭红军袭击。

4月下旬，红军从黔西南经兴义进入云南，孙渡军一直尾追不舍，5月中旬，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西康，才停止追击。

1936年3月，蒋介石委任龙云为黔滇绥靖公署主任，龙仍派孙渡率第三纵队开到贵州威宁、云南昭通、彝良一带尾追长征的红军二、六军团。

3月下旬，红二、六军团挺进滇东北，插入宣威县境，孙渡纵队尾追红军到宣威。红六军团萧克曾写信给孙渡，建议双方缔结抗日停战协定，但孙渡置之不理，继续尾追，在宣威来宾铺一带发起猛攻，红军伤亡数百名。随后经过两天激战，红军毙俘滇军近千人，从此孙渡不敢单独再与红军

正面交锋。

4月，红二、六军团突破滇军防线向西挺进，直指普渡河。孙渡纵队尾追不舍，被红二、六军团打得七零八落。红军渡过金沙江，孙渡纵队才停止尾追。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7月，龙云在云南新编五十八军，任命孙渡为军长，开赴湖北。11月，该部与云南部队第六十军、新编第三军合编，成立第三十军团，在第一兵团总司令张发奎指挥下，参加武汉会战与崇阳战役，部队牺牲惨重。12月，第三十军团改编为第一集团军，划归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指挥。

1939年2月，日军侵入江西，进攻南昌。第一集团军开赴江西奉新、靖安、安义，和友军配合与日军激战，伤亡惨重，弃守南昌。接着，日军向奉新、高安西南进犯，与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作战。第一集团军奉命驰援，在潦河南岸、大禾岭、白塔路、上龙岗、新形山一带与日军激战五昼夜。4月，赣北战局转稳，蒋介石严令罗卓英全力反攻南昌。第一集团军奉令在靖安、安义、奉新一线与日军作战，截断日军后方联络。由于敌我装备悬殊及指挥不力，反攻未能奏效。7月，薛岳下令发动赣北秋季攻势，孙渡所部奉命进攻雷王殿，未克。9、10月间，华中日军向第九战区发动第一次长沙会战，薛岳为确保战区第一线侧背安全，命第一集团军立令孙渡率五十八军到江西宜丰、高安间之杨公圩、村前街一带与日军作战。此役重创敌军，长沙会战告捷。在此期间，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高荫槐请假回滇，由孙渡代职。11月，第一集团军调往奉新、高安等地与

日军作战二十余日。

1940年上半年，孙渡率第一集团军在江西潦河南北两岸袭击日军，破坏敌军交通联络。5月底，日军被逼撤退，我军收复奉新等地。6月，第一集团军调离江西。9月，六十军调回云南，五十八军和新三军移驻湖北通城一带整补。1941年5月，又回防江西上高等地。同年8月下旬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和12月中下旬的第三次长沙会战，孙部五十八军都参加了作战。

1942年，日军纠集五个师团的兵力与赣中之敌合力出击，企图打通浙赣线。孙渡奉命率部参加赣东会战，与日军转战于临川、崇仁、丰城之间。9月，调驻分宜、宜春整训。1944年5月，孙部五十八军参加了湖南长衡会战。12月，奉命赴江西宁冈、遂川、新城一带堵截敌军。战后，就地休整，不久调驻安福、永新。

1945年初，孙渡升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调驻安庆。从此，受蒋介石的拉拢与分化，逐步脱离了龙云、卢汉的控制。

抗战胜利后，孙渡第一集团军总部由安庆移往东北锦州，参加反共反人民内战，孙渡任第六兵团司令兼东北“剿总”副司令，辖六十军、九十三军。

在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形势下，云南军队人心惶惶，士气低沉，一些高级军官纷纷逃回云南，军队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孙渡无力控制。加上第六兵团部武装包庇走私，蒋介石便以影响军誉为由，于1948年2月将孙渡调任热河省主席，以卢浚泉为第六兵团司令。

1949年12月初，蒋介石妄图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令孙渡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派他回云南活动。

孙渡回到云南，眼看全国即将解放，思想处于矛盾惶惑之中。他曾经和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有接触，也读过一些进步书刊，但又不愿投向人民。云南和平解放后，他到昆明郊区潜藏了两年。1952年，清匪反霸运动中被捕。

1959年孙渡经人民政府大赦释放，其后任云南省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和第三届委员。1967年4月在昆明病故。

盛世才

陈宁生

盛世才，字晋庸，原名振甲，字德三。生于1897年1月8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六），辽宁省开原县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属汉军旗人。早年在西丰县小学、沈阳农林中学读书。后考入上海中国公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1917年得到亲友资助，留学日本，进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盛世才受留日东北学生同乡会推举，返沪参加爱国活动。同年考入韶关讲武堂，盛在讲武堂期间，与该校教官郭松龄过从甚密。毕业后，随郭返奉，在郭任旅长的奉军第八旅担任排长、中尉连副等职。后升为东三省镇威上将军府警卫团上尉连长、中校参谋。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锐意整军，选派少壮军官出国深造。1924年，盛世才由郭松龄推荐保送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军事。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邀盛参与其事，盛乃归国，在其部任营长。郭松龄兵败身亡，盛即仓惶返日，后被张作霖取消官费留学资格。

1927年盛世才回国，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兼中央军校附设军官团欧洲战史教官。1929年至1930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上校作战科长。盛不甘任此闲职，多方谋求升迁。恰逢新疆督办公署秘书长鲁

效祖在沪、宁延揽军事人才，盛设法与之结识。1930年秋，受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之聘入新。经过辽宁时，对其密友赵铁鸣说：“此行乃破釜沉舟之举，有进无退，吾必远到边疆另创一局面，将来或作一东亚红军总司令亦未可知。”^①

盛世才初到新疆时，由于金树仁素对南京参谋本部的军官怀有戒心，只委盛为督办公署参谋处中校参谋、上校参谋主任等闲职。盛初来新疆，人地生疏，唯金之命是从，博得了金树仁的好感。不久，被委兼任军校战术总教官。盛以当时先进的军事技术教育学生，颇受学生欢迎。他即以军校为基础，培植个人势力。

1931年2月，新疆省政府对哈密维王领地实行“改土归流”，引起民变，维族上层人士、哈密王府侍卫队排长和加尼牙孜、哈密王府大都统尧乐博斯乘机率众暴动，是为哈密事件^②。同年5月，甘肃地方军阀马仲英部应和加尼牙孜之请，率骑兵入新，直趋哈密，威逼迪化（今乌鲁木齐）。新疆南、北各地维、回人民也纷起暴动。金树仁派鲁效祖为总司令，盛世才为参谋长，开赴哈密，迎击马仲英，结果大败。金树仁又改派伊犁屯垦使张培元为前敌剿匪总司令，仍委盛世才为参谋长，联合以巴品古特为团长的白俄“归化军”^③，驰援哈密。9月，马仲英部失败，退回甘肃，和加尼牙孜率众退入八大石山。

马仲英部退回甘肃后，得陕西省主席、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扶持，改编为新编第三十六师，马仲英任师长。他派遣部将马世明、马占仓再次窜入南疆，与和加尼牙孜取得联络，以图再战。1932年春，和氏袭击哈密，同年7月，金

树仁提升盛世才为东路剿匪总指挥，统率“归化军”，往剿和部。经过大小四十余次激战，攻破八大石山，摧毁和部主要根据地，迫和氏逃亡外蒙。8月，和加尼牙孜在得到外蒙一批军械援助后，又潜回南疆，与马世明相策应，进占鄯善、吐鲁番，南疆告急。盛世才奉命南征，迅速夺回鄯、吐两地，迫使和、马联军败走焉耆。

1933年1月，马世明等纠集维、回等族民众数万人，绕天山小道，攻陷迪化之咽喉要地达坂城，于旧历除夕，围攻省城。盛世才又挥师北上，在六道湾与马军遭遇，马军败走，遂解迪化之围。在连续两年战乱中，盛世才在军事方面崭露头角。

1933年春，战事虽暂趋缓和，但是，迪化城内粮煤恐慌，居民啼饥号寒；加上金树仁兄弟趁战乱屯积居奇，高抬物价，投机倒把，大发横财，更使民怨沸腾，金树仁政权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是年4月12日，迪化县县长陶明樾、督办公署参谋长陈中等人密谋倒金，策动驻迪化南关的白俄归化军攻占了督办公署，金树仁逃走。晚间举事诸人在归化军指挥部邀集省府官员和当地士绅开会，成立临时维持委员会和临时军事委员会，推举原教育厅长刘文龙为临时省政府主席，因在东北抗日退入苏联、归国后滞留迪化的原黑龙江救国军第十五旅旅长郑润成为临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是为“第一次新变”。

政变发生之时，盛世才部正驻防乌拉拜（迪化西三十里）。金树仁命令他火速回城平乱；而同时，陈中也星夜赶至盛驻地，请他支持政变。这时，盛世才举足轻重。他决定

倒戈反金，以便伺机取金树仁之地位而代之。13日晨，正当金树仁调集军队进行反攻，归化军眼看招架不住之际，盛世才率部赶到，与郑润成部联合，在“一炮成功”（地名）击溃金军，金树仁仓皇西逃昌吉。14日，盛世才率队凯旋入城，随即参加临时维持委员会和临时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他命令所部包围会场，在高处架起机枪，以武力胁迫联席会议推举他为新疆省临时边防督办。随后他发表就职通电，宣布施政纲领八条：实行民族平等；保障信教自由；澄清吏治；改良司法；整理财政；实施农村救济；扩充教育；推行自治^④，藉以安定人心。迪化各阶层人民，对盛世才寄予很大的希望，他们在4月22日，破天荒地举行了一次游行集会，表示对盛世才新政府的拥护。

这时，马仲英部又重整旗鼓，挥兵西进，6月14日，盛、马两军激战于阜康、孚远间的紫泥泉。结果，马军大败，向天山南路逃窜。

南京国民党政府久欲直接控制新疆，但鞭长莫及，乃趁新疆内乱未息，遣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入新“宣慰”，以图伺机取而代之。黄在督办公署院内，设立宣慰使署，同迪化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并提出废除督办制，改设军事委员会新疆分会，欲邀郑润成等东北军将领参与军政工作。“第一次事变”的发动者陈中、李笑天、陶明樾等各怀己志，亦力主废除督办制。盛世才见黄等的活动威胁他的既得权位，便舍弃马仲英不予追究，于6月25日匆匆回师。6月26日，盛世才在督办公署东花园设宴庆祝胜利，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将陈中等三人枪杀。接着，又故作姿态，表示不恋居高位，欲

率部开赴塔城。临时省主席刘文龙深感自危，亦表示恳辞。与会者在震慑之余，对盛、刘表示慰留。是时黄慕松已陷软禁处境，只得电告南京国民党政府，请维持督办制。7月7日，南京国民党政府致电盛世才、刘文龙，表彰他们“维持秩序，巩固后方，平定叛乱之劳绩”；劝慰他们“万不可自生携贰，致隳前功”；要求他们“仰体中央意旨，共济时艰”^⑤。至是，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便得到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正式承认，黄慕松也得以解脱“人质”地位，于7月9日离开了新疆。是为“第二次新变”。

同年8月16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派外交兼司法部长罗文干入新视察。欲造成盛世才、伊犁屯垦使张培元和南疆马仲英的鼎足之势，使三方互相牵制，以利南京控制全疆。盛世才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于10月10日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指控马仲英，“煽惑省军哗变”，“勾结回匪二千余人，分扰西路”；声称要“率师出发，以张讨伐”^⑥。10月14日，盛军进攻达坂城。盛、马之战再起。盛世才又委派和加尼牙孜为南路警备司令，以孤立马仲英。马军势孤力单，由吐鲁番退守哈密。

11月，盛世才又以临阵脱逃的罪名，将郑润成和东北义勇军将领二十余人逮捕（后均被秘密处死），将省长刘文龙软禁，捧出已是高龄的老官僚朱瑞璜为省主席，这样，新疆的军政大权，实际上操于他一人之手。

12月，张培元与马仲英相策应，两面夹击，兵临迪化近郊。盛世才派外交处长陈德立、航空队长姚雄赴苏联请求出兵援助。苏联红军分由霍尔果斯和塔城两路进疆，次年1月

26日张培元兵败自杀，马仲英部逃往喀什。马仲英后来偕其幕僚亡命苏联，余部由其部将马虎山率领，退驻和阗。盛世才曾请求苏联红军派一加强团进驻星星峡，以控制内地入新的门户。

和阗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穆罕默德·伊敏和沙比提大毛拉，趁盛世才、马仲英激战无暇南顾的时机，于1933年6月8日在墨玉县暴动，继而勾结和加尼牙孜于11月12日成立“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教共和国”，以和加尼牙孜为总统，沙比提为国务总理，定喀什为首都。“他们抵制马虎山部进入和阗，被马虎山击败。和加尼牙孜为保全自身，亲自将沙比提押送给盛世才，盛遂委和氏为新疆省副主席。盛世才利用反对派之间的矛盾，不费一兵一卒，借助马虎山消灭了南疆这支敌对势力。至此，除南疆尚有马虎山部与盛抗衡外，全疆基本统一。

1933年，中国共产党从北平、天津开始派遣党员到新疆开展工作。此时，盛世才刚拿到新疆政权，统治还不巩固，特别是新疆经过三年战乱，经济崩溃，民不聊生，他为了巩固统治，不得不采取对外联苏、对内联共的政策。从1934年9月开始，盛世才即派财政厅长胡寿康和苏联国外贸易公司理事长商洽向苏联借款。1935年5月，以新疆土产公司名义同苏联驻新贸易公司签订了五百万金卢布借款合同^①，后来又向苏联续借了二百万金卢布。1936年和苏联签订了“聘请苏联专家待遇合同”，于是大批苏联顾问、专家来到新疆。与此同时，为了取得苏联的援助和换取各族人民的支持，盛世才提出“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

设”六大政策，标榜“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依据的”，是“发展新经济、创造新政治、发展新文化的正确方针”^③，并悬挂自制的六星旗。盛世才执政初期，推行“六大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盛世才执政后曾在苏联保安机关的帮助下，建立了一整套秘密警察机构，监视各级官员和各族人士的言行。他凭着主观臆断、或者捕风捉影，非法逮捕、刑讯、甚至杀戮一切可疑的人。1937年，盛世才又先后剪除了哈镇警备司令尧乐博斯、喀什警备副司令麻木提等几支地方民族势力；10月，最后消灭了盘踞南疆的马虎山；接着，编造了一起所谓“阴谋暴动案”，捕杀了以省政府副主席和加尼牙孜为首的民族上层人物。至此，盛世才最后完成了对全疆的独裁统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新疆的战略地位愈益重要。盛世才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8年，中共中央在迪化设立了八路军驻新办事处，派遣一批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进入新疆。对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新疆成为重要的抗日后方基地。

盛世才凭借新疆的特殊战略地位，依靠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1938年8月，他曾去莫斯科进谒斯大林，当面要求加入苏联共产党，并提出把新疆变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斯大林当即婉言拒绝，仅赠与元帅指挥刀一柄以示鼓励。盛于9月回到迪化，对其莫斯科之行大吹大擂，借以抬高自己的地位。盛妄图与国、共两党并驾齐驱，宣称“六大政策和共产党、国民党合为中国三大政

治集团”，自封为“天才英明伟大领袖”，并且把自己的相片和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蒋介石、毛泽东并列，称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六大领袖。

1939年以后，盛世才随着权力欲不断增长，感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了他的独裁统治。1941年德国法西斯突然进攻苏联，使社会主义的苏联遭受严重的困难；同时，国民党反动派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接二连三地发动反共高潮，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善于见风使舵的盛世才以为苏联靠不住了，共产党靠不住了，企图另找靠山，逐渐走上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道路。

1941年，盛世才经过精心策划，制造了一起所谓“汪精卫系统的阴谋暴动案”，诬陷爱国民主人士、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是汉奸、托派，将他逮捕入狱，严刑逼供。被牵连入狱者达一千二百余人。著名文化人如张仲实、沈雁冰、赵丹等均遭到迫害。

蒋介石对盛世才的百般笼络，加快了盛公开反共的步骤。从1941年冬到1942年，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曾五次到迪化。1942年春，蒋发表盛世才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同年秋，宋美龄代表蒋介石赴新，对盛表示抚慰。1943年7月，国民党任命盛为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督办公署特别党部特派员、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主任、中央军校九分校主任，以及西北运输委员会副主席。盛踌躇满志，随即取消六大政策，并把六星旗改为青天白日旗，公开宣布反苏、反共。

1942年，盛世才制造了一起所谓“共产党阴谋暴动案”

作为投靠蒋介石的进见礼。他制造其四弟盛世骥被暗杀事件，无中生有地称之为“空前的带国际性的错综复杂的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并以此为由，在同年9月5日，通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命他撤走全部专家、顾问和驻星星峡的苏军。

9月17日，盛逮捕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李云扬、李宗林等中共驻新重要领导人，又陆续将在外区工作的中共党员及其家属押回迪化，拘留在八户梁招待所。1943年2月7日，他把在新全体中共党员投入监狱。9月27日，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秘密处死。还把杜重远案改为“共产党阴谋暴动案”，煞有介事也呈请国民党中央派员来新复审，最后并将杜重远毒死在监狱里。

1944年，苏联卫国战争节节胜利，德、意、日法西斯灭亡在即，国民党却在抗日战争中节节溃败，再加上国民党加紧对新疆的渗透与控制，同盛世才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盛世才遂故伎重演，制造了一起所谓“阴谋暴动案”，于8月11日深夜，把国民党要员黄如今、林继庸连同下属一千余人逮捕下狱，妄图再投靠苏联。对此，蒋介石立即派“中央军”入新，盛束手无策，只得听从国民党摆布。同年8月29日，国民党把盛调离新疆，改任农林部长。

盛世才统治新疆十一年，独裁专断，屡兴冤狱，对新疆各族人民实行残暴的法西斯统治。据统计，先后被监禁者近十万人，其中有五万人惨遭杀害。

1944年9月11日，盛世才满载在新疆搜刮的金银财物，在朱绍良、徐恩曾的护送下前往重庆。当时有一首童谣：“盛贼世才讲清廉，八十汽车没拉完，三架飞机还不算，二

千骆驼在后边。”9月18日，盛世才就任农林部长时，蒋介石曾亲临授印。但是，深受其害的新疆民众掀起讨盛浪潮，发布“新疆省全体民众讨盛檄文”，编写《盛世才祸新纪略》，迭向国民党政府控告盛的罪行。1945年，国民党政府撤去盛世才的农林部长职务，责成法院查办。但盛以重金行贿，此案不了了之。

抗战胜利后，盛世才一度任胡宗南武汉行辕高参。1949年，他随蒋介石集团逃往台湾，曾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盛一度经商，其后曾写有《如何顺利达成光复大陆的使命》、《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代的过去、民生世纪的来临》、《牧边琐忆》以及《新疆十年回忆录》，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诬蔑。

1970年7月13日，盛世才病死于台北。

注：

- ① 《盛世才祸新记》之二，油印本，周东郊编。
- ② 哈密维吾尔人的王，受封于清乾隆年间。1930年3月维王沙马克苏提逝世，金树仁乘机对维王领地实行“改土归流”，以废除哈密的农奴制度，但因处置不当，引起维族农民不满。1931年2月，哈密王府上层借小堡卡官强娶维女事件，挑起维民举行反政府暴动，是为哈密事件。
- ③ 哈密事件发生后，金树仁政府招募十月革命后逃往新疆的白俄（即归化人）组成军队，称为归化军。最初编为两个连，后扩充为两个团，团长是安东诺夫和巴品古特。1933年“四一二政变”前，又扩编成旅。
- ④ 《新疆纪游》第46页。
- ⑤ 《申报》1933年8月2日。
- ⑥ 《国闻周报》第10卷第41期。
- ⑦ 转引自孙福坤：《苏联掠夺新疆纪实》下册，第50页；又根据包尔汉：《盛世才在新疆》，包自称当年他是和苏联签订合同的全权代表。
- ⑧ 盛世才：《六大政策教程》。

吴克仁

姜克夫

吴克仁，字静山，满族，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出生于吉林省宁安县三道湾一个农民家庭。童年入乡塾受启蒙教育，民国成立后入县城高小和中学肄业。宁安地处国防前线的牡丹江流域，曾备受日、俄侵略者蹂躏之苦，吴克仁目击身受，壮怀激烈，遂立志弃文习武，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学习，毕业后分派皖系边防军服役。直皖战后被张作霖收编，从此进入奉军。因吴学术优良，在一、二次直奉战中屡立战功，先后由排长、连长升至营长。1925年被选派赴日本入炮兵学校深造，翌年学成回国，任东北讲武堂炮兵研究班主任兼炮兵教导队上校队长。1928年夏，张作霖于返奉途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出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后，着手整顿奉军，炮兵教导队改为炮兵教导团，吴克仁任团长，后又改任为东北炮兵第十八团团长。1930年张学良为提高东北炮兵素质，又派吴克仁赴法国考察炮兵，回国后升任东北讲武堂炮兵研究班少将教育长。吴精心治学，将在国外学到的炮兵战术传授给学员，为国家培训了大批炮兵指挥人才。1933年春，日军侵略热河，吴克仁被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一七师副师长，编入以王以哲为军长的第六十七军，参加长城抗战。

1934年春，张学良自欧回国，因在意大利期间受法西斯主义影响，高唱“拥护领袖”口号，接受蒋介石所委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职，调东北军南下“剿共”。吴克仁时任一一七师师长，率该师自北平清河镇进驻河南光山，对红二十五军作战。是年9月，红二十五军自鄂豫皖西撤，进入陕南，张学良奉蒋介石令，派王以哲率六十七军开赴陕南追击。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改委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督率王以哲等部进攻陕北，在榆林桥、直罗镇两次战斗中被红军歼灭了近三师之众。张学良既遭到红军的沉重打击，又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争取之下，认识逐步转变，终于在1936年4月在洛川与周恩来会谈，达成东北军与红军合作抗日的协定。此时吴克仁已升任六十七军副军长，随王以哲进驻延安，与参谋长赵镇藩共同协助王以哲执行张学良与红军达成的协定，负责对陕北红军输送弹药物资，保护红军人员来往的安全。东北军虽然是支军阀部队，但通过和红军的频繁接触，思想很快发生变化，许多爱国军官和广大士兵强烈要求停止内战，打回老家去。吴克仁痛感祖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为军人之耻，故1936年春即参加了张学良为首的东北爱国进步军官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

西安事变爆发后，王以哲留西安协助张学良处理军政大计，吴克仁则率六十七军移驻陇东平凉地区，监视蒋军朱绍良部的行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到南京，被蒋扣留，东北军内部因此发生混乱，王以哲竟被孙铭久等少壮派所杀。六十七军官兵闻耗，极为愤激，纷纷要

求进兵西安为王以哲报仇。吴克仁与王以哲友谊素笃，虽亦极悲痛，但为顾全大局，力予劝阻，使东北军避免了一场更大的自相残杀的灾难。

王以哲遇害后，吴克仁经西安抗日联军总部委为六十七军军长。1937年2月，东北军被迫调离陕甘，东移苏北、皖北和豫东地区。六十七军军部移驻界首，各部分驻阜阳、涡阳、沈丘等地。所辖五个师经过整编，合并为一〇七、一〇八两个乙种师。

六十七军整编甫毕，即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吴克仁当即率全军将士通电请缨。7月1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布动员令，东北军刘多荃、吴克仁两军皆在动员之列。吴克仁接到动员令后，即集结全军经商丘、徐州开赴沧州，接替自平津南撤的二十九军正面阵地。8月下旬，六十七军又奉命驰赴大城，接替二十九军王长海部，堵击由独流出动的日本侵略军。当时二十九军在西起姚马渡、中经马厂迄小卫庄一线构筑阵地防守，六十七军开到大城后，即在左翼姚马渡扼守拒敌。

当年夏季，我国北方大雨为灾，平地水深没膝，六十七军辗转跋涉，行军备极艰苦。但自“一二九”救亡运动后，中国共产党即派遣刘景希（谷牧）、杨西光等一批共产党员在该军开展工作，官兵都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开到前方后，中共东北特委又派于毅夫等人以东北救亡总会名义前去慰问、鼓动，故全军上下斗志昂扬。

8月21日，日军向津浦线发动新的攻势。吴克仁率六十七军对沿子牙河南下之日军中岛师团进行了顽强的阻击。但因

正面二十九军于9月11日向南撤退，六十七军亦不得不于16日放弃姚马渡，辗转经献县到达邯郸，拨归商震指挥，担任防守临洛关的任务。10月15日，日军土肥原师团猛攻临洛关，六十七军在敌军猛烈炮火攻击下，死伤惨重，渐不能支，要求商震增援，商又拒不派援。16日，吴克仁被迫率军南撤，到达新乡休整。

吴克仁对河北前线各军将领保存实力、怠于作战，致被日军各个击破，非常痛心，前往南京向蒋介石陈述，要求调离北战场。这时上海战局吃紧，蒋正苦于无兵可调，遂将该军迅速运至安亭。

淞沪抗战自8月13日爆发后，南京统帅部为了打破日本侵略军迫我作城下之盟的企图，提出了不惜任何牺牲守住大上海的口号，先后投入了八十五个师的兵力，在北起宝山，中经江湾、闸北，东迄浦东、川沙约一百公里的弧形阵地上，与日军展开了极其惨烈的搏斗。日军虽投入了二十余万人，挟其优势的火力，历时两个多月，攻势迄无进展。但至10月下旬，淞沪战场形势开始逆转。10月31日，日军突破我左翼方面军大场防线，威胁中央方面军侧背。适于此时吴克仁率六十七军开到战场，经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陈诚拨归右翼方面军张发奎指挥，作为右翼军的总预备队，驻军青浦。

11月5日，日军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等三个师团及第五师团之国崎登旅团在金山卫登陆，获得滩头阵地后即直扑松江。张发奎当即命令吴克仁率六十七军协同四十三军郭汝栋部及松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公珣死守松江三日，以掩护上海守军撤退。6日傍晚，吴克仁率六十七军赶到松江。当

时郭汝栋所率四十三军仅存残部五六百人，武器又窳陋不堪，而六十七军则军容严整，装备齐全。吴克仁向王公珣了解敌情后，即命令一〇八师师长张文清率部防堵城西之敌，一〇七师师长金奎璧出新东门迎击北犯之敌。金师出击后，与日军谷寿夫师团先头部队遭遇，杀伤敌人五六百人，敌被迫后撤。该师三一九旅旅长吴璠负重伤，三二一旅旅长朱之荣阵亡，团、营长亦伤亡多人。7日下午，敌谷寿夫师团大队开到，将金师击溃，直趋苏州河左岸。张文清率一〇八师开出城外，敌国崎登旅团即已接近松江城垣，乃令三二二旅旅长刘启文率部占领松江城至石湖荡之线。7日中午，刘旅在三十号桥附近与敌遭遇，刘启文力战阵亡。敌军遂突进到松江城西关大桥附近，与夏树勋三二四旅展开激战。至8日下午，战况愈趋激烈，夏旅伤亡惨重。吴克仁以战况紧急，乃亲自出城督战。坚持到8日半夜，吴克仁以守城任务已经达成，遂与郭汝栋、王公珣商定突围，令六十七军向昆山撤退。9日黄昏，吴克仁在指挥部队渡河时不幸中弹牺牲。^①

注：

- ① “八一三”淞沪抗战，吴克仁为了掩护上海守军撤退，率六十七军坚守松江三日，不仅全军为此付出了重大牺牲，本人且以身殉职，其壮烈事迹理应受到褒扬。该军副军长贺奎于事后为吴克仁及各级战死官佐请恤时，军政部竟根据所谓战区情报，诬吴克仁为叛变投敌，六十七军番号亦被撤销，缩编为一〇八师，拨归中央军王敬久部。吴克仁将军所受不白之冤，后经旅美报人田雨时先生于1981年撰文报刊，真相乃大白。为了褒奖吴克仁将军的英勇殉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于1987年2月，追认吴克仁将军为革命烈士，并向其子女颁发了烈士证书。

冯 占 海

霍燎原

冯占海，字寿山，1899年11月6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初四）生于辽宁省义县杂木林村的一户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在村内读私塾八个月后即给人家放猪。1917年参加东北军当兵，1919年到沈阳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历任东北军的排长、连长、团部副官、营长等职。1925年升任东北陆军六八二团（即吉林督办公署卫队团）团长。东北易帜后，于1930年加入国民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广大东北人民及其所部官兵纷纷要求抗日的推动下，他基于爱国思想，冲破了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束缚，率队奋起抗日。9月下旬，日寇占领吉林后，策动汉奸熙洽以师生关系^①三次派专人持亲笔函劝冯占海投降，诱以高官厚赏，胁以抄家进剿，均被他严词拒绝。他痛斥劝降人说：“占海身为中国军人，只知效命政府，生命当早置度外，况身外浮物之家产乎！本人只知有国，凡有反抗政府者，决以全力周旋，虽亲友均不顾。”^②随即向吉林省各县发出抗日通电，声讨日寇“侵我国土，掠我省库，杀我同胞”和熙洽“卖国求荣，认贼作父”的罪行，表达“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抗战到底”，“克尽保卫国土”的决心^③。他率队从永吉出发，绕经桦甸、蛟河、舒

兰，进入五常。11月，接受吉林省临时政府的委任，宣布就任吉林省警备司令兼第一旅旅长职务，并将所部卫队团和沿途吸收的爱国群众及绿林出身的宫长海、姚秉乾等抗日义勇军，共一万五千余人，编成吉林省警备军。此后，冯部转战于哈尔滨、方正、榆树、五常、吉林、长春等地，打击了日寇的侵略气焰，歼灭了大批日伪军，收复了一些失地。所到之处，受到广大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支援。

1932年1月，日伪军包围哈尔滨，冯占海会同陆军二十四旅旅长兼依兰镇守使李杜，联合当时驻守在哈尔滨及其附近的丁超、邢占清、赵毅等部，共同守卫哈尔滨。1月下旬，各部抗日军在上号、三棵树、南岗等地保卫战中获胜，歼灭大量敌人，迫使伪军于琛澂部向阿城败退，哈尔滨局势暂趋稳定^④。随即，由上述各部抗日军组成吉林自卫军，推李杜为总司令、冯占海为副司令兼右路总指挥。2月初，冯占海所部宫长海、姚秉乾二旅向榆树方向进军，行至双城团山子时，遇到了日伪军的截击与包围，损失很重，情况危急。冯占海乃亲率大队赶来助战，予敌军以反包围，毙伤敌军千余人，使战局转败为胜。正拟乘胜进取，不料友军失利，双城、哈尔滨相继失守，冯部腹背受敌，不得已遂向方正一带撤退。

3月末至4月初，冯占海率队在方正、会发恒等地与敌军展开争夺战，先将伪军于琛澂部的进攻击溃，给敌以重创，继为日伪军的联合围攻所败，退守大罗密。4月中旬，自卫军总部在依兰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兵三路反攻哈尔滨。会后，冯占海挥师西进，连克方正、会发恒、宾县等处，

进逼哈尔滨东郊。前后共毙俘敌人四千余名，击落敌机两架，大大鼓舞了爱国军民的抗战热情，队伍猛增至三万余人。

6月，冯占海部自卫军在宾县召开会议，决定脱离吉林自卫军系统，改名为吉林抗日救国军，推冯占海为总指挥，并制定了“坚持抗战到底”、“收复吉长、捉拿卖国贼熙洽”、“不扰民”、“至死不投敌”等七条“抗战公约”^⑤，统一思想，进一步激发斗志。会后，冯占海率队向哈尔滨反攻，在香坊附近与日伪军展开激战，因伤亡较大，转向榆树、五常进军。沿途经过多次战斗，于7、8月间连续收复了拉林、榆树、五常等集镇。其中双榆、青山堡一役，采取迂回战术，一举突破伪军防线，直捣日军旅团指挥所，毙俘日伪军一千余人，缴获大批枪械弹药。收复榆树、五常后，队伍又有很大补充，人员增至四万余名，并在山河屯地方建立了五常县临时政府，帮助当地发展了大刀会等群众抗日力量。

同年秋，冯占海部救国军又乘胜进逼吉林、长春。9月中旬，宫长海等旅围攻吉林，一度攻至吉林西郊温德河、小白山附近，使日伪宣布吉林全城戒严。与此同时，赵维斌等旅也攻至长春北的布海、米沙子等地。这些军事活动，震动了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使正在签订所谓“日满议定书”的日伪头目们受到了直接威胁。在他们的心目中，冯占海部救国军是一支“强有力的反满军”^⑥。

由于蒋介石继续推行对日妥协对内压制的反动政策，日寇得以全力放手进扑，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本身也犯了各自为政、胜骄败馁等错误，因而自1932年冬季开始，东北的抗

日战局走向下坡路。冯占海感到兵力疲惫，弹药缺乏，给养困难，孤立无援，产生率队进关的想法。在日寇节节进逼下，他未能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依靠当地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建议，企图取得国民党政府接济以扩充实力，遂于当年冬率队撤离了抗战第一线，向热河方向退却。退兵途中，由于得到沿途爱国群众和其他抗日义勇军的支援，一度攻克了长岭县城，击毁了四洮线上的一列日军装甲车。但沿途因受到日伪军的堵截和袭击，使部队遭到相当损失，当1933年1月中旬到达热河开鲁县时，部队只剩下两万余人。

到热河后，冯占海被当时担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的张学良委任为六十三军军长兼九十一师师长，并于1933年2、3月间，率队参加了保卫热河的战斗。失利后，经赤峰、围场等地，辗转退入关内。但冯部救国军被蒋介石、何应钦视为土匪不予收容，于是他转投主张抗日的冯玉祥^①。

1933年5月27日，冯占海在张家口就冯玉祥所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四路总指挥职，次日发出通电称：

“痛国家之阽危，愤强敌之凭陵，矢志救国，义无所顾。”^②所部驻守蔚县、怀来一带，继续进行抗日活动。5月31日《塘沽协定》签字后，蒋介石对抗日同盟军的压迫加剧，6月3日国民党中央会责成华北军事当局对此就近查察。接着国民党上海、南京、河北、天津、山西、察哈尔、绥远等省市党部纷纷通电反对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在上述情况下，冯占海率部脱离抗日同盟军，转投何应钦，6月5日冯致电北平军分会表示服从国民党当局的指挥。旋奉命移驻河北高邑、

内丘、元氏、临城等县。冯部改编后，国民党在该军内设置军训处，加强控制，打击军队内部的爱国进步力量，不准冯占海扩充实力。对1933年初张学良委任的六十三军军长兼九十一师师长的任命，国民党政府拖了一年之久，才正式发表，到1936年又撤销了六十三军的番号，只保留其九十一师建制。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冯占海部被调去防守河北永定河一线。冯率部在固安、雄县等地与日军对峙。后战线被日军突破，兵力损失近半，遂退至河南尉氏、郑州、开封等地进行整编。不久，调到漯河、确山一带驻防。这时冯占海兼任漯河警备司令与平汉铁路郑州信阳段的护路司令。

1938年秋，冯部被调到江西永修、马回岭、星子等地，在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下对日作战。由于蒋介石利用抗战消灭“杂牌军”，在战机不利情况下，令冯部进行德安战役，遭到日军的猛烈攻击，伤亡惨重。冯占海的得力部下、二七一旅旅长王锡山也不幸阵亡。国民党政府乘机解除冯占海的军权，给他一个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的空头衔。至此，冯占海对国民党蒋介石幻想破灭，便于1939年春携眷到云南昆明，经营旅店业。抗战胜利后，冯占海由云南迁居北平，继续经营商业和手工业，任北平兴业公司董事。解放战争期间，他在政治上陷于徬徨状态。一方面对国民党政府不再抱幻想，一方面对共产党心存疑虑、观望。

新中国成立后，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使冯占海受到了很大鼓舞，唤起了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情，表示要多为人民服务。1950年冯占海被选为北京西四区人民代表会议的特邀代表。同年8月参加了中国国民党

革命委员会，9月被选为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翌年参加了广东省新会县的土改工作。

1955年2月，冯占海迁居长春，相继被选为吉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吉林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和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被任命为吉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958年7月，被选为吉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又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吉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63年9月14日，冯占海病逝于长春。

注：

- ① 冯占海在沈阳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学习期间，熙洽曾为讲武堂的教育长。
- ② 冯占海：《吉林军抗日简略战史》，见璽南影片公司电影画报“东北义勇军专号”，1932年第12月版。
- ③ 冯占海：《“九一八”事变后我的抗日作战经过》，《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24页。
- ④ 参阅〔日〕满洲国史编纂发行会编：《满洲国史》分论，第313页。
- ⑤ 同③，第33页。
- ⑥ 同④，第314页。
- ⑦ 高兴亚：《冯玉祥将军》，198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第164页。
- ⑧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九辑，第97页，中华书局1981年8月出版。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吉林自卫军抗日实记》。
- ② 李树棠：《冯占海部在“七七”事变后抗日战况》，《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1981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 ③ 刘化南：《吉林抗日自卫军义勇军的兴起与瓦解》（未刊稿）。
- ④ 〔日〕《满洲国史》分论，第四编第三章：治安肃正。
- ⑤ 高品三、高尊三等入访问记录。

王金发

裘士雄 徐和雍

王金发，名逸，谱名敬贤，字季高，号子黎，金发（亦称“金法”）是他的乳名。浙江嵊县董龙岗人。1883年4月3日（清光绪九年二月二十六日），王金发出生于小康人家，祖遗水田三四十亩（一说一百多亩）。他的祖先“因恶清避居董龙岗”，祖父王修宫不满清朝腐败统治，1861年“太平军入浙，欲有所展布，毅然从之，得为偏裨，率队驻宁波，已而太平军败，知事不济，乃散归，恣饮以终其身。”^①父亲王启孝亦耻仕清廷，在籍从事耕读。王金发从小就受到社会 and 家庭的民族革命思想的熏陶和感染。

王金发少时聪颖过人，生性强悍，好习武弄枪棒，尤喜射击。其母徐珍梅督教甚严。王二十一岁考中秀才，同时也练就了一手射击绝技。“时值欧风东渐，梁启超、康有为等刊行新民、时务等报大声呼号；又有孙文、黄兴辈潜结志士，为积极的进行，于是，‘革命’、‘排满’、‘民权’、‘天职’、‘自由’、‘流血’种种新词几乎遍及国中，尽人乐道。”“而金发亦于此时在乡联合胡士俊、胡春霖、周志由、张陔南等创立大同社，名为办学，实则植党结群，以待时机之至。”^②他参加反清的会党组织——乌带党，继而归附平洋党，并很快取得绿林弟兄们的信任和拥戴，被推举为“龙头”（首领）。王

金发“凡所举动，均以身为党徒先，故党徒咸乐就之”^③。他们抗捐拒税，劫狱反官，从事反清斗争，清政府甚为震惊和不安，故“官府捕之，急如星火”^④。1905年春，光复会领袖徐锡麟到嵊县寻访王金发等，密谈竟夕，相见恨晚。是年8月，王金发应邀入徐锡麟等革命党人创办的大通学堂，并参加了光复会。同年冬，他与徐锡麟、王振汉、陈伯平、马宗汉、范爱农等东渡日本，“金发入大森体育学校，及至试验，成绩竟以第一人高标毕业”^⑤。

翌年夏，王金发回国后任大通学堂体操教员，协助秋瑾培训骨干，准备武装起义。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仓促起事失败被杀，继而秋瑾以大通学堂为据点的光复军起义，也在发动之前便遭清政府的血腥镇压。7月13日清军来时，“金发适在校，欲谋抵敌，秋瑾以已系女人毫无证据，即被捕亦无妨，而催金发速行，与竺（绍康）等为后图。金发不从，促之再四，声色俱厉，金发不得已逾墙远遁”^⑥。结果，秋瑾当天被捕，7月15日凌晨在绍兴古轩亭口英勇就义。王金发虽系清政府悬赏千金通缉的“要犯”，处境甚为艰险，但他的革命意志丝毫没有动摇，他更名牙黎，坚持反清斗争。王金发常向为富不仁之户摊款索粮，“以四分之一散贫民，以二分接济党人机关，以一分自充旅费”^⑦。1907年冬，他策动裘文高率台州数百义勇，伺机抗击清军的剿捕，嵊县白竹之战，杀死清军管带刘庆林、哨官杨华泰等。1908年夏，王金发变卖家产和向亲友筹借数千元，与陈其美、竺绍康在上海开设天保客栈，作为革命党人秘密联络机关。他是以暗杀为手段惩治内奸、叛徒的能手，曾在绍兴干净利落地

击毙出卖秋瑾的胡道南，替秋瑾烈士报仇；曾在十里洋场上海惩戒投靠端方的刘师培，责令刘确保已被捕入狱的张恭人身安全；还指派堂兄王敬良在上海四马路处决叛徒汪公权。当时此类暗杀事件，多系王金发所为或参与指挥，因此，王金发的名声大振，敌人则闻风丧胆。王金发或向华侨筹款，或购置枪支弹药，或联络会党，其足迹遍布日本、南洋、港澳、上海和浙江等地。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王金发积极参与光复上海的斗争后，即与张伯岐、蒋介石、王文庆等率领敢死队于11月2日赶赴杭州，4日晚与驻杭新军第八十一标、八十二标等部攻克军械局、抚署，活捉浙抚增韫。5日杭州光复后，汤寿潜被推举为浙江都督。次日，起义军领导人会议，王金发提出汤寿潜曾参与杀害秋瑾，要求改选，否则就用炸弹对付，被褚辅成竭力劝止，王乃愤而率部离杭。其时，绍兴的“几个旧乡绅”也拼凑了所谓“绍兴军政分府”，民政长则是原知府程赞清，治安科长则是“以刑幕致富”、杀害秋瑾的谋主章介眉。绍兴“光复”后的第二天，鲁迅和挚友范爱农到街上去走了一通，只见“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⑧。因此，他们派代表赴省城请求派驻革命军。这样，王金发于11月10日率领革命军乘船到绍兴主政，鲁迅曾组织绍兴府中学堂师生和绍兴各界人士到五云门外欢迎。

王金发在绍主政期间，为开创新的政治局面作了一番努力。进城后，他重组绍兴军政分府，本人就任都督。王金发得悉程赞清的罪恶历史，曾欲捕杀，但为陈燮枢等人所劝

阻。王金发受理群众的控告，将“矢忠清廷”的章介眉逮捕归案，并镇压了几十个民愤极大的恶霸，没收了景五四等土豪劣绅的不义之财。王金发接受北伐军副总司令（黄兴任总司令）的委任令，练兵筹饷，待命北伐。王金发饬令免一年钱粮，平米价，禁鸦片，奖励兴学，劝导实业，赦免“罪犯”，隆重公祭徐锡麟、秋瑾等烈士，并优厚抚恤其遗属，还任用了一批新人，其中鲁迅被委任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因此，光复初期，绍兴在各方面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可是，好景不长，自1912年袁世凯窃据政权后，中国的政治局势急剧逆转，绍兴的反动势力随之掀起一股“拥袁（世凯）、反孙（中山）、倒王（金发）”的恶浪，革命队伍内部也发生分裂；有的人倒向复辟势力一方。而王金发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声中，丧失了应有的革命警惕性。他的某些失误和缺点也为敌人提供了口实。如在军政分府里任用了一批无能的亲朋故旧，助长了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歪风；扩军后，新兵素质差，滋事生非，违纪扰民的事件屡有发生；王本人经不起封建势力的捧场，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诸如此类，不仅使王金发的新政方案计划得不到进一步实施，而且舆论日非，招致“祸绍”的罪名。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已和王金发熟识，他看到绍兴政局的逆转和王金发的蜕变，感到痛心和不满，曾创办《越铎日报》，撰文予以监督、规劝和批评。王金发公开声称：“一声光复，满幕都翻。凡我同盟，宜如何开诚布公，咸与维新，冀大造国利民福。”^⑨“现在共和之局已定，断无再有反对之人，

……本都督推诚相见，无诈无虞，愿我同胞，共喻斯义。”^⑩其时，一方面有黄兴、陈其美等上司派员或来函来电替章介眉讨保说情；另一方面王金发惑于章的韬晦之计，竟予以平白开释。鲁迅他们对王金发的这些错误言行，是竭力反对的。王金发虽然没有像传言所说的要派人去暗杀他的老朋友鲁迅，但他却是非不分地停发了学务经费，使鲁迅在此后不久便怀着失望的心情离别故乡。王金发在绍兴成了士绅们的“众矢之的”，最后也抵制不住袁世凯撤销军政分府、遣散部队的通令，被迫卸职，于8月1日挈眷赴沪“闲居”。在沪他出资筹办“竞雄女校”，又在南京路福建路口开设“天然旅馆”，秘密联络旧部。他的“寓公生活”无非是一种掩护而已。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王金发经多方侦察，“查悉确系应桂馨间接指使，武士英为凶手。季高遂率从者带巡捕与陆惠生乘汽车跟踪至妓院获之，并查获武士英，研讯口供，再检查其家中函电，牵连要人不一，其首逆则袁氏”^⑪。于是，报界竞相披露，全国民心共愤，导致“二次革命”爆发。王金发在上海招集旧部奋起响应，出任浙江驻沪讨袁军总司令，命谢飞麟起草讨袁檄文，亲赴宁波策动驻军，以图响应，终因浙江都督朱瑞的阻挠反对而连遭挫折。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以“国事犯”悬赏通缉王金发。王金发蛰居上海，陷于困境。其母在别人的怂恿下，背着王金发，托人写信至陆军部呈请赦免。王金发在亲友的催迫下，曾赴京争取“受得实职，以冀实行其革命之本旨”^⑫，而陆军部却提出要他拿获革命党人自赎。王金发不屑卖友求

荣，愤然离京返沪。他表面上仍逍遥自娱，暗地加紧活动，图谋重新举事。1915年5月，王金发以赴杭筹建新寓为名，打算招集旧部，以图东山再起，不幸为督理浙江军务的兴武将军朱瑞所捕。章介眉辈闻讯欣喜若狂，急电政府：“粮莠不去，嘉禾不生，恳即明断，以张法纪”^⑬。6月2日，朱瑞既无罪状宣布，谕为“未奉特赦明文，遵通缉令”^⑭，将王金发枪决于杭州，时年仅三十三岁。他“临刑时神色如故，无恐惧态，但求速死”^⑮。广大革命党人和人民闻讯既悲愤又痛惜，孙中山誉王金发为“东南一英杰”，不禁感叹说：“天地不仁，歼我良士”^⑯。

注：

- ① 楼翼台：《景风翁家传》，载敦伦堂《王氏宗谱》（八）。
- ②⑤⑥⑦⑪⑫ 谢震：《王季君行述》，载敦伦堂《王氏宗谱》（八）。
- ③④⑬⑭ 岑梦楼：《王金发》，上海华洋书局1906年仲秋初版。
- ⑧ 鲁迅：《朝花夕拾·范爱农》，《鲁迅全集》卷二，第313页。
- ⑨ 王金发致孙中山电文，载《（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17号。
- ⑩ 转引自朱恣等编著的《鲁迅在绍兴》第19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
- ⑮ 绍兴《越铎日报》1915年7月5日。
- ⑯ 沈鹏年：《孙中山与王金发》，载《嵊县文物》第十期。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浙江嵊县黄龙岗《王氏宗谱》（1—8卷）。
- ② 袁孟涵述，汪振国记：《王金发其人其事》，见《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
- ③ 陈去病：《王逸·附姚勇忱》，《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第十三期。

张 云 山

郑自毅

张云山，字凤岗，陕西长安人，1877年10月15日（清光绪三年九月初九）出生于贫苦农家。张的父母早逝，两个哥哥因家贫出外谋生，他由族人名五婆的老人收养，故幼年失学，帮人劳动。他喜看旧戏，对戏中关羽、岳飞、包拯等“名将”、“清官”最为仰慕。稍长，有胆识，善击剑且膂力过人。

1895年，西宁爆发回民起义，新疆巡抚署任陕甘总督陶模奉令募兵镇压。当时，张云山投效当兵，转战西宁、新疆等地，并在营中加入哥老会。张因打仗骁勇，积功升任都司。1905年回陕，在新军中任司号长。由于张为人耿直，待人诚恳，颇得下层官兵的好感。他通过理门公所（当时公开的戒烟机构）负责人夏连生，与哥老会在西安的“黄大爷”接上关系，陆续把新军中的号目、号兵介绍加入哥老会，从此，他的影响与势力日渐壮大。

1908年新军由常备军扩编为陕西陆军混成协时，张任司号官。同年10月，同盟会员井勿幕由日本回陕活动革命。不久成立了同盟会陕西分会，选举李仲特为会长，决议联合新军中的“慕亲会”、“哥老会”、“刀客”等在中下层官兵中影响颇大的会党共同行动，并派钱鼎、张宝麟代表同盟会向张

云山进行联系。经过两三个月的积极活动与宣传，使张云山及哥老会其他头目也都了解了同盟会的革命宗旨。张表示接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答应双方采取联合行动。为了壮大力量，张决定开山堂——“通统山”，并自任山主，吸收成员一千多人，占全协官兵的四分之一。他们在各标、营建有自成系统的哥老会组织，标有“标舵”，营有“营舵”，队有“队舵”，拥有很大的潜势力。而新军中同盟会员人数则很少。

为了加强同盟会与哥老会的联合，井勿幕、钱鼎、张云山等人发起，于1910年7月9日（农历六月初三）在大雁塔召开结盟会议。当时到会的有双方重要人物三十多人，时称“三十六弟兄”，他们在神前歃血宣誓为盟，共图大举。此次会议，影响很大，进一步巩固了同盟会和哥老会的团结，为后来的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震动，清陕西当局颇为惊慌，对于在新军中各会党的革命活动严加防范，并下令从10月24日（农历九月初三）起，将新军第二标所属一、二、三营陆续开往岐山、凤翔、宝鸡一带，听候行止。张云山、钱鼎等人得悉此讯，感到原订于10月29日（农历九月初八）之起义日期已缓不济急，必须立即改变计划。即由钱鼎、张宝麟、张钫等于10月21日（农历八月三十日）夜间去见新军三十九协二标一营管带张凤翔，研究应急对策。经商定于次日（九月初一）上午9时，在城西林家坟召开有各方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九月初一本为军中发饷日，各方负责人物均借故先后聚集林家坟开会，公推张凤翔为首领，钱

鼎为副首领，决定于当日上午11时发动起义。恰好当日亦为军中假日，清兵多外出游逛，起义军首先占领了城内军装局、鼓楼制高点和藩司衙门等要地，随即成立起义军总司令部，定名为“秦陇复汉军”，张凤翔为临时大统领，通电响应武昌起义。清西安将军文瑞，闻变退守满城。起义军于初二日拂晓开始向满城进攻，钱鼎、张云山、万炳南率队从西面攻击，张凤翔率队从南面进攻。经过半天激战，于下午攻克满城。文瑞投井自杀，“陕西护理巡抚钱能训逃匿被查获。西安其他武装部队，纷纷响应革命。于是起义军总司令部由军装局移至陕西高等学堂，于10月25日开会推选张凤翔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钱鼎、万炳南为副大统领，张云山为调遣兵马都督，成立军政府。接着由张凤翔、张云山先后发布安民告示及檄文，要求会党及市民严守纪律。

当陕西新军起义时，清卸任陕甘总督升允闻变连夜逃往甘肃，旋经陕甘总督长庚保荐，任陕西巡抚兼办军务。升允遂调动甘肃清军马国仁部于11月21日攻陷长武，进逼邠州（今彬县）。张云山闻知西路吃紧，即向军政府自荐，率向字营等部开赴西路，在长武冉店桥一带和清军激战，终将敌军击退，使局势转危为安。此时河南来犯清军则攻陷潼关，故东路告急。大统领张凤翔亲自前往督战，张云山被调回西安主持防务。不久潼关收复，而升允又调集甘肃清军张行志、陆洪涛、马安良、崔正午等大批部队由陇南、泾川分南北两路再犯陕西。长武、邠州等地相继失陷，情况极为严重。张云山急赴乾州（今乾县）堵截清军，坚守城防。与此同时，清军陷陇州（今陇县）、汧阳（今千阳），副大统领万炳南在凤翔

被围求援。张凤翔亲率由东路新回部队驰援乾州，又调井勿幕和陈树藩部赴援西路。一时各线同时抗敌，紧张异常。张云山坚守乾州城防，牵制了众多清军，双方对峙八十三日，大小数十战，以致城无完堞，伤亡颇大。张云山身先士卒，日夜巡城督战，清军曾多次使用云梯攻城、挖掘地道或派人诈降等，均未得逞。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并下令各地清军停战并进行和谈。18日，陕西东路征讨大都督张钫与河南清军将领赵倜达成协议，清军退出潼关，28日张钫率华阴各处民军西援。此时惟升允占据醴泉拒绝谈判，并将张云山派去的谈判代表雷恒焱杀害，直到在乾州的马安良向张云山求和并达成协议，升允陷于孤立，方于3月8日率领入陕甘军各部退出陕境。东西两路战事全面结束。

是时，袁世凯已继任临时大总统，张云山以光复有功被授陆军中将，补秦军第一镇统制。不久，为了削弱各地起义军实力，袁世凯令都督张凤翔缩编陕军，遂将张云山部缩编为第一师，张云山改任师长。

陕西光复后，以张凤翔为代表的同盟会，与以张云山为首领的哥老会之间的分歧加剧。一时，张云山与张凤翔之间也颇多歧见。当时二张一在南院，一在北院，俨然形成南北对峙。后经郭希仁、宋伯鲁等斡旋，规以大义，二张关系才逐渐好转。其后张凤翔令张云山率队剿抚在盩厔（今周至）、郿县（今眉县）、凤翔等地的溃军散勇，安定了地方。

张云山对提倡男人剪发辮，妇女放足，在省内创立同志

小学和设立普云堂药铺施舍医药多所赞助。他支持张凤翔禁种鸦片的主张，曾亲自到盛产鸦片的兴、武、扶、郿等地召集民众宣讲禁令。由于受旧思想局限，慕求“清官”、“名将”的美名，甚至仿效铁面无私的包拯，常在台上设置铡刀以示众下；又过分热心于哥老会势力的发展，采取不适当手段，曾引起人们对他的反感，但张为人尚能从谏，予以改正。

1914年3月，河南农民起义反袁军白朗部进入陕西，袁世凯派其亲信陆建章以“追剿”白朗为名，率北洋陆军第七师开进陕西，驻在西安城东附近。6月电召张凤翔入京改任将军府扬威将军，以陆建章继任威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独揽陕西军政大权。陆建章秉承袁世凯的旨意，大肆镇压革命党人，裁汰缩编陕军；又将张云山所部第一师缩编为混成旅，改任张为旅长兼陕北镇守使，但设置种种障碍，使张不能到任。张处此情况下，欲反抗而不得，只好曲意奉承。直到货尽财竭，陆仍步步相逼，张忧愤咯血，于1915年6月死去，终年仅三十七岁。张云山暴卒后，各方反响甚大，陆建章为了蒙骗世人，经陆军部于7月1日呈请袁世凯准予“从优照上将例”“给恤”^①。

注：

- ① 关于张云山卒于1915年6月的哪一天，尚未找到准确记载。但从《政府公报》中可以看到：1915年6月7日袁政府尚颁给张云山三等嘉禾章；同年6月24日则下令裁撤张生前所任的陕北镇守使缺；到7月1日则刊有“陆军部呈遵令从优照上将例议给陕北镇守使张云山恤典由，准如所议给恤此批”的条文。由此可见张当系于6月某日故去。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郭希仁:《从戎记略》。
- ② 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西北革命史征稿》,1949年出版。
- ③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二辑。
- ④ 《宋伯鲁撰并书张云山墓志铭》。
- ⑤ 《许宝荃撰并书张云山神道碑》。
- ⑥ 《关于张云山几个材料片断》,庞建堂口述,刘茵依记录。
- ⑦ 《宋伯鲁撰并书郑子屏墓志铭》。
- ⑧ 《郑自毅采访录》(手稿)。
- ⑨ 《续修陕西省通志稿》。

胡 景 翼

徐辉琪

胡景翼，字励生，又作笠僧、立生，早年号中山，陕西富平县庄里镇人。1892年6月20日（清光绪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生^①。祖父胡得鼎，1867年9月在家乡因阻击捻军身亡。父亲胡彦麟，初经商当学徒，后渐次升任“领本”（经理）。胡景翼七岁入塾，十三岁就学于三原举人赵如笃处。课暇喜读兵书及名人列传，并拜师学习武艺。

1908年，胡景翼考入西安健本学堂。该校为同盟会员创办，是当时陕西革命党人的一个秘密活动据点。胡由此结识了井勿幕、焦子静等人，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影响。1910年春，经井勿幕、宋元恺介绍加入同盟会。

胡景翼入会后，积极赞助井勿幕联络会党、刀客共同反清的主张，自愿担任与新军中会党联络的任务。他为此参加了哥老会，与崔俊杰、雷贵、刘俊海等会党重要分子多次密谋于小雁塔寺。还利用假日到同州（今大荔县）、蒲城、华阴、华县、临潼等地运动刀客。胡景翼联络会党成绩显著，在陕西革命党人中很快展露头角，成为一个重要骨干成员。是年7月9日，胡景翼与井勿幕、钱鼎等，和会党首领张云山、万炳南等三十余人在西安南郊大雁塔“歃血为盟，共图大举”，实现了同盟会、哥老会与新军的全面联合。

1911年6月，胡景翼于健本学堂毕业。为适应革命斗争需要，他决定“以奔走革命为职志”，不再继续求学^②。随后来往于耀州（今耀县）、西安之间，进行广泛联络。随着革命形势高涨，同盟会陕西支部计划由井勿幕、胡景翼率刀客在渭北发难，钱鼎等人策动新军在西安响应。井、胡遂以耀州庙湾为基地，加紧准备。武昌起义爆发后，清陕西当局颇为惊慌，密谋将新军第二标调离省城，并逮捕军中的革命党人。新军乃提前于10月22日举义。胡景翼得知消息，立即招集各方豪杰志士和刀客两千余人在药王山首先响应。不久，井勿幕在三原就任陕西北路安抚招讨使，他应召前往，被委为第一标统带。西路战事告急时，又奉命率部赶往支援，在三水张户原（今旬邑张洪原）大败清吏升允所率之甘军。

1912年3月袁世凯窃权上台后，陕西都督张凤翔投靠北洋政府，打击革命派势力。秋天，胡景翼被迫离陕去日本，入成城学校读书。12月，外蒙古封建主在沙俄政府策动下宣布“独立”，留日学界群情激愤，公举胡景翼为代表，归国组织“征蒙军”。但袁世凯无视全国人民的反对，一味与沙俄妥协，胡的使命未能实现。不久“二次革命”爆发，他便在上海投入了反袁斗争。期间，孙中山、黄兴曾派人约张凤翔举兵响应，张拒绝，胡景翼愤怒指斥这是“苟安一时，助长袁氏帝制自为之心。”^③

1914年1月，胡景翼亡命日本，入革命党人创办的浩然学社学习军事。数月后毕业，决定回国直接从事反袁斗争。离日前，曾由于右任引荐会见了孙中山。孙以“努力革命”相勉励，他毅然回答说：“俟破京后再迎先生！”^④

胡景翼回陕后，经师子敬、侯笃等人斡旋，到陈树藩第三混成旅教导营军官连学习。不久相继升为差官连连长、备补连连长、游击营营长。与此同时，他与刘守中、岳维峻等人在三原开设大有公司，作为秘密“革命机关”；又与续西峰、续范亭、孙岳、邓宝珊等人相聚于华山下，密谋讨袁计划。

1915年12月讨袁护国战争爆发，次年3月，郭坚、耿直等在渭北举事响应。陕西将军陆建章为镇压起义军，一面任命陈树藩署陕北镇守使兼渭北“剿匪”总司令，一面派其子陕西第一混成旅旅长陆承武率精锐一团，到渭北一带巡防。胡景翼此时驻防富平，他看到陕西反袁逐陆斗争日益高涨，认为时机成熟，于是将陆承武佯迎入富平县署，于5月7日晚发动兵变。经一昼夜激战，全歼陆部一团人，并生擒陆承武。事变后，武钧、刘守中、张义安等人要求乘时宣布独立，围攻西安，胡景翼却以“有旅长在”为理由，加以拒绝，将陆承武交给了陈树藩。陈见有利可图，遂于9日宣布独立，自称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并以陆承武为人质，与陆建章讨价还价，6月取得了陕西督军职位。

护国战争结束后，胡景翼部被编为陕西第一旅混成第二团，驻防陕南龙驹寨（今丹凤）。由于陈树藩对他并不十分倚重，且怀有猜忌之心，胡景翼这时将其所部编为十个连，致力于练兵活动。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揭起护法旗帜。陕西党人高峻、耿直、郭坚等人纷起响应。这时，胡景翼经一年多时间的练兵，有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队伍，但他却没有立即响

应，而且还奉陈树藩之命直接加入了对高峻、耿直等起义军的围攻。胡对人说：他攻打郭、耿、高是想把他们“剿灭掉”，“自己起来再干”^⑤。因此，当耿直退守岐山派人与他联系，以至质问他“还革命不革命”时，他仍与耿军“激战八昼夜”；直到有了重大伤亡，才感到这是陈树藩施用“以毒攻毒”之计，遂与耿密约：耿部退出岐山，他以“夺城之功”向陈索取更多枪械，然后响应起义。但不料事为陈树藩探悉，不仅没有取得枪械，反而引起陈更大的猜疑。此后，胡景翼便以“追击”起义军为名，把部队开赴渭北蒲城、富平、三原等处，并派人与驻防耀州的曹世英取得联系。与此同时，陈树藩也一面调其亲信曾继贤、严锡龙率部进驻三原，一面委任胡景翼为“击匪司令”，命他继续东去攻打郭坚、高峻起义军。胡、陈矛盾自此日趋激化。

1918年1月25日，胡部补充营营长张义安愤于陈树藩步步紧逼，在三原宣布独立。27日，胡景翼与曹世英分别由富平、耀州赶到三原，共同组成陕西靖国军，胡任右翼总司令，曹任左翼总司令。2月2日发布讨陈檄文，宣言靖国军“志在上以靖国，下以救民”，以达“政治清明，共和巩固，奸雄无覬覦之心，政府有依归之望”^⑥。随后，从东、西两路进兵西安。2月中旬，靖国军在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兵临西安城下。陈树藩为挽救其败亡命运，在据城固守的同时，不惜以陕西省长为条件，与河南镇嵩军统领刘镇华加紧勾结。刘率部入陕后，俨然以“调停人”的身份，诱迫靖国军退兵。胡景翼鉴于西安城屡攻不下，为“保存实力”，遂不顾前方将领张义安、邓宝珊、弓富魁等人反对，连函张

等撤军。结果，陈树藩与刘镇华镇嵩军乘机反扑，张义安在组织反击时中弹阵亡。从此，靖国军被迫转入节节退守的困境。

此后，胡景翼与曹世英电请唐继尧“派劲旅，由川援助”，并推戴唐为“滇川黔陕靖国联军总司令”^⑦；同时派代表赴上海请于右任回陕“主持西北革命大计”。8月9日，于右任经孙中山同意回到三原，被举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胡景翼改任第四路司令。靖国军改组后，对陈树藩再度发动攻势。但不久，胡景翼到渭南固市劝说姜宏模所部投归靖国军，为姜扣留，旋被陈树藩软禁于西安。期间，陈百般笼络，并屡次逼写劝降信，均遭到胡的拒绝。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陈树藩为缓和人心，同时慑于靖国军以焚烧教堂相要挟，将胡景翼释放。胡回到三原，即就任陕西靖国军副司令兼总指挥，宣布继续讨陈。并通电全国称：陕事“决由陕人自行收束，以纾民祸”^⑧。为此，他在着手整饬军队的同时，还注意从事地方建设和振兴教育。在地方建设方面，曾聘请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查勘泾阳吊儿咀水利工程。在振兴教育方面，除继续维持原有学校外，陆续创办了三原渭北中学、三原女子中学和富平庄里立诚中学。胡景翼这种精神受到了孙中山的赞赏，称誉他“所历弥苦，所志弥坚，诚可为晚近军人之励”。并勉励他说：“陕西险据中原，为南军入北之冲要，幸善守之，以俟时局之变化。”^⑨

1921年5月直军阎相文、冯玉祥等部入陕取代陈树藩，同时对靖国军大加分化拉拢。在此情况下，胡景翼为了保存

实力，竟不顾于右任的反对，于9月21日宣布取消靖国军名义，接受直军改编。10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暂编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在接受改编中，虽一再表白说是为了“通权达变”，是“依人”非“降人”，但靖国军多数将领对此是不满的，有的斥责这是“断送靖国军前途”^⑩。孙中山也致函责备：“以堂堂护法之师，受伪廷督军之改编，不特败坏纪纲，为西南各省所不容，即于其个人节操，亦有大亏。”^⑪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胡景翼率部随冯玉祥开赴河南，在郑州、开封、彰德等地与豫督赵倜军作战。战后，所部被编为陆军第二十四师，驻防京汉铁路北段顺德、彰德、正定一带。期间，胡景翼去北京，经人介绍结识了李大钊。自后“每遇辄洽谈竟日”，给其思想以重要影响。

胡景翼依附直系原是借此谋求更大发展，但直奉战争后吴佩孚不仅从服装、枪械到饷需多方加以限制，并时刻企图收编其部队，这使他对直系日益产生了不满。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遭到全国同声反对，胡景翼于是感到“有再度革命之必要”，“欲有所举动”^⑫。随后，他派李仲三、刘允臣、张璧等与冯玉祥密谋，同时积极与孙岳取得联系。经频频密商，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遂结成反直联盟。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利用吴佩孚在山海关与张作霖作战之机，在胡景翼、孙岳的密切配合下，回师北京囚禁了曹锟，通电主和。25日，宣布组成国民军，冯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任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并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

“北京政变”发生后，吴佩孚率残部退至洛阳组织反扑。

11月7日，北京政府免去张福来河南军务督理职，特派胡景翼前往河南办理军务，收束事宜。24日胡率国民第二军南下，与吴军战于彰德、道口、清化间。12月6日胡被特任为河南军务督办，12日胡进抵开封，宣布正式就职。接着，与镇嵩军憨玉琨部连续作战，至次年3月取得最后胜利。

胡景翼就任河南督办后，广为延揽人才，希图“以豫省为始基”，“期成清明之政治”，然后“推行主义于全国”。于是，国民党人李根源、李烈钧、柏文蔚等数十人纷纷前往；共产党人李大钊、王若飞等和苏联代表团、军事顾问，也曾先后应邀赴汴。但为时不久，胡景翼即于1925年4月10日病逝。

胡景翼病危之际，曾口授遗嘱谈及“胸中素蕴”，说：“余对世界观念，以人类互相亲善，永久和平，期臻大同郅治之隆为指归。而欲达此目的，非打倒世界强权不为功。”^③

注：

- ① 关于胡景翼生年，向无明确记载。据《胡景翼将军生平事迹》称，胡生于1892年6月20日（清光绪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今采其说。
- ② 王儒卿等编：《陕西乡贤事略·胡景翼事略》，第166页。
- ③ 同②，第169页。
- ④ 于右任：《胡公笠僧墓志铭》，《西北革命史征稿》下卷，第102页。
- ⑤ 叶雨田：《靖国军末期高陵事变见闻》，《陕西文史资料选集》第三辑，第242页。
- ⑥ 《胡景翼、曹世英讨陈徽文》，见《陕西文史资料选集》第二辑，第50页。
- ⑦ 《唐继尧致李根源电》、《李根源致唐继尧电》，存云南省档案馆。
- ⑧ 《胡景翼痛南北纷争不已并发表政见之通电》，存云南省档案馆。
- ⑨ 《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383页，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 ⑩ 张钫：《关于陕西靖国军的回忆》，《陕西文史资料选集》第二辑，第65页，孙蔚如：《杨虎城在武功继续坚持靖国军旗帜》，《陕西文史资料选

集》第二辑,第85页,叶雨田:《靖国军末期高陵事变见闻》,《陕西文史资料选集》第三辑,第243页。

⑪ 陕西靖国军时期孙中山给邓宝珊的一封信,见《陕西文史资料选集》第二辑扉页。

⑫ 高兴亚:《国民军革命史初稿》(上)第156页。

⑬ 《胡景翼遗嘱》,《革命人物志》第三集,第300页,台北1969年出版。

主要参考资料:

① 《西北革命史征稿》。

② 《胡景翼将军生平事迹》,未刊稿。

③ 笔者访问胡景翼三弟胡景铨笔记。

罗 佩 金

李希泌

罗佩金，1878年6月3日（清光绪四年五月初四）生。字熔轩，又作榕轩，云南潞江人。原籍四川华阳，明初迁居于此。祖父罗瑞图，光绪丁丑（1877）翰林；父罗森，光绪甲午（1894）举人。罗佩金自幼聪颖过人，但喜交游，厮驰不羁。父亲对他严加管教，亲自课读。他1898年考中秀才，1903年考入昆明高等学堂。罗在校内经常与赵伸等人议论时政，为校方察知，驱逐出堂。罗不得已而去广州，投奔他祖父的学生两广总督岑春煊。岑以治两粤策命题面试，罗条陈十事，为岑赏识，派他在督署奏摺处学习。次年，被送到日本学陆军。

罗东渡后，考入日本振武学校。1905年6月，罗偕杨振鸿、李根源谒孙中山于横滨。孙中山以“革命是艰苦事，要卖命”等大义勉励他们。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罗入盟。1906年5月，罗在振武学校毕业，考入日本士官学校。同年10月，他与杨振鸿、李根源、吕志伊、赵伸等创刊《云南杂志》，宣传革命。

1909年，罗佩金毕业于士官学校。他回国后，先到上海去见岑春煊，然后带着岑写给龙济光的荐函去南宁。龙委任他为随营学堂总办。不久，有人向龙密告罗佩金倡导革命。龙使人侦查罗的言行，罗不自安，同年返滇，任新军第十九

镇随营学堂监督，兼云南讲武堂步兵科教官，后调任督练处参议官兼陆军小学堂总办。1911年初，他和云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向云贵总督李经羲荐蔡锷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九协协统，他愿屈居蔡下，任该协第七十四标标统。罗处事以机警果决见称。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蔡锷约集罗佩金、李根源等云南革命党人密谋响应。10月30日(阴历重阳节)，云南光复军起，蔡锷担任总指挥。罗佩金率七十四标攻打总督署。起义军与守军激战数小时，始攻下总督署，全城光复。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罗佩金先后任南征总统官、南防总司令与军政部长等职，参与平定了迤南道龚心湛的骚扰，镇抚了蒙自兵变。1912年8月，罗奉命入京参加各省军事代表会议，补授陆军中将，1913年1月，罗返滇任民政长。10月，罗父故去，他辞去民政长，在家守制。

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阴谋愈益暴露。罗佩金与吕志伊、李曰垓、杨蓁、邓泰中等密谋反袁。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通电宣告云南独立，发动讨袁护国运动。罗佩金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参谋长，第一军下辖三个梯团，刘云峰统率的第一梯团为先头部队，克日出发入川。时滇省财政支绌，罗佩金将他家几代积累的家产，押于殖边银行，得银洋十二万元，拨给第一梯团作开拔费用。护国军第一军1916年1月21日攻克叙州，向泸州进攻。但北军偷袭后路成功，护国军腹背受敌，被迫撤退，形势危急。蔡锷命罗佩金率第三梯团和第二梯团一部，兼程赶赴纳溪增援。双方遭遇于纳溪前方之朝阳观、棉花坡一带。经过激烈

争夺，泸州一度为护国军占领，旋又退出。直到2月底，战局才在纳溪稳定下来。3月初，蔡锷与罗佩金统筹战局，决定暂时分两翼撤退，引敌前进，再乘机反攻。罗被提升为左翼军总司令，指挥左翼撤退；蔡锷亲自指挥右翼，总司令部驻于大舟驿。至3月中，广西宣布独立讨袁，形势于护国军有利。3月17日，护国军开始反击，蔡、罗均亲临阵头督战。20日晚，右翼军在正面阵地发动夜袭，将敌阵突破，毙伤敌军五百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粮饷。在全国纷起反袁的形势下，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向护国军提出停战的要求。四川前线停战。

同年5月，军务院于肇庆成立，罗佩金被推举为抚军之一。6月6日，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加罗佩金陆军上将衔，授勋三位、二等大绶嘉禾章，补广西省长(未到任)。蔡锷则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蔡喉病日益沉重，请假东渡日本就医，致电北京政府推荐罗佩金护理四川督军，戴戡署四川省长。

1917年4月，因裁减军队发生矛盾，罗部滇军与川军刘存厚部在成都发生激烈战斗。北京政府借此免去罗四川督军之职，授罗“超威将军”的称号。罗令全军西撤川南，退出成都。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唐继尧通电响应，将入川滇军改名为靖国军第一军和第二军，以罗任总司令。唐声称：先平川乱，然后北伐。唐继尧对罗统率滇军驻川心存猜忌，不久又下令免去罗的总司令职，部队由顾品珍和赵又新统率，由唐亲自指挥。罗卸职回滇，闭门谢客，不问政事。

1920年冬，川军驱逐驻川滇军，赵又新战死。次年初，

顾品珍率师回滇，驱逐了唐继尧，以滇军总司令名义主持滇政。唐继尧出走后，收买匪魁吴学显等，祸害迤南数十县。顾品珍因罗佩金在辛亥革命后曾任南防总司令，请罗出任迤南巡阅使，从事清剿。

1922年春，唐继尧利用吴学显等的武装力量，自广西边境返回云南。3月下旬，顾品珍战殁于陆良天生关。唐继尧进入昆明。罗佩金率骑兵队仓卒奔赴滇西楚雄，想依靠驻扎在那里的大理第九混成旅旅长华封歌。罗到楚雄后，华不接纳，反将罗的卫兵携带的枪支全部缴械。罗逃往华坪，唐继尧指使匪首普小洪追捕。罗被捕后，5月3日，在苴却的双金坡被普小洪处死。罗死后三个月，他的灵柩运到了昆明，唐继尧不准进城，厝于昆明城东小松山。直到1928年唐继尧死后，潞江县人民才公葬罗佩金于县城西十五里的朱家山。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李根源：《曲石文录》卷三，《护理四川督军广西省长罗君熔轩事状》。
- ② 《护国之役总司令部命令抄》抄本。
- ③ 李根源：《云南杂志选辑序》，载《云南杂志选辑》。
- ④ 朱德：《回忆辛亥革命》，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辑。
- ⑤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
- ⑥ 《曲石庐盖簪集·罗佩金致李根源书》（原件）。
- ⑦ 《蔡松坡先生遗集·军政文电》。

王 士 珍

公孙曾

王士珍，字聘卿，号冠乔，别号冠儒，直隶（今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人，生于1861年7月14日（清咸丰十一年六月初七）。曾祖父王朝凤，精通医术，长于书法。祖父王履安是个秀才，工医之外，擅长武术，有戎马书生之称。父亲如柏和伯父如松都早逝，王士珍兼祧两房，由伯母刘氏和生母丁氏抚养成人。王九岁入塾读书，十六岁习弓马。这时家道已经中落，王于1878年考入正定镇标学兵队，不久开赴山海关驻防。

1885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培养新式军事人才，仿照德国军事教育制度，奏准在天津创立北洋武备学堂，通飭淮军各部选送学员。王因性格温和，又兼稍通文墨，甚得上司喜爱，遂被聂士成保荐考入北洋武备学堂。王刻苦学习西方军事，肄业三年，“操行学绩俱优。”^①期满，仍回山海关，督办随营炮队学堂。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王奉命率由学员组成的炮队，随直隶提督叶志超于6月开赴朝鲜牙山。7月29日，日军进犯牙山，清军奋起抵抗。激战时，王士珍曾多次请战增援，皆被叶志超所拒绝。成欢驿失陷，叶志超惧敌怯战，遂率残军绕道向平壤撤退。8月下旬，王士珍所率炮队随叶志超抵达平壤，与

入朝清军奉天练军统领左宝贵等部会合，兵力一万五千余人，叶志超为平壤清军总指挥。9月12日，日军兵临城下，王士珍所部防守大西门至七星门阵地。王士珍观察阵地地形后，积极建议：应于城外山上设奇布防，敌至方能应战。叶志超以为王士珍年轻多奇，不予采纳。14日，日军攻城时，王士珍誓言为国效力，率炮队与进犯的日军顽强鏖战，给敌军以杀伤。当王士珍闻知左宝贵壮烈牺牲的消息时，他亲手操炮，轰击日军。作战中他左手无名指被炸掉，额头也被弹片击伤，后在炮队官兵护卫下突围。

平壤失守后，清军撤退时又遭到日军伏击，溃不成军。加之黑夜昏暗，不辨方向，幸好王士珍携有地图，按图指引清军安全抵达义州。此时炮队官兵“饥渴特甚”，他们在一村休息时，从一户乱柴下发现两口大缸，装着衣服和麦粉，王只准炮队官兵以麦粉充饥，临行前，他将银五两放入缸中，仍旧封好，才命炮队上路。

回国后，王改统榆防炮队，仍驻防山海关。和议签订后，王随新任直隶提督聂士成移驻芦台。

中日甲午战争彻底暴露出湘、淮军的腐败，清政府逐渐认识到编练新式军队的重要性，1895年12月，任命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在天津附近的小站编练新军。袁世凯广为延揽军事教学人才，北洋武备学堂总办荫昌遂将前毕业于武备学堂的高材生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和梁华殿四人提名推荐。王被任命为督操营务处会办兼讲武堂总教习，旋即转任工程营管带，兼工兵德文学堂监督。王在小站辅佐袁世凯练兵，以悉心筹划、办事认真，博得了袁世凯的重用，凡有关训练

军队的上奏或下发的文牍，袁世凯都命王士珍参赞擘画。凡全军成绩考核和升降黜陟，也无不与之磋商。王为袁世凯小站练兵是出了大力的。

1897年荣禄奉诏到小站检阅新建陆军时，王士珍将工程营设制的水雷、旱雷、踩雷及各种武器都请荣禄亲临阅视，然后一一演习，荣禄看得眼花缭乱，大加赞赏。翌年早春二月，荣禄复来小站检阅，将过海河，王士珍指挥工程营搭帆布桥迎接，荣禄一行人马“行过如履坦途”，深为“惊异”^②。待荣禄检阅完毕回津时，王再次架成此桥，荣禄认为时已二月，河水将要解冻，恐有危险，王士珍禀告说：“勿虑，三日后冻方解。”果然三日后解冻，荣禄“深服”王士珍“料事精赅”。荣禄曾致函袁世凯称王士珍“负治国大才，不第长于兵事也。”^③1899年9月，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领衔主持编成《新建陆军兵略汇存》与《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二十二册，“成为袁军教学的标准课本，也是晚清编练新军主要的教育典范。”^④该年冬，袁世凯获悉清廷将任命他署理山东巡抚的消息后，立即派王士珍率少数亲信赴山东视察一切，以便做好所部新建陆军移防山东的准备。王士珍连日奔波山东各地，仅一月余，就将省内，尤其是屯兵处和沿海要塞形势一一了解，随即向袁世凯复命，袁“惊喜过望”，遂令王士珍为小站留守司令，坐镇小站，指挥各营依次开拔。

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后，以王士珍参谋全省军务。此时山东义和团反帝斗争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山东前任巡抚李秉衡和毓贤对义和团以抚为主，而袁世凯则力主痛剿。王士珍权衡利弊后，建议：先行劝解，继威以兵，如仍不从，再

捕诛首犯，解散胁从。此议为袁世凯采纳。1900年7月，王士珍曾亲自监杀了从北京来山东的义和团大师兄渠魁。在义和团运动发展期间，各国传教士、教民和洋货商人纷纷逃往山东避难，对此王士珍特编便衣队沿途保护并帮助租赁舟车，资送粮食、衣服、钱财，尽力庇护。同年秋，当八国联军向直隶东南部进犯的时候，王士珍饬令靠近直隶的山东村镇用白垩在墙壁上写上“此山东境”四个大字，侵略者望见，认为有袁世凯等为之镇压义和团和保护传教士，自然不必亲自去了。是年雨季，山东黄河决口，王士珍曾率工程营至险区，日夜奋战，“引水就壑”，使决口提前合龙，从而减轻了灾情，并使数千顷荒滩变成了沃壤，“放民耕种”。

袁世凯为了取媚德国侵略者，任命王士珍为全省操防营务处督办，饬令冯国璋、段祺瑞协助，抓紧军事训练。未几，袁世凯特邀请德国驻胶州总督到济南阅操。总督看到袁世凯的新军确比清朝旧军操练精娴，又知道主持操练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都是受过德国军事教育的，故当面称赞王、段、冯为“北洋新军三杰”。

1901年11月，清廷任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到任后，为了扩充军队，翌年春在保定设立北洋军政司，王士珍被任命为总参议，总管全军操防营务。不久王士珍偕王英楷赴直隶南部州县，会同地方官精选壮丁六千余人，集中保定编练为北洋常备军（即新练军），王士珍为左翼翼长。在此期间，王士珍为袁世凯推行常备军制，编写了《常备、续备、后备各军章制》，为北洋陆军六镇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1903年，清政府成立练兵处。练兵处总理练兵大臣由满族亲贵奕劻兼领，袁世凯为会办大臣，操实权。袁荐王士珍为军学司正使，旋调任军政司正使，并先后兼任北洋军第二、六镇统制官，授正黄旗蒙古副都统，赏头品顶戴。故新军编定营制，厘订饷章及军屯要扼，多由王士珍主持制定。

1906年10月，清政府抽调二万北洋军在彰德举行秋操，王士珍以军令司正使充总参议，整个秋操几乎全是在王的指挥下进行的，从始至终井井有条，大得各方称赞，中外被邀参观者，赞誉王“调度肇划，为不可多得，所以特别对王垂青，其誉望也翬翬乎驾于冯、段二人之上”^⑤。

是年冬，兵部和练兵处合并为陆军部，王士珍被任命为陆军部右侍郎。

1907年王士珍以侍郎衔外放为江北提督，节制文武，兼理盐漕事务。第二年王的生母病逝，清廷给假三个月。期满召见，令继续统率第七镇回任江北提督任上。1908年秋，王率江北新军参加太湖秋操，秋操尚未结束，革命党人熊成基率新军在安庆举行起义。两江总督端方飞电请王士珍派兵往剿，在王部追击下，起义遂告失败。

王士珍任江北提督以前，长期在军中任职，虽官运亨通，但私饱尚属有限，自从外放江北提督后，乘机敛聚，宦囊渐丰。先后在北京西单、前门和天津等处购置房产，并在故乡正定县广置产业。他首先委其叔父王如云在牛家庄盖起家宅一处，家庙一处，小学堂一座。不久，又在正定城内西门里购宅基地二十余亩，大兴土木，建造王氏宗祠和公馆四百余间。同时期在本县和邻县藁城购地十五顷。

1908年11月，光绪、慈禧相继死去，由三岁的溥仪继位，其父载沣摄政监国，载沣本想杀袁世凯，为光绪帝报仇，但惧怕袁之北洋势力及帝国主义奥援，仅发上谕勒令袁世凯回籍“养病”。袁世凯失宠后，王士珍亦称病请开缺，一则为免招嫉忌之祸，二则报袁氏知遇之情，所以一辞再辞，至1910年（宣统二年）才获准离职。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爆发，袁世凯在“非袁不能收拾局面”^⑥声中，东山再起。他首先奏请起用已开缺的王士珍，任王为襄办湖北军务，袁任内阁总理后，王士珍被任命为陆军大臣。

王士珍心有潜室，念念不忘其恩泽，当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令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致电内阁奏请“立定共和政体”的电文发出后，王深为不满，遂有电致段“责以皇恩浩荡，不应发此电。”^⑦溥仪退位既成事实，王士珍又竭力为其退位力争优厚条件。溥仪退位，王士珍表示忠于清皇室，决计辞职，他说：“身任陆军大臣，决不愿署名于皇帝退位诏后。”遂即“退居乡里不问政事”^⑧。

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鉴于王士珍“不攘权夺利，不植党营私”^⑨，故几次派人去正定请王士珍回京担任要职。皆被王婉言谢绝。

1914年夏，袁世凯派长子袁克定专程往正定迎王士珍北上，并嘱：“王公不来，勿归也！”袁克定一行抵正定，毕恭毕敬请王士珍出山助一臂之力，再次被王拒绝。未几，段祺瑞去南方视察回京路过正定，预先电报王士珍“拟正定下车，登门拜访。”王士珍届时到车站迎接，专车到站，段派亲

信下车请王上车会见，二人说话间，火车便开走，王身不由己，只得赴京。遂就任模范团筹备员，被授为陆军上将。5月9日，袁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任王为六大办事员之一，但“实权最大”^⑩。

1915年5月，段祺瑞称病退居西山，袁以王士珍署理陆军总长，8月段辞职，由王继任陆军总长。

王士珍为人精明圆滑，时称“好好先生”。正当帝制密锣紧鼓之时，上书劝进者比肩继踵，唯独王士珍“迄不签署”^⑪。有人向他试探，他淡淡地说：“自己人嘛！何必来这一套。”^⑫袁氏帝制自为引起国内外朝野上下的反对，致使北洋集团内部分崩离析。1916年4月23日王调任参谋部总长。此时袁世凯极想利用王士珍团结北洋僚属维持局面，故二人密谈“退位之法”^⑬。6月6日袁世凯终因帝制失败羞愤成病而死，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王士珍仍任参谋部总长。不久，因“参战”问题引起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段祺瑞为了通过对德宣战案以换取日本的军火和贷款，极力主张按照日本的意图对德宣战，黎元洪则受英美影响不主张对德宣战，王士珍提出“德国不可轻侮”^⑭的劝告。1917年5月，黎元洪免去段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职务，王士珍被任命为京畿警备总司令，李经羲任总理后，又任命王为陆军总长兼参谋部总长。

段祺瑞被免职后，离京赴津，积极联络各省督军，一面谋以武力倒黎，一面又暗中支持张勋策划丁巳复辟，企图利用张勋赶黎下台。当倪嗣冲、曹锟在段祺瑞指挥下发兵北上，威胁北京时，手握重兵身为陆军总长兼京畿警备总司令的

王士珍不是积极着手北京防务，而是一味把希望寄于张勋进京调停上。6月14日张勋率辫军进京，6月30日夜王士珍为张勋所胁，跟随张勋、康有为等进清宫奏请复辟，随后又同梁鼎芬、李庆璋一行人去总统府，逼迫黎元洪“奉还大政”。因此，复辟王朝授王士珍为“内阁议政大臣”和“参谋部大臣”等职，并赏穿军衣。特别是当冯玉祥等人率军攻入北京，张勋作最后挣扎之时，王士珍和陈宝琛还为张勋出谋划策，“决定拟一道上谕给张作霖，授他为东三省总督，命他火速进京勤王。”^⑤由此可见，王士珍是参加了丁巳复辟的人，待段祺瑞率讨逆军兵临北京城下时，王始督率模范团参加讨伐张勋的战斗。

丁巳复辟平息以后，王士珍深感无脸见人，准备再回故里隐居。然而，段祺瑞不但不追查其罪责，却对其竭力抚慰，还说王士珍对维持北京秩序有功，继续留任参谋部总长职务至是年底。

段祺瑞重掌北洋政权后，与总统冯国璋在对付南方护法军政府的策略上，发生分歧。冯国璋为了拉拢西南军阀，提出了与段祺瑞“武力统一”相对立的“和平统一”政策，并暗中指示与他有联系的北洋将领通电主和，致使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遭到失败，不得不于11月15日辞去本兼各职，王士珍被任命为陆军总长，30日冯国璋又任命王士珍署理内阁总理。但此时段派势力正盛，致使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遭到段派的阻碍和破坏。王士珍虽极力主和，但他不敢轻易冒犯刚愎自用的段祺瑞，使反战主和旗号暗淡无光，措施软弱无力。当冯国璋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后，王

士珍也立即向段妥协，将陆军总长一席让于段祺瑞亲信段芝贵。尽管如此，在王士珍任总理期间，还不断受到段派机关报的恶意攻击，段祺瑞还多次指使徐树铮等人进行倒阁活动。经不起风波的王士珍，终于1918年2月20日借病请辞。冯国璋特任内务总长钱能训兼代国务总理。

1920年10月，江苏督军李纯暴死于南京任所，总统徐世昌保荐王士珍为苏皖赣巡阅使，王辞以老病。第二年特任为德威上将军，管理将军府事务。未几，王士珍辞去军界职务，以“野鹤闲云”自处。不久，宣布担任月薪五百元的北京电车公司董事长。在此期间，王士珍曾回正定小住，为伯母和生母建造“节孝牌坊”。直皖战争、直奉战争时，王士珍以北洋元老身份从中调停。

1925年2月1日，段祺瑞召集善后会议，推王士珍为善后会议议长，王坚持未就。

1926年5月，吴佩孚联络张作霖、阎锡山“讨伐”国民军。及国民军退出北京，王士珍被北京社会团体及知名人士推为京师临时治安维持会会长和京师救济联合会会长，以维持北京秩序，并一度调和直奉之间矛盾。

1928年5月，蒋、冯、阎向张作霖发动全线攻击，王士珍、熊希龄等人在北京发起和平运动。张作霖退出北京，王士珍再次出任治安维持会会长，电请南京政府迅速和平接收京津地区。

王士珍在军政界多年，各界都比较相信他，因此他两次组织治安维持会，尽心竭力维持社会秩序，使北京免遭战争灾难，为京师民众所钦重。此后，王士珍还曾几度主持北京

的慈善事业。

1930年7月1日，王士珍患肠癌在北平去世。

注：

- ① 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第六集，第161页，台湾新生报社出版，1981年9月30日。
- ② 尚秉和：《德威上将军正定王公行状》第3页，北平文楷斋承刻印。
- ③ 同②，第4页。
- ④ 刘凤翰：《武卫军》第193、492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78年6月。
- ⑤ 同①，第163页。
- ⑥ 李宗一：《袁世凯传》第173页，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11月。
- ⑦ 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第2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6月。
- ⑧ 见《正定县情》（未刊）。
- ⑨ 同①，第164页。
- ⑩ 同⑦，第94页。
- ⑪ 同②，第9页。
- ⑫ 同①，第166页。
- ⑬ 李希泌、曾业英、徐辉琪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册，第661页，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7月。
- ⑭ 同⑦，第205页。
- ⑮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02页，群众出版社出版，1982年12月。

张敬尧

范春荣

张敬尧，字勋臣，安徽霍丘人，生于1880年9月21日（清光绪六年八月十七日），自祖辈起迁居颍上县南照集。父亲名文奎，号益轩，读过几年书，曾是颍上县衙门包揽诉讼的“刀笔吏”。张敬尧少年时“事游荡、嗜烟赌”^①，当过粮食店的学徒，后因偷盗被乡人驱逐出境，流落到山东为盗，又因杀人逃到京津地区。1896年前后，投入袁世凯的北洋新军，被选入随营学堂（即武备学堂），受训后回到部队担任下级军官，后又在保定军官学堂毕业。1911年任第六镇十一协二十二标标统。武昌起义后，革命军占领武昌、汉阳。清廷命袁世凯派清军援鄂，其中就有张敬尧部。1912年秋，陆军镇、协、标等名称改为师、旅、团，张敬尧任陆军第六师十一旅二十二团团长^②。1913年“二次革命”时期，张敬尧又为袁世凯攻打南方革命军充当先锋，率先从湖口进入江西，立了头功，升任六师十一旅旅长兼南昌卫戍司令。1914年3月任第三混成旅旅长，驻河南。随着北洋军阀势力的膨胀，张敬尧也官运亨通，成了袁世凯手下一名战将。

1914年张敬尧随同刘镇华、张锡元、赵倜各部，围攻白朗起义军，张敬尧率部在鲁山县石庄战败了起义军，自恃“讨狼”有功，向河南督军赵倜“索赏”十万元未遂，袁世

凯为安抚张敬尧，于同年9月将张的第三混成旅扩充为第七师，令张敬尧任师长。当时袁世凯正密谋复辟帝制，为进一步控制军权，采用长子袁克定的建议，于1914年10月成立“模范团”，张敬尧为该团办事处办事员之一。1915年8月24日“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张敬尧与军界四十四人发起“军警大会”，通电响应复辟帝制。

袁世凯公开称帝后，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和反对。12月25日云南起义爆发后，1916年1月，袁命令曹錕为总司令、张敬尧为第二路司令，率第七师、第三师、第八师以及第六师由东路入川进驻重庆，随即向云南进兵，攻打护国军。张敬尧部赶至泸州，攻占兰田坝，进窥纳溪，袁为表彰其战功，授勋三位加陆军上将衔。但是在全国反帝制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北洋军阀很快就遭到失败。3月17日，护国军胜利地收复江安、纳溪等县，张敬尧败回泸州。6月6日，袁世凯死去。不久张敬尧回防河南洛阳。他野心勃勃，想取代河南督军赵倜的地位，因无机可乘，便把目标转向山西。1917年6月下旬，张敬尧制造了一起以驱逐阎锡山为目的的“晋南事变”，谋进兵山西，为北京所制止。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分裂为皖系和直系，张敬尧附皖系。1917年7月，张勋复辟垮台，北洋政府再次为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7月26日，段特派张敬尧督办苏、皖、鲁、豫四省交界“剿匪事宜”^③。在督办任内，张招抚不少土匪头目充当下属军官，其中有个毛思忠，被他收为“假子”，改名张继忠。后来张敬尧入湘，此人曾任张部第七师混成旅第五团团团长。这个团纪律极坏，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湖南

人民称之为“烂五团”。

同年9月，护法战争开始。段祺瑞政府力主对南方用兵，于1918年1月30日下达对西南“局部讨伐令”，派曹錕、张怀芝、张敬尧等率军南下，特任张敬尧为攻岳前敌总司令，进兵湖南。3月2日张敬尧率第七师抵湖北通城，旋攻占湖南平江，准备配合代理第三师师长吴佩孚会攻岳阳。3月中下旬，吴佩孚部连续攻占岳阳、长沙。不久，湖南大部分被北洋军张敬尧、吴佩孚、冯玉祥等部占领。3月27日段祺瑞任命张为湖南督军兼省长^①，而把拥有“战功”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冯玉祥撇在一边。这使吴、冯大为不满，6月和8月他们先后在衡阳和常德前线与南军单独划界停战，不服从段祺瑞的主战命令，一时湖南呈现四分五裂的局面。张敬尧名义上是湘督，实际上只能统治长沙、岳阳一带，吴佩孚统治衡阳一带，冯玉祥统治湘西一带，湖南郴永地区则为原湖南督军谭延闿所据，湘西大部地区又为当地军阀盘踞。湖南人民在大小军阀们统治下，备受摧残，特别是张敬尧，纵兵殃民，无恶不作，湖南人民痛恨张敬尧，称“张督”为“张毒”。

张敬尧督湘二年期间，甘心媚外，大量出卖国家主权，将湖南厂矿、公产盗卖给英、美、日等帝国主义。1919年他向英国银公司借款三千万元，将湖南全省未开的矿产作抵押。11月又把湖南第一纱厂抵给日本东亚兴业株式会社，借日金一百五十万元。12月又把湖南最大的水口山锌矿以矿内锌砂价值充股抵卖给美商公司。此外，张还向私商拍卖沅江官田、湖南银行房产、矿务局的地皮及湘吉轮船等公产。他

想尽办法搜刮民脂民膏，通过滥发纸币、征收多如牛毛的各种捐税对商民敲诈勒索，并私运米、盐，勒种鸦片，大搞投机买卖，从中渔利以肥私囊。据统计，他在湘督任内仅霍丘老家就购置田地三万余亩^⑤。张敬尧在湖南还大搞愚民政策，摧残教育事业，克扣教育经费，令其部下长期占据学校，停止招生，七个月不给教员发薪。他还安插亲信，控制教育会、工会等群众团体，使之变为安福系在湖南的分支机构，以维持他的反动统治。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长沙学生也走上街头，组织讲演团，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张敬尧对学生的爱国行动恨之人骨，诬蔑学生是“过激党”，抓到警署拘禁。为了讨好日本，张敬尧以督军兼省长身分发出布告，不许学生“妄干政治”，严禁抗日运动，不准罢课。为了钳制舆论，他下令封闭《湘江评论》、《新湖南》、《救国周刊》等进步杂志，甚至连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长沙《大公报》和《湖南日报》也遭罚禁多日。张敬尧兄弟四人（即敬尧、敬舜、敬禹、敬汤）穷凶极恶，深遭湖南人民痛恨。当时在湖南人民中流传一首歌谣：“堂堂乎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⑥

湖南革命学生因忍无可忍，开展了“驱张”运动，各界人民纷纷响应。12月2日，学联发动长沙各界在教育坪开会，举行焚毁日货大会，被张派人驱散。于是学联宣布总罢课，罢课宣言宣称：“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⑦驱张运动中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起了带头作用，他们联合湖南学生界、教育界及其他各界人士，利用军阀间的矛盾，大力开展驱张宣传，并组织请愿团向北京政府控告张敬尧罪

状，用大量事实揭露了张的祸湘罪行，舆论界一致口诛笔伐，使张臭名风闻全国，狼狈不堪。1920年5月，北洋军阀直皖二系酝酿战争，吴佩孚、冯玉祥从湖南撤防北归。他们本与张敬尧有矛盾，也想借助群众的驱张形势打击皖系军阀。吴佩孚与南军达成默契，吴军退一步，南军进一步。1920年6月11日，张敬尧部在势单力薄情况下，不战而溃，逃离长沙。张退到岳州时，北京政府于6月13日给予他撤职留任处分，褫夺其湘督兼省长职，但仍令他率部反攻。6月26日，张敬尧复退出岳州，在湖北嘉鱼暂驻。6月29日，北京政府认为张守土不力，“实属咎无可道”^⑧，令他到北京听候查办，交出军权，其余部由吴新田收容。张敬尧被革职后，移居上海，行动诡秘，企图伺机东山再起。8月，他秘密窜回汉口，唆使张敬汤率残部向武昌进扰，两湖巡阅使王占元部逮捕并处决了张敬汤。张敬尧见势不妙，于10月1日夜只身逃往上海。这时正是直皖战争以后，直系吴佩孚、曹錕控制了北京政府。与直系联合打败皖系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扩大势力，收买失意军阀，容纳了张敬尧，并委为随员，派驻北京。张作霖为了利用他，还电请国务院陆军部撤销对张敬尧的查办令。以后张敬尧就成了张作霖的座上客，经常参加奉系的特别军事会议。1922年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失利，张敬尧又投靠了吴佩孚。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錕被囚，吴佩孚逃出北京。张敬尧被捕，但后来冯玉祥为了表示“宽大”，又把他放了。

1925年张敬尧投奔张宗昌，任直鲁联军第二军军长。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盘踞在长江中下游的

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迅速被击败。11月，张作霖、张宗昌与孙传芳联合成立了安国军，分两路南下，与国民革命军对抗。此时，张敬尧任安国军第二方面军团副司令。1927年9月，他率军驻守皖北及陇海线，国民革命军派人向他策反，张伪装投诚，被暂编在第十一军军长马祥斌部下^⑨。但不久他又反水，并乘机把马掳到北方，向张宗昌献俘，使马遭杀害。

1928年1月，蒋介石的军队与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的安国军、直鲁军在苏、豫、晋、鲁一带展开激战。结果直鲁军在商丘、徐州等地大败。张敬尧被击溃后，其余部由阎锡山收编。1928年9月，张宗昌收集直鲁军残部编成六个师，分三路与白崇禧率领的第四集团军作战，张敬尧又出任第五师师长，旋遭失败。10月，张敬尧逃到大连，追随张宗昌，与清室遗老恭亲王溥伟联合，以溥仪为号召搞东北独立。1929年1月，张敬尧得张宗昌六万元活动经费前往济南，乘日军自山东撤退之际，联络原直鲁军残部，企图盘踞胶东。结果被国民党军刘珍年部打败。1932年张敬尧投靠了伪满政权，充当日本和伪满的暗探。1933年日本侵略军大举向华北进犯时，委张敬尧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供给七百万元活动经费，命令他乘日军侵占唐山、天津之际，潜入北平城内，策动旧部并勾结流氓，作日军攻城时的内应。5月7日清晨，张敬尧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内，被国民党特务处华北区派去的特务暗杀，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⑩。

注:

- ① 《张敬尧小史》，《天问》第四、五期合刊，第35页。
- ② 《天津历史资料》第十一期，第83页。
- ③ 《晨钟报》1917年7月27日。
- ④ 《晨钟报》1918年3月28日。
- ⑤ 《五四时期湖南人民驱逐封建军阀张敬尧的革命斗争》，《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二期，第35页。
- ⑥ 张国基：《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相处的日子》，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一辑，第33页。
- ⑦ 《湖南学生全体解散详情》，《燕阳请愿录》第10页。
- ⑧ 《晨报》1920年6月30日。
- ⑨ 许和钧：《关于张敬尧》，《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第117页。
- ⑩ 郑庭笈：《张敬尧被打死在北平六国饭店的经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第254页。

龙 济 光

吴显明

龙济光，字子诚，一作紫宸，彝族，云南蒙自县人，曾任蒙自县逢春岭（现属禄春县）纳更土司。1867年（清同治六年）生。兄弟三人，长兄龙觐光，次兄龙裕光。

龙济光没有读过什么书，少时学过武术，喜欢舞刀弄枪，性气刚强，身体粗壮。光绪年间在蒙自、临安（今建水）、广南办团练，曾参予镇压滇南人民的反清斗争。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广西爆发了游维翰、王和顺、陆亚发、陆亚宋领导的大规模的人民反清运动。1903年4月，清政府急忙把广西籍的署四川总督岑春煊调署两广总督，督办广西军务，调集广东、广西、湖南、云南、贵州五省兵力共十余万人前往镇压。此时驻防云南广南县弄汪地区的续备营补用同知龙济光也被调去“会剿”。龙除了率领续备营的基本队伍外，还在文山、蒙自、建水、个旧、金平、屏边等地招募五千新兵，作为补充。

同年秋，这支队伍从广南、富州（今富宁）进入广西百色地区，由岑春煊装备一新，依为股肱。龙济光任边防军济字营统领，伙同滇军武威营王镇邦等部执行“剿抚兼施”的政策，捉住了百色地区游勇首领游维翰，加以杀害。龙并收编了凌云的游勇韦尚、林西，东兰的游勇容有元等。之后龙济

光率部由滇桂边境的百色一直打到柳州。同年他升任广西省右江道，又会同荣字营统领陆荣廷在南宁、柳州一带剿抚“四十八峒”、“五十二峒”的游勇。1905年2月，在古板饭峒（属五十二峒）捉住了柳州地区游勇首领陆亚发，解送桂林，在岑春煊亲自指挥下，凌迟处死。

1907年12月，孙中山、黄兴领导的革命党人攻占了镇南关（今友谊关）右辅山炮台，广西巡抚张鸣岐限令龙济光和陆荣廷部七日夺回。他们如期夺回后，对革命人民大肆杀戮。龙济光因屡立战功，受岑春煊的荐举，1908年署理广西提督。1909年补为实授。

1911年4月，广州革命党人起义失败后，两广总督张鸣岐鉴于水师提督李准自成体系，挟功凌上，不易驾驭，遂奏调桂军入粤。不久，龙济光率广西军队调往广东，任陆路提督及陆军第二十五镇统制。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到广东，全省沸腾，很多县都在革命党人领导下组织民军，发动起义。新军协统李万祥劝龙反正，被龙下令拉出衙门枪决。

在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下，广东各地民军向广州进逼。11月8日，广州绅商联合各界代表在咨议局开会，张鸣岐也派代表出席。会议商定广东次日独立，推张鸣岐为都督，龙济光为副都督。张鸣岐不敢就任，微服逃走。次日，绅商代表又举龙济光为都督，龙避不就职。各界代表重新推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在胡未到广州前，由新军协统蒋尊簋代理都督，军政府乃成立。11月10日胡汉民由港前来就任，各路民军纷纷入城。龙济光为形势所迫，不敢反抗。龙部十

多个营，经过多方调停协商，开赴高雷各属驻扎。

同年12月下旬，孙中山自欧返国，就任临时总统，调胡汉民任总统府秘书长，由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1912年2月孙中山辞临时总统后，4月广东省议会推胡汉民复任广东都督，龙济光副之；12月袁世凯任命龙为广东副护军使。

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陈炯明于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通电讨袁。7月26日袁世凯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镇抚使，督师倒陈。7月30日夜，龙率所部抵肇庆。8月3日袁世凯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都督兼署民政长。龙接袁命令后，率兵会同李耀汉部由西江直向广州，8月4日，陈炯明避往香港，广东取消独立。龙济光从此占据广东。

龙济光在广州防范革命党，甚于当年张鸣岐。各城门均有军警把守，进城的人须经搜检才放行。各名胜风景区，都筑有碉楼，有兵士防守。胡、陈掌权时的官吏，凡参加过同盟会或国民党的，均避嫌离职。唯一留任的警察厅长陈景华，龙也不放过，于9月15日（农历中秋节）晚，以赏月为名，将陈景华骗入督署杀死。稍持正义的报馆皆被封闭。

1914年6月30日，袁世凯下令废除各省都督，特任龙济光为振武上将军督理广东军务，并准许在广东开府建衙。龙在观音山大兴土木，建筑振武楼夸耀战功，妄图把观音山扩建成可以长期坚守的“天堂”。

龙济光夺得广东这块富庶的地盘后，对广东人民肆意敲榨盘剥。他公开纵吸鸦片，大收烟捐、赌捐、花捐。云南蒙自“顺城号”周伯斋、周启斋弟兄，也随去广州为龙理财。龙氏及其所属滇籍中上级军官和官僚们的钱财，都由“顺城

号”汇回云南。龙济光私人还有一艘约两千吨的商船，往来于香港、广州、海南岛、越南海防之间做买卖，所得的利润存在香港。

龙济光统率的振武军，系杂凑而成。这支队伍纪律很坏，龙济光又以“清乡”为名，纵容部队胡作非为。“济军所至，奸淫掳掠，井里为墟，商舶裹足。各属有绝粮之危，万家闻痛苦之声。”^①

在袁世凯、龙济光的反动统治下，广东人民从未停止反袁反龙的斗争。1915年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而龙济光竟电袁请提灯庆祝。广东革命党人早已恨透他，亟欲得而甘心，龙因此戒备森然，深居简出。7月17日龙济光从观音山驻地前往其兄龙觐光宅，当行至积厚街时，中华革命党人钟明光向他丢了一颗炸弹，伤龙左足，卫队死伤多人。钟当场被捕，次日遭凌迟处死于振武楼侧。

同年冬，袁世凯帝制自为，册封龙济光为一等公。1916年1月，龙济光派兵打退攻入惠州的陈炯明部讨袁军，袁世凯又加封龙郡王衔。

当蔡锷、唐继尧等通电各省宣告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袁时，袁世凯指示龙济光假道广西向云南出兵，1916年2月8日任命龙觐光为临武将军兼云南查办使，进袭滇南。当龙部先头部队进入滇境时，大部还在广西，受到护国军和桂军马济部的夹击，3月12日在广西百色被迫缴械，龙觐光被扣留于南宁。陆荣廷在解决龙觐光部队后，于3月15日宣布广西独立。

4月6日，龙济光在广西护国军和广东民军压力下被迫宣布广东“独立”。他宣布独立时取得了袁的指示和谅解，同时密请袁派兵帮他“平乱”。4月12日，龙以广东各界代表的名义在海珠水警署召开会议，筹商反袁军与龙济光合作等事宜。会上因意见分歧，龙部警卫军统领颜启汉忽然行起凶来，当场将陆荣廷的代表汤觉顿等人击毙。龙的假独立完全暴露，反袁各军决定以武力对付龙。龙感到危急，4月19日亲去肇庆同陆荣廷达成妥协，承认在肇庆成立两广都司令部等五项条件。

5月1日，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在肇庆成立，岑春煊任都司令。5月8日，又在肇庆成立了军务院，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蔡锷、李烈钧、陆荣廷、龙济光、陈炯明、刘显世、梁启超等为抚军。龙参加反袁非其本意，视护国各军如仇敌，节节布防。6月6日袁死，他未得肇庆军务院同意，擅自于9日电北京取消广东独立，投靠段祺瑞政府。6月，李烈钧率领的云南护国军第二军假道广东韶关北进，龙拒绝李军过境，令南韶连镇守使朱福全闭门不纳，两军发生冲突，龙军开炮轰击，护国军愤怒反击，攻破韶城，朱福全部投降。接着护国滇军由源潭趋清远而攻兵工厂，桂军过三水而攻佛山，陈炯明旧部邓铿、钟景宁也向龙军包围压迫。龙军大败，退守广州。龙见大势已去，只好接受段祺瑞提出的调停意见，10月14日双方撤退军队，龙将督军印信交与省长朱庆澜转陆荣廷，赴琼崖任两广矿务督办。

1917年秋，护法战争开始。段祺瑞于11月任命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指使龙率领残部进攻广州。1918年1月，

龙军占领雷州半岛及沿海各县，并进占阳江、恩平、化州等地。在粤、桂、滇军等组成广东讨龙军，转入反攻。同年1月31日，讨龙军魏邦平部攻占阳江、恩平等县，龙军败走。

4月18日，讨龙军攻占茂名。25日，讨龙军攻占化州。29日，广东督军署举行讨龙祝捷大会。海南岛琼东县龙部警卫营长杨锦龙也联络当地黎民宣布独立，反对琼崖镇守使龙裕光，并攻占了万宁、陵水等县。龙军被打得丢甲弃枪，连海南岛也不能立足。龙济光带领残部千人，在同年6月初泛海而北。到塘沽后，段祺瑞指定天津小站作为他屯兵之处。

1920年7月11日，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失败，段祺瑞下野。奉军入关，进攻小站。龙军向东南撤退，溃不成军，派员向奉军求和。同年冬，全部官兵被奉军缴械遣散。

1921年1月，北洋政府始免龙济光两广巡阅使职，入将军府为将军。1922年龙患半身不遂，寓居北京朝阳门内私宅养病，1925年3月12日病死。

注：

- ① 《伍廷芳等致黎总统、段总理请罢除龙济光电》，《义声报》1916年3月12日。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罗峰南：《龙济光和振武军的兴亡》，《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 ② 李朗如、陆澍：《从龙济光入粤到粤军回师期间的广东政局》，《广东文史资料》第一辑。
- ③ 杨家骆编：《民国名人图鉴》第一册。
- ④ 普梅夫：《关于民国初年广东督军龙济光》。
- ⑤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 ⑥ 《广州市沿革史略》第十三章《济军时代的广州》。
- ⑦ 黄孟苍等：《覃老发、陆亚发等在四十八岸的反清斗争》，《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 ⑧ 林宝航：《广西游勇》，《辛亥革命回忆录》（六）。
- ⑨ 李朗如、陆满：《辛亥革命时期广东军民概况》，《辛亥革命回忆录》（二）。
- ⑩ 苏镜川：《护国第二军在开化、广南、富州一带军事行动经历记》，《云南文史资料》第十辑。
- ⑪ 陈润之：《护国第二军始末简记》，同上。
- ⑫ 郜孔昭：《云南讨袁护国第二军入桂粤亲历记》，同上。
- ⑬ 陈良佐：《陆荣廷的讨袁护国》，《广西文史资料》第十三辑。
- ⑭ 《广东战事近闻》，《义声报》1916年7月25、28日。

陈 炳 焜

刘立道

陈炳焜，字舜琴，1868年11月11日（清同治七年九月二十七日）生于广西马平县（现柳州市）一个破落仕宦家庭。因生活困难，陈炳焜幼年随母到陈团村刘姓地主家帮工，伴地主之子在私塾读书四五年。长大后，听说边关谋事较易，于1885年前往龙州，在广西提督衙门当戈什哈（满语，即卫士）。因稍通文字，聪明能干，为提督苏元春所赏识。陈在提督衙门五六年，学到了很多官场礼节和公务处理知识。先后认识了马盛治、陆荣廷、谭浩明、林俊廷等人，并与陆结为把兄弟。1891年，陈因事被提督苏元春斥责，愤而离去，投靠统领马盛治，被委为镇南营哨长。由于对部队的整顿训练有成绩，不过三数年，得越级升充管带。1904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请清政府将镇南营、熙字营和健字营合编为荣字营，以陆荣廷为统领，统兵十营；陈炳焜擢升营务处（略等于助理帮统）兼附中营管带，深得陆的信任。陈精明强干善交游，与荣字营的管带如谭浩明、林俊廷、韦荣昌等来往极为亲密。

这年5月，柳州附近会党游勇推陆亚发为领袖举行起义，藩司王芝祥急调陆荣廷率部镇压，陆荣廷将附中营及附左营、附右营共三营交陈炳焜指挥，防守镇南关（今友谊关）。

龙州、水口一带边区重地，营务处设在关前隘。翌年，起义军及所属游勇会党先后被平定，陆荣廷调任左江镇总兵，回驻龙州，陈仍驻守关前隘。

1907年12月，孙中山发动镇南关起义，占领了右辅山炮台，守炮台的正是陈炳焜的附中营前哨哨长。清廷限令陈炳焜克日夺回炮台，否则即予严办。陈炳焜等疯狂反扑，终于从革命军手中把炮台夺回，清廷遂免治其罪。

1908年春，清政府在龙州开办广西陆军讲武堂和学兵营，陆保送陈进讲武堂受训。毕业后，适值广西新军成立，陆又保荐陈为新军第二标标统。

1911年武昌起义后，广西于11月7日宣布独立，原广西巡抚沈秉堃为广西都督、布政使王芝祥和陆荣廷为副都督。不久，沈、王辞职离桂，陈炳焜等乘机拥陆荣廷为都督。1912年2月，陆委陈为都督府军政司司长。1913年4月，北京政府特任陆荣廷为广西都督兼广西民政长，他将全省军队改编为两个陆军师，任陈炳焜为第一师师长，驻桂林；谭浩明为第二师师长，驻龙州。

同年7月，孙中山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陈炳焜帮助陆荣廷逮捕过境的革命党人，镇压了响应二次革命的柳州起义。1914年7月，陈炳焜以第一师师长兼任桂林镇守使，主持桂林军民两政。

1915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在各省培植私人势力，9月派其亲信王祖同为广西巡按使，对陆荣廷进行监视。陆一面联合王祖同上书劝进，表示拥戴袁；一面称病回武鸣原籍休养，暗中进行倒袁活动，而调陈炳焜来督署暂代行代拆。

1916年3月15日，陆通电广西独立讨袁，亲率武卫军进军湖南，派莫荣新等进军广东，以陈炯焜留守南宁。5月，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在肇庆成立，陆荣廷、陈炯焜均为抚军。6月，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总统，黎任陆荣廷为广东督军，陈炯焜为广西督军。陈任督军后，认为政局变动莫测，决心整军经武，于1917年5月创办了学兵模范营，以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马晓军为中校营长、马子骏为少校营附，陆军大学毕业生朱为珍、曾致沂、黄旭初、苏端分任一、二、三、四连连长。^①

1917年春，陆荣廷受任两广巡阅使，陈炯焜调任广东督军，谭浩明接任广西督军。不久北京府院之争加剧，陆荣廷以总统黎元洪受到威胁，遂于6月20日授意陈炯焜、谭浩明宣布两广自主。7月，孙中山率领部分海军军舰南下广州护法，陈炯焜秉承陆荣廷的意旨，口头上欢迎护法，实则多方进行破坏。如广东警卫军是广东省长朱庆澜收编龙济光余部扩编而成，共有四十营，朱欲交孙中山作北伐使用，陈炯焜借口军权须统一于督军，企图吞并以扩大私人势力。后经林虎等人斡旋，陈炯焜始允拨二十营交陈炯明组成援闽粤军。又如朱庆澜出走后，广东省议会选举胡汉民为广东省长，陈不予承认。广东各项税收，均为陈所垄断把持，他拒绝担负军政府和非常国会的经费，企图从经济上扼杀军政府。这是以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力量所不能容忍的。加之陈炯焜任广东督军期间，与其参谋长秦一民在广州包烟包赌，贪污掠夺，大饱私囊，深为粤人所痛恨，陆荣廷为缓和矛盾，不得不于1917年11月调陈回桂会办广西军务，1918年6月又委他为广

西省长。但因陈刚愎自用，不大听陆的话，做事操切，不得人心，任省长一年即辞职，回柳州家中闲住。

1920年8月，桂系通过军政府下令进攻援闽粤军，孙中山命令在闽粤军回粤驱逐桂系在粤势力，桂军败退回桂。陆荣廷等不甘心在广东的失败，1921年4月欲再次进攻广东，陆向北京政府保荐陈炯明为护军使，在梧州组织护军使署策划东进。以韦荣昌、刘震寰等部为攻粤中路军，驻贺县一带的沈鸿英部为左路军，驻玉林一带的黄业兴部为右路军，其余部队统为谭浩明指挥，策应各路，作进攻广东的准备。6月孙中山下令讨伐陆荣廷，分三路进攻广西。陈炯明的中路军在梧州首先失败，粤军水陆并进，长驱直入，桂军左、右两路军接踵溃退。陈见大势已去，无法挽救，匆匆跑回柳州，携带家属经湖南逃往天津。以后在香港、天津过寓公生活。1926年，返柳州原籍。1927年9月1日在柳州病死。

注：

① 黄绍竑：《五十回忆》（上）第37页，云凤出版社1945年12月出版。

谭 浩 明

刘立道

谭浩明，字月波，广西龙州县水口村人，壮族，1871年7月3日（清同治十年五月十六日）生。他的父亲谭泰源，业农兼撑水口渡船。谭幼年失学，识字不多，从小就帮父亲耕种、撑船。1878年，陆荣廷流浪到水口，得谭泰源之助，帮谭家撑渡船。娶谭浩明的大姊为妻，谭与陆遂为郎舅亲。1886年中法战争后，陆荣廷聚集三点会众，结成小股武装，活动于中越边境一带，谭浩明也入了伙。至1893年，这支百余人的绿林武装，接受了广西提督苏元春招抚，陆被委为管带，谭浩明则为哨长。不久，开赴金龙、化岗、靖西、西林等地，招抚当地其他游勇、会党和绿林武装，队伍逐渐扩大。1896年，陆升任督带，谭升哨官。到1911年6月，陆升任广西提督，谭亦随之升为广西巡防营统领，驻在南宁。

武昌起义爆发后，11月上旬广西独立，陆荣廷被推为副都督，旋任都督兼民政长，他将全省军队改编为两个陆军师，谭浩明为第二师师长。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江西、安徽、广东等省先后举义。陆荣廷支持袁世凯，谭曾奉陆令杀害了革命党人甘尚贤。1914年7月，谭以师长兼任龙州镇守使及广西边防对讯督办，驻龙州。

1915年冬，袁世凯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活动，陆、谭曾

联名上劝进表，袁封陆为一等侯，封谭为二等男。1916年元旦，袁世凯改元“洪宪”。陆因不得袁信任，又在3月15日宣布广西独立讨袁，进兵湖南和广东。4月6日，广东督军龙济光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也宣布独立。5月1日，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成立，谭浩明为护国军第五军军长。

6月6日，袁世凯死，大权落入国务总理段祺瑞之手。6月9日，广东龙济光取消独立，阻挠滇军李烈钧取道广东北伐。陆荣廷遂令谭浩明移师广东，协同在粤各军驱逐龙济光。驱龙后，陆于7月6日就任广东督军。次年4月，升任两广巡阅使，他以原广西督军陈炳焜为广东督军，调谭浩明为广西督军。

在陆荣廷授意下，6月20日，谭浩明和陈炳焜宣布两广自主。段祺瑞肆意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派北洋军入湘，准备进攻两广。谭浩明受陆荣廷派遣，就任“粤桂联军总司令”，于10月初统率桂军韦荣昌、林俊廷、陆裕光的第一、二、三军和粤军马济的第一军，林虎第二军的第三团，以及马晓军的模范营（后改称总部卫队第一营）“援湘”。这时湖南护法军将领程潜、刘建藩、林修梅等已在衡阳设立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推举程潜为总司令。谭率部进入湖南，改称湘粤桂联军总司令。10月12日，联军与北洋军王汝贤、范国璋等部在衡山耒阳一带开战，激战十二天，占领衡山县城。11月12日占领双峰。17日、18日又占领湘潭、醴陵，前锋进占长沙，王汝贤、范国璋不战而退。24日，湘南护法军总司令程潜在长沙就湖南省长职，谭浩明抵长沙后颇为不满，通电宣布暂以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兼领湖南军民两政事宜，逼得程潜

只好辞去湖南省长职。

1918年1月27日，湘粤桂联军占领岳阳，次日占领羊楼司，前哨到达湘鄂两省交界线上。但湖北是直系地盘，陆荣廷企图“联直倒皖”，指示联军不得进入湖北境界，谭浩明遂按兵不动。这时，北洋军阀直、皖两系在南北和、战问题上分歧很大。直系主和，皖系主战。由于皖系得到奉系支持，直系只好迁就，派曹錕、张怀芝分任第一、第二路军总司令，分途进兵湖南。

1918年2月6日，曹錕到汉口成立第一路总部，第二路总司令张怀芝于3月6日也到达南昌，前线战云密布，谭浩明仍然未做任何应战准备。3月初，直系吴佩孚军绕过羊楼司直取云溪，湘军首先被击溃，桂军第三军冯浦澄团也被击败。联军不战而放弃岳阳，向长沙溃退。18日吴佩孚部占领岳阳，张敬尧部占领平江。岳阳失守时，谭浩明加紧在长沙搜刮钱财，并且张贴四言布告：“岳阳小挫，兵家之常；本帅坐镇，自有主张。谕尔人民，毋得惊慌；造谣惑众，明正典章。”^①24日，谭还身着戎装，骑上高头大马，巡视长沙大街，以示镇定。可是当天午夜，他却乘小火轮经湘潭向南逃走了。25日联军撤离长沙，桂军向湘桂边境退却，湘粤军退守耒阳、郴州一带。联军溃退时，既无行军序列，更没有退却的作战部署，沿途强抢粮食，掠夺财物，湖南人民惨遭浩劫。吴佩孚于4月24日占领衡阳后，即不再前进，湖南战场暂时沉寂下来。6月联军总司令部迁回南宁，此后就无形取消了。谭浩明仍做他的广西督军。

谭鉴于援湘溃败的教训，决心实行军事改革。他成立广

西陆军混成旅，以李祥祿为旅长，尽量任用陆军学校学生为各级军官。又将卫队第一营加以补充，仍以马晓军为营长，费旭初为营附，白崇禧任第一连连长，黄绍竑、张守义（张淦）、廖光为第二、三、四连连长。1919年元月，又开办广西陆军讲武堂，以金永炎为堂长。各军科长、队长、教官都聘用日本士官生和保定军校学生。每期学员一千四百余人，步、骑、炮、工、辎各科俱全，中下级军官和军官子弟均能入学。如陆荣廷之子陆裕藩、谭浩明的兄弟谭浩澄、谭浩清和儿子谭文茂等都来此受训。

在广西建设方面，谭浩明提倡植棉（广西缺少棉花，每年因此耗资甚大），是年在南宁成立“广西棉业促进会”，自兼会长，出版“广西棉业促进会刊”。除开辟示范棉场外，还在南宁郊外设立棉业讲习所，每县选送一人来所学习，毕业后，回县指导农民种植美棉。但他推广植棉的活动，由于具体机构工作不力和选种等方面没有因地制宜而失败了。

1920年8月，孙中山命援闽粤军回粤，驱逐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是年冬，所有在粤的桂军都被逐回广西。1921年元月，陆荣廷进行反扑，计划分兵三路攻粤，以陈炯明指挥韦荣昌部从梧州取肇庆，以林虎部（林辞职去沪，部队由黄业兴代）取广东南路高州等地，以沈鸿英部取广东四会等地，其余部队由谭浩明指挥。6月，孙中山令陈炯明、许崇智等率领粤军入桂，讨伐陆荣廷。桂军刘震寰部在梧州前线倒戈，梧州不守，陈炯明、韦荣昌、黄业兴等相继溃败，沈鸿英见势不妙，退回贺县，通电宣布“自治”，迫陆下野。各路粤军乘胜前进。谭浩明在玉林督战，部众不多，士气低落，茂

林桥一战，全线溃败。他逃回南宁，粤军又从大河和宾阳分路向南宁进攻。陆、谭率领残部万人匆匆向左江撤退，打算在崇善、龙州间作背城一战。但因大势已去，军心涣散，终于无法挽回败局，7月16日，陆荣廷、谭浩明宣布下野，从龙州入越南逃往上海。

陆、谭出亡后，仍与北洋政府相勾结，企图东山再起。1922年6月，粤军全部退出广西。北洋政府任陆荣廷为广西边防督办，谭浩明也随陆回到龙州。1924年初，陆出巡被沈鸿英围困于桂林，谭浩明率领谭浩澄、邓大模、马遼等部前往解围，中途被沈军击溃。陆荣廷得吴佩孚、赵恒惕武装调停，从桂林脱身，宣布下野。谭将所部交谭浩澄率领返靖西一带活动，自带随从数人随陆入湖南。后又随陆去上海作寓公。

谭浩明文化不高，对读书人和所属军官较为重视。他为人圆滑，很少与同僚争执，故手下的文武官员，愿为他效劳。他胆小心细，遇事向陆荣廷请示，按照陆的意旨办理，因此能统治广西多年。

1925年4月17日，谭在上海私宅因蹂躏其随从副官黄永福的未婚妻，被黄暗杀。

注：

① 据当时随军将士冯璜等的回忆。

沈 鸿 英

黄秀颖

沈鸿英，又名沈亚英，字冠南，1871年（清同治十年）生，原籍广东恩平，前代家业破落，迁居广西雒容。沈幼年家贫，读私塾二年，父母早亡，跟随哥哥沈鸿辉以肩挑小贩为生。长大曾当店员，替地主当帮工，后沦为盗匪，宣统年间，常出没于柳城、雒容、象县、罗城、修仁、荔浦、富川、贺县等地。沈身强体壮，性狡黠，行动强悍，被推为匪帮头目。

1911年武昌起义后，11月柳州独立。沈鸿英带领匪伙百余人接受柳州革命党人的招抚，被任为管带，隶属刘震寰统辖。1912年沈因捕杀密谋叛变的民军队长冯五，被提升为督带。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沈鸿英帮助广西都督陆荣廷镇压了响应二次革命的柳州起义，出卖了革命党人刘古香，帮统刘震寰被逐，沈由此得到陆荣廷赏识，被提升为帮统。不久，被派到富川、贺县一带平息了“匪乱”，更得陆荣廷的信任，升为统领，成为旧桂系军阀的重要人物。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发动。1916年3月，陆荣廷为形势所促，宣布广西独立讨袁。同年6月，袁世凯死，广东督军龙济光与段祺瑞勾结，广东取消独立并阻滇军假道北

伐，被在粤护国军击败，率部退往海南岛。讨龙战争时，陆荣廷命沈部开进广东，参加作战。沈在战争中攻城略地，尚肯卖力，被陆任为钦廉镇守使。1917年12月龙济光渡海进攻高雷，陆荣廷组织讨龙军一、二、三、四军，沈鸿英任第三军总司令。

在讨龙作战中，沈奉命率部渡海攻击，龙抵抗不住，被迫率残部乘轮北投段祺瑞。其后，沈部改为广东护国军第三军，沈任总司令并调任琼崖镇守使。沈因缴了龙部的大量枪支弹药，实力益增，成了旧桂系军阀的显赫人物。1919年冬，沈部调驻北江，任南韶连镇守使兼粤赣湘边防督办。沈在韶关曾开办讲武堂，培训中下级军官、培植势力。

1920年秋，孙中山命陈炯明率领驻福建的粤军回粤，驱逐盘踞广东的桂系势力。沈鸿英军败退广西，陆荣廷把沈部改编为广西边防军第三路军，沈任总司令，下辖三个旅驻防贺县、平乐一带。

桂系军队自被逐回广西后，陆荣廷企图东山再起，重占广东地盘。陆曾获得北洋政府的支持，被委为广西边防督办；陈炯明被委为广西护军使。陆、陈在梧州集结兵力，准备反攻广东，命沈鸿英由贺县进攻连山、连县、阳山。1921年6月下旬，孙中山派粤、黔、滇军平定广西。陈炯明率粤军第一军溯江西上，初时遭到陈炯明部的顽抗，后陈部将刘震寰率数百人倒戈，袭击梧州侧背，使桂军防线崩溃，梧州遂为粤军占领。北江方面，许崇智部向富、贺挺进，沈鸿英见势不妙，在贺县发出通电，逼陆荣廷下野，宣布自治，自称为救桂军总司令。粤军怀疑其为诈降，继续进攻沈部，沈

乃率部逃到湖南，依附赵恒惕。其后，沈通过岑春煊等人的疏通，获得直系吴佩孚的支持。吴于1922年6月将沈部列为北洋陆军第十七师，委沈为师长。

1922年春，广西境内的粤军回粤。7月沈奉吴佩孚之命率师从江西西部向广东进军，屯兵大庾。因图粤不成，11月回到桂北，占据桂林、柳州、梧州一带。他怀着囊括广西全省的野心，收编各处自治军，成为桂军中实力最大的一支队伍。

这年6月陈炯明叛变革命，孙中山退居上海，策动滇桂军各部发动对陈炯明的进攻。当时在广西境内的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和沈鸿英部，孙中山都派了代表分别联系，委杨希闵为讨贼军滇军总司令，刘震寰为讨贼军西路总司令，沈鸿英为桂军总司令。12月沈鸿英派代表黄应山，参加了刘震寰、杨希闵、范石生等在藤县大湮江白马庙召开的军事会议，会商驱陈的战略行动计划。会后，以刘震寰和范石生部从西江右岸东下，向都城、广州之陈军进攻；以沈鸿英一部由怀集向清远、花县方面攻击陈军侧背；沈部主力和滇军沿西江左岸东下向肇庆、三水、广州之陈军进攻。1923年1月，讨贼军把陈炯明部逐出广州。

这时，沈鸿英部已扩充到约一万人，分布在广州、肇庆及北江一带。沈鸿英对孙中山并没有拥护的诚意，联合倒陈是为了在广东发展自己的势力，占地为王，因此他把听命于孙中山的粤军视为眼中钉。滇桂讨贼军进驻广州时，孙中山任命粤军第三师师长魏邦平为广州卫戍司令，后魏又受粤军推举为广东讨贼联军总司令。1月26日，杨希闵、刘震寰、沈

鸿英邀请广州各军将领在江防司令部举行军事会议，讨论分配防务问题。沈在幕后策动，用武力将魏邦平扣留，并将粤军第三师缴械。

2月21日，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24日，任命沈为桂军总司令，并命沈部桂军撤离广州，移防北江一带。沈鸿英阳奉阴违，一面表示愿意遵照孙中山的命令移防，在新街设立桂军总部行营；另一方面又暗中与吴佩孚勾结。吴佩孚想利用沈来拆孙中山的台，3月20日，由北京政府下令特派沈鸿英督理广东军务善后事宜。沈鸿英于4月5日宣布接受北庭任命，次日拂晓兴兵进攻广州。孙中山对沈再次叛变极为痛恨，亲自到农林试验场与杨希闵共同督战，并调回刘震寰部救援广州。经过激烈战斗，终将沈部击败。沈退至银盏坳以北地区。后来，吴佩孚命方本仁、邓如琢率北军和樊钟秀部豫军援助沈鸿英，经过多次拉锯作战，沈军屡吃败仗，经源潭、韶关，狼狈逃窜到赣南的龙南、定南两县，最后窜回广西。西江讨贼军与新桂系黄绍竑部于7月夹击梧州，沈军败退桂林。

在沈鸿英窜回广西之前，陆荣廷已于1922年返回广西，1923年受北京政府委派，就任广西边防督办，沈回广西后遂与陆荣廷发生利害冲突。1924年春，沈鸿英以陆荣廷出巡桂林盘踞不去，派兵包围桂林达三月之久，桂林人民粮食断绝，每天只吃两碗稀粥度日。后来吴佩孚、赵恒惕进行武装调停，沈才解围，让陆荣廷撤至全州。这时，新桂系已袭取了陆的老巢南宁。陆荣廷见大势已去，遂于9月23日通电下野。

陆荣廷下野后，沈鸿英独占了桂林、柳州、平乐一带，与占据玉林、梧州、桂平等处的新桂系的矛盾日益激化。沈鸿英在桂林向广西各地发了一个通电，宣称他为“广西建国军总司令”，准备进攻新桂系。1925年1月，沈部分三路向新桂系进攻：贺县一路，出信都攻击梧州，由其子沈荣光指挥；柳州一路，出武宣攻击浔州（今桂平），由邓瑞征指挥；蒙山一路，出蒙江截击平南至藤县水道，由陆云高指挥。新桂系亦分兵左中右三路迎战：右路军向贺县迎击；左路向武宣、柳州迎击；中路向蒙山迎击。双方同时在三条战线接仗。贺县一路的沈军，因沈荣光指挥无能，一触即溃，退回桂林。柳州方面，双方主力在武宣新墟一带激战，沈军主将邓右文阵亡，邓瑞征率残部弃柳州，分向桂林及长安（今融安）方面溃退。新桂系白崇禧率部向桂林进击，在桂林附近击败沈军，4月占领桂林。沈鸿英率残部窜往长安，后又窜回姑婆山。至此，沈在广西的军事势力完全崩溃。

其后，沈化装成商人潜赴梧州，再乘轮船下香港。沈搜括的民脂民膏，早已在香港、九龙等处置有巨宅和地产，到港后过着骄奢的寓公生活。1938年在香港病死。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广西辛亥革命资料》。
- ② 《广东辛亥革命资料》。
- ③ 《广东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 ④ 《广西文史资料》第一、十六辑。
- ⑤ 《辛亥革命在广西》。
- ⑥ 黄绍竑：《五十回忆》。
- ⑦ 《李宗仁回忆录》。

胡 若 愚

荆德新

胡若愚，又名学礼，字子嘉，云南省罗平县人，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父亲胡兆云是秀才，曾授直隶州同知，未到任。胡若愚自幼读私塾，后转入罗平州两等小学堂毕业。

1910年7月，胡若愚考入云南陆军小学堂第四期，接触了《汉声》、《警世钟》等进步书刊。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云南同盟会组织新军、讲武堂、陆军小学中的进步力量，于10月30日在昆明发动了“重九起义”。是夜，陆军十九镇七十三标进北门直攻五华山北侧的军械局，胡若愚与陆小三四期同学冲出校门，与到达小西门的讲武堂学生分别控制住该门的東西两侧，迎接入城作战的新军。31日，起义军占领昆明，陆小学生被派往兵工厂、造币厂、滇蜀腾越铁路公司、英法领事馆等处执行守卫。11月滇南重镇蒙自发生兵变，胡若愚和陆小同学开赴婆兮（今盘溪）以南，维护滇越铁路交通，稳定南部秩序。

1912年初，胡若愚离滇前往江西，任督署警卫连长。二次革命前，胡若愚奔父丧回到云南。

1914年1月，胡若愚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将校班（后称该堂第六期）。结业后在参谋处候差，军阶上尉。不久，云南政府

征招新兵一千二百人，编为补充队，胡若愚调任第一中队长。训练期满，改称警卫第二团，胡若愚为第一营营长。警卫二团加上唐继虞的警卫一团和陈维庚的警卫三团，成为唐继尧最初的心腹部队。

护国运动中，广东督军龙济光在袁世凯的指挥下，派兵经桂犯滇，一度占领个旧。胡若愚参加迎战，克复个旧。护国运动后期，唐继尧增编军队，胡若愚擢升步兵第十一团团长。

护国运动后，滞留四川境内的滇、黔军与川军在成都相继发生罗(佩金)、刘(存厚)之战和戴(戡)、刘之战，滇军大败。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组织了护法军政府，唐继尧利用护法之名，组织靖国军出师四川，胡若愚团奉令入川增援。这年11月，滇军与川、黔靖国军协同动作，打败了刘存厚，1918年2月，再次占领成都。同年，胡若愚升任旅长。

1920年，川军熊克武等部在“川人治川”的口号下驱逐踞川之滇、黔客军。滇军战败，在顾品珍指挥下离川回滇，胡若愚旅次第退至大关。1921年2月，顾品珍等起兵倒唐。胡一向拥唐，得电急向昆明开拔，军至昭通，为守备司令蒋光亮等部所阻。胡若愚得悉昆明已为顾品珍部占领，进退两难，乃乘机响应孙中山北伐定桂的号召，以张汝骥为团长，率余部数百人经贵州东去。沿途收编了一部分黔军和滇军，兵力增多。广东政府派胡若愚为先遣军司令，令所部往击桂军沈鸿英，胡部获胜，占领桂林。在桂林，胡若愚与出走至香港的唐继尧取得了联系。

1922年春，唐继尧率领部分滇军回滇逐顾，胡若愚任第

二路司令兼前敌副总指挥。旋升前敌总指挥，率领张汝骥、龙云两个梯团。由于唐事先收买了土匪，里应外合，将顾品珍击毙在陆良境内。唐继尧再次督滇，胡若愚调任滇中镇守使兼戒严司令，驻昆明。后改镇滇南，移防蒙自。

1923年，川军发生内战，唐继尧支持熊克武一方。胡若愚受命率部经黔东进入川境。这年10月，胡部滇军配合川军赖心辉，在重庆的悦来场一带与吴佩孚派来援助杨森等另一方的黔军袁祖铭部发生战斗，击溃袁部，占领重庆。12月，杨森等由涪陵反攻，川、滇联军失败，同退贵州，胡若愚部西移毕节。

1925年初，唐继尧与叛变广州政府的杨希闵、刘震寰、陈炯明等相勾结，派出南北两路滇军向桂、粤出动，企图搞垮广州政府。南路滇军龙云于2月底占领了南宁，旋为桂军黄绍竑和驻粤滇军范石生部所围困。胡若愚奉命解围，兼程由毕节赶至南宁。杨希闵等人的叛乱先后被平定，桂军向南聚集，7月，胡若愚等部不得不放弃南宁，经百色返回云南。

多年来，胡若愚作为唐继尧的部属可说是忠心耿耿，卖命征战。但随着唐继尧的堂弟唐继虞等嫡系势力的成长，唐对胡若愚等人逐渐排斥。广西战败后，唐继尧以裁军为名削弱胡若愚等人的实力，胡若愚等人深为不满。1926年秋，在国民革命军胜利北伐的形势下，时任蒙自镇守使的胡若愚与昭通镇守使张汝骥、昆明镇守使龙云、大理镇守使李选廷达成了反唐协议。1927年2月6日，胡若愚等四镇守使在蒙自发出了讨唐通电，并齐集宜良，准备进兵昆明，唐继尧被迫

下台。3月8日，胡若愚就任云南省政府省务委员会主席委员。

“二六”政变后，胡若愚还接受了广州政府任命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九军军长职，但拒绝广州政府派人到云南任职。5月，云南省务委员会发出《云南省政府大政方针宣言》，表面上标榜要奉行三民主义，但又宣称：“其或有过激行为足以扰害社会之秩序者，我政府唯有力为制裁，以维护全省人民之公安。”^①

唐继尧倒台后，四镇守使中的胡、龙、张在争夺云南的政权上矛盾十分尖锐。胡若愚认为，他在唐继尧的手下征战经年，资历较深，加之首倡倒唐，其功远在他人之上，对龙云把持省城昆明颇为忌恨，遂联合张汝骥等在6月14日夜突向驻昆龙部发起攻击。龙部不敌，辗转退至下关。龙云在住所受围，被缴械囚禁。7月23日，龙部卢汉等师反攻获胜，胡若愚只好弃城挟龙云退出昆明。行至昆明以东20公里的大板桥，胡若愚为了摆脱龙部的追击，与龙云签订了《板桥协定》^②，将龙云释放回昆。

但是双方并不打算实行这个协定。胡若愚率部退到昭通，急欲卷土重来，遂与四川的刘文辉和贵州的周西成签订了《三军密约》（草案）^③，共同组成滇、川、黔讨龙军。10月，胡、张两部与周西成派出的中路黔军在陆良会合。12月，龙云打败并收编了唐继尧余部，迎击胡、张部和周部黔军，将他们围困在曲靖城中。1928年1月，胡若愚等突围，溃不成军。黔军左路也失败于陆良马街，川军一旅进至寻甸中途折回。胡、张在云南不能立足，胡若愚前往川南依附刘

文辉，张汝骥东至贵州投靠周西成。

1929年春，蒋桂战争发生。为了夹击桂系，蒋介石通过刘文辉、刘湘，劝说胡、张与龙云化除前嫌，入黔合击附桂的周西成，并委胡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二师师长，张为十三师师长。但胡、张却在川南会合了戍守昭通且已叛龙的师长孟坤，以胡为靖滇军司令，进攻昆明。7月，靖滇军与龙部在昆明西郊的碧鸡关发生大战，双方伤亡各在数千人以上。胡等失败，西撤至滇、康边境。

1930年初，胡若愚率部分文武官员经康定到成都。这时，刘文辉正积极响应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的讨蒋行动，胡也随刘反蒋。刘文辉给胡部一个旅的编制，以其所带军官为基础招兵成军。9月，反蒋活动失败。胡若愚被通缉，乃潜往上海租界。他托人向蒋介石疏通，获准出国。蒋要胡至京晤面，胡恐自投罗网，思虑再三，终不敢前往。

1931年2月，蒋介石借约法之争囚禁了胡汉民。5月，粤、桂等各方的反蒋人士以此为由，群集广州，另立国民政府，通电要求蒋介石下台。胡若愚企图乘机再起，乃取道香港至穗，参与反蒋。李宗仁令胡恢复国民革命军三十九军的番号，驻防百色。1932年1月，国民党内部的纷争因日本帝国主义侵东北而暂趋缓和，龙云多次借口胡部在百色对云南有威胁，要求将他调走，否则云南大烟将不经广西出口。李宗仁乃改胡部为独立师，移防梧州。不久，胡师并入桂军，胡若愚接受李宗仁所给出国费，于1933年赴德学习军事。胡在德未能进入正规的军事学校，只与人合伙聘请德人教习军事学。云南

人杨杰率领的国民党政府军事代表团到欧洲，经杨请准，胡以随员身份去过法、苏等国。

1936年夏，胡若愚经日回国，在港编写出版过《大军统帅》、《现代陆军的编制》等书。1937年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任中将参谋。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若愚被派往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代理参谋长。1938年1月，调任孙桐萱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在鲁南参加过对日作战。此后，在程潜的第一战区任过高参。1939年后，改任参谋部所属军训部部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校阅委员会第二组组长。1942年，出任兰州军官预备学校校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胡若愚退役。1948年4月，作为罗平县的“国大”代表参加了在南京开场的“行宪国大”，他在云南代表中间奔走活动，极力为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争取选票。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的精锐消灭殆尽，蒋介石垂死挣扎，不断拼凑新的兵团。1949年2月，升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为十一兵团司令，归华中“剿总”白崇禧指挥，鲁荐胡若愚为该兵团副司令。5月，人民解放军解放武汉，鲁兵团南逃衡阳。9月，白崇禧的桂系主力在衡宝战役被歼，鲁兵团奉令改为左右两个纵队向广西撤退，鲁道源为右纵队司令，领兵三个师，继任五十八军军长；鲁元为左纵队司令，领兵六个师。后鲁元患病住院，胡若愚接任其职。10月中，广州解放，人民解放军疾速西进，围歼蒋军残部，桂系余部纷纷夺路南窜。11月底，胡若愚率部逃至桂东

南的岑溪、容县一带，被人民解放军全部歼灭，胡若愚中弹身亡。

注：

- ① 《云南公报》第七十册，中华民国十六年六月十日，云南省政府省务委员会秘书处公报所发行。
- ② 据曾在胡部任职多年的彭稚如（秘书长）说，《板桥协定》的主要内容：（一）胡若愚放弃云南政权，由龙云接管；（二）胡、张二部出师北伐；（三）龙云接济胡、张外出部队弹药和补充兵员；（四）龙部不得派兵追击胡、张二部。
- ③ 《三军密约》（草案）主要内容是：（一）请刘文辉、周西成发兵援滇，三军（胡、刘、周）在滇部队由在云南指挥作战者指挥（意即归胡若愚指挥）；（二）各军饷项自行负担。但在必要时，胡、张二部当请刘、周给予补助；（三）云南事定，滇省当为刘、周部输送军官和士兵，并将以一定数量的东川铜矿的铜酬谢刘、周二部造弹。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吴璋：《唐继尧培养下的唐继虞派系》（未刊稿）。
- ② 高蕴华：《一九二七年云南两次政变回忆录》；谢崇文：《云南“二六”政变的前因后果》，均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 ③ 马伯安：《续云南通志长编军务草案》（未刊稿）。
- ④ 龚自知：《龙云夺取云南政权的经过》；詹秉忠：《唐继尧回滇复辟活动二三事》；安思溥：《顾品珍之死》，均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 ⑤ 曾万钟：《我对云南辛亥革命的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
- ⑥ 杨立人：《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左派在云南的革命活动》，《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八辑。
- ⑦ 张廷勋、刘镇宇：《国民党云南省行宪国大代表名录及选举闹剧》，《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 ⑧ 张文鸿：《桂系部队在粤桂边境的覆灭》，《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五辑。
- ⑨ 陈赓：《在祖国南部边疆的三次追歼战》，《人民日报》1977年9月14日二、三版。
- ⑩ 彭稚如、尹兰冰、胡济川、胡问邦、胡问英、胡问卿、萧烈、张廷勋、陈金灶、方良能、鲁萍、鲁元等提供的口头资料。

周 凤 岐

汪仁泽 陈光贻

周凤岐，原名清源，字恭先，浙江长兴县合溪镇周家村人。1879年6月24日（清光绪五年五月初五）生。兄弟六人，他排行第五。童年时，因家贫干过放羊樵柴等活，后附读于族人周杏顺家。因其聪颖好学，塾师自愿免收束脩，且寄以厚望。改清源名为凤岐。1900年考取秀才，不久又补了廪。①

1903年，周考入浙江武备学堂第四期，1905年冬毕业，因成绩较好，留堂任区队长。1906年春，经秋瑾介绍与夏超、俞炜等同入光复会。②旋在蒋尊簋所办的浙江陆军第二标弁目学堂任队官，后任第二标学兵队队长等职，颇受蒋的器重。1910年，周被保送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肄业。③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震动，周凤岐因军校遣散而回浙江长兴。其时嘉兴、湖州地区盗贼蜂起，族人周峰帆等发起招兵保卫乡里，由周凤岐和长兴合溪警察所巡官夏超主其事。浙江光复后，新军第八十一标管带代理标统朱瑞奉命率部驰援民军进攻江宁，周凤岐与夏超率千余人响应，被委为先行军，参加攻取南京。浙江民军凯旋回浙后，周部驻扎湖州。1912年8月，朱瑞继蒋尊簋任浙江都督，周任都督府参谋长。1913年春，宋教仁被刺，不久“二次革命”爆发，驻

前独立第四十九旅旅长顾乃斌等人通电响应，事败顾等离职。朱瑞因曾宣布“浙江自保”，袁世凯以朱“附己”，于1914年6月30日授兴武将军督理浙江军务，朱瑞以周凤岐署四十九旅旅长。^④

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朱瑞附逆，浙人愤慨。次年4月，浙军旅长童葆暄与嘉湖镇守使吕公望等合谋发兵夜袭将军署，朱瑞仓皇遁走。屈映光、吕公望相继代浙督，周凤岐曾在吕任内担任督军署参谋长，掌握督署大权。1917年1月，北洋政府任命松沪护军使杨善德为浙江督军，周凤岐反对，先图阻拒，后又谋倒杨，均失败，因此两度去日本暂避。1919年8月杨善德病死，卢永祥继任浙江督军，翌年沈金鉴为浙江省长，周与沈熟识，经沈疏解，卢允不究既往，周始返国，任浙江警备司令部总参议，开始为卢所用，并逐渐取得信任。

1924年9月，江浙军阀混战，浙督卢永祥命浙军第一师潘国纲部防守赣闽边界；卢自率北军一师及浙军王宾一旅，防守苏皖边界；命周凤岐留守杭州。9月，闽军孙传芳部趁机入浙，占领仙霞岭一带，周和夏超在杭州密谋驱卢迎孙入浙。其时，潘国纲师军心不稳，该部石国柱团已与周暗通；伍文渊团也擅离防地衢州，使孙传芳大军得以长驱入浙。9月17日卢永祥被迫发出同意“浙人治浙”宣言，本人则移沪督师；浙江省长张载阳声明卸职，委警务处长夏超代理省长，将所兼暂编浙江陆军第二师师长委周凤岐代理。10月，周、夏迎孙传芳入杭州。为酬答驱卢拥迎之功，孙以夏超为浙江省长，以陈仪、周凤岐分任浙军第一、二师师长。^⑤

不久周部改为第三师。

孙传芳军入浙，潘国纲所部退处宁波、绍兴一带，在吕公望、蒋尊簋、屈映光等策动下，谋划浙东独立，10月上旬在宁波宣布成立浙江自治委员会。由于自治派内部分歧和省方的利诱，并令周凤岐率部前往镇压，浙东自治迅即失败，周部于18日进占宁波。^⑥不久周部回师长兴，后奉孙传芳命移驻江苏常州。

1926年8月下旬，北伐军攻克湖南岳州、湖北通城，吴佩孚军溃败，武汉震动。孙传芳感到唇亡齿寒，于8月30日颁发“援赣计划”，将所部编为五个军，其中以浙军周凤岐部为总预备队移守九江，9月22日孙传芳亲赴九江督战。旋江西战事转剧，浙江地方势力再次密谋独立，倡议浙军回浙，保卫地方。10月中旬，夏超在杭州宣布独立；入赣之周凤岐则派参谋樊松甫向北伐军输诚。11月上旬，孙军在江西被北伐军打败，孙传芳乘决川舰逃回南京。

周凤岐率部撤离九江后，径由湖口向贵池，拟间道芜湖回浙，孙传芳获悉即命卢香亭师追至贵池、大通间截阻，迫令周部回驻常州，可暂不作处置。此时孙传芳又派孟昭月师入浙，省长夏超因率保安队与孙军作战，兵败身亡，孙传芳任命陈仪继任浙江省长。陈在杭州就商于地方绅商，主张联孙自治，并派人往南北两方游说。时北伐军王均部从赣入浙，陈仪命周凤岐驻防衢州抵拒。12月11日周凤岐宣布就任北伐军第二十六军军长职。12月14日周从衢州至富阳，邀陈仪共商浙事。陈未赴约，17日夜，周只身潜抵杭州，与陈会晤。周主张联南驱孙，实行自治；陈则主张联孙自治。因意

见相左，周恐有变，连夜赶返富阳。19日周在富阳宣告自治，并于25日通电宣称：奉命指挥全浙军队，速了战祸。孙传芳遂下令讨周，孙军自杭州向富阳进击，周败退衢州。随后北伐军以刘峙等师为主力，命二十六军为右翼配合，向金华、兰溪进攻。1927年1月18日周凤岐经蒋介石任命为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2月2日周部进占金华，中旬向绍兴推进时，在诸暨北之姚公埠曾与孙军激战，18日进占绍兴，北伐军同日进入杭州。

北伐军进抵上海附近，即屯兵不进。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上海，北伐军始开入上海。3月26日蒋介石到沪后，加紧策划反革命政变。4月5日蒋把同情革命的北伐军部队调往南京，以周凤岐部二十六军接防，8日颁布《战时戒严条例》，委白崇禧、周凤岐为淞沪戒严正副司令。^⑦4月12日凌晨，先由帮会流氓袭击工人纠察队，随后周凤岐则借口“工人内讧”下令二十六军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并打死打伤工人三百多人。为了抗议反动派的暴行，次日上海二十多万工人举行罢工，并有数万群众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行进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向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发还被缴枪支时，周即按照蒋介石的密令，用机枪向手无寸铁的游行队伍扫射，一时枪声大作，死伤枕藉，适值大雨如注，宝山路上血流成河，^⑧造成“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事件。为了奖励周凤岐的反共行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先后任命周凤岐为政治会议浙江分会委员、浙江军事厅长和军委会委员等要职。

同年8月，蒋介石因与桂系矛盾加剧，于12日离宁赴

沪，次日通电下野。随后杭州因受南京政局变动的影响，也发生政潮。在张静江辞去浙江省主席之后，杭州市长邵元冲因擅移公款事受到抨击辞职。周凤岐在桂系的支持下于8月19日返杭，代理浙省主席兼戒严司令，并将杭州市政府改组，从而进一步控制了浙江的军政大权。浙江政局的变化，显然是蒋系势力所不能容忍的。加之蒋下野后将东渡日本，要求浙江省库拨款十万元作旅费，为周所阻难，也使蒋不满。⑨龙潭战役之后，蒋的嫡系第一军向浙沪转移，以陈焯任二十六军副军长代理军长，以何应钦任浙江主席，蒋伯诚为浙江军事厅长，周凤岐被迫辞去一切职务，随后闲居上海租界。⑩

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周与冯驻沪代表戈定远联系，愿策动旧部反蒋；蒋则挽张群往说，要求周中立，并愿予安排；周不为所动，并称：“蒋在一天我终不吃蒋的饭”。⑪蒋遂对周下通缉令。1931年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1933年第十九路军将领联合李济深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周凤岐均参与其事。

1937年抗战军兴，蒋撤销对周的通缉令。10月周应白崇禧电邀赴南京逗留月余，11月25日南京形势危急，周由南京回长兴家乡，28日长兴沦陷。日军在长兴至宜兴一带大肆烧杀，周反以不吃眼前亏为辞，劝亲友组织维持会。1938年2月，日伪用小汽艇护送周凤岐返沪，此时日伪正在沪筹组伪政权，周不甘寂寞，遂成为物色对象，其长子周斯男曾跪泣劝父义不投敌，国民党军统人员早已注意其行动。1938年3月7日下午，周准备乘汽车外出之际，突遭狙击，身中八

弹，当场毙命。^⑫

注：

- ①②④⑨⑪ 《周凤岐事迹纪要》，《浙江文史资料》第七辑。
- ② 1905年初，秋瑾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次年春，秋瑾在浙江湖州南浔镇蔡元培所办的浔溪女校任教，其间介绍周凤岐等人加入光复会。
- ⑤ 《江浙战史》，上海宏文印书馆编。
- ⑥ 《浙东独立事件经过》，《东方杂志》第21卷第20期，第5—6页。
- ⑦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3辑，中华书局1984年7月出版。
- ⑧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稿》，1927年4月。
- ⑩ 《申报》1927年10月1日四版、十三版；10月2日四版。
- ⑫ 陶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申报》（汉口版）1938年3月8日一版；3月10日一版。

杨 登 鹏

吴忠才

杨登鹏，广西西隆县长发乡（今隆林自治县长发乡）人，苗族，1909年（清宣统元年）生。他的父亲杨文众出身于小康农家。

西隆县南部的克长、德峨一带是该县苗族主要聚居区。民国初年这里开始种植罂粟（鸦片），所产烟土称“苗冲货”。征收“苗冲货”和过境的“云土”、“黔土”的税款，是桂系军阀的重要饷源。桂系任用苗族头领、杨登鹏的外祖父杨满统治这个地区。

杨登鹏少时读过三四年书，1923年跟大舅杨福应（自封为苗王）当随从。1926年升为队长，成为杨福应的得力打手。他在西隆县南部拦路抢劫、杀人越货，护送马帮、贩卖烟土，一直到1935年。

1935年秋，杨福应被广西当局击毙。杨登鹏作为杨福应的亲信遭到追捕。这一年冬天，他带了少数人马去投靠西隆北部的匪霸陆尔福（壮族），结拜为兄弟，在黔桂边界打家劫舍，抢烟贩，“拉生”（人质）。有一次，他领着几十人扮成客商到贵州安龙县城，半夜里从“货担”中抽出武器，洗劫了该城。他有时回到克长、德峨活动，袭击杨福应的那些对头冤家。广西省政府派兵围捕他，不但没有结果，反而死

伤了一些人，丢了一些枪。

杨登鹏虽然与陆尔福结拜为兄弟，彼此间却是尔虞我诈，以至积怨日深。杨不满得来的财物受陆的勒索；陆也知杨难以制服，于是密谋杀杨。杨登鹏探知陆的密谋后，于1937年2月初潜回长发乡，掩藏了枪支，带几个随从到云南广宁县躲避。

1936年至1937年间，德峨、克长地区爆发苗族群众反对广西政府滥收苛捐杂税的斗争。为了加强统治，国民党省政府废除了当地的族长制，实行保甲制，物色一些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充当乡、村长。杨登鹏趁机于1937年底从广宁回家，出了千把块大洋向西隆县政府“自新”，在长发乡协助乡长做些事情。1938年冬，西隆县府送他到南宁进第八期民团干部学校受训四个月。结业后，杨登鹏被指派为长发乡民团大队长。1940年兼任副乡长，1942年9月升任乡长。这期间，他一方面悉心为国民党地方政府征集粮食、收缴烟税，以取悦上司；一方面利用杨福应昔日的“威望”，培植自己的势力。

1944年末，日军入侵广西。广西省政府迁到百色。大小官员们在西隆、西林一带暗地里鼓动广种罂粟。这正合杨登鹏的心意，他公然强迫农民种鸦片。第二年夏初收获时，西隆一县种的万亩罂粟，产鸦片一百多万两，广西省政府烟税收入折黄金一千七百两。西隆县指派杨登鹏负责征收德峨、长发、克长、隆或等乡的烟税。罂粟刚开花，杨登鹏就派人到地头估产，收获时按估产的百分之五十交税。缴纳不起的，被说成是偷税，要罚交“懒税”。上税时，杨登鹏拿出一把特制的“雷公秤”（秤砣下面有一小孔，可以放进铁珠），

一百两大烟上这把秤只有七十两左右。收上的大烟，他美其名曰加工，将黄豆粉掺入其中。他如此敲骨吸髓，巧取豪夺，捞到了约二十万两鸦片烟。其中除将百分之四十左右上缴及馈送贪官以外，他独占了约十二万两。这是他暴富的起点。

杨登鹏用这批烟土为资本，与百色、南宁等地的烟帮头子勾结，加入了以贩卖烟土为职业的洪帮组织。大烟从西隆运到百色，便获利数倍。从此，他在乡里大量购买田地，在外则勾结国民党军官、兵痞，贩卖枪支弹药。他自己添置了轻重机枪，以及新式步枪、手枪等。杨登鹏钱多枪多，赫然成了西隆的“南霸天”。对当地土豪和壮、彝等族的头目，他软硬兼施或结拜“金兰”，或攀儿女亲家，甚至以武力威胁。对外地来的官、商、赌棍，他讲“义气”，或供食宿方便，或给一点做生意的本钱，使他们在必要时为他效劳。有些“风水先生”也是他的座上客，常常散布说他家的坟山好，又得了杨福应家的什么法宝，理应由他来当苗王，以“保护地方”。他派出爪牙洗劫村庄，抢劫客商后，又装着悲天悯人的样子派人去“缉拿凶手”。

广西省政府为了笼络、利用杨登鹏这条“地头蛇”，1946年委派他担任西隆县民团总队副队长。这一年的5、6月间，越南国民党头目阮海臣为了对抗胡志明的革命力量，来广西招兵买马。杨登鹏带了二十多人携枪到南宁，受阮口头任命为“越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准备扩充队伍。杨登鹏等人从南宁出发到谅山，薪饷没有着落，卖了几条枪以充伙食费。他觉得跟阮海臣这个光杆司令没有什么出路，在

凉山住了一晚便返回。7月回到西隆。这时，杨登鹏原任的职务已被解除，广西省政府考虑到他的势力和“黑货”生意，又给他以百色专署咨议的头衔。第二年升为参议。

1946年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后，1947年广西省政府为解决饷源，默许大种鸦片。杨登鹏利用征收烟税的机会，又一次大发其财。此后，杨的实力更为雄厚，掌握了五六百人的武装。西隆县南部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他常对手下的人说：如果你们不跟我，我的嘴巴一歪，就有人把你们干掉。他占有六百多亩田地，不少苗壮族的农民成了他的“地客”（佃户）。这些“地客”受尽压迫剥削，每年除交付沉重的对半租以外，还要为杨家服劳役。

1948年末，国民党广西省政府眼看杨登鹏在西隆县势力日增，想调虎离山，由田西县县长覃超以朋友名义邀杨到他那里当民团副司令。杨登鹏虚与委蛇，很少到职，仍在长发、克长经营他的“洋烟”。他还邀了兵痞出身的烟贩头子梁平，带了一些人和机器到长发制造假货币。因技术低劣，铸出的光洋和印制的纸币均不能使用。

1949年10月，国民党妄图以几万正规武装配合广西边远山区的地主土匪势力，建立所谓“游击根据地”。他们在百色拼凑了新编十六军第四十八师，杨登鹏被委为副师长兼一四三团团长，有五六百人枪。翌年1月初，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黔桂边绥靖区司令官张光玮在田西县（今田林县）旧州率部千余人起义，新四十八师师长萧若夫也随行。该绥靖区副司令官胡栋成自任司令官，率残部进驻克长，委杨登鹏为新四十八师师长。一个月后，人民解放军

从滇南回广西，全歼了胡栋成部，解放了西隆县城。3月，杨登鹏被迫自首，得到人民政府宽大处理。不久，杨伙同当地一些土匪恶霸和残余反动势力进行反革命暴乱，妄想重温“游击根据地”的旧梦。6月底，杨登鹏从南宁逃到百色附近，受国民党特务委为“中国解放人民建国剿共军第七集团军”第二十七军军长。辖四个师，匪众二千余，枪千条。7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不久，杨登鹏在长发拼凑了伪军部，杀猪宰牛“庆祝”了三天，并改名杨万飞。8月，杨登鹏率匪部入西隆县城新州镇，大肆搜刮民财，残酷屠杀干部，有的整个村子被洗劫一空。

1951年4月初，人民解放军进剿桂西北土匪，4月中旬解放了新州镇。杨登鹏带三十多人流窜于长发、克长一带。在解放军日夜搜捕的情况下，杨登鹏写信给人民政府，诈称愿于10月5日来自新。10月初，解放军大部队撤走，留下少量队伍配合县大队和民兵继续搜捕散匪。杨登鹏得知这个消息，又拒绝投降。10月30日，解放军和民众百余人上山围剿残匪，杨登鹏被手榴弹炸死。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杨登鹏罪行材料》，《广西民族学院院刊》1975年创刊号。
-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关于隆林苗族、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未刊稿）。
- ③ 中共隆林县委办公室编：《隆林十年》，《隆林自治县三十年概况》。
- ④ 《人民解放军在广西剿匪工作的伟大成就》，《广西日报》1951年8月1日。
- ⑤ 陈良佐：《西隆西林烟寨内幕》，《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 ⑥ 岑建英：《广西百色的烟帮》，《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张 贞

萧 林

张贞，原名善兴，字浩然、幹之，福建省诏安县人，1884年2月8日（清光绪十年正月十二日）生。父亲张介一务农兼糖贩，常教育子女勤奋读书以报效国家。张贞七岁起入塾读书，十八岁应县试不第，1909年在诏安丹诏小学堂高级班毕业，翌年考入漳州府中学堂，后加入同盟会漳州支部为会员，遂改善兴名为贞，字幹之。

辛亥武昌起义，东南各省纷起响应，张贞加入漳州学生光复队，参与“11·10”光复福州行列。旋参加福建学生北伐队，举“祈战死”旗帜离榕赴沪转宁，先编为陆军入伍生队，后编入总统府卫士队。1912年8月国民党组成，他即以同盟会员转入该党为党员。同年10月，被选入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受训。越年春，张贞被保送到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炮科班深造，与白崇禧、黄绍竑、刘建绪等为同期同学。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于1914年在日本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开展武装倒袁的护国运动，张贞在保定宣誓入党，效忠孙中山。1915年初夏，他奉命偕汤铭盘、林知渊离开保定南下厦门，协助中华革命党福建支部长叶青眼主持鼓浪屿秘密机关部工作，并负责训练同安寮仔湖“福建下游护国军第一支队”。秋末，与北军厦门要塞司令唐国谟部辛桂

芳营激战于灌口山口庙。1916年1月，张贞参加“厦门首义”秘密军事会议，参与反袁驱李（厚基）“二二举义”的准备事项。起义未遂，偕陈金芳、丘庶竞处理善后近三个月。同年5月27日，参加指挥攻打同安县城之役，后撤返天柱山。6月，袁世凯病歿，南北协议暂成，张贞奉命偕陈熙亮、林邦燕作为福建护国军统筹部代表，携带《福建下游护国军编制方案》赴沪亲呈孙中山，嗣后重回保定军校继续学习至毕业。

1917年6月，孙中山通电护法，张贞偕闽籍同学七人到广州投效首先响应护法的滇军第四师师长方声涛。方任征闽靖国军代总指挥，张贞被委为靖国军第六军第二工兵营营长。是年12月，受命为大元帅府参军处荐任副官。1918年春初，孙中山命陈炯明率粤军援闽和方声涛靖国军征闽，张贞奉命只身潜入闽南，抵泉属凤巢山会见许卓然，共同联络和编练闽南民军，扩展晋、安、南护法根据地，组建闽南靖国军，任第四旅司令兼第七团团团长。1919年夏，任福建靖国军司令举旗护法，与盘踞泉属各县之北洋军阀交战。其时，驻扎漳州的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多方掣肘靖国军，使孙中山“组军大计颇受困阻”^①，张贞与靖国军将领许卓然、杨持平联名致电在沪的孙中山。俟后，张贞遵孙中山函谕“以同志大义所在，除去私嫌”^②，对陈炯明不添芥蒂，协力共事。

1920年秋，桂系军阀陆荣廷、沈鸿英觊觎广东，以讨伐福州北军为名进攻粤省，陈炯明回师入粤讨伐，张贞也奉命准备入粤作战。他在晋江安海与浙军师长陈肇英合作，组织

靖浙联军司令部，陈为司令，张为副司令，遂即派部挺进闽粤边境待命。7月，靖浙联军奉命转战广东大埔、饶平，张贞部在浮山之役为桂系刘志陆部所败，张左肩受伤，抢舟下潮安，得商会和传教士帮助，赴港医治，后转上海。8月，张与在沪的方声涛、黄展云等组织福建自治会，鼓吹“闽人治闽”，以反对李厚基在闽的暴虐统治，得旅居京、津、沪及南洋闽人响应。翌年7月，张贞离沪抵穗，闻孙中山有“粤局可定而闽局可安矣”^③的指示，遂回闽组建福建自治军。冬，任福建自治军司令兼前敌总指挥，在闽南一带配合讨伐南北军伐。

1922年6月，陈炯明武装叛变。为讨伐陈逆，廖仲恺于10月入闽改编福建自治军为东路讨贼军第八军，任命张贞为军长。1923年1月，张贞向孙中山请缨入粤，2月5日孙函陈肇英称“张贞愿为讨贼军前驱，极慕”^④，张闻悉大受鼓舞。6月底，张贞率部直捣潮汕，讨伐陈炯明。7月中旬，浮山圩血战十日，因孤军无援，参谋长汤铭盘战死，乃兵退云霄、漳州。

1924年，在闽的直系、皖系军阀进行“闽南大战”，张贞挂刀拼杀盘踞漳、泉二属的北洋军阀。7月24日，他随方声涛潜入厦门鼓浪屿，召集五十余名国民党员密议，筹划讨伐新闽督周荫人。不料事被查察，周荫人令厦门交涉署查捕，并要求领事团工部局“引渡”方声涛、张贞等人，幸方、张及早潜去而未被捕获。11月1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张贞任福建建国军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自永春出击周荫人驻安溪、德化北军。12月1日，他在鼓浪屿正式通电

讨伐周荫人，历数周的祸闽罪行，指出“周逆不去，闽无安日，军阀不倒，国无宁岁。”^⑥同月11日奉调入粤参赞戎机，任大本营参谋处主任。是月末，张贞率陈国辉等三个师攻打漳州北军张毅部，以支援挺进赣南的北伐之师。

1924年冬，退据粤东的陈炯明自封“救粤军总司令”，准备进攻广州。1925年初，广州革命政府决定东征讨伐，张贞率部参加第一次东征为右路，与讨陈粤军及黄埔军校学生军第一教导团并肩作战，在广东南部沿海安田、淡水之役大捷后，于2月27日攻袭海丰，张贞指挥所部炮轰海城，并下令火焚陈炯明“将军府”^⑦。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张贞在潮梅地区农运代表悼念孙中山逝世大会上表示服膺孙中山遗训，奉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7月，大元帅府改组，成立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一律编为国民革命军，张贞调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第一团团长，隶属蒋介石部，驻防东莞虎门，划归何应钦指挥。11月，二次东征胜利，潮汕底定，张贞率独立一团移防汕头，兼碯碌要塞防务。旋在诏安县城收编原福建靖国军旧部，并创设福建陆军干部学校（属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任校长，招收学员百余名。在此之前，张贞保送李良荣等十余名青年军士入黄埔军校受训。

1926年5月上旬，诏安县农运考察团结束对海陆丰农民运动的考察，张贞在汕头特予接待并赠送“为民前锋”锦旗。6月，国民政府筹划北伐，张贞升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师长，10月间在第一军军长兼东路军司令何应钦率领下出师攻闽，小坪岭一役大捷，乘胜尾追北军张毅师出漳州，12月

2日配合海陆友军生擒张毅于瓜山，随即挺进福州，底定福建，任福州卫戍司令。1927年1月，福建政务委员会组成，张任委员、代理主任。他为校长的福建陆军干部学校随之迁入福州。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同时密令闽、粤等省一致“清党”，逮捕共产党人。张贞虽然拥戴蒋介石，但认为“清党”之举过激，不利于完成北伐，在接令后未即行动，等福建陆军干部学校教官陈祖康、陈尚友、王战天等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离去后，始集合军校员生宣布蒋的“清党”命令。未几，独立第四师奉调驻防浙江江山。此时正适宁汉分裂，汪精卫派出密使到江山要晤张贞。张一心投靠蒋介石，拒见汪使。8月，原北伐军第四军第十师陈铭枢部参加南昌起义南下时脱离起义军，停在铅山重建十一军，苦于粮弹告绝，张贞闻讯后，感于旧僚袍泽，资助银洋十万元及大批军需弹药。10月，独立第四师调防南京，张贞任南京卫戍司令，拱卫京畿。1928年1月，蒋介石抵宁复职，对福建省主席杨树庄和滞留闽南的十一军陈铭枢余部很不放心，遂于汤山召见张贞，命独立第四师回防闽南重镇漳州，以牵制杨、陈所部，并协助福建省政府改组。2月，张贞率师自宁抵漳，坐毡未定，福建工农革命军于3月8日发动“平和暴动”，张即派陈炽营到平和进行弹压，并调张汝勤团驰赴闽西永定“清剿”邓子恢、张鼎丞领导的工农红军。自此始，张贞坐镇泉、漳、汀地区，委派亲信林学增、谢梅年等多人充任各县县长，惟函请北伐后由周恩来荐任漳州政治监察委员的陈卓凡充任龙溪县长。陈卓凡此时已

是中国国民党行动委员会中央工农运动委员会委员，视职数月即被叛徒告发遭通缉，张贞于1929年9月密送陈出境赴港，并赠款数千助其到沪创办“南强书局”⑦。

1929年3月，张贞赴南京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次年10月被递补为中央执行委员。他踌躇满志，醉心将该部四团制的丙种师扩编为三旅六团制的甲种师，由“官兵七千左右、枪五千余杆增加到人枪各一万余”⑧。尔后又将独立第四师番号三次易改为暂编第一师、中央陆军新编第一师、陆军第四十九师，均任师长。由于成倍扩军，粮饷骤增，每月需要支付军费20万元，而军政部仅拨给6万，不敷两倍多，张贞下令在辖防区内加捐附税39种，另开办“民兴银行”发行票券，多方榨取民脂以扩展军事实力。当地百姓不堪重负，编民谣斥之：“张毅换张贞，捐税加两升。”

1930年1月初，闽北民军首领卢兴邦绑架福建省政府委员事件发生，张贞派王祖清旅配合刘和鼎、陈齐瑄两部夹击卢师之腹背。6月卢兴邦兵败求和，释放林知渊等五人。越月，张贞兼任福建“剿匪”司令部司令、闽南航空处处长。

张贞自1928年至1932年占据闽西南4年多，虽卖力替蒋介石“防共剿共”，用“三光”政策酷对苏区人民，但屡屡战败：1929年6月，蒋介石调集闽、赣、粤三省兵力“会剿”苏区，张贞抽调六个团两个营兵力共万人参与“围剿”闽西苏区，遭工农红军歼击而失败；1931年9月，红十二军萧劲光部攻下长汀、连城两县，四十九师杨逢年旅被歼溃，残部逃退龙岩；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红军东路军从闽西东进

攻克漳州，四十九师“被俘3300余人”^⑨，残部连夜溃逃诏安、同安。当地百姓编民谣嘲唱：“张贞豆腐兵，会吃不会拼。”“正逢四十九，张贞无路走。”

张贞据漳期间，曾与地方人士共谋振兴闽南家乡。1928年投资13万银洋开辟龙诏、漳嵩公路，增扩交通运输线200公里；兴办龙溪中学和闽南医院，资助泉州黎明中学和上海侨光中学；选派一批人才留学日、德、美诸国深造；1929年3月，他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孙中山《建国方略》汕头、厦门开港计划，提出“建设嵩屿为商埠”提案，1931年11月国民党“四大”时再提此案。会毕回漳，遂组织“嵩屿建设委员会”，着手进行规划和勘测，筹办一年后因经费不足而中止。

1932年6月，张贞四十九师在被红军东路军歼溃后卷土漳州。时适在淞沪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蔡廷锴部被蒋介石调入福建剿共，设指挥部于漳州，四十九师划归十九路军指挥。张贞眷恋闽南乡土，未听何应钦要他移师闽北的电告，将师部西移永定坎市。翌年6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准备发动“福建事变”进行抗日反蒋，遂将张贞四十九师缴械并编，并派刚刚回闽的援热第二纵队司令张炎接充师长，另命周士第为参谋长。张贞被解职后回鼓浪屿寓邸，悲叹“本钱都输光了”^⑩，声泪俱下，在座的漳州名绅蔡竹禅嗤其“为将懦庸”。未几，张贞北上面求何应钦引谒蒋介石请丧师之罪，蒋委张贞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南昌行营军事特派员闲职。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爆发，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蒋介石指挥蒋鼎文、卫立煌所部七

个师讨伐，张贞以军事特派员身份随军入闽，其旧部闻风即在漳、泉二属组织“讨逆军”，分别袭击从福州南撤的十九路军。“福建事变”虽告失败，但张贞并未得重用。他郁郁不乐，于1934年7月携幕僚赴南洋“宣慰”华侨，回国后寓居南京。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时，张贞因先丧师于红军而后覆军于蔡廷锴，被降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后，张贞被蒋介石委为广州行营中将总参议，协助何应钦处置两广问题，但他感于与黄绍竑、白崇禧有同窗私谊，便遁词不去穗视事而转道香港寓居。

“七七”抗日军兴，张贞出自民族大义，投入抗战洪流。他先驰投家书命次子投考中央军校第十四期，后又令三子参加远征军赴缅作战，书谕“当遵先祖父遗训，读书必报效国家”^⑩。翌年冬初，在渝与国民政府委员熊克武、监察委员黄麟书组成中央川康党政视察团，赴四川、西康两省视察。1939年秋，张贞任军事委员会战区军风纪第四巡察团主任委员，驻广西桂林。1940年率巡察团巡察粤、黔、滇、湘、鄂诸省后，亲赴桂南前线昆仑关参加督战，与桂南会战总指挥、保定军校同学白崇禧共抗南侵的日军。次年，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国际线昆安段通车，张贞率巡察团到滇缅边境巡察中方军队，宣慰前方将士和筑路民工。1942年6月，张贞改任军事委员会军风纪第一巡察团主任委员，从广西桂林移驻福建临时省会永安，负责巡察苏、浙、鲁、冀、赣、鄂、闽、台八省军风军纪。他在巡察中查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及各集团军总司令部所设的前进指挥所，其实乃走私指挥机关，司令长官部的别动队武装还保护日伪占领区走私货

物过境。但张贞慑于顾的权势，又念及副司令长官黄绍竑、刘建绪、上官云相是保定军校同学的情谊，故巡而不察，察而不办，时人以“不打老虎、只拍苍蝇”讥讽之。

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在重庆召开，张贞连任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9月，蒋介石召见张贞于庐山，通知撤销军风纪巡察团建制，要年逾花甲的张贞退役。10月，授予陆军上将衔，退为预备役。自此，张贞携眷回漳州定居，伙同秦望山、郑华等围垦东井五里滩，开办长教煤矿，投资扩展漳州电厂，筹划整治九龙江。1948年，张贞旧属李良荣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张于10月赴榕晤李谈整治九龙江流域拨款事。1949年4月，张贞又向旧识、新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朱绍良请求拨款，拟修整由闽南入粤东的主干线龙诏公路。

1949年夏，挥戈入闽的人民解放军直指闽南，张贞在旧属李良荣、沈向奎的挟劝下，从厦门乘机仓皇出走台湾。后十余载，任台湾历届“立法院”军事组召集人，坐领薪俸，消闲潦倒。1963年12月29日因直肠癌于台北去世。

注：

- ① 《张贞先生幹之年谱》（1983年2月8日台北出刊）。
- ② 孙中山1919年7月22日复许卓然等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
- ③ 孙中山1920年10月2日致李厚基电。
- ④ 孙中山复陈肇英函，《孙中山全集》卷六。
- ⑤ 李爱黄：《故寓留笔》。
- ⑥ 中央诏安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调查材料。
- ⑦ 广州暨南大学历史系陈斯骏（陈卓凡之子）1987年10月提供资料。并见陈卓凡《自传》（手稿）。

- ⑧ 林梦飞：《张贞四十九师就歼记》，林志光：《张贞部围剿闽西苏区及其溃亡》（《福建文史资料》第二辑）。
- ⑨ 赵平：《浅论中央红军远征漳州之役》，《军史资料》1987年第三期。
- ⑩ 蔡竹禅在1966年漳州市民主人士座谈会的发言（记录）。
- ⑪ 张贞手书（复印件）。

汪 精 卫

闻少华 丁贤俊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季恂、季辛，精卫是他的号。1883年5月4日（清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生于广东三水。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祖父汪云，曾中举人。父汪琨，游幕广东番禺（今广州），先后在三水、曲江、英德、四会、陆丰等县作过多年幕僚，其后即寄籍于番禺。

汪五岁进家塾读书，九岁随父寄居陆丰县署，开始阅读王阳明《传习录》和陶渊明、陆游的诗词。其母亦督促他刻苦攻读。因此汪自称：“一生国学根基，得庭训之益为多。”^①他十五岁前双亲相继病故，随长兄汪兆镛客居广东乐昌，致力于文史、经世之学，并习应制文字。1902年应番禺县试，获第三名，接着又参加广州府试，名列榜首。旋应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之聘，任家庭教师。这时，正是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民族危机深重，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他与古应芬、朱执信、胡毅生等青年知识分子，在广州组织群益学社，“讲求实学，相互策励”。

1904年汪精卫考取留日法政学校速成科官费生，由于“留学法政，从宪法学得到了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观念。从前所谓君臣之义，撇至九霄云外；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兴”^②。一年半后，汪在速成科毕业，留在法政学校专科继

续自费学习。

1905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筹组同盟会，汪精卫加盟并参加起草会章。8月20日同盟会开成立大会，汪被举为评议部评议长。同年11月《民报》创刊，汪精卫是主要撰稿人之一。他根据孙中山的意图，在《民报》上用“精卫”的笔名发表了《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等一系列文章，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保皇谬论，指出：“满洲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能自立，瓜分原因一日不息”^③；“欲消除瓜分之原因，当先扑灭满洲之政府，是谓革命以杜绝瓜分之祸。”^④这些文章笔锋犀利，爱憎分明，为他在革命党人中赢得了声誉。

1906年汪精卫于日本法政学校毕业，次年春随孙中山赴南洋吉隆坡、庇能等地筹设同盟会分会。8月，革命党人在新加坡出版《中兴日报》，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展开论战，汪是该报的主笔之一。汪精卫有很好的口才，常在南洋召开讲演会，宣传反清民主革命思想。他的演说“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⑤，深受当地华侨欢迎。他先后参与筹设河内、仰光同盟会分会和在新加坡设置同盟会南洋支部等活动，“组织同盟会分会百余处”^⑥，工作卓著成效，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

1907年至1908年间，革命党人发动多次武装起义都遭到失败，同盟会内部又发生分裂，反清革命转入低潮，革命党内一些人中弥漫着悲观失望情绪，汪精卫认为，此时只有“直接激烈之行为”，才有可能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

于信”^⑦。于是，他在1909年约集同志数人潜入北京，“与虜酋拼命”^⑧。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人曾多次劝阻，汪仍自行其是。1910年3月，汪与黄树中（即黄复生）等在北京谋炸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汪被判处终身监禁。他在供词中斥责清廷侈谈立宪，“其宗旨在于巩固君权”^⑨，表示将以身为“薪”，为革命殉难。

清政府为了粉饰立宪骗局，收买人心，仅将汪处以终身监禁。肃亲王善耆对汪大施软化手腕，派人在狱中为之另辟裱糊一新并配有家具的房舍，倍加优待，“复赠以图史百余帙”，还多次赴监狱探视，对汪表示倾慕。汪精卫感恩戴德，思想逐渐发生变化。他被捕之初，自料必死，曾写过轩昂悲壮的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⑩，就是其中脍炙人口的句子。被善耆软化后，汪开始表示忏悔。他在狱中写的《有感》一诗，吟道：“忧来如病亦绵绵，一读黄书一泫然。瓜蔓已都无可摘，豆萁何苦更相煎。”^⑪谴责自己昔日的所作所为，把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说成是“豆萁相煎”，意境情态为之一变。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相继响应。清廷一面起用袁世凯，用武力镇压革命；一面释放政治犯，以缓和形势，收买人心。11月6日汪精卫被释出狱。当时，袁世凯正想拉拢一些革命党人为自己所用，他看上了汪精卫并让袁克定与汪结为异姓兄弟；汪和一些革命党领导人也把推翻清王朝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袁世凯策划南北议和，借以篡夺革命成果和了结革命。汪在袁的示意和革命党部分领导人的默许下^⑫，便和君宪党人杨度于11月15日联合发起“国事共济

会”，标榜调和南北、共济国事。他违背同盟会的纲领，声称：中国究竟应采取君主政体或民主共和政体，应付诸公决。公然散布自己曾痛斥过的革命延续下去，必将招致外人瓜分或引起内乱的谬论。11月下旬，清军攻下汉口，进攻汉阳。袁世凯一面再次对湖北军政府进行和平试探，一面又向汪表示愿配合革命党人在北京发动一次起义，对清室进行军事恫吓。但革命党人起事后，袁却按兵不动，致使党人遭到无谓牺牲。因此，有些革命党人义愤填膺地说：“世凯、兆铭果相继为奸，以杀我北京革命同志矣。”^⑧12月初，汪在天津组织同盟会京津保分会，有些革命团体因此不愿加入，另外成立革命同志协会。

12月中，南北双方停战议和，汪精卫南下时与袁克定有默契，由袁在北方推翻清王室，汪在南方说服革命党人拥袁世凯为总统。27日汪到达上海后，被任命为南方代表伍廷芳的参赞，参与议和。但他暗地里则和北方代表唐绍仪过从甚密。他赞同总统一席“非袁莫属”的主张，吹捧：“项城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⑨年底，孙中山归国，旋被各省代表选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反对和议，汪就对孙施加压力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⑩

1911年底至1912年初，北方革命党人几次发动武装起义，汪精卫以同盟会京津保分会领导人名义，派人四出阻止。他强调：“现当停战议和之时，吾党京、津、保一带同志，自宜遵守诺言，不可有所行动。”^⑪甚至为袁世凯镇压革命党的罪行辩解，宣称：“项城期望于和议者甚殷，且治军严，当无如此轨外行动。”^⑫而当袁以党人起事责问汪时，他

竟说：“当为匪类之结合，请依法办理。”^⑧

袁世凯窃取政权后，汪精卫自鸣清高，1912年8月辞去一切职务，带着新婚的妻子陈璧君到法国留学去了。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孙中山主张起兵讨袁。6月初，汪从法国匆忙赶回上海，他不主张讨袁，同拥袁的张謇、赵凤昌等密商调停条件：由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选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皖、粤、赣、湘四省都督在袁任临时总统期间暂不撤换；宋案“将来罪至洪（述祖）、应（桂馨）而止”^⑨。袁对汪力主调和虽加赞赏，却不采纳调停条件；悍然下令撤销国民党系南方三督，挥兵南下。这时汪仍然游说革命党人放下武器，俯首从袁，以维护“统一”。7月中旬李烈钧在湖口起兵反袁，汪以懊丧的心情向张謇诉说：“不图甫抵沪滨，即闻江西战事，崩析之祸，一发而不可收。”^⑩

讨袁失败后，汪精卫又以超然于政坛之外的姿态，跑到法国去进行所谓“考察”。在法期间，他一直接受袁政府的津贴，一次竟达八万元^⑪。1915年12月，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孙中山也策动讨袁，汪曾一度返国，但并无积极行动。袁世凯死后，国内政局纷乱，汪又跑到法国去“经营其‘小休’的生活”^⑫。

1917年7月，孙中山率海军南下护法，汪精卫在此之前也自法返国，从事党务和政治工作。1919年他参加孙中山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的工作。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非常设大总统职，汪任广东教育会会长。

1923年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准备改组中国国民党。对此，汪精卫一般是赞成的，但对接纳共产党人加入

国民党却表示反对。他说：“共产党如果并入本党(国民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所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②由于孙中山的坚持，他转而拥护三大政策，他承认：“中国国民党改组，对于本党，实在是起衰振废的良剂。”^③他被孙中山指派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不久又任宣传部长。1924年7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汪是委员之一，参与国民党中央核心领导。

11月汪精卫随孙中山北上。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在孙中山病危时，汪精卫被在京国民党人推举草拟遗嘱，经孙中山同意并签字认可，这件事更增加了汪的政治资本。7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时，他凭着遗嘱起草人身份、国民党左派头衔、同盟会老党员资格及粤军第一军军长许崇智等人的支持，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8月发生了廖仲恺被刺案。12月国民党内出现了反对三大政策的西山会议派。对待这些事件，汪都保持着他的左派姿态。1926年初，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地位逐渐提高，汪感到对自己是个威胁。3月20日，蒋介石策划了以反共为目的的中山舰事件，汪精卫对蒋事先没有跟他打招呼大为不满，认为损害了他的领导威信^④。于是愤而辞职，出走法国。由于他同蒋介石的矛盾，使他继续维持着左派的声誉。

汪精卫出走后，蒋介石随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不久又被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大权独揽。北伐军攻下南昌后，蒋在那里设立总司令部，与当时的革命中

心——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这就引起了国民党内一些人的不满。当时，武汉的国民党左派为了抑制蒋介石的独裁，在武汉成立行动委员会，发表宣言，“迎汪复职”；此时蒋介石一伙也觉得有利用汪的必要，于是也迭电促驾。这就大大提高了汪的身价。4月1日汪精卫由法国抵达上海，蒋介石正在上海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即拉汪合伙反共。但蒋主张立即“分共”，汪则希望暂能维持合作，主张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中央全会解决“分共”问题。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发表《汪陈联合声明》，否认蒋介石在策划反革命阴谋，要求国共两党“抛弃相互间的怀疑”，“如同兄弟般亲密”^⑥。

4月10日，汪精卫到达武汉。那里的革命气氛和强烈的反蒋呼声，使他别无选择，只能以左派身份发表激昂的演说，表现出进步姿态，这样一来，他就成了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首脑人物。就在“四一二”政变的前一天，他在一段题词中写道：“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⑦“四一二”政变发生，蒋介石在南京组织反动政府，汪斥责蒋破坏三大政策，屠杀共产党人，他表示：“每日得看各地屠杀的消息，真使我们流泪。”^⑧

但不久，武汉国民政府的内外危机迅速增长：帝国主义军舰的威胁，蒋介石对武汉的封锁，资产阶级工商业主闭厂怠工，地主流亡分子的造谣煽惑，国民党反动将领相继发动叛乱。汪精卫感到利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很难攫取政治权力了。于是揽下左派桂冠，决心反共。以汪为首的国民党中央，还发出了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的禁令，强迫总工会制裁

工人，下令解散农民协会，收缴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等等。6月1日汪更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向他透露的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训令为借口，说共产党要颠覆国民党，作为公开反共的“理由”。

7月15日，汪精卫亲自主持“分共会议”，正式宣布跟共产党决裂，并在武汉地区开始了血腥大屠杀。其凶残程度较之蒋介石毫不逊色。

“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宁、汉在反共反人民的基础上合流了，但他们之间的权力争夺并不能消除，加上国民党内还有西山会议派、桂系、粤系等派别，使得斗争更加复杂。在激烈的角逐中，蒋介石于8月13日通电下野。南京一些国民党上层分子主张迎汪赴宁主持政局。9月，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派达成妥协，产生了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作为临时最高党政机构，推汪为特委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由于特委会被西山会议派和桂系控制着，汪精卫十分不满，重返武汉另组政治分会，宁、汉再度分裂。随后汪又南下广东，在粤系张发奎、黄琪翔的支持下，要求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统问题。12月，中国共产党趁粤桂战争之机，发动广州起义。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借此对汪精卫进行猛烈攻击，汪不得不于12月再度出走法国。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利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排除了汪精卫集团。汪系重要成员陈公博、顾孟余等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不甘失败，聚集上海进行反蒋活动。同年冬，他们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打着恢复民国十三年（1924）国民党改组精

神的旗号，遥戴汪精卫为领袖。1929年3月，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警告汪精卫和永远开除陈公博等人党籍的决议。

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排斥异己政策，也引起各地方军阀的不满，1929年，先后爆发了蒋桂、蒋冯、蒋唐、蒋张桂等战争。汪精卫认为时机已到，一方面指使陈公博等在反蒋军阀中推波助澜，一方面从国外返抵香港，准备亲自出马。但上述反蒋战争相继失败，汪只得驻港待变。

1930年春，改组派又利用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对蒋的不满，策动他们发动更大规模的反蒋战争。阎、冯、李鉴于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有一定的声望，于是决定联汪反蒋。他们议定：汪主持党务、阎主持政务、冯主持军务。为了反蒋，汪精卫不惜跟过去被他视为反革命的西山会议派头目邹鲁、谢持等人联合，酝酿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另组反蒋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5月，蒋、桂、阎、冯军阀大混战揭幕。8月，汪抵北平主持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被推举为七人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这时屯兵关外的张学良，对于双方的力量对比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9月，张学良决定派兵入关助蒋，阎、冯联军迅速溃败，汪精卫由北平逃往太原，随后潜赴香港。11月，在蒋派控制下，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决定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次年1月，汪宣布解散“改组同志会”。

1931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围绕约法问题爆发了蒋介石与胡汉民两派的激烈斗争。2月胡被软禁。胡派的重要成员古应芬等人联合粤、桂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等共同反蒋。

汪精卫于5月下旬由港返穗，联合反蒋各派，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另组广东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汪与唐绍仪、孙科、许崇智、古应芬等当选为常委。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人民谴责军阀混战，要求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在蒋介石再次下野并释放胡汉民的前提下，宁粤对抗转化为权力分配的谈判。10月，粤方汪精卫、孙科等赴上海参加“和平统一会议”，决定双方各自同时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委员，再合起来开一中全会，产生政府。这时粤方又分裂为广州、上海两派。汪精卫一派在上海单独召开“四全大会”，推选中央委员。12月，宁、沪、穗三方面的中央委员到南京参加四届一中全会。此时，蒋介石辞职离京赴奉化，胡汉民滞留香港，拒绝进京；汪精卫则突然称病在粤住院，等待与蒋联合上台时机的来临。但汪、胡、蒋均被选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委。1932年1月，蒋、汪经过谈判，组成了汪、蒋合作的政府，汪出任行政院长。不久，汪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蒋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形成汪主政、蒋主军的局面。

汪、蒋同时上台，但他们的后台却不相同，蒋主要代表着英、美的利益，汪则更多地投靠日本。汪对内追随着蒋介石，叫嚷“全力剿共”；对外大讲“中日提携”，积极推行媚日妥协的外交政策。

是年，“一二八”上海抗战发生，汪精卫唱着“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调子，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进逼下，一再屈辱求和。南京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

汪的亲日行为，不但为广大中国人民所反对，国民党政府内部也有些人对他不满意。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汪被刺受重伤。12月7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举行，汪虽被推举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但行政院长职务则由蒋介石所取代。次年2月，汪去德国就医。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汪精卫认定这是他攫夺权力、取代蒋介石的大好机会，兼程返国。但当他于1937年1月抵沪时，蒋已被释放回南京。汪的打算落了空。

汪精卫对西安事变后出现的国内和平新形势，阴存反感，继续坚持其媚日、反共立场。他在回国途中就迫不及待地对记者发表谈话，希望恢复中日外交关系。同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汪继续叫嚷“尤勿使数年以来之剿匪工作功亏一篑”^②，但所提出的坚持“剿共”的政治决议草案被会议否定。

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日救亡运动高涨。汪精卫不得不装出支持抗战的姿态，但又散布失败主义，说什么“一个弱国对于一个强国，不得已而战，极度的牺牲是万万不能免的”^③。他认为：“中国战下去，日本不免于伤，中国则只有死而已。”^④后来他自己承认：“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事，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⑤所谓“转圜”，即是投降的同义语。

9月，国民党中央决定组织国防最高会议，推汪为副主席。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选蒋介石任国民党总裁、汪任副总裁，汪对屈居蒋下，深感压抑^⑥。

抗战开始不久，汪精卫周围聚集了一批随时准备向日本投降的民族败类，他们以汪精卫、周佛海为中心，在南京组成秘密团体——“低调俱乐部”^③。后来又网罗一些反共知识分子和无知青年，在汉口成立了以进行文化宣传为幌子的公开团体——“艺文研究会”，宣扬战必败和投降卖国主张。汪厕身于抗战阵营中，在公开场合，他高喊“人人抗战，处处抗战”，暗地里却指使其党徒鼓吹妥协投降。

日本侵略者在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又加强了政治诱降活动。继1937年对国民政府诱降活动失败之后，1938年1月16日由首相近卫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扬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讨论和平”，“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施展分化的策略，促使汪精卫一伙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的企图付诸行动。

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汪对抗战前途更加悲观失望。据汪自称：“我对于觅得和平（即降日）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了，到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④在日本政府引诱下，汪决心卖国投敌，妄图借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夺取国民党的最高权力。

11月3日，日本政府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口号，声称“国民政府……更换其人事之构成而举更生之实，来参加建设东亚新秩序，则并不加以拒绝。”汪立即通过周佛海派高宗武、梅思平到上海，于是月中旬与日本侵略分子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会谈。20日双方达成的《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明确规定日本支持汪精

卫成立“新政府”。其中重要条款还有：缔结防共协定，日军驻扎内蒙地区，承认伪满洲国等。他们并商定了汪等降日的“行动计划”。

12月18日汪率领其党羽周佛海、陈璧君、曾仲鸣、陶希圣等从重庆飞昆明，次日逃往越南河内。按预定步骤，日本近卫内阁于22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以“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对汪公开招降；汪即于29日发出“艳电”响应，并说：“国民政府即以此（指近卫声明三原则）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⑥汪精卫公然背叛中华民族，成为可耻的汉奸。

汪公开叛国后，全国群情激愤，也给蒋介石集团带来被动，国民党中央于1939年元旦召开紧急会议，决议永远开除汪的国民党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⑦。2月中旬，蒋介石命谷正鼎赴河内，劝汪去欧洲游历，汪不理睬。蒋转而采取硬的一手，派特务赴河内刺汪，3月21日误中曾仲鸣。27日汪发表《举一个例》，公布了1937年12月6日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委会会议记录，指出蒋介石也一贯对日主和，而“艳电”依据的正是这次会议的精神。4月25日汪精卫等在日本特务保护下由河内到海防，28日再换乘日轮北光丸，于5月上旬秘密抵达日军占领下的上海，住进江湾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公馆。

5月31日，汪精卫偕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在影佐祯昭等陪同下，乘日本军用飞机抵东京，和日本新首相平沼骐一郎会谈，汪乞求以“国民党（指汪记国民党）为中心，联合各党各派，放弃容共抗日政策，建立国民政府”^⑧。

他无耻地献计说：“保存国民政府的形式，可以避免中国国民抱着受日本压迫而亡国的念头，便于从重庆方面争取许多同志。”^③汪还和日本陆军、海军、财政、外务大臣及前首相近卫等分别进行会谈，要求这些侵略头目支持他建立伪中央政权。6月18日汪精卫回国。7月他在上海、南京与早已投敌并建立地区性伪政权的其他汉奸头目梁鸿志、陈群等会谈，筹组伪中央政府。同月9日，汪还在上海发表题为《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讲话，声称：他一贯的观念是对于日本冤仇宜解不宜结，并将本此观念，对于日本努力于转敌为友^④。进一步表明他腼颜附敌，死不回头的决心。同月下旬，汪精卫在上海召开干部会议，组成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叶蓬、李士群、丁默村等近二十人的汪伪政权的基本班底。

1939年8月下旬，汪精卫在上海纠集投敌的国民党员秘密召开汪记“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推汪为伪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还授权他组织伪中央政权。在这次群魔乱舞的会上，汪打出了“和平反共建国”的黑旗。9月，汪赴南京与华北伪“临时政府”、华东伪“维新政府”汉奸头目王克敏、梁鸿志等，会商成立伪中央政府及伪中央政治会议事务。但是日本对此内部意见不统一，汪伪政权迟迟未能建立。

这时日本政府一方面通过“梅机关”^⑤，继续与汪精卫等人磋商成立伪中央政权的细则；另一方面用“桐工作”为代号派人与重庆政府代表谈判。12月汪与梅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要纲》承认“满洲

国”，蒙疆、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岛屿作为“日华强度结合地带”，由日军长期占领；伪政府成立后日本设顾问监督；伪军警由日军训练，武器由日本供给；经济大权由日本掌握；资源任日本开发；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等。

在日本侵略者导演下，1940年1月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等在青岛举行第二次会谈，会谈纲要都是由梅机关拟定的。汪就《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部分内容作了说明。会谈正式决定组建伪中央政府。

由于对重庆诱降的“桐工作”受阻，日本加速建立汪伪政权。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开场，汪精卫就任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和行政院长，同年11月29日正式就任伪国民政府主席。伪“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同时解散。在日寇刺刀保护下的汪伪政权虽号称“中华民国”，其实际辖区仍只有苏、浙、皖的一部分，宁、沪两市，以及鄂、湘、赣等省的少数地区。在华北和东北，日本另设华北政务委员会，保留了伪蒙古自治政府和伪满洲国，这些地区汪伪中央政府均无权过问。当时上海人嘲笑这种情况为：“汪精卫有苏、浙、皖、鄂、赣，一省不全。”^⑥汪伪政权成立后，日本侵略者并未放弃汪、蒋合流的设想，以便结束侵华战争。是年6月曾多次策划安排蒋、汪、板垣三方面在长沙举行会谈，均未成功。

从7月5日至8月底，汪、日进行“调整国交”的谈判。11月30日签订了《中日国交调整条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了汪伪政权。这项条约包括《日本国中华民国间基本关系之条约》、《附属议定书》、《关于附属议定书中日两国全权委员

间了解事项》、《附属秘密协约》等，进一步确定了汪伪政权的附庸地位。接着，汪又在《中日满共同宣言》上签字，承认伪满洲国。汪精卫干了这些卖国勾当后，竟厚颜无耻地声称“中日关系开一新纪元”，“共存共荣的日子已经到来了”^④。

1941年6月，汪精卫率领党羽再次访日，向近卫乞求援助，获得贷款三亿日元。他感激涕零地表示：“国民政府务必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提供中日提携协力之具体的事实。”^⑤汪还在日本陆相东条的招待会上表示：“不管国际情势如何变化”，他都要履行与日本签订的基本条约及中日满共同宣言之精神，与日本一道，“从速建设新秩序，以图共存共荣”^⑥。7月，德国、意大利等法西斯政府承认汪伪政权。11月25日，德、意、日、西班牙等国签订延长德、意、日《国际防共协定》有效期，并邀汪伪参加此项协定。次日汪发表谈话说，他愿意和德、日、意等国一起，“坚守东亚轴心”和“世界反共轴心”^⑦。

同年12月8日，日海空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汪发表声明，决心与日本“同甘共苦”，“临此难局”^⑧，表示“参战”的希望。但是日本侵略者反应冷淡：“中国（指汪伪）参战是否必要？是否得策？须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及如何与帝国（日本）战争配合，”^⑨拒绝了汪的要求。直到1942年2月，日军相继占领香港、新加坡后，为了扩大侵略战争，日本认为有强化汪伪“国民政府”的必要，于是将上海、厦门、广州、天津、汉口等地租界的行政权移交汪伪“国民政府”管理。汪精卫“深表感谢之忱”，并说：“今后与日本益当密切提携，以期实现东亚永久之和平，并完成东亚新

秩序之建设。”^④5月，汪精卫偕林柏生、褚民谊等访问伪满，声称他是抱着“休戚相关，安危相共之至情”来访问的，希望共同支持日本，完成大东亚战争。同年12月20日，汪精卫应召第三次赴日，他向日本侵略者保证：“决与友邦日本同心协力，共安危共生死”，使“大东亚战争”，“得到最后胜利”^⑤。

1943年1月7日，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会见汪精卫，转告日本政府决定让汪伪政府“对英美宣战”。9日，汪伪政府声称：“当悉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一扫英、美之残暴，以谋中国之复兴，东亚之解放。”^⑥同日，汪精卫与重光葵签订《共同宣言》。强调：“为完遂对美国及英国之共同战争，兹以不移之决意与信念，在军事上政治上及经济上，作完全协力。”^⑦2月15日，汪在第二次“全国军事会议”上鼓吹：要“以同生共死的决心，来参加战争”^⑧。9月20日，汪精卫、陈公博第四次秘密去日本，双方讨论改订日汪同盟条约问题。

同年10月30日，汪伪与日寇签订所谓《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同盟条约》及《附属议定书》，以取代《关于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基本关系条约》和有关附约。条约标榜“永久维持两国间善邻友好”、“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重点却在于“为建设大东亚并确保其安定起见，应互相紧密协力，尽量援助”，“实行两国间紧密之经济提携”^⑨。11月，日本首相东条纠集汪伪、伪满、泰国、缅甸、菲律宾等傀儡，在东京召开所谓“大东亚会议”，汪精卫在会上叫嚣：“大东亚会议得到泰、缅、菲三国参加，及印度临时主席列席，共荣圈的范围更加

扩大了。”^⑤

汪精卫一贯以反共自诩，投降日寇后更以反共邀宠于主子。1941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清乡委员会，由汪精卫兼该会委员长。5月开始“反共清乡”。汪叫嚣：清乡地区是“和平反共建国的实验场所”。1943年汪又强调，“清乡就是建国，就是参加大东亚战争”^⑥。第一年以苏州为中心，划江苏省内十个县为实验区，集结伪军一万五千人，配合日寇，挨村挨户搜索盘查，编定保甲，联保连坐。设置封锁圈，限制人员、物资流通。强调“保障治安”，扬言要“在和平区域内，整理起一条东亚同志阵线”^⑦。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后来清乡范围逐渐扩大到太湖东南以及浙、赣、粤等省。敌伪铁蹄所至，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抓丁抢粮，抢劫财物，对沦陷区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债。

为了配合日寇侵略战争的需要，汪伪政权在经济上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1941年在南京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了大量的没有准备金的伪钞。日寇用刺刀维持着这些废纸的流通。不仅滥发纸币，而且为日本强征物资。连日本战犯重光葵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对中国“完全是单方面的榨取。日本榨取的大多是军用物资，只供消耗，并没有再生产可能。战区愈广，需要这一类的物资更多，除了用占领区的军票支付，更无其他经济手段。因此通货膨胀，民怨沸腾”^⑧。

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仅以苏北地区为例，除了六项专税外，另有大车税、民生税、县税、团税、枪杆税、复兴税、补助税、扬子税、附属行营军事补助

税等，甚至公开征收鸦片特税。名目繁多，不胜枚举。

汪精卫卖国集团还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强调所谓发扬固有道德，开展“新国民运动”，灌输反共思想，宣扬“中日亲善”、“和平反共建国”、“完成大东亚圣战”、“共建大东亚共荣圈”、“共存共荣”等等。汪伪还利用暑假举办学生训练班，提出“打倒共产主义”^③。汪精卫特别指出：上海是“二十余年来共产思想之策源地”，“须从思想清乡着手”，“不仅剿已有之匪，尤在防未然之匪”^④。

1943年8月，汪精卫因当年被刺未取出的子弹引起疼痛，同年12月经手术后，又患感冒并发脊髓炎症。1944年3月3日，偕陈璧君、周隆庠及其子女赴日治病，11月10日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结束了汉奸卖国贼的罪恶生涯。

据一位了解汪伪政权内情的人说，1944年汪曾写下《最后之心情》一文，尽管他对自己充当民族罪人的犯罪事实百般推脱和辩解，但也不得不承认：“铭盖自毁其人格，置四十年来为国家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⑤这种徒劳的辩解，只不过留下了一个民族败类的罪证。

注：

① 张江裁：《汪精卫先生年谱》第1页。

② 《汪精卫自述》，《汪精卫先生行实录》第2页。

③ 汪精卫：《革命决不致召瓜分说》，《汪精卫文存》初集，第94页。

④ 汪精卫：《申论革命决不致召瓜分之祸》，《汪精卫文存》初集，第144页。

⑤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29页。

⑥ 雷鸣：《汪精卫先生传》第38页。

- ⑦ 汪精卫：《致孙中山先生书》（1909年12月），载张江裁：《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第2页。
- ⑧ 吴玉章：《辛亥革命》第102页。
- ⑨ 《汪精卫供词》，载《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第20页。
- ⑩ 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第1页。
- ⑪ 同⑩，第3页。
- ⑫ 参阅闻少华：《汪精卫与国事共济会》，《南开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 ⑬ 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辛亥革命》（六），第279页。
- ⑭ 甘箴：《辛亥革命和议之秘史》，《辛亥革命》（八），第117—118页。
- ⑮ 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第118页。
- ⑯⑰ 同⑬，第294页。
- ⑱ 同⑬，第309页。
- ⑲ 《张謇致袁世凯书》，《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2期，第43页。
- ⑳ 同⑲，第49页。
- ㉑ 唐在礼：《辛亥以后的袁世凯》，《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104、108页。
- ㉒ 雷鸣：《汪精卫先生传》第112页。
- ㉓ 胡汉民：《革命与反革命最显著之一幕》，《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3册，第87—88页。
- ㉔ 汪精卫：《怀廖仲恺同志》，《汪精卫集》卷四，第172页。
- ㉕ 汪精卫在《复林柏生书》中说：“三月二十日之事，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毫没有知道，我那时是政治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三月二十日广州戒严，军事委员会并没有知道，我是军事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三月二十日，第二师团党代表以下都被拘留，我是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我的责任应该怎样？我这时候以为不问这件事情做得错与不错，而这件事情做法不能说是不错。”愤懑之情，溢于言表。载《汪精卫集》卷四，第64页。
- ㉖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声明》，1927年4月5日上海《时事新报》。
- ㉗ 汪精卫：《给〈中央副刊〉的题词》（1927年4月11日）。
- ㉘ 汪精卫：《到汉演说概要》（1927年4月）。
- ㉙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26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
- ㉚ 汪精卫：《大家要讲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1937年8月3日），转引自《汪精卫集团投敌》第179页。
- ㉛ 《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集》第125页。
- ㉜ 汪精卫：《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集》第25页。

- ②③ 陈布雷回忆1938年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的情景说：“推蒋公为总裁，而汪副之，……然汪于接受推举之即席演说中，即有不自然之情态见于词色。”《陈布雷回忆录》（二），第78页，1948年上海版。
- ②④ 周佛海说：“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而且把我们这个小团体叫做‘低调俱乐部’。”见《周佛海先生论文集》第8页。《汪精卫先生传》第307页亦有类似记载。
- ②⑤ 汪精卫：《复华侨某君书》，《汪精卫先生关于和平之重要言论》第24页。
- ②⑥ 《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第1页。
- ②⑦ 《中国国民党八十年大事年表》第327页；《中央日报》1939年1月1日。
- ②⑧②⑨ 《汪精卫与平沼会谈内容》，《日本外务省档案胶卷S487号》。
- ②⑩ 转引自《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第24页。
- ②⑪ “梅机关”是1939年5月日本军部在上海设立的特务机构，由影佐祯昭负责，其中心任务为扶植汪精卫建立伪政权。
- ②⑫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册，第61页。
- ②⑬ 上海《中华日报》1940年12月1日。
- ②⑭ 汪精卫：《与近卫首相共同宣言》，《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辑》第218页。
- ②⑮ 同②⑬，1941年8月21日。
- ②⑯ 同②⑬，1941年11月27日。
- ②⑰ 同②⑬，1941年12月9日。
- ②⑱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846页。
- ②⑲ 同②⑬，1942年2月19日。
- ②⑳ 同②⑬，1942年12月26日。
- ②㉑②㉒ 同②⑬，1943年1月10日。
- ②㉓ 同②⑬，1943年2月18日。
- ②㉔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第198页。
- ②㉕ 汪精卫：《同心协力共存共荣》，《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辑》第437页。
- ②㉖ 《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第222页。
- ②㉗ 汪精卫：《今年新国民运动之要点》，上海《中华日报》1943年1月1日。
- ②㉘ 重光葵（日）：《昭和之动乱》，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845页。
- ②㉙ 同②⑬，1942年8月17日。
- ②㉚ 同②⑬，1942年9月15日。
- ②㉛ 汪精卫：《最后之心情》，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册，第16页。但未见手稿，有人怀疑其真实性。

陈 公 博

闻少华

陈公博，原籍广东乳源，寄籍南海。生于1892年10月19日（清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从六岁起，即开始阅读《水浒传》、《封神榜》等旧小说，并涉猎《唐诗三百首》，到九岁时开始读四书，家中雇有拳师教习棍棒。幼年即“淘气不过”。

陈父陈致美曾任广西提督，1897年解职后住广州。早岁从军，曾结交会党，受会党的反清思想影响。1907年春陈致美在革命党人支持下，联络会党和旧部，筹划在广东乐昌举行反清起义，陈公博受其父影响也参与起义活动。起义计划失败后，陈致美被判处永远监禁。陈公博逃回广州，不久又避居香港，在一家报馆做校对工作。1908年回广州，考入育才书社，学习英文，1911年毕业。

1911年11月广东光复，陈致美出狱，当选为省议会议员，兼都督府军事顾问。这时的陈公博，本来也是个“浮嚣使酒骂座的少年”，又在报馆工作过，“会写几句短评，会做两首歪诗，那时真是自命不凡，不可一世”^①。靠了他父亲的名气，也成为乳源县的挂名议员。但陈致美认为陈公博的年龄小，阅历不够，让他辞去县议员，投入广州的北伐学生军。1912年2月学生军解散，陈致美又要他弃武习文。9月

陈致美病死。陈公博回育才书社任教。两年后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学习，还为香港的一家报馆写通讯。

1917年陈公博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他在北大三年，自称“养心性，寡交游”^②，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鼓不起我兴奋”^③，“没有努力的参加”^④。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对新旧思想采“兼容并包”的方针。在新旧思潮的激荡下，陈公博的思想也在发生变化。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都曾给他“一些思想上的影响”^⑤。在北大，他和谭平山、谭植棠等广东同学过从甚密。他们组织“十人团”，以陈公博为首，提出“制造新贵人”的口号，即“抓着机会便要向上爬”的意思。

1920年陈公博北大毕业后回到广州，任法政专门学校教员，这时他已开始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并受陈独秀委托，在广州主办宣传员养成所，又和谭平山、谭植棠一起筹办《群报》，作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阵地。年底陈独秀到广州，找到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成立了广东共产主义小组。次年3月，他们组建了广州共产党支部，陈公博负责宣传工作，还参与了广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工作。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陈公博作为广东代表出席参加。在会议过程中发生法国巡捕搜查会场的情况，他遂带着自己新婚的妻子，不等大会开完就到杭州度蜜月去了。是年，汪精卫在广州任广东教育会会长，陈以文字见赏于汪，和汪接触较多，并任教育会评议员。

1922年陈炯明公开叛变孙中山，上海中共党组织认为陈公博与陈炯明有勾结嫌疑，需要审查，陈大为不满，于是自行宣布脱离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先是准备给他留党察看的处分，但他坚持己见，后来被开除党籍。是年11月陈公博去日本，翌年2月由日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学经济。在这里，他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认为“马克思所说中等阶级消灭的理论绝对不确”，“马克思的辩证法不确”，“马克思所谓剩余价值也是片面的观察”^⑥，他根本否认马克思的学说，认为中国不能实行共产主义。

1925年2月陈公博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回国，到革命高潮中的广州任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教授，国民党领导人廖仲恺对他寄予期望，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任主席。由于汪、廖的信任，陈公博担任了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和广东省政府农工厅长，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工作。廖仲恺被刺身亡，他又继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1926年年底兼任广东大学校长。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同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蒋介石担任北伐军总司令。陈公博主持总司令部政务局。10月北伐军进抵武汉，陈任湖北省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又任外交部湖北交涉员兼江汉关监督。11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江西，蒋介石将总司令部设于南昌，把陈调去任江西政务委员会主任。在湖北和江西任职期间，他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十分不满。

1927年初，蒋介石企图迁都到他的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把革命政府置于自己掌握之中。在武汉由共产党和

国民党左派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决议迁都武汉，为此对蒋介石进行斗争。陈公博见蒋介石政治上处于劣势，他向蒋献计说：“共党虽然在武汉气势很盛，而军队毕竟附和者不多，若果总司令部能够迁汉，必然可以镇压下去，未来的祸害必然可以预先无形消弭。”^⑦他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国民党第二届第三次中央全会，并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工人部部长。4月上旬，汪精卫到了武汉，陈公博成为汪政治上的坚定支持者。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8日在南京成立蒋记国民政府，宁汉分裂。7月，汪精卫集团继蒋介石叛变革命，宁汉合流。陈公博追随汪走上公开反共的道路。9月，宁、汉两派加上西山会议派在南京成立了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由于分赃不均，汪精卫又回到武汉组织政治分会，与特委会对立，宁、汉再度分裂。陈公博作为汪的代表，南下广州与粤系军阀张发奎、黄琪翔结合，打起反对特委会的旗帜，电请汪回粤共商大计。11月，汪率领顾孟余、王法勤等不满南京特委会的中央委员到广州，举行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通电主张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国民党内部的纠纷。这时广东在桂系控制之下，汪精卫、陈公博利用张、黄与桂系争夺广东地盘的矛盾，策动张、黄发动政变，赶走桂系，控制广州。陈公博任广州军事委员会分会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2月11日，共产党趁广州空虚之际发动起义，陈公博与张发奎、李福林等调动部队把起义镇压了下去。

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借口广州起义对汪精卫、陈公博等人

激烈攻击，汪被迫于1927年12月出走法国，陈则于次年1月到上海。2月，蒋介石利用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机会，排除了汪精卫，拉拢胡汉民为他支撑政治门面。陈公博、顾孟余等汪派人物不甘心失败，麇集上海，以拥汪为旗帜，从事反蒋活动。是年5月、6月，他们先后办起了两个刊物：一个是陈公博主编的《革命评论》，另一个是顾孟余主办的《前进》。《革命评论》以恢复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精神相标榜，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统治有所抨击。但是陈公博在高喊恢复改组精神的同时，仍公然反对联共，目的仅在于抬高汪精卫的声价，以便与蒋争夺权力。由于人民厌恶蒋介石反动独裁，《革命评论》在一部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曾发生过一些影响。

经《革命评论》鼓吹，各地有些刊物起而响应，形成了一股反蒋思想浪潮。1928年冬，反蒋派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奉汪精卫为领袖，陈公博为总负责人。

1929年3月15日，蒋介石操纵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开会前几天，陈公博和汪精卫（汪领衔，时在国外）等公开发表《关于最近党务之宣言》，反对圈定指派代表，抨击南京蒋政权。各地改组派分子也随着进行抗议活动。蒋介石控制的三全大会五次会议旋即通过了警告汪精卫、停止顾孟余党籍三年、永远开除陈公博、甘乃光党籍的决定。还以武力镇压各地改组派的抗议运动。此后，改组派便转而策动地方军阀进行军事反蒋。

在陈公博等的策动下，张发奎于是年9月在湖北宜昌起

兵通电拥汪讨蒋。是年年底，桂系李宗仁与张发奎在广西组织护党救国军。12月改组派又任命驻郑州的唐生智为护党救国军第四路军总司令，驻蚌埠的石友三为第五路军总司令，起兵反蒋。但是蒋介石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先则击败唐生智于河南；接着收买石友三倒戈，改组派发动的这次军事倒蒋完全失败。

1930年初，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酝酿反蒋军事大联合。3月，陈公博、王法勤奉汪精卫之命赴山西勾结阎锡山，并和西山会议派头目邹鲁、谢持等捐弃前嫌，就党务问题进行反复协商。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正式爆发。7月，在汪精卫主持下，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及各派反蒋军阀一起，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9月9日成立了以阎锡山为主席的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峙。但反蒋军事不利，9月18日，东北张学良通电拥蒋，派兵入关，阎、冯军失败。扩大会议很快就散伙了。陈公博“心灰意冷”，于11月赴香港，“改组同志会”也无形解体。1931年1月汪精卫宣布解散“改组同志会”，陈公博复电赞成。接着陈由香港赴欧洲。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团结抗日，国民党各派被迫暂时妥协。陈公博回国后，国民党中央恢复了他的党籍，并在四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1月，各派成立了所谓“统一合作”政府，汪精卫任行政院长，陈公博任实业部部长。

汪精卫上台后，在其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掩盖下，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日深，逐渐形成亲日派。

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后，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长，进一步执行对日妥协政策。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坚持独占中国的方针，影响英、美在华利益，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和亲日派的矛盾日益激化。1935年11月，汪精卫被刺受伤，出国就医；蒋介石自兼行政院长，极力排挤汪派势力，陈公博不得不辞职，旋赴欧洲游历。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陈回国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军事委员会第五部部长。1938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四川后，陈又兼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

和汪精卫一样，陈公博对抗日前途早就丧失信心。他在实业部长任内，即散布“抗日必亡”论调。说什么：“中国一有战事，衣食均缺，真可不战而屈。”^⑧1938年12月汪精卫已背叛祖国，率其党羽离开重庆逃到越南河内，陈亦尾随至河内并携汪投敌声明（即艳电）到香港公开发表。

陈公博并不完全赞同汪精卫离开重庆的作法和其后的行动，所以1939年他仍在香港“徘徊观望”了一个时期。1940年1月，发生了高宗武、陶希圣携走日、汪密约在香港公布，并宣告与汪精卫叛国集团拆伙的事件，汪精卫处境狼狽。陈公博以其和汪精卫的深厚关系，决心追随汪精卫，不久，陈璧君亲自到香港邀他参加伪政权，他回答：“士为知己者死，我一定跟汪先生走，……我随后就到便是。”^⑨到上海后，他又对汪精卫表白：“你既决定牺牲一己，我只有为你分忧分劳。”^⑩

同年3月17日，汪精卫偕陈公博等到达南京。汪伪政权于3月30日正式粉墨登场，汪精卫任伪国民政府行政院长、

代理主席；陈公博则任伪立法院院长兼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政治训练部长。嗣后他又兼任伪上海市长、上海市保安司令。1943年7月，伪国民政府接收上海法租界改称第八区，陈公博兼区公署主任。当时上海有人因陈以立法院长而兼区长，曾嘲讽他“兼选特简荐委，五官俱备”^⑩，说明陈是汪集团的中心人物。

陈公博自参加伪政权后，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汉奸头目。1940年5月，为了争取日本尽快承认伪政权，汪精卫组织了“赴日答礼使节团”，派陈公博为专使，行前陈发表谈话说：当前对内是如何使全国“共同归趋于建国旗帜之下”，对外则“在于谋中日两国朝野深切之相互了解”，共同“建设东亚”。12月陈公博为日、汪《中日国交调整条约》签订发表广播讲话，他向日本侵略者献媚说：“我们的态度，首先为中国打算，更为日本打算，最终还为东亚全盘打算。”^⑪1941年汪伪成立清乡委员会，汪精卫兼该会委员长，陈公博兼副委员长。目标是对共产党和抗日民众进行打击。1943年4月，汪精卫再派陈公博为访日特使，他到日本后，为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叫好，表示“深愿竭其人力物力贡献于大东亚战争”^⑫。9月陈公博又陪同汪精卫秘密访日。10月与日酋签订《同盟条约》及附属议定书，进一步鼓吹什么“为建设大东亚……互相紧密协力”。积极配合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法西斯侵略政策。

1944年3月，汪精卫因病赴日就医，由陈公博代行伪国民政府主席职务。同年11月汪死，陈公博就任伪行政院院长，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成为继汪之后的第一号汉奸头

目。尽管他在就职时信誓旦旦地叫嚷：要奉行汪精卫“手定之政策”，“无论战争如何推移，时局如何迫切”，“决不动摇”^⑭。但当有人问到汪精卫已死，他代理死人行使职权，势必贻笑中外时，陈公博仍坚持己见。他私下对人说：“我不称主席而称代主席，是我对重庆方面表示的一种姿态。汪先生上演的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了。我来继位，是来办理收场的，不是来继续演出的。”^⑮为此，陈公博在就职讲话中提出了讨好蒋介石的“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口号，作为逐步结束伪政权的方针。他要求重整党务，召开一次全国党的代表大会，来结束伪政权，但未来得及日本就投降了。他曾和周佛海等根据日本主子的意旨，卖力推进对蒋介石集团进行“诱和”的工作。此外，他还卖力调整军事部署，积极配合蒋介石集团反共。他除了和国民党军统进行联系外，又和国民党地方军事当局有过相当接触。所有这些，都是为他自己和汉奸们留下一条后路。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周佛海由于早和军统头子戴笠有勾结，被蒋介石封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统局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8月16日，陈公博主持在南京召开的最后一次伪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了伪国民政府解散宣言。8月25日，陈公博乘混乱之机，偕其妻李励庄及林柏生、周隆庠等人，在日本顾问小川带领下，乘飞机逃到日本。经国民党政府交涉，10月13日陈公博等六人被引渡回国受审^⑯。

陈公博在监狱中写了《八年来的回忆》一文，为汪精卫和他自己开脱罪行。他迎合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准备发动全面

内战的心理，想以一贯反共的自白获取蒋的谅解，说：“重庆赞成联合剿共，我们也剿共，重庆不赞成剿共，我们也剿共。日本不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就是日本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我是不惜因为剿共问题和日本翻脸的。”^⑩ 1946年4月12日，蒋介石慑于全国人民要求严惩汉奸的舆论压力，将陈判处死刑。6月3日，陈公博在苏州被枪决。

注：

- ① 陈公博：《我与共产党》，《寒风集》，地方行政社1945年上海版，第194页。
- ② 同①，第196页。
- ③ 同①，第198页。
- ④ 陈公博：《少年时代的回忆》，《寒风集》，第13页。
- ⑤ 同④，第199页。
- ⑥ 同①，第231—232页。
- ⑦ 陈公博：《军中琐记》，《寒风集》，第153页。
- ⑧ 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陈逆公博罪行录》第32页。
- ⑨ 陈伯衡：《我所知道的陈公博》，《广州文史资料》第四辑，第186页。
- ⑩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一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960年版，第46页。
- ⑪ 同⑩，第二册，第61页。根据汪伪官制，立法院长为选任，军委会政治训练部长为特任，上海市长为简任，区长则在荐任、委任之间。
- ⑫ 上海《中华日报》1940年12月4日。
- ⑬ 上海《中华日报》1943年4月8日。
- ⑭ 上海《中华日报》1944年11月21日。
- ⑮ 巫兰溪：《汪伪政府末日记》。
- ⑯ 参见《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 ⑰ 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四册，第206页。

周 佛 海

闻少华

周佛海，湖南沅陵人，1897年5月29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①，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②。其父曾入湘军幕府，参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晚年赴闽任知县。周幼年丧父，他和弟妹三人由其母抚育。

周童年在乡村私塾读书，1912年考入沅陵高等小学，次年因欺负新同学受到谴责而自动退学，旋转入长沙兑泽中学，随后又转入沅陵中学。那时他只想进长沙省立高等师范，或在不能升学时谋求当一名县政府的书记（记录）甚至小学教员，就心满意足了。

1917年，一个偶然的机，周佛海得到师友资助旅费，前往日本求学。到东京后开始学习日语和其他课程。1918年5月6日，东京中国学生救国团集会，反对“中日共同出兵防敌协定”，遭到日警殴打并被捕多人。在东京的留学生大多数主张罢学回国，周也不例外地回到国内。因生活无着落，经人介绍，到在奉天（今辽宁）安东县办厘金的一个同乡那里谋事，孰知到后实无事可作，所看到的是“满目芦苇，几家土屋”，感到“前途渺茫”，“几欲跳海自尽”^③。两个星期以后，他又回到东京，经过短时间的准备，竟侥幸考取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官费生。一年以后，预科毕业，周被分发到鹿

儿岛的第七高等学校，读书以外还给中华书局译些书稿，并给《解放与改造》杂志撰文，挣些稿酬。

当时的日本，一方面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另一方面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不断涌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之父——卡尔·马克思》等论著相继出版，周佛海也程度不同地受到这股新思潮的影响，“看到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觉信仰起来”^④。

1920年周佛海由日本返国。原打算回湖南省亲，正碰上湖南发生湘军谭延闿、赵恒惕驱逐祸湘的张敬尧，交通梗塞，他只好滞留上海。这时陈独秀因主办《新青年》鼓吹新思想，为军阀当局所不容，也避居上海；周佛海通过张东荪的介绍认识了陈独秀，又结识共产国际的代表魏金斯基，对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发生了兴趣。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周佛海以留日学生党员代表身份参加，会后仍回日本。第七高等学校毕业后，他又升学到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直到毕业于1925年5月回国。周回顾这段历史时对入党动机毫不讳言地说：当时的确是“抱负不凡，深以将来的大政治家或革命领袖自命”^⑤。甚至干脆说：“当时所谓个人的动机，就是政治的野心，就是Political ambition。”^⑥

周佛海既抱有个人野心入党，研究马克思主义又很肤浅，他比较了英国产业革命时期与当时的中国经济状况后，认为“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在中国几等于零”^⑦。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荒谬结论。

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国、

共两党的全面合作。这时戴季陶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周佛海系应戴的约请，由日本返穗的，不久任宣传部秘书兼广东大学教授，月支薪水二百四十元。按当时规定，共产党员在社会任职有薪给收入者，须交纳部分薪水作为党费。周妻杨淑慧却说：“这钱挣来不容易，何必交党费，还是退了吧！”周佛海也是这个打算。为此，他拒绝参加党的组织活动，并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中共广州区执行委员会曾对周进行教育挽救，但无效。为纯洁党的组织，9月同意了他的脱党要求。

脱党后的周佛海，为了表明他要当一名“国民党的忠实党员”他纠集广东大学的几名教授，创办反共杂志——《社会评论》，以攻击共产党为能事。1925年他还在《孤军》、《独立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共文章。

北伐军于1926年7月由广东出发，10月攻克武汉，周佛海通过戴季陶的介绍得到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信任，委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不久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心与武汉政府对峙。这时国民党内左右两派斗争激烈，周除向蒋秘密汇报武汉情况外，决心寻机逃离大革命中心的武汉，

1927年5月，正当夏斗寅叛军逼进武汉时，军校学生开赴前线作战，周奉命在校留守，因得以伺隙由汉口携眷搭乘英轮潜逃。但在上海上岸时，却遭到南京政府的逮捕，经过其妻杨淑慧多方奔走，找到上海特派交涉员郭泰祺及王世杰等人疏通，并经吴稚晖、戴季陶等人营救，监禁半个月后得到释放。

周佛海获释后，蒋介石派他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

教官。同年8月，南京政府中蒋系与桂系矛盾加剧，蒋不得不宣布下野，随后到日本。周失去靠山，也去职离宁赴沪。此时戴季陶任中山大学校长，周遂应召赴粤相助。不久又回沪，奉蒋命与戴季陶、陈果夫等创办政治评论刊物《新生命月刊》，1928年1月该刊问世之时，也正是蒋介石东山再起之日。接着，周又创办了新生命书局。《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一书，即在此时完成。

蒋介石复任总司令后，周又被派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同年夏，“北伐”战争告一段落，7月蒋到北京西山碧云寺祭灵并酝酿编遣军队问题，周佛海、邵力子、陈布雷、陈立夫等随行。

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9年2月召开，周佛海被指派为菲律宾的党员代表。这时正是蒋桂战争前夕，周为蒋草拟讨伐李（宗仁）、白（崇禧）的宣言，并随蒋出发到武汉。蒋桂战争以桂系失败告终，周因反桂有功，被蒋任命为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兼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次年在蒋阎冯中原大战中，周则忙于为蒋草拟通电、宣言和宣传大纲。

1931年3月，蒋介石与胡汉民在约法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蒋不顾胡的反对，于5月召集国民会议，形成宁粤对立。国民会议后，周又随蒋赴江西“剿共”。11月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周佛海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宁粤妥协的结果，蒋介石再次下野。蒋在下野前安排顾祝同为江苏省主席，并徇顾的请求任命周佛海为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1932年蒋与汪精卫合作重新上台，汪任行政院长，蒋自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于1933年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并参加秘密组织蓝衣社的活动。他在蒋氏左右是“中统”特务首领之一，同时又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组长之一，成为蒋氏贴身机要人员。

西安事变发生后，1937年1月汪精卫兼程回国，周佛海与邵力子等奉命去香港迎汪，是为汪、周相与之始。不久周调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

“七七”抗战爆发后，周佛海对抗战前途悲观绝望，他认定“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在“八一三”后，周与来南京西流湾八号住所的客人顾祝同、熊式辉、朱绍良、梅思平、罗君强、陶希圣、高宗武等大唱和平低调（即鼓吹妥协投降），胡适感到此处的气氛与外面大不相同，就称之为“低调俱乐部”^⑧。同年年底，周佛海与陶希圣等在汉口成立“艺文研究会”，该会网罗所谓文化界人士，制造反共降日的舆论，由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并先后在长沙、成都、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立分会。周佛海从此就转而成成为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集团的主要骨干了。

从1938年初到年底，围绕着中日战争，日本政府对蒋、汪进行诱降分化，蒋介石、汪精卫等也不断派人去上海、香港、日本等地对日方进行“和平”试探，其中包括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的赴日，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及董道宁和日人西义显、松本重治等的多次秘密会谈。7月，周更瞒着蒋介石秘密派高宗武、周隆庠由香港到日本，试探对日妥协的途径与条件，高与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

骏、国会议员犬养健等多次晤商。双方确定以汪精卫为收拾时局的对象。汪精卫，周佛海得知上述消息，并获悉日本五相会议决定“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汪、周对此心领神会，于11月决定授权高宗武、梅思平再往上海，与日方代表举行秘密谈判。11月20日，高宗武、梅思平与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秘密签订《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并拟定了汪精卫响应日本招降声明及出逃的计划。27日，梅思平由上海经香港到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送交与日方签订的秘密协议。

12月5日，按预定步骤周佛海由重庆飞往昆明为汪精卫作出逃的准备工作。18日汪精卫由重庆飞往昆明。次日汪精卫偕周佛海、陈璧君、陶希圣、曾仲鸣等逃往越南河内。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对汪进行公开招降。27日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等人携汪精卫声明电稿由河内到香港。29日汪精卫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刊出，标志着汪精卫、周佛海等一伙人公开叛国降日。

在要不要发表《艳电》这一问题上，周佛海和在港的顾孟余针锋相对，当顾看到电文原稿后，态度鲜明地对陈公博说：“这电文万万不能发表，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蠢事。”当陈将顾的忠告转知给周佛海时，周恼羞成怒地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如果因为顾孟余一人的反对就不依期发表，那就散伙好了。”他怒冲冲地说：“打开天窗说亮话，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商量的，干就干，不干就拉倒。顾孟余不过是一个部长，我难道就没有当过部长吗？怎么可以由他一个人反对就推翻一切，连电报也压住不发呢。”^⑩可见周当汉奸的

决心有多么强烈。

1939年5月，汪精卫由日本人保护从河内到上海，周佛海等与汪会合，旋即住进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开始伪政权的筹建工作。

为了制造舆论，7月9日汪精卫首次在沦陷区发表《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讲话；周佛海也精心炮制了《回顾与前瞻》的长篇文章，为敌人张目，为汉奸开脱，极尽颠倒是非之能事。胡说什么：这次战争“因为是阴错阳差的打起来，就不能不糊里糊涂的打下去”。他指责中国方面的抗战是“朝野上下的调子，没有不高唱入云的”。从而把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罪责转加在中国头上。周佛海分析当时对时局有三种观点：“一是战必大败，和必大乱；二是和必大乱，战未必大败；三是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他说他“研究的结果，觉得第三种看法是对的”。他的根据是“中国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件能和日本比拟”。他预言“如果战事延长下去，日本当然是要愈益困难的。但是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已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⑩。说来说去，还是民族失败主义与民族投降主义的老调重弹。

周佛海不只是仅作些汉奸理论的宣传，在准备汪记“六大”时，他组织了“学艺研究社”，作为收罗汉奸的机构，派罗君强为总干事，于是一批社会沉渣泛起，一时投机政客、国民党失意分子、无行文人均逐臭前来，周佛海则一律予以接待，发给生活津贴，留作伪政权成立时之用。

汪伪政权终于在1940年3月30日敲响开场锣鼓，周佛海

颇为沾沾自喜地说：“第三次中政会，通过中央各院部会人选，余所预拟者，大体均照样通过。此次中央，实余助汪先生组成。”^⑩他还为自己能在历史上留下臭名而恬不知耻地说：

“国民政府还都，……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生此一世也！”^⑪

周佛海的叛国投敌，不是一般被动地追随，而是以一个出谋决策者的角色出现，他的地位仅次于汪精卫、陈公博。周在伪政权中曾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警政部长暨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财政部中央税警总团总团长、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上海特别市市长兼保安司令暨警察局局长等要职。

周佛海落水当汉奸后，异常卖力，他兜售汉奸理论，拼凑汉奸班底，他本是一个怀有政治野心的家伙，对于人事、外交、军事、财政、特工等大权，无不力求控制，成为事实上汪伪权力的象征，最大的实力派。

周佛海还不遗余力地培植私人势力。早在1939年秋，他即笼络易次乾、耿嘉基、罗君强、金雄白等结为“金兰之谊”。汪伪政权成立后，周又与李士群、罗君强、汪曼云、金雄白等十人结成小团体，把他们安插在各伪部、会内，使其成为周的耳目，从而使周佛海的个人势力渗透于各个角落。

周佛海对特工组织也不放松控制。汪伪特工总部头目丁默邨、李士群，就是由周一手拉进汪记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在汪记六届一中全会上，周佛海又顺利通过建立特务委员会的组织，自兼主任委员，直接控制

特工总部。

由于汪伪的主要“外交”活动就是和日本主子打交道。日、汪之间的交涉主要由日方代表犬养健、影佐祯昭和周佛海之间秘密进行，因此周佛海很轻易地操纵了外交大权。伪政权建立后，外交部长名义上由褚民谊担任，但重要交涉仍由周与日本直接进行。对此，褚民谊曾就《中日关系基本条约》的签订情况大发牢骚说：“这件事由周先生（周佛海）和影佐大佐二人去办理，不用我操心，等他们谈妥后，我来盖章。”^②说明外交权力，实操诸周佛海之手。

周佛海还将他的权力触角伸向军事方面。伪政权成立后，周设法成立了“肃清委员会”，自兼主任委员，下设“和平建国军总指挥部”，其任务是收编投靠汪伪的各种杂牌武装。其后周又筹建直辖于自己的税警团，由周的亲信罗君强主持实际工作，周自兼团长。把税警团搞成一支训练有素、装备较好、拥有几万人的汉奸武装。

财政金融是周佛海全力经营的一个重要方面。一开始周就牢牢控制“和平运动”经费，稍后经过与日本交涉，又把“关余”^③掌握在自己手中，事实上控制了汪伪的财政金融大权。伪政权建立后，周理所当然地出任财政部长，其亲信则分任盐务、关务署长。1941年在周佛海一手策划下，又筹建了伪中央储备银行，他兼任总裁，并在上海、苏州、蚌埠、扬州、广州、武汉等地建立分行。

从反共、反人民，破坏抗战的罪恶目的出发，汪伪秉承日寇旨意，1941年6月，在南京设置“清乡委员会”，汪精卫为委员长，周佛海、陈公博为副委员长。“清乡”前后进行了

三期，给沦陷区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为了配合日寇的以战养战政策，同年8月，周佛海与日本派遣军副总参谋长土桥拟定《长江下游地带物资统制暂行调整要纲》。建立隔绝地带，对某些物资实行封锁，并实行食盐按人口配给制度。汪、日还联合成立中央及地方物资统制委员会。

但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投机成性的周佛海眼看大势不妙，又想投入蒋介石的怀抱，进行政治投机。1942年10月，周派军统特务程克祥去重庆，向蒋介石输诚，通过戴笠面交其亲笔信。信中表示希望沟通宁、渝之间的联系，促成“全面和平”的实现，也就是希望宁、渝合流。1943年3月5日，周佛海在上海会见被捕释放的吴开先，准其返回重庆，要吴向蒋介石“相机传达和平意见”^⑥。5月程克祥由重庆返上海，带回电台及译电、报务等人员。并向周佛海报告会见蒋介石、戴笠等人情况。以后直到抗战胜利前夕，周和戴笠之间信使往返不断。

周佛海迎合蒋介石的反共心理，11月25日会见胡宗南驻上海代表洪复礼，详细讨论了联合反共和阻止长江南北两岸地区新四军发展问题。1944年2月13日，周佛海在接见伪政治部保卫局副局长胡均鹤时，令其今后“移重点于对付共产党”^⑦。4月3日，周委托国民党在上海的情报人员葛湛侯去重庆，向蒋介石转达日本关于实现中日全面和平及蒋、汪联合反共的意见。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病死，周佛海任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945年1月，周兼任上海市长前，曾征得

戴笠同意，周同时还兼任上海市警察局长、保安司令等职，派他的心腹罗君强任上海市秘书长兼财政局长。

2月23日，周佛海、陈公博召集一次以反共为目的的军事会议，庞炳勋、孙良诚等伪军头目参加。会议详细讨论了汪、日军事协定，议定：美国如在中国登陆，日军则全力抵抗，汪方军队则主要对付八路军、新四军。在反共一致的基础上，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派谢企石会见周佛海，转告重庆国民党政府“咸望南京与重庆配合，共同剿共”^⑩。同月26日，周接见陈立夫派驻上海的代表林某，讨论联合反共的具体办法。

1945年8月10日，日本决定接受苏、美、中、英四国《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12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命令他指挥伪中央税警总团、上海市保安队等伪军，负责维持上海市及沪、杭一带治安。

周佛海受宠若惊，19日他声称已奉命任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并成立了行动总队司令部。周神气活现地宣布：（一）本司令部所辖区域内各部队，未得委员长（指蒋介石）之核准，不得擅自移动及受任何方面之收编。（二）与治安有关之集会等行动，未经本司令部核准，不得举行。（三）对已停战之日军及日侨，不得侮辱或伤害。（四）人民纳税之义务，仍当履行，不得借词拒纳。……^⑪

但是周佛海神气了一阵之后，国民党当局慑于舆论压力，9月30日，军统局还是将周佛海、丁默邨、罗君强等汉奴软禁起来，并由军统局长戴笠用飞机亲自押往重庆白公

馆。后又以叛国罪转移到南京受审。在审讯中，周佛海狡辩说：他参加南京伪政府的前半段，是“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后半段则是“通谋本国，图谋不利敌国”^⑩。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处他死刑。周不服，多次申请复判。

1946年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死去，周佛海的处境更为不妙（因戴是周在抗战期间与重庆联系的重要人物），他哀叹：

“雨衣（戴笠的字）死，我也完了。”^⑪不过周佛海在1947年3月26日仍然得到蒋介石的特赦令，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脏病和其他并发症，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注：

- ① 据周佛海：《往矣集·苦学记》云“辛亥武昌起义的时候，我才十五岁”，当系虚岁。又《周佛海日记》1943年6月31日、1944年5月20日及1945年6月8日，均记作他的生日。按：上述三个日子，均为夏历四月二十八日。因此周的出生日期应为清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即1897年5月29日。
- ② 据周佛海自述，“家有薄田百余亩”。
- ③ 周佛海：《苦学记》，《往矣集》，1945年平报社版，第15—16页。
- ④ 周佛海：《扶桑发影溯当年》，《往矣集》第27页。
- ⑤ 同④，第25页。
- ⑥ 同④，第27页。
- ⑦ 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汉》，1927年8月版。
- ⑧ 参见周佛海：《走火记》，《往矣集》第83页。
- ⑨ 陈春圃：《蒋介石、汪精卫争当“儿皇帝”内幕和汪精卫傀儡戏班底的拼凑与灭亡》（未刊）。
- ⑩ 周佛海：《回顾与前瞻》，《周佛海先生论文集》第4—5页。
- ⑪ 《周佛海日记》1941年3月22日。
- ⑫ 《周佛海日记》1940年3月31日。
- ⑬ 田守成：《褚民谊和汪伪组织》。
- ⑭ “关余”，指鸦片战争前，中国政府的关税收入，每年由税务司存入汇丰

银行，用以偿还英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外债或赔款之本息后而余出的金额。“八一三”事件后，日军强将“关余”改存于横滨正金银行。经周佛海交涉，此款交由周佛海支配，作为汪伪活动经费。

⑮ 《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第198页。

⑯ 同⑮，第239页。

⑰ 同⑮，第267页。

⑱ 同⑮，第282页。

⑲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四册，第106页。

⑳ 同⑲，第102页。

周 学 熙

朱信泉

周学熙，字缉之，别号定吾，六十岁以后别号止庵，又号卧云居士^①，安徽至德县（今东至县）人。1866年1月12日（清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于金陵（今南京）。其父周馥于1861年底入淮军李鸿章营幕，办理文案，为镇压太平军、捻军效力，受到李鸿章的赏识，累获拔擢。1871年李鸿章督直，奏调周馥到北洋办理河工，任永定河道、津海关道，后来升任四川布政使、山东巡抚、署两江总督，调两广总督等职。

周学熙七岁入塾读书，稍长得长兄周学海的辅导，学业大进，1880年十六岁时中秀才。1883年跟随周馥的幕宾邵班卿等人讲论舆地、公牍并治举业和词章，从而“粗得窥见各学门径”^②。翌年从李慈铭问学，颇得老师的好评。1886年其父周馥捐饷，部议给奖，周学熙得以候补郎中，被签分工部都水司主稿上行走。1893年参加顺天乡试，中举人。后来多次参加会试未中，且以家累渐重，决定放弃科举正途，作异路功名的探求。1897年周学熙通过亲戚时任开平矿务局总办张翼，谋得开平矿局董事、驻上海分局监察职务，观察开平煤炭在南方的销售情况。次年，周学熙报捐候补道，由北洋大臣裕禄札委为开平矿务局会办，不久任总办。这是周学熙接

触新式工矿事业的开始。

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天津，周学熙护送眷属去沪避难。不久，周馥奉命随同奕劻、李鸿章办理和议条款事宜，周学熙随侍其父于1901年2月12日抵达北京。辛丑条约签订后，周学熙到济南投效山东巡抚袁世凯，被委为山东大学堂总办。他编印《中学正宗》、《西学要领》和天文、地理、格致等课本，以进行“中体西用”的教法。

1902年5月，周馥在袁世凯督直后升任山东巡抚，成了周学熙的顶头上司，按照惯例需回避，于是周学熙被转分直隶候补，7月经直隶总督袁世凯委派总办银元局。时值庚子之后，北方糜烂，私钱遍布，物价沸腾，民生凋困。袁世凯决定设局制造铜元和银元，以济市面并为直隶增辟财源。周到差后，利用天津河北大悲院烬余故址，移用东局子修械厂的旧机器和上海旧存锈蚀残缺之件，招来机匠漏夜改造安装，仅费时七十日就开工铸出铜元。周的办事才能和效率，深受袁世凯的赏识。

1903年4月，周学熙经袁派往日本考察工商和币制事宜。他在日本两月，悉心考察东邻获得富强之道，认为“日本维新，最注意者练兵、兴学、制造三事”^③，除练兵为国家之事外，兴学校、办工厂则以民办居多，从而坚定了他发展民营工业的决心。他回国后，随即条陈袁世凯，请在天津设立工艺总局，作为振兴北洋实业的枢纽，以“考求直隶全省土产，及进口所销各货，凡有可以仿造者，力为提倡保护，不必官事制造，但厘定章程，专司考察，择取日本凭帖奖牌之类，鼓舞而奖励之”，并说“果能得其要领，三五年

间必然有勃然兴者”^④。这一建议十分符合袁世凯举办“新政”以博取政治声誉，发展工业使游民就业而隐患可消的意愿。随后，周被委派为直隶工艺局总办。他认为“工非学不兴”，1903年在天津开办高等工业学堂，培养化学和机械制造方面的人材和师资。翌年开办实习工厂，供学生实习，并招收工徒培训工匠。同年8月开办考工厂（1906年底改名为劝工陈列所），展出所购集的国内外制品，并兼寄售货品，借以开通民智，劝导绅商投资工业。1905年冬，创办教育品制造所，招工制造各种教育用品，以应教学的需要。周还由直隶工艺总局投资开办造纸厂，作为示范；又以官督商办方式，开办劝业铁工厂；以官助商办方式，开办染织缝纫公司、造胰公司、牙粉公司和玻璃厂等。

为了推动直隶全省发展工艺，该局指导顺直各属府州县厅，先后设立了工艺局、所六十余处，作为地方振兴工艺的指导机关。周学熙因振兴工艺而累获提升，由一个候补道而署天津道，授通永道，升长芦盐运使，署直隶按察使，但仍兼直隶工艺局总办。在这期间，周还先后兼任过教养局总办、淮军银钱所会办、北洋支应局总办和天津官银号督办等要差，由此可见袁世凯对周的倚重和信任。北洋官营实业的兴办，虽然喧闹一时，但并没有可靠的根底。其经费来源，起初依靠银元局造币鼓铸的余利拨付；嗣后，周担任盐运使，则改由运库支付，是一种因人成事的做法。当1907年8月袁世凯卸去直督，同年底周学熙因丁母忧而去官，北洋官营实业，就因人事变迁而迅速废弛。但在此期间，周学熙所负责筹办的滦州煤矿和启新洋灰公司，则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和发展。

滦州煤矿筹办于1906年初。早在1902年，周学熙就奉直督袁世凯之命，办理收回八国联军入侵期间被英商骗占的开平煤矿，经四年交涉而无进展。后来经周报准，一面向英国人交涉收回开平，一面另创滦州煤矿，进行抵制。1907年9月，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后改名滦州矿务公司）正式成立，周学熙任总理，资本二百万两，其中官股八十万两，商股部分则由周氏家族和长芦盐商、直隶的各县知事以及在滦矿有职务的人员分认。起初，滦矿在开平镇附近用土法开采，因产煤多、成本低，销路甚好。转年又增资一百万两，购进德国机械，各支矿井铺设铁路与总矿相连，规模日渐完备，成为近代化的企业。而英商骗占的开平矿，则处于滦矿包围之中，矿区的蕴藏量也因多年开采而日渐枯竭。到1909年冬，开平英商见一再阻挠无效，才同意由滦矿备款赎回之议，办法是由清政府为滦矿担保，发给债票，赎回开平。但此议却遭到擅卖开平矿的原督办张翼的阻挠，以致清政府不允为发行债券担保，遂使赎回之议搁浅。开平英商见有机可乘，决心吞并滦矿。采用大肆跌价倾销煤炭，使滦矿遭到很大的经济压力，其后开平又托人说合，饵以厚利，要求两矿合并。滦矿股东在与开平苦斗经年之后，正不堪跌价竞销所造成的巨额赔累，以及对辛亥革命爆发后政局前途可能影响股东权益的疑惧，认为和开平合并不仅有厚利可图，且可藉洋人的势力保护产业。滦矿资本家们从自身的私利出发，抛弃了先前“以滦收开”的初衷，反而接受了“以开合滦”的办法。周学熙曾为此作辩解说，“此次联合之意，倡自开平，而董事

提议，股东赞成，实非学熙之本心”^⑤。1912年1月27日，双方签订了“开滦矿务总局联合办理合同草案”，6月1日签订正式合同。合同中，虽有十年后滦矿有权以双方商定的公道价值，将开平公司全产购回的条文，但1922年到期时，滦矿股东并未赎回开平。其时，国内北洋军阀混战频仍，不赎回开平矿反可以得到英帝国主义势力的庇护，并有超额利润可图的缘故。开滦联合的第一个十年中（1912—1921），获利高达六千八百零九万元^⑥。它为周学熙等原滦矿股东带来丰厚的股息，分派股息后的余额，周建议以“新事业存折”名义积累起来，作为日后举办新事业的基金。

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06年，周学熙任总理。启新的前身是唐山洋灰公司，当时由开平矿务局垫款管理，经周学熙与开平多方交涉，始于1906年8月26日正式收回。公司决定新招股本一百万元^⑦，向丹麦斯密士厂购得卧式旋转钢窑及钢磨，在唐山设总厂，加上老厂机器，年产洋灰二十四万桶。1909年启新添股本三十万元，在唐山马家沟增设分厂，先建机器制砖厂；次年又扩充新股一百五十万元，添置新式窑磨，年产洋灰增至四十三万桶。1912年启新改组，完全商办，成为华北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型民营工业。

启新洋灰由于销路好，企业不断扩充，到1923年已拥有甲、乙、丙、丁四个厂，年产洋灰一百五十万桶，在国内产销方面一直处于独占地位，直到刘鸿生在上海开办的华商水泥厂和姚锡舟在南京开办的中国水泥厂的产品于1923年问世，才打破启新洋灰的独占局面，但启新仍占优势。

启新兴办获得成功，首先由于国内工矿、交通和建筑等

业对洋灰的需求日增；再是得力于当时“舍实业无以富国，利权待挽，非众擎不足为功”^⑧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思潮的推动。以启新的开办集股而言，它得到愿将宦囊转化为工业资本以获厚利的北洋官绅们的支持，第一期开办股本一百万元，不消半年就全数招齐；在股款招齐之前，还得到淮军银钱所和天津官银号的低息垫款以为周转；而启新的主持人周学熙，素以廉洁干练著称，颇得投资者的信任，也是个重要因素。再是启新在当地找到水泥的主要原料——坩子土，并获得滦矿供应的廉价燃料，使生产水泥的成本大为减轻，所以启新产品一问世就能独步国内市场，取得高额利润，并为国家堵塞漏卮。启新以民营企业而取得成功，对华北地区近代工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也为周学熙等人后来创办华新纺织公司等企业开辟了道路。周学熙本人则由一个北洋官吏成为知名的民族工业资本家。

周学熙兴办实业的才能，深得袁世凯的青睐。民国初年曾两次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第一次任财长是1912年7月，正是袁世凯政府佯奉和平统一，而实际上蓄意消灭资产阶级民主派势力，搞专制独裁之际。袁于翌年3月20日指使歹徒暗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之后，加速了发动内战的步伐。为了筹措内战军费，袁指派总理赵秉钧、外长陆征祥、财长周学熙，于4月26日和英、德、法、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二千五百万镑（约合二亿八千万银元）的《善后借款合同》。这一条件苛刻有损主权，而事先又未经参议院审议的非法借款合同的签订，自然遭到国会和国民党人的反对和指责。周学熙为此刊出《布告善后借款情形文》和

《中国善后借款合同案汇编》，为自己和袁政府辩解。随后，周于5月16日请假，避往青岛（9月11日免职）。周学熙就任财长之初，曾提出《财政政见书》和《财政方针说明书》，企图对当时财政有所整理和建树，但实际情形是“内外同一困穷，举措动生牵掣”，结果只能“多成纸上空谈”^⑨。

周学熙第二次任财长是1915年3月，他原想利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和“白朗军”之后取得暂时统一局面，在财政和实业方面有所作为。他提出清丈田亩，以增加田赋收入；整顿场产，以裕饷项；实行烟酒公卖，以增辟税源；清理官产，以补助国库收入等办法，为袁政府筹措军政费用。在经济政策方面，提出创办民国实业银行，以推行都市工业建设；创办县农工银行，发展乡村经济等。同年8月，筹安会成立，周对复辟帝制不予附和，并上书袁世凯劝阻，继又请辞财长职，袁不准。后来周请病假，乞居北海养病避嫌，直到次年4月才准去职。从此，周学熙无意做官，而专心于实业。

华新纺织公司创设之议，始于1915年。其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第二年，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棉纱、棉布输入锐减，价格飞涨，纱厂利润倍增。周学熙见有大利可图，授意王锡彤、马萍等人具呈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创办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计划筹集资本一千万元（官四，商六），在直、鲁、豫三省设厂。周利用财长的职权，拨官款八十万元订购纱锭二万五千枚，并发表他的九弟周学辉为公司督办，决定先建华新津厂。但不久袁世凯复辟帝制败亡，时局动荡，股东疑虑观望，津厂建设迟缓。1918

年曹汝霖任北洋财政总长时，以华新商股未集，决定将华新津厂改为官办。股东闻讯十分焦急，连日开会商讨对策，后经周学熙向徐世昌总统疏通，才允准改归商办。于是华新成立董事部，一改推周学熙为主任，邀杨寿楠为副主任^④。由杨寿楠从无锡招聘工匠来津，漏夜赶工安装机器，到1919年1月，华新津厂便竣工投产。津厂采取包工制，工人受到资本家和包工头的双重剥削。津厂开工后，当年就获得利润一百四十万元，到1922年共赢利四百一十三万元，超过该厂二百万开办资本的一倍以上。

华新津厂既成，周学熙加速进行华新青（岛）厂的建设，并于1919年底建成投产。青厂资本一百五十万元，纱锭二万枚，周学熙任专董，以他的次子周志俊实际主持。在华新青厂建成前后，日商在青岛先后建了九家纱厂，与华新竞争十分激烈。为了维护企业的生存，华新青厂只有在业务经营上、生产管理上尽心竭力，出奇制胜。周志俊曾赴欧美考察纺织技术，回国后增添设备，使该厂成为纺织印染的全能厂，经营赖以不坠。

华新三厂建于河北唐山，有纱锭二万四千枚；华新四厂建于河南卫辉（今汲县），有纱锭二万枚。唐、卫两厂资本主要由启新和滦矿的“新事业存折”基金投入。唐、卫两厂投产时，国内纱厂已处于不景气状态，由于两厂所在地区产棉既多，纱销亦畅，因而投产后尚能年有盈余。华新津青唐卫四个厂的建成，是周学熙为首的北洋实业集团的鼎盛时期。

周学熙所经营的企业，虽以前述滦矿、启新、华新等厂

矿为主干，但他先后参加创办的还有京师自来水厂、滦州矿地公司、耀华玻璃公司（与比利时商人合营）、普育机器厂和启新机器厂等。为了抵制北洋交通系官僚对华新纱厂的覬覦，1918年周学熙应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的邀约，担任全国棉业督办并兼长芦盐垦局督办。周曾组织棉垦公司以开拓原棉生产，因各处原盐滩业主意见分歧，阻碍甚多，北洋政府又不给予实际支持，结果毫无进展。1920年底，周辞去全国棉业督办和盐垦局督办职务。

为了使产业资本能获得金融资本的挹注，周学熙在清末便重视对天津官银号（1910年改名为直隶省银行）等金融资本的运用。1915年担任财长时，曾提出创办民国实业银行的建议，不久周氏去官，事遂搁置。1919年北洋政府财政部决定开办中国实业银行，以熊希龄任总董，周学熙任总理，总行设在天津。1923年华新卫辉纱厂为筹措资金，发行公司债一百八十万元，即由该行担保。后来由于行内人事矛盾，周辞去中国实业银行总理职务，另创华新银行为所经营的厂矿调剂资金。由于军阀对银行的恣意摊派，使银行不堪苛索，1931年周将华新银行闭歇，另设久安信托公司办理资金调剂，由其子周志俊经理。

以周学熙为首的北洋实业集团的大股东，多为北洋上层人物。以启新洋灰公司的股东而言，可分为以周学熙家族为主的安徽系，和以袁世凯的子弟袁心武、袁凤镛、袁铸厚和亲信王锡彤等组成的河南系，以及后来倒向河南系的实力派李希明系。周学熙有创业的才干和毅力，但工作中也有刚愎自用、独断独行和任人唯亲的情形，这些便成为河南系袁家

兄弟们夺取企业领导权的口实。在1924年的启新股东常会上，周学熙受到河南系和其他不满周氏的大股东们的指责，周因此称病辞去启新洋灰公司的总理职务。为了应付北洋实业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当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对我国民族工业的影响，周于1924年成立了“实业总汇处”，任理事长，以为控制所属各企业的枢纽；但各公司的负责人常自行其是，使周难以统驭。实业总汇处仅存在一年，便改组为实业协会，由周任会长，王锡彤、李士伟任副会长。这个协会也只维持了两年，到1927年初改为实业学会，成了研究性质的学术团体。周也在这一年引退，不再直接过问企业的事务了。

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由于新官僚资本的兴起和扩张，尤其是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东北后，日本财团乘机窜进华北，对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压迫加剧，周氏所经营的实业就日趋衰落。1936年华新津厂以欠债过多周转不灵，被迫售与日商公大纱厂；不久华新唐厂也因欠债二百万元，吸收“东洋纺绩”投资三百万元，成了中日合办厂；同年耀华玻璃公司中的比利时商人所执股份，被日商旭日公司秘密购去，耀华也成了中日合办厂。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青岛沦陷，华新青厂被日本宝来纱厂吞并。周与杨寿楣合资经营的无锡广勤纱厂，则被战火所毁。开滦煤矿于太平洋战事发生后，被日本侵略军接收改为军管。

周学熙兴办实业，开端于直隶工艺总局，发源于启新洋灰公司，发展于滦州煤矿，到华新四个厂建成，则达到事业的鼎盛时期，成为我国华北地区首屈一指的实业集团。周学

熙与南方知名实业家张謇齐名，有南北二“四先生”的赞誉^⑩。但是，在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军阀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沉重压迫，周氏所手创的一些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同样也摆脱不了被摧残和被吞并的命运。他曾为“实业救国”理想遭到破灭而慨叹说：“毕生十事九成空”^⑪。他自引退后，曾捐资在安徽家乡兴学、植树造林和赈济灾荒。他还成立师左堂刻书局，先后编刻丛书五十余种，以备家塾教授子弟之用。晚年则以读经、赋诗和念佛自遣。1947年9月26日，周学熙卒于北平寓所，终年八十二岁。

注：

- ① 周学熙晚年以“卧云居士”作为别号，乃取陆放翁诗“身卧云山万事轻”之意。
- ② 《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第9页。
- ③ 周学熙：《东游日记》跋文。
- ④ 周叔斌：《周止庵先生别传》第4页。
- ⑤ 周学熙：《呈直督陈张明开滦联合顺末表明心迹文》，同④，第30页。
- ⑥ 淳夫：《周学熙与北洋实业》，《天津文史资料选集》第一辑，第18页。
- ⑦ “启新”在新股一百万元招齐之前，曾由天津官银号和淮军银钱所借垫行本，坐本共一百万元，七个月后股款收齐，随即归还了上述借垫款。
- ⑧ 周学熙：《禀直督陈启新洋灰公司扩充总厂添机加股请咨部立案文》，同④，第22页。
- ⑨ 同④，第109—110页。
- ⑩ 杨寿楠是周学熙的儿女亲家，无锡业勤纱厂厂长，有经营纱厂的经验。
- ⑪ 南方实业家张謇在张氏兄弟中行四，周学熙在周家兄弟中亦行四。他俩在清末民初均以兴办实业而知名，故当时有南北二“四先生”之说。
- ⑫ 周学熙：《检阅自叙年谱有感》，同④，第189页。

刘 鸿 生

熊尚厚

刘鸿生，1888年6月14日（清光绪十四年五月初五）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定海。父亲刘克安原是招商局一艘客轮上的总帐房。他七岁时父亲病故，家道中落，母亲想尽一切办法让他继续求学。1901年入上海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办的圣约翰中学，1905年升入圣约翰大学。刘读书用功，头脑聪敏，以优异成绩获得奖学金，在校与宋子良同学。二年级时，校方决定把他培养成牧师，让他去美国留学。刘未应允，即被无理开除学籍。离校后，先在英租界老闸捕房当教员，两年后转到会审公廨做翻译。又半年改入意籍律师穆安素事务所工作。

1909年，刘鸿生经父执周仰山介绍，进了英商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任跑街。当时，开平煤炭在南方销路不佳，他先后在上海及江浙地区的窑业中为开平煤打开了销路。1911年刘升任上海开平矿务局（1912年改称开滦矿务局）买办。他在上海设立开平公司售品处，开设帐房（后称刘鸿记帐房）独家经销开滦煤炭。接着建设开平码头，设置煤炭堆栈，又与义泰兴煤号合作销售开滦煤斤，并组设义泰兴码头公司。未及三年，使长江下游成了开滦煤的重要销售区，备受开滦英商的赏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内工商业得到发展机会，江浙地区煤的需求大增。从1916年起，刘鸿生自租轮船由秦皇岛运销江浙，两三年间赚银一百余万两。为了扩展煤炭的经营，1917年他与义泰兴煤号投资十余万元，接办柳江煤矿；在浦东设义泰兴董家渡煤栈（即北栈）；接着又于南京下关筹建码头，于上海、苏州、南通等地与人伙设煤号，从而在长江下游建立起煤炭供应网点。由于经销有术，到大战结束前后，刘鸿生已成为拥资百万的煤业巨子。随后他被举为旅沪宁波同乡会会长，加入了上海“洋人俱乐部”，闻名于上海工商界。但他感到自己虽然发了财，可“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觉得中国人之所以受气，是因为没有工业，没有科学”。^①于是，决心创办工业，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上海燮昌火柴厂总经理叶世恭是刘鸿生的岳父，因此刘与火柴业早有一定联系。当时市场对火柴的需求甚殷，经考察后认定创办火柴厂投资少，能赚钱。1920年他与杜家坤等集资十二万元，在苏州创办了鸿生火柴厂，自任总经理。该厂开办后，初因竞争激烈连年亏蚀，几濒于危。后经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减轻成本勉力竞争，情况有所好转。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蓬勃高涨，日商猴子牌火柴遭到抵制，瑞典商凤凰牌火柴的销量也骤减，国产火柴夺得了暂时优势。鸿生火柴趁机打开销路，遂转亏为盈。同年他收买了于上年倒闭的上海、苏州两家燮昌火柴厂。1926年鸿生火柴厂增资至五十万元，改组成有限公司。翌年聘留美化学博士林天骥为工程师改进产品，生产安全火柴，年获纯利十余万元。鸿生火柴厂成了江苏第二家火柴大厂。

在创办鸿生火柴厂的同时，刘鸿生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海地区各行业大兴土木，市场上水泥供不应求，1920年9月与朱葆三、李拔可等集资一百二十万元，在龙华筹办华商上海水泥厂。为了掌握生产水泥的知识和经验，他亲自前往欧洲考察学习。1922年自兼水泥厂总经理。次年8月象牌水泥投产，当即碰到外货和北方启新洋灰的竞争，1925年6月与启新达成划分销区、稳定价格和联合对外的协议。1927年8月，他倡议扩大联营，邀请南京中国水泥公司参加，终于在1931年达成协议。上海水泥公司产量连年大增，产品行销江浙地区。由于同业联营和共同提价，获利颇厚。

随着鸿生火柴厂和上海水泥厂开办获利，刘鸿生展开了广泛投资活动。在煤业方面，有元泰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煤业公栈、镇江安丰煤业公司、南京煤公司、中华煤球公司、华东煤矿公司；码头业有中华码头公司；搪瓷业有华丰搪瓷公司；毛纺织业有章华毛绒纺织公司；金融业有中国企业银行、中国煤业银行、华东商业储蓄银行、惠工银团及义兴联记、志裕和五丰等钱庄；保险业有大华保险公司；航运业有崇明轮船公司、舟山轮船公司、宁绍商轮公司；以及英商美灵登公司、华贸外贸公司等等。至1931年投资总额即达七百四十余万元，^②刘鸿生遂由买办起家的商人，转变为知名的民族工业资本家。在这些企业中，章华毛绒纺织公司的投资尤为突出。

章华毛绒纺织公司开办于1930年，资本额八十万元，刘鸿生任总经理。初以生产粗呢为大宗，后以资金不足，经营管理不善，加之上海“一二八”事变停工三月，至1932年

底，计亏蚀达二十五万元，处境十分困难。为了改善经营管理，经考察认为只有更新设备聘用专家，出产高级呢绒方可摆脱困境。于是，他辞去总经理改任董事长，聘请程年彭任总经理。章华在程的主持下改用电力马达，使梳纺间加开夜工，又用现存纱线多制细货及生产纱线驼绒，还改用进口毛纱织造精纺呢绒。从此章华产品质量堪与外货媲美，价格却比外货低廉。上海呢绒商人为迎合一般用户迷信洋货的心理，将章华标头剪去冒充洋货扩大销路。其后，刘又打通孔祥熙、宋子文及朱家骅等人的门路，取得供应蒋军军服用料及邮电部制服用料之权。1933年章华营业突飞猛进，产品行销长江流域，推及华南、华北，虽日夜开工仍供不应求，翌年春在天津添设毛纺分厂。刘鸿生的毛纺织业办得生气勃勃，产品在国内享有盛誉，被称为“毛纺织业的权威”。^③

火柴业方面，在外货倾销和国货贬价的激烈竞争下，刘鸿生发起了一系列的联合行动。1928年联合上海荧昌火柴厂，成立江苏火柴同业联合会；翌年11月进而组成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任主席）；1930年7月以鸿生厂联合中华、荧昌合组大中华火柴公司，加强竞争力量，刘任总经理。“九一八”后，大中华营业获得进展，先后合并了九江裕生火柴厂、杭州光华火柴厂，收买了汉口燮昌（改名炎昌）、芜湖大昌、扬州耀扬和其他一些小厂，并新建东沟梗片厂。大中华公司以统一行动、划一价格等办法抵挡了一阵洋商火柴的倾销，使所属火柴企业得以维持不坠。1933年大中华资本额增至三百六十五万元，年产火柴十五万箱，约占华中地区火柴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产品畅销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刘鸿

生被称为“中国火柴大王”。^④

刘鸿生办企业获得成功，重要原因之一是他经营管理上有一套办法。如重视创办新企业前的调查研究和对市场需求的了解；重视技术和管理人才的任用，以及注重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等；在经营上，各企业实行独立自主、各负盈亏的制度；在资金融通上，则截长补短，作为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⑤的实际运用。1930年他在上海修建了企业大楼，计划设立中国企业经营公司组成托拉斯组织；翌年8月又设顾丽江采办事务所。

在北伐战争前后，刘鸿生一方面同情反帝反军阀斗争，一方面又畏惧工人运动，殷忧共产革命，曾一度幻想美国会协助中国实行关税自主，对蒋介石的南京政权持合作态度，与宋子文、孔祥熙等人日趋接近。1929年工商部长孔祥熙邀他出长招商局，蒋介石亦电孔促刘就任。1932年11月，当财政部长宋子文答应帮助他解决企业资金困难后，刘始就招商局总经理职，他对招商局进行了改革整顿。在此期间，还担任了南京政府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全国财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等职。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到中国，日本侵华加剧，以及国内政治经济等原因，民族工业大都陷入困境。刘氏所属各企业负债达五百六十万元以上，全部资产抵押殆尽。原拟设立中国企业经营公司搞托拉斯的计划也成泡影。刘鸿生为了渡过难关，曾分别向美国花旗银行和宋子文掌握的中国银行乞求借款；又同虞洽卿、荣宗敬等联名呈请南京政府救济实业；并以全国火柴联合会名义呈请

实行火柴统制等，但均无结果。山穷水复，他只好另辟蹊径，从解决火柴同业间倾轧着手。1935年7月与汉口、上海等地九家火柴厂，联合组成“国产火柴制造同业联合办事处”，厚集资力一致对外，接着再以“联办处”同上海美商美光火柴公司等合组华中地区“火柴产销管理委员会”，联夷制夷对付日商；翌年3月与日本在华磷寸同业联合会谈判，迫使其妥协，组成“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总社”，从而维持了国产火柴的销售市场。至1936年下半年起，刘氏所属企业营业遂先后好转。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打响后，刘鸿生积极从事上海前线伤员的救护与物资的募集与调度，热情支援抗战。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时常出现对日妥协求和的暗潮，使他对抗战前途信心不足，在企业的牺牲与苟全的尖锐矛盾面前，曾一度踌躇观望。他曾提出在芜湖创设“自由港”的意见，并寄托外商洋行的庇护以保存自己在上海地区的企业。日本侵略者曾多次威胁利诱，要求刘与之“合作”；并要刘鸿生出任上海伪市商会会长。1938年冬他迫于环境离沪去港，由次子刘念义、三子刘念礼留沪看管企业。到港后，经过调查以及和刘氏企业骨干人员的商议，随后计划在四川筹办火柴和毛纺工厂，在香港和抗战后方创办其他新企业。

1939年4月，刘鸿生投资十四万元与重庆华业合记公司合组华业合记火柴公司，资本额二十五万元，他任董事长。6月在港与中国国货银行合资创办大中国火柴公司，资本港币三十万元，宋子良任董事长，他任总经理，翁文瀾任总工程师，生产氯酸钾、赤磷等火柴原料。9月，他以大中华火

柴公司联合川黔火柴商，投资二百万元，在重庆创办中国火柴原料股份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聘林天骥为总经理，潘履洁为总工程师；在长寿设厂，生产氯酸钾、磷、牛皮胶、脂肪酸等火柴原料。12月，蒋介石电邀他去重庆，并面允由政府赔偿其在沦陷区的财产损失一千多万元，如在内地办厂保证将予以支持。^⑥刘鸿生颇受鼓舞，于是在重庆与宋子良、钱新之、翁文灏等发起组织中国毛纺织公司。翌年在李家沱设厂，资本额四百万元，由宋子良任董事长，刘任总经理。此后他以华业合记公司名义，先后投资贵州火柴公司、洪泰火柴厂、裕丰火柴公司；在昆明创办磷厂；在广西八步创办广西化学工厂；将杭州光华厂迁诸暨再迁龙游，改组设立龙游火柴厂；在四川巴县创办四川水泥公司，并在贵州设第二厂；在乐山投资嘉华水泥厂；与董志卿在重庆合办永安电磁厂；由中国毛纺织公司与富华贸易公司在兰州合办西北洗毛厂；与孔祥熙、杜月笙、胡宗南等创办西北毛纺织公司等等。刘在抗战后方投资总额约达千万元，其中规模最大、生产发展很快的火柴原料公司和毛纺织厂，产品垄断了整个战时后方的市场，年获利甚丰，也引起官僚资本的觊觎之心。

战时，刘鸿生在西南、西北地区创办了大小十余家企业，而周转资金却十分短绌。为了获得长期贷款，他只好向国民党官僚资本求援，被迫接受了孔祥熙提出的苛刻条件：

（一）由刘出任火柴专卖总公司总经理，替重庆政府每年增加几千万元的财政收入；（二）允许官僚资本投资中国火柴原料厂和中国毛纺织厂；（三）两厂改组为特种股份公司，

由宋子良任董事长；（四）两厂各主要部门由孔宋派员监督经营；（五）两厂资产一律按帐面价值计算，不得提价增值。③ 1942年4月，刘任火柴专卖总公司总经理（后改组成火柴烟草专卖事业管理局，仍任局长）；重庆政府财政部、经济部、交通银行及中央信托局等单位，即先后向两厂投资。刘氏所持股份比例逐年下降，抗战胜利前夕仅占五分之一，刘从大老板沦为官僚资本控制下的小伙计。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刘鸿生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执行长兼上海分署署长，11月再任招商局理事长，并为全国船驳调配委员会主任、经济部计划委员会委员、全国工业协会和毛纺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是年秋他在上海创设中国企业物产保险公司，任董事长。翌年春收回了为日伪侵占的全部企业，他亦官亦商左右逢源，企图利用同蒋、宋及美国“盟友”的关系，加以自身拥有的经济力量，恢复和发展原有的企业，并开创新局面。但事与愿违，战后官僚资本的无情掠夺和美货的大量倾销，使他重整旗鼓谋求大发展的幻梦很快破灭；西南地区的企业因受“复员”影响，一直处于减工或停顿状态；上海水泥厂贷款复工后受美货倾销等影响，不久被迫停工，厂房改作仓库；章华毛绒纺织公司因美货充斥市场，销售困难；大中华公司一度虽有发展，但因管制进口，原料供应不足而被迫减产；青岛火柴厂因产销两难而出让；中华码头公司营业一度尚称发达，然在进口和救济物资减少后，业务亦趋衰落。为了维持刘氏各企业的生存，他只好被迫去搞商业投机。当时整个的时局，由于蒋介石挑起内战，国民经济遭到严重摧残，通货恶性膨胀，民

不聊生，民族工业也纷纷破产。1948年8月，蒋介石更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民间黄金、白银和美钞，对蒋管区实行经济大掠夺，他被迫交出黄金八百条，美钞二百三十万元，银元数千元兑成“金圆券”，刘氏企业再次受到沉重打击。这给多年幻想依靠官僚资本来发展自家企业的刘鸿生以很大教训，开始对蒋帮不信任，但对共产党也有戒心，他踌躇彷徨。上海解放前夕他曾决定留在上海不走，5月上旬，他在蒋帮特务逼迫下飞穗，随后潜抵香港。

上海解放后，周恩来总理曾派专人去港阐明政策，劝他和留港的上海工商界人士回沪。同时，刘鸿生又看到党和政府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和生产得到恢复的情形，及其子女由沪去港劝导，乃于1949年11月离港转经天津回沪。途中由津至北京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回到上海又受到陈毅市长的邀请，希望他在上海工商界起带头示范作用。刘氏所属企业在解放后获得恢复发展。他的思想不断进步，一直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他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分会副会长，并当选为全国第一届人大代表、上海市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第一届常务委员。此外，还是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兼上海市副主任委员，以及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分会副主席。

刘鸿生在旧中国艰苦奋斗一生，建立起一个规模可观的民族资本集团，被称为“中国的企业大王”，^③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过一定的贡献，在经营管理企业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实业家。1956年10月1日

因病于上海逝世。

注:

- ① 杨友:《民族资本家刘鸿生自述》,1957年《新华月报》第一号。
- ②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前言”。
- ③ 书报简讯社编:《上海概况》1949年版,第442页。
- ④ 傅华:《火柴大王刘鸿生》,1947年《经济导报》第13期。
- ⑤ 同②下册,第11页。
- ⑥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90页。
- ⑦ 同⑥,第94—95页。
- ⑧ 严得声:《刘鸿生先生事略》,《上海工商》1956年第20期。

盛 丕 华

汪仁泽

盛丕华，浙江宁波人。1882年3月29日（清光绪八年二月十一日）生于浙江镇海骆驼桥。父亲在宁波敦大北号当号客^①，七岁时，父亲去世，家境贫寒，依靠长兄盛丕荣继任父职的低微薪给度日。少年时在家乡私塾就读，后至亲戚费家，陪表兄弟伴读。

盛丕华十四岁时弃学来沪，进老宝成银楼当学徒，后升为助理司帐。在此期间，自修古汉语，泛阅古小说、史书等。戊戌变法时，他已是个十七岁的热血青年，深受改良主义影响，“于是崇拜梁启超，多方谋阅梁之文章，迷信立宪即强国，国家观念油然而生”^②，从此关心国家大事。不久进恒兴钱庄当跑街^③，后又经人介绍，进庆大洋布号为司帐。1908年英帝国主义欲攫取沪杭甬铁路路权，江浙旅沪同乡奋起力争，盛亦参加了这次江浙争路运动。不久浙江旅沪学会成立，盛入会为会员。1910年上海发生在帝国主义庇护下外国投机商人所搞的诈骗案“橡皮风潮”，致使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亦遭倒闭，结欠外商庄票^④银百余万两。清政府上海道蔡某因与此事有牵连，欲以国库款偿付，盛丕华撰文反对，指出商人投机失败欠洋商之款岂能以国库抵付，此例一开后果严重，并加抨击。当天携文往见《时报》馆陈冷，

血，陈深以为然，次日在该报社论地位发表。后虽仍由国库抵付，但盛文引起了当时舆论的广泛共鸣。与此同时，盛还在浙江旅沪学会出刊的杂志上发表改革钱庄的论文，得到宁波等地报刊的响应。此时，盛丕华鉴于上海商会为官僚、买办所盘踞，乃联合方椒伯、洪苓西等人另组商业研究会与之对抗。1910年庆大洋布号改组，盛转至大丰布号任司帐。该号布匹外销朝鲜等地，获利甚丰，年达银二三十万两。旋因日本加强对朝鲜的经济控制，销路受阻，营业日衰，盛曾建议设厂自织棉布，但未被店主采纳。

1911年辛亥革命军兴，在战事影响下，上海叶澄衷与许春荣合伙之余大、阳大、承大、志大四家钱庄倒闭，许氏存款甚多，而叶氏只欠无存，因此许委派盛丕华为清理员。盛在查帐中发现叶澄衷之子叶勉卿积欠该四庄债款达数十万两，叶勉卿恃其已入葡萄牙国籍，受外国领事裁判权之庇护，延不清偿。盛延请律师，首诉于葡驻沪领事败诉，再诉于印度加尔各答葡使馆，最后上诉至葡京里斯本，卒得胜诉，裁决叶勉卿应付清全部债务并加利息。此举影响甚大，是对当时某些借入外籍避债或行不法者的当头棒喝。

1914年，宁绍轮船公司总经理虞洽卿，以六万五千两白银，承购该公司“甬兴轮”后，即以每年三十万银元的高额租费租给外商公司，坐获厚利。股东闻讯大哗，召开股东大会，盛丕华当时为该公司监察人之一，挺身而出。他一面向法院对虞提出诉讼，并申请对该轮执行假扣押；一面致函港务局，制止该轮的过户手续。这时虞虽在沪势力很盛，但对此事却词穷理屈，无力对抗，终于屈服。“甬兴轮”仍由宁

绍公司收回。

1920年，盛丕华与虞洽卿、张澹如、周佩箴、闻兰亭等发起筹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时当选为常务理事，并主管该所会计。在此期间，盛接触了很多商界上层人物，尤其是博得了张澹如（张静江之弟）的信任和重用，而张家是浙江南浔四大富商之一。此后经常由张出资、盛出面经营商业活动，盛也从此进入了资本家的行列，闻名于商界。1927年，盛在交易所经营失利，赴汉口任中国银行分行行长洪菱西的秘书，后又在洪开设的开明公司任委员，经营麻、布、纱、丝等业务。在此期间，并与人合伙，由张澹如出资大半，在武昌开设武埠公司，经营房地产业。

1930年，盛从汉口返沪，仍回证券物品交易所，筹设证券部，由东南信托公司经管，盛任常务董事。与此同时，并兼任中一银行董事。上海总商会改选，盛当选为会董。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大片国土沦亡，富有爱国思想和正义感的盛丕华深感在国民党政府的腐朽统治下是找不到出路的。在此后数年内，盛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谋求救国之途，常常阅读进步书籍，观看进步电影和戏剧等。

1934年，盛丕华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挽救民族危机亦义不容辞，在上海静安别墅组织爱国团体“中社”，出版《新社会》半月刊。后该刊由其长子盛康年主持，并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加强了政治色彩，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出了数期即被国民党政府查封。

此时盛与人合伙组织“上元企业公司”，自任经理，经

营范围甚广。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不久上海沦陷，日商势力侵入，一些华商企业被迫与之合伙贸易。盛鉴于此，遂将上元改称为地产公司，因日商对经营地产不感兴趣，以此避开日人纠缠，坚持其爱国立场。

原设在虹口的新亚饭店，在上海沦陷后，被日寇霸占，职工失业，纷纷要求店主张澹如在租界内另设一店。张就商于盛丕华，乃筹设红棉酒家于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西藏路闹市中心，盛任董事长。1939年开张后，营业甚盛。宁商总会虞洽卿、徐永祚、方椒伯、袁履登等人发起，以盛丕华、包达三、张炯伯为核心的星期聚餐会也就在此时开始。起初主要是交谈生意经，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有些人如袁履登、闻兰亭等担任了伪职，逐渐退出；而另有些爱国民主人士如胡厥文、黄炎培、杨卫玉、胡子婴、陈维稷、俞寰澄、陈已生、盛康年等陆续参加。这样，聚餐会上谈话的内容逐渐发生了变化，成为议论时局的集会，使盛的思想更趋向进步。在抗战后期，盛和爱国人士曾资助爱国青年、学生分赴内地和苏北抗日根据地。

抗战胜利后，盛参加了“民主建国会”，并将红棉酒家三楼改为“红楼”，专供民主人士开会活动之用，常请有影响的人士如宦乡、孙晓村、马叙伦等人前来演讲，并曾招待从狱中获释的爱国民主人士。1946年9月2日，冯玉祥受蒋介石排挤，出国考察。出发当天，民主人士在红棉酒家开欢送会，由郭沫若主持，参加者二十余人，会上郭、冯作诗唱和。郭在会上说：“我到这里才真正嗅到民主的空气。”^⑥此时的红棉酒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工商界人士参加民主

运动的重要阵地。盛丕华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更趋明朗，积极参加民主运动。他常要盛康年收听延安新华社的广播。当时美国电影充斥沪上，盛丕华设法与苏联有关方面联系，在他合伙组织的五德公司管理下的大上海电影院，放映了《青春的旋律》等三部苏联影片，轰动一时，反应甚为热烈。

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抗议。6月23日，上海工人、学生和各界人民十万余人，举行反内战游行示威，并由五十三个人民团体委托推举代表十人，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作和平请愿。盛丕华为代表之一。当推代表时，盛感到工商界阵容不够坚强，认为黄延芳对各方面都较熟悉，当代表较为合适，即亲自去劝驾，黄允参加为请愿代表。当代表团到达南京后，即被冲散分为两处：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陈震中等被包围在候车室，盛和吴耀宗、胡子婴、包达三、张炯伯等人被拥至西餐室。特务与胡实声（随团同行的盛的秘书）交涉，要代表团当夜乘11时半的火车回沪，代表团不允，待这班火车开走后，特务就动手殴打候车室里的代表，使多人受伤，宪兵、警察视若无睹。这就是国民党政府镇压和平民主运动罪行之一的“下关事件”。直到半夜2时许特务散去后，大批宪兵才开到，把代表团用卡车先送警备司令部，要未受伤的代表下车，遭拒绝后，方送往中央医院。中央医院只有三张空床位，其他人只能睡在地上。不久中共方面周恩来、邓颖超、滕代远等带了食品来慰问。次晨未住院的代表在兴华旅馆讨论对策，有人提出采

用法律起诉，盛认为“这样会被动，将来被告不审审原告，弄得经年累月，没完没了。代表们来京是为了和平请愿，不计较被打的事”^⑥。包达三等表示支持，受伤代表也都表示同意。次日到国民参政会去请愿要求和平。这时为国民党当局控制的上海“总商会”、“总工会”来电说代表团是假冒的，代表团当即把五十三个团体委托书出示。国民党当局原认为代表团会提出被打的事，但代表团不予计较而是请愿要求和平，使国民党在舆论面前更为被动^⑦。

“下关事件”发生次日，上海各报刊出消息，盛丕华的家属金日英、盛康年赶赴南京，在医院里遇到前来慰问的邓颖超，邓对盛的家属赞许说：“丕老等他们不是愁吃愁穿，有汽车、住洋房，冒了生命危险搞工作，真是勿简单的。”^⑧在代表团回沪前夕，周恩来在梅园新村设宴招待全体代表团成员，饭后周详细分析了当时形势，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揭示新中国的光明前途，指明民主人士前进的方向，给予代表团以很大的鼓舞。通过下关事件，盛看清了谁要和平、谁要战争，也更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正确。因此他的爱国民主立场更加坚定，进一步靠拢中国共产党。在南京逗留期间，1946年6月25日盛曾会见冯玉祥，冯赠以“重科学思想，求民主精神”的亲笔对联一付，相互勉励^⑨。盛回沪后，团结工商界人士积极支持和参加日益高涨的反蒋民主运动。

1948年10月，盛丕华和盛康年赴台湾，佯称去筹设红棉分店，打算转道香港去解放区。11月盛康年先去香港，转来中共意见：等到时机适当去解放后的天津^⑩。盛遂从台回

沪。1949年初，平津先后解放，1月23日，盛丕华离沪去香港^①。3月23日，盛与黄炎培、俞寰澄及盛康年等由港同船到达天津，受到中国共产党代表的热情欢迎。25日乘专车到北平，当天下午参加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检阅解放军的仪式。晚上参加了中共中央为庆祝北平和平解放的宴会后，毛泽东主席又设专席宴请盛丕华等人，并由周恩来报告了国共和谈经过^②。4月15日晚，毛泽东主席又约盛及包达三、张炯伯等工商界人士谈话，盛陈述了关于经济方面的意见，毛主席甚以为然^③。在京期间，盛除参加人民政协的筹备工作外，又与黄炎培、陈叔通诸人筹划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全国组织的建立和整顿工作，并对解放军南下的准备工作提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如进入上海后的经济措施、部队的住宿问题等，为中国共产党所重视和采纳。6月19日，中共中央设宴欢送七十余位民主人士南下。盛到达上海后，向上海工商界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方针、政策，解除了他们的各种顾虑，并筹建上海市的工商业联合会。9月盛丕华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是这次大会主席团的成员之一。10月1日，参加了开国盛典，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余能躬与其盛，是我一生最为愉快的一日。印象极深，不会忘怀。”^④

新中国成立后，盛丕华在上海积极联系和组织工商界人士开展劳军和认购爱国公债等工作。以后他历任上海市副市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主任委员、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等职。在各项工作中不辞辛劳，贡献了自己的才能。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高潮中，他代表全市工商业者，向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递送了全市各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书。

1961年2月8日，盛丕华因患胃癌不治去世，终年七十九岁。

注：

- ① 当时南北杂货字号雇佣的对外全权办货人员。
- ② 盛丕华：《过去五十九年之回忆》。
- ③ 钱庄对外联系业务的外勤人员。
- ④ 钱庄开出的期票，记明金额及支付日期，到期凭票兑现。
- ⑤ 邹兆铭、邢芹生、盛厚甫、刘百年、郑安甫、冯伯准等同志回忆记录。
- ⑥⑦ 《关于1946年6月23日下关事件》座谈会盛丕华发言记录，并经本人审阅后修改。上海市工商联史料档案编号31—130。
- ⑧⑩ 1980年盛丕华家属金日英女士采访记录。
- ⑨ 这副对联现存金日英同志处。
- ⑪ 1985年10月访问金日英女士谈话记录，参见金日英：《难忘的日日夜夜》，《新民晚报》1984年5月24日第五版。
- ⑫ 盛丕华日记：1949年3月23—25日。
- ⑬ 盛丕华日记：1949年4月15日。
- ⑭ 盛丕华日记：1949年10月1日。

武 百 祥

辛培林

武百祥，又名作善，1879年2月4日（清光绪五年正月十四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何新庄。其父武士信，业农，自耕为生。武百祥九岁入本庄私塾读书。

1892年7月，武百祥随其舅父何善荣到长春，经推荐入万发号杂货铺学徒，次年改到万发德粮铺，三年后由学徒升管帐。1900年，沙俄侵略军进犯我国东北，武百祥返回家乡避难，当了四个月“货郎”。次年，时局平定后，他又回到长春。1902年，他随人到哈尔滨寻友“开关”（即开赌场），但无结果。于是，又别谋生计。1903年，武百祥同友人合资小洋二千五百元，创办了“同记”杂货店。翌年，日俄战争爆发，东北与关内交通中断，关内货物不能运到东北，哈尔滨成了东北三省商业货源的主要商埠。这时，武百祥向外国钟表行招揽生意，从中获利。1906年，因内部不和散伙，“同记”闭歇。

1907年初，武百祥来往于哈尔滨、长春之间，用“羌帖”^①倒换现大洋，从中牟利。后因不慎，钱款全部被盗。他受此打击后，无意经商，沉溺于吃喝玩赌之中。几个月后，在亲友的规劝下，他又重新开业，商号仍用“同记”。当时，英式鼠绒皮帽在哈尔滨畅销，武百祥见有利可图，便

买了一台手摇缝纫机，自己仿制了二百多顶出售，赚钱三百多元。1908年初，他同赵悼唐、王熙瑞合资四千元，共同经营“同记”。此后，武百祥工商兼营，使“同记”得到了迅速发展。他继续扩大英式皮帽生产，办起了“同记工厂”，“同记”的牌匾也添上了“帽店”字样。这样，哈尔滨英式皮帽的生产几乎为“同记”所独占，并遍销东北三省及海参崴等地。1914年，武百祥又在哈尔滨设立了服装工厂，在齐齐哈尔创办了“同记”分店。1917年，他在松花江北置地三百多垧，办起了猪繁殖场。1920年，他乘“羌帖”停用，哈尔滨金融市场混乱之机，开设了“同记钱庄”。翌年10月，将道外头道街的小楼改建成四层大楼，雇用店员一百多名，开设了“大罗新百货店”。这一年，“同记”工商两方面共盈利现大洋三十余万元，资本增到十六万元。

1922年，“同记”遭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次经济危机的冲击。工厂又不慎失火，楼房、机器、货场大部分烧毁。在外部索债，内部涣散的困境下，武百祥收缩营业范围，减少开支，渡过难关。此后，他大力经营，使其经商活动进入了“黄金时代”。1927年，他用八十九天时间建成了“同记商场”；盘进了“益丰源”百货店后，开设“大同”百货店。这样，在哈尔滨的商业中心地区，武百祥的“同记商场”、“大罗新”和“大同”百货店三足鼎立，经营商品达二十三类，三千余种；当时仅有二十五万人口的哈尔滨，到“同记商场”、“大罗新”和“大同”的顾客，年达六百万人次以上；这里也是外埠商人到哈尔滨采购货物的唯一去处。从而，武百祥垄断了哈尔滨的百货市场。在此期间，他雇用固

定工人一千三百人，临时工三四百人，店员七八百人，年终获利达上海规银^②三十二万六千五百两。然而，好景不长。1929年，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接踵而至，“同记”因有七十余万元的“金票”^③债务，又陷入了绝境。武百祥束手无策，拟将“同记”关闭。哈尔滨市政当局担心这将会给哈尔滨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便召开了“同记债权大会”，决定将其债务一律展期三年偿还，方使它勉强维持下来。

伪满洲国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陆续实行了棉花、皮毛、皮革、粮谷等物资的统制法和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发行了名目繁多的公债，制定了“七二五”停价令等措施，残酷扼杀和疯狂掠夺中国民族工商业，使“同记”每况愈下。1942年，同记工厂倒闭。1944年，同记商场歇业，大罗新百货店也处于销售残存商品的不死不活、奄奄一息的状态。

1946年4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进入哈尔滨，民族工商业得以复苏。武百祥相继开办了制毛、皮革、制染、针织等工厂和“百善牧场”。“同记商场”死而复生，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50年盈利近四十亿元^④。1955年末，他出席全国工商联执委扩大会议，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采取的赎买政策。他积极申请公私合营，在哈尔滨工商界中起了带头作用。1955年12月2日，正式宣布同记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实行公私合营，武百祥被安排为哈尔滨市百货公司经理。

武百祥由一名学徒成为拥资百万的资本家，“同记”由一个小杂货铺发展为雄踞东北的大工商企业，重要原因是他经

商“与众不同”，能够坚持“仿洋”、“革新”，较早地实行一套资本主义的经营方针、管理方法和营业手段。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能在中国商业场中首先革新，不畏人言，不怕失败，处处采取新法，以作商业界的先导”^⑤。

1911年10月，他赴天津办货，亲自到外国租借地学习外商经营方式。1920年，他又到天津、南京、上海和日本的大阪、横滨、东京、横须贺等地参观工商业发展情况。他还派员随莫德惠组织的欧洲参观团到苏联、波兰、法国、英国、德国、瑞士参观学习。同记商场、大罗新百货店不仅门面的修饰是“洋门脸”，而且内室的布置、商品的陈列和点缀，也都务求与外国洋行相仿。在哈尔滨的中国商界中，他首先采用资本主义国家商店的明码标价、使用包装纸等售货方法。他还利用美国花旗、英国汇丰、日本正隆和苏联远东等银行的资金，扩大经营；为日商、俄商代理批发和零售，甚至在日本设立驻庄，采购货物，从日本和欧洲进货率曾高达百分之五十四以上。武百祥以“洋”取胜，招徕了大量中外顾客，生意兴隆，竞争者望尘莫及。

他制定了“利公司、利劳资、利顾客、利同业”的经营方针。他对进货价款的偿付，打破了旧商号通行的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三节清帐的常规，首创了随时支付的办法，这既“利公司”，又“利同业”，博得到了好评，赢得了信誉。1925年，他仿照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公司制办法，将旧的“份子制”改为“薪金分红制”，即盈余按“东六西四”的比例进行分红。这个改革驱使职员、店员热心经营。后来，武百祥看到“各国劳资间的冲突，日甚一日，……欲想防止这种

冲突，其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先使劳动与资本间的利益均等”。^⑥于是，他将“同记”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把一百三十九名职员变为股东，使他们尽己所能，改变经营消沉的局面。

在管理上，武百祥以“良规善法”为准绳，多次修订铺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他对职员管理尤为严格，不仅使他们守规尽职，各司其事，还要求他们身为表率，弃绝嗜好，禁止吃喝嫖赌，倘有违犯，轻者记过，重者开除。他对店员的选择和训练，也与其他商号迥然不同，规定店员要有高小文化程度，录用时要经过训练和考试。为此，他曾在哈尔滨和河北省乐亭县设立培养新店员的学校，由他和“同记”的经理、各部主任亲自授课。他还给店员比较优厚的福利待遇，使工人和店员更加依附于“同记”。

武百祥的另一个重要的经营手段是在营业宣传上利用报纸、广播进行广告宣传，派人到各地张贴标语、图画，甚至雇用百余辆人力车，敲锣打鼓，贱卖商品，形式新颖、灵活多样。他的经营方针、管理方法和营业手段，为哈尔滨“多数商店效法步趋”，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武百祥信奉基督教。1914年2月，他在哈尔滨入丹麦牧师马继良办的基督教夜校学习英文、俄文和圣经。1915年10月4日，正式领洗入教，并在“基督教信义会”中任司库执事。1924年，他成立了“教友生产合作社”，1927年，成立了“职工青年会”，下设多种传道机构，向工人、店员灌输“仁慈”、“博爱”思想，他主张不用外国牧师，退出了“基督教信义会”，成立了“自立、自养、自传”的哈尔滨西门脸“中

华基督教会”，任执事长和牧师。“九一八”事变后，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满，终日在圣经院教授音乐和识字班。1936年，他入圣经院增设的神学院读书，1940年毕业后继续在圣经院任教。

1946年哈尔滨解放后，武百祥先后担任哈尔滨工商联合会副主任、社会事业协会理事长、政协副主席、民主建国会副主任、人民代表、人民政府委员及全国工商联合会执行委员、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等职。1957年，因提出定息十八年的主张，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1959年，摘掉其右派分子帽子。“文化大革命”发生后，遭到“四人帮”一伙的迫害，于1966年9月6日去世。1979年3月9日，中共哈尔滨市委为他平反，恢复了名誉。

注

- ① “羌帖”即清末、民初东北各地对流通于中东铁路沿线的帝俄纸币的俗称。
- ② “上海规银”即规元，是1933年前上海通行的一种记帐货币，只作记帐用，并无实银。
- ③ 1929年前，日本实行金本位制，当时对日本在东北各地发行和流通的日本纸币，统称为“金票”。
- ④ 指当时的东北流通券。
- ⑤ 武百祥：《大罗新商店政策》第12页，哈尔滨市档案馆藏。
- ⑥ 同⑤，第16页。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中共哈尔滨市委统战部档案：《武百祥卷宗》。
- ② 哈尔滨市整理私人工商业历史资料委员会编：《同记商场五十年概观》。

孙大有

马国晏 刘 攀

孙大有，字秀三，河北省乐亭县人，1882年12月29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生。父孙显文，虽在原籍有些田产，又兼赴东北经商，但并不富裕。孙大有幼年读书很少，十三岁便远离故土前往东北，到长春“益发合”大车店“住地方”^①。

长春“益发合”是河北乐亭县汀流河刘石格庄大财主刘梦道，以四万八千吊资本于1892年投资开设的，最初仅是一个大车店。当时粮豆是东北贸易之大宗，套挂骡马的运货大车是东北最主要的运输工具。长春地处东三省南北交通要冲，每日数千辆载运粮豆或其他货物的大车在这里聚集，进行交易，因而车店生意十分兴隆。“益发合”大车店通过招待货车，服务食宿吸引客商，或代客购销，从买卖成交中提取佣金。每到秋后，也囤积粮豆，从倒把中赢获厚利。为了适应营业发展的需要，“益发合”车店附设了油坊、碾磨坊、粉坊和豆腐坊等手工作坊，还开设了粮米铺，零售油酒米面和其他杂货。孙大有人“益发合”时，该号正处于稳步发展时期。

孙大有刚到“益发合”时虽然年轻，但聪颖勤奋、任劳任怨，故深得掌柜们的重视，“吃劳金”^②仅数年便升为“小

掌柜”，成了“益发合”车店里出类拔萃的买卖人。

清末东北金融混乱，币制庞杂，多种银、钱、钞票同时流通。为适应商品流通，便于兑换货币，钱庄在长春迅速增加，大商号多自办钱庄。1904年，“益发合”大车店在本城西三道街开设了“益发钱庄”。翌年，二十三岁的孙大有被擢升为钱庄经理。

孙大有经营“益发钱庄”后，深知钱庄要发展，关键是筹措较充裕的流动资金，增强购买和蓄积各种钱钞的能力。1907年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有密切关系的长春“同和盛”银号倒闭，孙大有迅即聘用该银号精通业务的佟锡侯等三人，通过他们与正金银行搭上关系，取得贷款。同时，孙大有积极改进内部业务，增设新的营业项目，扩大活动范围：第一，向交通银行学习办理汇兑业务，“益发钱庄”不仅获得了较多的汇水（汇款手续费），而且提高了存款额，扩充了流动资金。例如，1914年仅乐亭一地待取的汇款，有时就达一百多万元。第二，增加买卖和兑换金票、钞票、卢布和大小洋的业务，从中获利。第三，于1909年自设银炉，铸造“吉林大翅”^③，并自出一至五吊的凭帖。第四，1913年以十万元（小洋）为资本，稟请“在黑河开设金炉，收买沙金，铸造宝条”^④，运赴上海出售，由于色纯量足，信誉甚佳。在机构设置上，在上海、乐亭、天津、营口、哈尔滨等地增设了分支机构，办理汇兑业务。这样，“益发钱庄”由以兑换为主，逐步转为以汇兑和买卖钱钞为主，并在“益发合”内进行单独核算独立经营。

由于孙大有经营有方，“益发钱庄”成为“益发合”各柜

中最主要的获利单位。1912年至1917年，“益发合”共盈利二百零二万元，其中绝大部分为钱庄盈利，大车店的生意则因中东铁路通车后货运量锐减而常常亏损。1916年秋，“益发合”的总经理韩杏林拟从钱庄提取一笔巨款，作车店买卖粮食的流通资金；孙大有及钱庄众掌柜对此举颇不以为然，次年元宵节，他和钱庄掌柜们提出总辞职。韩见形势不妙，便自请退约。此时财东刘家亦已看出韩杏林和一帮老掌柜们不谙商情变化，无所作为；而孙大有和一伙后起的掌柜们年富力强、有识有为，于是同意韩杏林退约，从而迫使身股高、年岁大的三十余名老掌柜纷纷辞职。店东将孙大有等人的身股增加一倍，委任孙大有为“益发合”总经理。此事在当时长春商界影响很大，人们称之为“孙秀三闹革命”。

孙大有就任“益发合”总经理后，他以钱庄为“益发合”的总柜，在原有分柜、分庄的基础上，积极改革内部业务，不断扩大经营范围，新创办了榨油、制粉等工厂。同时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加强社会联系，使“益发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孙大有主持下，“益发合”的金融业务扩展较快，经营方法更加灵活。他大力经营金银和各种钱钞，随时用电话掌握各地兑换比价，在此地低价购入，在彼地高价抛售。1919年为日商三井、三菱洋行代收金票，即获利数十万元。“益发钱庄”除自身发展外，又于同年和交通银行合作，各出资十万银元，在长春开设“益通商业银行”。同时，“益发合”还大量经销粮豆，赚取厚利。由于经营金钞和粮豆等倒把买

卖，使企业经常冒着巨大的风险，孙大有切身感到办企业“虚的不行，要办实的”。鉴于长春一带盛产粮豆，生产豆油、豆饼和面粉，不仅加工简便，而且销路畅旺，于是积极筹建榨油厂、面粉厂等近代工业，这是“益发合”前进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1921年油厂建成投产，安装有四十台水压式压榨机，日产豆油二万斤，豆饼三千六百块，每日需用原料大豆二十万斤；是当时长春最先进的机械动力榨油厂。1924年以四十余万元买下日商“中华面粉公司”的制粉厂，日产面粉四千袋，每日需用小麦一百二十吨，是当时长春设备最先进、产量最大的面粉厂。为了加强面粉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益发合”不惜高薪聘请外籍技师指导生产；在选购原料，精心加工，严格检查产品质量上下功夫。同时还开设了一个织布厂，自制面袋，为生产面粉服务配套。经过一番努力，“益发合”生产的“龙马牌”面粉曾在大连博览会上被评为一等品。1928年又租用哈尔滨“永盛公司”火磨（机器面粉厂），是为“益发合”的面粉二厂。次年与长春“裕昌源”合买“裕滨”火磨，建面粉三厂。这样，“益发合”面粉的年产量遽增至五百四十万袋，在当地位居第一，产品畅销于南满、吉长铁路沿线各地。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榨下，为使“益发合”能够生存发展，孙大有注意联络结交地方官绅，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当时的吉长道尹蔡运升、曾任奉天军政两署秘书长的袁金铠、滨江镇守使丁超、依兰镇守使李杜等人，或为“益发合”的座上客，或与孙大有时有来往。孙看到负责经销吉黑两省食盐的吉黑樵运局进出款项数额颇大，便与局长董某拉

关系，为该局代收盐款，从而得到近百万元的存款充作流动资金。同时，由于他在长春商界积极活动，1917年被选充长春商会常务董事，1922年又当上了长春总商会的副会长，1924年至1931年“九一八”前，一直担任长春总商会会长。

1925年前后，由于军阀混战，滥发纸币，致使奉票币值不稳。当时，不少钱庄大量倒卖奉票牟利，“益发钱庄”内部也有人主张多做奉票买卖。孙大有虑及这样做可能给“益发合”招致祸患，便坚决禁止买卖奉票，并布置向沈阳、大连等地大量销售“龙马”面粉，使“益发合”的商誉为世人所皆知。其后，奉票贬值，市场动荡，民怨大起。为了转嫁责任，奉系首领张作霖竟将倒卖奉票的钱号“天合盛”沈、长、哈等三柜的执事人逮捕，并于1926年8月19日将冯浚川等五人枪毙。据说，“益发合”也曾被列入查办的名单之列。幸有与孙大有早有结交的臧式毅出面力保，声称益发合素营实业，并不倒把，遂得使该号化险为夷。对此，“益发合”内外无不赞佩孙秀三掌柜有先见之明。

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益发合”已经是商业、工业和金融资本的集合体，各业相互补充，彼此促进，具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1920年至1931年，盈利约计八百万元。除长春总号（包括油厂、面粉厂及其附设的织布厂）外，在关内外二十四个地方设分支机构二十七处，全部从业人员达两千余人。

“九一八”事变后，孙大有避居大连，在大连设立“总管理处”，仍负对“益发合”经营管理的全责。为了扩大粮

豆外销，1932年在大连“益发合粮栈”设出口部，直接向欧洲、南洋各地出口大豆、豆油、豆饼等。后因无力与洋商竞争，加上日伪进一步控制，被迫于1939年歇业。1932年“益发合”还在长春西四马路口开设“泰发合”百货商场，这是当时中国人在长春开办的营业面积最大、条件最好的百货商场。为了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加强管理，1936年孙大有提出改进组织领导形式，成立股份公司。是年7月，在大连召开筹备会，决定成立“益发合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设于长春，孙大有任代表董事，领导董事会。公司成立后，“益发合”由原财东刘家独资变成合资；由孙大有一人执掌全局，改为代表董事依董事会决议行事；将三年结帐一次，改为一年一决算，采用簿记帐，每年提出《业务报告书》。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伪为了加强对东北的经济掠夺，施行全面的经济统制，“益发合”和众多的民族工商业一样，原材料和商品几乎断绝了来源，生产和销售受到严格限制，因而日渐衰败下去。处此逆境，孙大有仍然尽心竭力进行经营，终使这一民族工商企业得以保存下来。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孙大有抑郁愤懑，不久即辞去连任七年的长春商会会长职务，指派“益发合”一名副经理出任副会长以事应付。翌年，他干脆以养病为名从长春出走，摆脱伪满“首都”——“新京特别市”的社会活动。日伪当局曾加给孙大有“新京特别市自治委员会委员”、“满洲制粉组合理事”、“新京地区直辖油房组合副组合长”等伪头衔，但孙大有从未参与其事。在日伪残酷统治下，他对日伪不予合作态度只能是有限的，但

作为一个商人，孙大有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是可贵的。

“益发合”是个拥有数千职工的大企业，孙大有担任这样一个大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在用人、操守等方面也有值得称道之处。“益发合”的一些业务骨干，大都是他亲手栽培提拔起来的。他们或老成持重恪守职责，或精明干练勇于创业，对一个私营企业来说，也可谓人才济济。孙大有执掌柜务，号令统一，不别亲疏。他的女婿高某在“益发合”任事，派驻海龙，1929年春节前夕，因业务需要，总柜通令各地驻在人员不得回长春度岁，而高某竟擅返沈阳家中过年，当时虽经东家为高求情，孙仍执意责令其“出号”^⑤。孙体恤下情，善笼络人心。一次，经理室内存有蜜桔，一小伙计趁室内无人，登高取食，恰逢孙大有入内，小伙计惊惧失措，孙却毫不介意和悦地说：“取下来，我要吃。”小伙计转恐为安，感激不尽。在企业内他虽权重位高，但廉洁公正，为同人所悦服。他精于计算，一般加减乘除均用心算，很少借助算盘等工具，俗称擅长“袖里吞金”。

孙大有长期担任“益发合”总经理，资深功高，个人身股也较高。后来将身股折算成钱股，遂成为除刘家一门八支外的较大股东。他在其他私人企业中，亦有少许股份。

1945年2月2日，孙大有病逝于大连。

注：

① 当时到私营店就业，俗称“住地方”。

② 按当时习惯，青年到私营商铺就业，最初二三年学买卖，近于“练习生”，称“年轻的”，之后，独立承担业务，称“吃劳金”。

- ③ 吉林地方铸造和流通的宝银，每锭重为五十三点五两，因形似元宝，两边有翅而得名。
- ④ 《关于“益发合”请于黑河地方开设金炉》，黑龙江省档案馆藏。
- ⑤ 从旧企业中退职、开除，俗称“出号”。

附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是1962年长春市民建、工商联编写的《长春益发合史料初稿》，在撰写过程中，吉林省工商联副主委万玉英（原“益发合”财东刘次玄的夫人），原财东刘益旺、文书经办人王赫然等曾积极提供资料，稿成后，又经孙大有的后人孙广礼先生订正，在此一并致谢。

王 荆 山

马国晏 刘 轲

王荆山，又名王琳，吉林长春县人。1876年1月11日（清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五日）生。其父王永祯，从原籍山东逃荒至东北，佃租田地耕种，勉强度日。王荆山幼年家境贫寒，十三岁入私塾读书两年，十五岁偕弟王奂清随同叔父去黑龙江瑷珲（今爱辉），在“和顺成”银匠铺学手艺五年。由于银匠业日趋衰落，生计艰窘，王荆山二十一岁北渡黑龙江赴俄境，初拟以挖金为业，因体力不强，又无同伙，便改做小商贩，靠肩挑背扛贩卖花生、榛子等食品为生。翌年6月，乘船行千余里，至当时中国人俗称“黄河口”地方，继续作小商贩，略有盈余。迨至1900年沙俄强行驱逐黑龙江以北中国居民，王荆山被迫渡江南返，是年底回到长春。

这时，长春已遭俄军侵占。王荆山利用粗通俄语之便，出入于俄军兵营，为俄军采办粮秣赚取佣金。1902年秋，他结识铁路工程师塞尔维亚人苏伯金。其时苏伯金在长春修建火磨，王荆山受雇“跑外”，为该火磨采办建筑材料和生产原料。二年后，日俄两国在东北交战，俄军节节败退，苏伯金惧怕日军进占长春，便将火磨委托给王荆山经管，只身往哈尔滨暂避。次年苏伯金返长，见火磨完好无损，于是对王荆山颇为信赖，并将所产面粉全部交王包销，作为酬答。此时

王荆山已稍有积蓄，便约同刘向阳、刘麟阁，集“羌帖”^①九千，王自出三千，开设裕昌源粮米铺，主要经销苏伯金火磨所产面粉，兼加工高粱米、榨制豆油等。^②王荆山为洋商当掮客，又自开铺面，从此发迹。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首先在塞尔维亚点燃，苏伯金仓猝返国，将火磨以四万九千卢布的低价出兑给王荆山。王获此意外之财，如虎添翼，遂于该年9月12日开办“裕昌源”火磨。此时欧战正酣，国际市场上面粉及其他粮食供不应求，价格上涨，“裕昌源”赢利甚厚。

为取得进一步发展，1915年春由英商伊达洋行经手，王荆山以四千五百余卢布，在长春头道沟“铁路附属地”内购地七千坪，^③作为新厂址。王用三年多时间，修建厂房、整治道路、添置机器，至1917年冬，“裕昌源”火磨在新址建成投产。该厂雇佣工人六十名，日产面粉一千五百包，一昼夜可加工小麦近四十五吨。^④该厂设备比较先进，场地宽敞，并建有联结铁路的专用线，这些对“裕昌源”的日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事过三十余年，讲述到“裕昌源”这一变化时，王荆山仍掩饰不住当时踌躇满志的心情，说：“裕昌源之事业为之划一新纪元。”^⑤

“裕昌源”迁入新址后，除加工面粉，每年还收购数百以至上千（火）车皮的大豆和其他粮食，或囤积起来待价而沽，或径直发往大连外销出口，其中仅运往日本的大豆每年就近万吨。为了运销粮食大豆，王荆山在大连开设了“裕昌源”分号。1919年王在吉林市以十九万元收买“恒茂”火磨，改称“裕昌源吉林火磨”，一昼夜加工小麦二十一吨。^⑥

1926年又在哈尔滨收买了一处正在修建中的火磨，一年半后竣工投产，是为“裕昌源”的哈尔滨分号。此外，“裕昌源”在长春还增设碾米厂和烧锅，并经营房产；在黑龙江安达县开设“裕达”火磨。

随着资本积累的迅速增长，王荆山不再满足单独经营粮食加工企业，开始向金融和其他产业投资。1921年趁长春“益通商业银行”发生亏损之际，“裕昌源”加入三分之一股本（该行额定资本一百万元，实收二十五万元），王从而取得了董事长的职位。1941年王荆山又以其子出面，投资开办“大明陶瓷厂”。

多年的苦心经营使王荆山聚集了不少财富，并且随着财富的增加得以跻身上层，成了当地的头面人物。1922年长春地方当局为城市建设和整顿市容，成立市政筹备会，王荆山被聘为筹备委员。其后，王担任长春头道沟商务会会长。王还举办社会公益和教育事业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如创办私立自强学校，修建校舍和学校经费均由他负担，又创办“荆山幼稚园”等。

为了取得铁路运输和资金融通的方便，王荆山积极与长春的日本经济界拉关系。早在1912年王就因在当地商界比较活跃，被长春满铁事务所看中，物色为商业参观团成员，赴日本参观访问。1921年至1931年王兼任“长春信托会社”社长，该社直属于日本关东厅，每年从东北收购大量大豆出口。

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后，在长春实业界中，王荆山被物色为接受其侵略政策的应声虫。在残酷

的殖民统治和严密的经济控制之下，王荆山企图通过投靠日本侵略者来保全和发展自己。1941年在伪满经济部授意之下，王荆山将日本“锤渊纺织公司”所属“义大”火磨合并于“裕昌源”，并聘请日本人为常务理事。同时，王向日本“泰东烟草”、“军援产业”、“满映”等企业投资。王荆山还积极靠拢日伪，与汉奸臧式毅、阮振铎、丁鉴修等人交往甚密，“裕昌源”中并有这伙人的股份。王荆山曾以“民众”代表的身份，参与了对伪满傀儡溥仪乘长春的“迎銮”丑剧。国联李顿调查团到东北，王在日寇指使下，参加了“请愿团”，该团假借民众的名义，颂扬日寇的侵略暴行是“拯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1934年，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划下，王荆山被选充“新京头道沟商工会会长”，1937年该会与市内商工会合并，成立“新京特别市商工公会”，王又充任副会长。当南美萨尔瓦多宣布承认伪“满洲国”后，曾委托日伪为其选派驻伪满的“名誉领事”。王荆山遂于1940年担任了虚有其名的“萨尔瓦多驻满洲国名誉领事”。日寇为了利用王荆山为其侵略活动服务，给王多种头衔，诸如新京特别市咨议，日满实业协会常务理事、中央禁烟促进会委员，满洲军援产业株式会社社长、银行协会会长、新京防范协会会长等十几个伪职衔。1942年在伪“满洲国”“七二五”物价停止令施行一周年之际，王荆山在报刊上发表讲话，拥护“七二五”停止令的无限期延长，重弹“日满一体，共同防共”的反动澜言。1943年在伪“新京市公署”的策动下，王荆山带头发起“五大城市捐纳飞机”的活动，为日寇的侵略战争效劳。

“八一五”光复后，王荆山曾被苏联红军拘留，获释

后避居哈尔滨，后闲住长春。在“镇反”运动中，王荆山于1951年4月26日被逮捕，以汉奸叛国罪判处死刑，1952年3月19日在长春伏法。

注：

- ① 从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部分地区流通的俄币，俗称“羌洋”、“羌帖”，此时多指银卢布，一卢布含银九钱，其市价高于银洋，而银洋一圆仅含银约七钱二分。
- ②⑤ “王荆山档案卷”，长春市公安局藏。
- ③ 坪，日本计算地积的单位，约合3.3平方米。
- ④ 参见《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第216页；又日本工业化学会满洲支部编：《东三省物产资源与化学工业》（上），第203页。
- ⑥ 《东三省物产资源与化学工业》（上），第203页。

朱 葆 三

陆志濂

朱葆三，名佩珍，字葆三，以字行，浙江定海县人^①，生于1848年3月11日（清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七）。其父朱祥麟曾任清绿营平湖县乍浦“都司”和定海县“游击”^②，1851年将家眷迁到定海县城居住，1859年移居定海东乡北蝉村^③。1861年，朱葆三的父亲患病，家境顿趋困难，母亲方氏托人把年仅十四岁的朱葆三带往上海学艺谋生。

起初，朱葆三在上海一家协记吃食五金店当学徒。该店经售罐头食品兼营小五金，生意规模不大。朱葆三白天在店里辛勤工作，晚间还抽空勤奋学习。上海当时已是新兴的对外贸易商埠，华洋杂处，洋行势力很大，会讲几句洋泾浜式的英语，在和洋人做生意时很有用处。协记邻近的一家店铺有个学徒，每月花三块钱学费去夜校补习英语。朱葆三付不起学费，就拜此人为小先生，把每月省下的五角月规钱送给小先生权充学费，从而学会了一些英语。由于他能挤时间刻苦自学，举凡语文、珠算、英语、记帐和商业尺牍等有关商业知识都学了一些，加之工作勤勉、生活节俭，因此为店主所赏识，一再给予提拔。在七年里，朱由学徒升任帐房，再升经理。朱葆三掌管协记期间，赢利可观，他从而也分得了许多红利和额外酬劳金。其后店主去世，协记闭歇。1878年

(光绪四年),朱葆三利用这些年积蓄下来的钱作资本,在上海新开河地方独资开设“慎裕五金店”,专营大五金。

朱葆三本人由学徒出身,熟知业务,精于管理并善于用人。慎裕所雇用店员都是一些好手,如顾晴川精通帐务、老练可靠,被聘为总帐房^④,其他店员在进货、推销或门市应客方面都有专长。由于朱葆三用人得法、经营有方,慎裕营业渐臻发达。他在业务往来中,曾结识了以经营五金业发家的叶澄衷,两人成为至友。于是朱葆三把慎裕五金店迁到叶澄衷置产的上海福州路四川路大楼里继续营业,并兼营进口贸易。慎裕由于年年盈利,商誉日增,俨然执同业之牛耳。

朱葆三在五金行业中崭露头角后,经济实力也日趋雄厚。从十九世纪末年开,他跨越五金业,先后创办和投资了不少企业。如他和当时的官方或商界著名人物联合创办或投资的银行有中国通商、浙江实业、四明、中华和江南银行等,并在这些银行里担任重要职务。他所投资的保险业,有华安、华兴、华成保险公司和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等。投资于交通运输业的,则有宁绍轮船公司、长和轮船公司、永利轮船公司、永安轮船公司、舟山轮船公司、大达轮步公司以及法商东方航业公司。投资于公共事业方面的,有上海华商电车公司、定海电气公司、舟山电灯公司、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汉口自来水厂以及广州自来水厂。投资于工矿企业方面的,有上海绢丝厂、上海华商水泥公司、柳江煤矿公司、长兴煤矿公司、大有榨油厂、海州赣丰饼油厂、龙华造纸厂、日华绢丝公司、上海第一呢绒厂、中兴面粉厂、立大面粉厂、和兴铁厂、宁波和丰纱厂、同利机器纺织麻袋公司

以及马来亚吉邦橡胶公司。此外，他还与人联合举办了一些慈善、公益和教育事业，如中国红十字会、四明公所、上海商业学校等二十四四个单位^⑤。

朱葆三的发迹，不只基于经营“慎裕”得法，更得力于他的买办生涯。1890年后，朱进入英商平和洋行任买办。由于外商洋行在上海等通商口岸迅速扩张，依附于洋行的买办们的经济实力也随之发展起来，其中一些经济实力雄厚者并在所经营的行业公所中取得了领袖地位。1904年上海商务总会成立，朱葆三便当上了协理。朱葆三的四个儿子也步其后尘，先后进入日商三井银行和英商平和洋行担任买办等职务。当时，定海《挖花调》唱词中便有“牛头朱葆三，平和做买办”^⑥，可见其影响之一斑。

此外，朱葆三曾先后担任过宁波同乡会会长、联华总会董事、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公断处处长、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商业联合会会长等社会公职。清末，朱葆三与苏松太上海道袁树勋私谊甚厚，朱曾被任为道署总帐房，他荐顾晴川任道署会计员并司出纳银库。其时，各省上缴之庚子赔款，均先解送上海道库，袁树勋把大宗库银委托朱葆三出面拆放，获取余沥。从而使“慎裕”成为运用道库存银，向沪地各钱庄拆放的“领袖”钱庄。朱葆三亦因此增强了在工商界的地位和实力^⑦。

辛亥革命前夕，朱葆三曾和陆维镛、虞芑山等发起组织商团联合会，以之适应潮流。武昌起义爆发，各地响应。11月3日上海革命党人联络当地商团及部分军警举事，次日上海光复，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任都督，沈缙云任

都督府财政总长。一个月后，沈赴南洋捐募饷款去职，陈其美会同沪上各界代表在味莼园开会，公举朱葆三继任财政总长。其时沪上商业凋敝，金融恐慌，“加以政治多从宽大，赋税概予蠲除，大宗的款全数无着，而所入关税又须解缴苏省，此外毫无公款可资挹注，而每月用款之多，数逾百万”。朱在任职期间，想方设法筹措军饷政费，尽力颇多。1912年2月，朱以“年关逼近、莫展一筹”为由，请另简贤能去职^④。1913年“二次革命”时，上海组成讨袁军，但朱葆三等人屈服于袁世凯的压力，不予接济。

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发生后，国内各阶层及各团体组织都不得不表明自己的立场。朱葆三当时任上海总商会会长，起初该会对于青岛问题交涉失败、北京学生被捕，迟迟不表示态度，这就引起各方面的议论和猜疑。到5月9日（佳日）朱葆三才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致电北京，表示支持政府，并提出中日直接交涉等荒谬主张。次日上海各报全文披露了这个“佳电”，并在电文的荒谬处加上醒目的批注，从而激起各界舆论的严厉抨击，纷纷向商业公团质询。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乃于11日致电北京政府否认“佳电”并向上海总商会提出质问，13日又向上海总商会会董追究“佳电”来源。新闻界则披露“佳电”出笼，系出于上海日本商会会长授意的内幕。同日，上海总商会又发出“元电”为“佳电”辩解。14日，上海各团体再起反对上海总商会的“元电”，并在国民大会上提出罢斥上海总商会正副会长朱葆三、沈联芳的职务，以谢国人。在各界群众愤怒谴责和追究之下，朱葆三避居斜桥寓所不出，沈联芳则借词赴皖南收购蚕茧。随

后，朱葆三虽被迫提出辞呈，但又设法恋栈不走。如派出上海总商会会董四出运动会员挽留；运动松沪护军使卢永祥出面劝朱仍旧任职，并由卢代为运动北京农商部致电上海总商会，希冀正副会长顾全大局，从速到会维持会务等。18日，当上海总商会派出代表到朱葆三的寓所“恳劝”其到会复职时，报界又揭露上海总商会会长、会董于“佳电”之外，与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还有过多次接触的消息，要求朱、沈等人明白公布会谈内容。继而学生代表又督促上海总商会倡导上海商界抵制日货；爱国学生们则齐集朱葆三寓所，由南洋公学和圣约翰大学推出代表入内向朱质问。在此群情鼎沸的情况下，朱葆三、沈联芳不得不相率引咎辞职^①。此后，朱甚少参加社会活动。

1926年6月，上海时疫流行，朱葆三所创上海时疫医院，是个施诊性质的单位，一时病人充斥，而经费短缺，穷于应付。朱葆三为此连日冒暑到医院巡视，并去各处劝募捐款，因年老体弱而染疾不起。是年9月2日，朱在上海西门处斜桥寓所病故，终年七十九岁。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曾破例将外滩附近的一条马路命名为“朱葆三路”（今溪口路），以示对朱的纪念。

注：

- ① 朱祥麟原籍浙江黄岩，后移居定海，遂落籍该地。
- ② 都司，官名，清代绿营军官，职位次于“游击”，分领营兵。游击，官名，清代绿营军官，职位次于参将，分领营兵。
- ③ 据定海陆联芳访问记和上述传闻略有出入，兹附记于此，以待今后考证。朱葆三，名佩珍，又有一名叫朱诚惠，兄弟二人，其兄弟名朱捷三，原

籍浙江黄岩，父为米师父(舂米工，俗称米榔头)。幼年时，因家贫流入定海(舟山麦区原称定海县，清代曾称定海厅)，求乞谋生，曾在定海桃花岛(现普陀县桃花岛)胡柏房家放牛(胡柏房是房名，是定海桃花小竹山胡家，过去曾是该地有名殷实人家，即抗日战争前上海联安轮船公司总办胡耀君的先辈)。

- ④ 顾晴川为顾维钧的父亲，顾维钧曾任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等职。
- ⑤ 朱葆三亦曾与人联合举办了一些慈善事业、公益事业和教育事业。他与沈仲礼发起举办中国红十字会，由沈任会长，他任稽核财政出纳等职。此后又陆续举办了华洋义赈会，以救济灾区受灾居民。余如济良所、广义善堂、仁济善堂、惠众善堂、四明公所、定海会馆、四明医院、吴淞防疫医院、上海公立医院、上海孤儿院、新普益堂、普益习艺所、妇孺救济会、同义慈善会、联义慈善会、贫民平果局、上海时疫医院。教育事业方面有上海商业学校、同济医工学校、定海公学(现舟山中学)、尚义学校、宁波益智学校。
- ⑥ 据定海陆联芳访问记内云：“清末，列强侵华，英国当时为第一等强国。朱葆三在上海商界颇有地位，而由英商平和洋行聘为买办。在定海挖花调中有唱词：‘牛头朱葆三，平和做买办。’该唱词一直流传到解放前尚能听到。”
- ⑦ 上海市工商联档案资料：《沈斐成访问录》，1982年11月23日。
- ⑧ 《朱葆三辞职书》，《申报》1912年2月21日第七版。
- ⑨ 《上海总商会档案》，全宗第37号，编目1—30；《申报》1919年7月1日第十版。

郑伯昭

陈曾年

郑伯昭，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人，1863年（清同治二年）生。年青时曾在上海美国人主办的中西书院读书。

十九世纪末叶，英、美两国的卷烟开始向世界各地倾销，中国的一些主要城市，如上海、广州等地都逐渐出现了烟草制品。郑伯昭于三十岁时，同广东同乡在上海合伙组成永泰栈。该栈的初期业务是在菲律宾设立泰记烟厂，利用当地烟叶制成“绿树牌”和“真老头牌”雪茄，运至上海销售。1901年起，同代理销售英、美两国卷烟的公发英行订立合约，代销“老刀牌”（Pirate）和“皇后牌”（Ruby Queen）香烟。1902年上海英美烟公司成立，继续维持合约，永泰栈为当时代销英美烟公司香烟的六家大同行之一。郑伯昭年轻时就是一个深谙行情善于经营的商人，烟业同行称之为“潮阳麻子”，以形容其苛刻精明。永泰栈在推销这两种牌号的香烟时，经常超额完成英美烟公司规定的任务。“老刀牌”打开销路之后，英美烟公司收回自销，永泰栈在上海继续销售“皇后牌”，并将它推广到京、津一带。

1905年，美国发生虐待华工的事件，引起上海各界人士的激愤，发起抵制美货运动，提出“不用美国货，不吸美国烟”的口号。美国对华贸易当即遭到严重损失，特别是在中

国设厂的英美烟公司更受影响。英美烟公司不得不将设在上海的制造厂——美国纸烟公司改为大英烟公司。郑伯昭这时已担任永泰栈的经理，他用蒙混手法将“皇后牌”的中文名称改为“大英牌”，销路遂蒸蒸日上。

英美烟公司在中国通过各级分支机构直接经销一个时期以后，感到外籍人员对中国各地的言语风俗习惯甚难掌握，并要担负较大的风险，不如自己退居幕后，运用中国的买办商人更为有利。1911年，公司资送郑伯昭、邬挺生两人赴英考察，参观了在伦敦的英美烟公司总公司和制造香烟的工厂。

1912年郑伯昭被授权为“大英牌”香烟的中国独家代销商。1917年11月英美烟公司董事托马斯和郑伯昭在纽约签订合约，议定自1918年起十五年内，由郑伯昭担任“大英牌”和“锦扇牌”香烟在中国的独家经理，条件是不得销售其他公司的产品，每出售一箱付以不超过四元的佣金，部分佣金并可在国外付以外汇。

郑伯昭在永泰栈工作多年后，在推销业务上已扎稳根基，于是决定摆脱永泰栈，自立门户。1919年他在上海九江路设立永泰和烟行，并将“大英牌”和“锦扇牌”的经销权也带了过来。经过了两年的努力，成绩斐然。1921年进一步和英美烟公司合组永泰和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额为一百万元（英美烟公司占股份百分之五十一，郑占百分之四十九），郑伯昭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永泰和对外自称完全是中国人创办的公司，实际上货款收入和帐房核算全部皆由英美烟公司控制。

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全国人民对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愤慨万分，纷纷发起抵制英货运动。英美烟公司的在华业务首当其冲，特别是大英牌香烟的销路更是一落千丈。郑伯昭马上将“大英牌”的中文名称再改为“红锡包”，还广贴传单说“红锡包”，“现已由大美国驻沪总领事奉到大美国华盛顿外务部示，证明确系用美国烟丝制造。且完全在美国境内制造之货”^①。并在“红锡包”的烟壳上加印上英文“美国制造”字样。不久，“红锡包”的销售量就恢复正常。同一牌号的香烟，在抵制美货时，变为英国货；抵制英货时，又变成美国货。郑伯昭就是这样运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法来迷惑吸烟群众，帮助英美烟公司规避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斗争的锋芒而开展其业务的。

郑一向重视卷烟推销网点的建立和运用。他选择各地有实销能力的商人作为经销对象，并在保证金、赊销等方面放宽条件，在销售佣金方面采取累进优惠办法，因此在外埠也能迅速打开局面。永泰和在全国各大城市设有四十多个据点，以联系众多的经销商。郑伯昭的买办才干，深得英美烟公司的信任和倚重，1930年干脆把自己直属的“东方部”和“上海部”撤销，将这两个地区所有各种牌号香烟的推销和管理工作，全部都交给了永泰和。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英美烟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量每年约为九十万箱（五万支装），根据1923年至1941年的十九年的统计，永泰和共计销售英美烟公司各种牌号的香烟四百二十三万箱（平均年销二十二万二千六百余箱），营业额共计为法币九亿四千一百一十万元。郑伯昭获得的佣金收入，

历年来的总和约为法币二千四百万元左右。

英美烟公司作为一个外商企业，受当时中外通商条约的限制，不得在内地购置产业，但扩展业务又迫切地需要在内地购置大量产业。为了解决这一矛盾，1920年由郑伯昭出面组织了宏安地产公司，向中国政府登记注册，成为一个“法人”（“自然人”的对称，依法成立并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权利和负担义务的组织）。这个公司实际上完全是替英美烟公司在中国内地管理产业的一个买办机构。

英美烟公司成立之后，收取了经销人员、仓库管理员和出纳人员的大量保证金，并利用这笔资金在上海购置了很多房地产。但是，英美烟公司是专做烟草业务的，不便做房地产生意，为了掩盖自己的房地产所有权，便与郑伯昭勾结，于1927年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昌业地产公司。昌业的资本额为一百万两，实收资本九十万两，名义上是郑伯昭拿出来的，实际上由英美烟公司所属的大英烟公司掌握所有权文书——权柄单。因此，它是英美烟公司的另一个由郑伯昭出面经营的买办企业②。

由于郑伯昭出面效力，从而绕过了中国政府控制外商企业的各项条文和法令的约束，英美烟公司为了酬谢郑伯昭，在所属的不少企业中安排了郑伯昭、郑的妻弟黄以聪和郑的儿子观柱、观铅、观城、观桐等人为董事或股东，并给以高薪和大量佣金，有时还给以大笔额外酬劳。如为了感谢他们在日军侵略中国时替英美烟公司掩护昌业地产公司的股权有功，郑观桐和郑观城两人在抗战胜利后就分别获得了特别红利金法币三百五十万元③。

郑伯昭利用其所获得的巨额财富，在上海购置了大量房地产，先后开设了奥迪安电影院④、百老汇电影院⑤和新光电影院⑥，还取得了美国派拉蒙、哥伦比亚等影片公司的新片专映权。他在香港亦设置了东南地产公司，并在国外拥有巨额存款。

郑伯昭忠心耿耿地为英美烟公司服务，充分发挥了职业买办的作用，做了许多英美烟公司所做不到的事，而其本人则成为极为富有的大买办商人。

郑伯昭于1937年“八一三”事变时离沪去港，把永泰和托付给黄以聪继续经营。解放前夕，郑在沪的大部分家属也包了飞机前往香港。

郑伯昭于1951年在澳门病死。

注：

- ① 见《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12月版，扉页照片。
- ② 同①，第48—49页。
- ③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颈中档案抄件。
- ④ 奥迪安电影院位上海北四川路宜乐里旧址，1925年12月9日开幕。该影院设备上乘，足与当时最著名的卡尔登电影院相伯仲，1932年“一二八”战事中，影院中弹被毁。
- ⑤ 百老汇电影院为奥迪安电影院在上海公共租界东区设立的连锁电影院，1930年9月25日开幕。
- ⑥ 新光电影院为郑伯昭在上海公共租界中区经营的另一戏院，建筑参照西班牙及意大利的中世纪式样，1930年11月21日开幕。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12月版。
- ② 程仁杰，《英美烟公司买办郑伯昭》，见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78年第

一辑。

- ③ 陈子谦、平襟亚：《英美烟公司史话》，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
- ④ 汪熙：《从英美烟公司看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见《历史研究》1976年第四期。

张 本 政

左域封

张本政，字德纯，祖籍山东文登，1866年1月28日（清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生于旅顺寺儿沟。父亲是个渔民，落水而亡。张本政小时家境贫寒，只念过四年私塾。十七岁到旅顺口，与人合伙开杂货铺，因生意清淡，歇业回乡务农。二十五岁再次到旅顺口，与人合伙经营“通裕号”杂货代理店，本小利微，营业不佳。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张本政结识了日本“酒保”^①商人高桥藤兵卫。日军攻占旅顺口后，张本政到高桥店里当伙计。1895年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次年日军撤出旅大，张本政随同高桥迁往日军占领下的威海。清政府收回威海后，张本政又随高桥迁往烟台，在高桥代理店干了一年对外事务。后来他看到经营海运有利可图，便到日人梶原门下学习了一年海运贸易，以后又在德和洋行当过四年执事人。1902年张本政租了两艘日本轮船——“贯效丸”和“宇和岛丸”，专驶烟台——大连——大东沟一线，从事海运贸易。他还以经商作掩护，为日本刺探沙俄在旅大的政治和军事情报。由于活动频繁，为沙俄殖民当局发觉，被视为日探而遭追缉，张本政闻讯逃回烟台。^②

日俄战争期间，张本政利用所租用的船只，为日军运输

军需粮秣物资。由于他积极为日本侵略者效劳，“日本官方对其援助甚力”，^③沙俄统治旅大时，有一个俄国通事张德禄，是个包工头并兼营船行，拥有“大德合”、“小德合”两艘轮船。日军占领旅大后，以“俄奸”罪名通缉张德禄，并将其财产没收。张德禄遗下的船只和几百袋面粉，均由日本殖民当局贱价卖给张本政。在此基础上，张本政于1905年兴办政记公司于烟台，此后，他又买了一艘日本轮船“仁义丸”，改名为“胜利号”，同时又租了五艘日本轮船，航行于威海、烟台、龙口、天津、营口、大连、丹东等地，营业逐步有所发展。1912年将资本增为三十万元，并把航线从北方沿海扩展至香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航行远东的欧美船只均被调集西方投入战时运输，中国沿海航运一时出现空白。张本政趁机扩大经营，获利丰厚，在整个战争期间，政记公司平均每年购进轮船三四艘。张本政为了发财致富，很会见机行事。政记公司的轮船，原先挂的是外国旗号，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迫使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遭到我国人民的反对，各地掀起了抵制日货的高潮，政记公司的轮船也被抵制停航。这时张本政奔走权贵，到处钻营，向北洋政府农商部登记注册，“所有船只挂五色旗”，从而使政记的船只得以航行无阻。^④并在这一年增资为一百万元，开设长江及南洋群岛航线。

1920年，张本政为了集资大干，将政记公司改组为政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新筹集资金五百万元，加上原有资产共为一千万元。^⑤这时，政记轮船公司已拥有轮船二十一艘，

航行范围已远达日本港口。随着经营范围和地区的扩大，1923年政记轮船公司将总公司迁到大连，并在大连黑咀子设立政记船坞，自己动手修船。同时还先后在烟台、丹东、青岛、天津、上海、香港等地设立了分公司。

在奉系军阀统治东北期间，张本政同张作霖交往甚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船只重新麇集亚洲，政记轮船公司竞争不过，营业颇受损失；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将政记轮船公司停泊在天津、青岛等港口的十三艘轮船扣留，准备运兵到辽西葫芦岛登陆，袭击奉军后方。后因直军战败，此项登陆计划未能实现。而政记轮船公司因船只被扣而“大遭损失”，^⑥险些倒闭。后经张作霖借给张本政三十万元，并由东北绅商加股二百万元，使政记轮船公司得以重振营业而“年有盈余”。^⑦到1927年，政记轮船公司南北航线“均货客满载”，^⑧又兴旺起来。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我国东北，次年又发动淞沪战争，张本政以船资敌，担负军运，大发横财。政记轮船公司拥有的船只，过去都是一两千吨级的小型轮船，不宜远洋航行。从1931年到1934年，每年都购进一艘四五千吨级的大型轮船，已能远航到南洋各地。据不完全统计，政记轮船公司先后拥有轮船三十余艘，总吨位六万多吨，雇用日籍职员一百三十人，中国船员一千五百多人，成为我国北方航运业的一霸。有“东北与沿海各省交通唯政记是赖”^⑨的说法。

张本政不仅经营航运，还把手伸向金融、工商、房地产和公用事业。他除在大连、烟台开设政利钱庄外，并投资于

青岛地方银行、烟台商业银行、龙口正隆银行以及东边道实业银行等。他所经营的工商企业有：大连政记油坊、政记铁工厂、政记船坞、瓦房店窖业公司、烟台电灯公司等。在烟台、丹东等地都建有专用仓库。大连政记油坊1923年年产豆油二百万斤，豆饼五十万块。^⑩他的房地产很多，仅大连一地就有土地一千零五十亩、房产一千八百八十六间。^⑪

张本政及其政记轮船公司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卵翼下，由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张对日本主子感恩戴德，积极效劳。他同大连日本殖民当局的历任头目关系密切，并为之出谋划策。福岛安正任“关东都督”时，张本政与之“提携共办之事甚夥，其贡献于关东州政治上者非浅鲜也”。^⑫1926年，日本殖民当局举行所谓“关东厅始政二十周年纪念会”时，张本政令人作呕地致辞颂扬，说什么“於穆长官，辽东开府，国依重臣，民怀众父”。^⑬1942年，日皇派遣德川侍从来我国东北，给日伪军政人员打气，张本政又恬颜表示：

“吾关东州民自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日本帝国施政以来，日满同处于善政庇护之下，……安居乐业，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生活快乐，……光荣感激，永世难忘也。”^⑭公然为日本侵略者涂脂抹粉，死心塌地地认贼作父。不仅如此，张本政一直以船为日本侵略者效力。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全国人民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奋起抗战。当时的中国政府曾明令规定，所有的中国船只，均须集中于本国内海，服务于抗战。但是，张本政却将政记的全部船只调集大连、香港，帮助日本侵略军运送军事物资。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张本政更变本加

房地用所有的船只资敌。截止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政记轮船公司先后有十四艘轮船因此被盟军飞机和潜艇击沉。张本政不仅以船资敌，还积极向敌人捐款，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以来，张本政先后向敌人献金八十万元。张本政无耻地颂扬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多次对旅大人民进行欺骗宣传，蒙蔽旅大青年，驱使他们给日本侵略者当苦工。他还积极协助日本侵略者搜刮民脂民膏，搞什么“储蓄报国”。当日本侵略者加紧掠夺粮食时，张献策让中国人吃橡子面，使成千上万的无辜同胞被折磨病饿而死。

张本政的效忠，深得日本主子的喜爱。日本侵略者称他是“图谋两国亲善的先驱者”^⑤和“特殊功劳者”。^⑥日皇曾接见并授予“勋五等瑞宝章”。自1905年以来，日本殖民当局先后委任他四十多项职务和头衔。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张本政改投国民党反动派，向国民党特务提供活动经费和据点，支持反革命暗杀组织“暴力团”，妄图与国民党反动派里应外合，推翻旅大地区的人民政权。在1947年反奸清算斗争中，大连市人民法院根据广大群众的揭发控告，以附逆叛国罪判处张本政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同年，张本政趁保外就医之机，携带家眷逃往国民党统治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张本政在天津被捕归案，经大连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同年6月10日伏法。

注:

- ① 酒伴商人,是为日本侵略军包办伙食和办理军需物资的随军商人。
- ② 《张本政氏之阅历》手稿。
- ③④ 《张本政小传》,大连市人民法院档案。
- ⑤ 《政记公司之沿革及现状之梗概》,大连市人民法院档案;樊百川:《中国轮船航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1页。
- ⑥ 漆树芬:《经济侵略下之中国》第116页。
- ⑦⑧ 东北文化社编:《东北年鉴》,1931年版,第522页。
- ⑨ 1927年7月29日《泰东日报》第二版。
- ⑩ 关东厅临时土地调查部编纂:《关东州事情·上卷》,1923年版,第695页。
- ⑪ 《张本政财产一览表》,大连市人民法院档案。
- ⑫⑬ 1923年3月25日《满洲报》第二版。
- ⑭ 浅野虎三郎著:《满洲二十年史》,日华实业新报社1926年版,第834页。
- ⑮ 1942年10月27日《泰东日报》。
- ⑯ 同⑭,第846页。

胡 适

耿云志

胡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学者之一。原名洪骅，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891年12月17日（清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生于上海。他的父亲胡传曾做过淞沪厘卡总巡和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

胡适四岁丧父，由母亲送他入乡塾读书。约在八岁时，偶然读到《水浒传》，从此对白话小说特别着迷。这给了他最初的白话文学的熏陶。

1904年，胡适离开绩溪家乡到上海入梅溪学堂。次年转入澄衷学堂。他在这里开始接触到西方思想。严复译的《天演论》，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成了他最喜欢的读物。而梁启超的论著尤其令他倾倒。

胡适在澄衷学堂就读一年半，于1906年暑期考入中国公学。这个学校是上年留日学生为抗议日本文部省的所谓“取缔规则”愤而归国自办的学校。学生中有一个组织叫做“竞业学会”，骨干分子多是革命党人。会长钟文恢恰与胡适同住一室。在他的邀请下，胡适为该会办的《竞业旬报》担任撰稿，从第二十四期起又接任编辑。因而使他得到早期的文字训练。

1908年夏秋间，中国公学为修改校章事发生激烈风潮，

有数百名学生集体退学另外创办起中国新公学。胡适在新公学里担任低年级的英文课。1909年秋冬，在各方调停之下，新公学复与旧公学合并。胡适不屑回旧公学去，开始自谋职业。

1910年夏天，胡适到北京考取了庚款官费留美。8月16日，他与同被录取的学生共七十人从上海登轮赴美。9月，进入美国绮色佳（今译依萨卡）城的康奈尔大学读农科。1912年初改学文科。从此，胡适天性浚发，对文、史、哲诸科均极用功，复以余力积极参加校内外各项活动，讲演尤为所好。还经常给当地报纸写稿，曾在一次征文中获奖，受到当地舆论赞扬。其风头之健，可见一斑。

1914年夏，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毕业，得文学士学位，继续留校研读。次年9月始离开康奈尔前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跟杜威学哲学。杜威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胡适受其影响最大的是对哲学方法的高度重视。杜威对于有系统的思想过程的分析。使胡适对中国古典史学的考证方法有了崭新的理解。此外，杜威的改良主义政治哲学也成了对胡适有终生影响的一个方面。但在哥大期间，胡适最为热衷的，为其一生事业奠定基础的，是文学革命的尝试。

由于早年受过白话文学的熏陶，入美之后又受到西方写实主义文学的影响，胡适对中国文学史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凡属优秀的文学作品，大多是白话的，或近于白话的。而那些古奥晦涩的作品却大多是徒具文辞而缺乏真实的内容。由此他提出，古文是“半死的文字”，白话才是活文字。他主张，写诗作文都应尽量用白话，使人明

白易懂。在他看来，这正是文学革命的起手工夫。他的这些见解没有获得同学诸友的赞同。其中有个梅光迪更是激烈反对。但朋友们的反对没有使胡适泄气，相反，却加速引发了他文学革命的自觉心，并逐渐形成他有系统的主张。

当胡适在美国与朋友们辩论文学革命问题的时候，他的同乡陈独秀正在国内主编《青年》杂志，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向旧文化发起挑战。陈曾多次托人向胡适邀稿。1916年8月21日，胡适写信给陈，提出他关于文学革命的八项主张。陈复信希望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于是，胡适便以八项主张为纲，逐条发挥，作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于1917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青年》自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上。其八项主张是（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模仿古人；（三）须讲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陈独秀趁热打铁，紧接着发表《文学革命论》，把胡适的温和的学理式的主张变成激烈的革命宣言。于是震动全国的文学革命运动就此揭幕。

1917年5月，胡适交上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并进行了答辩。因主考导师们多对汉语、汉学很隔膜，致使论文未获圆满通过。胡适期之数年的博士学位未能到手。但由他“首举义旗”的文学革命运动，这时在国内已如春潮澎湃。胡适感到，他的事业，他的未来，已经在向他招手。遂决计束装回国。

7月，胡适回到国内，当即受到北京大学的聘请，在家

小住月余便北上就任北京大学教授。从此便与《新青年》主编、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共事，并很快结识了北京的一派新人物，年高德劭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是他们共同拥戴的长者。

是年12月，回里与江冬秀女士完婚，实践了悬隔十四年的婚约，既安慰了寡母，又邀得社会舆论的普遍赞誉。

1918年初，《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六人轮流编辑。他们以此为阵地，复以北京大学为大本营，将新文化运动迅速推向全国。胡适成了几乎与陈独秀齐名的领袖人物。

在文学革命运动中，斗争最集中、最激烈、最牵动社会注意力的是白话与文言之争。白话文因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广大的社会阶层中受到衷心的欢迎。反对文学革命的人，无力与白话文相匹敌。遂杜撰出一个堂皇的“理由”，声称，文学革命只应革其内容，不当革其形式。胡适回答他们说，文学形式的变革正是为文学内容的变革创造条件。

“只有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①胡适看到，要真正解决白话文学代替文言文学这个问题，必须成功地创造出有价值的白话文学作品来。1918年4月，他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鲜明地标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并系统地论述了创造国语的新文学的方法。此文被郑振铎诮之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②

胡适还大力提倡短篇小说和戏剧改革，并自己创作了一篇新式独幕剧《终身大事》。但胡适对新文学的创造贡献最

大的是新诗的尝试。1919年10月，他发表《谈新诗》，文中提出关于新诗音韵的崭新见解，打破了传统成见，为新诗的成立提出了可靠的理论根据。著名新诗人朱自清说，胡适的《谈新诗》“差不多成了新诗的创造与批评的金科玉律了”。^③1920年3月，胡适的白话新诗集，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尝试集》出版。文学史家陈炳堃评论说：“《尝试集》的真价值，不在于建立新诗的轨范，不在与人以陶醉于其欣赏里的快感，而在与人以放胆创造的勇气。”^④《尝试集》受到了包括从梁启超到鲁迅，知识界绝大多数稍具新思想的人们的欢迎。但却遭到学衡派的激烈攻击。反对派的攻击没有阻止新诗的发展。《尝试集》不久即再版，而且跟着有一大批年青的新诗人出现。胡适热情撰文向世人评介他们的作品。孤独的“尝试者”有了战友和伙伴。

胡适在文学革命的问题上，主要的缺点是“提倡有心，创造无力”。后来他竟认为中国当时还不具备创造新文学的条件。他过分低估了中国文学的价值，低估了新文学发展的巨大潜力。

在新文化运动中，最使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为之激动的是个性解放与思想自由。1918年6月，胡适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极力宣扬解放个性，发展个人才能的主张。1920年8月，他同北大教授蒋梦麟、李大钊、高一涵等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要求北洋军阀政府彻底废除一切破坏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徙及人身等项自由权的法律命令，切实保障人民基本的自由权。这些要求虽不能实现，

终不失为一种正义的抗争。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里所鼓吹的“重新评定一切价值”的口号，是五四时期资产阶级在思想原则上所表现的真正激进的态度。从这种态度出发，可以打破一切教条，可以根本改变人们对传统道德、礼俗乃至政治、教育制度等等的看法。胡适对“孝”的观念的否定，对女子贞操问题的异议，以及关于女子解放，节制生育的鼓吹等等，都有推动思想解放运动的意义。

胡适还积极致力于教育改革。他就任北大教授的头一年就创办了哲学研究所，开创大学的研究风气。他提议组织各科教授会管理教学，树立教授治校的新风范。他倡议实行选科制，鼓励青年学子的主动精神。他还参与创办其他研究机构，鼓励、赞助出版学术刊物，支持学生自办文化学术团体等等。这些对于改造旧北大官僚子弟沿袭下来的恶劣风气，推动学生青年的思想进取，奠定新式高等教育的基础，都有不容抹杀的意义。此外，他对于全国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在内的新学制的确立，也起了重要作用。

1919年2月，胡适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出版。这本书以其观点和方法的新颖而引起学界的极大注意。他以哲学方法为中心线索，阐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演进。蔡元培指出此书有四大优点，即：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⑤此书出版两个月即再版，以后又多次重版，足见它是深受欢迎的。它为胡适在学术上奠定了不拔之基。

胡适在学术上取得成功的另一个领域是对于中国几部古典小说的研究。他的《〈水浒传〉考证》（1920年7月）启发

了年青的历史学家顾颉刚，以追迹古史传说演变的方法，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开创了新史学的一个流派。胡适的另一篇《〈红楼梦〉考证》（1921年11月）则第一次打破清末以来的种种附会的索隐派的迷雾，把《红楼梦》的研究引导到正当的学术范围内。在以后的七八年里，胡适又相继写了十几篇古小说考证的文字。经他考证和介绍的几种小说，颇有跃登龙门之概，一时都成了畅销书。而这些书的畅销也有力地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发展。

胡适对小说考证的兴趣是同他更大的工作目标相联系的，这个目标就是整理国故。胡适认为，整理国故是创造新文化的一种必要工作。所谓国故，就是“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整理国故“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⑥

胡适在倡导整理国故时，提出疑古的口号。他鼓励青年学者们以怀疑的态度去辩证古史。他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⑦他这种怀疑与批判地对待历史遗产的态度受到了复古派与国粹派的攻击。

自从梁启超欧游归国，发表《欧游心影录》以后，守旧派又有抬头之势。1921年，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3年，张君勱在清华发表《人生观》的讲演，两者都表现出拒斥西方文化的心理。胡适发表《评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梁氏的主观主义与非历史的态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东西文化的差别，最基本的是历史发展程度的不同，中国将来也终必要走上“科学化与民

治化”的路。胡适又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写长篇序言，批评梁启超与张君勱，认为他们的言论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开倒车。文章虽然宣扬了实验主义，但其抵制思想界复古逆流的基本立场是可取的。

胡适是实验主义（亦即实用主义）的忠实信徒。他自己从不讳言，他做学问、谈政治，乃至做人做事，都是实行其实验主义。1919年春，胡适发表长篇论文介绍和发挥实验主义。以后又多次在各地发表演讲，加以鼓吹。在五四时期，实验主义的客观影响是比较复杂的。它的怀疑的倾向、大胆尝试的精神、重视逻辑的思想方法等等，在当时是颇有积极意义的。但它否认客观实在、否认真理的客观性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倾向则无疑地表现了这种帝国主义时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反动性。其最主要的消极影响是政治上的改良主义。

胡适刚回国的時候，曾暗下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力图“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⑧但五四运动把尖锐的政治问题提到每个人的面前。胡适看到李大钊等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革命制造舆论；一大批青年愤激于军阀专制，国家昏暗而醉心无政府主义。他“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于1919年7月发表了他的“政论的导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中国的问题只能一个一个地解决，不可能凭借某种主义一下子“根本解决”。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批评胡适。指出，问题与主义不能截然分开；而用主义来团结群众向一个总目标做去，是改造国家的正确途径。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改良与革命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派别的初次交

锋。

1921年6月，胡适同其好友丁文江、蒋梦麟等组织了一个叫“努力会”的小团体。次年5月办起《努力周报》。1922年5月13日，胡适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由蔡元培、李大钊等十六位大学教授署名，提出以“好政府”做为政治改革的起首目标，曾引起广泛的讨论。10月，胡适又发表《国际的中国》，指责中国共产党的反帝纲领。声称，中国此刻没有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只须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帝国主义的问题”。⑨

在《努力周报》上，胡适针对时局提出过许多改良的主张，对北洋政府的举措也有一些很激烈的批评。但所有这些都是毫无效果的。1923年10月，《努力周报》停刊。

1925年1月，胡适出席段祺瑞的“善后会议”，遭到进步舆论的激烈批评。五卅运动爆发后，他曾与罗文幹联名致信当时的外交总长沈瑞麟，提出两步交涉的主张：第一步，先解决惨案本身，即惩凶、道歉、赔偿等。第二步，修改八十年来一切不平等的条约。他的意见没有引起当局的重视。而他反对罢课的言论则受到进步学生的激烈批评。

1926年7月，胡适赴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的会议。途经莫斯科时，参观访问了三天，对新俄国产生颇为积极的印象。在英国停留半年，年底离英去美国。在那里，他补领了被拖十年的博士学位，于1927年4月乘轮回国，并卜居上海。这年6月，他被推任中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机构，由中美双方派员组成，简称中基

会)的董事。从此,除短暂的间断之外,胡适一直在这个董事会任职,这使他在教育学术文化界得以发挥很大的影响。8月,胡适受聘为私立光华大学教授。次年4月,受任中国公学校长。

胡适在欧期间,曾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查阅敦煌卷子,得到一些禅宗史的材料回国后便陆续整理研究,相继写成几篇禅宗史的论文,并于1930年出版了《神会和尚遗集》。

胡适由美回国时,恰逢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尽管胡适路过日本时作了拥蒋的表示,但回国后,国民党当局并不很信任他。1929年春,因国民党三全大会上有人准备提出所谓“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的问题,胡适以其严重蔑视法律与人权,遂接连写了《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文章,批评国民党当局的专制。文中直接牵及孙中山与蒋介石。这引起当局的大不满,特饬教育部对胡适发出警告;又组织国民党人写文章回击胡适,出版专辑《评胡适反党义近著》,并在报刊上发表消息、宣言之类,大攻胡适。最后且下令查禁胡适的文章。

其实,胡适并不想与国民党当局作对。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国民党“只有善意的期望与善意的批评”。“批评的目的是希望它自身改善”。^⑩

1930年11月下旬,胡适携眷北上,重返北大任教。次年任北大文学院院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促成了胡适与国民党

当局之间的谅解与结合。那时，蒋介石集团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正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政治上很被动。而在这个问题上，却得到了胡适的充分理解与支持。1932年5月，胡适邀集友人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蒋廷黻等创办《独立评论》（周刊），积极配合蒋介石的内外方针，宣扬对日妥协、对内“统一”。所以，《独立评论》的创刊，是胡适在思想政治上与蒋介石集团结合的一个重要标志。次年2月，胡适与民权保障同盟的决裂，使这一结合更加紧密起来。

原来，1932年底，宋庆龄、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带有反蒋性质的民权保障同盟。胡适亦加入，并于1933年初创立北平分会，自任主席。2月初，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得同盟总部同意，发表了一份揭露北平反省院酷刑虐待的材料。胡适认为这个材料是伪造的，要求总部负责更正。总部当然不能同意。于是，胡适发表《民权的保障》一文，公开反对总部“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接着又对《字林西报》发表谈话，继续攻击同盟总部的宗旨。宋庆龄不得不发电给胡适，请其“自由出会”。此事过后仅一个月，汪精卫就致信专诚邀请胡适出任教育部长。经过数日踌躇之后，胡适回答说：“我细细想过，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并表示愿“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①

1933年6月，胡适赴加拿大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届常会，10月回国。11月间，发生反蒋的“福建事变”。胡适发表文章攻击事变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等“有危害国家的嫌疑”。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学生爱国运动，影响迅速推及全国。胡适表示有限度地同情学生的爱国行动，但反对罢课。他手拟《告北平各大学同学书》，竟指责学生罢课荒废学业，滋生事端，是“青年人自放弃其本身责任，自破坏国家将来之干城”。

1936年6月，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两广事变，提出反蒋抗日的口号。胡适致电李、白，指责他们是“掀动内战，危害国家”。

这年7月，胡适再度出国赴美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常会，12月初回到国内。12日，西安事变爆发，胡适本其一贯拥蒋的立场，打电报给张学良说：“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指蒋介石——引者）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⑫随后，又发表《张学良的叛国》一文，成为国民党当局的主要宣传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大举进攻中国。次日，胡适南下赴庐山参加蒋介石、汪精卫主持的谈话会。会间曾与蒋、汪面谈多次，仍主张做“最大的和平努力”。9月，受蒋介石之托，胡适以非官方身份赴欧美活动。

从1932年到1937年，胡适除在北大任教，主要精力用于编辑《独立评论》。在这个刊物上，他共发表论文118篇（不包括《编辑后记》及游记等文字），其主要内容一是宣扬对日妥协，二是主张效法英美政制。此外还发表了几篇讨论中

西文化的文章。1935年1月，王新命、陶希圣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3月，胡适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认为十教授的《宣言》“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时髦的表现”，是以折衷论反对西化论。他主张中西文化应“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这显然又同他宣布赞成的陈序经的“全盘西化”有矛盾。所以，不久他又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宣布放弃“全盘西化”的提法，而以“充分世界化”代替之。自然，这个提法仍是不科学的。

1936年11月间，《独立评论》以文字触犯宋哲元被勒令停刊。时胡适尚在国外。回国后，经一番活动并正式向宋哲元道歉后，于1937年4月复刊，至“七七”事变停刊。

由于办刊物和参与政治活动，这些年，胡适的学术成绩不佳。长篇著述完全没有。稍可足述者只有几篇论文。1934年5月写成的《说儒》一文可算是这一时期胡适治学的代表作。文中对孔子及初期儒家的历史地位做了较高的评价，受到郭沫若、江绍原等人的批评。

胡适于1937年9月到美国，1938年7月离美赴欧洲。不久，在蒋介石敦促下，决定出任驻美大使。9月离欧，10月初到华盛顿赴任，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他任大使四年，至1942年9月8日卸任。以后继续留居美国，曾断续地在大学和图书馆担任过工作。

1945年9月，抗战结束，国民党政府聘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次年回国就任。

1946年11月，胡适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召集的所谓国民代

表大会。12月24日夜，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国兵强奸，引起师生及各界极大愤慨。学生罢课示威，抗议美兵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12月30日，胡适赶回北平，在接见记者时，一方面表示理解学生、教授们的愤慨。同时却强调“此次不幸事件为一法律问题”，力图掩盖美国对华侵略的政治问题。^⑬

1947年初，蒋介石托傅斯年转达，拟请胡适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2月6日，胡适写信给傅斯年说，他“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因为只有处于在野的地位，才容易帮政府的忙，“替他说公平话”来支持他。若加入政府，便“完全不能有所作为”了。^⑭

5月间，胡适邀同北大、清华等校一些教授组织“独立时论社”，针对国内外重大问题各人撰写文章交全国各地有关系的报纸发表。陆续入社的有四十多人，建立联系的报纸有三十八家。胡适以此在舆论上帮蒋介石的忙。

8月下旬，胡适到南京筹备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曾面见蒋介石，向他提出发展教育的十年计划。

11月，胡适被推为久大盐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12月中旬，为出席中基会的会议再到南京。蒋介石托王世杰劝他“改行”从政。胡与王长谈多次，终于婉辞。

1948年3月下旬，胡适到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会议，当选为第一届院士。接着出席“国民大会”，选举所谓“行宪”后的第一任“总统”。其时，蒋介石为应付政治困境，曾敦劝胡适参加竞选总统。胡曾略为所动。但国民党内一些有影响的人持反对意见，事遂寝。

人民革命战争胜利向前发展，国民党的统治面临彻底崩

溃。胡适受阶级自觉心的驱使，决定以笔和舌帮国民党的忙。他在北平电台发表反共讲演，然后又到武汉、杭州等地讲演。他回到北平不久，人民解放军就包围了这座城市。12月15日，蒋介石派专机将胡适接到南京。

1949年4月，胡适受蒋介石之托，启程赴美活动“美援”。在海轮上，他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为拟议创刊的《自由中国》杂志写的《〈自由中国〉的宗旨》，一篇是为将要出版的陈独秀晚年论文与书信写的序言。前者是一篇继续反共的宣言；后者则利用陈独秀晚年的思想退潮，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反对无产阶级政权。

1949年4月21日，胡适到达美国旧金山。两天后，南京解放，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宣告垮台。这一历史性的大变局给予胡适的打击太大了。一年后他在给沈怡的信里写道：

“这十几年中，止有国际共产党大致知道他们的目的与步骤；止有他们比较地明白他们所谓战略与策略。此外，所谓大国领袖，所谓大政治家，都不免古人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⑤他认为杜鲁门、蒋介石们没有想清楚他们要做什么和该怎样做，糊里糊涂地输给了共产党。他显然是为唯心史观所误。杜鲁门、蒋介石在中国的失败，不是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和该怎样做；而是因为他们设计的那套方案，中国人民绝大多数不愿意接受，他们要自己安排自己的命运。于是就起来反抗、斗争，终于使杜、蒋们归于失败。

1952年11月，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次年1月17日离台去美。1954年2月，为参加所谓“国民代表大会”，胡适再度回台，4月5日复去美国。

1955年12月，胡适着手撰写《丁文江的传记》，这是胡适一生所写的四十多篇传记性文字中最长的一篇。

1957年11月，胡适被任为中央研究院院长。次年4月，回台就任。1959年，又出任所谓“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主席。是年7月，他前往夏威夷大学参加第三次“东西方哲学会议”，发表《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的讲演。会后，他接受该大学颁赠的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这是他得到的第三十五个，也是最后的一个名誉博士学位。

1960年7月，为参加“中美学术合作会议”赴美。在这次会议上，胡适发表《中国传统与将来》的讲演。大意说，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是“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这个核心是永不会消失的。他并宣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同这个核心是不能相容的。利用传统文化反共，这是胡适晚年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1961年11月6日，在“东亚区科学教育会议”的开幕式上，胡适讲演《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对传统文化又有激烈的批评。引起不少人的反对。不久，以心脏病复发入台大医院治疗。

1962年1月10日，胡适出院休养。但在2月24日中央研究院欢迎新院士的酒会上，心脏病再次猝发，不及救治而死。

注：

① 《尝试集·自序》，《胡适文存》卷一，第279页。

② 《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第4页。

- ③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第2页。
- ④ 《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第227页。
- ⑤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序,第2—3页。
- ⑥ 《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卷四,第162页。
- ⑦ 《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第一册,第23页。
- ⑧ 《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98页。
- ⑨ 《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28页。
- ⑩ 据手稿《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
- ⑪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08页。
- ⑫ 据胡颂平:《胡适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645页。
- ⑬ 见上海《申报》1946年12月31日。
- ⑭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173页。
- ⑮ 见胡颂平:《胡适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139页。

蒋 光 慈

姜献阁

蒋光慈，原名儒恒，学名宣恒，自号侠生(侠僧)，笔名蒋光赤，此外还有蒋铁生、华希里、华维素、魏克特、李铁郎、陈情等。1901年9月11日(清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生于安徽霍丘，祖籍安徽六安。父亲蒋从甫当过学徒，后来开了一家小杂货店和米行。

蒋光慈天资聪颖，七岁入塾，十二岁能赋诗填词，有“神童”之称。1914年，进河南固始县立志成小学读书，成绩优异。1916年，他参加了由国文教师詹谷堂组织的读书会，开始阅读进步书刊。此外，蒋还爱读游侠小说，因受影响，有时好打抱不平。

1916年夏，蒋光慈考取河南省立固始中学，但不到半载，因反对学校对待贫富学生不平等，与校长冲突，被开除学籍。翌年夏，经朋友介绍到芜湖省立第五中学读书。他在这里学习四年，品学兼优，受到校长刘希平和国文教师高语罕的好评。在校期间，一度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曾在1918年参加秘密组织“安社”(安即安那其的简称，是无政府主义的译音)，并出版油印刊物《自由之花》。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迅速影响各地，身任五中学生会副会长的蒋光慈，立即组织同学投入斗争。5月7

日，芜湖学生联合会成立，他被选为副会长，参与起草宣言，谴责曹汝霖等卖国贼，反对北洋政府镇压示威学生，表示与京沪宁皖各校一致行动。他带头参加抵制日货的活动，建议在墨写的传单上插鸡毛，称之《鸡毛报》，每当罢市之前及时传送至各商店，警告商人。商会会长汤善福对学生所提禁止日货的要求置若罔闻，激起众怒，曾被学生代表殴打。当时他还时常写作白话文和新诗，给《皖江日报》等刊物投稿。他又以外省学生资格加入河南曹靖华等人组织的青年学会，并在会刊《青年》上发表文章。

蒋光慈同情俄国十月革命，他经常出入进步书店芜湖科学图书社，阅读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介绍十月革命的著作，为他尔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基础。1920年春，得五中教师蔡晓舟的推荐，和吴葆萼同赴上海，通过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等人的关系，入上海外国语学社专攻俄语。该社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选拔和培养优秀青年赴苏俄学习而举办的一所革命学校。先后来这里学习的有刘少奇、任弼时等二十余人，他们不仅学俄语，还阅读《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并经常参加群众运动和社会调查。同年8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蒋光慈被批准为团员。

1921年夏，蒋被选派和刘少奇等去苏俄，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其时，瞿秋白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驻莫斯科，曾为东方大学中国班担任翻译，他们接触日多，友谊日笃。1922年，蒋光慈读了瞿的《赤潮集》有感，遂作《西来意》一诗相唱和，诗中把革命的苏俄比作当年的印度，把自己和瞿秋白比作取经的唐僧，希望在俄国

“得到一点真经，回转家乡做牧师”^①。正因为他抱有这样崇高的目的，所以能处处上进，同年7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二七”惨案时，蒋曾写《钢刀与肉头》的诗，痛斥军阀吴佩孚。不久，他还创作《中国劳动歌》，以“打破帝国主义的压迫，恢复中华民族的自主”，“推翻贪暴凶残的军阀，解放劳苦同胞的锁扣”，“我们高举鲜艳的红旗，努力向那社会革命走；这是我们自身的事情，快啊，快啊，快动手”^②，去激励罢工工人。同年又为从法国转到苏联学习的同学萧三、陈延年等当翻译。1924年夏，蒋光慈由苏回国。

留苏期间蒋光慈创作了很多富有革命朝气的诗，后辑成《新梦》一书出版，使不少青年读者受到鼓舞，“迈上了革命的第一步”^③。同时，他还著译有《经济形式与社会关系之变迁》、《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等文，登载于《新青年》等杂志上。尤其是1924年8月发表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一文，比较早的阐述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蒋光慈回国后首先受党的派遣，到故乡从事建党工作，创建了皖西第一个党小组，随后去沪，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与瞿秋白、恽代英等共事。1925年4月，受党组织派遣至北方，给冯玉祥处的苏联顾问当翻译，并一度任冯部张家口军官学校教员。但是，蒋对军事教育不感兴趣，亦“不愿做一个政治家，或做一个出风头的时髦客”，一心想要成为一个“东方诗人”，一心想“圆成文学家的梦”^④。他过分强调自己的爱好，常为不能专心从事写作而苦恼，同年10

月，他甚至没有得到党组织允许就返回上海，继续在上海大学工作。

蒋在北上之前曾参加创造社的活动，又与沈泽民等人以春雷文学社名义，在《民国日报》副刊上出文学专号，刊登有《我们是无产者》等诗歌，还在该报上发表《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的论文。“五卅”惨案发生时，他正在北方，得到消息后，马上作了《血花的爆裂》一诗，声讨帝国主义、哀悼革命烈士，号召广大群众起来“为中华民族的大暴动”^⑥。他这一时期的诗，多半都是忧国忧民之作，后来大部分收在诗集《哀中国》里。

当时，蒋光慈还创作了若干篇描写工农和其他革命分子的斗争生活，颇有启蒙作用的小说。1926年1月出版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少年飘泊者》，书中的主人公汪中，出身佃农家庭，几经周折，最后走向革命，“为广大青年指出了一条奔向光明的路”^⑦。由于受到读者的欢迎，此书七年之内重版了十五次。此后他又用十个月的时间完成八个短篇，后以《鸭绿江上》的书名印行。

同年秋，蒋同女友宋若瑜结合，不久宋因肺病去世，他十分悲痛。为纪念亡妻，于翌年将他俩的通信集，即《纪念碑》一书出版。

1926年冬到1927年春，上海工人举行三次武装起义。蒋与起义的领导者瞿秋白、赵世炎等很接近，按照瞿的授意，只用了半月的功夫便写出了带有报告文学性质的小说《短裤党》，热情歌颂这一斗争。出版后被敌人指为赤化的宣传品。此时蒋光慈已经看出伪装革命精英蒋介石的狰狞面目，但毫不

畏缩，表示：“当此社会斗争最剧烈的时候，我且把我的一支秃笔当做我的武器，在后边跟着短裤党一道儿前进！”^⑦

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上海大学遭到查封，蒋光慈抱着良好的希望奔赴武汉，不料武汉的汪精卫也于“七一五”公开反共，他又返回上海。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仍然坚持革命的文艺方向，创作并编辑了《野祭》、《菊芬》（又名《汉江潮》）、《最后的微笑》和《俄罗斯文学》

（下卷为瞿秋白原稿）等书籍，交创造社出版部或现代书局出版。并与钱杏村、杨村人、孟超等积极筹备《太阳月刊》。

《太阳月刊》于1928年1月问世，是共产党所领导的一个革命文学阵地，蒋光慈任该刊主编。他在“卷头语”中宣称：“向太阳，向着光明走！”“我们要战胜一切，我们要征服一切，我们要开辟新的园土，我们要栽种新的花木”^⑧。又接连在该刊上发表《现代文学及社会生活》、《关于革命文学》等评论以及小说、译文等。为便于杂志的出版和发行，他们还成立了太阳社和春野书店。在国民党反动当局高压之下，《太阳月刊》只出了七号即被迫停刊，不久春野书店也不得不关门。此后二年，蒋先后参加编辑出版有《时代文艺》、《新流月报》、《海风周报》、《拓荒者》等进步刊物。

但是，由于对中国社会和文艺界的情况缺乏充分的了解，以及受国内外“左”倾思潮和路线的影响，此时蒋光慈和太阳社的成员曾一度与创造社发生过争论，并否认鲁迅在革命文艺战线上的地位和作用。蒋这段时间作品的思想主流是好的，但存在某些悲观情绪。1929年4月写成的长篇小说《丽莎的哀怨》有较多的消极成分，出版后受到党内同志

的严厉批评。对此他感到苦闷，加上身体多病，故于8月去日本东京疗养。

蒋在日本迅速完成了另一长篇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的创作，翻译了苏联小说《一周间》。他这一时期的日记，后来印成《异邦与故国》一书出版。他还同冯宪章、楼建南（适夷）等组成太阳社东京支部（支社）。与日本进步文学评论家藏原惟人常相往来。此时他集中钻研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思想上获得较大的提高。由于怀念祖国，同年11月底回到上海。

这时国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为了加强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党曾派蒋光慈负责联系田汉的南国社，又被指定为“左联”筹备小组成员之一。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成立，蒋当选为候补常委，同鲁迅、夏衍一起参与“左联”的领导工作。不久，因抵制党内“左”倾盲动主义受到责备并被开除党籍。

同年11月，蒋光慈最后也是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脱稿。这部小说以土地革命为背景，通过张进德、李杰等典型人物的塑造，生动的描绘了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反抗地主、组织农会、举行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现实，比较完整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广大农村中剧烈的阶级矛盾和斗争”^③，是他创作道路更趋成熟的标志。该书已打好书版，未及印行即被查禁，后由朋友改名《田野的风》出版。蒋的其他著作也多被列为禁书。由于敌人的捕索，弄得他到处转移，生活极为困难。

1931年6月，蒋光慈病重住院，同年8月31日，因肺病

和肠结核去世，终年三十岁。他短短的一生中，不仅对革命文学理论作出了贡献，而且努力运用革命观点来从事创作，“开拓了中国文艺运动最先的路”^⑩。他的著作共有一百多万字（不包括翻译），解放后出版有《蒋光慈选集》（开明书店）、《蒋光赤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蒋光慈诗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多种。

注：

- ① 蒋光慈：《战鼓》，北新书局1929年出版，第34页。
- ② 《蒋光慈诗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3—14页。
- ③ 孟超：《蒋光赤选集》（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二版，第1页。
- ④ 蒋光慈给宋若瑜的信，即《纪念碑》，亚东图书馆1927年11月出版，第138、196、143页。
- ⑤ 同②，第60页。
- ⑥ 哈晓斯：《中国革命文学的先驱——蒋光慈烈士》，《江淮英烈》，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第139页。
- ⑦ 《蒋光慈选集》，开明书店1951年第2版，第86页。
- ⑧ 蒋光慈：《太阳月刊》一月号《卷头语》，太阳社编辑，1922年出版，第1页。
- ⑨ 吴腾凤：《蒋光慈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6页。
- ⑩ 方英：《在发展的浪潮中生长 在发展的浪潮中死亡》，《文艺新闻》1931年9月15日第2版，追悼号。

曹 聚 仁

任嘉尧

曹聚仁，字挺岫，号听涛，曾用笔名陈思、于舟等。1900年6月26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出生于浙江省浦江县蒋畈村（今属兰溪县）。

曹先世从金华迁浦江南乡，世代务农。其父曹梦岐，刻苦自学，举秀才。1902年赴杭州乡试时，正值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虞，他恨清室衰微，乃绝意科举，图教育救国。后在乡间办育才学堂，培育四乡子弟。曹聚仁在其父的教育熏陶下培养起爱国主义思想。

1913年春，曹聚仁离开家乡到金华，在中学念了一年半书。1915年夏，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得校长经亨颐及老师陈望道、李叔同、夏丏尊、刘大白、单不庵诸先生的悉心教导，学业锐晋。1919年五四运动烈火燃烧到东南，曹聚仁投入了反对旧礼教，打倒孔家店的斗争，曾担任学生会主席，领导“一师”的学生运动。

1921年曹聚仁在“一师”毕业后，到了上海。在邵力子等的提携下，曾创办沧笙公学，并在爱国女校等处教语文，同时，为邵力子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撰稿。这是曹正式从事教育和文化工作的开始。

其时，“国学大师”章太炎正在上海讲学，曹聚仁前往听

讲，并将记录整理成《国学概论》一书出版，成为当时大专院校流行的教材。可是，曹对章氏最后一章中反对白话诗的论调，不予苟同，曾发表专文进行批评，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从1923年到1933年，曹聚仁在上海艺术专科学校、上海艺术大学、路矿学院和上海暨南大学任教；并先后在复旦大学、持志大学、大夏大学兼课，讲授国文、历史等课程。

1927年初，军阀孙传芳的军队强驻真如暨南大学校舍，教学无法进行，曹乃应单不庵馆长之聘，去杭州西湖文澜阁浙江省立图书馆工作半年多，在整理、校对四库全书时，得以浏览四库全书提要。

1927年12月21日，鲁迅到暨南大学讲演《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曹为之记录（原记录收入鲁迅《集外集》）。这是他与鲁迅第一次见面并缔交。1931年8月，曹聚仁主编的《涛声》周刊问世，到翌年“一二八”上海抗战开始，该刊曾被迫停刊，同年秋复刊。《涛声》是一种文艺杂志，刊头以“乌鸦”为记，用以讽刺国民党当局所谓“太平盛世”的欺人之谈。鲁迅用“罗怃”、“旅隼”等笔名为《涛声》撰稿，包括为曹等准备出版《守常全集》所写的《〈守常全集〉题记》一文。虽然曹自命为“虚无主义者”，而《涛声》中常有“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文章”^①发表，抨击时弊，刺痛了国民党当局，实际出版不过一年零三个月，就于1933年11月遭到查禁停刊。其后一段时期，一些文人就视曹为“异端”，把“乌鸦”、“乌鸦先生”的帽子套在曹的头上，并对其作品进行谩骂攻击。

1934年6月，曹聚仁在上海和陈望道、夏丏尊、叶圣陶、陈子展、徐懋庸、乐嗣炳等提倡“大众语”，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开辟“大众语”运动的讲坛，轮流撰文发表意见。鲁迅曾给予有力支持，应约写了《门外文谈》，对大众语运动发展的道路提出了积极的主张。同年，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半月刊创刊，曹聚仁为编委之一。为什么它命名为《太白》呢？太白比白更白，实际上太白即启明星，暗示总有结束黑暗统治的一天。当时，以林语堂为代表的主张闲情逸志的论语派文字风靡一时，这对爱国救亡的现实是不合适的。曹和徐懋庸又合办了反对论语派的刊物《芒种》。

早在“九一八”事变时，曹聚仁主张抗日救国，任救亡协会理事，为国民党当局所嫉视，因而被迫离开暨南大学。1935年12月12日发表的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他也是签名者之一。他又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②并在当时报刊上撰写宣传抗日救亡的文章。曹为《社会日报》写的呼吁抗日的社论，常常被检“开天窗”，有时只剩下标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曹聚仁握笔从戎，出入火线，为上海《申报》、《立报》、《大晚报》、《社会日报》采访战地新闻。曾在淞沪抗战火线上活动两个多月。上海沦陷后，参加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工作，任该社战地特派员，随军至第五战区（徐州一带）和第三战区（苏浙皖地区）采访，他率先播发的台儿庄大捷报道，一时轰动全国。他还访问新四军叶挺、陈毅等将领，报道新四军英勇抗战事迹。1940年后，他在赣南为蒋经国主持《正气日报》，历时两年有余，担任

过主笔、总经理兼总编辑之职。1945年主编《前线周报》，宣传新理性主义，主张：“唤醒一般人的理智”，“继承科学的、民主的文化传统”。③

抗战胜利后，顾祝同在三战区所办的《前线日报》迁上海出版，曹任该报编辑，兼任香港《星岛日报》驻沪特约记者。1947年曾与舒宗侨合编《中国抗战画史》出版，文字部分都由曹执笔。这段时间，曹还在上海法学院和苏州国立社教学院任教，并兼上海前进中学校长。与此同时，曹有时参加沈钧儒、黄炎培等举办的聚餐会，曾在报刊上发表《观变手记》，对局势变化每好作预言。

新中国成立后，彷徨之中的曹聚仁，于1950年夏天应《星岛日报》社长林霭民之邀，离开上海赴香港任该报编辑。1955年后与林霭民相继脱离该报，曹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

1956年起，曹聚仁多次回内地参观访问，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以及其他领导人的接见，还参加各种活动。曹将见闻观感向东南亚报纸作专文报道，并在《南洋商报》上，连续发表《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人事新语》等专栏文章，介绍祖国新貌，在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5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周恩来总理在颐和园设宴款待曹聚仁，陈毅、张治中、邵力子应邀作陪。席间，畅谈天下大势和祖国前途。曹提到祖国的统一问题。周侃侃而谈：“国共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

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①

1959年起，他和林霭民再度合作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循环午报》和《循环晚报》，曹任日报主笔。林霭民谢世后，三报合并为《正午报》，曹仍任主笔。

为了纪念鲁迅，曹聚仁在香港出版了《鲁迅评传》和《鲁迅年谱》两书。

作为一个爱国人士，曹聚仁曾为祖国统一大业奔走，尽心竭力，以期有成。晚年，酷爱波兰爱国作者显克微支的小说《灯台守》，常以“守灯台的老人”自许。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因患癌症不治，逝世于澳门。遵照曹生前的意愿“叶落归根”，将其骨灰运回故乡安葬。

曹聚仁笔耕五十年，著述甚丰。据约略统计，撰文达四千万言，成集的有五十余种，晚年还广集资料，编辑成《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一巨册，宣扬了新中国文化艺术上的伟大成就，曹逝世的次年，香港出版他的遗著《国学十二讲》一书。

八十年代以来，曹聚仁遗著《我与我的世界》、《万里行记》、《听涛室剧话》、《书林新话》、《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即《国学十二讲》修订本）等，在国内陆续出版。

注：

① 鲁迅：《祝〈涛声〉》，《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卷4，第561页。

- ② 周天度编：《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63、68页。
- ③ 曹聚仁：《采访外记》，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第238页。
- ④ 曹聚仁：《颐和园一夕谈》，新加坡《南洋商报》1956年8月14日。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 ② 曹聚仁：《采访外记》，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
- ③ 曹聚仁：《采访二记》，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
- ④ 曹聚仁：《采访新记》，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
- ⑤ 曹聚仁：《文坛三忆》，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
- ⑥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续编），香港新文化出版社出版。
- ⑦ 行止：《曹聚仁传略》，《晋阳学刊》1983年第二期。

任 白 涛

任嘉尧

任白涛，笔名冷公、一碧。1890年1月24日（清光绪十六年正月初四日）生于河南南阳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出生仅六月，父亲病故，依伯父为生。青年时好读书，邻居张衡藩为同盟会员，所藏革命书刊甚多，因得接触进步思想。辛亥革命前后，任上海《民立报》、《神州日报》、《时报》、《新闻报》驻汴特约通讯员。曾参与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

1916年任东渡日本，进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同时补习日文。因酷爱新闻学，参加大日本新闻学会为首届会员，研究新闻学，并积累资料，进行写作。1917年周恩来亦在东京求学，当时一些进步的留日学生，有着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的共同愿望，常在周末至王拱壁寓处相聚，畅谈形势，议论国家大事与祖国前途，任白涛与周恩来由于志趣爱好相近，友谊甚笃。在日本留学时，任白涛已将《应用新闻学》一书初稿写就。当时我国尚无中文的新闻学专著问世，

《应用新闻学》可称为我国新闻学专著的嚆矢。

1921年任白涛从日本回国，曾将《应用新闻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未被接受，乃筹款自费印刷二百本。不久任白涛离沪去杭州，寓寺庙中，创设中国新闻学社，积累新闻资料，与各地有志从事新闻学研究者共同探讨学术问题，潜

心钻研新闻学；并以卖文为生，常为《教育杂志》、《妇女杂志》撰稿，译述外论，介绍国外情况，发表本人对教育、妇女、社会问题的主张。当时稿酬菲薄，生活清寒。名记者戈公振在撰著《中国报学史》时，鉴于手头积累资料不够，曾于1923年到灵隐寺访问任白涛，向其请益，任乃将历年珍藏的报刊资料慨然借予戈公振选用。

1923年，李一氓在《中国评论》杂志撰文，揭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伍超所撰的《新闻学大纲》一书，与任白涛著《应用新闻学》有雷同之嫌，任白涛核对之下，发现伍超一书有百分之七十系直接抄袭《应用新闻学》的，当即致函商务印书馆交涉，但商务未予理会。

1925年，任寄寓杭州大佛寺从事著述时，碰巧胡适亦来杭游览，晤谈之下，了解任白涛耗多年心血写成的《应用新闻学》，先交商务，不愿出版，却出版了伍超抄袭的《新闻学大纲》，颇为愤慨。胡适与商务总编辑王云五有师友之谊，^①函王，始得王云五回信。商务方面决将伍超之书毁版，而同意将任在《教育杂志》发表的文章，编集成《改造中的欧美教育》，由商务印书馆出书，以版税作为赔偿。

以后，胡适又介绍任白涛与亚东图书馆主持人相识，任的《应用新闻学》、《给志在文艺者》、《恋爱心理研究》、《恋爱名论》等书，相继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1927年，任白涛由杭州迁居上海，仍悉心撰述。次年，与南华通讯社女记者邓润云（广东鹤山人）缔交。两人志同道合，于1929年秋在上海结婚。任婚后仍以写作维持生活。

1935年任白涛将历年所积累的新闻学资料，加以整理分

类。动手执笔写《综合新闻学》一书。原订计划写三十万至五十万字，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始全部杀青，计一百三十万字。

“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由上海迁往香港，任白涛将书稿寄往香港。为避免邮政检查一关，托友人汪馥泉把《综合新闻学》稿件寄出。行前写了《抗战期间的新闻宣传》一书，交北新书店出版。1938年春节，任白涛夫妇离沪到广州，正碰上日军飞机“大轰炸”，局势动乱，但任白涛仍不忘著述，写成《国际通讯机构及其它》一书，交广州商务印书馆出版。

当时日军南侵，战局急转直下，广州处境险恶，任白涛通过《新华日报》驻广州经理张尔华的关系，把原稿、资料、信件、日记等装成一大木箱，由帆船运往梧州。自己则于10月21日广州沦陷那天上午，匆忙沿广三铁路步行离穗，几经颠沛流离，始抵梧州。在广西滞留期间，又为商务印书馆写成《日本对华的新闻宣传政策》一书。

1939年春，任白涛到了重庆，随即前往中共代表团驻渝办事处找周恩来。适值周去第三战区视察，只见到邓颖超，留下通讯处（白象街商务印书馆转）辞别而去。当周恩来返渝时，重庆已遭到5月3日、4日敌机大轰炸，商务原址化为废墟，无法找到任白涛的下落。曾登《新蜀报》寻人。原文是：“任白涛兄：弟已回渝，仍寓曾家岩渔村。兄现寓何处？请告。翔宇启。”②任一见署名为“翔宇”的广告知道周回到了重庆。“翔宇”是周恩来在留日时用的别名，只有少数知友知道。便于次日赶赴曾家岩晤面。久别重逢，分外欢欣。

任白涛向周恩来叙述了二十多年来的生活和工作，并表示毕生以研究新闻学为素愿，打算为抗战期间国际新闻宣传略效绵薄。

不久，周恩来介绍任白涛到郭沫若主持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担任设计委员，从事对敌宣传事宜。那时，重庆一再遭到敌机轰炸。任征得周的同意，将文稿资料等物装在竹箱内，存放在曾家岩。每逢空袭警报发出，中共代表团驻渝办事处工作人员便协同将上述物件搬进防空洞，警报解除后又重新取出（放在防空洞内易受潮发霉）。正因为这些文稿资料是人民的宝贵财富，周恩来才这样关怀，这样爱护备至。^③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白涛被裁员。此时湖北省政府已迁到恩施，拟邀任出任《新湖北日报》总编辑。任当时想去延安，向周请教，经告知：“我们需要更多的同志和朋友在新闻界工作。你还是先到恩施去好。”^④任白涛在恩施，名义上虽是《新湖北日报》总编辑，但薪金菲薄，生活清苦，住所楼下养猪，楼上住人，晚上要提着灯笼，走过田埂去上班，下雨天还要穿着钉鞋走路。可是他仍然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地工作，他想到的是：一切为了抗战。工作了九个月，因与工人打成一片，受到社长谢然之^⑤的疑忌和排挤，任被迫离开该报，再度失业。其后，任白涛曾任第六战区中校参谋、湖北省政府参议等。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任白涛回到了重庆。一度借住在神仙洞《新华日报》职工宿舍，不久迁至化龙桥《新华日报》编辑部，这儿每逢星期六改善生活，打一次“牙祭”，还举

行联欢会。在沸腾的革命洪流里，任白涛感到极为兴奋，他说：“这是我一生最有意义的日子。”⑥

1946年7月任白涛夫妇离开重庆，来到南京，曾去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所在地，得悉寄存曾家岩的文稿资料等早由中共代表团专机运到，存放在上海马斯南路（今思南路）周公馆（即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不久任到了上海，乃赴商务印书馆，晤编译所负责人谢仁冰，得悉《综合新闻学》原拟分四册出版，第一、第二册已于抗战时在香港发行，第三、第四册排稿后打好纸型，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尚未印刷。任将第一、第二册取回阅读，因未经作者本人亲自校对，谬误百出，非订正不可。加以付排后垂十年，形势发展变化颇大，第三、第四册亦须修改后方能出版。遂向谢交涉，一定要修改后始能出版。谢同意，但商定不能多更动版式。

花了九个月时间，任白涛将全书修改竣事，又往晤谢仁冰。谢却反悔说，这部书有些章节写得过于尖锐，目前不可能出版，并表示歉意，只是将该书全部清样、纸型、铜版、锌版等物交回任白涛，不了了之。

《综合新闻学》，是解放前我国新闻学著作中内容丰富、篇幅最长的一部，是任白涛花毕生精力撰写的。它就新闻学概论、原始的公告形态和方法、现代的采访技术和通讯方法、编辑和技术、经营管理以及杂志，作了全面的论述，保存了不少中外古今新闻事业史的珍贵资料，可惜由于客观原因未能问世。

1948年，任为三联书店翻译了《〈资本论〉图解》第一

册，作为研究马克思著作的辅导读物。

新中国成立后，任白涛曾出席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又孜孜不倦地继续修订《综合新闻学》，并为北新书局编写一些文学、医学书籍。1952年春，周恩来总理知道了任白涛生活清苦及工作情况，嘱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派人慰问，并电邀任赴京工作。7月中旬，任白涛摒挡就绪，即将成行，不幸突患中风，虽经医务人员悉心医疗，仍于1952年8月31日病逝上海，终年六十二岁。

任白涛遗稿、往来信件、日记、资料以及《综合新闻学》等遗物，亦按周恩来总理指示和任白涛生前愿望，全部交给国家有关单位保存。

注，

- ① 胡适曾在中国公学读书，王云五时任英文教员。后胡介绍王到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所工作。故有师友之谊。
- ② 广告剪报原件在上海图书馆保存的任白涛文物中。
- ③④⑥ 据任白涛爱人邓澍云回忆笔录。
- ⑤ 谢然之，一度在瑞金任《红色中华》主编，被俘后投靠国民党，大陆解放前去台湾。

王 希 天

任秀珍

王希天，原名王熙敬。1896年9月11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五）出生，吉林长春人。其父在县城东北金钱堡屯开设皮铺。

王希天九岁入家馆读书，十二岁始入小学，因成绩优秀，未及一年，升入长春第一高等小学。1911年入省城第一中学肄业，后又转入奉天铁路学校。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成立了民国，不久北洋军阀攫取了政权，中国人民依然处于反动统治之下。王希天面对国家的现状和在奉吉读书时目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决心为了国家的富强去研究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1915年东渡日本留学。

王希天到东京后，经过预备期学习，于1917年7月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当时日本高等学校的食宿条件均甚简陋，故住校生寥寥无几。王希天发奋读书，坚持在校食宿。他平时生活俭朴，常把节省下来的钱接济有困难的同学，加之为人和蔼，结识朋友很多。

王希天初到东京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强迫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之际，1917年至1918年，日本为进一步控制我国的经济命脉支持皖系军阀扩大内战，给予段祺瑞政府“西原大借款”。1918年5月又与段政府秘密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

军事协定》，妄图实现其独霸中国的野心。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变本加厉的侵略行径，留日学生们无比愤慨。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在“一高”化学讲堂集会，王希天登台讲演，痛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诸君不见报纸所载中日军事密约乎？我们当速起共谋抵制之方”^①，与会留日学生群情激愤以至感叹泣下。在王希天等人的号召下，当即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接着又在东京神田的源顺馆召开代表会议。会议进行中曾遭到日本警察的镇压，王希天和参加会议的代表被拘留。日本警察的暴行，激起中国留日学生的更大愤慨。为抗议中日军事密约，留日学生在东京召开代表会议，决定组织请愿团分批回国。归国学生分两路行动，一路到北京，一路到上海。王希天随同请愿团先到京、津各学校演说，然后去总统府请愿。他们的这一爱国行动，很快得到北京学界的积极响应。5月21日，北京学生二千余人到总统府请愿，要求公布并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游行请愿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前奏^②。这时，北京一部分学生组织了学生救国会，王希天等则在天津成立了留日学生救国团支部和全国学生爱国会，除了进行文字和口头宣传以外，还组织了国货贩卖部，以抵制日货。他那慷慨激昂的演讲，充满着爱国主义的激情，迸发出对侵略者的仇恨，曾经感染激励了很多^③。

这次“拒约”运动持续了半年之久，在全国学界播下了群众爱国运动的火种，为后来的“五四爱国运动”奠定了基础。“拒约”运动过后，多数归国留学生不愿再回日本。但由于国内无相当学校可入，转学他国又不可能，王希天只好

和一些人再次去日本。

王希天在归国期间，目睹军阀统治的腐败，国家积弱不振和外侮日逼，心情十分沉重。他认为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唤起人民的觉醒，必须首先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因此，返日后，他决定弃工习文。1919年王希天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毕业，随即转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在名古屋学习期间，除读书以外，还做些国民外交工作。他在名古屋租了一间房子，名曰“乐园”，利用此地与日本新思想学者及当地贫民来往，但不久便引起日本警察当局的注意，不得不搬迁。由于学习和生活环境均甚艰苦，他的胃病日趋严重，后来又染上了肺病，加上日本教育与警察当局认为王希天是个“排日分子”，故为刁难，终被学校除名。王于是去长岗养病，并利用这个机会了解社会，接触旅日华工。

早在1917年前后，我国浙江、山东等地有一批同胞到日本行商谋生。初时只有三千余人，后逐渐增多，至1922年达六七千人。仅浙江温州一带就有三千五百余人。他们从国内带来的雨伞、锯、六神丸、山东绸花边等物品，到日本的长崎、门司、神户、大阪、名古屋、东京、北海道等地行商。由于本小利微难以维持生计，后来便流落东京等地工厂做苦工，从事挑煤挖土等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收入菲薄，常遭资本家和工头的刁难、殴打和无理克扣工资。他们多数居住在贫民窟或露宿街头小巷，由于饥寒、疾病的侵袭，横尸街头者也屡见不鲜。特别是1918年留日学生归国参加“拒约”运动后，日本当局对旅日华工的迫害更是变本加厉。

王希天的好友王兆澄注意到华工在日本的悲惨遭遇，便

与王希天商量，办一个“共济号”，为华工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王希天不顾自身疾病，为保护华工的利益而奔波劳碌。这一行动，曾受到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周恩来的赞许^④。

1922年6月6日，趁留日青年会召集留学生领袖开会的机会，他和王兆澄提议“决定以后对于华工加以特别注意”^⑤。7月下旬，青年会在大原海岸举行夏令会。王希天为会议执行干事。会上讨论了有关华工事宜，提出：“设法防止华工的困难，并谋其福利。”^⑥8月下旬，日本当局突然下令驱逐华工回国。留日学生总会、青年会、圣公会当即联合起来，各方奔走，拒绝此令。在强大的声势下，日本当局才不得不把驱逐华工回国之事暂缓下来。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旅日华工的情况，争取各界人士的广泛同情，9月5日，王希天亲自邀请留日学生总会、青年会、圣公会的代表，到华工居住最密集的地方——大岛町进行视察。代表们目睹华工的悲惨生活，深感有为华工设立事务所，组织华工团体之必要。为了避免日本当局刁难，王希天提议救济事业必须与日本宗教团体一起来办，否则很难实现。经过多方努力，又得到了日本朋友的帮助，9月21日，在大岛町正式成立了留日中华劳动同胞共济会。王希天被选为委员长。

在东京建立华工共济会并取得初步成效后，鉴于东京以外的地方尚无共济会，华工仍受外界的压迫，1923年春，他又亲往名古屋、大阪等地调查华工情况，为各地华工组织共济会，深受侨胞的欢迎。

鉴于旅日华工因疾病得不到及时医治而死亡者时有发

生，又决定建立治疗部，邀友人孙绍唐医士（即后来任吉林希天医院院长的孙宗堯）为华工诊病。为了使华工能学到文化知识，王还在共济会内设了教育部，在大岛町举办了一所华工补习学校。王希天的服务精神，得到了广大华工的拥护和赞扬。是年夏，王希天被选为中华国内布道会留日协进部部长。王希天除了为华工组织强有力的团体，设立治疗部、教育部、慰问部，召开布道会以外，还经常处理华工因讨债、禁工、斗殴等遭受压迫而引起的交涉问题，由于王的积极交涉和争取日本主持正义的友好人士的支持，问题常能获得合理解决。

为解决共济会的经费不足，他亲自向神户、横滨、大阪的华侨进行募捐。从1922年9月到1923年5月，就募集到一千九百六十五元。他自己也把薪金从一百元减少到三十元，生活十分艰苦。他经常穿着一套半旧的衣服，吃的是粗茶淡饭。他深入到华工中宣传爱国互助思想，有时顾不上吃饭，就以冷水、面包充饥。他常说：“并非自己吝啬，亦非无钱可使，实因有许多同胞衣食尚且不给，我等生活独丰，于理既为不合，于心亦何忍哉！”^①

为了宣传和开展华工救济事业，他把担任共济会长时所调查的侨日华工情形及会务报告编成《共济》一书出版。

由于王希天处处为华工谋利益，经常同日本资本家、工头进行斗争，日本反动分子把他视为眼中钉，诬为“排日巨魁”，并伺机报复。1923年8月，他曾被日本警察当局找借口拘留了六十八小时。

1923年9月1日上午11时55分东京突然发生强烈地震。

日本当局借口震后大火系“朝鲜人纵火”，以维护治安为名趁机进行大迫害、大搜捕，旅日华工也大批遭到迫害或被屠杀。王希天不顾个人安危，在发生地震的当天下午，冒着余震的危险，奔往各地慰问华工，并与一些好友商量救济办法。

大岛町离东京较远，地震一周后交通仍未恢复，王希天关心那里的华工，9日上午8时，独自骑车前往慰问，日本宪警却乘机将他逮捕，并于12日凌晨3时将他秘密杀害。

王希天被害的消息传出后，在国内外激起强烈的反响。各界人士纷纷起来抗议日本反动当局残害我侨胞的罪行。中国政府外交部亦派人赴日本调查王希天牺牲的情况。上海和吉林的报纸予以报导。10月22日，成立了留日各省同乡会联合对日残杀侨胞抗议后援会，并发表宣言，对日提出抗议。吉林省议会、工商总会、教育会、农会、律师会、学生会等团体在吉林丹桂茶园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为了纪念这位为华工救济事业而献身的志士，在他牺牲一周年时，吉林建立了希天医院；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了《王希天小史》。1926年6月25日，温州工界、学界同人在温州为王希天树立了“吉林义士王希天君纪念碑”。1974年1月15日，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根据国务院的批示，追认王希天为革命烈士。

注：

- ① 谢介眉：《王希天小史》，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5页。
- ② 许德珩：《纪念五四话北大——我与北大》，《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 ③ 王希天在天津进行爱国宣传时，邓颖超同志曾听过王的讲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2年邓颖超同周恩来总理到吉林省视察工作，接见王

希天的家属时，还谈及此事。

④ 思宇：《〈切磁集〉题记——怀念周恩来伯伯》，《吉林日报》1980年1月8日第4版。

⑤⑥ 同①，第20页。

⑦ 同①，第33页。

朱 惺 公

任嘉尧

朱惺公，原名松华，又名松庐。江苏丹阳人。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生。父朱紫阳，为当地中医内科医生。朱家境清寒，早岁辍学，仅读到小学毕业。十五岁时，由同乡介绍到上海浦东一家衣庄当学徒，办事勤恳，业余刻苦自学求进取，并从事写作。满师后，曾在老西门创设鼎新书店。1929年任杭州《浙江商报》编辑，曾在报端撰长篇小说《浙江潮》连载。一度创湖上出版社，并发刊《湖上之花》文艺月刊。^①

三十年代初，朱惺公到上海，先在《时代日报》任编辑。后来他到中国化学工业社广告课任职，曾为中国化学工业社编辑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刊。他设计的广告，常独具风格别出心裁。这期间，他为报刊写过不少评论文章，涉及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诸问题，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爱国报人对时弊的“率直、果敢、咒诅和慨叹”。^②“八一三”抗战军兴，苦战三月后我国军队西撤，上海沦为“孤岛”，与外地交通暂时隔绝，商业萧条，中国化学工业社紧缩机构，裁撤广告课，朱惺公失业。

朱惺公为谋生计，以其微小的资本，与友人合办机杼出版社。但书生从商，不善经营，加以当时市面萧条，不久便

宣告失败。出版社倒闭后，经济益趋困窘。朱一度在法租界法大马路（现名金陵东路）骑楼下摆一旧书摊，借以勉强糊口，生活更加穷困。曾寄一便条给中国化学工业社老同事林汝康云：“弟家八十八师为难，请兄接济。”初，林不明其意，嗣详“八十八”乃“米”字，盖朱家断粮难为无米之炊也，即送去米半担帮助渡过难关。^③

这件事为中国化学工业社经理李祖范所悉，前往探望，见家徒四壁，惟书籍数架而已。当时，朱有子名庸庸，才五岁。李询问为什么叫“庸庸”？朱引用苏东坡诗云“人人生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世。但愿我子愚又鲁，无灾无忧到公卿”，并慨叹说：“庸庸只求无灾无忧而已，公卿岂敢望也。”^④

李祖范鉴于朱惺公潦倒困顿，乃烦友人张似旭（时任上海中文《大美晚报》总经理，与李同为留美学生）介绍朱惺公于1938年2月进《大美晚报》任《夜光》副刊编辑。

饱经忧患的朱惺公，在国难当头、敌伪气焰咄咄逼人之际，主持《夜光》副刊编辑工作，是十分艰巨的。当时，孤岛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报》等大报无法出版，《文汇报》、《导报》、《每日译报》挂的是“英商”招牌，《大美报》、《大美晚报》、《华美晚报》挂的是“美商”招牌，才得免于日本新闻检查机构检查，继续宣传抗日爱国。敌伪则以威胁利诱、软硬兼施，恐吓信、警告信、手榴弹等恐怖手段交替运用。在这些魑魅魍魉面前，朱惺公不为所动，置生命于度外，坚持宣传抗日爱国。

他曾在《华美》杂志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一篇《首先做除奸工作》的文章，指出：要抱定宗旨，敌汽同仇，绝不

与汉奸们妥协合作。假使人人都能把汉奸当作最大敌人，而时时刻刻注意他们的行动，揭露他们的罪恶。“万夫所指”的汉奸们，自将陷入他们的绝路上去。

在1938年11月的《夜光》上，刊出了四期《菊花专辑》，以菊花喻抗战，朱惺公写道：“我歌颂菊花，我钦景菊花。我以为菊花生来一个战士。它挺起了孤傲的干枝，和西风战，和严霜战，和深秋时的细雨战，更和初冬时的冷雪战。抗战时期的国民，皆宜效法。”他还说：“菊花一名‘节花’，又名‘更生’。它真像现在的中国将从战斗中求取‘更生’。菊本作鞠。菊花的抗战精神是‘鞠躬尽瘁’，至死不屈的”。

1939年3月至4月的《夜光》版上，先后刊出了署名“杰”的《中日关系史参考》十八篇，论列中日二千余年来之关系，呼吁团结御侮；发表了《民族正气——中华民族英雄专辑》，介绍了宋末抗元的文天祥，扶明灭元的田兴，守城御倭侮的南水仙（明嘉靖年间无锡县令王其勤），抗清死守江阴的阎应元，誓不仕清的顾炎武等人，发扬古代民族英雄坚持大节的革命精神。还发表了《明代何以能平靖倭寇？》，以及史沫特莱的《悼无名战士》（新四军抗日战士）等文章，并连续刊载了《汉奸史话》，把历来的汉奸一个个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1939年4月6日，时逢清明，朱惺公撰四言长诗《祭抗战阵亡将士》，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日本侵略者必败的信念。这些激动人心的文章，对“孤岛”上海的广大读者来说，是很大的鼓舞，很大的鞭策；另一方面，这些宣传抗日的文章，对敌伪来说，真是芒刺在背，恨之入骨。于是，朱惺公一连接到了好几封恐吓信。那时，《文汇报》社早于1938

年4月22日被敌伪扔了手榴弹，炸死了营业部职员陈桐轩，现在眼看敌伪又要向朱下毒手了。朱惺公呢？大义凛然！他于1939年6月20日在《夜光》上刊出署名“惺公”的一篇文章，题为《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复所谓“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书》，该敌伪特工组织的恐吓信扬言：今后《夜光》上如再发现“反汪(精卫)”的文章，即将派员对朱执行“死刑”。朱惺公严正驳斥道：“这年头，到死能挺直脊梁，是难能可贵的。贵‘部’即能杀余一人，其如中国尚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何？余不屈服，亦不乞怜，余之所为，必为内心之所安、社会之同情、天理之可容！如天道不灭，正气犹存，余生为庸人，死为雄鬼，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矣。”⑤

有署名病怜作诗《生挽不怕死之惺公》，以资赞扬。朱本人于6月29日拈七绝一首以明志，有云：“懦夫畏死终须死，志士求仁几得仁？”充分反映了他大无畏的、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

朱惺公主编的《夜光》上，还刊载了陈剑魂的《改汪精卫诗》：

当时“慷慨歌燕市”，
曾羡“从容作楚囚”。
恨未“引刀成一快”，
终惭“不负少年头”。

残暴成性的敌伪黑手，对这位威武不能屈的新闻界战士，是决不会放过的。1939年8月30日下午4时20分，朱惺公甫从寓所外出，行未及十数步，在北河南路、天潼路附近，

有暴徒三人由路旁窜出，两人强执朱两臂，另一暴徒持手枪进行恫吓，朱面对强暴，仍岿然不为所动，英勇不屈，昂首自若，视死如归，终遭杀害。遇难时，年仅三十八岁。遗妻及子庸庸，当时庸庸只有七岁。^⑥

次日的《大美晚报》刊载朱惺公遇害的消息，并发表了社评《丧失一位同志》，指出：“朱先生为人勇敢，意志坚强，始终尽忠于报业，从未因着恐吓而稍受影响。朱先生是个真正的烈士。他曾竭力求作真实的中国人，并鼓励其读者，亦作真实的中国人。‘东亚新秩序’者杀了这位良善、能干、方正的人以后，决不能获得皈依者。”

“八一三”战争爆发后，朱惺公的遇难，是上海“孤岛”初期新闻工作者死得最壮烈的一位。在1939年9月1日的追悼会上，有两副挽联颇能说明朱的为人。上海文化界联谊会的挽联是：

读书明气节，挽士林之颓气，
严词斥叛徒，为民族而增光。

商务印书馆同人的挽联是：

诛伐群邪，挥笔如剑，
扶持正义，舍身成仁。

注：

- ① 据朱惺公的表弟龚天宇提供的书面材料。
- ② 朱惺公：《惺公评论集》，上海机杼出版社1933年8月出版，序言第5页。
- ③ 作者访问原中国化学工业社襄理林汝康笔录。
- ④ 访问原中国化学工业社经理李祖范笔录。
- ⑤ 见《大美晚报》1939年6月20日《夜光》版。
- ⑥ 见《大美晚报》1939年8月31日新闻版。

杨 铨

陈 崧

杨铨，谱名宏甫，字杏佛，1893年4月5日（清光绪十九年二月十九日）生于江西靖江县。幼时，由于家境贫困，随父移居扬州，后迁杭州。

杨铨六岁读私塾，接受四书五经的传统教育；稍长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当时中国正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杨铨的家庭也处于贫困和动荡之中，正如他在诗中所说：“兄弟四五人，零落已及半”，“饥来相驱逐，各向东西散”。^①国耻家难，使青少年时期的杨铨，受到了强烈刺激。在上海读书时，他结识了爱国青年张奚若、任鸿隽等，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国事，对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深为不满，向往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1910年，他参加了“南社”，并写了一些充满救国豪情的诗词。他为民族的苦难和清政府统治的黑暗而痛心疾首：“九地黄流注，叩苍穹，沉沉万象，当阙豺虎”；他对革命起义的失败和烈士的英勇牺牲感到无比悲愤：“眼覩英雄成白骨，好头颅未易苍生苦。心化血，血成雨！”^②他还高唱：“一朝狮梦醒，身与国魂还。”^③流露出他当时就已有以身许国的志向。

1911年8月，杨铨转到河北唐山路矿学堂，编入预科第六班。10月，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课，当同学们纷纷为躲

避战争跑回家乡时，杨铨却去武昌参加了革命，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杨铨遂赴南京，担任总统府秘书处收发组组长。1912年11月，杨铨与任鸿隽等，经稽勋局派往美国留学。到达美国后，先在康乃尔大学攻读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又转入哈佛大学学习工商管理、经济学和统计学。留学期间，他和中国同学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秉志、过探先、任鸿隽等创办了《科学》杂志。该杂志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杨铨为编辑部主任并经常执笔撰稿。不久，他们又组成“科学社”。这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科学团体，它对于普及科学知识、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推动我国的科学事业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1918年10月，杨铨由美归国，到达上海后曾和任鸿隽、周仁等准备筹办工厂，由于资金不足而作罢。在上海逗留期间，杨铨应中国环球学生会和南洋商业专门学校的邀请，先后发表题为《个人效率主义》、《科学的工商管理法》的演说，积极宣传用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振兴民族实业。1918年11月，通过友人介绍，杨铨前往汉阳铁厂任会计处成本科科长。

1920年夏，杨铨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科教授。不久该校改组为东南大学时，他出任工科主任，主要讲授工业管理课程。在此期间，他一面教课，一面利用课余，发表过一些涉及社会政治改革方面的文章，如《社会自救与中国政治之前途》、《思想界与中国今日之祸乱》、《代议制与中国之乱

源》、《中国近三十年之社会改造思想》、《从社会方面观察中国政治之前途》、《实业改造》、《教育革命与中国学术及政治前途》、《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等。他在这些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例如：对单纯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主张，提出了一些批评，并认为要使中国得救，必须做到政治上的改革同社会改革相结合，科学同革命相结合。他批判了当时对中国前途的两种错误论调。一种是主张把中国的“和平革新之望”完全寄于列强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另一种是断言中国民族富有的“同化力和调和性”，必能“同化西人，调和新旧”，以保持中国之独立。他指出：前一种“悲观”论调，只能“与虎谋皮”；后一种“乐观”论调，则是“画饼充饥”，所以“皆不可恃”。④

他在南京期间，同共产党员恽代英、侯绍裘、吴肃、宛希伊、黄觉新以及高尔松兄弟相往来。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到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讲课。他站在同情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努力探索和阐述劳动问题的产生及其意义、劳动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关系，指出不解决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劳动者问题，就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他口才出众，许多演说充满革命激情，受到听众的欢迎。

由于杨铨坚持革新，坚持进步，便深为东南大学中以校长郭秉文为首的守旧者的忌恨。1924年10月，郭秉文领导的校方以杨铨宣传“社会改造思想”为由不发聘书，杨铨被迫离开东南大学前往广州，投身于民主革命的实际斗争。11月，他奉命随同孙中山北上，启程前，孙中山委托他参加筹

备设立中央学术研究机关的起草计划工作。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杨铨被任命为“孙中山先生治丧筹备处”总干事，主持孙中山丧事的筹备工作。不久，杨铨全家从南京移居上海。从此他的战斗生涯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为了唤醒中国民族之自觉”，6月10日杨铨联合爱国志士创办了《民族日报》。他以高昂的爱国热情积极投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当时杨铨身患肺病，仍然不顾疲劳地工作，从撰写社论到编排校对，都亲自动手。在短短半月内，他撰写了二十余篇有战斗力的评论。他在发刊词中，号召人民组织起来，对英日帝国主义“实行经济绝交”，“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在文章中，他热情赞扬工人罢工、市民罢市，表现出“勇往直前的精神”，“大有气吞英日帝国主义的决心”。^⑤《民族日报》的宣传，有力地鼓舞了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并揭露了北洋军阀的媚外罪行。该报出版仅半月，便被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强令停刊。

同年9月，杨铨参加发起“中国济难会”。该会以“救济因爱国运动之被难者”为宗旨，他在该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中宣称：“中国民众为解放运动而死者，屡为社会所轻视，吾济难会的目的，在表同情于为民族谋解放之人，而予意尤当注意工农。”^⑥会上他被选为审查委员和募捐委员。中国济难会于1929年底改名为中国革命互济会。

1926年1月，上海还处于北洋军阀孙传芳统治下，为了进行北伐，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秘密成立，杨铨被选为执行委员，主持策应北伐军的工作。广东国民政府成立之

后，杨铨兼任上海政治分会委员。他虽曾参加戴季陶所发起的孙文主义学会上海分会，但是他不同意戴的分共主张，仍然坚持实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例如，1926年11月12日，他为《中国晚报》纪念孙中山诞辰专刊所写的文章中，强调“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不是分散的，国民革命的成功，惟有全国民众参加方能实现”，指出孙中山的革命是以“联合各阶级努力国民革命为起点，以消灭一切阶级制度实现大同世界为目的”。^⑦

1927年1月，正当国民党右派进行“分共”、反苏叫嚣的时候，杨铨挺身而出，借着庆祝元旦的机会，为《中南晚报》撰文，申言向苏俄学习革命经验。不久，中共中央在上海发动工人起义，杨铨当时作为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代表参加了国共联席会议，并同共产党人汪寿华、周恩来等相配合，积极支持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为此，巴黎《救国时报》曾在文章中，赞扬上海工人起义是“国共合作所造成的伟大胜利”，同时赞扬杨铨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在“调协国共关系上尽了很大的努力，实为有功于上海起义之人物”。^⑧起义胜利后，杨铨被选为上海临时政府的常务委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由于杨铨同情和支持了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被蒋介石集团撤销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的职务，不久又被诬指是共产党员。^⑨他们还指令上海市警备司令杨虎，趁杨铨去龙华总指挥部工作时，把他扣押，后经郭泰祺营救，方才获释。

1927年10月，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大学院，杨铨被任命为该院教育行政处主任。11月，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出

任院长，杨铨任秘书长，1928年4月，杨铨改任总干事，直到1933年6月。在协助蔡元培主持院务中，杨铨以工作成绩优异，“精悍而机警”，受到蔡元培的赞赏。^⑩

1930年，邓演达在宋庆龄的支持下，在沪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复兴中国革命，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继续孙中山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为职志”，^⑪创办《革命行动》杂志，并在十四个省市建立了基层组织，宣传平民革命，主张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积极开展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反动政府的斗争。杨铨秘密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与郑太朴、谢树英等一起负责中央直属区的工作，任务主要是争取一些国民党上层人士和教育界人士。^⑫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同声讨，纷纷举行游行示威、罢工罢市，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而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坚持镇压政策的南京政府，为了强化政权镇压革命人民，成立了“中华复兴社”、“力行社”等特务组织，制定了一系列反动法令，无数爱国青年和志士惨遭杀害。1931年11月29日，蒋介石下野前夕，下令将邓演达秘密枪杀于南京。杨铨闻讯后，立即报告宋庆龄，她对邓演达的死极为愤慨，当即用英文起草了一份宣言，谴责南京政府“早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谄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宣言经杨铨译成中文，由陈翰笙和谢树英二人冒着生命危险，连夜送往《申报》编辑部，第二天就发表了。^⑬邓演达的死，显然给了包括杨铨在内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强烈震动和深刻的教

育，杨铨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政权反人民的本质，因而以更大的勇气，不知疲倦不顾危险的战斗姿态，投入了反对国民党当局反动政策的斗争。

1932年夏秋之间，面对着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独裁，以及对投身于抗日救国爱国志士的残酷镇压，杨铨与宋庆龄、蔡元培等人一起，以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为反对南京政府实行法西斯独裁的武器，他们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下简称“同盟”）。杨铨为五名筹备委员之一。当筹备就绪之后，于12月18日发表宣言，29日蔡元培在上海华安大厦主持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宣言”指出，本同盟之目的：（一）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本同盟愿首先致力于大多数无名与不为社会注意之狱囚；（二）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国内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三）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同盟”设全国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由该委员会选举全国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执行机关。^⑩宋庆龄、蔡元培分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杨铨任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同时为全国临时执行委员会的七委员之一。次年，杨铨亲自主持上海和北平“同盟”分会的建立。自从“同盟”成立以后，杨铨以总干事的身份，不顾个人安危，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无数次斗争。

1932年12月17日，杨铨同宋庆龄等八位筹备委员打电报给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要求释放在北平被非法拘禁的许德珩等师生。

1933年1月上旬，在北平狱中的共产党员刘尊棋经中共秘密支部领导的同意，以“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政治犯的名义，写了两封信给宋庆龄。一封是揭露监狱对政治犯的非人虐待和残酷迫害，要求改善待遇；一封是要求释放政治犯，以便投身抗日斗争。“同盟”接到信后，于1月31日派杨铨借成立北平分会之机，至北平考察监狱。杨铨到北平后，先后考察了北平军事分会所属的反省院、军事执法处看守所、陆军监狱，详细询问了“犯人”的生活待遇情况，并同刘尊棋用英语谈了话，听取了他的控诉。杨铨并用同情的口吻说：

“我们知道你们无辜。我们一定促请当局改善你们的待遇。”2月1日“同盟”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宋庆龄签发了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政治犯的两封来信。2月2日和2月5日英文《大陆报》和《燕京报》，先后发表了这两封信。2月11日《中国论坛》（实际是“同盟”的机关报）2卷1期，全文发表了这两封信，同时发表了“同盟”为此而写的一篇《说明》，强烈呼吁“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这些材料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广泛注意。

杨铨对北平监狱的考察，激励了被拘押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刘澜涛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和薄一波、安子文、刘尊棋等被关押在所谓陆军反省院的共产党员，深深为他（指杨铨）的到来和视察所鼓舞。”^⑤

2月6日杨铨自北平回到上海向“同盟”总会报告赴北平视察经过，并向报界发表谈话，揭露北平监狱的黑暗状况，婉转地表示对被捕的共产党人的同情。他说：“此次调查之结果，综三处所拘押之政治犯，共达百五十余人。就中以反

省院为最多，达九十二人。所拘押之政治犯，都属共产嫌疑者，其间年龄都殊幼稚，十六龄至三十七龄不等。”他并指出：“狱内政治犯多未经司法手续”，“有不少冤抑者”，同时还揭露了狱中房舍陋隘、待遇恶劣的状况。杨铨对北平监狱的调查，为“同盟”展开要求释放政治犯、保障民权的斗争，提供了有力的事实根据。事实表明，在实际斗争中，杨铨在对待民主革命的问题上，立场越来越和共产党人接近。他在北平视察的时候，正值群众公祭李大钊同志，他参加了公祭的游行队伍，并亲自撰写挽联：“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犹在，那用吾辈哭先生。”^⑩这表现了他对共产主义先驱的真挚感情。

1933年3月，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推动之下，上海邮务工会、彩印工人反帝同盟、沪东印刷工人抗日会等三十多个团体组成了“国民御侮自救会”，参加的有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商人等各方面的抗日爱国人士。在成立大会上，宋庆龄号召团结抗日力量，“组织人民自卫团”一致抗日，反对国民党向中华苏维埃区域的进攻。杨铨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表演说，阐述反帝抗日与争取民权及释放政治犯运动之不可分离。^⑪

“同盟”为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于3月间专门组织了一个营救政治犯委员会，杨铨被选为委员。他还参加了以宋庆龄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南京向国民党政府以及司法部长罗文干提出立即释放罗登贤、余文化、陈赓、陈赓英等的要求。杨铨谴责南京政府在民族危机关头，不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而是“反其道而行之”。^⑫4月4日，杨铨

随同宋庆龄等代表“同盟”中央，到南京江苏第一模范监狱，探视了长期被关押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及其夫人。早在“同盟”成立之前，杨铨以个人的名义，随同宋庆龄组织过援救牛兰委员会，并向国民党政政府抗议，要求释放牛兰夫妇。由于南京政府不顾国内外进步人士的抗议，牛兰夫妇一直被关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才被释放。

1933年4月下旬，杨铨还为营救丁玲和潘梓年四处调查，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欺骗伎俩，并到租界奔走交涉，发动上海文艺界人士联名打电报向国民党政政府提出抗议。

1933年5月13日，杨铨和“同盟”执行委员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等一起前往德国上海领事馆递抗议书，抗议德国法西斯政权对德国人民的迫害。抗议书既是声讨希特勒，也是抨击蒋介石政权。蒋介石得知此事后，曾经大发雷霆。

上述繁忙的活动，表明杨铨作为一个爱国的国民党人士，对于国民党反动派践踏民权、残酷镇压革命者的罪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营救被非法逮捕的共产党员和民主战士，他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他的这些活动，是对于进步力量有力的支持和鼓舞，当然也就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仇恨。为了破坏“同盟”，国民党特务不断写信给宋庆龄和杨铨等“同盟”主持人进行威胁，甚至把子弹头放在信封内恐吓杨铨。特务还曾印发三百张照片，并悬赏以求暗杀杨铨。1933年6月18日晨，杨铨携带长子杨小佛由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乘车外出，车刚开出大门，突遭潜伏

路旁的特务枪击。杨铨伏在儿子身上，自己身中数弹，司机重伤，杨小佛也受轻伤。杨铨被送到医院几分钟后，就因伤重逝世，年仅四十岁。

注

- ① 郑逸梅编著：《南社丛谈》第443页。
- ② 柳亚子编：《南社诗集》第13集。
- ③ 同①，第444页。
- ④ 《社会自救与中国政治之前途》，载《杨杏佛文存》第3—4页。
- ⑤ 《对于上海市民大会的感想》，载《杨杏佛文存》第193页。
- ⑥ 《申报》1926年1月18日《本埠增刊》（一）。
- ⑦ 《中山先生几个伟大的观念》，载《杨杏佛文存》第39页。
- ⑧ 《救国时报》1937年3月21日。
- ⑨ 《申报》1927年4月15日，杨铨所登启事。
- ⑩ 《蔡元培选集》第335页。
- ⑪ 季方为《邓演达文集》所写《序言》，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⑫ 政协江苏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史料选辑》第二辑。
- ⑬ 据陈翰笙、谢树英口述。另参《申报》1931年12月20日。
- ⑭ 陈漱渝著：《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第15、20—21页。
- ⑮ 《纪念杨杏佛，学习杨杏佛》，载《文汇报》1983年9月10日。
- ⑯ 杨小佛：《杨杏佛事略》，载《人物》1982年第1期。
- ⑰ 《中国论坛》第2卷第3期，1933年3月27日。
- ⑱ 《吴凯声回忆》，载上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竺可桢

阎 铁

竺可桢，字藕舫，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1890年3月7日（清光绪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出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今属上虞县）。同胞六人，他最年幼。在本镇天华府小学读书时，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①，为探求救国救民的道理，1905年去上海入澄衷学堂读书，1909年考进唐山路矿学堂（唐山铁道学院前身）攻土木工程，学习勤奋，成绩冠全班。他认为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发展农业是治国之本。1910年考取公费留美，入伊利诺斯大学农学院学习。1913年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攻读气象学。1916年发表第一篇气象学论文，之后在美国气象、地理等刊物上多次发表关于雨量 and 台风方面的文章。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②，同年秋回国，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讲授地理和气象学。1920年转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东南大学，即南京大学前身）与柳诒徵共同主持史地学部，讲授地学通论、气象学、世界气候、地质学等课程。我国最早的一批近代地理学家如胡焕庸、张其昀等和气象学家，多属这一时期该校的学生。1925年竺受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聘任编辑，一年后又应邀赴天津南开大学教书。1927年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邀请，赴南京筹建中央气象研究所，次年该所建成。

竺担任所长。在此之前，中国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气象事业，沿海和长江下游虽有一些气象所，多半是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海关所设立的，主要为外国资本家在华航运服务，气象资料和台风警报，全为外国人所办的徐家汇天文台所掌握。

在旧中国办研究所，经费短缺，人员不足，困难重重。竺可桢经过七八年的苦心经营，到抗战前夕气象研究所已有四十名工作人员，并在各省设置四十多个气象站和一百多个雨量站，先后开展了高空探测，无线电气象广播，天气预报等工作，出版了中国气象资料，发表了许多研究论文，为我国的气象学奠定了基础。

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同时仍兼任气象所长和中央研究院院士。他锐意整顿浙大，废除前任校长强制推行的军训制度，增强民主和学术空气。他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③，四处聘请有造诣的教授，还尽量充实图书仪器。抗日战争爆发，他率领师生向内地转移，两年中四迁校址，最后在贵州遵义和湄潭定居下来。每到一地，即使只有两三个月的间歇，他仍然坚持科研和教学活动。

竺可桢艰苦创业，提倡“学理之研究重于物质之享受”^④。贵州物质条件十分困难，就以炭炉代酒精灯，土制瓷杯作培养皿，祠堂、庙宇权充试验室。尽管这样艰苦，科研与教学却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理学院的数学系和生物系，工学院、农学院、文学院和史地研究室，都有相当数量较高水平的论文和专著在国内外发表。1944年4月和10月，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李约瑟曾两次访问浙大，对浙大师生在物资设备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教学与科研居然获得了可观的成

果，学术风气也颇浓厚，表示惊叹。他在为浙大师生作“战时与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的讲演时，称赞浙大为“东方的剑桥”^⑤。1945年6月，浙大生物学教授谈家桢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中国西南果蝇之调查及分类”报告，美国学者以中国抗战八年尚能作出如此研究，无不惊讶^⑥。

浙大在抗战胜利前夕，已拥有六院、二十五系、四个研究所，另有一个拥有八个系的龙泉分校。学生比抗战初期增长了四倍^⑦。由于竺可桢苦心经营，浙大逐渐成为国内著名的高等院校之一，对抗战时期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优异的贡献。

竺可桢从年轻时候就抱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可是现实总是和他的愿望相左。国民党当局对文化机关千方百计地加强控制，对进步师生残酷迫害。竺可桢为了主持正义，珍惜人才，对受迫害的进步师生，总是设法给予维护。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前夕，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慌忙用飞机接他的家眷离港，连哈巴狗都带上，而对滞留香港的大批文化界和其他知名人士却弃而不顾。再加上平时人民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于是爆发了反对孔祥熙的运动。当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首先发难，接着在遵义浙大学生也举行示威游行。为防止国民党当局开枪镇压，竺可桢亲自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卫护学生。

1945年3月5日凌晨，浙大教授费巩在重庆江边码头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竺可桢得知费巩失踪消息后，立即四处奔走，打探营救，竭尽了全力。他的日记中有关营救费巩的记载，就有七八十处之多。

1947年5月，国民党统治区掀起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国民党特务为此大肆逮捕进步学生。这年10月24日，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捕，29日被杀死在浙江保安司令部狱中。国民党反动派为掩盖罪行，伪称于子三是自杀身死。竺可桢闻讯赶往保安司令部察看，反动当局要他证明于系自杀，他严辞拒绝，愤然离去^⑧。接着反动当局在“御用”的《华南日报》上刊登“于子三畏罪自杀”的歪曲报道，竺可桢为说明事实真相，11月4日亲到南京，向《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于生致死主要凶器及创口之真象，均尚需调查，其死因或将成为千古疑案”。《申报》记者问：“于子三是否自杀？”竺答：“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他的谈话登报后，引起很大反响。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要竺可桢在报上更正。竺斩钉截铁地回答：“报载是事实，我无法更正。”^⑨之后，一个“反迫害于子三运动”，在蒋管区内兴起。

解放前夕，国民党教育部曾一再催促竺可桢去台湾，后来又送来飞机票，他毅然拒绝，只身潜赴上海。为躲避国民党特务追踪，他机警地躲在上海一处实验室里，直到解放。

1949年7月竺可桢接到周恩来的邀请，立即赶赴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7月19日周恩来设宴招待竺可桢和其他几位科学家，共商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大计。9月他出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对发展科学事业提出建议，被大会采纳并在《共同纲领》第四十三条中有所说明。同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竺可桢被任命为副院长。他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至四届代表，人大常委会委

员。他还是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主任，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中德友好协会会长。他虽然社会活动繁忙，仍然不遗余力地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竺可桢从新旧社会对比和革命实践中，逐渐加深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认识，1962年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的时候说：“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⑩这是一位终生孜孜不倦地从事科学事业、执著地追求真理的学者满怀欣慰的自白。郭沫若为竺可桢入党写了祝贺词：“雪里送来炭火，炭红，似熔钢。老当益壮高山仰，独力更生榜样。”^⑪

竺可桢致力的研究工作，跨越不少学科，在气象学、地理学、自然科学史方面，均有卓越贡献，是中国气象学、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他对教育、科研组织和科学普及工作的贡献也很大。

他是我国高等学校中讲授近代地理学的先驱者，他创办的东南大学地学系^⑫，是我国最早具备近代地理教学内容和教学设备的地理系。他编的《地学通论》是我国最早的近代地理学教科书。他在浙大建立的史地系的地理组，培养了不少人才。解放后他又亲自主持和筹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我国地理的综合考察、自然区划、国家大地图集的编纂，以及历次地理学规划，都是在他领导或直接指导下进行的。

竺可桢认为地理学是研究现代地面环境的科学，应着重研究“现代地球表面的岩石圈、水圈、气圈和人类的相互作用”，应向实验科学方向发展，将了解自然与利用改造自然

结合起来，特别强调地理学要为农业服务。

竺可桢用了很大的精力领导和指导我国自然资源的综合考察工作。他根据国家的需要，先后组织了华南热带生物资源、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西北沙漠、西南南水北调地区以及黑龙江、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西藏等省、区的综合考察。此外，对海洋综合调查和冰川、盐湖的考察也积累了系统资料，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参考数据。

竺可桢一生著述甚丰，公开发表的文章为 272 篇，还有大量的手稿、油印稿、书信和日记。

竺可桢是我国最早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台风的人。1918 年在美国发表《台风中心若干新事实》，提出台风眼中温度剧升，是由于有下沉气流。1924 年发表的《远东台风新分类》和 1925 年发表的《台风的源地与转向》，分析了 1904 年至 1925 年 247 次台风的季节分配源地、运动途径及其转向地点，并提出新的台风分类法，将台风分成中国、日本、印支、菲律宾、太平洋、南海^⑩等六个类型。

关于季风研究，1933 年在第五届太平洋学术会议上，他提出《中国气流之运行》一文，总结我国三十年代气象台站网资料，阐述我国天气与气候的变化规律。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东亚大气环流的研究。1934 年发表《东南亚季风与中国雨量》一文，讨论季风成因，指出夏季东南季风强盛时，长江流域主涝、华北主旱的规律。这篇文章为我国长期天气预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

关于气象和区域气候，1922 年发表《南京之气候》，1937 年发表《杭州之气候》，1936 年出版《中国气象概论》，系统

地概述了当时所掌握的气象资料，对中国气象作了全面论述并对高空气候作了分析。同年发表的《气候与人类及其他生物关系》，是他着重研究气候与人类和生产的方面的重要论述。解放后，他更加重视农业气象和气候的研究工作，培育人才，设立机构。1963年发表《论我国气候若干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着重论述光能在作物生产量形成中的作用，分析了温度、降水对粮食作物的影响，从而指出我国农业生产有很大潜力以及可采取的途径。这篇论文综合分析气候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为科学种田提供了依据，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许。

物候是竺可桢很重视的学科之一。他每天亲自观测、记录物候与天气，特别注意物候在农业中的作用，并注意搜集古代有关物候的文献。1931年发表《论新月令》一文，分析1921年至1931年南京物候记录，论证按物候安排农事比依据二十四节气更为适宜，主张以物候观测为基础，制订新农历。1934年至1937年他开始建立物候观测网，“七七”事变后中辍。解放后，从1950年至1973年，连续二十四年，他每天观测物候，从未间断。在他倡导下，中国科学院地理所、植物所和北京植物园，于1962年共同组织全国物候网，观测记录一直在正常进行。他的《物候学》1963年出版，1973年科学出版社修订重版，是一本非常有实用价值的科普读物。

关于气候变迁，他对古今中外有关的气候资料广征博采，以新的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形成完整体系。1925年曾发表《南宋时代我国气候的揣测》，在三十年代又多次发表中国气候变迁的论文，分析我国两千年的水旱资料。他长期注

意搜集世界历史上各个时期气候变迁的资料，从动植物分布、冰川进退、雪线升降、河流湖泊冻结等变化中，研究从古迄今的气候变迁，注意考古和气象仪器观测记录中所获得的资料。1961年发表〈历史时代世界气候波动〉一文，阐述二十世纪上半期气候变暖的事实，追溯整个历史时期以至第四纪各国水旱寒暖的历程，以中国历史上的寒冬与欧洲记录相比较，发现十七世纪后半期长江下游寒冷期与欧洲“小冰期”是一致的。1966年写成〈我国五千年气候变迁初步研究〉（英文稿），后来的中文稿于1972年发表在〈考古学报〉，英文稿1973年发表于〈中国科学〉上。这一著作，立论严谨、博大精深，深受中外学术界推崇，美、英、苏、日等国的书刊竞相介绍。日本气象学家古野正敏说：“在气候学的历史中，竺可桢起了巨大作用”，“经过半个世纪到今天，他所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前面”^⑭。英国〈自然周刊〉说：“竺的论点是特别有说服力的，着重说明了气候变迁的途径。西方气象学家无疑将为能获得这篇综合性研究文章感到高兴。”^⑮这篇水平很高的著作，是他八十二岁时发表的。

在自然科学史方面，自二十年代开始，他先后发表过三十多篇文章，涉及天文、地理、气象和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1944年发表〈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曾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好评。1926年发表〈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及记述〉，全面评述了沈括的成就。1942年发表〈徐霞客之时代〉中指出：“欲求霞客之以求知而探险者，在欧洲并世盖无人焉。”^⑯竺可桢对我国另一位科学家徐光启也评价极

高，认为徐超过了培根。1962年、1963年竺可桢写过专门纪念徐光启的文章^⑦。

竺可桢治学谨严，提倡“求是”。他强调科学实验，注重亲临第一线观测试验，取得第一手资料。1965年8月，他已75岁高龄，放弃去北戴河休假，却到甘肃河西走廊考察农业区划，先后到兰州、酒泉、玉门、安西、敦煌等地，每日行程二百余公里，完成他一生最后一次野外考察。

竺可桢每天必写日记，就在出国参加会议或在野外考察十分繁忙劳累的情况下，都坚持不断。他1936年以前的日记，已在抗日战争中散失。自1936年1月1日至1974年2月5日，共三十八年零三十六天的日记，全部保存下来，竟无一日间断，共八百余万字。天气与物候是他每日必记的内容，其他如中外科研的新动向、新观点、新问题以及其他大事，无不扼要记载。这是竺可桢为后人留下的非常有价值的科学遗产之一。

1974年2月6日，竺可桢病逝于北京。

注：

- ① 蔡元培、秋瑾、徐锡麟、章太炎等都是浙江人，他们的民主革命思想对当地教育界有很大的影响。
- ② 当时哈佛大学不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凡研究生毕业合格者给哲学博士学位。
- ③ 1938年4月25日就职演辞《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竺可桢传》，浙大校史编辑室编著（供内部参考用），第68页。
- ④ 《竺可桢传》，第198页。
- ⑤ 同④，第194—195页。
- ⑥ 同④，第199页。
- ⑦ 同④，第200页。

- ⑧ 同④，第243页。
- ⑨ 同④，第246页。
- ⑩ 《竺可桢日记》，现存中国科学院《竺可桢文集》编辑小组。
- ⑪ 《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卷首第5页。
- ⑫ 地学系后分为地理、大气、地质三个系。
- ⑬ 南海台风原文为：China Sea Typhoon.
- ⑭⑮ 同⑪，第xii页。
- ⑯⑰ 同⑪，第xiv页。

叶 企 孙

阎 铁

中国优秀的物理学家、教育家叶企孙（原名叶鸿眷），1898年7月16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生于上海。父名叶景澐，清末举人，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曾赴日考察教育，担任过北京清华学校国文教员，上海教育会会长，江苏第三中学校长等职。

叶企孙幼时在上海读书，1913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1918年去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1920年得学士学位。同年入哈佛大学研究物理，1922年得硕士学位，1923年得博士学位。以后又去德、法考察半年。1924年3月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任物理系教授，讲授力学、电子论、近代物理学等课程。

1925年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叶企孙应聘到清华建立物理系。1926年开始，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1930年曾去德国休假一年，研究量子力学。在清华他曾讲授普通物理、力学、热力学、分子物理、光学等课程。

抗战爆发后，清华内迁。1938年11月至1941年8月，叶企孙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担任物理系教授。清华大学单独在昆明办有金属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航空研究所、农业研究所和社会调查研究所，叶企孙为研究所委员会主席。

1941年9月，叶调任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当时朱家骅代理院长，由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1943年叶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的评议员。同年9月回西南联大任原职，1945年并兼理学院院长。

1946年10月清华复校迁回北平，叶仍任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北平解放后，1949年5月叶企孙兼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2年高等院校改革，清华物理系并入北京大学，叶企孙担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北大物理系金属物理及磁学教研室主任和物理学教授。1950年后，他还兼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常务委员、应用物理所和近代物理所的学术委员、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和研究员等职务。

1949年他出席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政协委员。他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为了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叶企孙早在1924年就参加中国科学社，担任理事和《科学杂志》编辑。1932年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叶为发起人之一，他曾担任第一届常务理事、副会长，第二届会长。1946年又一次当选常务理事和理事长（会长改名理事长）。1950年担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叶企孙对中国物理学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青年时期留学美国时，对物理学研究就有了突出成就。他和杜安（W.Duane）及帕默尔（H.H.Palmer）合作的《普朗克常数 h

值的测定》一文，发表于1921年美国科学院院报和美国光学学会学报。普朗克 (M. Planck) 最早测定 h 值为 6.548×10^{-27} 尔格秒。其后他人屡次有所修订，而叶等人的测定值是 $(6.556 \pm 0.009) \times 10^{-27}$ 尔格秒。这个测定值在其后十余年中曾为大家所采用。

他的第二个重要学术成就，是流体静压对铁、镍、钴的磁导率的影响。这项研究工作是他在哈佛大学独立完成的，因此获得博士学位，论文载于1925年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报。高压对铁、镍的磁化影响的研究，日本科学家在十九世纪末便开始了，当时在实验室内只能达到二百多个大气压，效应不显著。叶企孙一面改进测量方法，一面使用流体静压，使压力增高到一万二千个大气压。对此他作了理论分析，虽不能与实验数据定量符合，但得到了定性解释。他的这项研究，在布里奇曼 (P. W. Bridgman) 所著的《高压物理学》中，有较详的评述。

叶企孙是中国物理学界研究磁学的第一人，他留学回国后，引导施汝为研究这项工作，送施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磁学。至今我国磁学这一领域已经人才辈出，成果累累。

叶对自然科学史研究造诣也很深。他精通我国天文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等，对阿拉伯天文学史也有研究。

叶企孙最大的贡献是在物理学教学方面，他培养了多位年轻优秀的物理学人才。他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后工作五十余年，一直没有离开教育岗位，并始终坚持授课和指导研究生。他不仅讲授物理学方面许多课程，而且始终保持敏锐、活跃的学术思想。清华物理系初创时，他注

意建立实验室，提倡理论与实验并重、教育与科研并重。他和郑衍芬合编的《初级物理实验》，成为当时大学普通物理实验教材。

他爱护青年，培养后进，对于那些踏实努力搞研究作学问的青年人，时常给予亲切的鼓励，而且大胆使用，不次擢拔。华罗庚由一个抄写员提拔为大学助教就是他的建议。1925年创建清华物理系时，他先后聘请了一批崭露头角的年轻物理学家，如萨本栋、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霍秉权等担任教授，使清华物理系在几年之中达到当时的国际水平。他所领导的理学院其他各系的学术水平，也居于全国最先进的行列。

他因人施教，善于识别人才。赵忠尧、王淦昌原来都是学化学的，叶建议他们转学物理，后来都成了有名的物理学家。

清华物理系（1925—1937）在叶企孙和他的同事努力下，培养出很多人才，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国物理学界的著名专家。如王淦昌、钱三强、施士源、周同庆、彭桓武、王竹溪、何泽慧、王大珩、龚祖同、赵九章、傅承义、钱伟长等。在西南联大时期，他培养的学生则有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陈篪等。

1925年，清华留美公费生改为面向全国招考，叶企孙主持这项工作。他从推进我国科学事业发展出发，设立留学生的名额不限于物理方面，其他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各学科都给予通盘考虑。他特别关注建设需要而国内基础又薄弱的学科（如地球物理、应用光学、弹道学、物理冶金学等），

为之设立一定数量的名额。他办事公正，每次设立名额和主持招考，从不徇私。他不仅关心清华、西南联大、北大等他执教的学生，也同样关心全国其他大学的青年，他曾鼓励大同大学毕业的钱临照投考公费留英。他对青年既关心备至，又严格要求。他招收研究生，总是严格按照考生成绩，从不徇情照顾。他治学严谨，为研究生改论文总是字斟句酌，数据都要重新算过。

叶企孙富于正义感，热爱祖国。年轻时他痛恨帝国主义的压迫，抱着科学救国思想出国学习科学技术。“七七”事变后，他因伤寒病在天津休息，曾积极支持清华学生援助八路军的抗日救亡活动。有一批理工科大学生秘密制造炸药，运往冀中抗日根据地，叶积极给予技术和经费资助，还为他们到香港活动经费。^①1945年国民党当局在昆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叶企孙义愤填膺，他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参加西南联大教授会议，声讨制造惨案的反动派。

叶一生未婚，无家庭负担。全部精力都用在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上。他个人生活简朴，却乐于助人，除书籍外，别无积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横遭“四人帮”的迫害，系狱数年，1973年7月13日因病逝世。“四人帮”被打倒后，方获彻底昭雪。北京大学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悼念他一生为发展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所作的卓越贡献。

注。

- ① 蔡元培《杂记》手稿记载：“叶企孙到香港，谈及平津理科大学生在天津制造炸药，轰炸敌军通过的桥梁有成效。第一批经费借用清华大学备用公款万余元，已用罄，需别筹。拟往访宋庆龄先生，请作函介绍。当即写一致孙夫人函，由企孙携去。”（见高平叔编著的《蔡元培年谱》第104页）

（本文的撰写，承叶铭汉教授提供许多宝贵资料，钱昌照、傅承义两位教授也给予协助，特致感谢。）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叶企孙档案（现存北大档案科）。
- ② 钱昌照：《纪念物理学界的老前辈叶企孙先生》，《物理》杂志1982年第4期。
- ③ 王竹溪：《深切怀念叶企孙先生》。
- ④ 叶铭汉教授提供的有关材料。

熊 庆 来

夏光辅

熊庆来，字迪之，1893年10月20日（清光绪十九年九月十一日）生于云南省弥勒县。父亲熊国栋在清朝末年曾任云南省巧家县和赵州县“训导”（主管教育）。1906年熊庆来考入云南方言学堂（后改为云南高等学堂）法文班。他学习努力，成绩优良，1913年考取公费赴法国巴黎矿业学校学习，梦想学成回国，开发宝藏，振兴祖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巴黎矿校关闭，他改学理科。自1914年至1920年的七年间，他先后在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Grenoble）、巴黎大学、蒙彼利埃大学（Montpellier）、马赛大学等校读书，获得理科硕士学位。1921年初归国。

二十年代的中国，科学文化十分落后，熊庆来立志献身科学教育事业。1921年春天，他在云南工业学校和路政学校任数理教员。这年秋天，他受聘到南京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创办算学系。1926年又受聘到北京清华大学创办算学系。中国数学在古代曾处于世界的先进地位，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的科学技术蓬勃发展，中国则在封建制度的束缚下停滞不前。熊庆来立志改变中国的数学落后面貌，在教学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程设置等方面，引进西方现代数学体系，是在中国传播现代数学的先驱者之一。

熊庆来在南京东南大学和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期间，先后讲授球面三角、微积分、方程论、高等算学分析、复变函数论、实变函数论、微分方程论、偏微分方程论、变分法、力学等十余门课。他所讲课程，皆自编讲义，其中〈高等算学分析〉讲义被选入当时的大学丛书。他十分注意选拔和培养人才。在东南大学时，他曾卖掉自己的皮袍，资助学生出国留学。学生严济慈学习勤奋，成绩优秀，但经济困难，熊庆来曾在经济上给予资助。在清华大学时，熊庆来在科学杂志上看到华罗庚的论文，发现他很有数学才能，便破格把这个只有初中毕业学历的青年店员，聘请到清华大学算学系工作，使华罗庚获得深造的机会，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数学家。熊庆来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后来在云南大学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了大批科学人才。现今我国不少著名的科学家，都是他早年的学生。他晚年曾回顾说：“那时可注意的是，优秀同学不少，平生引以为幸者，每得与当时英才聚于一堂，因之我的教学工作颇受其鼓舞。”^①

熊庆来在清华大学期间，还致力于数学研究工作。1930年创办了清华大学算学系研究部，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的数学研究机构，由熊庆来、孙光远、杨武之三教授专任指导，北京大学的江泽涵教授兼任指导，陈省身、吴大任、庄圻泰等是当时的研究生，华罗庚也参加了研究工作。熊庆来后来回忆说：“虽然组织简单，研究空气则甚浓厚”^②。研究成果大多载于当时的清华大学理科报告。

1932年，世界数学会议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熊庆来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会议。会后，他到法国巴黎，进庞加烈研究

所研究函数论。经近两年专心研究，写出论文《关于整函数与无穷级的亚纯函数》。1933年，因这篇论文的科学水平，熊庆来获得法国国家理科博士学位。熊庆来定义的无穷级，被国际数学界称为熊氏无穷级，又称熊氏定理。

1934年熊庆来回国，仍在清华大学算学系任主任和教授。1936年，熊庆来参加创办中国第一份数学学报，并任编辑委员。

1937年8月，熊庆来由北平回到故乡昆明，担任云南大学校长，直到1949年夏天。在这十二年间，云南大学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云南大学的前身是1922年创办的私立东陆大学。1934年改为省立云南大学。熊庆来到任后，取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批准，于1938年改为国立云南大学。熊庆来除要求政府增拨经费外，还向各界人士募捐，用以扩建校舍，增置教学设备，增购图书资料。“映秋院”、“澄农馆”等就是募集捐款修建的。抗战期间大批学者云集西南，他凭借自己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声望，聘请了许多著名学者到云南大学任教。从1937年到1946年的十年间，教师由四十九人增为二百三十七人，其中教授、副教授由三十八人增为一百二十六人。无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有专家作为教学和科研的骨干，使云南大学的教学质量和科学水平有了显著提高。随着师资力量增长，熊庆来逐步把云南大学的规模扩大，由原来的文法、理工两个学院，扩充为文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五个学院，下设十八个系，另有三个专修科和三个选修班。云南大学成为学科比较齐全的综合大学。学生人数由1936年的302人增为1946年的858人。地处西

南边疆的云南省，有这样规模的一所大学，加上北京、南开、清华三大学南迁昆明后合办的“西南联合大学”，大大改变了云南的文化落后面貌。

熊庆来任云南大学校长的十二年，正是他在教学、研究上风华正茂之时，但教学行政工作占用了大量时间，他“每盼有机会重理已经荒辍的旧业，从事研究工作。”^③在1949年夏天，离开了云南大学。

不久，熊庆来赴法国巴黎参加国际教育会议。会后，他留居巴黎，想集中精力从事数学研究，以补十二年脱离学术研究之憾。第二年不幸患脑溢血病，致右半身瘫痪。他以病残的身体在巴黎过着清苦的生活。病势稍退，他就用左手重新学习写字，继续研究函数论。他的艰苦奋斗精神，深受法国数学家的敬佩。1956年，他被法国数学界研究亚纯函数的一个学派推选，执笔撰写了《关于亚纯函数及代数体函数，奈望利纳的一个定理的推广》一书，作为法国数学丛书《Memorial des Science Mathematiques》中的一本出版。为数学界所称道。

在此期间，熊庆来没有忘记尽力为祖国效劳。他出国前夕，云南大学曾筹集了一点外汇经费，委托他在国外购买科技图书。尽管他只身异国，病魔缠身，经济困难，生活清苦，但这笔钱分文没有动用，如数在巴黎购买了图书，邮寄回解放后的云南大学。

熊庆来第三次旅居法国不久，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1953年，周总理曾函邀熊庆来回国，他因病体未愈，行走困难，无法启程。在法国以病残

之身，从事学术研究，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他深深感到“工作只为个人生活，久留异国，殊觉无甚意义”^④。希望返回祖国，发挥所长。在此期间，台湾当局以陈立夫等人出面写信邀他去台湾，熊庆来坚决拒绝。1956年，周总理再度邀他回国，这时他正紧张地为法国数学丛书撰稿，决定稿成即启程回国，并通过多种途径表达了对祖国的思念和回国的决心。1957年6月，熊庆来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北京。他满腔热情地表示“愿在社会主义的光芒中尽瘁于祖国的学术建设事业”^⑤。

熊庆来回国后，按照他的志愿，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当研究员，从事函数论研究，他以“不知老之已至”的精神^⑥，与病魔搏斗，撰写出许多有价值的科学论文。1957年至1965年的八年间，他发表科学论文二十余篇，占他一生所写论文的三分之一强。这些论文分别刊载于《科学纪录》、《中国科学》、《数学学报》等杂志。应约为外国数学期刊撰写了三篇论文，一篇载于罗马尼亚《数学汇刊》，两篇刊于法国《数学学报》。其中一篇是法国维腊院士邀其为巴黎大学教授夏尼野院士的五十周年工作纪念所写的。这八年间，他还指导青年研究人员完成研究论文二十多篇。

1963年是熊庆来的七十寿辰。北京大学数学系庄圻泰教授在《数学进展》杂志上发表题为《数学家熊庆来先生》的祝贺文章，系统地总结介绍了熊庆来1963年以前所写五十余篇“有创造性的论文”的成就。他说：“在奈望利纳所建立的亚纯函数学理方面，米约和熊先生各获得一些关于函数结合其导数的基本不等式。而熊先生所得者，可用以解决米约所

不能解决的问题。此外，熊先生考虑函数结合其原函数（即积分）的问题，而获得若干基本不等式，并据以解决亏量唯一性等问题。熊先生所得某些不等式被认为是这方面最深入的结果。”“孟德耳（Montel）的正规族理论，在数学各方面起重要作用。熊先生得一新法，简化了米朗达（Miranda）定理，达到所期待之精密度。”“在正规族理论中，熊先生获得几个新的简单的正规性定则。”“关于代数体函数第二基本定理，伐理隆仅指示可以用一个恒等式得出，但未得出证明。熊先生补上了证明，并结合导数将其推广。此外，熊先生曾指出亚纯函数无穷级概念可推广于代数体函数。巴格纳斯所证明关于代数体函数之一个普遍定理，即利用熊先生所定义之无穷级所获得。”“熊先生对单位圆内全纯函数及亚纯函数亦有所贡献”^⑦。

熊庆来还先后编写了十二部高等学校数学讲义和教科书，大多用于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有些则出版发行。他还写了一些数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介绍性论文，刊登于报刊杂志。

在数学研究所工作期间，熊庆来多次参加全国性的学术活动，发表卓有见解的学术讲演，提出研究方向，受到全国数学工作者尊敬。1961年全国数学会议后，熊庆来倡导组成北京地区的复变函数讨论会。这个科学集会每两周在熊的寓所举行一次，一直持续到1964年，有力地推动了函数论研究的发展，并培养了一批青年研究工作者。

熊庆来在年老病残的情况下，除自己努力进行研究工作外，还积极培养青年研究人员。数学界的后起之秀杨乐、张

广厚等人，就是熊庆来六十年代培养的研究生。

1959年，熊庆来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64年又被选为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69年2月3日，熊庆来因病去世。

注：

①②⑤ 《熊庆来先生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欢迎会上的讲话》，《数学进展》1967年第3卷第4期。

③④⑥ 熊庆来：《回到祖国的七年》。

⑦ 《数学进展》1963年第6期。

章 鸿 钊

李建初

章鸿钊，号演群，又号爱存，笔名半粟，是中国地质事业的拓荒人。公元1877年3月11日（清光绪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出生于浙江省湖州（今吴兴县）城南荻港一个清贫的书香门第，父亲章乃吉是塾师，叔父是光绪己丑科进士。

章鸿钊从五岁起，随父亲读书，十二岁时跟随族叔学习作文。他勤奋好学，攻读文史之外，还自学数学，遍览中国算术书籍，1897年编成《综合算草》。次年考取秀才，为了维持家庭生计，曾教了两年家塾，1901年入湖州安定书院和爱山书院读书，秋末，他以第一名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东文学堂。1903年秋东文学堂停办，他随学堂监督（校长）罗振玉和日籍教员藤田丰八去广州，在两广督署学务处襄办编辑教科书事务。1904年初，章鸿钊被广东当局选拔到日本留学。

章鸿钊和同时代的许多爱国志士一样，目睹清政权的腐败，立志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欲以科学救国，振兴中华。初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预备班，一年后转入理科，先学数学，后改学农学，1908年毕业后，入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院地质学科，受业于地质学家小藤文治郎。

1911年6月，章鸿钊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他是我国留日学生中较早选修地质学并获得理学士学衔的人。回国后，任

北京京师大学堂地质学教师，是我国主讲地质课的第一位本国学者。

武昌起义后，章鸿钊欣然应邀赴南京参加筹建临时政府事宜。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在实业部矿政司下设立地质科，它标志着中国地质事业的诞生，章鸿钊被委任为地质科科长。他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筹划开拓。他对于“我国山川蕴藉，灵秀所钟，弃利于地，无人过问，欧美学者先后逾海而东，日本继之，足迹及于中国之大半，而我国犹若勿闻”^①的状况，引以为耻，力图改变。他草拟了《地质调查咨文》，向全国征调地质人才和地质图籍。又写了《中华地质调查私议》，并附有筹设地质研究所的详尽计划和简章。其中一段写道：“调查私议者，欲诉之于全国人民也。设研究所，并期之于我国后生青年也，而尤以培植青年为最切要。”^②他力主先办地质研究所，招收中学毕业生，修业期限为三年，以快速培养中国自己的地质调查人才。同时，还向当局疾呼：“谋国者首宜尽地利以裕民财。欲尽地利，则舍调查地质，盖末由已！”^③4月底临时政府北迁，北京临时政府将实业部分为农林、工商二部，9月，他转任农林部技正，因此上述计划未能实现。

1913年初，工商部地质科由丁文江继任科长。矿务司负责人张轶欧采纳章鸿钊的方案，与丁文江商定开办地质研究所（实即高等地质专科学校），将章氏所拟章程、计划以部令颁布。9月，招生30人，10月初开学。章鸿钊受聘兼任主讲教师，11月，代理所长。年底，农林、工商二部合并为农商部，章鸿钊正式担任所长，专力从事地质教育。当时，农商

部长张謇不以办地质研究所为然。经章鸿钊恳切陈词，据理力争，研究所计划才获得批准。到1916年，该所第一批学员有22人毕业，为我国地质调查提供了自己的骨干力量。其中不少人，如叶良辅、谭锡畴、谢家荣、王竹泉、李学清、朱庭祐、李捷等，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章鸿钊对研究所的领导工作十分认真负责，亲自带领全班学生到北京西山和河北滦县、开平等地实习，并在西山区进行矿产勘测工作。在1916年7月14日的毕业典礼上，一些外国地质学者看了学生的学业展览后，认为“成绩甚佳”，“实与欧美各大学无异”，

“为中国科学上的第一次光彩”。^④章鸿钊在毕业典礼上谆谆劝勉学生：“从事地质，虽苦亦乐！”“学问上研究不可忘记，形式上的痛苦总要忘记”。^⑤鼓励学生要以调查矿产富国利民在精神上的快乐，战胜地质野外工作的艰苦。研究所原拟继续招第二批学生，由于丁文江主张停办，遂告终止。以后，章鸿钊改任地质调查所地质股股长，兼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地质学和矿物学教授。1922年11月，他率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博物系学生赴泰山，进行地质实习，开创我国妇女界考察地质之先河。章鸿钊于朝阳洞刻石记述此事。

1922年1月，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成立，章鸿钊被选为首届会长。他大力推动学会工作，创办《地质学会志》，并亲自参加编审稿件。以后他多届任理事，十分关心学会的发展。他的论文，大多是在《地质学会志》和1936年创刊的《地质论评》上发表的。在我国最早的一些学会团体中，无论是组织建设，还是学术活动、论文出版，中国地质学会在

国内外学术界，都享有较高的声誉。章鸿钊还是中国科学社和中华学艺社的社员、撰稿人。

因与北洋政府地质机构的主管人在地质事业发展方针上意见不合，1928年7月章鸿钊被迫辞去地质调查所的职务，专事研究著述。1936年曾被故宫博物院聘为专门审查委员。1937年，中央研究院聘他担任地质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这些年中，他没有固定收入，家庭生活主要靠兼职和稿费维持。他以献身地质科学为志，虽然坎坷困苦，也不改初衷；论文著作，更趋广博精深。面对祖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的爱国热忱尤见坚贞。卢沟桥事变后，他因长子病重，滞留北平。日本人曾多次登门聘请，许以什么科学研究所所长职务和优厚的薪金，都被他严词拒绝。1941年4月，他摔伤左足，卧床八个月，始能扶拐行走。他给重庆的学生去信说：伤腿虽然痛苦，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省了日本人的纠缠。^⑥他年过花甲，身处逆境，贫病交加，仍然不忘报效祖国。每有余暇，就“展简披图”，阅改《古矿录》文稿。他将这部手稿“深藏篋中”，^⑦以待将来。当他得知留在北平的几名学生，在日本人招聘下有可能动摇时，心急如焚，登门规劝，晓以民族大义。在他的督促下，这几名学生终于离开北平，奔赴抗战后方。1943年秋，他腿伤已愈，遂举家迁居上海，一度暂住亲戚家中，经济上多赖亲友和学生资助。

抗战胜利后，章鸿钊于1946年下半年由上海迁居南京，任国立编译馆编纂。同年，获得中国地质学会葛氏金质奖章，中央地质调查所特为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他致力于《地质学论丛》的写作和区域地质构造理论的研究，编译岩

石学名词等，并继续研究区域地质构造理论方面的课题，撰写和发表了有关论文和专著。

1949年4月，南京解放。章鸿钊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庆幸中国地质科学也获得新的活力。他被邀请参加南京市首届人民代表会议。1950年9月，章鸿钊被特聘为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顾问。11月，他不顾年老多病，应邀赴北京参加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致开幕词。1951年，任《南京日报》社技术研究组召集人。早在四十年代初，他就提出过地质科学和实际相结合，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正确主张，但在旧社会根本不被重视。解放后，他亲眼看到地质学真正与人民事业结合起来，感到由衷的高兴，迸发出巨大的工作热情，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努力研究，发表若干新作。

1951年9月6日，章鸿钊病逝于南京。在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李四光致悼词说：“章先生为人正直而有操守，始终不和恶势力妥协；他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多次拒绝和日本人合作；对于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贡献尤大。因此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不是别人而是章先生。”^⑧

章鸿钊一生著述甚丰。早在日本留学时，就借回国探亲机会，赴杭州、富阳、临安、于潜、天目山一带进行地质考察，系统地搜集实际资料，回校撰写了《浙江杭属一带地质》的毕业论文。这是我国地质学者自己独立完成的第一份地质调查报告，至今仍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1916年地质研究所停办后，他将全所师生在一些省份实习中所写的六十九篇调查报告，综合整理出《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一书，

对全国地层分布、火成岩、地质构造、矿产等，系统地作了分析归纳，建立起我国地质区划的概略轮廓，是当时我国一份重要的地质研究成果。以后，他在地质学、岩石学、矿物学、地质发展史、地质调查史和地质科普等方面，发表了大量的学术专著。他精通文史，从浩如烟海的我国古代文献中，悉心研究有关地质、岩石、矿物、金属和化石方面的史料，用地质科学理论加以解释，去伪存真。他的著作，以资料翔实，论述精确著称。他的代表作有《石雅》、《古矿录》、《自鉴》、《三灵解》等书。《石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地质、岩石、矿物、化石和金属方面的总结性著作，1921年出版后，1927年曾再版。《古矿录》是他用十余年时间，从我国古代文献记载中整理成的一部叙述我国矿产资料的重要著作，全书分十卷，按省阐述，附分布图及历代年号与公元对照表，1954年由地质出版社出版，对我国地质普查勘探工作的开展，帮助极大。1922年发表的《自鉴》，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道德观念的形成、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梁启超为之作序，并高度评价其学术价值。^⑨章鸿钊对达尔文的进化论、魏格纳的大陆漂移学说，都进行过反复研讨。他长期研究震旦运动问题，对日本、东亚以至太平洋区域地质构造的认识不断深化，先后发表了《中国中生代晚期以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与动期之检讨并震旦方向之新认识》（1936）、《太平洋区域之地壳运动及其特殊构造之成因解》和《就所谓震旦运动及对于此事之批评重加省视》（1947）等。他用环太平洋大陆块向洋水平位移来解释太平洋造山带的形成，在当时的地质学术思想上，坚持了

活动论的观点。近四十年来板块学说的发展，证明他的这一观点是富有远见而难能可贵的。

章鸿钊在数理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并能将数学、物理学方面的最新成就运用于地质科学研究。1929年发表的《地质学界两种过度的信仰和今后发展的趋势》一文，提出要以物理学作基础，开展地质学的研究，预言《物理地质学》或《理论地质学》“将作为一门新学科出世”。^⑩他在科学上的进取精神和锐敏的观察力，至老不衰。1951年，他还在《中国数学杂志》上发表了《周髀算经上之勾股普遍定理》（陈子定理）和《禹之治水和勾股测量术》两篇数学论文，可见其知识的渊博和研究领域的宽广。

章鸿钊治学严谨，道德高尚。为了地质事业的发展，他顾大局，重团结，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深得后学的敬仰。晚年他在一首述怀诗中说道：“治学何尝有坦途，羊肠曲曲几经过。临崖未许收奔马，待旦还应傲枕戈。虎子穷搜千百穴，骊珠隐隔万重波。倘因诚至神来告，倚剑长天一放歌。”^⑪这是他一身锲而不舍，始终如一，献身中国地质科学的忠实写照。

注：

①④⑤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一览》，1916年。

②③⑧⑪ 孙云铸：《纪念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章鸿钊先生》，1954年。

⑥ 据李春昱教授回忆，1983年8月29日。

⑦ 《古矿录》自叙，1954年版。

⑨ 《自鉴》序，1922年版。

⑩ 《学艺杂志》第11卷第2期。

任 鸿 隽

赵慧芝 王 震

任鸿隽，字叔永，1886年12月20日（清光绪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生在四川垫江县一个小官吏家庭，任祖籍浙江归安县（今吴兴县），1863年（清同治二年）太平军占湖州，祖父任轶才率全家人川，依叔祖父任秋苹^①，居成都。父任章甫，习刑名，初作幕僚，后纳资为佐贰，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选授垫江县典史，1902年歿于任上。

任鸿隽兄弟姐妹七人，在兄弟中排行第三。六岁延师在家就读，十二岁已熟读四书五经，并同季弟任鸿年同时考入垫江书院^②。他聪明勤奋，在书院历次月试中均名列第一。1904年他冒籍巴县参加院试，考取第三名秀才。同年，考入重庆府中学堂师范班。这是废科举后四川创办的第一所中学。他在此学得新知识，并在政治上受到老师杨沧白等人的影响，萌发了民主革命思想。1905年底毕业后，在重庆开智小学和私立重庆中学堂执教一年。1907年初，以教学所得积蓄偕学友周秉鲁、罗锦章赴上海求学，入中国公学高等预科甲班。中国公学是当时革命党人的活动场所，秋瑾等人的革命活动对任鸿隽政治思想上的进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课余任常与同学张翼若、杨杏佛、朱芾煌、胡洪驛（胡适）等谈论时事，向往革命，怀有推翻清政府的情绪^③。

1908年初，任鸿隽在学友邓子浮的帮助下，得到留日同乡李竹君、李雨田经济上的资助，随同余耀彤东渡日本留学。初入同文中学，翌年夏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为官费留学生，学习应用化学。与此同时，他还从章太炎学习国学，对形声、训诂及诸子源流之学得益颇多，并深受其革命思想影响。是年，经同学朱芾煌、但懋辛介绍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先后任同盟会四川分会书记、会长等职。他学习应用化学，目的在于继承喻培伦、黄复生之事业，为革命制造炸弹^④。在此期间，他还常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接触，为支持国内革命购买军火^⑤。1911年3月，为了配合黄花岗之役，牵制长江方面的清军援兵，和喻培棣一日内即拟就布告，油印数百份，并连夜刻制“中华民国军政府印”，盖在布告上^⑥，带回国内在长江一带散发。武昌起义前后，为配合四川铁路风潮，发表了《川人告袁文》、《为铁路国有告国人书》等文章。

1911年11月任鸿隽由东京返回上海。此时上海已经光复，四川方面战事正紧。聚集在上海的四川革命党人发起组织蜀军，推熊克武为首领，欲去四川支援，并推任鸿隽和另一党人去武昌与黎元洪的军政府交涉，借道返川^⑦。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宣告成立临时政府。任鸿隽与吴玉章等任总统府秘书^⑧，他曾为孙中山草拟《告前方将士文》、《咨参议院文》、《祭明陵文》等文稿。南北和议告成后，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任鸿隽对此极为不满，便立意弃官请求出国学习。因对革命有功，经稽勋局派赴美国留学。在去美之前，他应邀北上，到唐绍

仪内阁任秘书。6月，唐内阁倒台，任赴天津任《民意报》总编辑，他除为该报撰写社论、时评等文章外，还根据朱芾煌的日记撰写长文《共和建设别记》在该报连载，揭露袁世凯在南北和议中运用手腕谋取临时大总统的内幕。文章刊出方半，袁世凯已怒不可遏，通过法租界当局迫令《民意报》停刊。11月底任鸿隽赴美留学，与杨杏佛等同入康乃尔大学文学院，实际上所学专业则偏于化学、物理两科。

1914年6月，任鸿隽与在康乃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谈论当时风云变幻的世界形势，认为“在现今世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⑨。为实现科学救国，他们商议创办《科学》月刊，以向国内介绍并传播科学，于是便着手草拟“缘起”，制订办法，募集资金。为要发行科学杂志，他们又发起组织科学社。数月之内，入社者达七十余人，股金筹集到五百余元。1915年1月，《科学》月刊正式出版。4月，任鸿隽、胡明复和邹秉文草拟了社章，10月25日经全体社员通过，中国科学社遂正式成立。社章规定科学社的宗旨是“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⑩。任鸿隽与赵元任、胡明复、秉志、周仁等五人被选为中国科学社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任鸿隽被推举为董事会会长兼中国科学社社长。

在康乃尔大学期间，任鸿隽还曾主编过《留美学生季报》，与胡适等人过从甚密。1916年曾为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问题与胡适发生一场激烈的辩论，他与梅迪生、杨杏佛一起反对胡适提倡的白话文，尤其反对白话诗。此乃中国文学史上白话与文言论战之发端。

1916年6月任鸿隽于康乃尔大学文学院毕业，获化学学士。一度想去哈佛大学攻文学硕士，但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愿望，决定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化学，1918年得化学硕士学位。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告结束，任与一批留美学生于10月搭轮经日本回国。中国科学社总事务所也由美国迁回国内，先后在上海和南京设办事处。该社为调动社会力量，积极扩大科学活动，曾发起“五万元基金”募集运动。任鸿隽为此奔走各方，历访各界名人，为发展中国科学事业大声疾呼。“可是在反动而又愚昧的政府统治下，对于人民的利益照例是漠不关心的，对于学术思想这种看来是不关重要的事情，尤其难望得到重视。”^⑩因此有时不免遭到冷遇。但他毫不灰心，以沿门托钵的精神，不辞辛劳，前往广州、北京、成都、南通、杭州等许多地方募集基金，获得社会各界开明人士的支持。任鸿隽在上海，曾多次拜访孙中山，时孙正在著述《孙文学说》，以有关科学部分嘱任鸿隽校读，并鼓励留学生应自有组织，以对国家有所贡献，对中国科学社组织颇为赞赏，并给予极大的支持。

1919年春任鸿隽回到四川，在各学校、商会演说，鼓吹科学^⑪。当时四川督军熊克武正拟筹办炼钢厂，他向熊建议应同时建立钢铁两厂，“相辅而行，为四川立钢铁工业之基础”^⑫。熊亟是其言，遂委任鸿隽草拟创设钢铁厂的计划，并将筹办铁厂之事委托给傅友周和姜荣光。是年冬，任偕周子竞复去美国采购机器设备并调查炼钢方法，1920年夏，任鸿隽回国，适值四川一、二军之战，熊克武已去职，而继任者未遑远略，于是建厂计划中辍。十余年后四川设立钢铁厂

所用机器设备，即系当年任鸿隽等所引进者。

任鸿隽在川筹建钢铁厂事中辍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邀请他担任北京大学化学教授兼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但任鸿隽一向主张专事一职，反对兼任，不久乃辞去北大教职。但未及一年，范源濂因教育界经费风潮去职，任遂辞去教育部职。

1920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任与陈衡哲结婚^④。陈长于西洋史，是我国第一位女教授，也是颇有个性和见地的女学者，对任鸿隽的事业帮助颇多。

1922年8月中国科学社在江苏南通举行第七次年会，修订社章增设理事会，以负责经常工作，原董事会则主持科研方针和募集资金。年会选举张謇、蔡元培、梁启超、马良、汪兆铭、熊希龄、严脩、范源濂、胡敦复九人为第一任董事，选举竺可桢、胡明复、王琯、任鸿隽、丁文江、秦汾、杨铨、赵元任、孙洪芬、秉志、胡刚复十一人为第一届理事，任鸿隽为理事长。同年冬，任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23年任去南京，任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1925年春因不满学校两派斗争而辞职，专心著述《科学概论》一书。8月到北京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秘书，此后，继而任秘书长、副干事长、干事长直至1935年。1927年蔡元培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大学学院院长，并受命筹建中央研究院^⑤，任鸿隽积极参与筹建工作，并担任大学院科学教育委员会委员^⑥。1929年任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至1931年去职。

1935年9月，任鸿隽出任四川大学校长，12月全家迁居

成都，陈衡哲亦在川大任西洋史教授。陈一贯同情被压迫的妇女，而目睹大学女生中不少人系达官贵人的姨太太，便在成都《新新新闻》著文抨击，认为这是对妇女的侮辱，是大学教育的破产，号召四川妇女争取独立自主；并在《独立评论》上连续撰文，对当地政治和社会情况进行激烈的批评。陈因此受到攻击，被迫离开川大返回北平^⑦。1937年6月任鸿隽也辞去川大校长职务，回北平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任编译委员会委员长，7月应蒋介石之邀参加庐山谈话会。次年7月，任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是年底，应蔡元培之邀，到昆明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化学研究所所长和评议员等职。1941年冬，中央研究院迁至重庆，翌年任鸿隽辞去中央研究院的职务，再次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任干事长。这时中基会、中国科学社组织机构和《科学》杂志均迁至四川重庆的北碚。1944年1月，中国科学社董事会改为监委会，任鸿隽继任社长、监委会书记，以及理事会会长、临时编委会委员和特约撰稿通讯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随同中基会和中国科学社返回上海。1946年再度赴美考察，次年春回国后定居上海，致力于中基会和中国科学社的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社和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联合发起，向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建议，召开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并先组织筹备委员会，任鸿隽为筹备委员会委员。这个会议于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

及协会（简称科普）。任鸿隽被选为全国科联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和常委会委员。任鸿隽作为中国科学社的主要负责人，在这些活动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这次会议，他认识到人民政府对于科学事业是很重视的，认为“此后的科学工作，已经成为国家的事业，前途无限光明”^⑥。为了更好地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配合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他召集中国科学社理事会，经讨论决定将当时该社主办的几项事业先后移交给人民政府或国家的其他科学组织。1951年将《科学》月刊与《自然科学》合并，由全国科联主办刊行；1953年将《科学画报》交上海科学普及协会继续刊行；1954年将生物研究所移交给中国科学院；1956年将明复图书馆捐献给上海市人民政府，改组为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1956年到1957年间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所属印刷厂合并给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出版社，编辑部合并给上海科技出版社，仪器部分合并给上海量具工具制造厂。最后，在1959年秋，由中国科学社理事会提议，并得到全体社员同意，将科学社拥有的房屋、财产、书籍、设备等，全部捐献给国家。1960年5月4日，中国科学社宣告结束，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中国科学社是我国最早的科学团体，《科学》杂志也是我国创刊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期刊，它对传播现代科技知识、推动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训练造就科学人才和在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国科学社四十五年的历史中，任鸿隽不仅是发起人之一，并且是始终致力于中国科学社事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建国后，任鸿隽是第一届全国政协特邀代表，第二、三

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科技图书馆馆长，1958年该馆与上海图书馆合并，他继任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市科技协会副主席等职。1961年11月9日，任鸿隽在上海病逝，终年七十五岁。

任鸿隽的著作和译著颇多，粗略统计，文章有二百多篇，主要发表于《科学》、《东方杂志》、《新教育》、《教育杂志》、《建设》、《现代评论》、《独立评论》、《新青年》、《留美学生季报》、《中国科学社论文专刊》（英文版）等刊物。内容涉及化学、物理、生物、教育、科学发展史、科学家传记等。他很重视科学对于国家发展的巨大作用，写了很多宣传科学和传播科学技术文章。他的主要著作有《科学概论》，译作有《教育论》、《最近百年化学的进展》、《大宇宙与小宇宙》、《爱因基坦与相对论》等，还有与李珩、吴学周合译的《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与胡明复等人合译的《汉译科学大纲》等。任鸿隽也具有相当的文学素养，他的文章，特别是古体诗很见功夫，除散见于报刊杂志之外，还选有《古青纪游诗》等。

注：

- ① 任秋苹曾入四川总督吴棠戎幕，任四川盐运使。
- ② 任鸿年(1888—1913年)，字季彭，别字百一，同盟会会员，曾积极参加辛亥革命。宋教仁案件后，对资产阶级革命失去信心，投井自杀。遗绝命书七百余言。
- ③ 杨小佛：《杨杏佛事略》，《人物》1982年第一期。
- ④ 喻培伦(1886—1911年)，字云纪，四川内江人。日本千叶医学校留学生。1908年经吴玉章介绍参加同盟会，曾专力制造炸弹。1911年广州起义中，奋勇当先，弹尽被俘，英勇就义，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一，吴玉章：《辛亥革命》；熊克武：《广州起义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

⑤⑬ 任鸿隽：《五十自述》（手抄本，藏于其女任以都处）；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

⑥ 任鸿隽：《前尘琐记》，见《传记文学》第二十六卷第二期。

⑦ 任鸿隽：《记为蜀军返川向湖北军政府借道事》，《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七辑；《记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

⑧ 任鸿隽：《记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

⑨⑩⑪⑭ 任鸿隽：《中国科学社史简述》，《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辑。

⑫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⑭ 陈衡哲1919年毕业于美国瓦塞学院，因成绩优秀，获得瓦塞奖学金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学习。1920年获硕士学位。1916年夏陈在纽约伊萨卡度假时与任鸿隽相识。

⑮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

⑯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8年出版。

⑰ 〔美〕包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一卷“陈衡哲”条。

李 剑 农

萧致治

中国著名的政治经济史专家李剑农，又名剑龙，号德生，1880年6月10日（清光绪六年五月初三）生于湖南邵阳西乡滩头（今属隆回县）。早年在农村私塾念书，后就读于邵阳经正书院。戊戌变法时期，李剑农受到湖南著名维新派樊锥（南学会邵阳分会负责人）的影响，同情变法维新。1904年春，李剑农入湖南中路师范史地科，专攻历史。在校学习期间，受到革命影响，于1906年由同学曾广铨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①。1908年秋毕业，留校任教，暗中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

1910年春，李剑农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留日期间，曾参与同盟会的一些革命活动，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均有接触。第二年武昌起义爆发，李停学回国，参加革命活动，曾撰写《武汉革命始末记》^②一文，在上海《民国报》第一号上发表，热情赞扬武昌起义。

1912年初，李剑农应汉口《民国日报》发起人张秉文之邀，任新闻编辑，后来，该报由于抨击军阀专横跋扈，反对袁世凯推行独裁统治和杀害革命党人，于1913年6月24日被查封，报社人员遭到通缉。李剑农在国内无法活动，同时感

到要建立民主共和国，需要有欧美民主政治知识，乃于同年7月赴英，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旁听并作自由研究。留英期间，李对欧美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政治史和宪法史，都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他赞赏英国的议会政治，认为英国议会制是由逐步改良进化而来，以调和妥协为基本精神。此后，改良主义便成了他在一段时期内政治上的信条^③。

1916年夏，李剑农由英返国。这时国内军阀割据，政治紊乱，国力凋残，疮痍满目，深感要求得国家富强，必须先使国家统一。他主张仿效英国的联邦制，采取联省自治方式实现国家统一。当时，曾经赞助过武力统一的进步党首领梁启超、熊希龄等人，亲睹武力统一无法实现，也在鼓吹由分省自治进而采用联邦制统一全国。李剑农的主张和梁启超等人的想法不谋而合。回国后，他担任上海《中华新报》编辑员，专写政论，揭露军阀暴行，鼓吹政治改良。不久，他又联合王世杰、周鲠生、杨端六等几个朋友创办政论刊物《太平洋》杂志，自任编纂主任，介绍西方政法知识，积极宣传联省自治。

1917年冬，李剑农在《太平洋》杂志第一卷第八、九两期上连续发表以《民国统一问题》为题的政论文章，指出中国已到了地方势力增长，中央政府不能统驭的时候，不采取联邦制，不能恢复中央政府的实力，得到真正的统一，并分析了军阀割据局面形成的原因。此外，他还发表《时局罪言》、《地方制之终极目的》等政论文多篇，从各个角度阐述了他的联省自治的观点和主张。

1919年8月至1922年冬，李剑农受聘担任汉口明德大学

教授。1922年，李又在《太平洋》杂志第三卷第七期上再次以《民国统一问题》为题发表政论文章，指出根据民国成立以来的经验，采用武力统一办法，“不惟南北不能统一，并且南也不能统南，北也不能统北”，“要中华民国真正的统一，只有采取联邦制的一个办法”，继续鼓吹联省自治。

1920年前后，南北军阀混战不休，人民深受其害，联省自治的思潮风行一时，湖南军阀谭延闿、赵恒惕利用湖南人民由于厌战而产生的自治要求，在湖南推行制宪自治活动。1921年，湖南省长赵恒惕特聘李剑农等十三名省内外知名人士组成省宪起草委员会，由李任主任委员，负责起草湖南省宪法^④。1922年1月，湖南省宪法正式公布。按照省宪规定，省长以下设内务、财政等七司，由七司司长组成省务院，互选一人为院长，辅佐省长工作。同年12月，李任省务院长兼教育司长。当时地方实力派不过是打着联省自治的幌子，实行割据自雄，并无自治诚意。赵恒惕也不例外。所以，李虽担任省务院长，其联省自治主张依然无法实行。后来李深有感触地说：“想在军阀混战中联结邻省保持苟安局面，脱离混战局面，妄想以此挽救国家危亡，事实证明，纯属舍本逐末的书生之见。”^⑤ 1924年10月，赵恒惕修改省宪，由省长兼任省务院长。李于11月离职，从此不愿再写政论。他渐悟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了解不深，决心研究中国历史，想当一名超政治的学者^⑥。

1925年，李和友人彭一湖在长沙办了一所晨光大学，以超政治、超党派，不介入政争相标榜。入学前，学生须保证不加入任何党派。入学以后，每人置一部《资治通鉴》，限一

年读完，并要求作出笔记。晨光开办不到两年，北伐军进入湖南，校内早已渗入各种党派人物。彭李等的设想被现实粉碎，他们感到办学宗旨无法贯彻，就停办了。李剑农继政治上失意，办学又受挫，对北伐持旁观态度。但他赞成国民党改组，认为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⑦。

1927年夏初，李剑农离开湖南，再赴上海，担任太平洋书店编译主任。这期间，除书刊编辑工作外，他专心于戊戌以来中国政治史的研究。

1930年秋，李剑农接受武汉大学聘请，讲授中国近代政治史课程，以后曾任武大文法学院教授兼史学系主任。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湖北，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他因家庭牵累不能入川，回到湖南老家。在家乡居留期间，李倡办松坡中学于隆回桃花坪，又发起编印蔡松坡遗集，并亲为之作序；还与友人倡议募资建立松坡图书馆。该馆与中山图书馆、船山图书馆为湖南三大图书馆^⑧。从1940年夏到1945年冬，李一直在蓝田（后迁淑浦）国立师范学院任教，主讲中国经济史和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等课程。他不满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但持明哲保身态度^⑨。

1946年，李借聘于湖南大学。1947年以后，一直在武汉大学执教。在这两校他仍讲授中国经济史和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就接触过一些进步书刊，逐步认识到共产党是真诚的爱国力量；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腐败，贪污成风，物价飞涨，人民愤懑，使他益加寄希望于共产党^⑩。淮海战役后，更断言“蒋党必垮台，中共必胜利”^⑪。

国民党逃往台湾时，他表示决不离开祖国大陆。湖南解放前夕，李回到邵阳，参加唐生智组织的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和争取湖南和平解放的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7月，李剑农受聘为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1954年至1963年，担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1963年12月14日，李因患动脉粥样硬化症在武汉去世。

李剑农从1925年起，长期从事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928年，他以半粟笔名出版了《中山出世后中国六十年大事记》。1930年，写成《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由太平洋书店出版。该书出版后，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后又将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的政治斗争补写了三章，由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史地学会合印成《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946年由启明书局出版。1947年，又由商务印书馆改排重版。解放以后，他将《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删去《导论》和第十二章《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的解释和今后去路》，改名《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于1965年由中华书局重新出版，1979年重印。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

1956年，《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一书由美籍学者邓嗣禹和Jeremy Ingalls依据商务版合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先后印行三次，共发行五千二百册。美国著名中国近代史学者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对该书作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对西方的学者来说，作为一种可靠的记事和重要资料的简编具有重要的价值”^⑫，另一名中国近代史学者林伯格（G. C. Linebarger）则说：“李剑农的政治史对于中国问题专家来说，

是必不可少的书。”^③

李剑农的另一部著作是《政治学概论》，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被列为大学丛书。该书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作了综合的通俗的介绍。

李剑农从1921年起就注意研究中国经济史。他在讲授中国古代经济史时，对中国古代经济资料作了系统的搜集和整理，编成《中国经济史》讲义印行，1943年由蓝田中国书局出版。解放后重加整理，1957年至1959年间由三联书店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三册经济史稿出版。1962年后转由中华书局据原纸型重印。该书文字通畅，体裁严谨，对各代农业、手工业、商业和财政等方面均有清楚的叙述，描述了中国三千多年经济发展的概貌，是解放后出版的第一部有系统的中国经济史专著。李自认为此书较《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有保留价值。

李剑农治学态度谨严，言必有据。他为编写中国古代经济史稿，三十年如一日，夜以继日，浏览古代文献，参考各家著述，勤学苦思，力求从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史实中，探求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书中确有不少创见。在治学方法上，他主张自学，常以“自学为主，勤奋努力”等语勉励后学。

注：

① 李剑农自填高等学校教师登记表（李剑农档案，藏武汉大学档案室）。

② 《民国报》第一号，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月一日（藏湖南省社会

科学院)。

- ③④⑥ 李剑农：《我的社会关系》(李剑农档案，藏武汉大学档案室)。
- ⑤⑨⑩ 梁希杰：《有关李剑农先生的点滴事迹》(原稿存萧致治处)。
- ⑦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线装本，启明书局版第四册，第35页。
- ⑧ 陈新宪：《李剑农先生二三事》(原稿藏姚薇元处)。
- ⑪ 《李剑农小传》(油印草稿，藏武汉大学档案室)。
- ⑫ Am.Hist.R(《美国历史评论》)，AP,57。
- ⑬ Current History(《现代历史杂志》)，Jan,57。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李剑农档案(藏武汉大学档案室)。
- ②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蓝田国立师院1942年版，蓝田启明书局1946年版，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 ③ 《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
- ④ 《政治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 ⑤ 《中国经济史》，蓝田中国书局1943年版。
- ⑥ 《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中华书局1962年重印。
- ⑦ 《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版，中华书局1983年重印。
- ⑧ 《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
- ⑨ 李琮池、梁希杰等回忆录及访问刘寿祺记录等。
- ⑩ 《明清史讲稿》(手稿)。

吕 思 勉

汤志钧

吕思勉，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生于1834年2月27日（清光绪十年二月初一）。他是近代我国知名的史学家，知识渊博，成绩卓著，在国内外史学界享有盛名。

吕思勉六岁入塾，十二岁时因家贫无力延师，由其父吕誉千亲自讲课，授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并由母亲讲授《纲鉴易知录》、《正史约编》，因而他很早就对史部之书发生兴趣。其父又授以《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和《经世文编》，让他“随意泛滥”。自称：“至十六岁，始能认真读书，每读一书，皆自首迄尾。其时自读正、续《通鉴》及《明纪》，先父授以汤蛰仙之《三通考辑要》，余以之与原本对读，觉所辑实不完具，乃舍之而读原本，此为余能自读书之始”^①。

甲午战后，他关心时事，开始读报，1896年创刊的《时务报》，是他当时最喜读的刊物，从而“于政务各门，皆知概略”。认为政治利弊，应“从发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于是“渐入史学一路”^②。

1905年起，吕开始任教。1907年，在苏州东吴大学教国文、历史，在常州府中学堂教历史、地理。1910年，经屠寄（敬山）介绍，到张謇创办的南通中学国文专修科任教。

1911年辛亥革命起，这时是他加入政界与否的关键，他说：

“如欲入政界，觅一官职之机会甚多，若不乐作官，亦可以学者之资格，加入政党为政客。余本不能作官，当时政党之作风余亦甚不以为然，遂于政治卒无所与”^⑤。1912年，在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教商业经济、商业地理。旋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1920年，任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北大学）教授。1923年，在江苏省第一师范专修科任教。1925年，任上海沪江大学教授。次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后来光华大学增设历史系，吕任教授兼系主任。除“一二八”后一度到安徽大学任教外，一直在光华大学。1935年12月12日与马相伯、沈钧儒、李公朴、蒋维乔等署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936年8月，任“吴越史地研究会”理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沦陷，光华停办。吕思勉携眷归乡，闭户著作，侍开明书店稿费自给，直到抗战胜利，重返光华。解放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吕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一级教授，并任上海历史学会理事、江苏省政协委员。

吕思勉认为自己的思想几经三大变：“成童时，最信康（有为）、梁（启超）之说”，“世界愈变必愈善，既愈变而愈善，则终必至于大同而后已”；至于大同世界“究系如何情状，当由何途以赴之”，尚不知考虑，这是第一期。十七岁以后，主张通过改革政治而走向大同，这是第二期。四十七岁，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解放以后，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用以检查过去的史学思想，这是第三期。

吕思勉从二十三岁起，就决心献身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

学工作。早年用力于中国通史的研究，1922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本国史》四册，是第一部用语体文写的中国通史，几经重版，在当时有较大影响。此后，在教学过程中，又写了不少著作，主要有：一、《中国文字变迁考》（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论述篆、隶、真、行、草的变迁，其中论汉代古文一段，有创见。二、《字例略说》（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论六书为汉代研究文字之学者所创，字例应别立。六书中只有象形是文，指事也是字。整理旧说，辅以新得材料，以论文字之增减变迁。三、《章句论》（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以为章句即今之标点符号，古代也有标点，后来抄写，印刷时逐渐失之。四、《说文解字文考》（稿本，未刊），就《说文解字》检寻单体之文，稽考解释。五、《经子解题》（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论读古书方法和考证古籍，并推论古代学术流派的源流。六、《先秦学术概论》（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不单从先秦哲学立论，注意社会政治方面。七、《理学纲要》（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论述宋代理学，中多新意。八、《史通评》，对刘知几《史通》进行平议、推论，附考据辩证。此外，尚有《宋代文学》（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民族史》（1934年世界书局出版）、《历史研究法》（1945年永祥印书馆出版）、《中国通史》（上册，1940年；下册，1945年，开明书店出版）、《燕石札记》（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燕石续札》（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等。

直到晚年，吕思勉仍然专心致志地想以个人的精力，来写成各个时代的断代史。由于他辛勤劳动，和对二十四史的稔熟，先后完成了《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

《隋唐五代史》等四部分量很重的断代史。《隋唐五代史》即用力十年之久。计划中要写《宋辽金元史》，因年老多病，仅存札记，未能写出。

吕思勉所著断代史，一般都分上、下两编，上编叙述政治史，实际上是王朝兴亡盛衰的历史，基本上采用纪事本末体；下编分章叙述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学术上的各种情况，采用的是旧的叙述典章制度的体例。尽管不易看清历史发展的全貌及其规律性，但他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钩稽排比，鉴别考订，给研究者带来很多方便。特别是下编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学术部分，原来资料很分散，经过搜集整理，分门别类，贡献很大。

吕思勉治学的经验和方法是：一、读书基础应广，读书要多，多读书就能发现问题；二、留心政治社会情况，将当世之事与史实互勘，使不为表面记载所囿；三、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它是史学的根基，历史的根基是社会，读历史单知道攻战相杀是不够的。社会科学既有门径，即可进而读史；四、读本国史，也须研究外国史，于历史地理亦应知其大概。他治学的成就，在于“博、通”，是位史学专家，但他对经学、文字学、文学都有深刻研究，有独到的见解，只是因为“治史”，而使经学、文字学成为“古史之工具”的。有人论述他的学术成就是：“识大而不遗细，泛观而会其通，务求是而不囿于成就，尚核实而不涉于烦碎，此其为学之方也。……吾观其所著书，闳雅似顾亭林，渊博如钱晓征，论证似戴东原，辩述似章实斋，而其所言者，又皆出于一己之独得。”^③

吕思勉治学严肃，作风踏实，五十年来，曾经从头到尾把二十四史读过三遍，同时还参考其他历史书作考订，基本上运用清代乾嘉学者所用的方法，每读一本历史书，都要仔细地排比史料，分门别类，写成许多札记。他的不少历史著作，就是从札记的基础上写成的。但因其知识面广，于各门社会科学多所涉猎，所以能从分散的史料中观其会通，不专门在枝节上用功夫。他并不好奇猎博，却尚实事求是。年轻时爱读《日知录》、《廿二史札记》，也欣赏《十七史商榷》、《癸巳存稿》。后来看到有些人屑屑考证，自以为搜辑精博，实际上这些材料，“古人既得之而复弃之者多矣”^④。他认为精力不应该完全耗费在枝节问题上的锲钉，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吕思勉晚年想将毕生治史独到之处，辑成专书。又感到道教包括“从古以来杂多之宗教”，与佛教既有交叉，与农民战争和反动道门也有联系，但乏人研究，几成空白，晚年想通读《道藏》，研究道教思想，为后人开辟途径，亦未如愿。他为人诚朴，谦虚谨慎，不管熟悉或不熟悉的人向他问学，总是认真答复，绝不敷衍，对青年更时加勉励。七十岁后，不能到大学上课，还扶病编写讲义。吕思勉的著述除上述已出版者外，尚有未刊遗稿一百数十万字，正将陆续整理出版。

1957年10月9日，吕思勉因病逝世，终年七十四岁。

注：

①②④ 吕思勉：《自传》（稿本未刊）。

③ 徐哲东：《吕先生六十寿序》（原稿未刊）。

黎 锦 熙

白吉庵

黎锦熙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字劭西，湖南省湘潭县人，生于1890年2月2日（清光绪十六年正月十三日）。其父黎培銓是个秀才，爱好篆刻和诗画；其母黄庚午也知书识字，黎锦熙从小受家庭影响，喜爱读书写字。四岁时延师启蒙，十二岁时已读过十三经。次年，自学算术、世界地理，阅读时务、洋务书籍。十六岁赴童子试，补诸生。

1906年冬，湖南浏阳一带的民众举行武装起义，屡败清军，声势浩大。黎深受其影响，来到长沙，与张平子发起组织“德育会”，以“致良知”为宗旨，号召“牺牲个人，努力救国”。旋被清政府侦悉，因即逃匿回乡。翌年7月，在实业救国思想影响下，他考入北京铁路专科学堂。不数月因学校遭大火，转入湖北铁路学堂。不久，奉父命返乡，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辛亥革命前夕毕业，名列前茅。

1911年10月22日，湖南响应武昌起义，成立军政府。黎锦熙的老师颜昌晓接办《长沙日报》，他被聘为报社主编。该报因持论常与湖南当局不合，次年1月被改组。此后他与朱让楠、任凯南等自创《湖南公报》，改推李抱一为主编。该报宗旨：主张“和平统一、绝对民主”^①。黎常为该报撰写时评和社论。

1913年黎任湖南省立编译局的编译员，负责小学教科书的编辑。他曾将《西游记》的个别章节选入课文，是前所未有的，为教育界所侧目。同年1月，被聘为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历史教员。次年“四师”并入“一师”。黎与同事杨怀中、徐特立等人创办宏文图书编译社，以介绍欧美新书及编辑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工作；同时办了《公言》杂志，发表文章倡言“自由”、“民主”，提倡进行学术研究，并批评了当时教育界的派别斗争。但为当局所忌，发行了两期就被迫停刊。后来，他们又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杨怀中为指导，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学经常参加小组讨论活动。

1915年北京政府教育部设编纂处，审定小学教科书，黎被聘为编纂员。同年9月他离开湖南，从此定居北京。翌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黎与教育部内的同事陈懋诒、彭清鹏等人，深感社会保守势力严重，想在教育上谋求几项根本改革来提高民众的认识，以适应共和政治的需要。当时他们“觉得最紧迫而又最普遍的根本问题是文字问题”^②，因此主张“国语统一”（推广普通话）和“言文一致”（普及白话文），并要求教育部改小学国文科为国语科，废除文言文。由于他们的鼓吹，各省学者来信赞成，在北京成立了国语研究会，以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备教育界采用。1917年10月国语研究会召开第一次大会，举蔡元培为会长，黎为委员之一。这时他开始与钱玄同相识。1918年在他与吴稚晖等人的要求下，教育部公布了1913年读音统一会议定的注音字母。后来黎为此创制了注音符号草体。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蓬勃

发展。黎锦熙等人认为须加强对国语运动的领导，于是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作为教育部的一个附属机构。黎被教育部指派为该会会员兼教育部国语传习所导师。之后，他到各地讲学，并答复各方提出的有关注音字母的问题。这些答复，收入《国语学讲义》于同年出版，对当时新文化运动起了积极作用。第二年他就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教员，后来曾兼任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教授，高师改为师范大学后，任国文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这时新旧两派斗争激烈，“国粹派”声称，你们虽有“文学”，却无“文法”；有“文”无“法”，终是无以为“文”等等。为了回答这种谬论，他在高师第一次开设“国语文法”这门课，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捍卫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继此之后，他又编著了一部《新著国语文法》，于1924年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白话文语法，对学校的教学与研究均是一个贡献。此书后来印行竟达二十四版之多，足见其学术价值之大和影响之深远。

1922年由于黎锦晖在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引起了用“国语罗马字”代替汉字的研究。翌年该会成立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议定由黎锦熙与钱玄同、赵元任等11人为委员，负责研制国语罗马字。后来由在京的五位委员组成“数人会”，常聚会商讨有关改革汉字的事。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又在《国语月刊》上组编了“汉字改革”专号，积极宣传以国语罗马字拼音代替汉字。在他的建议下，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还设立了国语辞典编纂处，后因经费短缺，只做了一部分收集资料的工作。

1925年4月，北京临时执政府任命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章到任后，提出复古读经的主张，并采取了一些钳制性的措施。黎锦熙对此十分不满，在教育部部务会议上讨论小学生读经问题时，他公开反对，但无效果。会后他又递上一道呈文，剖析读经“有百害而无一利”^③。文章披露后甚得舆论界的好评。

这年，文言与白话之争十分激烈。章士钊利用《甲寅》周刊公开宣扬封建文化，在征文启事中宣称“不收白话”；而黎与钱玄同主办的《国语周刊》针锋相对提出“欢迎投稿，不取文言”。双方旗帜鲜明，展开了对垒战。在女师大学潮中，他与鲁迅等人站在一起，支持学生驱赶反动校长杨荫榆的正义斗争。

1926年1月国语运动大会在北京召开，黎在会上作了长篇讲演，指出今后国语运动的方针是国语统一和国语普及两件大事。他希望大家脚踏实地向前走去，目的是定能达到的。最后他作了一首《龟德颂》勉励大家，谓：“任重能背，道远不退。快快儿的慢慢走！不睡！”话虽不多，寓意深刻。

9月14日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通过了他和赵元任等人提出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呈请教育部颁行，但未获批准。后来他们利用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名义，自行刊布。同年他编撰的《国语四千年来变化潮流图》在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上展出，曾获奖章、奖状。此图将我国语言文学发展的源流，以图解法勾画出来，来龙去脉，十分清楚，西方人士看后，对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惊叹不已。

蔡元培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时，对汉字改革工

作颇重视，特聘黎锦熙、钱玄同为国语统一会筹备员，并于1928年9月26日正式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这对国语运动是个巨大的推动。年底，国语统一会定名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黎被选为常委。是年他被委任为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院长。

由于形势的发展，黎锦熙认为，若要对中国文字进行根本改革，那就得将四千年来的语言文字和它所表现的学术文化等，作一番详细的总结。因此他主张将国语辞典编纂处改名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钱玄同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二人各处奔走，结果由政府拨给北平中南海居仁堂西四所为办公处。黎任总主任兼总编纂，钱为总编纂，下设五个部，预计出书十巨册，二十年完成。后来因为时局动荡，经费无着，人员星散等原因，书未能编出。但他们利用收集到的资料写出不少论著，当时称之为“副产品”。黎所撰写的《审音通说》、《论“将”》、《说“把”》及《比较文法》等论著，都是利用这里的资料写成的，影响较大。后来黎锦熙考虑到这部辞典工程浩大，一时不易编成，为了满足学校与社会需要，及时组织人力先后编纂了一些中小型字典，如1932年出版的《国音字典》，1936年开始出版的《国语辞典》等等。此外，黎还利用大辞典处的资料，编写了一部《国语运动史纲》于1934年出版。是书详细地记述了清末以来汉字改革、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及大众语等运动的始末，是一部研究我国文字改革历史的重要著作。

1934年，拉丁化新文字论者与国语罗马字论者，在上海就“大众语”中的阶级性等问题展开了热烈争论。黎连续撰

写了《大众语短论》等十九篇文章分送报刊发表，他认为：

“‘大众’就是众人，不但阶级宗教种种限制都没有，并且也不必聚作一堆。”^④ 这些文章后来辑为《建设的“大众语”文学》一书，即《国语运动史纲》序。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由东北向华北大肆扩张，北平已处在日军监视和控制之下。为了唤起民众，挽救危亡，黎锦熙等人认为得先从扫除文盲做起，于是他和钱玄同约定停止“大众语”的争论，集中精力搞汉字改革和扫除文盲的工作。不久他设计了一副汉字带注音的字模，专程到上海请中华书局研制，计划以此来印识字课本和民众读物。同年8月，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改为国语推行委员会，黎被举为委员兼常务委员。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教育部决定北平师范大学与北平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西迁，合组为西安临时大学。时黎在长沙讲学，知道消息后，于当年冬赶到西安。次年春日军逼近潼关，“临大”师生以行军方式，从西安越秦岭迁往汉中城固县，此后学校改名为西北联大，黎任联大秘书处主任、国文系主任及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

1939年8月，国民党为了分化进步力量，教育部将西北联大改为西北大学，师范学院独立为西北师院。黎任师院教务主任兼国文系主任。1940年7月黎赴重庆，出席教育部召开的国语推行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如何制定注方音字母等问题，并成立了全国方音注音字母修订委员会，推黎锦熙、魏建功、卢前为委员，按照国音编订“中华新韵”。是书1942年出版，为民国以来第一部韵书。

黎锦熙自西安到汉中后，即主持了城固县志的编撰工作，后来他以修城固县志的经验写了《方志今议》一书，论述了新修方志的要旨及其方法，于1942年出版。之后他又参与了关中的洛川、铜川、黄陵、宜川等县县志的编撰工作。此外，每到假期常被各地举办的中小学教师讲习班邀去讲学，这些活动对当时的教育发展和国语运动起了促进作用。

1943年3月他再次赴重庆，出席国语推行委员会与全国方音字母修订委员会会议，会上讨论了注方音字母的草案，即《全国方音注音字母总表》。此次在渝停留期间，他看到战时重庆官僚资产阶级政治上专横、经济上垄断控制及民不聊生等现象后，很有感慨，于是在《蜀中杂咏》诗中写了“民主与科学，宗旨毋游离”^⑤的诗句，表达了当时的心绪和主张。

1944年10月，黎随西北师院搬迁到兰州。当时虽处在抗日战争艰苦环境中，他却充满必胜信心。他倡议在西北师范学院、白沙女子师范学院、璧山社会教育学院创办国语专修科，为将来推行国语教育培养人材，并获有成效。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光复，为了推行普通话，教育部在台湾设立了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将三校国语班的师生派去工作。此后，“黎门弟子”从各方面集中于台湾的有一百多人。他们积极开展活动，办《国语报》，出版普及读物等等，为国语运动做出了很大成绩。抗战胜利后，黎一度被任命为西北师院院长。

1945年冬，黎锦熙由黄国璋介绍加入“九三座谈会”，翌年5月前往重庆出席“九三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学社”

的成立大会，会上他被选为监事。7月他到南京亲辞西北师院院长职。不久，回到久别的北平，重整大辞典旧业。抗战时期，辞典处的工作没有发展，由汪怡等人留守，已迁出中南海。自黎返任后，才由西单迁回，改设在怀仁堂东四所。后来“九三学社”许多次重要会议曾在这里召开。1947年初，他曾多次会晤中共在北平军调部的代表。有一次徐冰告诉他“要追随全国人民”，他铭记在心并写在日记上，日期是2月3日。

1946年10月，西北师院迁回北平，但南京教育部不准复用“北师大”的校名，改称北平师范学院。次年7月黎锦熙被“复校委员会”推为代表，与袁敦礼、焦菊隐二代表一起，到南京与教育部进行交涉。但久候无结果，于是他便应湖南大学借聘一学期之约，到长沙任该校国文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1948年4月他离湘返平，继任师院国文系主任，后来师大校名恢复，他又兼任文学院院长。这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皆取得巨大胜利，6月河南开封战役中，国民党飞机滥肆轰炸，“九三学社”发表宣言：呼吁停止轰炸开封古城，黎在宣言上签名表示拥护。同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国民党当局想把一部分名教授劫走，给黎送来了飞机票，他拒绝离平。

1949年2月北平解放后，北平师范大学成立了校务委员会，黎担任委员会主席，领导校务。不久他与吴玉章在师大邀集在平的语文工作者，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同年10月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他被举为常务理事

副主席。会上他作了长篇讲话，以亲身经历论述了国语运动的历史，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这个报告后来整理成《国语新文字论》一书，于次年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除在师大任教，并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外，先后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职。

1978年3月27日，黎病逝于北京。

黎锦熙治学勤奋，持之以恒。研究和探索领域很广，除语言学外，哲学、佛学、文学史、近代语、目录学、图书馆学皆有较高造诣。著作极富，有论文三百多篇，专著三十余部。黎任教六十余年，桃李满天下，为我国文字改革的先驱之一。

注：

- ① 黎锦熙：《廿年纪事诗存》稿本，第8页。藏于黎宅。
- ②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66页。
- ③ 黎锦熙：《为反对设“读经科”及中学废止国语事上教育总长呈文》，见《中国近代教育史料》，第88页。
- ④ 同②，第10页。
- ⑤ 同①，第34页。

李更生

萧致治

李更生，名荃，字亘孙，江苏淮阴人，1883年1月23日（清光绪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生。以守正不阿、言行鲠直自期，故自号鲠生。后因落水得救，遂号更生。1902年入江北高等学堂肄业，1906年结业后投身教育事业，毕生从事小学教育，是教育实干家，也是教育革新家。清末民初，中国内忧外患频仍，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认为：“自清道咸来，欧化东渐，而造成无量之隐痛者，皆教育事业不能与人争故也”。^①因此，他决心献身教育事业。

1906年，他应皖中当局之聘，历任繁昌、宣城、太和等县高等小学主事（校长），以善于办学受到各地人士的敬重，多“称以更公而不名”。^②1909年，他被派“佐治亳州”，因其父促归里，没有赴任。继返淮阴，任江北师范附属小学主事。1911年淮阴光复后，兼任淮阴县学务科长。当时“城乡公私数十校，罢乱尽废，校具尽坏，几无着手地”。他“与诸校长缉理于颓败中，惨淡经营，比数月次第复业。”^③次年秋，他又兼任省立第六师范学监（相当于教务主任）。校长徐公美对他“虚己以听”；他则治校事如家事。因之校誉大起。一次，学校发生火灾，他深夜闻讯，冒火入室抢救图籍，几不得出。他对学生重视身教，认为“教师以言教人，

不如以身教人。”他严格要求自己，给自己订了八大戒条，即《更生八不箴》。这八不箴概括了李处世待人的一些基本准则，曾传诵一时。其中一条为“终身不吸烟、赌博。”先是，公教人员于公余时，每每以打麻将消遣。他也会逢场作戏，但忽觉其非，遂召集学生训话，大书“李荃之恶德”五字于黑板，痛自贬责，并告诫学生勿犯赌博恶习，诸生心服，没有敢犯禁的。^④他担任学监五年，与师生朝夕相处，研讨小学教育，还十分重视形势教育。经常教导学生要热心教育事业，以民族利益为重。

1917年秋，江苏省教育当局任命李更生为扬州市立八中校长。时扬州市立五师为先进学校，八中则事事落后。李到校后，于私室里悬一横额，书“竖起脊梁担事”六字自勉。更备笔记本，题曰“更生思潮”，每有所思考，都记录下来，随后便付诸实施。^⑤如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受教育，1919年他将单轨制改为双轨制，招生规模扩大一倍。又自二年级起分科授课，甲组偏重文科，乙组偏重理科，以利发挥学生所长。继之，又试行能力编级法，先对学生分课程进行测验，按其实际程度编入适当班级教学，这在当时江苏中等学校中是一种新尝试。他常亲自听课，并与教师共同研究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他还重视实验，为文科设历史参考室和地理参考室等；为理科设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和博物参考室等；为文理两科共设的有中文图书室和英文图书室。为使学生全面发展，他对美育、体育也很重视。当时学校就设有国乐队、军乐队及油画小组，并请专家指导。油画小组成员的作品，还有参加国际画展的。此外，还建有或准备建设雨

天操场及运动场、弹子房、健身房、浴室、游泳池，以至印刷所等等。由于勇于改革和认真建设，使得后进的八中，于三四年间一跃而为全省最优秀的学校之一。八中毕业生考入沪宁等地交通大学和东南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的人数之多，为全省各校之冠，为改组以后成为驰名全国的江苏扬州中学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其时八中校舍系借自地方，李更生谋建设永久校舍，曾迭请省当局拨旧府署为校址，而该处为驻军占用，拖延不让，从1918年起，纠缠四年，驻军才全部迁出。^⑥正当制定校舍建筑方案准备发展之际，不料他的妻子唐治英病故于淮阴，李拟回淮阴办理丧事，其时地方劣绅则勾结军人与李作难，他遂拂袖而去。学生闻风乃组织护校团，群起挽留，足见李在八中之深得人心！^⑦

李回淮阴后，被任为省立六师附小主事。到职后他锐行新制，在不到四年时间中，就试行葛雷制、设计教学法、道尔敦制和特殊幼儿教育等等。^⑧他曾经深入调查儿童习惯，为实施教育张本。他主张推行儿童本位教育，根据儿童特点进行教学。于是在读书外，还让儿童办《自治周报》校刊，举行足球比赛，风筝比赛，上海惨案募捐会等，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本领，增长学识。他还主张按照儿童个性差异，因材施教。对聪颖儿童允许跳级，对顽劣儿童施行特殊教育。他认为环境对儿童的成长有重大影响，教室庭院务使美化。在李主持下的六师附小，不仅读书空气浓厚，而且生动活泼，朝气蓬勃。他又为学校创办了博物馆和图书馆，经费不足，便捐献自己藏书数千册以充实之。^⑨他为初等教育尽瘁，使六师附小呈放异彩，得到当时人们的好评。

淮安省立第九中学，在江苏素以难治著称，于1925年宣告停办。1926年省教育当局徇苏北人士之请，委派李更生为校长加以整顿，李力辞不获而后就职。消息传出，推荐教师的信件多达四百多封。李概置不复。或说李以九中既设于淮，则淮邑人士应多所罗致，庶免遭反对，李亦不为所动，坚持聘用真才实学之人。他到校后对原有教职员一律解聘，择优者另发聘书。另于平时留意物色的人才中，一一聘请。对原有学生一律重新考试，择优录取。开学后，九中气象一新，面貌顿改。是年起，为适应社会需要，李在高中一年级分设数理化 and 银行理财两科，更为全省的创举。为严肃学风，学生每晚必须在自修室自修两小时，虽走读生亦必到校。当时淮安尚无电灯，该校乃自备发电机为自修室照明。此外，如整顿食堂秩序及加强学校卫生，提高健康水平，他均有所措施。不到一年，九中声誉大起。李之雷厉风行作风，获得全校师生的拥戴。^⑩

当时淮阴小学较多，中学只有一所，远不敷青少年升学需要。邑人于1922年创办了一所私立成志中学，因多种因素，濒于闭歇，眼见莘莘学子，行将失学。校董会上乃群推李更生继任校长。此时学校经费竭蹶，所租校舍简陋且居闹市，宿舍则赁于僧房，远在二三里外，教员则无专职，亦几无报酬可言。李不忍听其关闭，乃慨然允就，但提三点声明：任校长而不受任何津贴；教员津贴于学期终了时视学校经费盈余多寡而定；租某校董之空地为操场，但缓付租金。^⑪众校董及教员均赞同，李乃就职。上任后首即筹选校址，先请江苏督军拨旧漕标火药库为校址，未得允。几经周

折，始得长期承租劝棉场旧址为校址。但此处房舍已圯，更缺教室，于是又决定向社会募捐五千元，进行修建。李为此“不惜卑躬屈己，沿门托钵，有一点办法可想，无不想到；有一点便宜可趁，无不去趁。”^②但募集半年，仅得二千七百余元，所需不敷甚巨。而校舍已开工修建，不容中辍，李乃趁续弦之机，遍发请帖，说“苟于不佞婚事欲有以贺之者，请悉移助成志。”^③于是又得款约千元，新校舍始得以完成。成志为私立，按规定应向政府立案，但规定学校非拥有二万元基金不办。于是李又为筹措立案基金而奔走。起先，他以自己承领的湖滩地二十五顷移赠学校，又为学校购皮家渡地二十六亩，但去立案的条件尚远；最后又想出筹募公债券作基金的办法，惟所得亦不多。但他绝不中止，继续劝募。他为培植“成志”，真是做到“筚路蓝缕，艰困毕经。”^④在六师附小任职时，每日必去成志一次，亲为主持。他对教育管理力主从严，尤其重视教学，学生成绩遂蒸蒸日上，其第一、二届毕业生升入高中者，达百分之八十。对经费开支力求节约，每月必公布收支于众。他对成志未来远景，规划亦颇周到。

李更生生前虽未参加任何革命组织，但他拥护革命，热爱祖国，并勇于接受新思潮。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淮阴城被民军包围，李“首倡反正议，偕代表十六人开门纳民军。”^⑤李到八中时，正值卖国的“二十一条”签订之后，他在校中树石碑，刻“汝忘五月九日六时乎？！”用以告诫学生不忘“二十一条”国耻。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他身体力行，在其《八不箴》中即订有“终身不买日货”一条。五

四运动爆发，他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潮。他鼓吹科学与民主，提倡白话文，推行注音字母，提倡演话剧，并亲自登台。他提倡阅读杂志并鼓励学生自编刊物多种。他不仅对待同事平等，而且平等对待学生和校工。校内举行庆祝会，多要请学生和校工上台讲演。在他的影响下，“五四”以后的新思潮“随着扬子的高潮输灌到运河流域”，八中學生“无人不充满德模克拉西的观念”。^⑩ 1926年秋北伐开始后节节胜利，李极兴奋，曾订好计划积极准备欢迎北伐军。不幸，在北伐军到达淮阴前，李已遇害。

李更生性刚毅，不畏强暴，不阿权贵。为教育事业，他不惜挺身斗争。1913年，他被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在议会中担任教育审查员，力主增加教育经费。对于权贵人物的不法行径，他在议会上每每痛加弹劾，以至“闻者咋舌”，被称为“不背民意”的省议员。^⑪ 他为八中申请到新校址，而驻军旅长黄振魁不允迁出，甚至扬言要置李于死命。李毫无畏惧，仍据理力争。^⑫ 一方面利用舆论压力和军政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则与黄曲意周旋，折冲樽俎之间，终于1922年春迫使驻军全部迁让。1924年为修建成志校舍募捐，李首先向淮扬镇守使马玉仁劝捐。马出身“盐梟”，嗜财如命，而李竟能设法使马某捐款八百元。

李从事中小学教育的同时，还积极支持妇女解放运动。当时在封建礼教的桎梏下，男尊女卑的观念很重。他却支持唐治英积极提倡女权和男女平等，赞助唐等首先在淮阴组织了“天足会”（又称“不缠足会”）。^⑬ 同时，还大力提倡女子教育，曾在六师设女子部，聘请女教师，又在淮阴倡办女

子小学等。

对于校外活动与社会福利事业，李也很热心。他在淮阴组织了高小联合会、平民夜校，创办了小型刊物《童灯》、《淮铎》，开展平民救济事业，组织红十字会等。

李更生毕生从事教育，尤重身教，故律己甚严，对子弟亦要求严格。在《八不箴》中即有“教子女不分厚薄”及“遗产不必由子女继承”二则。其族弟李萃为无赖子，曾因强索遗产被他训斥，竟挟怨于1927年4月5日晨刺李于赴校途中，经抢救无效，于7日晨去世。^⑳

注：

- ① 李更生：《赠六师本科毕业生序》，《李更生先生言行录》第22页，1932年扬州胜业印刷社印，以下简称《言行录》。
- ②⑨ 李崇祐等：《先府君行状》，《言行录》第1、2页。
- ③⑪ 徐庶侯：《李更生君别传》，《言行录》第6—7页。
- ④⑤⑥⑩ 张震南：《八中校长之李更生先生》，《言行录》第8、10—11页。
- ⑦ 张通谟、张云谷致李崇淮信。
- ⑧ 吴钊：《六师附小主事之李更生先生》，《言行录》第11—13页。
- ⑫ 范绍曾：《九中校长之李更生先生》，《言行录》第17—18页。
- ⑬⑫ 张震南：《成志初中校长之李更生先生》，《言行录》第13—17页。
- ⑬ 李更生：《为续娶沈夫人通启各界》，《言行录》第43页。
- ⑭ 李更生：《成志初级中学募集国省库公债票作基金启》，《言行录》第44页。
- ⑮ 张震南：《李更生先生事略》，《言行录》第4页。
- ⑯ 《高季可在李更生追悼会上演说词》，《言行录》第53页。
- ⑰ 李更生：《元配唐夫人悼启》，《言行录》第30页。
- ⑱ 李有一个族弟李萃，不事生产，游荡成性，李屡加劝诫不听，反怀恨在心。1927年4月5日，在李赴六师途中，李萃怀利刃相随，乘不意刺之，李重伤不治，于4月7日逝世。李萃逃逸，不知下落。

俞 承 修

姚祚鼎 汪仁泽

俞承修，字志靖，江苏常熟人。1894年5月3日（清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生。其父俞钟璠，清光绪丁酉科举人，是翁同龢的外甥，爱好旧文学。后因翁支持戊戌变法被黜受到牵连，遂改业中医；并在本邑创办“儒英两等小学”，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办学主旨，自此不再在仕途中求进取。俞家子女众多，承修居幼，从小敏慧，深得父亲喜爱，对之精心教读，期望殷切。

俞承修自小受封建传统教育，1909年考进江阴南菁文科高等学堂。该校前身为南菁书院，校内学习旧学的气息很浓，可是他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阅读了谭嗣同的《仁学》、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邹容的《革命军》、严复译的赫胥黎《天演论》，以及孙中山的革命理论等书刊。从而扩展了眼界，思欲有以振兴中华，改变祖国贫困落后面貌，走富国自强的“革新”之路，同时他对“君主立宪”和“伦理纲常”等等在少年时代所受教育，也开始产生了怀疑。当他读到了孟德斯鸠的《法意》和《群己权界论》等有关“三权分立”的学说后，进一步认识到“民主”与“法制”是救国图强的必由之路。这正如他自己在自传中所说：“看了这些书，使年轻的我大为兴奋，尤其是‘共和制度’，深入我心，认为中国

大有可为”，“从而就决定了我在校毕业以后决心去投考政法学校”。①

1912年，俞考进了省立苏州法政专门学校。该校的教师，不是英美派，就是德日派，所讲授的大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学理论，这又进一步加强了他对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的观念。②俞在法专毕业后，于1916年经浙江省司法人员考试录取为专审员，先后被派往浙江嘉兴，山东济南等地担任承审员。1919年到北京参加高等司法官考试，录取后被派往北京司法官讲习所学习。入学之初，正值“五四”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俞也走上街头参加了这一伟大爱国运动。北京司法官讲习所的教师，多为年长资深的司法官，也有日本的法学专家。这两年的学习，为他日后在法学上取得成就，打下了一定基础。1922年讲习所毕业后，他被先后派到浙江永嘉、吴兴、杭县等处地方审判厅为候补推事及代理检察官。1924年调往浙江高等审判厅办事。

1926年在北伐战争影响下，上海收回了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成立了“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1927年俞被调至该院的上诉审法院任候补推事。

俞为人方正，耿直不阿。从1916年走上司法工作岗位，到1931年离开“临时法院”，整整十六年始终未获递补正缺，当有人嘲笑他是个“老候补”时，他也处之泰然，不以为忤，但云只求问心无愧而已。在此一段时间，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在公余之暇，搜集各国法律资料，钻研法学理论，每有发现或心得，即与俞钟骆、张志让等相互探讨，悉心研究，并视此为他生活中的最大乐趣。1927年，东吴大学校长

吴经熊谕知他对法学钻研有素，并在刑法学方面有独到见解，就聘请他到东吴大学讲授刑法学。他在讲课中，每常用大理院的“判例”和“解释”，结合他自己在法院实际工作中的经验，来讲授课文，阐明法理，内容生动，易懂易记，深受学生欢迎并得到学校好评。自此蜚声讲坛，为高教界所知名，一些院校竞相争聘。从1930年起，他先后在暨南大学、大夏大学、持志学院、上海法学院以及震旦大学等院校兼课，讲授民、刑、亲属、继承等法，其中以讲刑法为主。当时在法学界中曾被誉为桃李满天下的刑法专家。

1931年俞辞去了法院工作，加入了上海律师公会，并在任课之余，开业从事律师事务。不久，又担任了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1930年至1935年，他主编《法令周刊》，除为读者解答法律问题外，还为该刊撰写专题和论文。1936年上海法学编译社出版了他所编《中华民国刑法总则释义》和《中华民国刑法分则释义》，次年又出版了他所编的《中华民国新旧刑法比较》。^③当时一些高等院校曾选用它作为教材或参考书。

1937年抗战开始后不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1939年，上海特区法院被敌伪接管后，俞出于爱国主义思想，自行停止了律师业务，并坚决抵制敌伪对他的威胁和利诱，拒绝参加敌伪组织。这时他继续在持志等院校任教，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他才重新复业，执行律师事务。1946年，俞曾应聘担任国民党苏浙皖区敌产管理局的法律顾问；同时还担任“中华法学会上海分会”的理事、“上海司法协会”的常务理事和“上海法学编译社”座谈会委员，从事研究法律等学术

活动。

他在从事律师事务期间，除办理一般案件外，还能出于正义为受迫害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学生、工人出庭作义务辩护。如在抗日战争前，国民党政府为了坚持“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反动政策，镇压在全国兴起的群众抗日救国运动。1936年11月22日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的领导人沈钧儒、沙千里、史良等七人，时称“七君子”案件。当时俞承修等上海、苏州的二十一位律师，出于爱国激情和对反动当局的愤慨，主动担任代表律师，为此案出庭作义务辩护。又如1948年1月，上海展开了争民主，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同济大学学生自治会代表瞿宇平等十一人被国民党逮捕。俞曾替瞿等出庭辩护，办理“同济学潮”案件，最后瞿等全部获释。同济大学学生自治会为此向俞赠送题词为“保障人权、发扬民主”的红色锦旗一面，以资表彰。此外，他还直接或间接支持被国民党逮捕的爱国学生和青年工人，替他们代写诉状，同国民党展开合法斗争。他这样做，有随时遭受反动派迫害的危险，可是他从不计个人的安危得失。这种见义勇为支持革命斗争的忘我精神，赢得了进步舆论的赞许。

1949年上海解放后到1952年，俞仍继续在震旦大学执教，并在上海市人民法院参加陪审工作。之后，他又担任了“中华新法学研究会——上海分会”委员会委员。这时，俞虽已年近六旬，但伏枥老骥，壮志未已，常向人表示：要继续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所颁布的政策和法令，并搜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关资料，去从中探究社会主义的立法精神，以备

我国立法部门起草民、刑、诉讼等法案，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时提供材料。^④不幸的是数十年来俞承修所搜集和积累起来的中外法学资料以及他历年来所写的专著和文稿，在“十年动乱”初期竟被“四人帮”一伙抄没一空，他本人在惊恐之余，于1967年1月20日赍志饮恨而歿。

注：

①② 俞承修本人自传。

③ 均由上海会文堂新纪书局印刷发行。

④ 1952年9月俞本人所填《震旦大学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

傅 东 华

王 震

傅东华，又名傅则黄，笔名有冻菡、冻华、伍实、郭定一、黄约斋、约斋等，生于1893年4月21日（清光绪十九年三月初六），浙江金华人。其父曾在金华城内教私塾，家境清寒。傅从小随父读书，成绩优异。1910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中院（即中学部），于1912年毕业。因经济困难，未能继续升学。1913年傅考进中华书局做练习生，因古汉语和英文均佳，不久即改任编译员。主要翻译由正式编辑在外文期刊上选定的短篇小说，有《白羽冠》、《美人丹》、《黄金魔力》等，在《中华小说界》等刊物上发表。

1916年秋，《中华小说界》因故停刊，傅东华离开中华书局，随后到浙江东阳县立中学教英文。后由同乡邵飘萍介绍，于1919年到北京，曾在平民大学附中、北京高等师范教授英语。1920年，在北京加入“文学研究会”，是年译《青鸟》一书，又与金兆梓合译文艺理论著作《诗之研究》。

1924年傅由京返沪，进商务印书馆任编译员。业余翻译投稿，计有短篇小说《致某妇人》、《曼佛罗特》和《桃园过客》等。1925年译有短篇《参情梦》、《迁士录》、《社会的文学批判论》和《西万提司评传》等。1926年译有短篇小说《奇事的天使》，1927年译有《诗学》和托洛茨基的文章。

1929年至1931年，傅曾在上海复旦大学、吴淞中国公学任教，并著有《两个青年的悲剧》、《人生鉴》等。还译了《饥饿及其他》、《文学之社会的批评》两书和《恫吓》、《资本家》、《革命的女儿》、《珍异的片屑》等短篇。此外还撰有《二十年来的英国诗坛》、《风格与人生》等文章。

1933年7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大型文艺期刊《文学》创刊。郑振铎、傅东华任主编。郑当时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傅为执行编委。

傅在主编《文学》期间，曾联系了一批左翼作家，发表了许多“左联”成员的作品，但也引起两场风波，成为三十年代文艺界两桩公案。一是在《文学》第一卷第二期上，他化名“伍实”，发表了《休士在中国》一文，诬称鲁迅看不起美国黑人作家休士。鲁迅非常生气，写了《给文学社信》，提出抗议，并说明了事实真相。^①二是在《文学》第五卷第六期上，任意删改周文的小说《山坡上》，并在同期的论坛上，发表了《一个小小的实验》一文，用教训的口吻，说周文的小说“写人物的动作过分繁琐”，“牢牢抓住一个无甚关系的断片来细磨细琢”。周文立即给《文学》写信，要求将“砍杀”的部分与信，一同刊于《文学》第六卷第一期上。

傅东华在主编《文学》的同时，还为商务印书馆编撰《基本初中国文》(六册)、《复兴初中国文》(六册)、《复兴高中国文》(六册)。此三套教科书曾风行全国，并为开创我国语文教材编写的新体系作了有意义的尝试。

1934年“大众语”问题的讨论开展起来之后，傅站在支持者一边，并撰有《大众语跟作文》、《大众文学解》等文，

主张应创立群众语言为基础的新文体。同年9月，陈望道创办了以小品文为主的文艺性刊物《太白》半月刊，傅是编委之一。是年，他还编著《选注杜甫诗》、《李清照》、《欧洲文艺复兴》等书，翻译有《赛珍珠女士短作集》等书。1935年6月，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分专辑和单行本两种形式出版，傅是编委之一。7月，他主编了《文学百题》一书，约请全国著名作家撰著。

1936年春，傅东华在沪参与发起组织“文艺作家协会”，为“左联”解散后文艺界出现的联合战线性质的文艺团体。其宗旨在谋求文艺工作者之大团结，保障文艺作家的利益，号召在国难临头之时，文艺家应认清目标一致努力。6月7日文艺作家协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傅被推为理事和章程起草人之一。

1936年10月1日，鲁迅、茅盾、巴金等二十一人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提出：“我们是文学者，因此亦主张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救国而联合。”^②傅也在宣言上列名。

1937年1月27日，在沪出席由潘公展主持召开的文艺作家座谈会，在会上傅提倡推进文艺复兴和文艺界大团结的主张。并说：“过去文艺界曾有数度团结组织，但派别纷歧，团结徒托空言，故我人应谋其真正的团结运动。”又说：“文艺复兴之必然条件，为社会安定，社会安定之道，莫过于统一，今日统一之局面，粗告完成，我人应爱护而巩固之。”^③会上与洪深、邵洵美等被推修改《上海文艺界对于统一救国运动宣言》。“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后，傅参加上海市文化界

救亡协会，并为该会主办的《救亡日报》编委之一。

上海沦陷后，傅留在上海，除编辑出版“孤岛闲书”和继续搞译书外，把精力转向了语言文字学的研究上去。1939年发表《文法稽古篇》。1940年发表《一个国文法新体系的提议》、《书同文考》等文。1941年发表了《汉语声纽变转之定律》。

抗战前傅原在上海兼任暨南大学国文教授。1942年，受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之邀，于7月携全家赴福建建阳暨大任教，路经浙江金华时，全家被日军所虏，并被押往杭州敌伪特工总部。9月由汪伪浙江省长傅式说保释。放出后，即随傅式说在汪伪特工部“闽浙皖赣四省行营总指挥部”任主任秘书、教育处长、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伪职。并主编敌伪刊物《东南》月刊。1943年傅脱离敌伪机关，隐居上海，从事翻译和致力于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

1955年，傅被邀参加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他在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的研究方面有较高的成就，在把字的形音义三者结合起来的的研究上，有独到的见解。他著有《北京音异读字的初步探讨》、《汉字——汉字知识讲话》、《字义的演变》、《汉字变迁》、《字源》、《现代汉语的演变》等书，并编写了《汉语拼音词汇》初稿等，为推广普通话和改革汉字作出了贡献。同时，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任作协上海分会理事、上海社联语文学会理事。1956年傅被聘为上海市政协特邀委员。在古籍整理工作方面，他参加了《资治通鉴》清样校注，标点《汉书》，并加工整理《后汉书》、《三国志》的标点本。

1959年底，傅东华进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工作，担任编审及《辞海》语词学科主编、辞海编委会委员。1965年又参与了《汉语大字典》的筹备、编纂工作。

傅东华长期从事翻译工作，一生翻译作品颇多，除上面提到的外，尚有古希腊两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英国弥尔顿的长诗《失乐园》以及《我们的世界》、《美学原理》、《虎珀》、《夏伯阳》、《慈母泪》、《红字》、《难兄难弟》、《天下太平》等多种。1971年9月10日，傅东华在上海病逝。

注，

- ① 鲁迅，《给文学社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5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 ② 见《文学》第七卷第四期，第744页。
- ③ 《文艺家座谈会》，载《辛报》1931年1月30日。

王 闾 运

白吉庵

王闾运，字壬秋，又字壬父，书斋名湘绮楼，故以湘绮为号，湖南湘潭人，公元1833年1月19日（清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生于善化县（今长沙）。其父王士璠，业商。王闾运六岁丧父。七岁入塾，三年后“日诵不及百言”；后能成诵，又不能解，因此常被同学们嬉笑。塾师激励他说：读书被人嗤笑，是可羞耻的，而被人耻笑还不奋发，那就太没出息了。之后，他发奋向学，废寝忘食地攻读，而且持之以恒，结果有长足的进步。十七岁时应童子试，答卷中有“月落梦无痕”的佳句，甚得师友之赞赏。十八岁入长沙城南书院学习，老师选文四十篇授之，未数日竟能应对如流，不失一字。十九岁应县试，补诸生。不久与邓辅纶、邓绎、李寿蓉、龙汝霖成立兰林词社。他们的诗文，极力模仿两汉、魏晋时代的文体，如五言诗、骈体文等。但只是形式上的功夫，缺乏创见，所以后来有人评论他们的作品是“假古董”。

1853年3月太平军攻下南京，旋即进行西征。次年冬，王闾运应湖北布政使夏廷樾之约，至武昌游玩。是时，正值湘军与太平军在九江交战。他们议论湘军“攻坚之不便”^①，于是由王起草，上书曾国藩，建议回师武汉、厚集兵力，始可东下直取金陵。但这个意见没有被曾国藩接受。后来湘军

水师败绩，王闿运很得意，认为自己有先见之明。在这一年，太平军进展神速，横扫东南七省。他见此情景，忧心忡忡。仿北朝诗人庾信的《哀江南赋》，依韵作赋，以表达他对清王朝的眷念，及对太平军的恐惧心理。

1855年王接受友人邓辅纶之聘，往湖南武冈教家塾，并从此开始研究“三礼”。因经文难懂，于是先作“仪礼演”十三篇，分章节，正句读，作注解。后来在此基础上写成《礼经笺》、《周官笺》、《礼记笺》等书。1857年他赴长沙参加乡试，得中第五名举人。

1859年春，王闿运到北京应礼部试，未中。他认为京城乃文人荟萃之地，故决定留下，居法源寺。不久经友人介绍，入户部尚书肃顺府中为塾师。次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王闿运闻讯赶到安徽祁门，在曾帐下充当幕僚。因他为人恃才傲上，不为曾倚重。王多次建言，均未获采纳。王在军中待了一个时期，因母病返回湖南。

1864年7月，曾国藩的湘军攻占太平天国首都南京，王闿运于10月赶到军中，本想获得一官半职，但遭到曾国藩的冷遇。他觉得脸面无光，遂不辞而别，乘船北上，重游燕赵。同年11月到山东齐河，遇大雪冰封，船不能行，上岸夜宿村舍，无限感慨，于是作《思归》一首，序云：“叹停车徘徊，感念伊人，咏其思归之篇，悲所志之不遂。”^②从此产生“归隐”的意愿。

翌年5月，王回到长沙，即率其妻儿移居衡阳西之石门，过乡村生活。日以课读儿女和埋头经史著述为事，但间亦出乡远游或访友。1871年再次赴京会试，仍名落孙山而归。从

此潜心著作，成册者有《庄子内篇注》、《今古文尚书笺》、《诗补笺》、《衡阳县志》、《春秋公羊何氏笺》等书，而其中又以“公羊传”为代表作。

1876年夏，湖南蒸水暴涨，附近村庄受灾。王因房屋倒塌，无法安身，遂移居长沙。在营盘街宅中建湘绮楼为书斋。从而结束了十二年的所谓“隐居”生活。

王闿运回到长沙后，受原湘军将领郭嵩焘等人之托编撰湘军志，为避开城市繁嚣专心著述，移居城之东山。1878年冬，《湘军志》初稿略定，时逢四川总督丁宝桢来请，遂入川任成都尊经书院主讲。到职后他要求学生专心向学，不问政事，并规定学生不得条陈时事，若在外违约者，“经长官告知，院册即行除名”^③。在教学方面，他提倡分经授业，仿汉代儒生办法，每人专治一经。他说治经之法，治《易经》当先知一字有无数用法；治《尚书》当先断句读；治《诗经》当知男女赠答之词；一洗三陋，方可言《礼经》，理明然后治《春秋》，等等。在此任教八年，他培养了一批经生，其中较著名的有治《公羊》《谷梁》《春秋》的廖平；治《尚书》的戴光；治《礼经》的胡从简；还有刘子雄、岳森等人，都是当时知名的学者，号称“蜀学”^④。王也被誉为“一代名儒”^⑤。

王闿运在成都从事讲学的同时，仍继续编撰《湘军志》。1881年此书全部完成，并已付刻。10月他携《湘军志》刻版回到长沙后，湖南官绅对此书议论纷纭，其中郭嵩焘等人也很有意见，认为是书之编撰。多采人世谬悠之谈以为实录，而且对湘军将领，包括曾国藩在内，多有微词，明扬暗贬。曾国荃尤为恼火，认为王闿运在叙述湘军攻占南京时，没有

表彰他的功绩，把一场大胜仗写得平淡无奇，而且贬斥湘军兵将之间是“以利为义”等等。因此视为谤书，必欲毁之而后快。在此情况下，王闾运遭遇不测，随即将书及刻版送交郭嵩焘，请他出来调解，并嘱为销毁，以免后患。他致书郭嵩焘说：“以众怒难犯，先生与交笃，在湘绅中又负重望，故出此也。”^⑥于是，王闾运经过多年心血成就的这部书，在官僚集团的威慑下，结果付之一炬。

次年，王闾运返回尊经书院。蜀中诸生听说刻版已毁，愤恨不平，故重刻之。从此《湘军志》广为流传，成为王的一部代表作。由于作者与曾国藩等人有矛盾，是书对湘军将领的反动面目，作了一些暴露，对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些难得的资料。

1886年王妾莫氏病逝成都，王亲为移柩回乡；不久，四川总督丁宝桢亦病故，他便留在湖南了。逾年，他勉强接受郭嵩焘三顾之请，任长沙思贤讲舍主讲。1891年王辞主讲，应彭玉麟之聘，去衡阳任船山书院山长。之后常居于此，但也时常外出访友或是讲学。

1898年戊戌变法时，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也提倡新学，在省城设立南学会。同年陈拟派王闾运之长子王代功率领学生游学日本，他坚决反对。他的弟子杨锐、刘光第等人，在北京参与维新运动，曾秉承清廷意旨，拟请王出山任职，去信征求意见。他认为变法终不久长，于是婉言谢绝了。

1902年他的另一个弟子杨度，因受新思潮的影响，准备赴日本留学，他劝阻无效。后来他感慨地说：读书不能改变人的气质，习俗之染甚于师友之言，时势使之然也。为此他

曾上书反对开办新学。

1904年王闿运正式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请，携家属到南昌任江西大学堂总教习。初时讲授《礼记》，不月余，地方议筹款十六万元建新学，他极力反对，但无济于事，便辞去教职到夏时署中当幕僚。不久夏调任陕西巡抚，王乃告辞还乡，仍讲学于船山书院。1908年夏，由于湖南巡抚岑春蓂奏荐“耆儒”，清廷授王闿运为翰林院检讨，后又加侍讲衔。次年北京新设礼学馆，他又被聘为顾问官。

辛亥革命前一年，湖南长沙发生抢米风潮，清吏采取镇压手段，民众愤极，于是焚毁了巡抚衙门及外国领事馆，并要求岑春蓂下台。王闿运为此赶往省城，写信慰问岑春蓂，为清吏辩护。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各省区纷纷响应，一个多月内，全国半数以上省区宣布独立。王对革命神速发展，甚为惊奇，说：这是历朝以来所未及防之事。次年，民国成立，衣冠制度皆已改变，但他仍然穿清朝的服装。他为清帝被迫退位而不胜惋惜，并赋诗抒发胸中之悲哀，悼念清室之覆亡。

1913年，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旋即解散国会，启用一批清室遗老，成立参政院。次年4月王闿运被邀入京，5月被任命为国史馆长兼参政，时王已年过八旬。不久，复辟之风甚嚣尘上，那时在国史馆任编修的宋育仁发表了“还政清室”的演说，王表示赞成，并已署名。后来，这股逆风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袁世凯不得不佯为制止，将案件“交内务部查明办理”。同年11月宋育仁被遣返回四川。在宋

离开北京时，王派其长子到车站送行，并送了二十元钱。后来他怕牵连自己，也在年底匆匆离京，到汉口后才写信给袁世凯辞国史馆长职。袁世凯曾复函抚慰，并请他“遥领史职”^⑦。

1915年袁世凯加快步伐推行帝制活动，筹安会为之呐喊。时杨度派人到湖南请他作表劝进，且致函说：总统将称帝，因先生为国老，惧持异议，故欲请劝进。王从清室遗老的立场出发，对袁氏帝制自为，持反对态度，于是写信告诫杨度说：“总统为人民公仆，不可使仆为帝”^⑧云云。

1916年10月20日，王闾运病逝湖南衡阳山塘。王生前著作甚丰，有《湘绮楼诗文集》、《湘绮楼日记》、《春秋公羊传笺》等数十种。

注

- ① 王代功：《湘绮府君年谱》，1923年湘绮楼藏版，第1卷，第13页。
- ② 王闾运：《湘绮楼诗集》，1907年刊本，第6卷，第20页。
- ③ 同①，第2卷，第27页。
- ④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页，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出版。
- ⑤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1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重印。
- ⑥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下），1971年台北出版，第884页。
- ⑦ 同①，第6卷，第13页。
- ⑧ 同①，第6卷，第17页。

廖 平

汤志钧

廖平，字季平，1852年3月29日（清咸丰二年二月初九）生，四川井研人。家贫，其父曾为人牧牛、佣力，后稍自给，在盐井湾设一磨坊，廖平始能读书，勤于学。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张之洞放四川学政，次年院试，张对廖平很是赏识，拔为第一，补为县学生。1876年（清光绪二年），调尊经书院肄业。不久，王闿运到四川，主讲尊经书院，授《春秋公羊学》，谈今文经说，廖平受其影响，称“高第弟子”，与绵竹杨锐、汉川张祥龄齐名。1879年乡试，廖平考中第二十四名举人。1889年成进士，以知县用。廖平考虑亲老，不愿到远处做官，请求改就教职，选授龙安府学教授。历署射洪训导、绥定府学教授、尊经书院襄校及嘉定九峰书院、资州艺风书院、安岳凤山书院山长等职。

廖平早年研求宋学，后来逐渐专门分析经学中的今文与古文。他的学说以善变称，大体说来，从1883年到1902年的二十年间，学凡四变。第一变讲“今古” 初持古文为周公所创、今文为孔子所创之说，认为今文学崇奉的《王制》和古文学尊崇的《周礼》可“同治中国”，分别周公和孔子的异同。这时虽平分今古，但已说“《左传》出于今学方盛之时，故虽有简编，无人诵习，仅存秘府而已。至于哀、平之间，

今学已盛而将微，古学方兴而未艾，刘子骏（歆）目见此编，遂据以为今学之敌，倡言求立。至于东汉，遂古盛而今微，此风气盛衰迭变之所由也”^①。已对古文经学的创始人刘歆表示不满，代表作是《今古学考》。

第二变讲“尊今抑古”。1884年廖以本文为孔子的真学，古文是刘歆的伪品。自称：“当时分教尊经，与同学二三百人朝夕研究，析群言而定一尊，于是考究古文学渊源，则皆出许、郑以后之伪撰，所有古文家师说，则全出刘歆以后据《周礼》、《左氏》之推衍。又考西汉以前言经学者皆主孔子，并无周公。六艺皆为新经，并非旧史。于是以尊今者作为《知圣篇》，辟古者作为《辟刘篇》。”^②代表作是《知圣篇》和《辟刘篇》。这一时期，他尊奉孔子之“圣”，攻击刘歆之“篡”，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所本。

第三变讲“小大”。1898年说什么《周礼》是皇帝书，与《王制》大小不同，“一内一外，两得其所”。代表作是《地球新义》、《王制集说》和《皇帝疆域图》。

第四变讲“天人”。1902年廖以《尚书》为“人学”，而《诗》、《易》则“遨游六合以外”，是“天学”。他把过去写的《诗》、《易》旧稿加以改正，专门讲天人之说的演进。代表作是《孔经哲学发微》。

戊戌政变后，因康有为援引今文经说，推演变法维新，受到廖平启发，于是廖平被劾为“离经叛道”、“逞臆说经”，被革职。1909年，四川提学使赵启霖又以廖平讲左丘明实无其事，《春秋》三传都出于子夏，说是“穿凿附会”，命四川各

学堂不得再延廖平讲学。1911年，辛亥革命起。次年，刘师培任四川国学馆长，聘廖讲经学。1913年廖出席全国读音统一会，为四川代表。1914年，任四川国学学校（后改为公立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校长，后兼成都高等师范、华西大学教授，至1922年辞退。

民国以后，廖平的学说又有改变，先把“小大”融合在“天人”之内，讲“人学、天学”（第五变，1918年），以六经皆孔子所作，各有领域，〈礼〉、〈春秋〉、〈尚书〉三经为“人学”，以〈周礼〉、〈王制〉为之传；〈易〉、〈诗〉、〈乐〉三经为“天学”，以〈灵素〉、〈山海经〉、〈庄子〉、〈列子〉、〈楚辞〉为之传，“各有皇帝、五伯四等”。后来又想再变一下，但愈变越离奇，终于没有变出来。

1932年6月5日，廖平由四川嘉定返里，途中病逝。廖平著书甚多，除经学著作外，兼及医术、堪舆，撰有〈四益馆经学丛书〉，后又增益为〈六译馆丛书〉。

注

① 廖平：《今古学考》卷下，第9页。

② 廖平：《经学四变记·二变记》。

李 苦 禅

姜克夫 李 侃

“余门下弟子数百人，人也学吾手，英也夺我心。英也过吾，英也无敌。来日英若不享大名，天地间是无鬼神矣！”通过半个多世纪艺术实践，李苦禅在国画艺术上的造诣，完全证实了我国写意画大师齐白石的上述预言。

李苦禅原名英杰，后改名英、超三，字励公。1922年考入北京“国立艺专”，时常在夜晚租洋车拉客挣钱，以购买绘画材料，每日仅以窝窝头和稀粥为生，穷且益坚，学习更加勤奋。同学林一庐怜其清苦，赠名“苦禅”。从此遂以“苦禅”为艺名。苦禅1899年1月11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生于山东省高唐县城西李奇庄一个农民家庭。童年时代，在偏僻的鲁西北农村无处娱乐，李奇庄前一座庙宇就成了他和小伙伴经常玩耍的地方。庙里有许多泥塑神像和壁画，是供村民顶礼膜拜的精神偶像。苦禅一面听老年人讲述画上的故事，一面以树枝在地上画着英雄的形象。当时庙里住着一位穷困潦倒靠画庙宇壁画为生的远房爷爷李宾，他见苦禅酷爱绘画艺术，经常把笔教习，从此这位农村老艺人就成了苦禅习画的启蒙老师。

1906年，在乡亲们的援助下，苦禅入本村私塾读书，经过五六年的苦读，从而打下国学和书法的基础。1913年苦

禅考入高唐县城高等学堂，因学习成绩优异，获得免交学费的奖励。苦禅家境清寒，其父李名题仅有盐碱薄田二十余亩，丰年也只能以红薯高粱饼子维持一家生计，无余力供应子孙读书。故在苦禅读私塾时，即欲令其与同龄长孙辍学务农，但因苦禅系父亲的幼子，又特别聪慧，最后还是决心节衣缩食，供苦禅进县城念洋学堂。

1916年，苦禅在高等学堂毕业，向其父要求升中学。对此老父颇感为难，不允报考感觉委屈了孩子的优良成绩，让考则又财力不济。经苦禅挽亲朋再三向父亲请求，始允许其去聊城投考，居然考取了官费的山东省立第二中学。其父从此持家更加俭省，并向亲朋借贷，维持苦禅读完三年中学。东昌府在鲁西北素以文风盛而著称，苦禅在此读了不少书，眼界大开，特别是当地的大戏、民间艺术、庙宇和古代建筑，给了苦禅以极大的感染力。他在课余之暇，经常前往临摹、写生，绘画才能初露头角。老师和同学都认为苦禅有绘画天才，鼓励他去杭州或北京报考艺专深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人曾来我国招工，当时我国贫穷学生为追求知识，曾由国民党人李石曾组织勤工俭学会，介绍贫苦青年以半工半读方式到法国留学。立志学习绘画的苦禅到处奔走借钱作路费，遂于1919年考取了北京大学附设的“勤工俭学会”，从此以半天时间学法语和绘画，以半天时间在铁工案子上干活。同时有机会在北大附设的“业余画法研究会”里，向比他年长两三岁的徐悲鸿学素描；他有时在北大中文系旁听，从而打下了坚实的造型功底和文学基础。

1922年春天，李苦禅考进了北京国立艺专“西画系”。

艺专为欧化最深的学校，学生大都为富家子弟，穿着为西服革履，而苦禅成年穿着家乡寄来的棉布长衫和布鞋。时值军阀混战，鲁西北饱受兵匪蹂躏，李名题更挤不出余钱供儿子读书。苦禅仰仗其自幼习武锻炼成的结实身体，经常一晚拉四个小时的洋车挣钱维持生活，白天到校坚持学习。当时艺专学生除家居北京的同学走读外，外地学生大都寄宿在阔绰的公寓内。而苦禅则借住古庙，长期过着夜晚拉车白天上课的苦行僧生活。故同学们以“苦禅”名之，他认为“名之固当”。

苦禅来自民间，酷爱国画艺术，早年生活在古朴的鲁西北平原，熟悉农村的一草一木和花鸟鱼虫，尤其在秋冬之际农民架鹰猎兔的雄姿，和渔夫以小舟载鱼鹰在古运河潜水捕鱼的风采，给了他以很大的艺术感染。虽然他的油画人体与风景的成绩，得到艺专捷克教授齐蒂尔、法国教授蒙日与克罗多的称赞，但还是在第二年即欲转学国画。由于“四王”^①的模式长时期统治着国画界，陈陈相因，使艺术生命日趋枯萎，当时只有齐白石等极少数“非主流派”的画家不守旧，喜创新，爱画民间生活题材和自己的内心感受。然而齐翁当时在画坛地位一般，但苦禅喜爱齐翁富有乡土生活气息的作品和不巴结权贵的高尚品德，遂于1923年登门拜齐白石为师。当年拜师要送为数可观的贽敬，而苦禅身无长物，仅凭那深重的山东乡音和一片仰慕虔诚之心，却博得了白石先生的青睐，欣然纳于门下。此后，师生常在一起琢磨绘画艺术，李被齐视为门下第一位知音者。正如齐白石在苦禅一幅画上题的那样：“余初来京时，绝无人知，陈师曾（字槐堂）

已名声噪噪，独英也欲从余游。”苦禅的绘画艺术由于不断受到白石的指点而颇得真传，再加上他的刻苦磨练，在艺专将毕业时其作品已超越侪辈。

1925年艺专校长林枫眠观看毕业生画展，忽然发现署名苦禅的几幅国画，惊奇的问：“我怎么不知道咱们艺专还有位苦和尚？”当陪同参观的教师告之“苦和尚”即穷学生李英杰时，林枫眠赞叹不已。展出的作品遂被参观者选购多幅。从此，苦禅的画名即蜚声京城。

李苦禅于北京艺专毕业后，即于1925年开始了近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活，先后应聘在北京市立师范学校和保定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美术教师，1930年被国立杭州艺专校长林枫眠聘任为国画系教授。苦禅在山青水秀，柳堤荷浪的西子湖畔生活了将近四年，使其在艺术水平上获得进一步的提高。他在教授水墨花鸟与山水画时，多带领学生到野外写生。在锻炼学生的基本功的同时，结合古代写意画大师和齐翁的笔墨，创作自己的画稿。苦禅创作的雄鹰、鹭鸶和渔鹰等，为其写意画的代表作。在国内美术界被誉为南潘（天寿）北李（苦禅），同为写意画的巨擘。

1935年冬，李苦禅因不同意杭州艺专开除进步学生沈福文，以及去“苏州反省院”保释被捕学生凌子风、张仃，被学校当局停聘而携眷迁回北平，先后在私立华北美专和华北大学艺术系任教。“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学校多被日本侵略者所控制，他激于民族义愤，宁肯饿死也不就任敌伪大学的教职，隐居于西城柳树井民居，以鬻画为生。当时敌伪亦有附庸风雅者，曾有一汉好求画扇面，他即以狂草书：“日

月已沉海，蛟龙乱升天。”以阴斥之。1940年李因“私通八路罪”被捕入狱后，一家生计更为拮据，长子李杭与小贩一道赴张家口趸菜，受尽伪警欺诈，家人常到寺里排队领取慈善团体舍施的救济粥。因为长期过着饥馑的生活，苦禅身体日渐衰弱。1943年冬，苦禅传染上斑疹伤寒和脑膜炎，被送进医院，病势沉重，经诊断“非注射德国进口药针不能挽救”，但此药价昂，因苦禅平素为人豪爽能舍己助人，朋友闻讯纷纷解囊相助，始获药石转危为安。

日本投降后，徐悲鸿来北平接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与齐白石联名聘苦禅为国画系花卉翎毛教授。他正振作精神投身教学之际，不料内战爆发，贪官污吏横行，物价飞涨，广大人民又处在饥饿线上。苦禅在“戏丑官图”上题道：“千里来做官，意的在何焉？无非金钱与美女，……”以表达对那些发国难财的“接收大员”的憎恨。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苦禅以当年曾与毛泽东、徐特立等中央负责人在勤工俭学会有同窗之谊，上书反映美术界压制国画的情况。毛泽东曾亲笔致函中央美术学院为之关说。这时他虽已年逾五旬，仍报名参加土改工作队，亲身投入四川省的土地改革运动。返校后仍在中央美术学院任职。

李苦禅生长于农村，养成了农民的淳朴作风和爽直性格，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话必说。曾对1957年以后某些“左”的政策表示异议，故长期遭到不公平待遇。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被目为“右派教授”、“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1970年被下放河北磁县农村劳动，1971年因病回北京。

1972年，周恩来总理为布置装饰我国驻外使馆和国内宾馆，指示国务院请国内著名画家在北京饭店等处作画，同时借此机会为画家们恢复名誉。两年中，苦禅为国家义务作画三百余件。但苦禅抑制不住内心对林彪、江青推行文化法西斯统治的愤懑，曾画有一幅荷塘巨制。江青一伙把它说成攻击八出“样板戏”，组织美术界对苦禅进行批斗，使其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创痛。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祖国大地重现光明，苦禅兴高采烈，遂绘制“红梅怒放”、“晴雪”等以抒发无限喜悦之心情。苦禅又焕发出艺术的青春，以饱满的热情从事国画的创作，装饰人民大会堂和一些公共场所，让更多的群众有机会欣赏到国画艺术。

李苦禅勤奋劳动，一生创作了数以千计的优美画卷，为海内外爱好者所珍藏。他的画磅礴大气，沉郁雄浑，笔墨豪放纵逸，及至晚年更加雄健苍劲，为民国以来花鸟写意画派，继齐白石后又一最享盛名者。写意画鼻祖为宋代的石恪、梁楷、苏轼、法常等大师，经明代的徐渭，清代的石涛、“扬州八怪”与八大山人以及清末的任伯年、吴昌硕诸位大师弘扬光大。民国以来，齐白石以民间艺术家之身分，刻苦精进，集前人之精萃，奇峰峻立，成为一代写意派之宗师。而苦禅亦崛起于民间，从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又投拜齐白石门下和师承历代大师，领悟先贤之美学精神、笔墨玄奥与自然意趣，融合自己的意匠创造，将写意花鸟画发展到一个新的境界。同时苦禅于绘画之外，更关心祖国的安危和人民的苦乐，他爱憎分明，抒发其情感

于花鸟鱼虫之间。故其画很有时代色彩和富有人民性，因而为广大人民所喜爱，被赞为写意画的一代大师。

中国传统绘画与书法堪称双璧，苦禅幼年时经塾师教导，已打下楷书的基础。及长，临摹沈曾植、黄道周、张瑞图、怀素、颜真卿、李北海、郑道昭以及汉魏名碑法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书法风格，质朴浑厚而又风神婉转，和他的绘画互为表里，深受国内外书法家的推崇。苦禅来自山东戏剧之乡，于绘画之余爱好京剧，并擅演武生。他认为“京戏是写意戏，是传统的综合艺术，要画好中国画一定要知京戏。”

李苦禅虽系国画艺术家，但能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五四运动时，他参加爱国演说、游行与火烧赵家楼的斗争。其后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早在二十年代末期，现河北省妇联主任郝冠英（鲁伟）等，在女师大读书，遭受军阀警宪追捕，即藏匿李家，并获赠转移路费；三十年代初期，现“北影”导演凌子风在北平被国民党宪兵第三团逮捕，苦禅日夜仆仆平、沪道上奔走营救；而抗日战争中，更与中共北平地下工作者黄浩有联系，曾掩护冀中抗日根据地来平治病的袁祥峰。后因被汉奸密报，苦禅于1940年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在沙滩“北大”红楼底层，受尽了酷刑，但他坚贞不屈，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及至“十年动乱”期间，更饱受“四人帮”的迫害，但他从未失去对祖国前途的无限信赖。当江青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黑暗日子里，他还书写“雪侮霜欺芳益烈”的条幅，以表述其坚信人民与正义必胜的坚强信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文化部党组推翻“四人帮”横行时强加给艺术家们的诬蔑不实之词，认为苦禅一生无私无畏，高风亮节，长期支持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在绘画艺术上，含辛茹苦，继往开来，研精邃思，继承传统，变革古法，扫除蹊径，另辟幽异，创出自己的风格。他从事绘画教学六十年，诲人不倦，循循善诱，桃李满天下，为艺苑大放异彩。1977年苦禅被再次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1980年被特邀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党和国家的关怀，更激发苦禅为祖国的统一和为“四化”建设献身的积极性。1983年1月13日，首都美术界同仁二百余人为他举行从事艺术教育六十年的纪念会上，苦禅还豪迈的说：“虽然去年夏天我得了脑血栓，住进医院，现在又和大家在一起啦！脑血栓它栓不住我，我想再画它二十年”。不料于6月11日1时，因老病复发而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六岁。

苦禅一生绘画甚丰，代表作品为“山岳钟英”、“渔鹰”、“松鹰”、“鱼”、“鸟语花香”、“红梅怒放”、“盛夏图”等。

出版著作有：《苦禅画册》（第一集）、《李苦禅画辑》、《李苦禅画集》（上海版）、《李苦禅画集》（山东版）与《苦禅画鹰》等。并将一生的绘画技巧拍成教学影片“苦禅写意”、“苦禅画鹰”与“中国花鸟画”。

注：

① “四王”，系指明末清初传统派画家王时敏、王翚、王原祁、王鉴四人。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王森然:《苦禅画集序》,1936年北平版。
- ② 曹禺:《李苦禅画集序》,1980年山东人民出版社。
- ③ 李端:《回忆父亲早年在家乡的生活》,1984年2月3日。
- ④ 李燕:《风雨砚边录》,1984年。
- ⑤ 范曾:《但留清气满乾坤》,《中国青年报》1983年6月。
- ⑥ 黄奇南:《回忆李苦禅老师在沦陷区》。
- ⑦ 魏逸儒:《忆与先生同狱时》,《北京晚报》1983年7月20日。
- ⑧ 蒋兆和:《悼我老友苦禅》,《人民日报》1983年7月18日。
- ⑨ 许麟庐:《苦去甘来兄离去》,《北京晚报》1983年6月30日。
- ⑩ 王朝闻:《领异标新》,《人民日报》1983年7月18日。
- ⑪ 沈福文:《著名画家李苦禅教授》。
- ⑫ 《李苦禅教授追悼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1983年7月6日。
- ⑬ 黎明:《画不惊人死不休》,台北《雄狮美术》1984年6月。

沈 克 非

商一仁

著名外科专家沈克非，1898年3月2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十）生于浙江嵊县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他幼时家境清寒，三岁丧母，依靠父亲任小学教师的菲薄收入抚育成人。他的祖父是个基督教牧师。1914年沈毕业于上海华童公学，旋入杭州之江大学中学部。1916年考取北京清华学校庚子赔款预备生。1919年远涉重洋，就读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文市的西余大学（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1924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后留任该校教学医院为外科助理住院医师两年，同时担任美国中部学生分会会长、美国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会长。1926年，他返回祖国，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住院医师及住院总医师。1929年任芜湖医院外科主任。1930年担任南京中央医院外科主任，后升任副院长、院长。

沈克非在青年时代，目睹动荡、贫弱、分裂的旧中国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很早就醉心于“科学救国”，立志要摘掉中国人民头上的那顶屈辱的“东亚病夫”的帽子。他认为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先进的医学科学。二十年代的旧中国，西医还处于萌芽阶段，各地的医务力量，直接或间接掌握在教会手里，如北京的协和医院、南京的鼓楼医院、湖南的湘雅医院、上海各教会大学的附属医院等。沈克非渴望改

变这种局面，而他所在的中央医院则是中国人自己开办的第一所大型医院。沈出长该院后，苦心经营，锐意图新，从医院的行政管理、医疗质量、医师修养及作风等各方面下功夫，建立了一整套科学制度。为了提高医师队伍的质量，他每年暑假往返宁沪道上，亲自到上海选拔医学院毕业生，充实中央医院的医务力量。在沈的精心擘画下，该院逐渐成为当时国内的第一流医院，外国人垄断我国西医事业的局面有所突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央医院始迁长沙，再迁贵阳，后建院于当时的陪都重庆。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沈不惮辛劳，往返奔波于祖国大西南。1941年国民政府委任他为中央卫生署副署长兼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医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又随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印度，在军队中担负起救死扶伤的重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沈克非辞去卫生署副署长职务，受聘为上海医学院教授兼该院附属医院——中山医院院长和外科主任，一直到新中国成立。

沈克非曾多次参加国际性医学会议。1944年，他作为中国医学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赴伊朗德黑兰参加中东医学会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英、美、苏四国倡议成立联合国，沈克非作为中国医务卫生界的首席代表，曾赴美国纽约参加创建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1946年，沈去南美秘鲁，参加在那里召开的第五次国际外科学会，继又赴美国考察。在外科学会上，沈提出的论文对于麻醉术、胸腔手术作了精辟的阐述，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沈克非在沟通我国与西方医

务界方面起了桥梁作用，增进了学术交流，建立起友谊。他曾获得好些国家的医务界知名团体和个人赠送的锦旗、杂志、书籍及纪念品，它的名字（Dr. Shen James Kofei）在西方医务界为许多人所熟知。他还是国际外科学会中国分会的负责人、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

新中国成立后，沈克非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积极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曾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沈组织志愿医疗队到鸭绿江畔，担任医疗队技术顾问团主任顾问，后又在沈阳筹建中心血库，抢救志愿军伤员。1952年到1958年，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副院长，负责科研工作。后又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教授、副院长、外科系主任、中山医院院长等职务，直至去世。他的夫人陈翠贞，是儿科专家，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第一医学院教授兼该院儿科医院院长。

沈克非以高超的外科医术享誉海内，曾首创脾脏切除大网膜后固定术，以治疗晚期血吸虫病，疗效显著。他重视新兴学科，注意吸取世界先进医学科学成果。上海第一医学院的脑外科，就是在他推动下创建并发展起来的，他并且是第一个为脑瘤病人施行手术的医师。1950年春天，中山医院接受了一个确诊为脑瘤的病人，送进医院时已神志不清。经过沈克非长达九小时的手术，终于使病人起死回生。当时上海的《新闻日报》曾以“医疗手术上的辉煌成就，沈克非割治脑瘤成功”为题，高度评价这一外科史上的胜利。

沈克非不仅是出色的外科医师，也是我国医学教育的先

驱，很久以来他一直是医学院的一位受人欢迎的教授。他非常重视临床教学，强调外科原则，总是尽最大努力使病人不受或少受可以避免的痛苦。他认为医师治病救人，应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特别是人道主义精神，否则就是亵渎这一神圣职业。对待工作，他讲究实效，勇于负责，要求严格，人们对之都很钦佩。在医务界，他“桃李满天下”，其中不少人早已成为我国医务界的骨干，并在医学领域中作出贡献。

医学科学在解放后获得迅速发展，在临床部门中，外科学尤为显著。为赶上世界医学科学先进水平，1956年我国医学界自己编著的第一部高质量的《外科学》问世，沈克非任主编，故又称“沈氏外科学”。这部大型的专业著作，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同学派及其理论，在书内均有所反映。如关于休克发病机制的两个主要基本观点——神经论和体液论，同时获得叙述和阐明。此书对外科理论、临床技术等方面都有系统的阐述，为临床医师及医学院学生所必读。出版后在数年内就曾再版六次。《外科学》出版后，沈则因过于劳累致心脏病发作。稍愈，又倾全力编写《外科学》的姐妹篇：《外科手术学》，此书分胸腔、腹腔、神经、泌尿、心血管等几个分册，可惜只出了二册，由于“文化大革命”被迫中辍。

沈克非为人正直，一生廉洁奉公。他拥护公医制度，本人坚持不挂牌、不私人开业，一向反对以医学技术作为敛财的手段。他的这种医德，受到许多人的称赞。

在“十年动乱”中，沈克非受到冲击。1972年10月9日，沈因患癌症去世。粉碎“四人帮”以后，沈克非教授得到昭

雪，1978年3月，他的骨灰被安放进上海龙华革命公墓。

注：

本文资料来源除参看有关文字外，还得到上海医务界知名人士石美鑫、史玉泉、冯幼贤、王鹏万诸先生的帮助。承蒙他们提供资料，特此一并致谢。

吴耀宗

汪仁泽

吴耀宗，广东省顺德县人。生于1893年11月4日（清光绪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父亲吴博樵在广州开设木材铺。吴耀宗自幼聪颖好学，因家庭人口多，经济较拮据，他常用竹竿在家门后面小河滩旁划沙练字。少年时在广州就读于英国人开办的育才书舍，由于成绩优异，每年都获得奖学金。1909年，入北京税务学堂，1913年毕业，先后在广州、牛庄等地税关工作。1917年调至北京总税务司署任职，工作之余，常到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参加活动。1918年受美国来华传教的艾迪博士的影响，受洗入基督教。1920年，他因宗教信仰的关系，接受“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思想，辞去当时被称为“金饭碗”的海关职务，到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先后担任学生部干事、主任。1921年与杨素兰医生结婚。1924年吴去美国协和神学院、德鲁神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并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27年回国，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工作，担任专做青年学生工作的校会组主任。1934年后改任该会出版组主任和青年协会书局的总编辑，直到解放。

青年时代的吴耀宗，由于受到基督教义“爱人如己”和国际上唯爱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国内发起组织“唯爱社”，

并担任该社主席，与唯爱主义的国际组织建有联系。参加唯爱社的多为基督徒中的知识分子，主张非暴力主义，认为只有用“爱心”才能感化人类、改造社会，使社会达到理想境界。此时，他还受印度民族运动领袖甘地及其非暴力思想的影响，曾将《甘地自传》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后来他又利用赴印参加国际基督教会议的机会访问甘地，赠给该书中译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政府的妥协退让，不到三个月，东北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殖民地，三千万同胞成为亡国奴。吴激于民族义愤，痛感唯爱主义不能救中国；并在与抗日爱国进步人士的不断接触中，受到他们的教育和影响，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毅然辞去唯爱社主席的职务，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上海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并任该会理事；同时又先后参加了“东北社”、“国难教育社”等抗日救亡团体。他利用当时在青年会工作中与青年群众接触的机会，广泛开展抗日爱国宣传，积极从事救亡活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开始。吴耀宗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参加了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大同盟”，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募集医疗器械和药品。^①在沪组织“民社”，宣传抗日，提倡民主。是年冬发起“节约救难”运动，以劝募“寒衣”为掩护，为新四军募集军需物资。^②1938年周恩来以第十八集团军代表的身份，驻节汉口，是年夏吴耀宗亦因公到武汉，他曾向有关同志表示，希望能会晤这位久已敬佩的中共

领导人。5月20日，周恩来在吴玉章的陪同下，亲自来到吴的住处晤谈。据他后来的回忆：“是日，报载徐州已经失守。周恩来同志分析了抗战形势，论述了国共合作和中国革命问题，还谈到中国共产党对宗教信仰的态度。他着重指出：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意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他的谈话立场鲜明，观点明确，对未来充满信心，给了我很大的启发。”^③

1941年吴耀宗随青年协会书局内迁四川成都的华西坝，继续担任该书局总编辑；次年，兼任基督教联合出版社社长。任职期间，他编译出版了具有进步倾向的《青年丛书》数十种，如《社会主义新史》、《反利润制度》、《今日之苏联》、《苏俄的公民训练》等等。^④此时蒋介石在国民党统治区加紧独裁统治，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吴耀宗对此极为愤慨，多次写文章、发表演讲，抨击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他还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威胁和迫害，大力支持成都青年学生的抗日民主运动，常昂首挺胸参加爱国学生反蒋示威游行的行列，并为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活动提供种种便利。他在成都华西坝等处，曾多次给青年学生作国际形势的报告，由于材料丰富，逻辑性严密，分析精辟，具有很大的说服力，使当时感到抗战前途黯淡、不满蒋的独裁统治的同学们顿觉心境开朗，视野开阔。当时他和文幼章、沈体兰被誉为三位民主教授。他的住所，常有不少进步青年趋访，亲如家人，因之被称为“民主之家”。

在四川期间，他曾于1941年12月11日和1943年5月25日，两次到重庆曾家岩五十号走访周恩来。尤其是1943年的

那一次，从上午谈到中午，周恩来留他用了午餐后，知道他身体欠佳，特为之在会客室搭铺午休后再继续畅谈到晚，那天董必武也在座，后来吴回忆说：“那次是周总理和我最长的一次谈话，继续了将近一整天。谈到党的宗教政策时，他重申：‘不同的世界观并不妨碍我们为了争取和平、民主而共同努力。你多年来为抗日和民主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在目前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对每个人都是考验，希望我们能继续合作，在即将到来的新时期中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这是周恩来同志对我最大的鼓励和鞭策。”“从此我更相信中国共产党，更加敬佩周恩来同志，对我国的前途也抱有更大的信心。临别之前，董必武同志还应我的要求，开了一张马列主义的书单给我，一共五六本，包括《共产党宣言》和《列宁传》。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这张书单和这些革命书籍。”^⑤

抗战胜利后，吴耀宗于1946年初回到上海。不久，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准备挑起全面内战。当时，制止内战，要求和平民主，已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上海几十个人民团体，在经过多次磋商后，决定推举一个由十一人组成的代表团，于1946年6月23日到南京请愿，向国、共两党和美国使华特使马歇尔三方面呼吁和平，要求停止内战。吴耀宗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他还为代表团草拟了一份给马歇尔的英文《备忘录》，严正表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屠杀中国人民。在到南京后第三天，他亲自将《备忘录》交给马歇尔。^⑥吴耀宗后来回忆说：“到了南京下关车站，代表团就被国民党特务包围殴打，许多人被打伤，送到医院。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闻讯后，半夜赶来看望我

们。邓颖超同志还送来了食物。第三天又在梅园新村中共办事处设宴招待我们。‘下关事件’清楚地表明：一方面是制造事端，欲置代表于死地而后快；一方面是热情支持，亲切接待。到底谁要和平，谁要内战，不是最鲜明的对比吗？回到上海以后，邓颖超同志在刘少文同志陪同下，代表周恩来同志到我家来表示慰问。他说：党很重视我给马歇尔的《备忘录》。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⑦在这以后，吴耀宗的爱国民主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继续支持和参加上海人民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民主运动，并曾帮助被迫害的青年学生摆脱特务的追捕。1948年他在《天风》周刊上发表《基督教的时代悲剧》一文，指出中国的基督教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关系太密切，在面临历史大转变的时代，基督教必须实行改革，否则将被淘汰。为此竟遭到了一些帝国主义分子的反对，被迫辞去《天风》社长的职务。由于反动势力的压迫，他在沪处境日艰，1948年12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锡兰（今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召开“亚洲基督教工作人员领袖会议”，吴被邀请作为讲员身份出席大会。会后，他借道香港，到达刚和平解放不久的北平，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协筹备工作。1949年9月，他以宗教界代表的身分，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后增选为常委）。1949年10月1日，他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参加了开国盛典。

1950年5月，政协委员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和赵紫宸等基督教界知名人士，到各地传达第一届政协会议的精神后，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们。在中南海作了三次长时间的谈

话。当他们反映了各地执行宗教政策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后，周总理说：“中国的基督教长期来曾受帝国主义的利用，广大的人民不理解，有隔阂，这是很自然的。你们应当行动起来，让人民理解你们。既然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国家，中国人难道办理不了中国人的宗教？”^⑧此后吴耀宗联合了全国基督教会团体的有影响人士四十人，带头发起了一个基督教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革新”运动，于1950年7月28日，发出了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革新宣言，宣布中国基督教坚决割断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种种罪行。对此，周总理曾建议说：“这份宣言可以发表，让人签名嘛！”^⑨到8月底，仅一个月签名人数已达1527人。为此《人民日报》在9月23日刊载了新华社发布的关于三自革新宣言签名的消息，在第一版上发表了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指出“这是基督教人士应有的使中国基督教脱离帝国主义影响而走上宗教正轨的爱国运动”，并刊出宣言全文，还用三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签名者全部名单。接着其他各报也纷纷发表评论，表示支持。到1951年3月底，全国各地各民族中的基督教徒在宣言上签名的，达十八万多人。^⑩在此基础上，1951年4月在北京成立了统一领导全国基督教徒爱国运动的“中国基督教徒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吴耀宗当选为主席。1954年7月，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吴耀宗继续当选为主席。他在发起和组织三自爱国运动中，团结广大基督教徒热爱新中国、走社会主义的道

路。他在反映基督教各界人士的正当要求和协助人民政府全面贯彻宗教政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了有益的作用。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三自爱国运动使中国基督教会得以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割断了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关系，逐步肃清了帝国主义的影响，使中国基督教会成为中国教徒自办的宗教事业。吴被誉为中国基督教界的思想家。^①

此外，他还积极参加了各种国际性活动。曾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多年，多次出席有关的国际会议，向世界各国友人介绍新中国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增进了互相了解和友谊，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保卫世界和平的正义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吴耀宗曾当选为第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委，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第一至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曾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主席，中国福利会执行委员等职务。

他在青年会工作期间，除了编辑、出版宗教方面的书籍外，还撰写和翻译了《黑暗与光明》、《没有人看见过上帝》、《甘地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等著作。1979年9月17日，吴耀宗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八十六岁。

注：

①② 吴大现：《我所知道的吴耀宗先生》，载《回忆吴耀宗先生》，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1982年8月版。

- ③⑤⑦⑧⑨ 吴耀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八十一周年》，《文汇报》1979年3月5日第3版。
- ④ 江文汉：《吴耀宗——中国基督教的先知》，《回忆吴耀宗先生》第42页。
- ⑥ 吴耀宗：《下关事件日记一页》，载《上海文史资料·上海解放三十周年专辑》中册，第77、78页。
- ⑩ 吴耀宗：《八个月来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总结》，《天风周刊》第十一卷第17—18期，1951年5月8日出版。
- ⑪ 邓裕志：《基督教界的杰出思想家具耀宗先生》，《回忆吴耀宗先生》第69页。

达 浦 生

陆琢成 朱正谊

达浦生，名凤轩，字浦生，以字行，经名努尔·穆罕默德，江苏省六合县人。他是中国伊斯兰教知名的大阿訇，也是回族中有影响的爱国教育家。1875年5月14日（清光绪元年四月初十）出生于一个研究回文的家庭。

达氏一姓是在元朝时期由新疆来至内地的，他们的祖先达布台是元朝的一名将军，曾官居台州路（今浙江省浙东地区），元亡后他的一支子孙定居六合，以达为姓。

达浦生的父亲达象乾，是六合县伊斯兰清真寺的阿訇。达浦生青少年时代跟父亲学习经文和阿拉伯文，1893年他自肩行李，长途跋涉来到北京，以求深造。

北京的回民很多，其中心清真寺是历史悠久的牛街清真寺。这里的教长是位对古兰经义和阿拉伯文、伊朗文造诣很高的王浩然阿訇。达浦生就是慕名北上拜王阿訇为师的。达氏抵京的第二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战事的结果不仅迫使中国忍受割地赔款的痛苦，而且造成中国面临瓜分的危机。失败的耻辱深刻地激发了中国各阶层人士的爱国心，也激发了青年达浦生的爱国思想。他师事王阿訇时，还时常听到老师讲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有关陕甘和云贵等地的回民起义暴动的故事，他感叹时艰，更坚定了爱国思想。当

时大多数回民只学习阿拉伯文，念诵经文，不重视汉文学习，尤其西北边远地区，甚至有反对读汉文书本的。这就造成回民的文化水平与汉民有一定差距。王浩然认为应举办回民学校，提高回民文化，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和社会地位。达浦生赞同这一主张，并决心为其实现而尽力。

1899年，达浦生完成学业后，北京的教友们曾邀他留京担任阿訇，他没有接受，抱着为回民做些切实的基础工作的决心回到家乡，六合县的教众就请他担任本县清真寺的教长。在此期间，达浦生在城内创办了一所广益启蒙学堂，招收回民子弟入学就读。它是六合县最早成立的学校之一。他在推行新的教育内容时，耐心地向教众宣传不应囿于经堂教学，而应让子弟学习汉文和数学等新的内容。他勇于任事、辛勤办学，颇得当地回族群众的信任和尊重。

1907年，王浩然阿訇从土耳其回国时邀来两名土耳其籍教师，把北京牛街清真寺的回文学堂扩充为回文大学。教学内容除了原有的经义、回文之外，增加汉文、数学及一些时务知识课。达浦生应王阿訇的邀请再度来到北京，因王阿訇年事较高，由达主持校务。这所大学培养了不少人才，知名的马松亭阿訇，即是该校毕业生。

1912年民国成立，是年秋马邻翼（字振五）任甘肃提学使（后改称教育司长、厅长），邀达浦生担任省视学兼回民劝学所所长。达去兰州赴任，在职六年走遍了陇东、陇西、陇南和宁夏、青海（当时宁夏、青海均为甘肃省辖地）各地，辅导各县开办学校，有些地方需留驻在那里一两个月，直至学校开学上课，才转往别处。达浦生辛勤而踏实的推动回民教

育，为地方作育人才，使他在甘肃回族民众中享有声望。回民中发生纠葛，也常请他出来排难解纷。

1918年，他自甘肃返回六合，再次从事家乡的回民教育工作。二十年代初，上海福佑路清真寺邀请达浦生去沪任教长。为了筹集兴办回民教育的经费，上海的几位从事国际贸易和交通界的教友，合组了一个进行对外贸易的商号——协兴公司，准备以经商盈利所得资助教育。达浦生有意于出国，作游学考察，于是就作为协兴公司的一员代表于1921年出国先至麦加朝圣，游历中东，回途畅游印度、马来亚、槟榔屿、新加坡，并在锡兰（今斯里兰卡）住了相当时期。他在考察各地穆斯林居民的教育情形的同时，也结识了不少伊斯兰教界领袖和名流。

1928年，达浦生从南洋回到上海，福佑路清真寺的教众再三恳切地邀请他担任教长。达浦生借主麻日礼拜的机会，作了一次演说，讲述国外见闻，并建议在上海办一所伊斯兰师范学校。教众踊跃认捐，次年于西门内方浜路青莲街建成一座三层大楼，一、二层为敦化小学，三层为伊斯兰师范校舍，秋季开学上课。小学部大多数为伊斯兰教众子女，师范部招收回族青年培养师资和研究古兰经义，毕业生选优资送前往阿拉伯国家留学深造。北京大学已故的著名阿拉伯语学者马坚教授，就是该校第一届毕业生。

1937年“八一三”，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岁末福佑路清真寺被日军占领，伊斯兰师范也被迫停办，该校学生不少人奔赴后方参加抗战工作。达浦生在上海租界内安置完毕清真寺和伊斯兰师范各项事务之后，他目击日军野蛮暴行，

为坚持抗战尽一己之力，认为有必要向国外宣传抗战，向伊斯兰教国家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唤起国际舆论共申正义，援助中国抗战。他在上海组成一个中国回教抗日宣讲团，得到教众及校董的赞助，乃于1937年9月由沪出发，一路经香港、新加坡、南洋各埠至巴基斯坦，与当地伊斯兰教领袖真纳会见，得到真纳的热情接待。再由巴基斯坦西行至开罗，在开罗埃兹哈大学作多次公开讲演，声讨并宣传日军侵华的种种罪行，呼吁中东伊斯兰教国家共申正义援助中国抗战。他发出要为拔掉插在祖国土地上的日本旗子而竭尽全力的誓言。他以阿拉伯文写了一册《告世界同胞书》。埃及国王法鲁克及皇后特为接见他，并设筵款待。这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向中东各国的反宣传一扫而清，中东各国的报纸纷纷刊载谴责日军暴行的文章、图片与新闻消息。

1939年夏，达浦生回国前往重庆。当时《新华日报》记者专程采访，发表报导，誉为爱国阿訇。后方社会各界及政府也对达的国外宣传抗战表示赞扬。为了给抗战作育人才，经过达浦生的多方努力，把上海伊斯兰师范迁移后方，择定在甘肃平凉复校，校名定为平凉伊斯兰师范，于1939年10月开学。学生除战区西来的回族青年外，亦就地招收回民青年。校长一席仍由达浦生担任。其后由于“法币”贬值，学校经费困难，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乘机于1941年将平凉伊斯兰师范改名国立陇东师范，并由教育部直接管辖。1943年教育部另派校长，达浦生改任参政员，常住西安。

抗日战争胜利后，达浦生回到上海，因经济拮据，常债台高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应周恩来总理的

邀约来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他与伊斯兰教界人士发起筹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并任该会副主任。他还担任民族事务委员会理事和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1958年起任院长。达浦生拥护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在加强民族团结和统一战线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他还积极参加外事活动，1952年率领中国伊斯兰教朝觐团去麦加朝觐。在途经巴基斯坦时，曾亲至真纳墓举行宗教的谒墓仪式，受到当地伊斯兰教徒的热烈欢迎，很多教众和阿訇热泪盈眶向前拥抱达浦生。^①达向他们讲述我国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及我国回族居民生活提高的情况。1955年他随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去印尼万隆出席亚非会议，任代表团的顾问。1954年起，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的宗教组长，第三、四届的常委。他又受聘为最高人民法院的顾问。

1965年6月21日，达浦生病逝于北京，享年九十岁。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达浦生：《自传手稿》，未刊。
- ② 陆廷珏辑：《达浦生年谱资料》，未刊。

于 斌

阎 铁 沙 洵 泽

于斌，字冠五，号希岳，后改号野声。1901年4月13日（清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生于东北边陲黑龙江的兰西县。原籍山东昌邑县于家庄，至其曾祖父于文成时始迁往兰西。祖父于刚，业医。父于水源，业农，当于斌六岁时去世，次年母亲也相继故去。于斌依靠祖父母抚育成人。

1909年于斌九岁时，曾入兰西初等小学读书。十岁时因为生活贫困缘故，随祖父母迁居海伦县海北镇。当时该镇是法国巴黎“远方传教会”建立的传教据点，亦称“若瑟屯”，凡信教者得依靠教会求得最低的温饱，于是全村皆信奉天主教。于斌的祖父携带一家人也皈依了天主教，于斌起教名保禄。他曾入海北镇一私塾攻读“四书”、“五经”。塾师是海伦县知名的汉学家邢汉卿老先生。

当时海北镇教堂的本堂神父，是法国人名叫陆恒厘（Henri Roubin, M.E.P），为培养中国籍神父，自办教会初级学校，从中选拔合适的对象，然后送吉林小修院或送一般学校学习文化。于斌被选中，1913年由教会保送入海伦高等小学。他有空还要做零工以补助生活。1916年，经教会资助考入齐齐哈尔黑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于斌一向学习成绩优异，考试名列前茅。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

全国，反帝爱国的思想也冲击到帝国主义在华的教会势力，广大爱国教徒，特别是青年开始觉醒了，纷纷投入爱国运动中去。于斌和同学们一道参加游行示威。因他功课好，身材高大，口才出众，被同学推为学生团团长。他带头在街上讲演和进行其他爱国活动。五四运动震撼了中国的统治者和帝国主义。黑龙江省督军鲍贵卿和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也极力反对学生运动。梵蒂冈教廷派员到北京，^④召开中国主教会议，明令公教人员不得“为公众表示举动之首领”，“不可容准天主教之男女学生结队游行，参予其事”。^①这样，于斌便被教会免除了保送资格，回到北镇屯在一家绸缎庄当“跑外”糊口。于斌读“四书”时，受忠君报国的思想影响较深，崇拜历史上的苏武、岳飞等人。所以，这时他自己取号“希岳”。

于斌回海北镇不久，众教友向陆恒厘为于求情，副本堂张方济尽力推荐，以及于的祖母恳求，最后，经吉林教区兰禄（Bishop Lavuoiliere）主教批准，1920年于斌才得进入吉林神罗学院的小修院，学习拉丁语文和神学。1921年，经主教高德惠（Gaspais August-Ernest-Pierre）保送去上海震旦学院预科，进修法文。一年后返回吉林神罗学院学习。这时期正逢梵蒂冈教皇庇护第十一世为改变欧洲神职人员把持亚非教会引起当地教友反感，而推行“本土教会”政策。在中国也尽量起用、培养本土神职人员。于斌学习成绩较好，被神罗学院选拔出来，1924年送往罗马传信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1925年于考入圣多玛斯学院，补修哲学一学期，即获哲学博士学位。1928年12月22日，在罗马晋升司铎（神父）。

翌年又获传信大学神学博士学位。当时意大利正盛行法西斯主义，于斌又入意大利国立伯鲁日大学攻读政治学。他研究了墨索里尼的政治思想，又获政治学博士。他在罗马进修几年，谙熟了拉丁文和英、法、德、意等国语文。

1929年，于斌被罗马教廷任命为外交随员，派往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作为访问团团员。这一举措是梵蒂冈教皇庇护十一世显示他重视发展亚、非地区的天主教之意。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于斌尚在罗马。当时传信大学的中国籍学生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十分愤慨。于斌对家乡沦陷更为义愤。他和同学们组织了一些爱国反日活动。揭露日本侵略东北的真象，深得意大利主持正义人士的支持。于斌晋升神父后，未担任传教职务，经常参加社会活动。这时，他曾组织“中意友善会”。1933年曾获意皇颁发的一枚爵士勋章。他虽有抗日思想，但是反共意识一向是非常强烈的。这是他后来走上反动道路的思想基础。

于斌1933年回国，他并没有回吉林教区。同年11月15日经梵蒂冈驻中国宗座代表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推荐，担任梵蒂冈教廷驻华代表公署秘书兼“中国公教进行会”总监督和天主教《益世报》的发行人。次年，又兼任全国公教学校视察主任。这期间，国内外政坛正瞩目于日本侵略东北问题。1932年10月，国联调查团抛出国际共管“满洲”的调查书。遭到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舆论的强烈反对。但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政府，却公开同意这份报告书；中国的天主教会奉梵蒂冈教廷指示，支持国联调查报告书，支持蒋介石的反共和对日妥协政策；在日本占领区，则表示“中立”

和“友好”，如规定早晨可向东方祭拜太阳神等。于斌对梵蒂冈这些指示，也是唯命是从，给予执行。

在教会方面，他尽力推行梵蒂冈的“本土教会”政策，把中国籍的主教、神父推到前面主事，这就遭到某些外籍神职人员的忌恨，甚至到梵蒂冈告他的状。他自己则以中国天主教公进会总监督身分，来往于南、北方，推动天主教徒参加“公进会”的各种活动，如暑期训练班、宗教学习研究会（后改光启学会），督促各教区成立分会，发行《新北辰杂志》等。1935年9月8日，由刚恒毅主持在上海召开全国第一届公教进行代表大会，到会主教、神父、分会代表一千多人。这是天主教传到中国以来，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中国籍的神职人员与外籍主教神父平起平坐，有力地推行了“本土宗教”政策。于斌跑前跑后，操办会务，颇受与会代表的欢迎，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

他又以全国天主教学校视察主任身份，到各教会学校视察，解决人事矛盾和经费等问题，他被聘为辅仁大学的董事兼伦理学教授。

刚恒毅是1922年由庇护十一世教皇派往中国担任特使的，衔命推行“天主教中国化”。他初到中国先觐见北洋政府要人，表示尊重所在国家政府，申明他是梵蒂冈教廷的专使，代表梵蒂冈处理在中国的天主教事宜。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刚恒毅又竭力适应蒋介石的政策，标榜反共和对日妥协。蒋介石参加基督教美以美会，他要求宗教界成为他倡导的“新生活运动”所标榜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封建道德宣传的主力军。在这方面，于斌和蒋最合拍，并成

了蒋与刚恒毅之间的桥梁人物，颇受蒋的垂青。于斌既忠于梵蒂冈又忠于蒋介石，因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从事社会政治活动，故被讥为“政治和尚”并有人为此向梵蒂冈教廷“告状”；但是，他仍然博得中国统治者和梵蒂冈教廷的欢心。1936年7月7日，罗马教廷任命他为南京教区的主教。9月20日在北平举行“祝圣礼”，旋即赴南京就职，他的地位更为提高。

1937年“七七事变”，蒋介石为了加强与意、德关系，派于斌赴意大利活动。于斌利用他的宗教地位和以往结识的上层人士开展活动，并把一些重要社会关系介绍给蒋的高级谋士蒋百里。于和蒋百里曾就中国与梵蒂冈教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向教廷国务院接洽。教廷国务院表示欢迎中国派使节驻梵蒂冈，教廷仍保留宗座驻华代表一职。蒋、于二人将这一答复迅速报告我国政府外交部，因中日战争正激烈进行，与梵蒂冈通使事暂被搁置，延至1942年7月，中国政府始派出谢寿康为第一任驻教廷公使。

抗日战争期间，于斌在重庆主持难民救济工作，并应聘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为了开展所谓“国民外交”，他的足迹遍及美、加、英、法、比、瑞、荷、意等国。1943年，他曾三度赴美晋谒罗斯福总统，为重庆国民政府争取美援。他有天主教的主教身份，又有蒋介石给他的许多头衔，本身又善于凭借这些关系广泛活动。所以，很快就成了名扬中外的风云人物。美国鲁温斯大学赠予他社会学博士学衔。1945年打通滇缅路后，他曾率领各界代表团赴前线慰问。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斌随同国民党政府回到南京。1946

年4月11日，梵蒂冈教廷晋升他为南京教区总主教。11月，他参加蒋介石召开的所谓“制宪国民大会”，1948年3月又参加所谓“行宪国民大会”，积极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

蒋介石集团逃往台湾后，于斌赴美组织国际反共势力，领导“中国游说团”（“China Lobby”）活动，为蒋介石的“反共复国”（于斌后来改为“灭共复国”）反革命“大业”效劳。当时他在美国政治界颇有影响。1949年前后，经于斌保送留美中国学生就达三千余名，在海外华侨各界他也有声望。他曾去华盛顿创办“中美文化协进会”和建立中国文化学院，在纽约创办“中美联谊会”、“自由太平洋协会”，并兼任台湾“教育部”在美文化教育事业顾问委员会委员。他的所谓“国民外交”，就是宣传“反共复国”。

1951年，他建议美国的西东大学创设远东学院，9月学院成立，聘于斌和越南吴庭艳等人为顾问。1959年经他几年奔走，得到台湾当局的支持和梵蒂冈教廷的批准，辅仁大学在台湾复校，设立文、理、法商三院，于斌任校长。1966年，他被任命为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的副会长。翌年，他担任台湾“中华学术院”哲学协会的首任会长。

梵蒂冈保罗六世教皇因教廷内保守派势力的复苏，又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宗教界开展反帝爱国和“三自”（自治、自养、自传）革新运动的成功，中国的天主教界拒绝听从梵蒂冈的反动命令，而瞩目于台湾的天主教，于1969年3月28日，竟然破格将一生主要从事政治活动的于斌晋升为枢机主教（亦称红衣主教）。于斌成为中国籍的第二名红衣主教。在于斌之前只有田耕莘一人，已于1967年亡故于台湾。

于斌晚年一直追随台湾蒋介石集团，曾担任“国民大会”代表和主席团主席；还担任薛岳为主任的“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宪政研讨会”的常务委员；“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的副会长；“中国电视公司”常务董事；陈立夫为理事长的台湾“中国孔孟学会”的理事等。在天主教界，他担任天主教主教团主席；《益世报》的董事长等职。

台湾辅仁大学的文学院属台湾公教团系统，理学院属圣言会，法商学院属耶稣会，三院各自为政，互相勾心斗角，矛盾很深，对于斌都有意见，曾两次联名向梵蒂冈控告于斌，要他下台。1978年7月，于斌向梵蒂冈和辅仁大学董事会辞去他干了十八年的校长职务，梵蒂冈教皇仍任命他为辅仁大学总监督。

于斌虽然取得了神学、哲学、政治学的博士学位，并有赠予的社会学博士头衔，但是他并没有这方面的专著。于斌的思想也不是纯天主教的，而是天主教与中国儒家思想的混合物。他企图把中国古老的封建道德观念与天主教的道德观糅合在一起。他少年时先读“四书”、“五经”，后来入吉林神罗学院小修院学神哲学，这奠定了他后来的思想基础。他在罗马传信大学任教时，讲授中国哲学和古典文学，曾提出要建立一个“天人合一”哲学，即“基督孔孟人性论”

(Christian-Confucian Humanism)。所以，有的学者归纳于斌的思想是“孔子加基督”体系。其实他对儒家思想并没有深入研究，但是在外国宗教界人士面前谈论儒家思想，讲授《诗经》等，就颇能使他们刮目相看了。于斌在中国统治者

面前，是个受“尊重”的最有势力的洋教头头。蒋介石得到这样的人为他在国内外宣传联络，真是求之不得。所以他成为蒋氏夫妇的座上客和国民党政府的“社会贤达”。蒋介石给了他许多很高的头衔。梵蒂冈也给了他枢机主教头衔。他爬上这样高的社会地位，在当时中国天主教界可说是独一无二了。

1978年8月6日，梵蒂冈教皇保罗六世逝世。于斌9日从台湾经纽约赶赴罗马，16日准备参加保罗六世葬礼时，在住所心脏病猝发去世。28日遗体运回台湾，安葬于台湾辅仁大学校园。

注：

- ①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1931年上海版，第311页。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李霜青：《于斌枢机纪念文集》，1981年台北版。
- ② 于斌：《哲学言论》，1961年台北版。
- ③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1931年上海版。
- ④ 《中国教会的呼吁》（The Voice of the Church in China），1938年纽约版。
- ⑤ 《圣经杂志》1920年四月号，上海版。
- ⑥ 《传记文学》第19、30、33、34、39卷中有关文章。
- ⑦ 《于斌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出版。

黄金荣

吴云乡

黄金荣，字锦镛，是旧上海显赫一时的“三大亨”之首^①，1868年12月14日（清同治七年十一月初一）生于苏州。黄家祖籍浙江余姚，父黄炳泉原是余姚县衙门里一名颇有点名气的“捕快”。清同治年间被请到苏州破案，就此在苏州府任“捕快头”^②，并娶当地邹氏女为妻。金荣为邹氏所生，乳名和尚，因脸上有几粒大麻子，人们呼之为“麻皮金荣”。

黄金荣幼时受父母溺爱，不爱读书。1880年黄家迁居上海南市，在三牌楼开设一片小茶楼，不久其父、母相继去世，他借居于靠洗衣维持生活的姑母家里。稍长，混迹于地痞流氓、盗匪赌棍之间，常窃姑母替人洗涤的衣服去典质，手中稍有点钱就聚赌、抽鸦片或狎妓胡闹。后来竟结伙抢劫他在那儿学艺的城隍庙萃华堂裱画店，因此被店主开除。黄金荣乃通过他父亲生前的老相识徐安宝的关系，在法租界巡捕房里当上一名“包探”。他的主要活动地点是郑家木桥附近的“聚宝茶楼”，每天上午他坐在固定的座位上，泡上一壶茶，交线索、通情报，讲斤头的就纷至沓来。他通过码头上、租界里的大小流氓侦察、追索“案犯”，为租界当局效劳。同时也在这茶楼里策划走私、绑票等勾当，以之聚敛钱财。

经过一段时期的活动后，黄金荣的“才干”渐为租界当局所赏识，称赞他是“租界治安的长城”。有一次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书记樊尔谛带着他的妻子樊菊丽到太湖游玩，被横行太湖的土匪绑走。法租界当局要黄设法营救，黄与杜月笙等计议后，派与太湖匪首有联系的高鑫宝前去“拜山”。结果匪首“太保阿书”和“猪猡阿美”分文不取，交出一对法国“肉票”^③。

黄金荣进法租界巡捕房后，由包探、探目、督察员直升到法租界警务处中唯一的华人督察长，与法捕房总巡费沃礼及公董局总办魏尔第关系密切，深得法租界当局的倚重。法国东亚全权大臣安南总督为表彰他的功绩，三次授予他头等和二等金质、银质宝星^④。法捕房里的许多高级华籍职员如总翻译金苗泉、严志超，刑事督察长金九妹，政治部督察长程子卿，探长李耀龙等都是他的门生。法租界巡捕房是他在上海称霸一方的支柱。

1927年黄退休后，法租界当局继续聘他为警务处顾问。

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买卖军火、收集情报、采办舶来品、运销鸦片的主要水陆码头，以致北洋官僚、各地军阀、响马匪帮或多或少都和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三大亨”有交往，黄金荣等也为他们在上海的起居安全提供方便。1917年7月，因“辅助护军使署办理重要事宜，颇为出力”经松沪护军使卢永祥呈请，北洋政府陆军部给黄金荣颁发二等银质奖章^⑤；黎元洪在总统任内也曾授他陆军步兵上校侍从武官的头衔^⑥。有一次福建督理周荫人的参谋长杨知侯的六箱字画、瓷器等古董运抵上海码头时全部被窃，松沪护军使何

丰林请黄金荣协助追索，黄金荣限其手下人六小时破案，结果仅用三小时就将原物如数追回^⑦。1923年，黎元洪被迫退总统职位后，曾南下活动，到上海时作为黄金荣的客人“驻蹕”三个月。黄派杜月笙及其“小八股党”^⑧保驾，使这位前总统十分感激，特别制作了十个纯金奖牌，分发有关人员以示感谢。

1924年9月“齐卢战争”后，统治上海的军阀更迭频繁，但不管谁家当权，黄金荣等都是军阀们竞相结交的对象。更有一些人想借黄金荣的“牌头”广开财路或得到某种便利和保护，争相爬黄的山头。蒋介石早年上海做股票经纪人时，经虞洽卿介绍就曾拜黄金荣为师^⑨。蒋介石后来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身份回到上海，位高权重，黄很知趣地主动把拜师名帖退还给蒋介石。

黄金荣凭借自己的地位和权势，在租界当局的默许下，指挥他的流氓徒众给上海烟土商押运鸦片，从中获得巨利。后来黄和杜月笙、张啸林等联合潮州帮土商，办起专营鸦片的“三鑫公司”，上海当地百姓称它为“黑货公司”。在法租界捕房的武装警卫下，包办法租界的烟土经销，其后松沪护军使何丰林和军警头目俞叶封也相继入股，总资本约二百七十万银元^⑩。为运输鸦片组织了飞龙汽车队，甚至发展到动用何丰林管辖下的高昌庙海军兵舰，担任烟土运输^⑪。在军阀、租界当局和军警一体保护下，三鑫公司的“事业”日趋“兴旺”，为黄金荣聚集了大量财富。当时法国驻扎上海法租界的一营军士，约五百多名的全部生活费用，也全由“三鑫公司”负责供给^⑫。“三鑫公司”的赢利到底有多少，谁

也说不清。仅当了二年经理的范回春就盖了洋房住宅，在嘉定买进千亩良田，戴上全上海最大的十克拉钻戒。

黄金荣聚财的另一途径是开赌局。早在1917年以前，他就和门下人开设了新吉利赌台，后来发展到合股开设五六个大赌台，豢养五百余名年轻力壮的流氓当“抱台脚”，保护赌场。黄金荣除每月从各赌台分得盈余红利外，每个赌台每天要孝敬他一百元。另外，黄家数以百计的仆佣，不用黄金荣支薪，一律到赌台去拿“俸禄”。此外，他又先后开设日新浴室、逍遥浴室、大观园浴室、大利春酒家、荣记大舞台、黄金大戏院、共舞台剧场、大世界游乐场等。黄金荣对这些游乐场的经营颇为霸道，如1921年共舞台演出连台京剧“莲花公主”，当演到天宫盗宝一幕，调换布景，舞台灯灭时，有一新昌五金店职工唐长根用手电筒对台上照了几下被黄看见，便指使手下人把唐拉到帐房间痛打一顿，尚不解气，还以捣乱场内秩序的罪名，送到嵩山路巡捕房罚款并拘押三天^⑬。1924年间，黄扩充共舞台的场地，仅以二担米钱的“搬场费”，强要邻近的一家五金杂货店在半月内迁出。店主叶庆祥不同意，黄即破口大骂叶不识抬举，不出三天叶被捕房抓走。最后叶妻到“黄公馆”哭求“请罪”，答允迁出店堂给共舞台，这样叶庆祥方才获释。

黄金荣的“桃李门墙”遍及上海各个角落和行业。军人、政客、律师、巡捕、报人、商贾、戏子、舞女、侍役、车夫和地痞流氓，拜香入黄门的数以千计，甚至有人估计有两万多人^⑭。但黄早先并未正式加入清帮或洪帮。按照帮规，外人用帮会名义纳名帖收徒弟是要受到严厉惩戒的。曾有人去

函责问他为何冒充清帮“大”字辈张镜湖的门人，“博致虚名”。但他凭借在上海流氓群中的声势，并没有因此招致太大的麻烦。黄金荣迟至退休之时，才托杜月笙硬要张镜湖接受他的名帖和两万元的赞敬^⑤。他这个“粽子”终于弄假成真，成了清帮“通”字辈的人^⑥。

1927年3月底，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夕，先后派杨虎、陈群、王柏龄带着秘密使命化装潜入“黄公馆”，和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会晤，密商反共清党事宜，这时黄金荣虽已退休在家，仍把为蒋介石效力看成是“成龙修凤，得道升天”的大好机会，一再表示，“全力协助，义无反顾”。他们当即着手组织“中华共进会”^⑦，以网罗党羽。同时委托洋行买办购置枪支弹药。黄还“慷慨”地把他的“公馆”作为匿藏军火的仓库。4月11日晚，他们以有要事相商为借口，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骗到杜月笙住所，毒打后带到枫林桥附近加以杀害。当夜黄、杜、张和杨虎、陈群、王柏龄在刘、关、张桃园结义图前祭告天地，喝酒结义。4月12日凌晨，在攻打上海工人纠察队各据点时，黄金荣等还亲临阵地督战。第二十六军则假借调解“纠纷”，骗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黄金荣还伙同杜月笙、张啸林联合印发十万份“警告男女工人书”，并在沪上各报发表所谓“真电”对共产党大肆污蔑，颠倒是非，说“共产党流行病，势将传染于大江之南，不早歼灭，蔓草难图，噬脐莫及”^⑧。为了表彰黄金荣等的反共殊勋，蒋介石委任黄金荣和杜月笙、张啸林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少将参议，随后什么军事委员会参议、行政院参议的头衔也接踵而来^⑨，成了“地方政

要”、“党国新贵”。

对追随蒋介石清党反共有功的黄金荣，法租界当局倍加优待，同意他在租界内继续开设赌场。就在“四一二”政变以后不久，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一百八十一号开设了上海最大最豪华的赌场。场中轮盘赌台、牌九麻将、梭哈摇缸、烟榻酒肴一应俱全，并有女招待在旁侍奉巾栉，挑土烧烟。这个销金窟开张以后，车水马龙，赌客云集，为黄金荣提供了又一个聚财的新来源。

黄金荣上述种种“营业”和产业，加上上海源成里、钧培里数十幢里弄房产，苏州唯宁乡下的数百亩良田，成了家产巨万的大富翁。1931年他在上海南郊漕河泾，耗资三百五十万银元，建造了占地六十余亩楼台亭阁布局有致的黄家花园^②，落成时蒋介石还特意手书“文行忠信”的刻石碑相赠。黄金荣从此深居简出，声言归隐退休，不过问外务，事实上他暗地指挥、坐地分赃的老行当，从未放弃过。

成了大阔人的黄金荣也经常办些“善事”，如早在齐卢战争期间，他领衔联名发起“江浙善后义赈会”，相隔一年发起组织“联义善会”；1926年1月，又发起重建被火烧毁的上海城隍庙，同时还创办“上海乞丐收容所”。每年寒冬岁末，他总要散发一批“施米票”、“施米钱”和“度年钱”。他自夸“拯救了许多无法过年的穷人”。他的另一个“善举”就是常年散发贴有黄本人图像的“十滴水”^③。

黄金荣常对他的徒弟说：事情不要做绝，光棍不打九九，留个余地为好。他一方面为法租界当局效劳，另一方面也接近革命党人，曾捐款给孙中山一千元并答应对此后来沪的

孙中山的同志和朋友给予照顾。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他一度把“大世界游乐场”借出作为难民收容所，也允许“上海救济协会”设在“大世界”里，但后来又把它们赶走继续营业。

1938年夏天，上海租界已成了“孤岛”，日本侵华海军驻沪武官府特派海军少将佐藤到黄家，邀请他筹备组织上海的汉奸政府，黄托病不见，借口年老多病没文化而加以拒绝。黄常以岳飞传教育心腹说：土地是中国的，日本人虽然打进来，占据上海，但它不能把上海搬到日本去，我能得势窜上去，同蒋介石有关系，他好我也好。现在他在重庆，我只能帮他，不能同日本人打交道，遗臭万年，应当为子孙后代着想^②。但佐藤再一次来访时，两人达成两条秘密协议：其一，黄尽力支持汉奸政府，派遣徒众党羽参加汉奸组织；其二，黄为日本侵略军运销烟土，充作军饷^③。八仙桥、龙门路钧培里黄家门，从此经常停着悬挂日本将级军旗的小汽车，一批黄门弟子也开始参加汉奸组织。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黄金荣派龚天健赶赴南京，代表他参加“盛典”。汪精卫做寿时黄又派龚天健送去《长眉罗汉寿佛图》一幅，以示祝贺。1943年春，陈群就任汪伪政府江苏省省长时，黄亲自率领若干门生，乘坐专车赶往苏州捧场。江苏省的一些汉奸机构里都有一些黄门弟子，如吴县县长沈靖华、江阴县长韦长镇、松江县长杨士杰、无锡县保安队长周阿富等。当了伪官的门人，每月都向黄孝敬厚礼。

除此以外，黄金荣在汪伪的“和平军”中也有很大影响。

黄的拜把兄弟太湖惯匪徐林诚任“和平军”第一集团军第二军军长，徒弟郝鹏举任淮海省保安司令，过房儿子陶雪生任淞沪铁道护路团司令。驻扎在苏北一带，专门对付新四军的一些“和平军”的将领，如集团军司令李长江、军长颜秀吾、三十六师师长田铁夫、二十八师师长丁聚堂等，都是黄的门下。在法租界巡捕房时的得意门生巡捕领班鲁锦臣，日伪统治时期是“和平军”三十六师驻沪办事处处长，负责采办军用物资装备伪军。

黄金荣与日伪显要过从密切，汪伪政府的社会部长丁默邨、工商部长梅思平都是黄家的常客。1944年上海糖业公会从台湾私运大宗食糖来沪，被汪伪财政部税警团查获，以偷税逃卖论处。糖业公会会长史雨春托黄设法疏通，黄派人向财政部长周佛海说情，结果人员释放货物发还，糖业公会送给黄二十根金条，以为酬谢^②。一些汉奸说：麻皮金荣在“南京政府”里虽然没有公开头衔，但他的权力不下于周佛海呢！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翌年2月蒋介石首次到达光复后的上海，黄金荣又以当地绅耆的身份，受到蒋介石亲自接见。

黄金荣到晚年热衷于佛事，上海市区、近郊乃至苏杭一带的寺庙庵堂里，经常能看到“弟子黄金荣敬奉”的匾额。1946年，他发起修建上海西郊龙华古寺。派人到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等佛门胜地进香布施，每年清明节则亲自领着一群人到郊县各庙宇，烧“十庙八寺”香。

1946年2月23日黄金荣组织起“荣社”，由其大徒弟邱子善，儿子黄源涛，外甥邹政之等分别担任理事、监事，并

企图在杭州、苏州、南京、无锡等地设立分社，但由于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其计划未能实现。上海解放后，荣社被勒令停止活动。

上海解放前夕，黄金荣家中的动产和企业中的资金已暗中抽出变换成黄金、美钞，连同地产证、企业执照等，均由他的大儿媳李志清一并带到香港，并在港、澳等地购屋置产。上海解放后，在军管会的教育启发下，黄金荣曾公开登报检讨自己的罪恶。为争取教育更多的人，人民政府给以宽大处理。

1953年6月20日黄金荣偶受风寒发高烧，治疗无效，死于他自己的寓所，终年八十五岁。

注：

- ① 大亨，上海俗语，意指有权有势的阔佬。“三大亨”，在旧上海系指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又称“三闻人”。
- ② 多数资料采此说，但1931年出版的《海上名人传》第61页却说“父炳泉公江苏提标候补守备”。而《众家老板黄金荣》一书中则说：黄家原籍绍兴，太平天国军兴，黄家逃往苏州，经由朋友的介绍在苏州府衙门充任捕快。
- ③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法律研究所社会问题组编：《大流氓杜月笙》，北京群众出版社1965年版，第19页。
- ④⑥ 海上名人编辑部编：《海上名人传》，1930年5月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第61页。
- ⑤ 《上海时报》1917年7月4日。
- ⑦ 同⑤，第18页。
- ⑧ 据上海市公安局档案抄件。小八股党是指马祥生、叶焯山、顾嘉棠、杨俊棠、马汝祺、芮庆云、王家丰、高鑫宝。
- ⑨ 见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社，第10页。又见薛耕莘：《近代上海的流氓》，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三辑（总第31辑）。
- ⑩⑪ 1925年7月25日上海《民国日报》二张二版。
- ⑫ 邹政之：《黄金荣的一生》，上海市公安局档案抄件，第13页。

- ⑬ 同⑫，第6页。
- ⑭ 关于黄的徒弟到底有多少，各种说法差别很大，程锡文在《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一文中说二三千人；而薛耕莘在《我接触过的上海帮会人物》一文中说，共收南北徒弟数万人。上述两文均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四辑。
- ⑮ 参见章君谷：《杜月笙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版。又见樊崧甫：《上海帮会内幕》，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三辑。
- ⑯ 清帮有四十八字辈，分前后二十四。前二十四字：“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人（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圆明兴礼，大通悟学（觉）”；后二十四字：“万象依皈，戒律传实，化度心回，普门开放，临持广泰，光照乾坤”。“通”字是第二十二辈。
- ⑰ 有别于1907年8月焦达峰、杨任等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共进会”。
- ⑱ 见1927年4月13日、14日《申报》第七版。
- ⑲ 同⑫，第17页。
- ⑳ 解放后辟为“上海桂林公园”。
- ㉑ 同⑫，第23页。
- ㉒ 程锡文口述、杨展成整理：《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载《旧上海的帮会》，见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四辑。
- ㉓ 同⑫，第14页。
- ㉔ 同⑫，第11页。

《民国人物传》第一至七卷目录索引

(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中文数字表示

卷数,阿拉伯数字表示页数。)

二画

丁文江	一	370
丁福保	六	348

三画

于斌	七	566
于学忠	二	99
马衡	六	324
马占山	三	108
马师曾	二	380
马君武	七	13
马约翰	三	370
马宗汉	四	12
马相伯	一	360
马福益	七	53
马福祥	六	115
马鸿宾	六	57

四画

王振	六	161
王一亭	四	255
王小航	四	315
毛士珍	七	218
王天培	六	140

王文华	六	69
王少堂	五	360
王占元	二	211
王永江	七	109
王正廷	七	37
王尧臣	四	217
王亚南	五	295
王光祈	三	326
王志莘	四	193
王伯元	六	308
王伯群	七	45
王希天	七	430
王国维	一	366
王和顺	七	71
王金发	七	194
王金铭	五	30
王宠惠	二	139
王性尧	六	232
王闾运	七	530
王荆山	七	371
王造时	六	330
王统照	五	265
王家烈	五	130
王家襄	六	76

王禹卿

井勿幕	三	80
太虚	三	381
丰子恺	四	347
方声洞	四	7
方声涛	四	108
方椒伯	四	189
方液仙	四	166
巴布扎布	二	235
孔伯华	四	390
邓铿	三	1
邓宝珊	六	43
邓初民	五	100
邓演达	一	111

五画

石友三	一	248
石筱山	四	394
左舜生	三	208
龙云	三	137
龙济光	七	235
龙鸣剑	五	26
卢汉	三	145
卢兴邦	五	160
田桐	三	53
田耕莘	一	399
史量才	一	356
叶企孙	七	463
白朗	二	153
白毓昆	三	21
包达三	五	210
冯占海	七	188
冯国璋	二	170
司徒乔	四	334

司徒美堂

二 91

六画

老舍
达浦生
吕公望
吕志伊
吕思勉
师复
朱执信
朱自清
朱志尧
朱家宝
朱家驊
朱惺公
朱葆三
伍廷芳
伍连德
任可澄
任白涛
任鸿隽
华之鸿
齐白石
江庸
江亢虎
江加走
汤子敬
汤化龙
汤用彤
汤尔和
汤寿潜
许广平
许世英

五 242
七 561
四 76
六 32
七 499
四 397
一 62
一 349
四 236
五 156
四 129
七 437
七 376
一 101
五 366
七 99
七 424
七 483
六 255
二 363
五 107
一 391
四 357
五 233
二 21
三 366
六 181
六 63
三 292
七 85

许地山	三	346
许冠群	四	261
许雪漱	二	33
许鼎霖	五	183
刘天华	五	344
刘文典	五	308
刘仙洲	五	301
刘半农	三	333
刘师培	一	382
刘国钧	五	203
刘柏森	四	205
刘显世	三	169
刘显潜	六	161
刘航琛	六	280
刘复基	六	1
刘桂棠	三	215
刘鸿生	七	339
刘道一	三	13
刘撰一	三	47
刘镇华	三	184
关伟林	六	280
孙渡	六	167
孙大有	七	363
孙中山	一	5
孙本文	五	330
孙多森	五	189
孙传芳	一	208
孙蔚如	三	125
孙衡甫	六	270
阮玲玉	二	369

孙多钰

七画

劳乃宣	三	391

严复	三	286
严宝礼	五	285
严裕棠	一	304
李弥	六	145
李铭	二	271
李纯	一	198
李士群	五	166
李公朴	二	334
李仪祉	三	300
李更生	七	513
李苦禅	七	539
李宗仁	七	128
李剑农	七	492
李叔同	三	317
李厚基	四	114
李根源	四	45
李烈钧	二	105
李康年	五	225
李德全	六	37
李鼎铭	三	75
杜月笙	一	314
杜定友	五	336
杜重远	二	311
杨杰	五	69
杨森	六	121
杨铨	七	442
杨希闵	五	124
杨虎城	一	119
杨笃生	二	53
杨振鸿	五	18
杨登鹏	七	269
杨槃三	一	309
吴樾	二	46

吴兆麟	五	53
吴克仁	七	183
吴奇伟	三	162
吴佩孚	二	200
吴铁城	七	29
吴景濂	六	87
吴禄贞	二	12
吴鼎昌	二	145
吴蕴初	一	274
吴懋鼎	五	195
吴耀宗	七	553
岑春煊	二	188
何 键	三	199
何成浚	五	135
何香凝	二	67
邱菽园	五	118
余日章	一	402
余芝卿	五	229
邵力子	七	1
邵元冲	二	125
邵飘萍	一	335
邹 容	二	17
邹 鲁	一	377
冷 通	四	62
沈克非	七	548
沈钧儒	二	321
沈联芳	四	251
沈鸿英	七	251
汪逢春	六	371
汪精卫	七	284
沙彦楷	六	284
宋则久	一	295
宋庆龄	五	1

宋教仁
陈 诚
陈三立
陈万运
陈天华
陈友仁
陈少白
陈公博
陈朵如
陈光甫
陈其美
陈宝琛
陈绍宽
陈春圃
陈炯明
陈济棠
陈家鼎
陈炳堃
陈望道
陈焕章
陈嘉庚
陈楚楠
陈蝶仙
陆征祥
陆宗輿
陆荣廷
陆费逵
陆皓东
阿 炳
张 贞
张 勋
张 澜
张 继

一	43
六	93
三	323
四	180
一	48
五	64
三	41
七	305
六	275
二	265
一	105
六	166
六	50
五	179
三	161
三	191
七	62
七	242
四	288
二	393
二	241
五	42
三	225
一	227
一	170
一	190
三	230
五	14
五	356
七	274
一	216
三	66
二	114

张 榕	三	16
张 睿	一	259
张云山	一七	200
张开儒	六	25
张凤翔	三	61
张文光	二	57
张石川	六	364
张本政	七	388
张百麟	六	19
张岚峰	六	194
张作霖	一	179
张伯苓	二	306
张君劢	二	409
张国淦	二	352
张治中	五	84
张宗昌	一	236
张鸣岐	二	194
张振武	四	30
张振勋	三	253
张培爵	一	76
张敬尧	七	228
张辅忠	四	382
张啸林	四	180
张嘉璈	三	237

八画

林 文	二	50
林 森	二	119
林文庆	三	387
林可胜	五	363
林白水	三	310
林述庆	一	89
林柏生	六	188

林觉民	四	1
林语堂	二	388
林砺儒	三	360
武百祥	七	357
范旭东	六	200
范筑先	六	25
茅 盾	六	316
郁达夫	五	250
欧阳予倩	三	340
罗君强	五	173
罗佩金	七	214
罗振玉	一	387
罗家伦	五	149
罗常培	五	313
罗福星	五	36
周凤岐	七	263
周西成	六	134
周作民	四	230
周佛海	七	315
周钟岳	七	92
周学熙	七	328
周瘦鹃	五	276
金润庠	四	211
竺可桢	七	453
庞元济	四	243
郑正秋	四	376
郑伯昭	七	382
郑孝胥	四	148
郑振铎	五	257

九画

赵 声	二	28
赵 俾	七	106

赵凤昌	七	117
赵尔丰	六	173
赵寿山	三	116
赵秉钧	二	181
荣宗敬	一	278
荀慧生	六	359
胡适	七	394
胡筠	六	228
胡文虎	五	199
胡汉民	一	131
胡若愚	七	256
胡景翼	七	206
柯劭忞	六	344
项松茂	四	172
俞庆棠	五	324
俞佐庭	四	247
俞承修	七	520
俞颂华	四	302
侯西反	五	121
段祺瑞	一	162
禹之谟	一	81
秋瑾	一	52
施从云	六	5
施今墨	三	378
闻一多	三	278
洪深	二	344
洪式间	四	386
梁石	四	282
费汎	五	290

荣德生

十画

秦润卿	六	212
秦德纯	一	253

聂云台	二	249
莫觐清	四	223
袁世凯	一	145
袁祖铭	六	128
袁履登	六	312
夏威	七	152
夏超	六	82
夏曾佑	四	321
夏瑞芳	一	291
都锦生	四	185
倪映典	二	41
徐润	一	266
徐谦	五	112
徐永昌	六	109
徐世昌	一	156
徐志摩	三	353
徐宗汉	四	34
徐树铮	一	204
徐新六	六	223
徐锡麟	一	58
徐镜心	七	57
殷夫	四	275
钱玄同	四	307
钱新之	三	246
郭乐	一	285
郭琳爽	四	198
席尼喇嘛	二	61
唐生智	三	90
唐绍仪	一	126
唐拾义	六	287
唐继尧	三	152
唐群英	七	77
高星桥	六	244

蔡声白

谈荔孙	六	264
陶行知	一	342
陶成章	二	22
陶克陶胡	三	220

十一画

曹 银	一	172
曹汝霖	一	231
曹聚仁	七	418
黄 兴	一	35
黄 郭	一	140
黄乃裳	三	306
黄远庸	五	281
黄仲涵	三	259
黄明堂	五	47
黄金荣	七	574
黄泽霖	六	10
黄奕住	六	218
黄宾虹	四	342
黄焕南	六	259
黄琪翔	三	100
黄锡滋	六	291
黄楚九	四	268
萧龙友	三	375
萨镇冰	四	69
梅兰芳	四	381
盛丕华	七	349
盛世才	七	173
盛宣怀	二	256
虚 云	二	357
章士钊	四	53
章太炎	二	276
章伯钧	五	92

黄明安

章宗祥	三	174
章鸿钊	七	476
梁士诒	一	221
梁启超	二	289
梁墨缘	五	214
阎宝航	四	39
阎锡山	四	90
康心如	六	249
康有为	一	320
寇 遐	三	86
续范亭	二	83

十二画

彭泽民	五	77
彭家珍	三	7
韩复榘	一	243
董显光	四	142
蒋光慈	七	411
蒋作宾	七	21
蒋梦麟	五	142
蒋维乔	五	317
蒋鼎文	四	135
贾廷芳	六	207
靳云鹏	六	102
喻培伦	一	85
程砚秋	四	366
程家桢	六	14
程德全	四	82
程璧光	三	33
焦达峰	一	72
傅东华	七	525
傅抱石	五	340
傅斯年	六	352

傅筱庵	四	154	譚鑫培	五	350
舒新城	四	297	熊庆来	七	469
魯迅	三	263	熊成基	一	68
曾朴	二	302			
曾琦	二	399	十五画		
曾俊臣	五	238	樊钟秀	五	58
溫生才	二	38	黎元洪	二	161
謝晋元	四	17	黎烈文	五	271
			黎锦熙	七	504
十三画			滕虎忱	六	237
簡照南 簡玉阶	一	298	穆穆楚克棟魯普	二	222
詹大悲	四	23	潘天寿	四	352
詹天佑	四	327	潘光旦	六	337
			潘昌猷	六	296
十四画			黎玉琨	六	156
蔡 鐸	一	93			
蔡元培	一	328	十六画		
蔡楚生	四	370	薛觉先	二	374
廖 平	七	536	穆藕初	一	270
廖 磊	七	161			
廖仲愷	二	1	十七画		
廖耀湘	七	143	戴季陶	四	121
譚人凤	二	78			
譚延闓	二	129	十八画		
譚浩明	七	246	魏 如	五	220

后 记

本卷由朱信泉、宗志文编辑。本卷的部分初稿，李静之参加了编辑工作